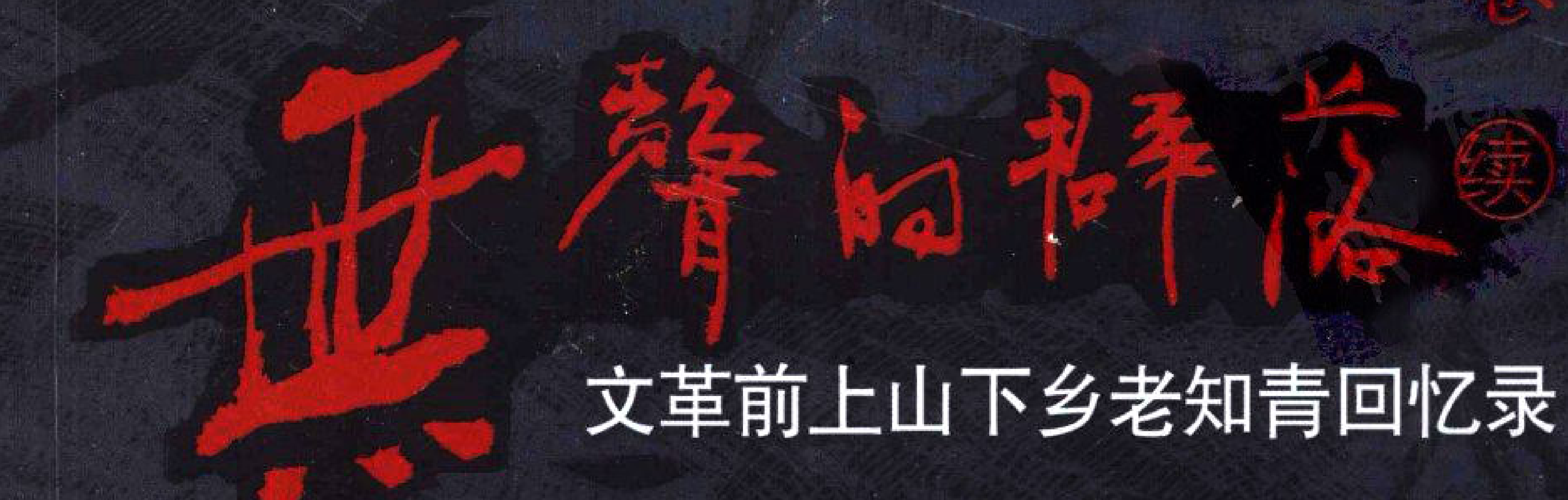
邓鹏／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上卷



邓鹏 /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無聲的群落（续）

“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的群落：续编 /邓鹏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29-01214-4

Ⅰ. 无… Ⅱ. 邓… Ⅲ. 回忆录-中国-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451 号

无声的群落（续编）
WUSHENG DE QUNLUO
邓 鹏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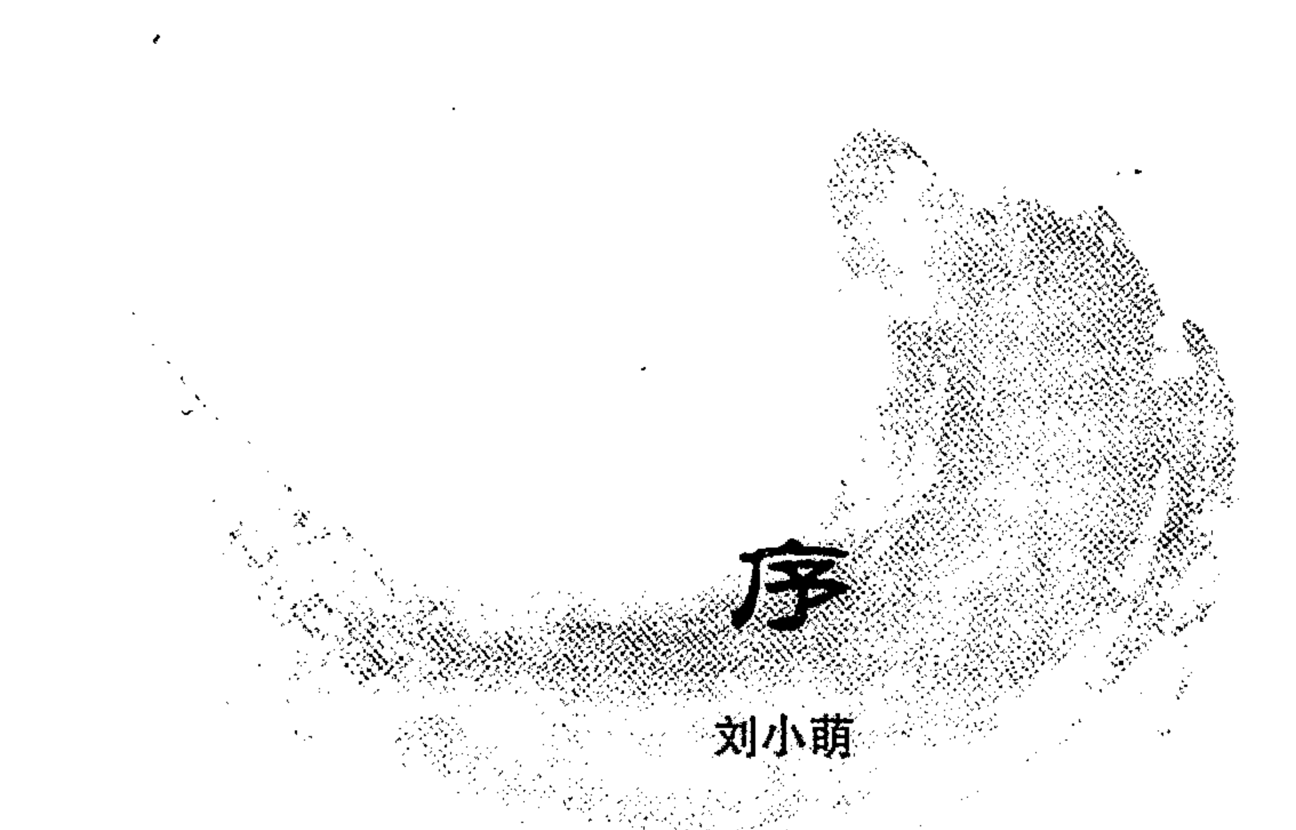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戴前锋
责任校对：何建云
封面题字：丁重九
插 图：甘 铭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58 字数：1070 千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套
ISBN 978-7-229-01214-4
定价：97.00 元 / 套（上下卷）



序

刘小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在官方组织下走向农村和边疆。这场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知青这一庞大群体中，除了人们熟知的“文革”中下乡知青，还有一个“无声的群落”，即“文革”前知青。“文革”前知青约有130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群体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致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200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年老知青回忆录》，作者是“文革”前从重庆前往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知青。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将自己的坎坷经历，汇集为一部催人泪下、真切动人的纪实文本。回忆录一经行世，在各地知青中产生热烈反响，好评如潮，并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当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百佳图书之一。

本书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提出编写一部全国老知青回忆录的宏大计划。三年来，包括北京、重庆、成都、长沙、达州的老知青在内的《无声的群落》(续编)编委会齐心合力，在各地知青的积极响应下，完成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书稿，即将印行。本书作者都是1964年和1965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目前散居在全国二十余个城市和海外，一个共同的夙愿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凝聚到一起，共同续写了中国知青史中一段起伏跌宕的开篇。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文革”前知青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他们出生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成长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最纯正，也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其中的大多数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就业的权利，不得不到农村去“脱胎换骨”。由于

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比后来的知青更为曲折和坎坷。因为上山下乡，他们的正常成长道路被打断，人生轨迹发生急剧的转变。正是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底层社会令人心悸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虚幻理想很快消磨殆尽。于是，他们又成为知青群体中最早觉悟的一群。

近年来，知青史已经初见成果，知青学也在有关圈子的酝酿之中。在反映上山下乡史实方面，主要有史书与口述回忆（回忆录）两类性质不同的著述。史书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史学方法为研究手段，作者追求一种客观立场，目前还处在宏大历史的概括和基本事实的还原阶段。回忆与口述则带有更鲜明的个人色彩、引人入胜的情节、强烈的情感倾向和多元的价值判断。它的好处还包括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以及广泛的群众参与。目前，回忆录与口述史学在知青史研究中的应用，已获得广泛认同。以往人们只把这些作品视作普通的回忆，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纪实作品陆续出现，不仅拓展了知青史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研究的手段。

《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续编》收有知青回忆文章近九十篇和近五十首新旧体诗歌。每篇回忆文章基本围绕个人经历或某些历史事件展开。在记录"可怕的真实"方面，续编保持了前编的特色。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6 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5 年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期间，因为邻居诬告被勒令退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北大校方竟拒绝向董大南这个天真幼稚、忠诚老实的青年说明处分的理由（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长沙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最后抱着"赎罪"的愿望，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尽管出身卑贱，他却不乏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的狂热。1967 年 8 月，他明知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返回江永，不久惨遭杀害。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革命"的英雄，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祭奠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如此惨痛的史事，因本书出版避免了湮没于世。感谢本书编者，由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不懈努力，当代史中又多了一批真实可靠的宝贵例证。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个性化回忆构成"文革"前老知青那几分绚烂、几分惨淡人生的一个缩影。作者不仅记录史实，还对诸多历史现象（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知青中一度弥漫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等）的由来、背景、影响加以诠释或评价，从而加强了纪实文本的厚重。除了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外，书中还包括若干珍稀档案和图片，共同构成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

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忽略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精英史观，把眼光向上变为眼光向下。特别在揭示"正史"不敢正视的史

实方面，回忆录和口述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庸赘言，在这方面，本书也是一个典范。

本书作者多是一些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绝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实际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因此，当他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已不是简单地就知青谈知青。换言之，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几十年层出不穷的经济、政治运动（即所谓的"穷折腾"）及其灾难性后果，几代人——包括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遭受的苦难与挫折，都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史学遗产之系统与丰富，在世界各国中无出其右。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堪称最具"历史感"的民族。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这个民族，在对待当代史方面却表现为极度的无知和麻木。包括当年的知青在内，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记忆的忘却。还有许多人，基于对官贪吏黩、贫富分化现状的不满，对那段逐渐远去的沉重年代，不恰当，甚至不负责任地赋予了太多的瑰丽色彩。在许多人，包括知识和文化精英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遗忘的今天，《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回忆录是写给世人看的。当年的知青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书，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这些回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色彩斑斓……但属于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是以悲剧为其底色的。忘记过去，就可能重蹈悲剧。当然，在感慨人们遗忘历史的惊人速度时，我们更需要谴责那种制造历史遗忘的机制。古今中外，好好坏坏的历史总是人写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文明社会的命脉；而无论是人为掩盖历史真相，或是用扭曲的历史误导世人，都是在酿造新的悲剧，并且注定要沦为历史的罪人。

最后，我想用本书主编邓鹏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愿以此话与有识者共勉！

注：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青研究专家。

前言　走出沉寂的阴影，拥抱生命的尊严

邓　鹏



这本书里的一百余篇文章，介绍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的历史，作者大多是1964年和1965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多年前，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贵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在这些饱蘸着心血的文章里，作者如实地讲述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的观察和感受，留下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诚实的思考。

一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它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196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12・22指示"，把数百万中学生送到农村，上山下乡运动至此达到巅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终止，上山下乡运动也黯然落幕。但是这一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持续20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虽然最近20年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重要层面至今还缺乏研究和总结，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有待知识青年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抢救和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老三届"（指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和"新三届"（指1969年至1971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的知青，在走出农村后逐渐获得了话语权，开始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经历。自叶辛、张承志、梁晓声一鸣惊人之后，难以计数的知青作者纷纷闪亮登场。三十多年来，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历久不衰。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色彩。20世纪90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学者，如刘小

萌、定宜庄、杨健、邓贤等，更是筚路蓝缕，编写出《中国知青事典》、《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文学史》和《中国知青梦》等专著和文献。这些著作为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高潮迭起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却存在着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部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著。因为作者主要依赖官方公布的资料，所以存在明显的局限。此外，关于这个群体的文学作品也寥若晨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标签被转贴到“文革”中被毛泽东送到农村的“老三届”身上。“文革”前老知青对这种张冠李戴的历史误会并不介意，从事知青研究的学者则需斟酌。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文献，包括顾洪章、胡梦洲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描述和解释，在理论、事实和结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上山下乡的标兵人物的事迹，并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知青的命运。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情节或“支配性话语”的具体表达，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乌托邦的符号，它为政治精英所炮制并用来支撑着一个虚无的理想和美丽的谎言。

“文革”前老知青这种集体的失语决非偶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一方面，这个群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出身于所谓的“非劳动人民家庭”（指非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里厉行贯彻的阶级路线，他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是班干部，是团员，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教育和各种信息渠道的灌输，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对领袖满怀敬仰，对革命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对祖国满怀忠诚，对人生和社会抱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中考和高考名落孙山的打击与官方的所有宣传使他们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滞留城市是没有出路的；若要改变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须跟自己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这种决裂不仅要在口头上信誓旦旦，反复表白，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上山下乡于是成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

无可讳言，老知青怀着幼稚的政治信仰和宗教般的虔诚，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栉风沐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创办夜校，把知识带到农村；他们通过文艺表演，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尽管生存环境艰苦，老知青中还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及对人生、对世界的浪漫情怀，少数老知青甚至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英勇献身。可以说，“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们知行统一，公而忘私；他们执著向上、勇于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愧于列祖列宗和

子孙后代。

然而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老知青可以为他们的信仰作出牺牲，但是天长日久，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开始是模糊的、胆怯的，多年的正统教育造成了他们对领袖的迷信和盲从。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逐渐动摇了老知青的盲目信念，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加速了部分老知青的觉醒，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正当"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甚嚣尘上，正当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的旗帜下"横扫一切"的时候，一个启蒙的火花在部分老知青中悄然迸发。这些老知青的思想状态正如诗人但丁在他那不朽的《神曲》卷首写下的那句话：

"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里停了下来，因为我在那里迷失了政治的道路。"

迷惘是痛苦的，但它是觉醒的必要条件。"文革"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部分老知青受到红卫兵的影响，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参与了造反派的夺权和对立派之间的武斗。更多的老知青把"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看成了他们讨回公道的极好机会。在广州，老知青扛着一口棺材在大街上游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争取自己回城的权利；在贵州的小城安顺，知青乔装打扮成政府官员到公社去迁移自己的户口；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老知青纷纷上演了将户口迁移回城得而复失的悲喜剧。应该说，这些举措不仅反映出老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怀疑，而且体现了他们的人权意识在初步萌动。

不过，老知青的艰难处境和诉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几陷全面瘫痪的政府，对他们的问题和意愿置若罔闻。于是，在喧嚣的中国社会，老知青成了一个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几乎无人理会的多余的群体。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几百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随即涌进农村。毛泽东的"12 · 22 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掩盖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面将原来仅属于老知青的问题演变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老知青的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但是在招工过程中，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面临政治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审"（政治审查）而一再痛失参工的机会。最后他们不得不用"病残"或"顶替"（即让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离开农村。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的时候，一些老知青才最后带着心灵的伤痕和疲惫的身体回到久违的故乡。更有少数老知青在下乡地区成家或

就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老知青已经或正在进入花甲之年。由于中国社会残存的血统论的影响，这个群体的经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坎坷，地位更低下。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在今天这个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新时期，的确没有多少，也难得获取什么话语权。但是老知青的经历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这是因为：一、1964、1965 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二、1964、1965 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过程中，第一次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实行“一刀切”的“不予录取”歧视性政策的高峰时期；三、因为如此，研究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实际上为研究他们的家庭在 1949 年至 1978 年之间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四、通过考察这些老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的经历，我们也可透视 1949 年至 1978 年间发生的那些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为关键的社会变迁和政治事件。

二

历史是一个民族对以往事件的记录，也是对自己的经历的一种解释。存史不仅是为了让后代知道过去，而且也旨在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和教训，它是中华民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种精神活动。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中国素来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除了保存社会记忆之外，还有树立正统、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为这样的功利目的，正史便难免存在远离事实真相的病诟。好在中国历来也有野史存在。来自民间的野史，在皇权和正统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了道义，顽强地表达了独立的史观，为后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跟官史相映成趣。在这种意义上，《无声的群落》(续集)里的故事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教训：

第一，上山下乡运动是乌托邦思想登峰造极的产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它是一种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社会工程”。

早在 1980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坦率地承认：上山下乡是个“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许人俊：《20 世纪 70 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党史博览》第二期，1980 年 2 月)。但是二十几年来，知青内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荦荦大端者中，有“青春无悔”的高调；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叹息；更有“劫后辉煌”这样的宏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 2700 万知识青年中的每个人在那段时间里的经历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对那场运动的感受也各自相异。要全面认识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波及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

历史事件，必须有多角度、多层次、多观点的考察，必须允许和鼓励不同见解之间的交流。

本书的作者之一、书法家杨代欣在四川农村度过了12年的光阴。他是这样来回顾他在农村的经历的：

> 12年是漫长的，12年是不堪回首的。试问，12年怎么能"无悔"？
>
> 对于我12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杨代欣所痛惜的岂只是自己的遭遇，他痛惜的是这一劳民伤财的运动给一代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 尽管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当我在"耳顺"之年，仍然对悲剧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近两千万知青和亿万人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杨代欣：《我的上山下乡》）

老知青中的成功者常常有"青春无悔"、"人生无悔"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无悔的青春不应该用来掩盖历史的教训。关于上山下乡的得失，曾为上海老知青的科学家董大南有这样的感受：

>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

回顾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终结，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时间里，他以领袖之尊，不顾中国社会的现状，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领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宏图"。结果事与愿违，这些盲目浮躁的举措

不仅没有带来现代化和人间天堂，反而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和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盲目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中国领导人寻找缓解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经济停滞不前之间的尖锐矛盾的途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政府一箭双雕的选择：一方面，它是缓解城市就业问题“一劳永逸”的举措；另一方面，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落户也正迎合了毛泽东消灭城乡差别的构想。但是，在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政府对经济上的尴尬讳莫如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意义却进行了高调的包装。

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动。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英文中的文明一词 civilization 来自古希腊语里的 civitas（城市）一词，可见文明跟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加速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城市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现代化当然可能出现问题，城市也可能由于财富的聚敛而出现腐化堕落、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并由此跟农村形成对立，甚至导致农村的反抗。工业化、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它可以暂时被阻碍、被滞延，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中国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现代化再一次显示了它那摧枯拉朽的威力，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革命、瘟疫等天灾人祸，人口才会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古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部族的入侵占领之后，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中国遭到日本入侵的时候，许多城市居民疏散到了乡村。而由执政者发起的将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的事例在现代不多见。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实现“全面就业”；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巩固波尔布特的革命政权。中国的上山下乡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但它毕竟是逆历史之潮流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第二，政治歧视贻害无穷。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有类群的划分。在古代中国，“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士、农、工、商”四种阶级。这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事实。在西方，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揭示历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和英国的学者试图表明，现代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本无可厚非。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1848年，《共产党宣言》）。他们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发展，为当时作为“弱势群

体”的产业工人指出通向解放的途径。

中国大陆在1949年至1976年之间的历史的确是一段阶级斗争史。但是这种阶级斗争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现实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极左政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殃及无数的中国家庭，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核心，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稳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和万事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朴素的信念。但是，提倡阶级斗争的政治精英却以阶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以革命的名义教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势不两立。在四川成都，共青团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举办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参加青训班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落榜青年。青训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上山下乡，他们别无出路。学员们在政治教员的引导下，对自己的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结果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竞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人为地激化阶级关系，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虚拟阶级敌人，颠覆正常伦理，造成全社会关系紧张，人人惶恐，个个自危。不仅伤害无辜百姓，而且最后危及政权本身。其中教训值得后人铭记。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于年轻幼稚，更由于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听信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的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换取学校和所在地方的权力机构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明显歧视的时候，仍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己的父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父母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留下了永远的痛。

谩骂父母却并不能挽回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命运。荒诞之处就在这里：

>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为老知青如影随形的沉重包袱。老知青们

发现,尽管他们下了乡,仍然面对这一堵又高又厚的墙。争取社会承认似乎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崎岖道路。老知青李自森在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时候,面临这样的考验:

> 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说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

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政治歧视、险恶的人际关系,阴谋、告密、打小报告、栽赃、诬陷。它毒害青少年的心灵,它使出身"好"的青少年趾高气扬,使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自暴自弃;它使近邻和朋友变为仇敌。

在升学和就业范围内实行的阶级路线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举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滥惩无辜,蛮横无理;因为它不讲公道,违背"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它违反"择优录取"、"唯才是举"的黄金原则。它虽然满足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但却降低了中国教育的质量和重要行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在资源有限、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现代暴力革命的教训之一是对法制的漠视和践踏。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个人没有尊严,生命如草芥,弱势群体没有法律保护。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自然十分脆弱。1964 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组滥施淫威,以极其荒诞的理由和蛮横的手段对无辜的学生青年肆意处置。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4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因为一位邻居的诬告,被勒令退学。使人更难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绝对董大南说明这一处分的理由!若干年后,董大南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董大南毕竟是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他居然接受了北大校方的解释,顺从地离开了他曾经为之朝思暮想的大学,最后带着怅惘和悲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才 17 岁。

悲剧发展到极端往往带有几分荒诞,因为这种悲剧的逻辑难以言喻,它那冰冷的教

训穿透我们的心胸。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那些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却又执著而无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长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眼见滞留城市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赎罪"的愿望，来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他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在朋友中深孚众望。他有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那样的狂热，在《新农民之歌》里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 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
> 我们的生命属于人民，
> 我们的理想——红旗手，
> 我们的专业——革命人。（王百明：《新农民之歌》）

与此同时，王百明又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于是处处小心翼翼，他虽然渴求知识，但连读书学习都要背着别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回到江永，为的就是要表示忠诚，修成正果。回到江永不久，他就惨遭枪杀。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英雄，"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之险恶和无情的确超出了老知青们的想象。他们太幼稚、太单纯了。但是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在那些不眠之夜，这些青年也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

>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忏悔，而披着神父外衣的恰恰是利用这教义为自己谋私利的投机者。（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老知青大多出身在"非劳动人民"家庭。所以他们低人一等，需要比其他同辈人更多的改造。所谓"非劳动人民"指的是农村的地主、富农，城市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产生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这一术语的理论设定本身在今天很有斟酌的必要。比如，这个阶层曾是中国农村的经济

管理者和社会精英，它维持着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中的开明分子主导着农村的现代化变革。城市里的资本家、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业主，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管理经验，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成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不少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同情和支持过共产党。他们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卢作孚不仅创办了一个优秀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且在"抗战"期间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位"古之圣贤"（梁漱溟语）一样的杰出人士，因为不忍目睹"阶级斗争"给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现代化事业带来的逆转，最后竟以死明志。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屡遭打击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中国极其稀缺的资源。他们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是民族的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族最需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敞开国门，走向世界；二、保护传统，继往开来。这两项艰巨的任务都亟待这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作为中流砥柱。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不仅接受了新中国，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他们的真诚换来的往往是妒忌和怀疑。

当年，鼓吹阶级斗争的人常常通过宣传机器，别有用心地把知识分子放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教唆工农打击知识分子。今天，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打击知识分子就是打击整个民族。专制的受害者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整个国家。

作为现代株连的受害者，本书的作者深知这种极端理论的悖理和危害，感到有责任将这种认识以诚实、坦率的文字记载流传后世。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者当年宣称，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所以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本书的作者要告诉后代：自有人类，即有人性。它的存在比阶级不知要早多少万年。世上从来就有超阶级的人性，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本书的作者还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什么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么是神智不清，要么就是居心叵测。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蛊惑。

三

当然，老知青也是一个折不断、压不垮、乐观向上的群体。他们曾经幼稚过、愚蠢过，甚至犯过使他们终生悔恨的错误。但是他们勤于思、敏于学、笃于行。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成长，在逆境中奋进。在农村的经历给了他们智慧，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陶冶了他们的情感，健全了他们的人格。

在本书的故事里，读者不难找到人民群众，包括老知青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抵制，看

到革命暴力如何被传统和人民的善良消解的例子。在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办林场里，1965年进行的“四清”运动还演绎出这样的戏剧场面。这个林场的重庆知青被工作组根据家庭出身分成两拨，出身“好”的，不管有无德才，一律重用；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迫接受教育。结果，一连几天，林场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以沉默来抵制“洗脑”。一天晚上，工作组长终于按捺不住，对知青大吼一声“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哪里料到他话刚落音，顽皮的知青就给他来了个“放屁大合唱”。知青们笑得前仰后合，工作组长黯然退场。(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的场面，只有在老知青这个独特的群体：一个富有聪明才智而又生不逢时，一个委屈而又倔强的群体中才可能发生。

通过上山下乡，老知青真正认识了农村社会，认识了农民。老知青谭世通惊奇地发现，农业合作化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使曾经繁荣一时的商埠丧失生气；使他更加吃惊的是：贫下中农其实并不认同“伟大领袖”的思想。(谭世通:《我的上山下乡四部曲》)老知青徐建成注意到农村的宗族关系顽强地抵制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以至他在参加了针对一个富农的批斗会之后，突发这样的奇想：“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地富反坏右也是人类，不是兽类，是不是也应该在解放的范畴之中？”(徐建成:《老知青散记》)在生活的道路上，老知青还得到这样的“再教育”：

> 晚炊之后……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在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分子包括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他们曾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有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这些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自始至终不承认“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沧，使我们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慰藉。(黄晓龙:《流年往事》)

在农村，老知青的奉献也换来了理解和温暖。在辽宁省中部那片黑油油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靠山屯的村子，在那里安家落户的46个沈阳老知青不仅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而且最后挑起了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大梁。为了履行自已扎根农村的诺言，有的男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姑爷”；有的女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媳妇。他们也有感到失落甚至绝望的时候，但是正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些知青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

并由此结下了伴随一生的友谊。回顾那段经历，老知青翟亚萍发现它竟那样如诉如歌："几度山下春草绿，几度山上秋叶红？在岁月的更迭中我们奉献着、拼搏着、彷徨着、痛苦着。我们调动了生命中的全部顽强蘸着汗、蘸着泪、蘸着血书写了自己的知青岁月。难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幻，尽管有那么多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汇成了一支难忘的歌。"（翟亚萍：《靠山屯纪事》）这个知青点的知青金霆和刘金秀结婚需要建房，友好的乡亲不顾农忙时节白天在地里干活的劳累，晚上义务帮助两个知青筑墙盖房，使他们扎根农村的愿望成为现实。（金霆：《扎根》）老知青后来虽然离开了农村，却总也忘不了那些善良的农民给他们的那份恩情，岁月的流逝割不断他们对那些父老乡亲的思念。

人生如旅途，一路上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驿站"，我们在那里歇息，在那里感悟世界和人生。但并不是每一个"驿站"在我们的记忆里都占据同样的位置。长沙老知青张健夫在动乱的年代身陷绝境之时，受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和姑娘的厚待。如此滴水之恩他终生不忘："假如你曾经记得在某个'驿站'所经历的毫末细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着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张健夫：《生命的驿站》）对于老知青，农村正是这样的一个"驿站"。

四

很多老知青对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耳熟能详。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幸运者真正可以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尽管他们当年历尽人世的艰辛，但是每当抚今追昔，都会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激之情。他们怀恋那些苦中带甜的日子，他们珍惜那些患难中的友谊。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同伴自从当年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向往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可惜的是，对于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老知青都在追求些什么？回答是：他们追求的是那短暂而脆弱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人间至善至美的感情。上海老知青阿蔡在校学习期间是三好学生、二级运动员，在新疆十多年，落得了下半身瘫痪。回到家乡上海，他找不到正式工作，但他不甘平庸，发奋读书，居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本想通过取得律师执照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帮助那些跟他命运相似的弱者。但是在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大

陆，他却没有得到开业的许可，就因为他是残障人士。面对这样的歧视，阿蔡大哥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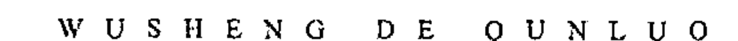
在将自己的故事付诸文字的时候，《无声的群落》（续集）的作者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终生所爱的大地和人民，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暴力和社会动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向往社会的长治久安。综观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2007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 200 名国内外记者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总理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中华民族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出极权政治的阴影。

五

中国在 20 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留下了很多历史的教训，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去研究和总结。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是非功过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在大是大非上苟且、麻木的民族是难以建立自信的。

学者徐友渔先生在讨论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的现状时发出这样的警告："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徐友渔：《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老知青、民间思想家谢几何代表《无声的群落》（续集）的所有作者表达了他们的初衷："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的。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样的证言。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能得到救赎！"（谢几何：《"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老知青这个群体自身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障碍：一、老知青当年对乌托邦理想的认同和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否定乌托邦就可能否定他们青春时期的所有梦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带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痕迹；二、作为一个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个人和家庭在当年受到的迫害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伙伴当年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他们半生贫困，半生潦倒。回首往事，痛不堪言，于是他们宁可让痛苦的记忆烂在心里，也不愿让回忆来撕开血



迹尚存的伤口。这才叫"哀莫大于心死"。

对老知青经历的忽略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记忆导致的"社会忘却"。社会忘却或集体失忆是沉默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位西方学者在讨论东欧国家出现的有组织的社会忘却时写道:"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人的尊严遭到侵犯,而且还在于这样的危险,即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转引自王纪潮:《有选择的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号,第46页)老知青的经历对一些政治精英实际上是一种逆耳的真实。这种逆耳来自于它的另类性质,因为它来自一个弱势群体,更因为它对一些人们所接受的神话提出的质疑。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这样描绘历史的冷酷:

>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史观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已经开始面临风雨飘摇的局面。日新月异的信息手段和信息传输渠道给个体的表述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无数小人物的故事也在挑战几十年来御用学者创造的一个神话。一位学者写道:"选择什么作为社会记忆就是一个主观性事件,也就不具有永久性。从时间上看,专制国家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社会记忆,由于历史可以不依赖'社会记忆'的独立存在和它的重构性,专制国家塑造的社会记忆或者强迫的社会忘却是短暂的,对记忆或忘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人们自己拯救自己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其中的道理也十分简单,无论权力集团以什么样绝对正确的理由要求社会记忆什么或忘却什么,并不能如愿,原因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这个绝对正确的控制社会记忆的理由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见王纪潮:《社会如何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号,第47页)

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今天已经有了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广阔的视野,他们应该有勇气、有能力走出历史的阴影。和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和谐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科学的事实,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的存在。但是鼓吹阶级斗争,利用阶级斗争来实现乌托邦的革命是一种缘木求鱼的举措。专制政治的遗风是中华民族创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我

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摒弃阶级斗争理论，必须从理论上拒绝暴力，才能真正找到实现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途径。

学者们发现，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对暴力革命进行了反思，在民主制度中看到了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曙光。他发现："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也见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在过去30年里，中国实施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对世界敞开了大门，走向了世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满目疮痍的大地逐渐焕发了生机，中华民族重新找到了自信。然而，巨大的成功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道德失范、文化断裂等。应付这些挑战要求大智大慧，要求勇敢的前瞻，要求通过对话和改良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决心。"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遭受了太多的损失。在新的一个世纪，这个古老的民族再也不能承受动乱，再也不能承受暴力革命了。请那些今天仍在颂扬暴力、宣扬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人三思！

本书的作者是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经历了忧患和人世的沧桑，他们对民族依然满怀着深情，对中国的未来怀着殷切希望。但是，他们也知道，任何文字、任何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近年来，各种治国的理论、方略纷然杂陈：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无意提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高论，他们只想给后代留下一点关于暴力革命的代价的血肉文本。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训；没有总结，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相信，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这本一百多位作者参与的集体回忆录集是他们恢复当年被极权政治所抹煞、今天被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声色犬马时尚所淡化的记忆的抗争，是一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宣言。四十多年前，当他们离开城市时，既有几分无奈，又胸怀几分壮烈。今天，他们的心境已经异常淡定，却仍然牵挂着儿女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从推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到创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摸索了50年，花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牺牲了许多性命，代价可谓高昂。老知青因为自己经受的不公，是和谐社会这一理想最坚决的拥护者。如果中华民族要在新的世纪建设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走出暴力的阴影；也只有走出暴力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拥抱生命的尊严。诚实的回忆录写到头来，作者会发现他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老老实实地记载自己过去的经历，审

视自己的是非功过，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超越。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中华文明里缺乏宗教作为道德的源泉和依据，历史因之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源泉。这样的现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历史诚实、公正、温良、敦厚。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它还要求历史具有科学和批判精神。这样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发展中，在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道、进步之道、民主之道、和谐之道的伟大进程中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对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的还原和反思，《无声的群落》续集是“文革”前老知青继《无声的群落》之后，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奉献。《无声的群落》及《无声的群落》续集的全体作者和所有参与这本书编撰的老知青朋友谨以此书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仰天祈祷。

作者简介

邓鹏，1964年重庆六中初中毕业。同年10月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1971年参工进四川省达县地区万福铁厂。1978年考上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1979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85年至1990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



WUSHENG DE QUNLUO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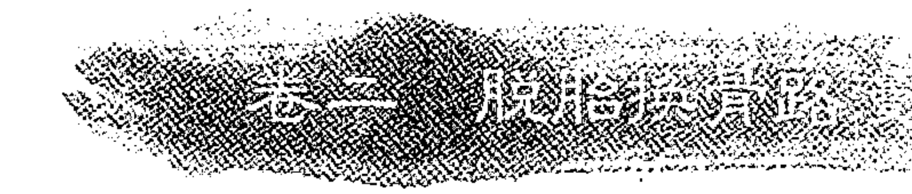
目录

序 …… 1

前言　走出沉寂的阴影,拥抱生命的尊严 …… 1

卷一 [illegible]

通往新疆之路 …… 2
天路迷茫 …… 10
滴血的光荣花 …… 25
无奈上山下乡,终未"脱胎换骨" …… 30
为了那些被湮没了的岁月 …… 37
逃　亡 …… 48
冬夜的山路 …… 56
弄巧成拙迁户口 …… 59
湘南往事 …… 64
笑谈悲情岁月 …… 77
老知青散记 …… 94
黄河滩上的杭州知青 …… 103
未忘却的记忆 …… 113



卷二 脱胎换骨路

“脱胎换骨”路漫漫 …………………………………… 130
成都有个“青训班” …………………………………… 148
西山坪上的“小右派” ………………………………… 155
冤　孽 …………………………………………………… 162
岁月痕 …………………………………………………… 166
烙　印 …………………………………………………… 173
落户辽中的日子 ………………………………………… 180
我的名字叫郑畹兰 ……………………………………… 190
南江纪事 ………………………………………………… 197
龙泉山中十度秋 ………………………………………… 211
见证塔里木河 …………………………………………… 223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 231
天上掉下招工馅饼 ……………………………………… 235
从大学生到农民 ………………………………………… 238
故乡的云 ………………………………………………… 247

卷三 [illegible]的[illegible]

泣血的映山红 …………………………………………… 260
风垭林场四知妹 ………………………………………… 268
历练痛苦 ………………………………………………… 274
我的知青生涯 …………………………………………… 286
六　娘 …………………………………………………… 305



到"广阔天地"里去 …………………………………… 322
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 …………………………………… 329
漂泊的孤魂 …………………………………… 335
小　草 …………………………………… 341

卷四　见证乱象

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 346
红与黑的颠倒——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 355
我莫名其妙就成了杀人犯 …………………………………… 359
误入"主战场" …………………………………… 363
迟到的鞠躬 …………………………………… 366
秋天的故事 …………………………………… 370
兵团战友阿蔡 …………………………………… 376
在哥哥走后的日子里 …………………………………… 390
南江故事 …………………………………… 396

下 卷

卷五　生命的驿站

生命的驿站 …………………………………… 410

靠山屯纪事……………………………………………………417
人狗情……………………………………………………………436
上山下乡四部曲…………………………………………………443
世上还是好人多…………………………………………………461
人猴之间…………………………………………………………471
刻骨铭心的岁月…………………………………………………475
“团长”、“连长”与“排长” …………………………………484
柿子风波…………………………………………………………491
知青小屋…………………………………………………………495
难忘那年九月九——政治风暴中的知青命运…………………500
回　家……………………………………………………………512
曹家岁月拾零……………………………………………………517
岁月悠悠…………………………………………………………530
生日忆……………………………………………………………536

卷六　铭心之声

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 ……………………………………542
留　痕——一个老知青的故事…………………………………548
流年往事…………………………………………………………567
江永农艺队散记…………………………………………………577
一封上告信………………………………………………………585
大竹四题…………………………………………………………590
知青兄弟…………………………………………………………596
扎　根……………………………………………………………605
打　桶……………………………………………………………613
塔里木马鹿苑……………………………………………………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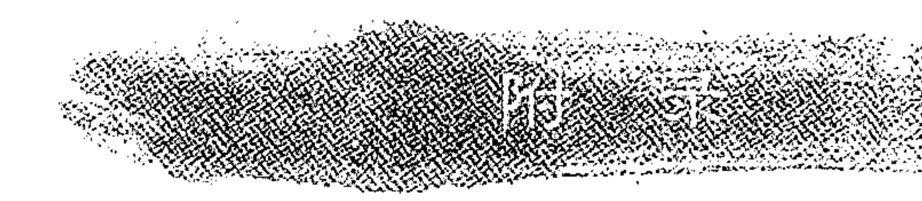
巴山情未了——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 623
那年中秋月最圆 …… 639
天赐姻缘 …… 649
梦绕魂牵大小凉山 …… 655

卷七 守望心灵

“贱民”之忆 …… 664
我的大学梦 …… 668
坎坷大学路 …… 678
我的两次高考 …… 684
我的读书梦 …… 695
反苦为乐的知青岁月 …… 716
倔强的树 …… 731

卷八 青春之歌——老知青

王百明诗选 …… 738
陈德诗选 …… 742
胡天仁诗选 …… 748
谢几何诗选 …… 758
朱四维诗选 …… 762
刘兆英诗选 …… 768
刘炎诗选 …… 772
张诗亚诗选 …… 773
大巴山诗话 …… 777



1964 年招生文件 ………………………………………………… 784
致刘定强…………………………………………………………… 788
致丁玉敏…………………………………………………………… 793
致李自森…………………………………………………………… 795
像人一样生活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 1964—1965 老知青回忆录》
…………………………………………………………………… 800
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 810
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 1964—1965 老知青回忆录》…… 813
重庆知青在四川通江……………………………………………… 817
爸爸和大巴山……………………………………………………… 823
俄罗斯书简………………………………………………………… 828
编后语……………………………………………………………… 831

对于这近百万少男少女，上山下乡既是对崇高的追求，又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卷一 失落的梦

通往新疆之路

董大南

1961年,我14岁。这一年,我考上了有近一百年校史的上海中学。

"上中"是上海有名的"常春藤"学校之一,有不少很有水准的老教师,据说去大学教书也绰绰有余。"上中"的学生来自市区和郊区各校的尖子,我报考时只收高中。每年,"上中"从上海市各区招收300名学生,从郊区各县招收100名学生,每50名组成一班,每届八个班。学生一律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学校内有商店、电影院、食堂、澡堂,设施完备,功能齐全。

我考入"上中"那一年,学校从400名学生中挑出50名外语好的,成立一个高级班,单独培养。我进入了高级班。从高二起,班里的团支部被个别高干子弟控制,他们在班里大搞阶级斗争,实行红色恐怖,班里的团结风气逐渐变坏,也逐渐让我看到了这些高干子弟在革命辞藻罩盖下的弊病。他们有浓厚的"自来红"意识,在班里制造等级差别,使原先不错的同学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理所当然是他们的统治属下,因此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居高临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糟糕的是,"上中"的教育体制,还是那些高干子弟耿耿于怀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出题、打分十分严格,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要是教育体制早一点改革成他们喜欢的"无产阶级"体制,规定高干子弟的成绩至少80分,平民子弟的成绩最多80分,或者取消考试,由党委推荐,那么,我后来遭受的苦难,也许要少得多。可惜,这样的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实现,而我早已成了老"运动员"。

当时,戴着红领巾上高中的我太单纯了。我只知道尊师守纪、努力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却不知道人间还有妒忌和阴谋。高中期间,我年年都是班干部,也是班里唯一达到三

好学生标准的学生。三好学生在“上中”是个很高的荣誉，要求很严。这样崇高的荣誉居然没轮到那些可靠的八旗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

进入高三，他们就轮番找我谈心，压我表态放弃考大学，直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就在于你考不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再去新疆，那就不是真革命。”

这我就弄不懂了。为什么你们可以拼命复习，根本就不想去农村边疆？我不得不向这些革命接班人挑战。

“只要你们不考大学，我也不考。不管你们去哪儿农村边疆，我也去哪儿！”

这些团员再也不来找我“谈心”了。

高中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中的一天，忽然“上中”的团委书记邬某通知我到一个高干子弟同学的家中，说有事要找我谈一谈。会有什么事呢？莫不是要发展我入团？也许团组织要交给我一件什么任务？带着一点朦胧的欣喜，我来到了这位同学家。

邬某阴冷的神态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找你来，是要跟你算一笔账；这笔账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账跟你算算清！”

我一头雾水，我招了谁惹了谁了？这邬某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训斥我？

邬某活像在演戏，这出戏与其说是演给我看的，倒不如说是演给坐在一旁的那位高干子女看的。邬某用夸张的语调，要我老老实实交代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动言行，交代自己在家里干过什么坏事。简直莫名其妙！

邬某演的这场戏的背景，在我离开“上中”多年以后，才露出冰山一角，让我震惊。

原来就在这个寒假，不知为什么，邬某跑到我父亲工作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去调查父亲的材料。父亲是脱帽右派，人所皆知，说白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再调查也没有多大油水。然而神奇的是邬某带回了父亲所在系党支部书记孔某以邻居身份写的关于我在家中表现的揭发材料。

奇怪，我和孔某从无往来。我平常很少回家。他既不是和我一个单位，又对我根本不了解，凭什么揭发我？

有时周末回家偶尔碰见孔某，孔某当着我父母面，总是对我赞不绝口，什么有出息啊、了不起啦，满嘴甜话，可谁能想到他会写诬告我的材料？

真是人心叵测！

这孔某是20世纪50年代对高校“掺砂子”从工厂调到上海戏剧学院做党政工作的。我上高中时，他提出他老婆要生孩子，住房太挤，要我家借他一间房，父母把最大一间房腾出来给他。高二暑假时，他又向我父亲提出，要我帮他考高中的小舅子补十天课，父亲

哪敢不答应。

我费了最大的劲帮他小舅子补了十天课。他小舅子的功课不是一般的差,初一的题都不会,天知道他怎么能升到初三?结果,他因成绩上不去落榜了。

一旦考不上,里弄的大娘大嫂就天天敲锣打鼓上门动员你报名去新疆。他小舅子哪会上这个当,死也不会去的,赶紧躲到孔某这里避风。孔某正天天托门路,拉关系,为小舅子找工作。

我周末回家,正好碰见他小舅子。

"你好,考上高中了吗?"我问。

"没有。"

"不要紧,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一样有光明的前途。"

这真是我内心发出的鼓励他的话,没有一点恶意。我哪知道,这脱口而出的"到新疆去"四个字,比皮鞭抽在孔某身上还疼!那一天,孔某脸色铁青。我父母吓坏了,问我说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有这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

这句话有错么?报上不是这样讲的吗?你孔某做别人思想工作时不也是讲这些话么?

毕竟孔某和我毫无接触,他只能凭空杜撰一些罪名。什么"从小接受资产阶级印象派(一种美术流派)的影响","学习目的不端正,一心想上大学",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我"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决赛,家里大摆宴席"。这些"罪名"足够让我入不了团。

而邬某不知从何处拿到我的档案,在班主任对我的"毕业鉴定"后面悄悄加上了两行字:

"在学校表现较好,在家里表现极坏……资产阶级苗子。"

他再把孔某写的诬告材料,附在毕业鉴定后面。这种落井下石的作法,谁都可以预见对我日后政治生命造成的重大恶性影响。

18年后,"上中"新领导宣布撤销和销毁我档案中邬某和孔某写的一切诬告材料。我回母校拜访当年的班主任,当我告诉班主任这桩冤案的真实背景时,他惊讶得无法合上嘴。

"当时班里同学的毕业鉴定都是我写的。你的毕业鉴定我每句都写得非常好,连一句一般的评语都没有啊!"

一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真诚的话,就把一个三好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苗子。这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年代千千万万的真实冤案之一。

那时我才16岁。

高考发通知那天,我拿到了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

没有错。

原来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招生工作组听说北大物理系因为一位高分考生档案里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犹豫，不敢录取，于是他们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调了过来，研究后决定录取。

新生入学后，系里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在专业思想教育会上，系里告诉同学们，地球物理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不要小看这个系，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们系里。会议过后，同学们纷纷跑到我这里请教学习经验，我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

开学后第一个月，除了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以外，大量的时间用在排队列、练正步上，几乎没上多少课。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在准备国庆节游行的队列操练。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回，说不准又要搞什么运动。运动一来，有人倒霉，有人挨整，也有人发迹。倒霉的，不要又轮到了我。

这预感也真准，邪门了！

国庆节一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校园里展开。

北大作为全国高教系统社教工作试点，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领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从一开始就搅进了上层的内部派系争斗，表面上是清查北大党委的教育方针，其项庄舞剑之用意却是瞄准了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工作组一进入北大，就把北大校系领导架空，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每个学生要写思想小结，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要揭发交代父母的反动罪行。社教运动中，把白区工作时的单线联系、背靠背方式照搬过来，什么“扎根串联”、“请上楼”、“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层出不穷。

家庭背景不硬的学生，必须作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揭发家庭，揭发他人，还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才有可能过关。我们系有一个上海的考生，大会小会把自己父母骂得那个厉害，听的人都毛骨悚然。他父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真难想象他怎么能和魔鬼父母亲生活多年没把他们一刀宰了。他成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安然在社教运动中混过了关（但“文革”中他没混过关，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了）。

社教运动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饭，没把红薯皮吃掉，留在饭桌上，被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发现了。这还了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一场声讨地主资本家复辟变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红薯皮里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薯皮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

铁证,红薯皮象征着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红薯皮俨然成了是不是要亡党亡国的头等大事!

斗争面越铺越开,手段也越来越狠。

社教工作组的第一刀,对准了刚入学的新生,用它作突破口来揭批北大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工作组审查新生的档案,发现政治上不可靠的,通通开除。据说北大共开除了两百多名学生,我不清楚是否属实。但地球物理系招收的将近八十名新生中,开除了三名,这是确实无疑的。

第一个被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来的石××。她是位学习很不错的女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离开了。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说不能告诉我原因。

我离开北大后,又有个福建同学林××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关系。15年后,我和林××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个海外关系,是他有一个在印尼橡胶园当橡胶工人的舅舅,标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吗?怎么变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也不是吃素的,几个月后就展开了反击。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大社教工作组改组,运动开始转向。据说,工作组掀起的针对学生的乱批乱斗风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试点虎头蛇尾,草草收场,那是后话。

我们这批已被工作组清除的学生,却是不了了之。

当通知我被除名的那位系干事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知道开除我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以后不是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吗?"

系干事有些为难:"我要请示一下工作组,明天再答复你。"

第二天,系干事告诉我:

"我们研究决定,还是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样吧,你可以说,原因就是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

我被除名了,连一张说明我被除名的证明和告示都没有。

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

我离开了北大，一张为什么离开的证明都没有。档案里已是内定“白专”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时我 17 岁。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离开上海时，我还是个三好学生，才两个多月，就莫名其妙成了被大学除名有问题的人。我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原因？

我问书本，找不到答案。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儿？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失学的社会青年，“社青”是被人嗤之以鼻的。

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我能面对眼前和将来的一切吗？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办公室。

户籍警听完我的陈述，惊奇得呛了一口，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什么？被学校开除了连张证明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人放火？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

“什么？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开除的理由。侬当阿拉是憨大啊？（上海话：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户口报不上，我成了没有户口的人。

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人敲门。

敲门的竟是比我先一步被开除的石××和她的母亲。她们听说我也被开除了，赶来问问什么原因。我告诉她们，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系里说不能告诉我。

她们愤愤不平地说，北大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么罪？报纸上不是一直说，关键看本人表现么？凭什么不看本人表现就把学生开除？

她们准备去市高教局告状，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却说了一句当时发自内心、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原因，但我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是不会错的。



右一为作者

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我劝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去告了。”

她们惊呆了。然后，默默地走了。

以后我去了新疆。石××下一年再次考大学，考上了同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贵州。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又回到同一起跑线。15年后，我平反回北大学习时，她考取了同济研究生。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系学习时，她正好研究生毕业，到南大答辩。她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知道她的情况。可我不敢见她，我因为当初那个表态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她。

历史证明我当时的愚忠是错的。每当我想起自己那时愚昧丑陋的表现，想起她们惊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责，我无地自容。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

1965年1月，公安局通知我可报户口，我总算升格成了社会青年。

社会青年是一个两极分化复杂的群体，即使处在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厂招工机会，送去的总是出身好的。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宣传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是宣传到新疆去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么？

为什么把根红苗壮的送到大学工厂，把血统差的塞到新疆？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讲的，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从小到大，父母、老师的教导，报刊、书本、广播的宣传，在我头脑中编织了一道道美丽的光环，现在被赤裸裸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

我问苍天，“真理在哪儿？”

苍天不回应。

我问大地，“真理在哪儿？”

大地不吭声。

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

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

“哼，假积极，还想找真理呢！”

“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轻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

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轻人。”

于是，冥冥中，仿佛看到真理在远处向我招手，为了寻找真理，我踏上了通往新疆之路……

作者简介

董大南，1964 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诬陷被学校取消学籍。1965 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 年平反重返北大学习。1982 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7 年赴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

天路迷茫

李忠公

上山下乡别人都能活，难道我不能？

我的上山下乡是深思熟虑的抉择，而不是“热血沸腾”。

1964年高中毕业时，我已是一个20岁的成熟青年，在校是学生会干部、班长，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高考前父亲就对我说：“今年你考上了，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不该落榜的我“符合规律”地落榜了，我心中是有准备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渴望读书，梦想上大学，好大学考不上，孬大学总该有一个吧。心存幻想，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三个月，同学们的通知来了，没有我的。那时真是心慌啊！迷惘、惆怅、失落，乱糟糟说不清是啥心境，只觉得心慌气短，魂不守舍。紧接着在落榜生中调工作，也没有我的份。在家苦闷彷徨，如坐针毡，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五哥、六哥1958年同时考取西师美术系，因为那时不看成分；七哥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是因为当时四川省高教厅厅长康奈尔的德政（他“运气好”，属于可收可不收的“好学生”）。我就背时了，运气不好，碰到了要命的1964年！

我们家有11个兄弟、三个姐姐，共1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八。新中国成立后，家境贫寒，从五哥到十弟另加幺姐七个孩子同时读书，全靠大的哥姐相助。自反右运动后，兄弟们厄运接踵而至：在外工作的二哥、四哥被迫“劝其退职”回家，一直没有正式工作。1963年四哥主动下乡到大足渔场去了，二哥因为已成了家，只好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当了工人。1961年，我、九弟和十弟同读南坪中学，“三丁抽一”，读初二年仅15岁的九弟就被学校赶下农村当了农民；十弟1963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进厂当了学工。他们都

不是成绩差的调皮捣蛋学生，而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何故至此？都是因为可恶的家庭成分。

我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我们这个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变。大哥追随地下党革命，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同时把父亲和三哥也抓走了。大哥背叛了，父亲和不到15岁的三哥出狱了。新中国建立后，大哥被枪毙，李庄的家产和家族墓地全部被收缴，评了个“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分得了在家对面小丘上的一座茅草房和一份土地。这样一个大家要装进一座茅屋，谈何容易！二姐、三哥参军走了，大姐、二哥、四哥参加革命工作离开了家。父母、15岁的五哥和我留下当农民，不满周岁的小弟送与农民为子，其余兄弟和幺姐暂时跟奶妈、跟外婆、跟哥嫂去了。不到两年，茅屋被狂风吹塌，我们一家便逃离农村。父母亲咬着牙挺过了那道翻天覆地的生死难关，我知道那有多么艰难。

达观开朗有大丈夫胸怀的父亲，看到在艰难困境中渐渐长大的孩子们被不公正的政策断送了学业，内心是何等的忧愤！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窘迫的生活，1964年我高中毕业前，他患了直肠癌。

在给四川大学读书的七哥的信中父亲感叹道：“你来信述说家中的事，使弟兄们也知道破碎家庭的父母教养子女费尽心思，希望个个独立。尽到责任原是应该的，并不想得到将来的报酬。你能知道贫困父母教养这么多子女真是不易的事，这个苦心，已算是深入儿辈了，我内心已获得无比的安慰。”（原信附后）

我是一个很懂事听话的孩子，深知父母亲心中的困苦和家庭经济的窘迫，特别是有时等钱买米的时候，我也心如猫抓！失学、无业的我再也不能增加父母的负担，再也不能呆在家中吃闲饭了！堂堂七尺男儿，一个血性汉子，该是自找路走的时候了！

是赖在家里等工作当“社青”呢？还是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呢？升学、就业、参军，条条路都堵死了，等工作看来也是奢望，留给我唯一的就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大道。小时候一年多的茅屋生活和初中、高中那些年的支农劳动，让我对农村、农业劳动已是非常熟悉了。九弟比我小都已在农村当农民三年有余，虽然没离开家，但他已能自食其力了。明知上山下乡是一条坎坷的山道，也得去闯！为什么？因为在我和我的父母看来那是一条正道，是一条冠冕堂皇的革命化道路，是一条通天大道，革命青年不走这条道又走哪条道！它包裹着革命的红色外衣，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不管它是何等的微弱，总还是点燃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却又偏偏追随“革命”的年轻人的激情。

我写信给刚解放就参加自愿军的二姐征求她的意见，我知道，她是我们家革命的榜样。她来信支持我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她说：“别人都能活，难道你不能？要看到将来，要从长计议，不要计较眼前利益。”并嘱咐我千万不能长期呆在家里。

在街道办事处搞会计工作的二嫂是做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得知我要下乡时劝我别去。她说："我又没动员你，你去干啥？在家慢慢等工作嘛！"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的年月，谁还敢有人性的选择？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事事都得从"革命"出发。别人可以在家坐等，我就不能在家坐等。

我主意已定，当晚和父母亲谈自己被困的处境和家中的经济窘况以及上山下乡的打算。母亲流着泪说："你大姐现在也没在市劳动局工作了，一点都帮助不了你，你的运气硬是不好。"（1963 年大姐在劳动局工作，十弟进长安厂当了学工）我们一直谈到半夜三更，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没能上大学读到书是我最大的心痛，以后的路只有靠你自己了。"翌日我就下了户口报了名，怀着惶恐的心情自觉自愿下了乡。

我的画家梦

立志，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童年之志会像向导一样引导着自己的人生脚步。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时就喜爱收藏中国书画，不惜巨资购得几大箱藏于家中，有陈半丁、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的得意之作。每到过年前才拿出来张挂，年后又收藏进箱。"土改"前夕，他叫四哥、五哥挑了一大挑，背了一大背到四伯家去藏。看到那么多名家作品，他们也不敢收留，结果全被收缴不知去向。

二哥不喜欢政治，读书时就喜爱绘画，他爱临摹徐悲鸿的奔马，还把画的奔马挂在自己的床头墙上。1950 年，二哥考上美院，没钱去读书而进银行工作了。在他的影响下，五哥、六哥在 1957 年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吃饭不要钱的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五年。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梦想着长大了当个画家。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王次椿见我办黑板报时画得不错，送我一大卷素描纸，并嘱咐我把画好的画给他保存，请美院毕业的师母给我指导。可惜到了五年级时，学校不见了他的身影。从师母那儿得知，他成了右派，被弄去劳动改造了。当时身为少先队大队长、班长的我，无论怎么样也不明白为什么王老师会是坏人。

学校的黑板报每期都是我一人选稿、编排、写画全部包揽。南坪中学小小的教师阅览室，唯我可以进出。《新观察》、《知识就是力量》、《苏联画报》等好多杂志的美术画页皆被我"收藏"了（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柜中，上面还盖有学校图书室的印章）。我陶醉在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们的名画中，叩拜在大师们的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苏里柯夫的《近卫兵临行的早晨》、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谢罗夫的《女孩和桃子》，那希什金的森林、列维坦的充满阳光和空气的俄罗斯风光，那《深渊边》神秘幽深的氛围令我神往。从此，我痴迷于绘画练习。

五哥看了我的素描和水彩风景写生习作说:"要想当个画家必须知识广博,特别要打好文学基础。"假期他们回家给我辅导,还跟他们全班同学一起到南泉写生,就是睡在仙女洞旁的第十中学教室的地上我也欢天喜地。十多天一晃就过去了,喜得一摞南泉风景写生画。哥哥留给我的水彩纸舍不得用,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解放碑的外文书店买苏联宣传画反过来当做画纸用。很便宜,纸很好,但太光滑,可以画水彩,这一招也是五哥教我的。

光影造型,黑白灰五大层次,质感、量感、空间感,素描的整体性,色彩、色阶、色调,从习作中去解读这些概念,在练习中去领悟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回到整体的素描基本法则、透视规律和空气透视法则。读书读画读教材,习作实践,观看美展,虽用去我所有的空余时间,但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空间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都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培养了我极强的自学能力。

黄桷晚渡的余晖,水码头层叠曲折的石阶,阶旁高大的黄桷古树下楠竹捆绑房的茶馆,长江边过渡的木船小趸,"官老壳"的石岩、石滩湍流,下河街的老屋和吊脚楼,尽皆收进我的画夹和速写本。

从小学到中学,除唱歌外,门门功课均是五分,且学得极其轻松愉快。读初二时,我就递交了入团申请,因资产阶级出身和大哥的历史问题,迟迟未被批准。对大哥历史的反复交待,几乎让我丧失要求入团的信心,然而初三时我的申请居然被批准了。毕业前选择志愿,学校不推荐我报考美术院校附中,要我带头填报普高。"高中毕业后再考美术院校对你更好。"班主任老师对我说。结果我赌气坐在中专考场中参加了升学考试。而后,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带头改报了普高。就这样,全年级顶尖的年年的三好学生也没能考进重庆的重点中学。

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最美最美的年华,也是我初尝苦涩人生滋味的端首。初三毕业时,任学生会主席兼班长的我,却感到了政治前途的迷茫,已领略到自己前途所承载的家庭出身的分量。

高考落榜让我的画家梦断,但我没有放弃我的追求,没有放弃我手中的画笔,背着草绿色的画夹上山下乡去了。但天路迷茫,无论如何我也要在艰难的上山下乡生活中继续我的追梦年华。

初到林场

我从跨出家门那一刻,就明白自己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我知道,那是一条满布荆棘的山道,那是一条迷茫的天路!但我有勇气走下去,因为看到了前面有希望的亮光,只要有希望,生活就会充满朝气和阳光。

刚到公社那天，小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知青们受到夹道欢迎。我背着一个大画夹，很显眼，引起了公社书记的注意。他问我："会画画？好啊！有一技之长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嘛！"

11个知青中，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公社填登记表时，都推我——代劳。当我在"本人成分"一栏里填"学生"时，一旁的公社秘书老林连忙纠正说："不能这么填！"我竟一怔，语塞起来。见状，林秘书顿了顿，用手指着表上那一栏说："该填无业者，现在你们已不是学生了。"我只觉得头嗡嗡直响，呆头呆脑不知所措。我们这些不该失学的学生已成了无业者？我们已从城市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了？我的心被冰冻似的顿时透凉下来。

霎时，只觉得我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出卖的悲哀忽袭初涉世事的我，紧缩的心似被马蜂蜇过般生痛。

紧接着便恍然大悟——这是一种顿悟，一种对"上山下乡闹革命"美丽口号实质的朦胧的顿悟；又是一种感知，对世态炎凉、世事险恶的感知。

那短暂的一瞬间，我觉醒了，觉着自己这时才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我的知哥知妹们正沉浸在新鲜与兴奋之中，我的心却沉甸甸的闷得慌。

初到林场的那些日子，劳动不多，秋来又多雨天，闲暇不少。那些天，心里一直不好受，对迷茫的未来充满惆怅，充满惶惑，甚至还充满了恐惧。阳光下劳动流汗心里倒还坦然舒畅些，阴雨连绵蜷缩在土屋里好难受，连画画的兴致也没有。

一天，场长对我说，公社张书记叫我去一趟，有事找我。

连绵数日的秋雨骤停，山雾弥漫。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从山腰的林场连滚带爬地下到了沟底。裤腿已被道边茅草湿至膝部，滴着水，我踏上去公社泥泞的田坎路。深秋雨后，远处灰褐的丘陵，衬着泛灰蓝天光的残留稻桩的弯弯水田，株株塔柏散乱地点缀其间垅上，群群白鹤在田间觅食，泥泞小道蜿蜒其中。恰似那留苏画家罗工柳笔下的油画风景。独自一人，无心欣赏，只顾埋头前行，格外小心，生怕滑跌到水田里。

赶到公社时，解放牌胶鞋上的稀黄泥快爬上了脚背，已糊满了两个裤腿。经过那条"场头跌跤，场尾捡帽子"的小街时，有些人用和善的眼光注视着我那狼狈相。虽然没有了前些天刚到公社时夹道欢迎的热烈，没有了争睹城里来的姑娘小伙的新奇，却依然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盯着我的视线和小声的议论。

坐落在山丘上的公社，两层穿斗结构青瓦房。沿着街边石阶，小心翼翼地进到公社办公室。"啊，来了啊。"秘书林亨文先招呼我。我问道："张书记找我有啥事？"他放下手中的钢笔，立即站起来，"你坐，我去问一下。"他挺客气的。

一会儿他回来领我去书记在楼上的办公室兼作卧室的屋里。三十开外，面相和善的张书记笑容满面地推开藤圈椅站起来，还是那句“来了啊，坐”。让我在办公桌旁的方木凳坐下，语气温和地问我生活习不习惯，说靠山的我们公社穷，条件艰苦，还鼓励道：“刚下乡嘛，肯定不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低首无语，心中直嘀咕，究竟要我干什么？“你们知识青年有文化，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农村需要知识，需要文化。”我只能点头称是。他迟疑了片刻说道：“听说你会画画？”我笑道：“只是爱好，只是爱好而已。”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两寸发黄的老人照片：“你看看，能不能帮我画张像？”他把那老照片递到我手上。看了看，也没问照片上的老人是谁，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连纸也愿帮他出。“这段时间扎雨班①，没什么事，画好后等下个赶场天我就给你带来。”说到画像的尺寸，我说画八开行不行。“八开大小有多大？”他问我。“有半张报纸的半张那样大。”我笑着对他说，手也比比画画。“好，好好！这就麻烦你了。”

张书记笑容可掬，给我留了个好印象，他还留我在公社食堂吃午饭，“不了，还早呢！”送我出门时，嘴里还不停地谢我，好客气。我似乎受宠若惊，心想，我的一技之长在农村也还有用武之地。

我们林场，其实就只有一栋孤独的小青瓦土屋，其中两间七柱房，一抹水的厨房靠在左边，连着四柱八扦的猪圈。右边有一小土坝，坝边涓涓小溪，屋后山坡连着石岩，耸入云雾之中。青瓦屋檐滴着水滴，天阴沉沉，心阴沉沉。有的知青在看书，有的在吹牛，有的在睡觉，各干各的。

从给张书记画过一张老人像（后来听说是他父亲）得到大家的好评后，心情又好多了。我倒喜欢这种不出工的天气了，不是躺在床上读书，就是画速写，画头像。在初中时，我这个三好学生经常上课给老师画像，目不转睛地望着老师，老师还以为我在专心致志地听课呢。

老场员叶四请我帮他画像已好久了，雨班不出工，正是好时机。他背靠土墙侧身坐在床沿边，眼看窗外，四分之三侧面脸庞上，明暗分布优美，立体感强，我常爱取这角度画头像，“头别动，你看着窗外，好，就这样。”

第一印象在写生头像画中至关重要，五哥常对我说，应当把它保持到画完那一刻，才不至失神。在初中毕业时，我已具备了很强的写实功夫，素描基础打得牢，五哥说考中央美院附中没问题。不料高中一毕业，我就失学了。只能在这野山沟里自行修炼。心头之痛，无以言表！

叶四捧着画好的速写头像，笑眯了眼，“像！”都说抓住了特征，画出了精神。农村孤

儿，没了爸妈，活得像没了主的狗，没了家的猫。从他们脸上能捕捉到失落与感伤、悲戚与苍凉人生的阴影。他们并没有"成分"重压的伤痛，却有着生死存亡的焦虑。

林场的"莽三"没姓没名，心地善良，傻得可爱，我们都很喜欢他。二十多岁的他，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力，矮笃笃活像大头娃娃，钱多一点就数不清。有时不如意，会像孩子一样怄气，要人哄哄，但也不是那种什么事也不会干的大傻瓜。脏活、粗活他从不推辞，又爱帮助人，尤其是女知青叫他帮忙，有求必应。衣无二件，鞋无一双的他，脚板如牛皮，不怕石子锥，不怕刺来扎。大风大雨中敞放的羊儿没回来，淋得似落汤鸡的他独自一人把它找了回来；没收的工具他会收，掉下的粮食他会捡，一般农活都会干，可怜他一字也不识。家境好一点的知青纷纷拿出自己的衣物送给他。

我们林场11个知青，余立、汤文诠、余眉父、张泽华、洪忠萍(女)是十七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他们都认识我，离开家乡时，来送行的父母特地托咐我下乡后要带好他们。祝玉辉(女)是五中的高中毕业生，小女孩向玲和韦素珍是小学毕业生，陈昌吾是民办中学毕业生，只有苏辅琪是所谓的"社青"。其中祝玉辉与韦素珍是工人成分，其他都是黑五类子女。聪明好学的陈昌吾，因地主成分，1961年就没考上公办中学。成绩优秀的余立是独子，母亲是十七中数学教师，其父因历史问题被放逐内蒙改造。余立虽与离了婚的母亲相依为命，也逃不过失学的厄运。

我的知青朋友们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娃娃脸、学生味、浑身的稚气与清纯，老场员们的质朴、憨厚，风霜雨露、烈日暴晒，斑痕累累的形象，几个月来，利用闲暇，我把他们尽收画夹并保留在我心深处。

劳了筋骨苦了心志

初到林场的几个月，心思一直放在了画画上，秋后农闲，又乍到林场，把带下乡的纸都画得差不多了。知哥知妹们虽然过着常吃白饭喝清炖氯化钠的日子，却成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歌声不绝于耳。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我们才真正开始了农民生涯，那是今生今世决不会忘记的一段日子。

天快亮时，山雨骤来，将我从噩梦中惊醒。我双腿一伸，翻过身来，心想：今天该睡睡懒觉给筋骨松松绑了。噩梦的惊吓过后续来了美梦，飘然若仙归故里，母慈父爱，好似堕入温柔乡。忽听得一阵敲门声，"起来，起来！"又是场长那敲二锤似闷顿的声音。我翻身下床，开门让场长进屋。此时天微明，淅淅沥沥下着雨。"今天还要出工？"望着阴霾的天，场长背过身去："趁下雨上山一趟，去砍点树！"

阵雨忽大忽小，小溪水浑黄起来，春末雨晨寒气袭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七个男

知青和几个老场员，拿着横料大锯，在手握板斧的场长的率领下，消失在环山堰沟道上。

转过两道弯，根本没有路，穿过没过头顶的茅草和杂树林，爬过一面坡，来到一山垭。这是风垭公社与相邻的九峰公社交界处，唯有一片密密的国有松林。在雨雾中，苍葱迷蒙，其色幽冥，凄神寒骨。我屏息而立，四下环顾，木痴痴不知所以，心里空荡荡直发虚。

只听一声："专门找长得直的砍，动作利麻点！"又是场长闷锤似的声音。无人言语，一片死寂中只听见呼呼响的锯木声。我和余立刚悄声议论起来，场长立即嘘声制止道："不要开腔！"

我们已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林场就有看管山林的职责，居然我们敢去盗伐国有林木！尽管我们先前不明真相，昏昏噩噩上了山，而身为副场长的我，此时却不敢道一个"不"字。

不一会，十多根碗口粗丈五有余的小松树直挺挺躺在了地上，被场长用板斧劈得光溜溜没了手足。场长让我们知青捡细一点的搬。活湿的树重如铁石，好在返回之路是下坡，连扛带拽搬回了林场，忐忑之心踏踏实实落了地。真似一场激战呀！过后，才发现湿透的衣裤被野棘划破，手足也挂彩出了血。

"人家发现了找来啷个办？"

"啷个办？又不要你负责。有场长，有公社，关我们屁事！"

端起饭碗，和着盐米汤，把饿得巴了背的肚皮吃得胀鼓鼓。我和余立倒躺在叠好的被盖上，他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道："你又起得了啥子作用？又不该你负责！何况场长选了好日子，大雨天，恁个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才晓得！""我们公社的山，1958年大炼钢铁前，水桶粗的松树满山，遮天蔽日，落下的丫枝也烧不完。现在像啥样？满山遍坡找不出一根碗大的树！"老场员刘甲金用惋惜的口吻常对我们说。"现在这些小松树林，还是前些年飞机播种才长起来的，不得行，做不了啥事。"他的话，让我想起俄罗斯著名风景油画大师希什金笔下那长满参天大树的森林，那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财富，那是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福气。

百年千年，祖祖辈辈留下的青山绿水，毁在那狂热的年代，是为了一句"超英赶美"。而今为了给我们修一间女生宿舍，我们这些"林场工人"竟然去盗伐仅有的一点点碗口粗的林木。古人"十年之计，莫若树木"之说，恐谬以千里。唯以斯人而教化，"百年树人"将适得其反矣！大自然要恢复元气，数载千年也恐难实现，这是我中华民族之大悲哀！

1966年春公社决定搬迁林场，由原来的山沟底迁到山坳上，图谋发展。为此，公社还淘神费力到县林业局批了点木料，指定到我们林场背后的九峰公社去砍伐。啥都得靠自己，"打青山"也得靠我们自己。

林场组织了“打青山”小组，成员主要是知青，只请了个木匠昌师傅，工具全由他带来。我们已相识，原来林场的猪圈就是他做的。四十开外的人，说话诙谐，知识不少，经验丰富，农村有“木秀才”之称，可见其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场长办好手续，联系好住地后，由我带队上山。

来到目的地，那是一片松柏混交林，松树已所剩无几了，拳头粗的柏树还不少，郁郁葱葱，在初夏的阳光里，透着勃勃生机。昌师傅早知我们几个知青眼尖手快，会“偷师学艺”，半年多的劳动又练得浑身是劲，没有拿不下的活。不过，“拉改锯”这活得使巧，不能蛮干。虽见别人做过，也曾偷摸过几下，但像这样真枪实弹干个十天半月，啥滋味心中终究没有底。昌师傅调侃道：“要不了三天，叫你几个崽儿屙屎都蹲不下去！”

头天下来，腰酸膀痛，呼呼大睡一夜，第二天大天亮了也不想起床。三天下来真还有点如师傅所言，腰又酸臂又胀，效率也慢了下来。我们都有个经验：筋骨之劳三天是道坎，坚持下来就好了。果不其然，十多天完成任务后，陈昌吾、苏辅琪和我已是熟练的“改锯手”了，全部的椽子、板子都出自我们之手。

新屋土墙是请了匠人来筑的，那一套技术非实践不能掌握，如若塌了下来，那可不像拉改锯“走了墨”那么简单。新屋“断水”迁入以后，胆大的我们自己动手筑起猪圈厕所的土墙来。老场员叶四在生产队帮人干过，把他当了师傅，借来墙板，乒乒乓乓顺顺当当山墙也上了巅。大家欢欢喜喜吃午饭，场长还派人上街割肉打酒以示庆贺。笑谈间，忽听一声巨响，大家哑然相视。回过神来时，异口同声“糟了！”争相夺门而出，只见最后筑的那壁山墙，已轰然倒下。“还好，还好！如果人还没下墙就遭了！”师傅叶四脱口而出，说来真还有点后怕。来到倒墙前细究其因，不是墙未筑正气，是第二轮处泥土含水量过大，承载不住上部墙重，竟从该处崩裂开来。

“你以为土墙就那么好筑！”场长教训起叶四来了，“你冲壳子得行，当师傅还差得远！”叶四听了一脸的不了然：“又不是我一个人充行事硬要筑，还不是你们说要自己筑！”叶四竟赌起气来。“不要怪哪个人了，失败是成功他妈，来过不就成了。”知青们七嘴八舌总结了经验。本来很简单的事，对没有灵性的人来说自然就难了；虽然有灵性，不经实践，也有错谬之时。那顿未吃完的庆贺饭也早冷了，已变得索然无味了。

新场比旧场高了许多，新房坐落在山凹的底部，坐西向东，三面临坡，东边是陡坎，小路依次曲折而下。山下远处是九龙平坝，日出东山，开门即见，坝上铺一层轻烟薄雾，山丘顶若隐若现，恍若天上人间。

包谷苗已半尺许，绿黄黄的，早该浇肥了。行间还留有麦桩，土也早该翻了，粪水肥

料还需到下面旧场去挑，理所当然是我们男人的事了。下去挑一趟粪水，要四十来分钟，下坡一溜烟，轻松愉快，上来就恼火了。八九十斤的担子上了肩就不能落地，坎窄路陡，桶也只能装九成，不能太满。每次爬上了沟顶，长吁粗气一口，步履也轻快起来。一次，不知是抬头看天，忘乎了所以，还是“黑晕症”突发，我竟一脚踏空，扑跌下尺余高的路坎，恰好带倒一桶粪水，从头上冲浇而下，爬起来满面臭水弥漫。急忙跳到溪中“牛滚凼”，顾不了冷热，滚了个头遍。见者无不善意地微笑道：“今天你背了时，也没得啥子，粪淋了还长得快些！”炊事员赶忙烧热水，抹了肥皂，从头顶到脚板心都洗了个遍。

或许这就叫爬一身泥巴，滚一身粪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这就是我的脱胎换骨？当我每天睡在那80公分宽的木床上时总要质疑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开初，握了锄把的手，几乎握不紧拳，吃饭拿筷都不听使唤。拿起铅笔，木然似断了神经，笔尖竟然没了方向。真心痛起自己的手来。问自己：我还能画画么？

请钢琴家用弹奏美妙乐曲的双手来握握坚木的锄把，让舞蹈家赤着脚走走这满是碎石的山路，那会是啥滋味呢？

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舞蹈家，但我从小就梦想当个大画家。

遥望蓝天上雄鹰翱翔，近看苍翠的青松耸翠，凝视山边的危岩矗立，聆听小溪的流水潺潺，我一阵茫然。

就是挨刀，也要图个痛快

金色，是富贵的象征。自从有了统治阶级，自从有了三皇五帝，金色就是他们至高至尊的象征。然而在广袤的山乡农家，金色象征收获，象征着劳动结出的果实。

1966年金秋的林场，满目金灿灿：收完黄澄澄的谷穗，收完金黄黄的包谷，再挖完遍坡的红苕，扯回10月黄金豆，囤满仓盈，我们林场被点染成了金色，满屋充溢着稻菽的香气。特别是红苕，多得没处放，在西坡岩边看好点儿，专挖了两个大窖，似备战备荒般存好。

我们林场丰收了，就红苕平均每人一千多斤！做“红苕泡”，熬红苕糖，缸盛碗装，新鲜时喝半碗，就“伤”得来闻都不想闻了。串门的知青们来了，它们就成了招待客人的礼物。人吃猪吃，天天吃，蒸、煮、炒，搅包谷羹羹吃，吃得我一辈子都不想吃了。三个月光吃红苕，有哪个招架得了？知妹们更是吵着要吃白米饭。话又说回来，吃久了虽“伤”人，但知姐知妹们一个个长得胖乎乎的。俗话说“无娘儿天照顾”，酷日暴晒，大雨骤淋，不记得有过什么病痛，吃过什么中药西药，最多不过喝点姜汤而已。当然啰，也仗着人年轻，体力劳动也能强身健体，一个二个都被整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家伙了。

一天，场里开会，传达县里派到公社的社教工作队的文件，说什么要抓紧阶级斗争，搞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场长还神秘秘地说“林场也不是真空”，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

要求大家努力学《毛选》，勇于“斗私批修”，大搞“人人下楼”，搞“背靠背揭发”。

场长私下叫我写入党申请，背地里却找成分好的知青收集材料，说我要“篡党夺权”。“知青们不听他的话而听你的话”，团支部书记祝玉辉对我说，这就是场长的根据。我只是一笑而罢，嗤之以鼻：“太低能了，平常看起正正派派的人，居然也搞这一套。”

“听他说这恐怕也是工作组的意思。”祝玉辉也挺心细的，她出身工人家庭，心地善良，正直温顺。她虽然劳动有点“温”，动作又慢，加之眼睛又近视，做事自然就有点“笨”。但她人品好，在林场同样赢得大家的尊敬，就像大姐姐样。

11月份深秋的山边梯田，水冷扎骨。我犁完最后一铧把牛索解下，牛儿在坡上吃草，我坐在田边歇气。这小块块一坡梯田，是生产队划给林场的，不知哪朝哪代这儿是个窑罐厂，稀泥里暗藏着硬利的瓦片。不下田哪里知道厉害，当赤脚踏进柔软软的淤泥时，顿感有硬棱在小腿上刮过。待爬上田坎，洗去腿泥，细皮嫩肉的小腿顺水渗出条条细丝丝鲜红的血道，才显出了惨状，血渗了好一阵才凝止了。犹如茅草划破皮，或许久而久之便会习以为常，或许如农民皮粗肉厚就划不破了。这点皮肉之疼筋骨之劳我不怕，还是那心志之苦教人难受。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这些夹着尾巴做人，生怕惹是生非，甚至是谨言慎行，在野山沟里老老实实埋头改造世界观两年未回过一次家的人，哪点又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听话的知哥知妹们又何罪之有？又何错之有！我有了不祥之兆：为什么要加之虚有的罪名？篡党夺权如此之大帽，冠之以匹夫，谁又经受得了？越想越气，心头之痛更甚于那破瓦片划破小腿。好在我还不是那圈内之徒，哪来篡夺之说！君子之心明如镜，静以观之，看你把我又其奈何哉！

我的朋友蔡铁昌同学突如其来的一封书信，化解了我的一切疑团。蔡铁昌也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他在信中传递了关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顿时振奋不已。

是夜，我把朋友的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知哥知妹，大家都兴奋得通宵达旦合不了眼，满以为劳其筋骨的日子该结束了，幻想着山外的世界该有几多精彩属于自己。我即决定次日先到县城窥探形势再作计议。尽管听说“大革命”已经近半年了，大城市都闹翻了，在那闭塞的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我们仍然不敢轻举妄动。

县城里秩序依旧，但大字报满街，已有工人造反派扯起了大旗招兵买马，喇叭里播放着造反歌曲。红卫兵串联路过县城，戴着红袖章，穿着军色衣裤，其意洋洋。那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横幅已扯上了街，过去平静的小县城已潜藏着暗流与危机，气氛凝重，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该咋办？我们老知青该何去何从？是夜，住在县城朋友家，辗转反侧通宵达旦。

清晨,告别朋友,踏上归途。从县城乘车到合流(汉渝公路离城最近的区),再徒步翻中山回场(邻水县地形分三山两槽,我们林场在中山东侧),中途可在禾丰林场歇脚。到达禾丰林场时已近中午,有一二知青相识,并引见他们林场的"高参"蒲远华。这位因在校和女同学恋爱被迫退学的大学生,身材修长,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言语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激动的人,这恐怕与他的经历有关。跟他谈及山外形势和造反打算,一拍即合。林场顿时沸腾起来,知哥知姐们欢笑、吵闹、摩拳擦掌,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但他们都愿听蒲眼镜的,让他拿主意。我们商定,发动全县知青造反,组织重庆知青造反兵团,杀回老家闹革命。在场的知青当即取来纸笔,由我起草了一封《告全县知青同胞书》,慷慨陈词,阐明形势,回顾展望,呼唤造反,激奋之情见于字里行间,无畏之心掬之可视。我们约定一周后(1966 年 12 月初)在邻水离重庆最近的坛同区集中,举旗徒步回城造反。最后决定把《告全县知青同胞书》以风垭公社林场与禾丰公社林场的名义向全县每个林场寄发。油印此信,寄发都由蒲眼镜他们立即动手,制作大旗则由我们负责。午饭后,我告辞翻山而去。

天擦黑时我跑回林场,歇了口气后就与知弟妹们商议我们的行动计划。决定走之前日到公社与工作组辩论,在公社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时到公社取钱取粮为返城作好准备。一切都暗地里进行,平日照旧出工,不让场长事先察觉而有所防备。举事当天,我们 11 个知青全然如一人,雄赳赳气昂昂直赴公社。那天逢场,人潮涌动,我们把县里派来的工作组的组长"请"出来站在公社大门外石梯上,知青们在下一字排开,双方展开了对答式的辩论。农民们把我们围得密不透风,工作组长铁青着脸,语无伦次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旁观的农民朋友们看见这种情况,也为我们捏了一把汗,悄悄对我说:"你们不怕以后挨整啦?"

挨整,谁不怕?要挨,躲也躲不脱,就是挨刀,也要图个痛快。在林场闷了两年,耗费了青春热血,一无所获,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心里窝着一团火!再整,不外乎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外乎在这野山沟呆一辈子!于是无所畏惧了,想说的话敢放开嗓门说了,要出的气也敢挺起腰杆出了。

看着石阶上组长紧张瑟缩的窘态,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们并不想有什么结果,只是想公开宣布:我们开始造反了!我们非常明白,县委工作组、公社能起什么作用呢?政策又不是他们制定的,在公社造反毫无意义。余眉父专门负责取钱取粮、订做大旗,当他告诉我们一切办妥时,我们立即撤退回场了。

翌日早晨,天朗气清,我们收拾停当,准备出发。此时,我才对场长说:"我们要回重庆造反了,场里的钱、粮我们取完带走了。"他瞪着双眼看着我,愣了一会惊诧地说:"那我们在场的老场员还吃啥子?""场里的包谷红苕还吃得完吗?"我略带嘲讽的口吻反诘

道。他点着头，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此时，老场员们也全钻出门来，惶恐地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要回来，再见了！可爱可憎的野岭荒山，我们的林场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背着包，一个跟着一个越过了屋后的山梁，回头只见几个老场员站在土坝上呆头呆脑地目送着我们。

雄赳赳回城造反，灰溜溜返场生产

坛同，一个汉渝公路上的小场镇，是邻水至重庆的咽喉，两地相距近百公里。有百十号人按时到达，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吵吵嚷嚷，小镇也沸腾了。大家规定了纪律，大张造反红旗，向重庆进发。预计两天走完近两百里路任务很重，伤病者随时可乘车。出发前就派了人先坐车赶回重庆联系已在渝立足的观点一致的造反组织，联系接待站吃饭住宿，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头天夜宿江北县兴隆场，次日天亮出发取道寸滩小道，至傍晚时分大部队才到朝天门。迎接大家的先遣战士告诉我，大竹县知青成立的造反兵团先到重庆好几天了，观点和我们相同，也是要砸烂社办场。我与蒲眼镜等临时负责的头头商量后立即决定加入该组织。

由于邻水知青的参加，造反兵团在重庆壮大起来，总部由邻水和大竹分团组成，改选了头，大家推举我总负责，蒲眼镜借故回家再也没来了，大竹县的负责人是冯昆华。兵团成立了宣传队和材料写作小组，宣传队成天排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有歌舞、表演唱、说唱之类的形式，好不热闹。我多数时间负责材料整理，进度很慢，目标不明确，找不到出路。最后整理出社办场的“八大罪状”，提出“砸烂社办场”的口号，要求给予工作安排。我们派代表去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市接待站、市信访办、市政府办公厅送材料反映问题，哪家也答复不了，都说你们知青的事情只有等中央的指示。

我们驻扎在市外贸大楼，看辩论，练节目，逛街串门，折腾了一个多月，等来了周总理的指示：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接待站一断炊，咋办？大家一合计，只能各回各的县。

回到邻水县，接待站设在县磷肥厂。那时县城里的工人造反兵团人多势众，要我们参加一起造反。我思索再三，认为我们造反的性质不同，目的不一样，那些工人造反派有点乌七八糟，名声不大好，不愿参加。在县里，我只想弄明白，我们的档案上给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写了些什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抄安置办公室！当晚，我提出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又特别告诫知哥知妹们：不能硬来，只能文来！

翌日上午，组织了各林场代表直奔县安置办公室，找到安办主任余代祝。主任阴沉

着脸，“你们来啦！”他“马”着脸说。“余主任，我们想看看档案，大家担心装了黑材料。”我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和他太熟了，在县知青中我算是脱胎换骨的先进代表，原来在各种代表会上早已相识。在这种场合，似乎有些尴尬。“现在安办哪还有啥子档案！”余主任叫着苦。知青们群情激奋，出言不逊：“余代祝，你老实点！哪有安办不整知青的！”“把档案拿出来我们看，现在藏到整不得行了！”主任掏出钥匙，打开每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此时我才猛醒，他们早早就是有防备的，此举太愚蠢！我立即对大家说，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在县城呆了四五天，什么也没干成，在接待站吃闲饭。下一步何去何从？城里朋友悄悄告诉我，县里准备要拿知青开刀，要抓工人造反军的几个头目，其中就有老知青张金陵。我们几个的名字还没听说，不过已有传言，说我们抢东西，抢饭吃，这是在逼我们走。我认真地回顾了近两个月的造反经历，重新审视了我们造反的目的和眼前的形势，意识到再呆下去，不会有结果，反会害人害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入夜开会，各林场头们研究下步行动，听完我的意见，大家失望了，不少人反对就此撤离。没法，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开全体知青大会，由大家决定。夜深沉，心如焚，我站在室外篮球场上仰望天空，漆黑一片，冷风飕飕，全无倦意，我仰问苍穹，我们知青的出路在哪里啊？

一大早，天气阴沉，全体知青集中在篮球场，我站上一方凳，一双双期盼的眼睛紧盯着我。看着他们，我无法开口，是歉疚，还是无奈？我也说不清。紧咬双唇，双眼慢慢平扫一周，用沉重的语调说出我平生无法忘记的一席话：“同志们，我们知青造反为什么？不就是想找一条出路，说白了我们应当有个工作，不当农民。宪法规定我们有工作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有结社、言论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我们来说，早就成了奢望，从上山下乡开始，我们的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为什么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是我们成绩不好，还是我们表现不好？都不是！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激奋之下，我慷慨陈词，在场的知青望着我，全场清斯哑静。“前段时间造反，我们知青的问题反映到了中央，结果如何？周总理一句话‘就地抓革命、促生产’把我们从老家又赶了回来。才在这里住了几天，又能干啥？县里恨死了我们，已往我们身上泼‘打、砸、抢’的污水了！”我是个爱激动的人，说得很动情。

“我们是‘秀才造反’斗斗嘴而已，还能干啥？还敢干啥？与县工人造反军合流？我不愿干。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现在怎么办？只好听天由命了。”

顿了一会，我用平静的语气，态度坚决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场抓革命促生产，静观形势的变化！”

“哦！”不少的知青异口同声大声吼起来。

“那兵团啷个办？”有知青高声喊道。

“就此解散了。”我平静地说。大伙议论起来了，失望了，责怪起来了，甚至愤恨了。

“害怕了嗦！”带嘲讽的口吻。

“叛徒！逃兵！”双龙林场的夏文富大声责骂起来。

我有点不能自制了，听到“叛徒”二字如芒在背，如针刺心，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大哥的下场忽闪而过，此刻，我更坚定了退出“造反到底”的决心。

“要走就走，要留就留，悉听尊便！”我放开嗓门喊道。我跳下凳，对我们林场的知青下令似地叫道：“我们走！”我们又率先当了“叛徒和逃兵”。一个个林场的知青如鸟兽散，各自归去，“造反兵团”亦土崩瓦解了。

回到林场，只见男生宿舍竟变成了牛圈。原来我们知青造反离场后，场长和老场员多数都回家去了，只剩下一个人守场。猪、牛圈离宿舍有一段距离，晚上怕牛被偷，便将牛关进了我们男生宿舍。打开房门，臭气冲天，我挂在墙上的画夹不翼而飞！床挪到屋一角，铺草已被牛吃得所剩无几。我的画夹呢？当我的视线搜寻到地上时，只见我在林场的全部画作被牛的排泄物和着泥蹂躏得稀里糊涂一团糟，画夹被牛擦背时从墙上拱了下来，被它千踏万踩地糟蹋了。自己的一时疏忽，让我悔恨终身。

退出了兵团，退出了造反派当了逍遥派，我心里踏实了，那段莽撞的造反经历让我更成熟了。后来，我又自己做了一个油画箱，提着它在重庆、乐山、南溪、大竹、邻水为造反派画巨幅毛主席像和巨幅《毛主席去安源》了。

我告诉自己：今生也许成不了画家，但总还可以当个画匠。

作者简介

李忠公，男，重庆人，1964年高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到达县地区邻水县九龙区风垭公社林场，后撤场插队。1972年因有美术特长留在邻水县工作，曾当过中学教员、县川剧团美工。后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工作，现已退休。1983年加入美协四川分会，现为美协重庆分会会员。曾在《四川画报》、《中国妇女》、《四川农民报》、《巴山文艺》等多种刊物上发表过水印木刻、黑白木刻，有30本封面设计作品面市。

滴血的光荣花

杨友维

1964年7月，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感觉考得很满意，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心里暗自得意洋洋。我是学习委员，又是团干部，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均是名列前茅，母校安顺二中是全国文教先进单位、贵州省红旗学校，高考录取率每年都是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我自信考上大学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填报高考志愿时，考虑到父母工资低，我们兄弟4个都在上学，读师院可以免交学费，减轻父母负担，因此，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贵阳师范学院。但是，班主任陈容舒老师却说我“没有雄心大志”，他叫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我服从了班主任，心想即使没考上，至少贵阳师范学院能够录取我。

走出考场那天，同班同学胡绍源把我叫到街上饭店吃饭，看他一脸愁容，我大惑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考累了？”他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你和我去吃一餐饭吧！唉——”我说：“何必破费呢？在学校食堂吃吧！”因为那年月，我这样的穷学生到饭店吃饭是一种奢侈。他垂头丧气地说：“同学一场，吃顿散伙饭吧！”一边说一边拉起我就朝一家饭店走去。

他家庭富裕，父亲是一名老公安，还有一个哥哥在省城贵阳工作。他年龄比我大两岁，对我很关心，我非常羡慕这位老同学有这样一个好家庭。他不仅要了几个菜，还要来一瓶白酒，我一看连忙制止：“中学生守则规定不准抽烟喝酒，不要酒吧！”他凄然一笑：“现在我们不是中学生了！自由一点吧！”

我坚持遵守规则不喝酒，他拗不过我，自己倒了一杯酒，抬起酒杯后异常认真地说：“你的学习一贯都很好，肯定能考取重点大学；我成绩不好，是考不取的。”我看他满脸沮

丧，连忙安慰他："不要紧的，你明年再考吧！"

他咕的一声喝了一杯酒，然后紧锁双眉，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就到贵阳去，我不回来了，考不取大学，没有脸见人呀！我……等你的消息，到时候我在贵阳送你上大学。"不管我怎样安慰，他总是坚信不疑地说："我考不取，你肯定是重点大学！"

第一批录取通知下来了，没有我的。我想等第二批吧！可是，第二批录取通知发下来了，仍然没有我的，而胡绍源却被贵阳医学院录取了！天哪！上帝和我开了个玩笑吧？最后我得到的竟是"不录取通知"！我们这一届两个高中毕业班共计74名学生，9人因为家庭政治审查不过关不录取，两人未达录取线而落榜，其余的63人均跨进了省内外大学的校门。

年轻无知的我哪里知道，因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安顺县党部副书记长，1950年被关押劳改5年（于1979年特赦），家庭历史政治审查过不了关而上不了大学。没想到升学录取时，高考成绩竟会一文不值，家庭出身居然成了决定性因素！按那时的政策，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属于政治不可靠之类，当然不属于培养对象。我感到绝望了，我成了社会的弃儿，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痛苦、无奈、郁闷，整天不说话，也不愿意和谁见面。

家里人也不说什么，偶尔亲友来家说到我的事，祖父母和父母亲都只是长叹一口闷气。好在亲友们也明白事理，有的还安慰我说："要不是你父亲问题影响，你肯定是个名牌大学生了！"我知道，这样的话，对我是一种宽慰，却又是对我和父亲的一种钻心之痛。我流着泪哭不出声音，把头重重地往板壁上碰，吓得年迈的祖父心疼地大叫起来："不要碰！不要碰呀！"政治，政治是什么东西呀？！一个上进的青年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它的迫害！

8月初的一天，校长张维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这位校长是北方人，南下老干部，对我这位好学生历来很关心。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是团干部、班干部，你带头上山下乡吧！"我坚决地说："我回老家！我的老家在农村，那里有我的亲人。"张校长停了一会又说："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一批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你带上高中课本去，一边劳动一边复习，明年再考吧！"说了半天，校长硬要逼我带头上山下乡！我是一名太听话的学生，心里感到张校长是爱莫能助，于是屈从了校长。上山下乡成了我不得已的出路。

1964年8月中旬，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连同一中的10来个同学和几个社会青年共计25人，作为黔中大地安顺县的首批知青，下放到宁谷公社（今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插队落户。出发时，我们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背上背着一个印有"红在农村，专在农村"8个红字的斗篷，在欢送的锣鼓声中走出学校大门，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斜视着戴着大红花的我们，就像观看一群怪物。丧失读书权利的我们在被逐出家园之际，却又被戴上光荣花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游街宣传，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呀！我低头凝视胸前的光荣



花,却看不到任何光荣,只有满腔屈辱,我的心在滴血!

低垂着头,强忍着悲伤,我一定像是参加送葬那样走在大街上。走到大十字,一位在公路工程公司工作的朋友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他朝我走来,惊奇地问:"你们这是搞哪样名堂?"我无言以对,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出来。朋友睁大了眼睛又问:"你下哪样乡?到我们那里去上班吧!"我颤抖着说不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在纸做的光荣花上,红色的花瓣上立即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黑斑,接着又变成一个又一个黑洞……

到了宁谷公社,我的知青生活,我的蹉跎岁月开始了。

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住进了同一间房屋,组成了一个集体户,为了区别于封建性质的"家长",同伴们戏称我是"家主"。然而,我仅是个不懂油盐柴米的学生,大多数同学又不会做饭,好多时间吃的都是夹生饭。第一年,政策对知青很优待,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粮店供应40斤大米,还有10元钱的生活费,在农村可算是富户人家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空荡荡的。尤其是进入大学的同学来信时,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下乡的我们心里阵阵隐痛,眼前一片迷茫。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光荣花,总觉得是我的心滴血染红的,因为我的心总是在滴血。这是滴血的光荣花!

作者简介

杨友维,男,汉族,1944年11月出生。1964年7月于贵州省安顺二中高中毕业,同年8月,下乡到安顺县宁谷公社插队劳动,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学教师、文物管理所所长,后当记者至退休。已发表百余万字作品,专著《大明屯堡第一屯——鲍家屯》一书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无奈上山下乡，终未"脱胎换骨"

张学锜

1966年3月3日这天，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上扎着大红花，车厢侧面和后面挂满"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真金不怕火来炼真金更要火来炼！"等标语，车厢里载着我们千多名成都团市委第四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毕业的知青，从成都北门梁家巷缓缓出发。从北门到南门，从武侯祠到簇桥沿街十多里路上，成千上万市民夹道相送，其场景大概不亚于当年抗日救国"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景。当我们挥泪告别了远送的父母和亲人后，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往上山下乡目的地——凉山州西昌县。

三天的行程，第一天晚上住雅安。当车到雅安时，我们班上考上雅安四川农学院的黄玉微同学早已等候在我们要住的招待所了。她听说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坚决要下乡的同学，感到异常惊奇，特地赶来问我，她说："你为什么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信心十足但又显得有些无奈地用早准备好的体面、时髦话回答她说："我们这些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脱胎换骨嘛！"

说实话，我内心其实很痛苦，很不情愿。对老同学的回答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对那个年代的学生，金榜题名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当国家工程技术人员或成为国家机关干部的人生轨迹谁说不是首选？我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九中，初中毕业又以优异成绩升入该校高中。在这所全省著名的重点学校读书，学习成绩又一直保持优秀。早在升入高中时就立下志向："高中毕业一定要考入我国名牌大学去读书。"奇怪的是，临近高中毕业时，人生的选择却变成上山下乡了。这是为什么？难道真正只有上山下乡才是

唯一的选择吗?

每当我回想起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时,心里就难受,就怨气冲天,就产生无名孽火高三千丈。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平衡心态,保持愉悦心情,争取晚年健康长寿,我时常告诫自己:“尽快忘记痛苦的过去,经常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是,根本做不到。只要一提起上山下乡的初衷,那些令人感到无奈、可悲、可恶的往事就浮现在眼前。有人说:痛苦的事情彻底说出来反而痛快些。好,那就让我从读高中那个年代的政治背景和我们学校的情况说起吧。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够原谅我的宣泄,从中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

我读高中的三年是1962年至1965年,这几年正值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学校这样讲: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就寄托在我们这代身上,搞不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断送在我们手中;要求我们深挖细查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批深批透并与之彻底决裂;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关系到以后能不能接“革命班”(分配工作)的大问题。学校里大会、小会开个不停,人人过关,个个拿话来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都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任何社会经历,思想单纯,一心一意读书学知识,会有什么罪恶东西值得深挖细查?

记得那是1963年9月,高二上期开学第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在班上慎重地给大家宣布了一个谁都没有意料到的决定:根据学校有关精神的要求,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分别由李××和陈××担任,原吕×和沈××不再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大家都十分困惑。原班长和书记干得好好的,又没什么错;一般新班第一学年的班干部才是班主任指定,第二学年即使不称职也是由全班同学一同来改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班主任没有明说,只说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不久我们得知其他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都一样地更换了,而且换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革命领导干部子女。我们班新换上这两位同学的父亲就分别是当时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领导。我们终于明白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行的阶级路线和相关政策。

那时推行的阶级路线和政策重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的问题。以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一系列论述作为依据,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按其所处的政治地位、社会职业、资产状况划定成一种阶级成分。然后根据阶级成分确定属哪个阶层,最后站在革命阵营的高度来区分敌我,确定对其采取什么对待方式。那时被定成革命干部、产业工人、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的是最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红五类”),属

无产阶级阶层，是革命依靠对象；被定成小贩小商、中农、医生、职（教）员、自由职业者的是不好不坏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麻五类”），属小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教育、团结的对象；被定成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奸商）、国民党反动派、罪犯坏分子（包括“关管杀”）、右派分子的是最不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黑五类”），属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打击对象。

我们是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论成分，我们只能是学生。该划成什么阶层呢？都划不上！那么学生就该大家一视同仁了？不行！没有阶层就这样办：就看其父母的阶级成分，即按该学生的家庭出身来划群分类。因为家庭出身是不可改变的，按当时阶级分析的观点：出身什么阶级，就受到什么阶级思想影响必然是铁板钉钉的。因此不知不觉我们学生就按家庭出身分成前述的“红五、黑五、麻五”三大类了！那时填写的任何表格都设计了家庭出身这栏。

我父亲解放前在伪政府当职员，因而我的家庭出身是伪职员，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当时的革命阵营而言，我应属教育、批评和团结的对象。但不幸的是我父亲解放前有一段反动历史，让我对自己本来不是很坏的家庭出身失去了自信。成都九中是当年省市搞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和那些出身“革干”家庭的省市委、省市府、省市军区首长的子女同校，我们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人数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因此剩余的我们这些少数既是弱势群体，又是众矢之的就毫无疑义了。好事沾不了边，倒霉事一串串。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受到的冲击最大，对我高中毕业后是否升大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63年高中二年级上期，我校的阶级教育搞得如火如荼，学校上下，阶级斗争政治空气浓得使人窒息。没有想到，学校居然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教育的典型，在各个班上都要找出几个所谓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学生让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记得那时在班主任的策动下，班委会组织我们对我班学习成绩相当好，但政治思想方面不积极要求进步的谢××等三位同学开批判会。他们三人被认定为已走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们的家庭出身当然不是“红五类”）。批判他们埋头读书，只顾自己成绩好，不愿帮助成绩差的同学（主要指“革干”、“红五类”子弟）一起进步，是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东西在作祟；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积极参加政治思想方面的活动，不要求进步，是中了资产阶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腐朽思想的毒；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不愿为班集体多费心多出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脑子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泛滥等等。总之，说他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流毒太深，这样下去跟我们党要求的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这种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无可救药云云。批判会开得很认真，气氛很严肃，简直像对犯罪分子开批斗会。其中一个叫毛×的女同学每次开会都在哭，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男生谢

××虽然没有哭，但他说话时声音和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

其实，我的心早已跟着他们一起颤抖了。我意识到我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出身“麻五”，划定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先天接受的家庭影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今后我还能埋头读书，发奋学习吗？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到头来落个“白专”的名，岂不前功尽弃吗？这是给我单纯地埋头读书，以优异成绩考人名牌大学理想的一次较大冲击。

第二次受到的冲击是高中二年级下期（1964 年 5 月）的“选飞”体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以招滑翔员的名义到我校选拔飞行员，高一至高三全体男生都必须参加非常全面而且细致的体检。体检实行淘汰法，只要查出某一科（项）不合格，就立即走人。我记得那时体检占用了我一周多上课时间，从内科查到外科，从五脏六腑查到眼耳口鼻，从头到足全身查遍，从小医院查到大医院。什么坐转椅、拉平行筷子、滚翻倒立辨方向等等功能、体能项目都测评。查来查去，原来的三四百人只剩下了两人（我和高六五级二班的李林同学），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一直过完最后一道关，全部合格。我没想到，爸妈给我的身体居然那么好。我裸眼视力到现在都还保持 2.0（即现行最高标准：5.3）。回到学校，当班主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兵登记表交给我填写时，班上同学们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也很激动，同时也有点犹豫。我想：我这就去参军，不读书，不能实现读名牌大学的美好理想，太可惜了。但又想：当飞行员这么不容易，100 个人难挑一个，能被选上，这也是我一生的福气。班主任问及我有什么想法时，我如实地回答说：“我本想读书考大学，但祖国需要我当空军保卫祖国的领空，是无上光荣的，我也很愿意。”之后，我按登记表要求认认真真地填表，填写了对人民空军的认识；填写了“三代”（本人、父辈、祖辈）情况及认识；填写了对“三反、五反”的认识等等。填完表交给班主任时，班主任对我说：“你安心学习，等待通知，若是被录取，暑假期间会有车来你家接你。”我真的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暑假到了，我一直在家一天都不敢离开，眼看着暑期一天天过完，一点音讯也没有。我感觉到已经没望了，一开学我就去找到二班的李林同学。我疑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也没走成？”他一点也不遗憾，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我还有个国民党的地主爷爷，政审就过不了关嘛。”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的家庭出身比李林更差，我出身在有反动历史的伪职员家庭，父亲解放前在川大读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白色恐怖时期脱了党，大学毕业后在伪政府工作又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其一特务组织成员，因无罪过、交代清楚、态度端正而被政府留用；我外祖父是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文革”后平了反）。说起来，我出身的那个“麻五类”家庭比“黑五类”还要“黑”。那个年代谁敢把反动历史家庭出身、家族里还带有“关管杀”的子女送入中共军营，还把如此贵重的飞机给他驾驶？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完全领悟到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不可改变的，同时心理承受力开始增大，碰到好事，不会高兴得太早。

第三件事是我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也是对我升学理想的致命打击。那是高三上期(1964年底)的一天下午，全校停课，全体师生一千多人集中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大会。我惊异地看到，低头站在台上，带着高帽子被批判的人竟然是我们敬仰的王用舒教导主任。在我们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印象中，王主任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负责认真，能力强，威信高，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好领导。这次不知为什么竟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批斗。那天学校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气氛很严肃，空气很沉闷，大家都专心地听着刚来不久、面孔阴险、嘴上不时叼着香烟的刘校长(兼党委书记)数落王主任犯下的“十大罪状”。这十大罪状主要是跟阶级、阶级斗争有关。具体哪十条记不清了，但使我刻骨铭心的一条是：竭力将黑帮子女塞入大学，把“革干”、工农子弟排斥在大学门外。

更使我惊讶无比的是，他列举的“黑帮”子女竟然是正寄住在我们家里的同乡兄长黄显亚。黄显亚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四川富顺县老乡，他们家在成都暂时没有住房，我爸就让他们全家搬到我家来住，大家相处得和睦、亲密。黄家是四兄弟，黄显亚行二，比我大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他很聪明，读书读得很轻松，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父亲是个知识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却没有在大单位上班，而是在一家搬运队拉板车，干重体力活。这次才知道他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又是什么“袍哥”组织的小头头。

大会上的发言人声色俱厉地批判王主任故意不执行我们党的阶级路线，竟敢为黑帮子女黄显亚的高考开绿灯，为其升学保驾护航，强行塞入北京某重点大学，而把某某干部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

此后，成都市招生办确实传出一段精彩的故事：1964年高考没有公布考生成绩。黄显亚的高考成绩非常好，经查实，他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是成都市理科第一名。他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北师大，第三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录取过程中，清华、北师大的招生工作人员犹豫很久，不敢要。北钢的招生工作人员得到后就不肯放手。他们说：这么好的学生哪里找？他们不要我们要。北京钢铁学院决定立即录取，当天下午就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邮电局。第二天一早，市招办主任接到市教育局某领导打来电话，要求马上扣压这份录取通知书。市招办主任放下电话就往邮电局跑，到邮电局一找，晚了一步，说邮递员刚带走。市招办主任决定尽最后的努力追。他先打电话问好黄家地址，再请邮局派人快速赶到黄的家门口去拦截。结果不妙，派去的人赶到黄家时，刚好遇见送通知书的邮递员走出门来。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听说，黄显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北钢学习不到两年就把专业课自修完，学院图书馆的相关书都翻了一遍，第三年考上本校研究生。）

其实，这事并不是王主任要把黑帮子女黄显亚塞入大学，而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招生人员还有几分良知和勇气，根据考生家庭和成绩自主地择优录取而已。从批判会不

难看出:为了在后来的招生推荐工作中切实贯彻落实阶级路线,学校当局要抓一个典型,搞杀鸡儆猴的勾当。

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对升大学的想法产生了绝望。论成绩,我不及黄显亚;论家庭出身之差,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述及:我的家庭出身里面比黄多了一个"叛徒"性质和"关管杀"成分)。姑且算我成绩过关,那个严格的政审关就难过了,新上任的教导主任绝对不敢步王主任的后尘!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摆在我面前的1965年高考将有一个令人心寒的结果(那一年毕业的考生档案里都附上了学校推荐意见。据我们年级二班田毅生同学说,他的学生档案被"文革"造反派抄出来,上面学校推荐意见栏写的是"该生不宜上大学"。他没有想到断送他大学梦的竟然是自己的班主任和母校)。

我该怎么办? 1965年最后下半学期都没有专心读书,而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激烈的斗争和痛苦的抉择之中,一味要升大学的想法开始向上山下乡转变。

对每一届高中毕业生,学校都要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宣传教育,对我们这届学生作的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宣传教育。也就是说,除了升学与就业两种准备,我们还需要有待业、无业等多种准备。在阶级斗争路线指导下,出身"黑五类"的学生就有必要作好这些准备(事实上,六四、六五两届出身不好的学生待业而街道办事处不予分工作的太多了)。其实我在想,就算我走运,没升到学而让我就了业,高中毕业当徒工去卖体力,我还真不愿意干;况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背上背着出身不好的皮,随便在哪里就业都一样受歧视,何时出得了头? "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更使出身不好的人抬不起头。人活着就这样低着头,夹着尾巴过日子有什么意思? 我想,我们还这么年轻,总不能因出身不好而沉沦下去吧。要想办法,要思变! 那么,想什么办法,怎么变呢? 辗转反侧地想完了,最后结论只一个:"脱胎换骨"吧!

"脱胎换骨"意味着出身不好的学生能真正背叛家庭,能真正与父辈的反动思想、言行划清界限,做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重在看本人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脱胎换骨"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意味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意味着到艰苦的地方去,"真金更要火来炼"!

最艰苦的地方在哪里? 在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无人愿去的穷地方!

那两年,"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之类的标语、口号比比皆是。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某某知识青年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主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全国著名的知青有邢燕子、董加耕;四川著名的知青有巫方安、孙传其;成都

也有，名叫张宏道。张宏道曾被请到我校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讲述了他如何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凤凰山，如何把一个荒山变成花果山，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果农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园艺师，如何从普通劳动者提拔为乡镇领导。回乡知青董加耕有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确实，坚决要求到艰苦贫寒大凉山插队落户的成都市十一中学高中毕业生巫方安、孙传其，不到一年就分别被推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入了党，还都身兼当地政府要职，政治地位高了，名气也大了。而她们原家庭出身并不怎么好。

我想，他们能选择这样的道路，我就不敢吗？我怕啥？不就是"用青春赌明天"嘛！那时真有点"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气度。干脆来个"不成功则成仁"的做法又如何？这个想法给几个相好一交流，立即产生共鸣。暗中串联后，我们高三四个班共十来个人联名向成都市团委发去一封"请允许不参加高考，坚决要求到大巴山革命老区插队落户"的申请报告。(这十来人中有大半是出身不好的，他们很认真，出身好的人不多，大多是闹着玩的，他们中最后有一个是真下了乡)团市委对我们上山下乡的决心非常支持，但要求我们必须参加高考。最后除袁学鑫同学外都去参加了考试，袁学鑫一直在考场外给大家守包包，无论怎么劝他都坚决不考试。为表示决心，三班的任伦同学从写申请那天开始，天天打光脚，一直坚持到下了乡都未穿过鞋。

我也动了真格。成都有个编号叫"102"信箱的国防工厂(现在的西南金属结构厂)给我送来当工人的招工录取通知书，被我毅然拒绝。我父母和好友亲临成都上山下乡知青训练班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没动摇，而是把招工录取通知书上交给了知青训练班领导。因此我的下乡决心引起轰动，受到当局嘉奖，在获奖学员中排名第一。就这样我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能使人"脱胎换骨"的艰苦道路。我们成都九中最后一起踏上这条人生艰苦历程的高中六五级同学共 20 人，初中六五级同学共三人。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看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下乡五年，我既没有脱什么胎也没有换什么骨，只是徒然消磨了青春岁月！

作者简介

张学锜，男，汉族，1946 年 8 月生。1965 年成都九中(现为成都树德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1966 年 3 月到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县高草人民公社插队落户。1971 年 12 月调回成都市食品公司搞兽医卫生检验。1977 年至 1981 年在成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成都市食品公司职工学校任教师、副校长、校长。1987 年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企业指导处任质量管理工程师。1992 年调四川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主持全面工作，任副主任、主任、书记。2003 年至今在四川凌峰矿业公司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为了那些被湮没了的岁月

韩　秀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 1982 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时，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当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一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 1943 年到 1945 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 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 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 1949 年之后的新政权，因为中美关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而父亲不但是军人，且与 1949 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权眼睛里，他无疑是“敌人”。于是自从“抗战”胜利离开中国，父亲再

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每当我读到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书将我引进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门。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

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远，我只知道，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与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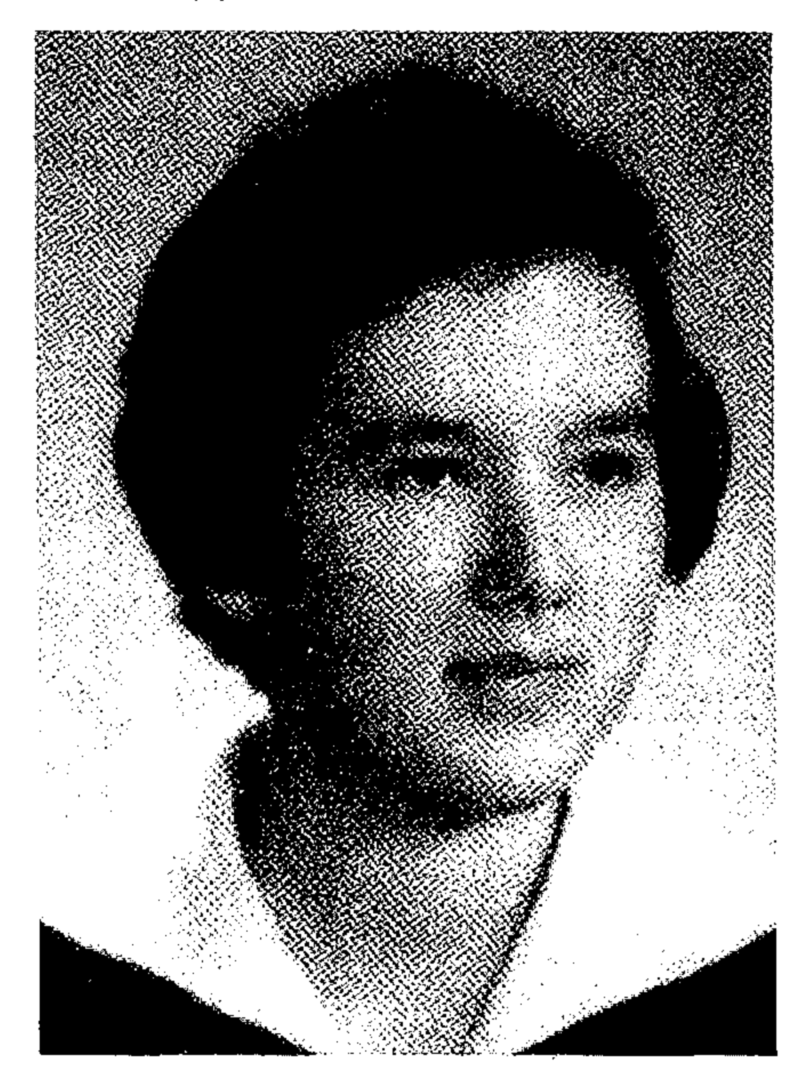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现在两位老人家都到了一个可以尽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因为我曾经成功地为他们传递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舒先生好讲故事，但他需要一个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二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卡玛·韩丁的父亲那样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孤独地坐在

最后一排。



韩秀高中毕业照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

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学校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那里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打倒美帝”喊声震天。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烤得我心里发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还站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倒是常常想到那个温和友善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会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雷打不动。

三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 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20 世纪 50 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 50 名学生中只有四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限，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时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

44 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 40 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

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后来，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们一行出发之前，副市长崔月犁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说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四

山西曲沃是棉麦之乡，相当的富裕，社员们下田劳动衣服鞋袜都穿得整整齐齐。林城中间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砖瓦房，也都整齐。家家户户堂屋灶间都擦抹得干干净净，睡房有炕占地宽阔，妇女们纺棉花、拧线、缝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摆上小方桌吃饭也在炕上。这张炕真正是当地农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们一帮知青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男女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三年时间里，知青之间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

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活儿干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绝不外借。

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疱，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疱，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姊姊让她下乡的，姊姊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不过，大概没用，那个人离那个高门坎儿还远得很呢。"我这才有些明白。

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 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 13 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 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 12 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刚下乡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召开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许多的磨难，但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的是，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对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撤

回县城，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 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五

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1964 年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人生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尽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 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

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织毛衣却飞快,而且花样翻新。她在与农家少女的交流当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六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韩秀在新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 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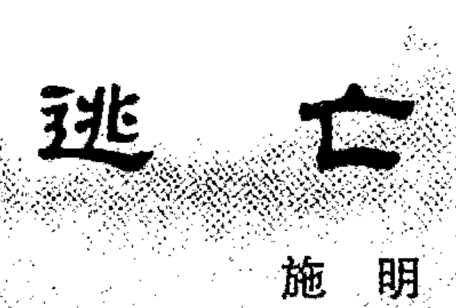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

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

作者简介

韩秀,当代作家。中文原名赵韫慧,笔名韩秀,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2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四年)担任华府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三十本著作,曾获纽约第四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二十四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



逃亡

施明

1973 年这个年头，因为我的逃亡偷渡经历而永远铭刻在心。

但凡重大的人生叛逆之举，皆事出有因。

日子混到这一年，我在珠江农场已经历了八个寒暑。

3 月某一天，我在石山上开山炸石移炮位时出了大意外。当我攀附另一根缆绳时，绳的中段被一块突出的石尖架住，并没有直垂下来，我一借它做力，被隔着的部位滑开，绳子长了许多，霎时间没有了支撑，失去了平衡。我本能地抽出扶着肩上工具的右手，双手死命拉着绳子，钢钎铁锤已飞滚下山。我的身体也吊在空中往下滑，快要力竭松手时，也是命不该绝，脚跟蹬住一块突出的石托，缓冲了下坠的力度，得以拉紧绳索，终于化险为夷。我爬起来往下望，还有十几丈高，深深倒抽了一口气。

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已是遍体鳞伤。最严重的是下巴划去一块肉，而脚跟第二天肿起像猪蹄，脊柱部位淤黑了一大块，摸摸都痛。这件事轰动了全农场，我养伤养了一个月，因为无法再干重体力活，于是被调去碎石班，以示照顾。

从此与妇孺为伍，工资不到 20 元，我非常沮丧。虽然不再一瘸一拐走路，但腰部还痛。心想，如果我那天一松手掉到山下，肯定肝脑涂地，死无全尸。如斯死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不得而知。《“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林彪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干部下乡是变相劳改”，如果此话当真，那我的血汗岂不是白流了？

我才二十多岁，正当盛年，难道就在这妇孺工棚过一辈子？晒场上的风柜把谷子和秕糠分作两摊，难道我甘愿是被淘汰的秕糠？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往往刺激起人的反思、顿悟、求变，有两首词记录下我当时的心路：

云

轻骑西风走万里，
霹血雷鸣惊天地。
洒泪洗五湖，
沉重心愁苦。
无知且洁白，
浮名空显赫。
破碎何为早，
云涌逐浪高。

星

月色柔和，
飞身渡银河。
天庭欢唱自由歌，
胜比月里嫦娥。
莫道岁月孤清，
胸中无限热情。
历尽悲欢离合，
乐在万里行程。

这大概便是我欲偷渡香港从闪念到行动的宣言吧。

偷渡因为有个"偷"字，似乎有失修为。而香港隶属英联邦租借地，去那里自然有投敌叛国大逆不道之嫌，但穷途末路已顾不到许多了。那时广东地区的偷渡风潮在知青群体中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广州珠江大桥下有条白沙河，河面上天天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气枕，万头攒动，都是苦练长游的准偷渡者。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亦是人潮汹涌。上下奔跑的晨运者为何乐此不疲？自然心照不宣。那时我便是这两处操练场的常客，也暗自写下两首词以作励志：

长游

未尝冬泳，先试夏游，六月江水清悠悠。畅洗人间跋途累，一腔热血逐急流。
不图春风，却惹春愁，烟水茫茫何尽头。送我渔波八十里，跃过龙门即自由。

越秀山登高

越秀瑰奇，登临早，七彩迷离山色。
绽放金波万道绫，天下朝阳无敌。
百步飞驰，石梯眼底，鸿雁初试翼。
心旌飞扬，凭栏别有胸臆。
韶华误了谁惜？童心已逝，铁肩千斤力。
满城莺燕颂光明，何堪嗟来之食？
大地无边，海月有期，鹍鹏扶摇直。
明朝谢别，云横万里踪迹！

万顷沙属边境地带，常有人算好潮汐，偷条木船，乘着月黑风高，顺流而下，避哨所，过龙穴，入零丁，越青山，六个钟头便可直达香港。但珠江农场政治空气甚浓，且戒备森严，所以农场知青偷渡者大部分都放弃地利之便，而是先撤回广州，边操练边串联。我第一次从事偷渡也是采取"踩线"（暗语："较脚"即偷渡；"着屐"即水路；"踩线"即陆路）。

我的偷渡伙伴，一个叫阿新，是初中同学，为人粗豪讲义气，高中毕业去了公社插队，合作时他已经有了两次偷渡案底，我想借助他的经验（此人1974年第四次偷渡不幸失踪，之后再无音讯）；另一个是道兄，是校友兼农场农友，生得唇红齿白，仙风道骨，酷爱文学，写一手清秀的柳体字，割禾时小指割断了上截，出身不好，家境凄凉，总之，与我甚是投缘（此人现在是下岗工人）。我们"埋堆"的地点是东莞塘头厦，因道兄的姐姐是那里的知青，答应帮弟弟作内应。

1973年7月21日，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出发。所需的物品已由道兄的姐姐偷偷带入东莞，不外是布鞋、气枕、药物之类。干粮是炒过的面粉拌上白糖和猪油，体积小而充满卡路里。指南针在当时广州已经断市，我们是自制的。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三人分散找座位坐，假装不认识。火车飞驰南下，离香港越来越近了，但过樟木头的时候，车上要逐个检查行李证明。阿新和道兄的证明露出了破绽，当场被捕了，而我竟然过了关。眼看着他们被带走，唯有不动声色，故作镇静。下一个站便是塘头厦，离香港只需六晚路程。但孑然一身，脚踏一双破凉鞋，手执一柄折扇，再无长物。我下了火车，随着人流漫无目的走在路上。如退却，连买火车票的地方也不知道，肯定会自投罗网。我想既然是漏网之鱼，或许老天爷额外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哪有临阵退缩之理？人群把我引进一个小镇，我大喜过望，身上还藏有几元钱和一些粮票，凭着在石场混了几年学了几句东莞话，我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食店，叫了两碗米粉，先把肚子填

饱，再找一间杂货铺买了两斤鸡仔饼，我又买了一个鱼丝网，把饼装入网中，重返大路。前面有片小蔗林，眼看四下无人，一闪身钻进蔗林，在里面等待天黑。

终于夜幕降临，我把那珍贵的干粮系在腰间，像鬼魅一般窜出蔗林，开始了黑夜独行侠的征程。我背着北斗星，迎向南风，唯此辨认路向。这时探照灯横扫在原野上，不过我一个人目标太小，何足惧哉！孤身上路真是好处多多，跑也好，歇也好，无须守望相助；饿也好，渴也好只有冷暖自知。有一次，我穿过一个小村落，惊动了讨厌的狗，吠得震天价响，我竟然与打着手电筒的民兵捉迷藏。有时碰上铁路，为了抄捷径，干脆在铁路上走一两个钟头，然后又消失在山林中。日间就藏在山障的坑沟边，躺卧在草丛中，哪管它蛇虫鼠蚁。不知翻过多少座山，涉过多少道水。第四天，我已经断了粮。第五天我在高高的山峦上终于看到大海，看到对岸一团光气，兴奋莫名的心使我忘却了饥饿与疲劳。我沿着连绵不断的山脊踽踽独行，第六天早晨我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座山顶上。那里随处可见前人丢下的衣物，我捡到一瓶红药水，涂一涂跌伤的膝盖，还意外拾到一包炒面粉，有拳头大小，舔一舔还没有变质，抓一团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我找了一个藏身处，一边品尝这天赐佳肴，一边凝视山下那片约四千米宽的滔滔恶水。水的对岸，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当女佣，但她老人家答应收留我，给我找工作做。我想我今晚一定能征服这片大水，尽管没有气枕，徒手横渡。我在水乡生活了八年，民兵训练参加过二万米泅渡，在水中泡了七个钟头，为此还得过一张奖状：“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人生能有几回搏？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静静地在山坑里歇息了一个白天，天还未入黑，就开始下山，我想赶在巡逻兵尚未上岗时突破防线。一下山便越过国防公路，前面是一片烂泥地，那时天已黑透。为了减少声响，我甩掉了塑料鞋。离水只有数丈之遥，我俯身向水边奔去。这时突然右边传来人的咳嗽声，接着还有一声犬吠。我心中一怔，不妙，于是全速向水边冲刺。说时迟那时快，一条“大猫”已经恶狠狠地从后边扑来，一口咬住我的肩膀，但我没有停步，“沙啦”一声上衣被撕去一大条。另一只军犬从我左方包抄过来，我左闪右避，不肯就范。折腾了好一会，浑身上下衣服差不多被撕光了，最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趴在泥塘里，泥水混着鲜血，有如万箭穿心，疼得发麻。四条巨大的军犬张牙舞爪围着我狂吠，几支枪“咔嚓、咔嚓”上了膛对着我，那些兵大哥用怪怪的北方口音吆喝着：“偷渡？干过什么坏事？”“怎么只有一个，同伙在哪里？”我一边爬起来一边喘着气作答：“没有同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兵扛起枪托，做着向我扎来的姿势，我连忙将双手举起，紧闭双眼：“解放军优待俘虏”，接着又说：“我说的是实话，若找到同伙，就马上枪毙我吧。”

偷渡失败了。当天晚上，我光着上身戴上手铐脚镣，被推到营地旁边一棵大树下，由一个民兵看守着。背和屁股被狗咬过的伤口淌着血，可恨的大蚊又来叮我，抖动身躯仍



驱赶不去，只得在沙地上滚来滚去，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们除开我的脚镣，押解我走在国防公路上。我一边瘸着前行，一边东张西望，默默记住这一带的地形。灼热的太阳晒得我的伤口快要裂开了，那民兵还算好心，让我趴在路边喝了几口沟水。

之后，我被辗转押往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最后到了广州沙河收容站，那是一个大集中营，一个大仓几百人接踵比肩打地铺睡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偷渡的知青。在那里我与阿新、道兄相遇了，大家并没有悲伤，既然豁出去了，小小失败等于激励。阿新告诉我，我下山的地方位属240国防公路，叫白石洲，又名"白骨洲"，由北方兵巡逻，对偷渡者无同情心，必要时会开枪，而且水域不止四千米，如果潮汐不对，被大水冲出零丁洋，那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如此看来，那几条大犬倒是救了我一命。

沙河是个中转站，两天后，知青们分别被解往下乡落籍的各县收容所，至少要关上一个月。被关的日子，与其说面壁思过，不如说是偷渡知青经验大交流、大串联。一些人主动过来结识我，向我打听水边的情形。在里面不会寂寞，我们用蚊香盒做象棋，用破玻璃刮胡子，劳动时沿途捡香烟屁股，回来分给大家卷烟抽。正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常常在一起讲故事，唱粤语流行曲。有首《知青较脚歌》到现在还记得，是用《望穿秋水》的曲谱配词，当时在广州非常流行：

> 窗外东风劲吹百花正吐艳，
> 田野里的知青遥望远方有何念？
> 在它乡，希望变失望，
> 就要奋起奔赴前程路。
> 较脚——求前程——做知青——尽努力——学游泳，
> 洞察世界那一边灯光撩人面，
> 红男绿女穿梭不止个个笑盈盈。
> 跌倒不妨决心再来过，
> 青山过后跨过浪头K城见！

为了"K城见"，1973年12月我们计划了另一次偷渡，那次是准备走水路，"堆点"就在我们石场附近，可惜戒备森严，落船时被追捕而作鸟兽散，连夜逃出广州。1974年又酝酿过第三次。

偷渡需要经费，父亲和哥哥长期以来周济我和妹妹（六八届海南兵团知青），已经不胜负荷，我不能动辄向家里伸手，没有很大把握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拖了两年，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回城，我凭着一张骶椎隐裂的X光照片（并

没假造)，1976年1月被批准病退回城。

既然可以逃亡回城，便不再逃亡香港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大多数有过偷渡案底的知青，都就此作罢，打算重新做人了。

知青喜欢讲故事，我也来凑趣。不是为了诉苦，毕竟是肺腑之言，毕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是否可以引申为：顺利的人生都差不多，而坎坷的人生却各有各的不同。我想我的故事也算有点特色吧。

没有磨难，不配真正生活过；没有痛苦，就没有真正的人生！



施明，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65年广州市28中高中毕业，当年9月下乡到珠江农场务农。1976年病退回城在街道当待业青年，做了一年多的搬运散工。1978年进街道工厂当工人。1982年至1984年为工业公司工会主席。1984年9月随亲属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在餐馆当厨师数年。1997年起进入报馆工作，现在《南加州侨报》供职。





冬夜的山路

邹克纯

知青生活已非常遥远了，但有时又觉得很近很近。回忆大巴山的岁月，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仿佛看得见崇山峻岭间自己踽踽独行的身影。

那是1970年1月，我才21岁。

我是跟父亲赌气返回农村的。父亲看不惯我在城里游手好闲。他不时沉着脸教训我："五亿农民都能活下来，你就活不下来？"

说我"游手好闲"，其实也挺冤。我每次回城都在千方百计搜罗各种书籍阅读，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当然，我读的书中间有许多是当时的闲书、禁书。父亲尤其反感我读欧洲人文主义的作品，他认为那些书都有毒，会导致我产生离经叛道的危险思想。

现在想来，当年父亲撵我回乡的动机其实很复杂。父亲本是个言必称孔孟的旧式读书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十分奇妙地将忠君报国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糅合为一体。尽管红卫兵造反已弄得他死去活来，但他还是虔诚地拥戴党的一切政策，包括上山下乡运动。这里面不排除父亲对当时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他常常告诫我们兄弟姊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只有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的政策，才不会下意识地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招致杀身之祸。"当然，父亲讨厌我呆在家里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每月就55元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我和妹妹邹弘两个知青以及80高龄婆婆的生活开支。

那年襄渝铁路还没通车。我们从渝返乡都得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途经邻水、大竹、达县，直至万源县的罗文坝下车，然后翻山越岭返回海拔1800米的草坝公社。

草坝知青到罗文坝一般都要住上一夜，第二天起个大早动身，好在天黑时赶回生产队。我那天因为一心急着回队，刚下公共汽车，不顾颠簸劳顿，就匆匆踏上了回草坝的山

路。那时已经快到中午了。

从罗文坝到草坝的路很难走，时而攀登陡峭的山路，时而在高低不平且单调的盘山公路上行走。年轻时我十分干瘦，体力很弱，那样急迫地登山让我很难受，虽然是在冬天，但不多久我便浑身大汗淋漓了。我脱光了衣服，只余下一条内裤。

孤独的行走越发容易触动伤心事，我忽然记起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而这个日子恐怕只有我自己还记得。我忽然非常眷恋生产队里那间小木屋，尽管那里面只有不够我吃半年的粮食，而且到处是臭虫虱子，但在这世上，那，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家”。

天色终于令人担忧地黑下来了，四围的群山渐渐失去了层次，黑压压地挤压过来，使我发慌。我筋疲力尽地爬上陡峭的亮垭子，再也不想挪动脚步，一屁股瘫坐在公路上，而回“家”的路才走了一半多一点。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躺倒睡着了。醒来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十指冰凉。一阵寒意袭来，我急忙穿上了衣服。

黑沉沉的天地间仿佛只余下我一个人，四围出奇的寂静，只有北风掠过大片的山林，时而像在怒吼，时而像在呜咽。我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迷惘，就在这样奇怪的情况下，我度过了自己 21 岁的生日。无可名状的惆怅浸透了我的思绪，我开始慢慢地想着很多事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让“造反派”的知青们疏远了我，而“保皇派”的知青对我也心存戒备；回到生产队也只有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劳累不堪、枯燥乏味的“修理地球”的劳作；没有五彩绚丽的生活，没有热烈追求的事业，没有爱情，也没有家。莱蒙托夫的一段诗句不由自主地浮上了我的脑海：

> 它们像干瘪的果子，
> 挂在繁茂的枝叶间，
> 看起来难看，吃起来也无味。
> 正当成熟的季节，
> 它们却要凋零了！

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只是茫然地望着那条微微发白的公路延伸向茫茫的黑暗之中。在寒冷、疲惫与饥饿的夹攻下，我非常盼望奇迹般地出现一辆车能捎带我一程。但我也清楚，在这条简陋的山区公路上，经常只有一些拉煤和运猪的货车，就是白天往来的车也不多，夜行车就更少了。

可世事常常就出人意料，奇迹还真的出现了。我忽然发觉，在险峻的亮垭子崖下那无边的夜色中，远远地有一点移动的灯火。我目不转睛地关注了一阵，最后判定那是一

辆夜行车，心中不由涌起一阵喜悦。

过了好久好久，盘旋的车灯终于上了山垭，向我迎面飞过来。两道雪亮清冷的光柱射得我眼睛发花，但我心里却觉得那简直就是两堆熊熊的篝火。老远我就拼命挥动着双手，大声呼喊着："搭车！搭车！"

但是，汽车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大油门，从我面前飞驰而过，飞扬的尘土扑打在我的脸上。霎时，就像一桶冷水浇下，我感到从头凉到脚。

就在我失望的目光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事：汽车居然停了下来，司机推开车门，慢慢地走近我。我现在已不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司机的模样，只记得他是一个中年人。陌生的司机审视了我一下，简单地询问了我赶夜路的情况，就让我上了车。

到草坝的那一段路上，司机基本上没有再说什么话，沉默寡言，表情似乎很漠然。然而，听着车窗外呼啸的北风，我却感到狭窄的驾驶室内无比温暖。

人生会遇到许多大事也会遇到许多小事，有一些大事让你终生难忘，而有一些小事也同样会令你刻骨铭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时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那条崎岖的山路、那位陌生的司机、我孤寂的 21 岁生日，以及那一点似乎微不足道的人世常情。然而，恰恰就是许多那样微不足道的人世常情，伴随我度过了那段蹉跎的青春岁月；它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以善意的目光面对人生太多的无奈，诚实地走自己的人生路。

作者简介

邹克纯，男，散文作家。1965 年重庆四十二中学初中毕业，9 月下乡到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星火茶场，"文革"后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教师、技校校长。发表过数十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重庆分会理事，现任重庆电视台编导。

弄巧成拙迁户口

黄鹤生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这是一个造反派的"吉日"。安顺县委门口，全是满插红旗和标语的宣传车，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响彻云天。号称十万大军的造反派战士拥进大院，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并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挺进县委、县政府，夺取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我们蔡官区白坟公社知青造反兵团，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决定对安顺县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知青办"）进行夺权。

在串联了其他知青点的造反战斗队并得到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支持后，安顺六四届第一批下到宁谷公社的知青代表刘玉明，六五届下到旧州公社苏吕堡大队的知青代表安华荣，小二毛、胡格和我们六四届第二批下到白坟公社的四十多个造反知青，在县委门口汇集后，喊着口号，团团围住"知青办"。我把大红纸写的夺权公告往办公室门上一贴，和刘玉明、安华荣带头站到龙主任办公桌前，向他严肃地宣布："'知青办'长期以来，忠实执行旧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们下乡知青革命造反派，代表宁谷公社的25名知青，白坟公社的49名知青，旧州公社的53名知青，向旧'知青办'夺权！勒令你立即交出一切权力！"遭到意外冲击的龙主任一脸惊慌，满头是汗地说："没有县委的指示，我不能交权！"安华荣的大嗓子不容他考虑地说："县委已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了！你还要顽固抵抗吗？不交权，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面对众多情绪激昂、气势咄咄逼人的造反知青，龙主任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公章、文件柜和门锁钥匙。一个小时的快速行动，我们打了个小小的胜利夺权战。

夺权后咋办？以白坟公社造反兵团为主，召开了有各知青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会

上,反响最大斗争最坚决的白坟公社女知青王娅玲一马当先说:“我们那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最深,许多同学被打成牛鬼蛇神游乡示众,挨批挨斗,尤其是李浩然、谢光前二人,仅仅是说了些牢骚话就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关押。想起当初满腔热情奔赴农村,最后落得灰溜溜夹起尾巴做人的下场,白坟那地方太叫人伤心寒意了,我们死都不回去!”

被触及痛处的旧州公社知青安华荣接过话茬说:“一提起当初,许多同学都后悔。原先以为因成分不好、家庭问题而未读上大学和高中后,响应号召下农村,图个表现才有前途,谁知道一个个的运动还是揪住家庭关系不放。这里没有出路,干脆出外去新疆闯一闯!”宁谷公社的刘玉明似乎要老成点地说:“闯不好还得要回来,我看是就地想办法的好!”王娅玲一下子站起来道:“如今我们造反知青掌权了,还怕哪样?把户口办回来!”“对!”我也趁此说出大家的心里话:“下乡几年来,我们起早摸黑顶风冒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老实实干活,一年到头的爬坡上坎,肩挑背磨,犁田掌耙,打场收割,可年终结算一个工才1角7分钱,工分少的还要倒补口粮款!尤其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狗崽子’,讲话要注意,做事须谨慎,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犹如戴上冰凉的精神枷锁,再不离开那地方,今后日子怎么过?先把户口办回来再说!”

最后安华荣又说:“我也同意把户口办回来,你们白坟的先动手搞,我们旧州和宁谷的回去和大家商量统一后,接着就办。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保密不许讲出去,二是也不告诉家中父母。大家想想,下乡几年间,我们的日子多难过,他们心里也跟着多难过。哪家父母不在盼望我们回来,万一事情办不好,他们已操够的心,还不更担惊受怕吗?”知青战友们纷纷赞同。

散会后,我们白坟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又专门留下来讨论办户口的事,当即决定由搞宣传和联络的黄鹤生、王娅玲、邓天顺、廖国昆、王韵霖五个委员负责去研究如何办,并要求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出问题。

我们五人小组初涉“官场”,深知此事的分量,不敢贸然就去,仔细策划后,决定以重新安置为名去办户口,为把握起见,找我们公社干部不认识的华严区宁谷公社知青刘玉明来扮成“知青办”干部下公社去办。因在几次的批斗会上显现出他老练稳沉,做事干脆利落,又能学说一口北方话,很像干部模样。

第二天,找他来商量,一听说是知青的如此大事,他便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我们立即给他借来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和一双好皮鞋,像模像样地装扮成一个知青办干事模样,并且由他想好同白坟公社领导讲话的“台词”,我们配合其进行。接着按计划专门排练了半天,战友们看后觉得语言表情都不错,没有破绽,才放心地让我们去完成这个关系大家命运的大胆而冒风险的任务。接着,我找出办公室的函头纸,编写了一份给白坟公

社关于对下乡知青转点重新安置的公函，主要内容是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对白坟49名知青转点重新安置，望支持并给予办理。最后盖上“知青办”的红色大印。

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赶到白坟公社。在五个知青代表陪同下，“刘干事”四平八稳领头走进公社书记办公室。习惯了被批被斗的朱书记赶忙站起来让座迎候，我们有些紧张但还是沉住气把“知青办”的“刘干事”介绍给书记。“刘干事”将公文包放桌上，主动伸出右手一个握姿状笑盈盈地说：“书记你好，辛苦啦！”喜得书记急忙伸手相握：“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辛苦！”寒暄后落座，“刘干事”给书记送上公函，然后不快不慢的一句句北方话，把函件内容及来意简明扼要地叙述清楚，说完抽起香烟等待书记的应答。

真是“官性”相通，衣妆照人。正宗的河南籍书记和操一口北方话的“刘干事”竟然如此容易地语音融洽，事情很顺利。书记不假思索地说：“‘知青办’要重新安置这些知青，我们支持，公社照办！”边说边在函件上签字同意办理。我们紧张而担忧的心情一下子兴奋到极点，跟着“刘干事”连声感谢书记对知青安置工作的大力支持，在握手道别后，去找秘书盖公章办迁移证。

公社秘书谢××，三十来岁，农校毕业生，公社唯一的知识分子。由于我们进城造反不归影响了公社林场的种植任务，他一直对我们很有意见。见今天又来办户口，顿生疑忌，狡黠的眼睛把函件看了两遍，才勉强地给盖上公社公章后领我们去办了迁移证。

已是四点多钟了，我们赶到离公社不远的轿子山煤矿地磅房，等搭乘煤车回安顺。忽然我们大队抽到公社食堂做饭的林妈的儿子跑来告诉我们：“我妈送开水去会议室听见公社领导开会讲，要追回你们来办的户口迁移证，你们快跑吧！”

犹如一声惊雷临空炸响，我们一下子呆住了！还是“刘干事”临危不惧，望着地磅房前“Y”字形的叉路口问我：“哪条路走安顺近？”我说：“东面经蔡官公社去安顺三十多里，南面过跳灯场公社到安顺也是三十多里！”他又问：“除了运煤车还有其他车吗？”“没有汽车了，两条路上都是煤车少，马车多，我们进城多是走路。”他自言自语道：“只有看天意了！”然后拿出迁移证分散给大家，说：“一人带几张藏在鞋底里，分头跑吧，只要到了安顺城就不怕啦！”于是我们人分两路，向安顺方向奔跑而去。

原来是公社谢秘书的“点水”。他总觉得此事蹊跷，就向朱书记报告，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会上秘书自鸣得意地分析说：“他们来办户口迁移证，我有三个疑点，一是那个刘干事，我去过几次‘知青办’未见过此人。二是这么重要的调动安置知青行为，县里应以政府文件行文下达，咋会是一纸公函？三是这个公函函件无编发字号。”朱书记说查实这问题不难，给县里挂个电话就清楚了。于是电话打到县“知青办”，谁知知青们运气就这么倒霉，竟是龙主任来收拾东西时接听了电话，他说自己已被夺权了，是

那些知青们搞的，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我们的事情完全露馅。

情况核实后，书记着急了，又是谢秘书乘机大出主意："我已打电话问了地磅房，他们说那些知青没等到车，分两头跑了，才半个多小时，赶紧派民兵班跑步去追回来！"书记点头同意，但很诧异怎么是分两头走呢？秘书肯定地说："他们是心虚分头走，上头走蔡官，下头走跳灯场，这有何难，我们也兵分两路追！"

公社武装民兵班接受追夺任务后，正副班长各带一半人，朝着南向着东往两条路追去。

我们由地磅房分手后，刘玉明带着王娅玲、王韵霖往东向蔡官跑，我带着邓天顺、廖国昆朝南向跳灯场跑。

三月的天，寒意扑打在脸上生冷刺痛，半明半阴的天边低垂下灰色雾幕，加重了我们沉闷的心情。跑着跑着，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一颗颗一串串继而汇成汗水流进前胸，淌进后背，衬衣湿了，毛衣润了，心里像小鼓在一阵阵敲打，咚咚咚！又像兔儿钻进去在使劲蹬腿，扑腾！扑腾！这失魂落魄的奔逃是生平第一次。见两个知弟没有跟上来，我放缓脚步边走边等他们。近黄昏了，已没有煤车，只见三三两两的马车在过，那负重的老马蹒跚地拖着腿，沉闷的马蹄声敲击着我们脆弱的心灵。

跑到袁家屯寨子，只见原本冷清的寨子正热闹起来，放牛娃尖声尖气地吆喝着牛群，老大爷赶着慢摇慢摆的鸭子步随其后，收工的人们扛着柴火，背着猪草，抱着娃儿，拎着野菜跟进寨头。一时间，茅草房、石板屋、土墙里的上空升起一缕缕青烟。我们跑进人家户要些水喝后，不敢停顿，相互鼓鼓劲又小跑起来。我估算已跑得十多里路了，还有二十来里，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脱离险境了。

不停地紧跟慢跑，迁移证在鞋里梗着脚底，脚痛起来，脚底板火烧火燎的，像针刺刀割，看着两知弟咬牙忍痛一脸汗水的可怜样，我心疼地喊停下歇歇气。

歇下气来，方才看清两边田野里一片片金黄。啊，正是阳春三月，满田满坝的油菜花，昂头吐蕊开放，山风吹来，扑鼻的香，田边地角的蚕豆花紫色白色相间，迎风左摇右摆；大块大块的麦地里，粗壮的麦穗挺直向上。唉！多美的春天，不由令人想起三年前我们上山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光荣无比，而今，尝尽各种苦难的我们，却在奔逃之路上冷寂无助，悄然无声！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嘲讽吗？还是命运给我们的折磨？刚想到此，仅仅几分钟时间，只见路后边有七八个人朝我们方向跑来，我惊呼一声"追来了！"三人便一跃而起抬脚就跑，这下可是难逃了！我心乱如麻，头脑混沌，一下想到神话里的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子又想到了一首歌里"追兵来了，莫奈何！娘啊，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突然，"站住，跑不了啦！"的阵阵呐喊声把我震住，双腿一软，瘫倒在路坎边。

两军相逢勇者胜。已筋疲力尽且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我们三个文弱书生，在训练有素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面前，只得“束手就擒”，毫无办法被他们带回公社大院。

真是放干河底捞鱼——一网打尽。当我们三个被喊进公社会议室问话时，知青办干事刘玉明和两个知妹已站在那里。唉！他们也没有跑脱。彼此看着疲惫不堪的一副俘虏样，心里却十分悲观，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冷水浇灭了！我们眼里都在喷着怒火，现在的形势是造反派当家，大家根本不把公社和背枪的民兵放在眼里，气的是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好事。

谢秘书看去很得意，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已查明，你们夺权办户口是非法的，重新安置是借口，快交出迁移证，放你们走！”

“什么非法？法在哪里？夺了权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了，我们说的不算，要你们小当权派说的算？我们办户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你这是破坏革命！”刘玉明可能是被谢秘书的话激怒了，他提高声音，几乎是吼出了这些话。

我也跟着来了劲：“你们用武装民兵对待知青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快放我们走！”

王娅玲干脆带着其余几个知青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见这形势，谢秘书的语气软了很多，解释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朱书记到区里去了，希望大家别为难我们了，把迁移证交出来，以后正式下个文件来我们照办。”

说完后，僵持了一会，见我们仍无交出的意思，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不客气了。”说完，示意民兵们搜身。乡下的民兵们，根本不怕什么造反派，也不理睬什么革命大好形势，他们唯命是从于自己的上级。

我们一再辩解不听，齐声抗议无用，想要反抗没法，也不能和十多个带着枪的强壮汉子硬拼，只得任凭他们从鞋底搜去那装热不多时的宝贝户口迁移证才算罢休。就这样，我县知青夺权办户口的事，以失败告终。

历史开了太大的玩笑。十年浩劫中，我们这群被愚弄得几乎毁了一生的造反知青，经过深深反思和磨炼，才在知青返城大潮中，通过招工、参军、读书、教书转正等形式回到离别多年的安顺，才算“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简介

黄鹤生，男，贵州省安顺市人，贵州省建筑四公司退休职工。1964 年安顺地区二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安顺县白坟公社插队劳动。1970 年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2 年抽到贵州省机械化土石方公司工作（后改为省建筑四公司），曾担任省建筑四公司四处党支部书记。

湘南往事

张健夫

公元1964年，深秋。一列一列的专列，一艘一艘的专轮穿梭于铁道、港口，风驰电掣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这些现代交通工具载着数以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长沙，不分昼夜地驶向广种薄收的湖区，驶向贫瘠荒芜的山区……这是一个"政治卫星"频频迭曝的神奇岁月，这是一个创造"英雄史诗"的伟大时代。

在长沙市东风路的尽头，有一道狭窄而阴暗的小巷。巷堂至多五十米不到，最多三四步宽，铺着碎裂而不规整的石子。巷子的两边堆聚着一些称之为"房子"的构筑物。屋顶大多为大片瓦，因为长年无人理睬而积满了附近铁道上飘来的灰垢，经常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湿臭味。那时的人们没兴趣散步，来往的多是此地的居民，从那衣着肮脏的制服上，从多油垢的脸上那充满疲惫的神色可以判定，这些来去匆匆的男人大多是附近铁路上的工人。这里叫铁路新村。我的外婆据说最合乎那种年代阶级定性的标准，作为"逃亡地主"被赶出了单位，即便她是"辛亥"先贤杨毓麟唯一的女儿。在一个亲戚的安排下她住到了这相对偏僻相对安全的铁路新村。1964年上半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我们全家都迁到了这里。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们三姐弟都属于被城市"清空"的对象。三姐弟都下去了，多病的老外婆怎么办？在母亲的哀求下，上面终于回复了一句话："可暂留一人。"于是母亲召集大家讨论一个艰难的话题：谁去农村？入夜之后，在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下，阴暗而狭窄的陋屋更显得沉闷，灯泡闪闪烁烁地颤动着，似乎一瞬间就要熄灭似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凄惨的意味，母亲那久久沉吟不语的神态，几乎就像要爆发一场全家生离死别的大哭。她的儿女们都没一个说话，只是不安地注视着母亲。就这样，在母亲和外婆的叹息声中左右为难地商议了一个通宵。正是这个

夜晚的决定，我和弟弟纵身投入了汹涌的上山下乡运动洪流。

人生有时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吐着白沫，滚着浪花，鲁莽地向前冲去。也许它会流到平坦的河滩，也许会冲到两壁陡峭的断崖。此刻，我别无选择地进入了我人生的断崖。

当列车沉重地喘着白雾，载着我们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在睡眼中看看车窗外，依然是夜幕重重。天还没有亮。下车的五百多男女青年在带队干部老傅、小徐老师（他们是区政府从各级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的指挥下，就近找了个宽敞一点的坪就地坐下来休息。在这里要坐等两个多钟头到天明，然后再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越过双牌大山，才能抵达我们向往的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西瓜芝麻，树上柚子打死人"的地方。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湘南地区的江永县。也许是我们大多年纪小，充满着青春的激情特别容易兴奋，一路上又是飙歌又是表演节目，几乎没有人打瞌睡。年龄最小的俞和平叽里哇啦地讲了一夜的话，到登上汽车的时候，他的喉咙都嘶哑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梦的年龄，那地方是那样的令人产生美的遐思梦想，令人恨不得足登风火轮立即飞到那个极乐仙境去，没人想到这会是一条不归之路。

江永县坐落于湘南边陲，五岭山下，当地俗称骑田岭。五岭山系，余脉纵横，与广西十万大山相接，自南逶迤而来，突地耸立在潇水之畔。江永四面环山，投入峰峦怀抱。相对而言，这里的季节是冬短夏长，风调雨顺时，特别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里生长的一种"六月白"的稻谷，味美清香，是当地山民唯一骄傲的资本，据说在皇权时代是当地向皇帝老子进贡的唯一的贡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常青的松柏，翠绿的古樟，挺拔的竹枝，它们像一把把张开的绿伞，顺着山势，攀坡过峡，如同绿色的大海涌向远方。山上的草木，经秋霜染过，有的叶子枯黄，万绿丛中，红枫点染，不失为一幅气势雄伟、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的油画。据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在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一分支转移到了这里，准备翻过大山，借道广西北上抗日。关于红军的故事，成了这里山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仿佛是一夜之间，近七千城市知青被抛散在这个不足十六万人口县份的各个角落。湖南的"北大荒知青兵团"来了！

从1964年10月进入江永务农到1971年早春二月"转点"浏阳农村，我经历了整整七年的湘南农村生活，年复一年的雨打风吹将我从羸弱的少年磨炼成骨骼粗壮的青年；永无休止的艰辛劳动又让我的精神从茫然陷入到对人生的绝望。即便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生活中那么多酸甜苦辣，但江永的那人那山那水依然清晰地在自己的眼前晃动，我的人生之旅将始终难以逃脱这段青春时期的记忆。

周家帮村

我下放的地方叫周家帮村。

周家帮村，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写意画：小桥流水，一条清澈见底的浅涧穿村而过，浅涧两岸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岸边；开阔处，青砖黑瓦、古朴幽深的清式建筑拔地而起。百多年前从广西洪杨起事时避乱到此地的几对周姓移民夫妻的后代，在这里繁衍生子休生养息。很多年来，这里的山民苗汉杂居，相安无事。围着山庄，巨大的青石叠起了一道高大而坚固的石墙，显示了这里民风的强悍。

知青小组五男七女（分属六、七两个生产队）"驻节"在一座据说是曾为当地苗王所有的二层木制楼房里，山民称之为苗王楼。这座百年老屋，整个布局呈四平八稳的国字形，入院即可见近千平方米的庭院，楼上楼下房间共设二十余间，分别起着堂卧厨厕的作用。虽然已是日见破败，但映入眼帘的鱼池假山，雕凿精细的走廊，楠木铺就的楼面，无不显露出当年主人的尊贵。

进村的第一天，村里支书便告诉我们，政府会按每个知青50斤谷配给，自己种菜。配给时间约为一年。一年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无偿的"皇粮"了，生产队分多少粮吃多少粮。当地虽然拥有无穷无尽的山林，但当时并无"开发"一说，山上的树木除按申报批给山民们自用外大多用来作柴火烧了。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只有旱地和不多的一点水田。

山清水秀啊，散发的贫穷却令人窒息。

记得1965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年尾分红是，每个劳动日（即10分工，我的劳力评分是8分）1角2分，分谷不到一斤。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男知青不缺一天地干一年，非但没有进项，反而还要出钱才能买回分配给自己的口粮。那年我的母亲寄给我20元钱，才得以将自己的口粮领了回来。

刚开始给家里写信，总是挑好的写，免得母亲担忧，到最后自己饿得也没了兴趣写信了，一次给家里写信只写了两个字：我饿！

如果要我来解释何为"乌托邦"式的生活？我就会说，下到周家帮的知青前两年的生活就是"乌托邦"。在知青群落里，无论劳力的强弱，无论男女性别的差异，只有"公平"二字，大家吃大户。谁的家里寄来了钱物，其所有权自然是"一切权利归农会"，于是，那点可怜的钱或吃的东西便成了知青们的"牙祭"。很多年过去以后，母亲听说这类"牙祭"的故事，总是泪眼涟涟唏嘘不已。

当太阳从山脊露出脸来，我们已经在田间做完了早工；当黑幕早将夕阳吞没，我们才收拾好农具借着水田反射的白光疲惫地回到知青组。我们标准地执行着古老农家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间作息表。年轻人的心总是容易遗忘苦恼的。回到自己的住地，这些青年男女们仿佛又像换了个人，整个苗王楼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抬起来。小提琴手小仇急不可待地将那优美的琴声奏起，一曲激越绵长的《命运》会让大家热血沸腾，精

神振奋；最搞笑的要数冯大汉，总爱来一段粗鄙的荤段子，令几个女生红着脸跑开。往往在晚上十点多，我便沉静下来，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寄托到笔走龙蛇的书画中。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有时仍然会想起城里的书法老师对自己的殷殷嘱咐。

有人讲：人生有时又像一头马，一头骠悍野性的马，每个骑手都想驯服它。凭着自己的年轻，我也在幻想着驯服这匹"马"。

大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下到深山里面的一些知青，有的无师自通地学做起了木工。赶墟时，只见他们男男女女知青肩扛手提，从山里弄出来各色家用木制品，有饭桌、箱柜，甚至还有淘盆、水桶。反正木材不要钱，一通烂便宜的销售，居然也能够弄几个油盐钱。

我特别佩服他们其中一位，号称"木匠王"的廖哥。此人个性倔犟，狂傲不桀，脑子却特别聪明，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零件、几何图形什么的。他做出来的箱柜严丝合缝如同一块整木挖出，平整光洁如同一件精巧的工艺品，令人观之钦佩不已！

我也受到了启发。我的自学木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学的木工技术在一定时期还给知青小食堂解决了部分油盐菜蔬钱，为此，我不能不感谢艰难岁月对我的这种意外的馈赠。

征战"鬼地"

下乡前，我们在知青学习班就被告之下乡后的几项任务：一、访贫问苦，改造世界观；牢记血泪仇，始知今日甜。二、充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战天斗地，敢教日月换新天，努力改变农村贫穷面目。下乡后，每天都要透彻地学习和领会上述的内容。大家都是不到 20 岁的小青年，不免血气方刚心潮澎湃，深感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不容有失，否则有负革命领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大家摩拳擦掌四处打探，看有否凭我们的知识可以改造的地方。很快，我们发现这里的情况是地少人多，特别是水田少。这可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雄心勃勃地找到大队周书记，提出要改造靠山根阴河那片沼泽地，要让这片废地变成良田！周书记听后，却皱紧了眉头，他不同意我们的"革命行动"。他说："那块地祖祖辈辈都种不得谷，你们去了也是空的哩。再说还是块鬼地，人去不得啊！"大家的积极性正空前高涨，谁也不听他的，一个劲地要去"捉鬼"！周支书自然抵挡不住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答应派我下乡时拜的师傅六苟和一位回乡知青昌武带着我们去征战"鬼地"。

已经是三九天了，冰凌子长长地挂在人家的屋檐下，人哈一口气只见一团白雾。我们大队男女知青 36 个人赤着脚，裤腿卷到了膝盖，背着长齿耙和锄头，在六苟的带领下，开始向"鬼地"进军。

改造“鬼地”谈何容易！上千亩的沼泽地沿山根绵延十几里，上面长着芦花、刺木，一层厚厚的草科植物盘根错节地“盘踞”在稀泥上……有的地方根本不能站人，人如陷进去，真有“灭顶”之灾。据六苟说，他有个侄子到此处养牛，先是牛陷入泥内，侄子赶去救助也一同陷入。待六苟几个人带着梯子绳索赶来时，沼泽地已是人牛不见踪影，沼泽归于一片静寂。从此当地的山民再也不敢近前。这里成了一片神秘的“鬼地”。

几经研究，我们改造“鬼地”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选择好的地段，将泥面上的各种植物砍伐清除并开出水渠；其次是“换土”并加撒大量的石灰以增强其土垠的板结性和可耕性。

当我的双脚踩进那冰冷得刺人骨髓的稀泥中，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沼泽地刺骨的寒冷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在浅浅的泥层下排满了一种坚硬而锋利的“铁梨刺”！这种东西在下面连成一片，时续时断，有的刺甚至是垂直生长的，被它刺中，可一穿而至脚面。我们的垦荒大战仅进行半天即有两名女知青因脚被刺伤而血流不止，但她们稍加包扎又加入了战斗。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看到左边一片沼泽，既平整又少芦草，便兴奋地邀冯大汉赶过去，挥动长齿耙，又挑些田泥来掺和在面上。我俩干到下午，已经整理了五分多田。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脚掌一阵撕裂般地疼痛。不好，我踩到“铁梨刺”了！说话间，我跌坐在泥里，脚根本拔不出。大汉见状，急忙在泥里挪动，赶到我身边。昌武也赶忙用两只手搂着我的身体。扒开泥一看，一根硕大的“铁梨刺”已如一根钢钉将我的脚钉死。我的右脚已被贯通，鲜血不断地从脚面的洞口涌出，我的眼泪也痛出来了。“小张，别急，只有慢慢拔。”大汉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弯刀将“钢钉”周围的根蔓斩断，小心地抽出我脚下的“钢钉”。因为天冷人又未动，脚流的血与沼地的水混在一起结成了一层红色的冰块……

这块“鬼地”经过我们十多个人一个多月的战斗，终于被彻底征服了（除实在无法开发的外）。从外形看，百亩垅垅相接，错落有致，让人想象这里稻花飘香的丰收景象。

然而，春耕时节我们牵牛荷锄准备在鬼地耘田时，眼前的一切却让我们傻了眼：原本像模像样的“良田”在汹涌的春洪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依然回复到我们改造前的模样。原来鬼地实际上就是阴河泄洪的河床，秋冬季节无雨似乎像一大块闲置的土地，春天来了，山洪暴发，这里就成泽国。一腔热血，顷刻冰消，劳神费力，徒添笑料。那一天，带着沮丧的心情，大家荷锄打道回府。

庚　哥

庚哥本名杨庚。下乡后，无论男女知青，无论村里老少，均呼其为庚哥。

苗王楼知青组有两个人的特点大相径庭：一个是冯大汉，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但说话结巴，不善言辞；另一个则是庚哥，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但口若悬河，上通天文，下

知地理。

常言道没有两片绿叶是相同的，阳世上的人性格也千差百异。庚哥算是“百异”中的一个“异”人。他总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惊人之举。庚哥好读书。下乡后，我们这些城里哥哥喜欢串门，常三五成群流窜到其他大队知青组去玩，或是有事无事到“闹子”上去闲逛。庚哥却蜗居一室手捧一书，两耳不闻分外事，在书中寻找他的“颜如玉”，其人行踪俨如一未出山的高人。与知青伙伴闲聊时，他嘴里不时嘣出几句什么“费尔巴哈”、“美学逻辑”之类的字眼，令听者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加之，此君生一张“阴阳脸”：右脸寸“草”不生，左脸却络腮虬髯丛生。据说，古往今来的高人脸相均呈谲诡怪异，庚哥对自己的长相不独不介意，反而自以为荣，自称自己为“半边美人”！以他1962年高中毕业的不凡学历，自然使得我等仅有初中学历、小学学历的小后生仰望他如泰山北斗。大凡平日里发生诸多不懂之事即屁颠屁颠去找这位庚哥解惑，待我们如小学生似的围他坐定后，他也不推诿，从事情的“来龙”谈到“去脉”，从事情的背景谈到解决的条件。最后，如此这般，“须按我庚哥说的去做……”云云。大家皆大欢喜，心里极是佩服庚哥的分析。

此君还有另一大特点：好逸恶劳，也就是说，他极端鄙薄体力劳动，而崇尚脑力劳动。用他的话说：莽者，一人敌；智者，万人敌也。从小就显得愚钝的我，不懂他的那套“之乎者也”，总疑心他是找借口偷懒。

1966年春耕前生产队出牛栏粪，这既是后生子挑担负重“炫耀”自己本事的时刻，又是一个捞工分的好机会。那时我的肩膀虽然稚嫩，但每次挑肥总咬着牙将自己的两个筐子堆得满满的，希冀在出得门楼的那一刹那博得大家一声“好后生”的赞扬。春耕前的一次出肥，我们挑着牛肥从门楼口鱼贯而出，将盛满牛栏肥的竹筐依次摆在门楼上，让生产队会计称重计工。会计依次为大家过秤，我的担子一称有184斤，黑莉的担子竟也重达140斤。贫下中农们纷纷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嗨，冯大汉挑着一担堆积如两座小山般的牛栏肥出来了。一称，顿时举座皆惊：呵，360斤！我暗暗地感到了惊讶，冯大汉真是条汉子！

庚哥出门楼了。只见他挑着两团小小的牛粪，脚步扭着麻花，颈项内缩，双肩高耸，看去像是三个脑袋。他“扭”到门楼上一称，又是一个举座皆惊：他的担子只有大汉的零头：60斤！

黑莉当即打趣庚哥：“你不如把中饭让二碗给大汉，让他连你带肥送到田里去算了！”。

众人一阵哄笑。

那时候国家已停止对我们每月50斤“皇粮”的供给了。作为知青组长的我，看到庚哥既不愿出工，劳力又弱，不免心生忧虑。担心他养自己不活，也担心他拖累大家。

抛撒牛粪回来的路上，我期期艾艾地说：“庚哥，你还是要多锻炼，多出工啊！”特别

还将大汉作为“范例”来启发他的觉悟，“你看，大汉养自己保证没问题……”话未讲完，庚哥打断我的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急什么？”

“……”我无言以对。

临走进门楼口，他突然上不着天下不接地地讲了一句：“你读过历史吧，毛主席指挥那么多战役，你几时看见他带过枪？诸葛亮只有一把鹅毛扇，哪个不是他手下败将？”

我愕然，只好摇摇头跟着他进了门楼。

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庚哥成为了大家照顾的对象，而他也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划入了女知青这一弱势群体的范围。其实，与黑莉比起来，庚哥则更应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

有一次知青和社员去县里送萝卜（这种又大又甜的萝卜也是本地的一种特产）。三十多里山路，回家半途天就黑了。大家都挑着从县里采购回来的一应物什，急急地行走在蜿蜒的山道上，而庚哥挑着空箩筐却还在大口喘着气。他实在走不动了，还是冯大汉将他背了十几里山路。当然，他也没有“亏”大家，运用自己的长处——嘴巴，就在冯大汉的背上，唾沫横飞地给我们讲了一段“十二金钱镖”，大家听得乐滋滋的。

庚哥会讲故事，但故事当不得饭。背着他，有人在我前面数落起了庚哥。伶牙俐齿的黑莉有次跟我抱怨，一是冯大汉的饭量大，抵得两个人；一是庚哥太懒，只晓得吃现成的。如此坐吃山空，还玩得下去？建议散伙，把“大锅饭”改为“小锅饭”。我自然不同意分伙，只是好言相劝。好言相劝这一招不凑效，只好用“革命道理”塞住她的嘴巴。自此以后，倒也相安无事。

1967年8月的“道县大屠杀”，让我们下放江永的知青们遭遇了充满生命凶险的日子。

在知青群落中，有思想深邃的，立马就“预警”到此风会否刮到此地，须早作撤离准备；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杀人与枪战只在电影里看过，亲身体验怕也是一种刺激，有人甚至盼望此风果真刮到这里，也好亲身体验体验那种惊险场面。他们也在作准备，不过这种“准备”却令人啼笑皆非。

又逢三、六、九赶集日，我和黑莉从闹子上采买点肥皂煤油等生活物什回来，见苗王楼大门紧闭，连连敲门却无人应答，细听之下似有人声，我在外面骂起来，又将大门拍得山响。少顷和平的头从大门缝际中露出，一副怪异的神情。

“搞什么新鲜花样！”我一边骂一边踢开门。待进到院内，却见冯大汉等几个精壮知青正如虎狼般地在捆庚哥。脚踩手紧，一条牛索子将瘦弱的庚哥捆成了一个“绣球”！庚哥在知青组年纪是最大的，劳力是最弱的。但见条条绳索勒进肉里，肩窝处还渗出点点血痕，而庚哥正龇牙咧嘴呈痛苦状却又咬紧牙关连叫“再狠点，再狠点！”

我大骇，疾步上前欲制止他们的“再狠点”。

和平却笑着拦住我，“我们和庚哥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履行合同！我们不来真的，赶集莫想吃他的肉丝面！”他接着说，“他是想体验体验一下真要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捆起时，会不会喊人家叔叔伯伯告饶，会不会丢我们知青的脸哩！”

原来他们在搞模拟“演习”。

大家赶忙给庚哥松了绑。庚哥却曲着身体躺在地下回不过神来。

我大叫：你们这是何苦！黑莉的泪珠子都笑出来了，我却苦涩得笑不出声来。

庚哥，庚哥啊，你总出“鲜味”！

庚哥“出鲜味”的模拟演习仅仅过去五天，江永县的造反派组织就开始大打出手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时传来了知青被捆被杀的消息，留在江永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知青们愈来愈嗅到了一种生命遭受威胁的气息，终日惶恐不安地呆在知青组，哪儿也不敢去。男孩子倒还好办点，那几个跑不动的女孩子还有体弱的庚哥怎么办？这是我最感到焦心的问题。有天，村里周三姑的儿子厚昌回来了，他在县里驻军开汽车，经常跑零陵冷水滩。我灵机一动：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将这几个人带出去！主意一定，人也轻松了很多。

平时就和我们关系很融洽的厚昌几乎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遗憾地告诉我他的车最多只能挤四个人。他正要在明天去零陵拉军用物资，于是说好明天一早就将车开到允山镇，要我们等着他。

事情顺利得令我喜出望外。我决定组里三个女知青黑莉、吴萍、杨丽菁外加一个庚哥加紧收拾行装，明天搭乘厚昌的车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当我将决定通知这几个人时，却意外地遭到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他们不愿丢下我们自己逃生，“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

我和大汉等人苦口婆心地开导这些人，竭力让他们明白：我们留下来的人是安全的，他们要留下来和我们“捆”在一起，反倒会很危险。临了，三位女知青流着泪水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她们千嘱万托地要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但是，庚哥却死活不愿走，瘦削的两手在我前面激烈地舞动，其偏狭和固执实属罕见，直令我们束手无策。时间的紧迫已不容我们再作其他的选择，只得无奈地留下了庚哥。我在泪眼朦胧中看着厚昌的车载着黑莉她们渐行渐远。

留下的四个人准备徒步穿越道县地域，路途中逢车爬车，还必须时刻躲避那些极端仇视知青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们的追杀。然后抵达广西泉州，爬上去长沙方向的火车，这才算我们逃亡计划成功了。庚哥留下来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很担心他瘦弱的身子能否跟上我们“逃亡”的步子。冯大汉自告奋勇，拍胸担保他一定照顾好庚哥。庚哥却一边噘着“喇叭筒”，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不定谁照顾谁哩！”

当年9月5日，我们走小路绕过县城登上了唯一与外界连接的那条公路。鉴于当时

所处环境的凶险，为了安全，我们选择白天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晚上断黑就走路。一路没有碰到一部车，四人已经步行六个小时备感疲劳，想找一处地方稍事休息。行进中，在月色下突然发现公路上横着几根圆木。正自奇怪之时，斜刺里窜出几个拿枪的汉子，其中一个瘦削的汉子兀自用把手枪指着我的头。我们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呆住了。“你们是干什么的？”一口的当地道县话，瘦汉子将枪摆了一下。我知道讲自己是知青必遭杀身之祸，正嗫嚅着不知怎么开腔。庚哥讲话了，一口纯正的广西话，“我们是广西人，到这里来投亲靠友，没有找到亲戚。现在想回广西……”瘦汉子紧盯着庚哥那张镇静坦然的脸，不置可否地沉默了一分钟后，突然问：“身上有枪吗？”我们忙不迭地摆手，“没有，没有。不信，你们搜！”他们中的一个人上来在我们身上胡乱地摸了摸，确实没有枪。只是好奇地盯着冯大汉身上背着的那个包，一摸，像是铁器。情况顿时紧张起来。他们用枪指着冯大汉，要他将包打开检查。庚哥走过来继续用广西话解释：“这是木工工具，想找点木工活干干。”说着将斧凿拿到瘦汉子眼前晃晃。几个持枪者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了。瘦汉子围着我们转了一圈后，和其中一个人咬着耳朵低语了几句，一挥手，叫我们走。

我只感觉背脊上透着被汗水湿透了的凉意。好险，多亏了庚哥小时是在广西外婆家长大的，那口纯正的广西话救了我们。

天亮了，我们在路边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我们感觉这样下去，即使是晚上走仍然很危险，晚上没有车可拦；只有白天才能拦到车，而拦了车才能很快脱离道县。我们决定宁愿冒一下险也要保证速度，尽快脱离道县这块凶险之地。

我们决定边走边等机会拦车，最好是货车。一路上，我们还真拦了几辆车，但是司机就是不停车。要么，司机远远看见我们站在路中拦车，就将汽车加大油门凶狠地朝我们撞来，让我们落荒而逃；要么，司机将车停了，待我们准备上车时突然启动将我们抛在后面。当时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啊，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这些司机明哲保身的“绝情”自有他的道理。我们经过几次类似的折腾后已是气急败坏筋疲力尽，对拦车也没了信心。我尤其着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的凶险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庚哥要冯大汉将那个背包给他。他将背包放在了显眼的路中央，然后将带在身边那把破油伞撑开了。我们正惊疑间，他拍着我的肩，要我们隐蔽到路边，说了句：“叫你们上车时，动作要快！”我猜不透他要干什么，但看着他那一脸的自信，一挥手就让大汉和政哥下了路基。我们依言匍匐在路边，倒要看他演的什么独角戏。

远远地来了辆大货车，显然司机看到了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似乎是拦车的。车依旧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这是老办法，拦车人没有不怕死的。看着车逼近了，我的心吊了起来，一双眼死盯着庚哥。此刻，庚哥的脚下摆着一个状若炸药包的背包，将伞撑开背对着疯狂逼近的来车，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口里还悠然地吹着“打靶归来”的口哨。

就在我紧闭着眼不敢看眼前即将发生的惨祸时，来车在距离庚哥几米远的地方突地一个急刹车！司机一双疑惧的眼睛死盯着几米远外的那个什么包，看来他不是怕撞死路上那个打伞人，引起他真正恐惧的是路中央那个疑似炸药包的东西。我们一窝蜂似的涌了上去，攀着车厢爬了上去。我们很幸运，这是辆到泉州的空车。虽然一路上司机骂骂咧咧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毕竟庚哥的阴谋得逞了，毕竟我们免了劳顿之苦，毕竟让我们当晚在泉州爬上了开往长沙的煤车。

在浓浓的黑暗中，我呼吸着被风卷起的煤屑，听着车身下面咣当咣当的车轮声，肚子里虽是饥肠辘辘，却感觉到精神上彻底松弛了下来。再见了，梦魇般的江永！

在静静的思考中突然生出一种对庚哥的感激之情，想起了他临走时说的“还不定谁照顾谁哩！”那句话，自己偷偷地抿着嘴笑了起来。

六　苟

当年下到周家帮时，每个知青都“拜”了个学农师傅，周六苟是我的师傅。当时的六苟比我大两岁，一口“扒牙”，面相凶恶，只是据说出身最好，属苦大仇深的雇农一类。我当时虽不乐意，自认倒霉，但接触一段时间后，却发现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2004年是江永知青下放40年周年纪念，当地政府及回城的老知青都有愿望在当年下放地江永建一座知青雕塑。作为土建专业人员的我自回城后第一次踏上了这块久违的土地。

到江永后的第三天赶到当年下放的周家帮村。远远地就看见了山口那株双人合抱的百年古枫，依然是那样的高耸挺拔，依然是那样的翠绿葱茏。村口一个挑柴的年轻人用一双探究的眼睛望着我，显然我的那身装束使他判断出来者应该不是本地人。

当年的六苟，年纪19，却吹得一口上好的竹笛。当年仍属少年的我直至今天仍很纳闷：无师自通的六苟，怎么就会将那支竹笛吹得出神入化？每当月上山坳，生产队记过那价值三五角钱的十个工分后，六苟就似乎忘了别人的存在，拎上条竹椅，去到村后的松竹林里，架起赤着的二郎腿，悠悠地吹起些或悲或喜的歌曲，倾诉着心下那过去的日子所给予他的种种复杂情感。

这时，我便会寻声走过去，于一旁静静地站了，望着他那骨节突兀而变了形的粗壮手指，那灵巧无比地于竹笛上滑动的指尖，时而颤动，时而滑动，莺啼玉鸣般的声音一下就在寂寞的山村里弥漫开去。他的嘴偏噘着，轻依笛杆，时而轻输兰气，如弱柳扶风，令人心旌荡漾；时而力度突兀地吐出断音，激扬刚劲，仿如千军万马，铁骑突出。他极尽着竹笛的种种表现力，奏鸣出抑扬顿挫的高山流水之雅意。

六苟其实也有师傅，那是一位南京某部队著名歌舞团落难下放的笛子演奏员，叫老朱，曾经多少教过他。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迄今为止我也没能猜出个头绪：这笛手

其实从未手把手教过他什么音律指法，而他却于一旁把他演奏的技巧烂熟铭记于心里。不几天他自家去杨头源砍来两捆挺拔的竹子，不知演练过多少次，做烂了多少枝竹，终于才制成了能吹得出歌的"笛子"。

四十多岁的老朱身体瘦弱多病，分给他一天的农活总难干完。六苟年轻，也不怕人家讲他"包庇坏分子"，即使干到入夜也要帮老朱干完农活。老朱的柴禾没了，也是六苟及时为他送来，让老朱直觉得六苟是个好后生。没有两年，老朱因病去了。这支紫竹笛就是老朱临终时送给六苟唯一的礼物。

山村来了些从长沙下放的知识青年，内中有个姓仇的知青携了把板鸭似的怪乐器，据说这东西在国外被称作维奥林(VIOLIN)，而中国则把它叫做小提琴。光是那琴弦就有四根，音域足足比六苟吹的笛子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不消说，其表现力也就多出来一片广阔天地。特别是那把有如剑似的琴弓，竟然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琴弦上自由自在地翻腾和跳跃。而不像竹笛演奏，仅凭六孔七音，似乎难以与"板鸭"一决高下。六苟却是不以为意，他虔诚而怯怯地找到小仇，惑惑地去问那"板鸭"演奏指法是否与吹笛相同，小仇敛了笑容，沉静而严肃地说出来一串长长的话语：哎呀，还看不出你这"都佬倌"（乡下人）还关心这个问题哩，问题问得好。这个山冲里，能有一个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在让我感到震惊。你晓得啵？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人，在我们偌大的长沙也难找出几个。我倒是蛮愿意对你讲，音乐和乐器，都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一种历史文化的特殊现象。中国是儒、释、道哲学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讲究的是中庸与平和。儒家主张克己复礼，释家提倡普度众生，而道家则坚持独善其身，崇尚的都是内心的自省与自制，对一切都取含而不露之态。你看，你吐气吹的那种笛子，不就是通过嘴里吹气，指闭指开而发音的么？而外国却不是这样，人家的小号、圆号和大号，都是放在嘴外去吹的，那声音就格外响亮，足以振奋起沉睡中的人们猛醒，催促起将士们奔赴战场去卫国杀敌。至于笛子和小提琴，这两者音理的区别你已是看到了，一个是简单地屈从于六孔七音的吹奏，吹出些不大复杂的，如《林中鸟》一类的乐曲。而另一个却有如斯巴达克勇士一般，驰骋呼啸于四条金属弦上，奏鸣出如《自新大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惊世骇俗的雄浑乐章。嘿，你也不要听了我这些话后，便就为自家眼下仅仅见识过笛子而感到懊丧和悲哀，也不要为一时见不到我讲的小号、圆号和大号而自暴自弃。其实，中国也有令我们全身心获得解放的一种乐器，这就是琵琶。你晓得白居易么？唐代的著名诗人，一曲伟大的《琵琶行》，道尽了对千载琵琶之表现力的无限赞美和自豪。

不啻是对牛弹琴，因为我看到六苟的眼神是懵懵的。六苟和我分手时，却对我讲了一句让我对他另眼相看的话：音乐深啊，就像大山！

我同样被小仇这段话所震惊。说实在的，有些话语，其含义至今我仍不敢说都已然

明白。而只是从那以后我就看着六苟又跟着小仇吱吱呀呀地学起了小提琴。平心而论，一段时间后，看着六苟拉着小提琴的样子，直觉得别扭难受。况且，拉出来的曲调倒有点像吹笛子似的哀怨。我暗忖：六苟还是吹你土腔土调的笛子好。

六苟终于没有将琴学下去，笛子却愈见吹得悠扬动听了。

六苟用笛声救我的故事发生在 1967 年。

肆虐如洪的“文革”浪潮涌到了僻静的山乡后，原本民风淳朴的所在，竟然武斗频发，乡村之间的械斗借机也愈演愈烈。知青均为外来人，自然难逃此祸。一段时间来，冠名为“贫下中农法院”的造反组织对知青更是如“仇人相见，格外眼红”。桃川知青王伯明无端被杀，瓦扎湾知青集体被捆被吊的消息传来，知青组的知青惶恐不已，人人自危，总怕哪天厄运降临，无端做了冤死鬼。

偏生周家帮出了个“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造反分部，偏生这为头的又是那个历来与知青有很深过节的癞苟。这癞苟，说白了就是周家帮村一个人见人嫌的二流子。好吃，谁家的鸡鸭逮到就吃；贪色，村里稍有点姿色的女人看见他无不犯怵；好来事儿，丁点的事儿被他撩拨成天大的事。他也知道知青素不愿答理他，干脆将知青看成了一伙仇敌。倘若哪位知青与哪位山民稍有一点矛盾，他即上蹿下跳从中撺掇，唯恐事情搞得不大。机会来了。有次知青养的一群鸡溜进他的菜园啄坏了他刚下的菜秧子，他竟然狂暴地用扁担将鸡打死了 11 只。拎回家不算，还以风作邪地在知青食堂门前跳起三尺高骂娘。知青冯大汉实在忍不住，出来和他论理，竟然被他砍了一扁担。嗨，大汉可不是好惹的，身高体壮，一米八的大个。上去一个“小背”，即将这厮送到了粪坑里。当他从满满一坑的粪尿里爬出来时，脸上爬满了蛆虫，让围观的山民笑了一个小死。

这仇结大了。听六苟几次讲，他要用鸟铳冲死几个长沙仔。

县里愈演愈烈的武斗使癞苟格外兴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造反分部在周家帮村的设立使他更加趾高气扬。因为他可以报仇了！他放话出去：长沙仔一个莫想跑，吊死他们！

六苟是他的本家亲，与他住在一个大屋里，总劝他莫乱搞，也时常提醒我们早作打算，别遭了他的毒手。一次六苟殷殷叮嘱了我们一席话后，复又转身附着我的耳朵低语了几句才走。

这几天心里感觉会出事，因此知青组剩下的几个男人总是和衣而睡。一连过去几天无事，人就疲惫了。第四日夜深之时，正自昏睡，突地耳畔响起一阵笛声，如凄厉鸟鸣，撕魂裂魄。蓦地惊醒过来，想起六苟临行附耳叮嘱的话，一激灵，鲤鱼打挺般坐将起来。摇醒大汉与和平，急促地将准备好了的简单行李拿了，蹑脚开门，融入了夜幕，开始了向长沙方向的亡命。

若干年后才了解到，当时癞苟已纠集了一帮人准备在凌晨动手，准备将我们弄到潇

江边用马刀砍死丢入河中。多亏了六苟的笛声及时报警，否则结局实难预料……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当年的实际情形，不禁为六苟后来悲惨的遭遇而感到锥心的伤痛和愧疚。那天晚上，六苟为我们吹笛报警后，不久即为癞苟参透。他碍于亲戚面子不便向六苟发作，反倒唆使几个外村同类寻了一个机会将六苟毒打了一顿。那次六苟当场被打断三根胸肋骨，口吐鲜血……

正是由于这老伤对六苟多年的折腾，六苟在一次偶遇风寒后便咯血不止，不到36岁即英年早逝。

……

于今，造物弄人，六苟早逝；睹景伤情，笛声渺渺。

后　记

岁月镌刻的是道道画痕，于是成为了一圈一圈人的年轮。这就是我吗？不是，不是的，这是风吹过，雨打过，雪飘过，冰凝过的人的生命。很多年以后，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知青广场，并且为纪念长沙知青曾经抛洒过青春热血的岁月而铸造了一座知青雕塑。我的一篇应征的碑文中写道：

清幽灵秀，蜿蜒北去潇江；雄峻巍峨，逶迤南来都庞。寄我辈几多少年壮志，证历史无数沧桑悲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患家忧，举国青年奔赴广阔天地；别亲桑梓，长沙知青落户江永山乡。雏鹰试翼万里，青春溢彩；古郡旌旗七千，壮志飞扬。知青携手乡亲，躬耕垄亩，修渠治水，改造山河，栉风沐雨相伴；意志淬火艰危，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獠烟历火，期盼凤凰涅槃。

冠名革命，史称迁徙，是耶非耶，说与后人谈。

惜乎蹉跎岁月，当年农友安在？青山遗恨，绿水哀伤。逝者已已，生者戚戚，悠悠缅怀，地老天荒。

斗转星移，四十光阴，迟暮回首，乡情难忘。捐资兴学，修路架桥，倾情回馈，慰我乡愁。史册当记，今届政府，慨然兴建，知青广场。知青雕塑，矗立于兹。年华已逝兮，壮心不已；铭心刻骨兮，望我故乡。

然而，知青雕塑建成了，仍然是无字碑。历史无言，我亦无言。

作者简介

张健夫，长沙市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周家帮大队。1972年回城，历尽艰辛，从事多种职业，嗣后在雨花区任技术干部，现已退休。

笑谈悲情岁月

宋晓涛

我记述的是我知青生涯中1964—1968年的这一段。尽管1968年以后我还有两年多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知青史。

我想重现一段个性化的历史。

曾有过的不幸和心酸，于平凡者，只是流逝的岁月；于庸者，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智者，是积淀的精神财富。回首悲情岁月，对于今天的过来人，我真希望是巨龙腾飞的匆匆一瞥，是笑谈风云的浅浅一杯，是对冷暖人生的领悟观照，是对逝去岁月的豁达宽容。于是，岁月回眸，悲情不再，沧桑依然……

一

让我从1964年说起。

这年深秋，我初中毕业，没能继续升学念书，于是就上山下乡当了知青。

其实，事情的背景远远不像我叙述的这样简单。

上山下乡，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而人生命运的这次分流，是特定时代铸就。

我生于南京，长于上海，一岁的时候，被全托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幼儿院。听我奶奶说，那是新中国最好的幼儿院。宋庆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宋奶奶还抱着我合过影。

我父母在上海是国立剧专剧团的演员。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爸参军解放大西南，后来就留在了重庆。几年后，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异，我和二姐晓慧随奶奶乘船抵渝，跟了爸爸。

爸爸那会儿春风得意，是西南文工团、市歌舞剧团的艺术权威——艺委会主任，我和二姐自然成了全团的宠儿。

始料不及的是，命运会在顷刻改变，前途会在霎时断送。

1959 年 7 月，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一下子成了“右派家属”。

本来，“反右运动”在 1958 年夏已经结束，他原本没事儿。1959 年 6 月他带团去北京参加全国歌剧调演，获了奖还评了全团标兵。但谁料想人缘特好的他忽然间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这年我 11 岁，我亲眼见到对我父亲“组织处分”时的张榜情形。

一天深夜醒来，身边的奶奶不见了，忽听单层木板相隔的爸爸房里传来压低的哭泣声。二姐猜测说，家里肯定出了事。

第二天清早，我拎着饭锅去市歌舞剧团食堂打早饭，路过公布栏时，见二人正将一张“……撤销副团长职务，戴上右派帽子，降薪三级处分”的白榜，换下了那张“……因导演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全国调演中获奖，被评为全团标兵”的红榜。

我当时脑海轰然一下成了空白：我爸的“标兵”怎么顷刻就换成了“右派”？“红的”怎么立马就变成了“黑的”？

这个疑问涉及的层面实在太多，当时没人能回答我。

之后，我爸被送到百里之遥的长寿湖渔场“劳教”3 年，“戴帽”洗厕所拉板车达 22 年。

事后，听说我爸是被补划的，原因是在审看剧目时他顶撞了文化局局长，说了句“不懂不要装懂！”当然，在中国的官场，公然顶撞上级领导是要吃大亏的。但我爸最大的悲剧还在于：22 年后获得平反，而在各类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纸有关对他“定性右派”的组织文件。后来平反的工作组说，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个奇冤，因为全国在 1958 年夏就已经结束划右派，当年秋天中央内部提出开始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而这“摘帽”同 1959 年十年国庆特赦战犯一起是作为当局的重要形象工程的，那么在 1959 年 7 月也就是十年大庆前还来“补划”给我爸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绝对是局长泄私愤的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意见了。由于没有组织处分文件，因此，平反落实政策也无从谈起，22 年的不白之冤（从 38 岁到 60 岁的整个人生的黄金壮年被耗掉）就不了了之。

而我呢，从早先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幼儿院被宋庆龄奶奶时时搂抱的幸福记忆中，一下子跌落到“右派分子狗崽子”的惊怵里，天堂地狱，翻覆于顷刻之间。

两年后小学毕业，我没能进入公办中学，而是被分配到官井巷民办中学。

1964 年初三的下学期，除了备考，就是为升学作准备。

准备之一，就是报考前填写履历表，其中，“直系亲属的政历”、“个人的态度”等栏，每次填写，都需要杜撰。为一个小小的报考志愿去“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最让我难受的。

我填写的所有文字内容，都是我奶奶口述的。

我奶奶从小在兵工厂捡煤炭花，15岁出嫁，没文化。让人敬佩的是，她在新中国妇女扫盲运动中，硬是靠刻苦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识字水平，创造了新中国妇女学文化的奇迹。她因此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作1952年2月号封底人物，后又因此被选作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长安兵工厂和市歌舞剧团的家属主任委员，因此练就了她的口才和文才。

我爸被打入另册，我奶奶也入了另类，她的口才和文才，仅仅体现在指导我填写履历表上。

她说，我们家现在是"右派家属"，没法抬头，但说话填表，要站在批判"右派"的立场上，用"批判"把你和你爸隔离开，因为你的前程还没有开始啊！在填写你爸解放前接触过的单位时，必得加上一个"伪"字，如：伪金陵兵工厂、伪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伪剧专校友剧团……在谈及你爸的"错误性质"时，要用"忘本"、"资产阶级思想"、"反党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在谈及组织对你爸的处分时，要说"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奶奶的话语在我的笔下慢慢变成了文字。我填着填着，忽然听不到奶奶说话了，抬头一看，只见长长的泪水在她老人家怆然的脸上流淌……

我轻轻问，真是"罪有应得"吗？

奶奶一下子抱住我的头，哭出声来。可是，三两声后，她又断然打住，惊诧的眼神四下探视，唯恐被人发现"不满的情绪"（不敢哭啊）……

她轻声抽泣说，几千年了，一人有罪，满门抄斩……

我奶奶是一个小脚的旧式妇女，一肚子封建时代的故事，她特别担心我会因我爸的"株连"而断了前程。

正是因为奶奶的思绪，我每每在履历表的填写上，总是把她的过激的批判、尖刻的断语统统纳入其中，俨然一篇向我爸声讨的檄文。

奶奶说，只有这样，才能向组织证明你与你爸划清了界限，你才可能得到组织信任，你才可能有前途。

但是，每次填写，都是一次心灵的颤栗。我不敢让我爸看见我填写的内容，老远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会慌忙藏起履历表，当他离开后我再次提笔时，我会发现我的手抖个不停——心在战栗啊！我感觉我在出卖父亲，像叛徒出卖灵魂保命那样保全自己的前程，我心虚呀！可久而久之，填写多了，形成定式，心灵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奶奶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违心的了。

可是，尽管经历了这样痛苦的心灵炼狱，1964年，我收到的依然是《不录取通知书》。

其实，我早有预感，因为早一年的1963年，我二姐就收到《不录取通知书》。

二姐晓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重庆十九中学广播站站长（广播站就她一人），那会儿学校没有唱片，一部《洪湖赤卫队》歌剧，是她每天三遍亲口清唱让师生一饱耳福，至今她母校的老师提起她，谁不是啧啧赞誉？她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她索性当月就向街道申请，到云南省最边远的个旧市“支边”去了。全校高中部就她一人远走高飞，可以想见她心灵的痛楚。

而现在，动员我上山下乡的居民代表就坐在家里等待我们的表态。

“去吧，跟你姐一样，没法子的事儿！”劳教后已回歌舞剧团扫了两年厕所的爸爸说这话时，我第一次见他在我面前揉擦湿润的眼眶，他甚至弯下腰佝偻着身子，让我猛然觉得他仿佛要给我跪下，弄得我热血冲顶，跳荡的心像要堵住嗓门了。

我心底清楚，我是“五类分子子女”——“没有继续上学的权利”，“必须上山下乡离开城市”。

这样的安排对“五类分子”家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当局正在贯彻强硬的阶级路线。

阶级？我们家以前祖祖辈辈可都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啊！

只是，一顶“右派”的帽子改变了这一切。

实在说，我下乡时没有那么多的愤愤然，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二姐在我头里也上不了学，我能不一样吗？况且，二姐走得那么远，而我只到大巴山，算幸运的。

再说，还有那么多“同类”——龚可，他爸与我爸同是市歌舞剧团的“右派”，周大同、回光时都是我的同学，一大拨人。这是“黑五类”子女的命，我认。

二

1964年9月，命运把我们33个城市青少年抛掷在大竹县张家公社的马家山上一个小院落，这里本叫陈家湾，这会儿改称“张家公社马家山林场”。

公社武装部邓部长在安顿好我们后开了一个大会，表示欢迎。

末了，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在三大革命中好好改造自己，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吧！

我渴望“进步”。我下定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吃大苦，耐大劳，让组织考验我。

二姐从遥远的云南边疆给我买了一套乌密风的水粉花卉小辑寄来，勉励我画山画水，争取进步（我至今将此画珍藏）。

林场知青们伐林开荒，垒石造田，热情似火，干劲冲天。年轻人对一个新鲜的环境总是充满新鲜感，那个“战天斗地”时代的基调因此而显得昂扬乐观。

我在心底说：在三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成红色接班人！

同时，我下定决心，过好“三关”，发誓三年内不回重庆探亲。

我们规划了林场的蓝图，并努力付诸实施。

我们在马家山陈家湾平整了一块水田，挖泥挑土，夯筑土墙，盖起了一幢两层小楼。

我们又在马家山林场五里外的田岔子荒坡上，清理出一块老宅地基（有下脚石），夯筑起了一长排平房，开发了田岔子分场。

听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80年前的一个老地主。

我们开玩笑说，将来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老知青。

两处林场共开垦出100亩土地和水田，足够四十来号林场男女生产自足。

1965年深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政治空气浓郁，我和周大同当了劳动标兵，都写了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没多久周大同被委任为林场新场长，取代了本地的老场长。

始料不及的是，几月后，忽然有一天，林场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地被宣布统统靠边站，周大同场长、邹孝琼会计在马家山林场“下楼”，张正清场长在田岔子分场“下楼”。我懵了，因为在我心中，这几个当权派表现很好，况且他们正领导着我们建设家园，怎么能靠边站呢？

这其间发生了多少让我心灵震颤、不知所措的幕幕闹剧。

一天，周大同正在大会上“下楼”，检查自己的“四不清”。忽然，工作组组长振臂一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被吓了一大跳，惊得心口咚咚直响。

见知青们一下子没有反应，工作组组长又领呼了一遍。

于是，知青们莫名其妙地呼应了一下，都举了举拳头，只有几声稀疏的言不由衷的声音附和。

尽管这样，我就已经觉得胆战心惊了。我在电影里看到土改时斗地主有这一幕，周大同怎么也不可能等同于地主吧？

这时，我看到周大同在瑟瑟发抖，样子非常可怜。忽然我想哭，心很疼。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爸爸，他一定也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灵打击……

又有一天，田岔子分场的张正清场长被叫到前锋大队“下楼”（他原是该大队干部），通知林场知青参加。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正清弯下了腰。我远远看见工作组组长把林场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叫到身边说了几句，接着就见她上得台去，义愤填膺地说了几句不得要领的批判语，那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知识青年绝不答应，你休想把我们带到邪路上去！”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张正清场长抬起身子回答她的问话时，冷不丁地她一扬手，手臂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啪的一声，一记耳巴子重重地扇在张正清的脸上。我几乎是随着那一声响，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脸，我相信我此刻的脸一定因为别人挨这一记重击而变得通红。

我的心开始发抖。一是张正清场长是个好人，我在为他痛心。二是大打出手的她，是我心仪已久的姑娘，我暗恋她，崇拜她，她在我心中是绝对完美的，这一记耳巴子打坏了她的形象，打碎了我的心……

事后我老想，工作组组长到底向她说了什么？她出身豪门，资本家的女儿，大家闺秀，美貌出众，工作组组长有意"抬举"她，让她在"风尖浪口"表现一下。而她是一个听话的却又没有多少独立思想的人，也许一句"看你的了"就足以暗示她产生过激的行为，作为"黑五类"子女，她也要做给组织看啊！事隔多年后我拿这事问过她，她矢口否认说我瞎编，可见这于她是没有印象的。而对于我，心中的偶像，暗恋的情人，她手臂那一道美丽的弧线，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了。

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就扭曲了人们的命运，扭曲了人们的灵魂。

1966年2月10日晚上，我接到爸爸的一封紧急信件，说奶奶病了，要我火速赶回重庆。连夜把紧急信件送上山的干部拿出了我爸爸写给公社党组织的信，另有一封云南发给重庆我奶奶的电报。

我一看，顿时天旋地转，瘫软在地——

电报说，宋晓慧同志（我二姐）已于2月5日死于云南东川的大地震（她当时在东川小江农场任技术员）。

第二天，我在摇晃的返渝汽车上神情恍惚。车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今天我又翻看它，真该为当时扭曲的心灵而深深忏悔：

姐姐，你睡吧

姐姐，你睡吧！
还有什么事儿心中挂？
只要我当弟弟的力所能及，
我一定给你作解答。

是不是穷白没抛掉？
是不是理想未到达？
这个你千万放下心，

几辈辈以后保证是个新中华。

……

我失去了最最爱我的胞姐，我恨云南，我恨东川，我恨支边，我恨上山下乡。我心里这么想，可笔下敢写吗？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什么时候了？什么样的心境下？我居然"化悲痛为力量"，大写特写"革命打油诗"。

奶奶已经因悲伤倒床不起，爸爸不能赴云南奔丧，只能在家里点上两支蜡烛，为姐姐写了一张灵牌，他跪在前边，我跪在后面，重重地向姐姐灵位磕头。爸爸号啕大哭，打头捶胸，不能自已，我知道他在自责，他把自己认作是全家的"罪魁祸首"。

只待了一周，我就急急回到了林场。不少知青为了给我安慰，半道上来接我。可我"坚强"得像没事一样——我心里暗自说"我战胜了自己"，"我成熟了"。

呸！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金水桥旁的喜泪，宝塔山上的霞光，引起了我们多少遐想。林场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男）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我们是"黑五类"，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是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

我二姐晓慧去世后，我大姐晓鹇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我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我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

"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30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之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儿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的，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

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联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

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

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联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的,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

四

1967 年 1 月 3 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 17 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厅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我们来京，原本是冲着"伟大领袖的接见"，来京第二天，我们就奔赴朝思暮想的北京天安门。

因为不让过金水桥，隔水相望，朝思暮想的天安门，远没有梦境中那么高大。铁红色的墙基上，"文革" 标语白底黑字加红叉，格外醒目。全国各路人马齐聚天安门广场，横幅、造反旗、红袖章、红宝书，映得天安门一片红海洋。

每天清晨，在招待所食堂揣上几个大馒头，灌满军用水壶，我们一拨人去北大，走清华，赴北航，像朝觐的圣徒一样，抄大字报，抄"最高指示"，就这样待了十多天。

1 月 22 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我们听到了周总理代表中央"文革" 领导小组发出的号召：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当时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很明确的就是农村，就是林场。

回到重庆，与一些知青造反队伍一接触，他们"老家" 的概念，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杀回老家"，就是从农村杀回重庆，要把户口办回来。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

他们说，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认为，"杀回重庆" 讨要户口，与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庆的两三天里，我亲自拟就了《告知青战友书》、《"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倡议书》，四处张贴，八方散发，号召返城的知青们尽快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市中区"文革" 小组应我们要求，请部队准备四辆大卡车，过几天送我们返回农村。

没多久，一条海报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组织发起的"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将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

但此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誓师大会发起者们的真实意图，我更意料不到这将是重庆知青营垒两种观念、两种命运的一次历史性大碰撞……

重庆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知青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本身就说明知青的活动能力和对此会的重视。

实在说，这天在踏入大礼堂之前，我并不清楚组织者和参会者是一腔什么样的心愿？

我们"五四红色造反团" 由年纪最小的胡伯寿高擎团旗，整队入场，上了二楼，为的是把我们宽 4 米高 3 米巨大的团旗平展在二楼的栏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楼居高临下，很多团队的标语口号赫赫在目，让我惊讶："还我户口，还我青春"；"杀回重庆来，就地闹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知青换新天"……这些舞动的大幅标语，伴和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喧哗声，使重庆人民大礼堂不再神圣，不再庄严，而是在浓烈的造反气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壮色彩。

我一下子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性质与我们的意愿是相悖的。

说真的，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原本不是来唱对台戏的。

我对胡伯寿说，我一会儿要上台发言，你看我的手势，当我说到"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五四'道路"的时候，我们造反团撤离。

誓师大会开始了。似乎没有细致的大会议程，上台的人乱糟糟的，像生产队里开大会。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们过激的批判语言让我头皮发炸，但他们过人的勇气多少有点让我佩服。

大概五六个人发言之后，我往舞台的边幕走去。腹稿很简单，就是谈谈参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感想，表达我们要回农村去的意愿。

意外地，在舞台边幕上，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朱大明，我俩从小在市话剧团一块儿长大，这会儿他在主持会议，或者是他在控制话筒和音响。

我说，我要说几句话，我刚从北京回来。

接着，朱大明就冲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场宣告：现在请北京来的宋晓涛讲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知青战友们，首先，我代表"五四红色造反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绍和我那标准的普通话（从小在话剧团文艺家庭长大语音纯正）让大伙儿误会了，一句话引得掌声雷动足足半分钟，真把我当京城红卫兵了。

有人在台下领呼：感谢首都红卫兵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战友。掌声终于减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家请往二楼看，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团旗，我们是"五四红色造反团"的。

我不紧不慢地讲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情况，其间，在讲到"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时，台下又响起了几次掌声。再往后，我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首都这次誓师大会的意义。我讲得很谨慎，我没有否定现在的知青大会。我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与工农结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渐渐地，台下有些哗然了，显然，这声音不是与会知青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朱大明借整理话筒之机，过来提醒我：你讲偏了！

这时，台下冲上来两个人，他们憋不住了，伸手抢我的话筒。

我觉得我该说结束语了，于是抓住话筒不放。

我最后说：知青战友们，相信自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动作和语言多少有点像革命者临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壮，又滑稽。

可是，话没说完，声音没了——显然朱大明关掉了音响。

大礼堂乱起来了。我看见二楼胡伯寿挥舞着大旗，我们的队伍开始退场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声响起来，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然，是装出来的……

1967 年 2 月中旬，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石子区近百名知青，分别乘坐军分区提供的 4 辆大卡车，准备返回大竹县。我们汽车经较场口去解放碑绕行一周，一作告别，二作宣传——我们准备了不少《告知青战友书》和《“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要在那里抛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绕行解放碑时，我们依然把宣传品撒向空旷的街道。李焕琨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两年多前我们首次下乡经过这里时也唱过，但此时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几分新意，又添了几分悲壮。

五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

这是一幢独院小楼，法式建筑，带花园的，过去曾是大竹县本土军阀“范哈儿”（即如今因电视剧扬名天下的“哈儿师长”）的私人别墅。环境虽然漂亮，但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

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用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

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 1964 年、1963 年……也就是说，我们 1964 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 1964 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所有的原始意念在翻腾，在打架。

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生产力发展停滞，财政吃紧，加之人口增长过快，教学机构不足，众多青少年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学，产业结构又不合理，城市人口就业途径越来越狭窄，过多的失业人口将招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群体下乡。国家早已明确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将此作为一个兴国兴邦的事业无可厚非，艰苦的地方也确实需要建设者，但问题是，这支发往艰苦之地的主体建设者是以什么标准和方法来挑选的？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的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这一拨视为异己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

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安民告示,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在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分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的纸签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了——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

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 年 4 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了。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做"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信念的完全颠倒真是时代和个人的讽刺喜剧。

大家开始收拾行囊。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前排中者是作者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

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封建迷信的诡谲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啦。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这真是“玩火者自焚”、“咎由自取”！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读着文章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为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小将们的错误被原谅了，因为并没有谁被抓起来。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

六

“文革”中的重庆，武斗全国闻名。全家为避战火，分散躲藏，各奔东西。我则随同众多的难民爬上北上的火车，去西安电影制片厂见我分别了十多年的亲娘，躲避战祸。

分别了十多年的母子重逢，情景自然是动人的。母亲看儿小孩变大人，情理之中。儿看妈妈一头“乱鸡窝”，莫名其妙。妈说，这是造反派给剪的。原来，在我来西安的几个月前的寒冬里，家里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妈是剧团当权派，也被按住头颅挂牌游街。妈说，她与陕西省作协主席、《创业史》作者柳青同押一车，柳青是秃顶，我妈担心他在寒风中游斗会着凉，谁知柳青笑笑说：“不会，因为始终有一只温暖的大手按住我的头顶……”我妈谈这事儿似乎很轻松，而我早已双目涟涟，没想到我妈高干家庭依然逃脱不了被造反施虐的遭遇。不过，疾风暴雨暂时过去，已经“靠边站”的母亲每天只是扫扫花房，偶尔被叫去训训话，所以家中相对比较平静。这里应该是我这个“黑五类”子女的避风港。

这样的不算正经也算逍遥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到了1968年中，终于因为造反派的干预而结束。

这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帮人踏入家门交代事情,不经意间他注意到了我。

次日下午,我妈被叫走了。晚上,妈回到家,把我叫到客厅,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欲言又止。

妈说,造反派要让你离开西影,说你是不是犯了事儿,为什么不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说,走就走吧,再待一周,别难为了你们。

这时,我妈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目光,慢慢摸出一张纸笺,交给了我。

我看着,心跳加快,脸儿发烧。

这是一纸"勒令"——

"据了解,宋晓涛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居然在西影躲藏了将近一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必须交代真实的意图。同时,限定宋晓涛24小时之内滚蛋!"

我心里开始难受。好长时间里我把这种难受的感觉差不多给忘了,想不到我在远离重庆的西安,在我高干的母亲家里,我依然是那个"黑五类"子女,依然是个"狗崽子"。

我眼睛红了,湿了。

妈说,如果明天走不了,我们去说一说,延后一天。

"不,我不是怕走不想走,而是……"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我扭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晚上,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隆隆的火车轰鸣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什么时候我才不是……

1968年中秋节,我终于在漂泊一年后返回了林场,又和知青们处在了一起。

但是,此时的林场已经没有了前些年的蓬勃朝气,不再烧山垦荒,不再你追我赶地挖地,不再欢声笑语。虽然仍然吃大锅饭,但有些房间里筑起了小巢——1967年"回城梦"破灭的时候,大部分知青回重庆当"逍遥派",而杨绍林、陈章国几对男女后来又返回了林场,过起了同居生活。

这是一段坐吃现成、得过且过的日子。

闲处山林百无聊赖,见几对恋人已公开同居,我既茫然又向往。耳闻目睹,春心萌动,开始为思念而夜不成寐。终于,在那个夜晚,在那条小溪边,我鼓足勇气心潮澎湃地对我的意中人念了我的情诗,表达了我的爱。但是,她说:"别想入非非了,我比你大一岁,这不可能。"就像大姐姐安抚小弟弟那样,把我炽热的情火顿时给浇灭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越更显得无聊没趣了。

那幅自给自足的林场蓝图离我远去了。

那份渴望得到"信任"、要求"进步"的热情消融了。

那个"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信念失却了。

一次“教育”，一个“运动”，一场“革命”，从重庆到大竹，从西安回林场，此时若谈起四年知青生涯的收获，我真有些茫然。

新的兴奋点在1968年12月24日出现，过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来到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天，公社革委会向我们传达了那条著名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9年1月8日，我们再次被通知到了公社，这次向我们传达的是《达县地区革委会关于撤销社办林牧场的决定》，以及大竹县张家公社革委会对林场知青重新安置的详细方案。现有的1964年、1965年重庆上山下乡知青38人，分散到六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谁和谁插在一队住在一户，完全自由组合，这样，那些公开同居的或准备同居的都如愿以偿。我和周大同联手，分在五大队五小队。

经营了四年半的社办林场就这样解体了。

过去当知青，今后当农民，再往后呢……不去想了，想也无用。

当我们数十个重庆知青在林场收拾好行囊，拎着脸盆，又像几年前初来乍到的那样，一字儿排开地面对落成才三年的林场房舍，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这是亲手修建的林场。

这是将要永别的林场。

我禁不住联想翩翩——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知青。

别了，我的林场知青生涯！

别了，我的1964—1968……

作者简介

宋晓涛，男，生于1948年。1964年毕业于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同年9月上山下乡到大竹县张家林场。1970年招入大竹县文工团，任演员、导演、舞美、编剧。1993年调入重庆市人口宣教中心，任电视栏目编导、中心副主任。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老知青散记

徐建成

一 “格资”其人与太极拳、点穴道及其他

我们1964年下到西昌的这批知青，人员构成复杂，除了应届、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外，还有小学生和小学未毕业生，同时还有一些当过工人、做过干部自愿辞职来当知青的，实在是“散”得可以。

“格资”即是当过工人又上山下乡的知青之一。在记叙“格资”之前，先对我们这个群体作如下交代介绍——

我们是4月14日乘军用大卡车由成都出发，记得是几十辆车，如集装箱般装着热血、充血或贫血的青春。当夜宿于雅安，次日住在石棉，16日到达当时的西昌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西昌县——现在的凉山州首府西昌市。18日那天，当地的车辆送我们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下到了各自插队的公社。有两百多人下到了距城二十多公里的裕隆公社；有四十八人被下到裕隆公社的永兴大队，这其中有笔者，也有笔者正在记叙的“格资”。我下在六队，“格资”下在五队。

“格资”也姓徐，名叫寿金。马脸，高额，时常笑得如腻了一般，暴露出一口被烟熏得黄灿灿的牙齿。下乡时，他大约25岁，原系木器厂二级木工。与他同时下乡并分在同一个生产队的还有他木器厂的两位师兄弟，一是知青小组长邓克胜，另一位与民国政府时的一位高官同名同姓，叫做王世杰（邓克胜君不幸于1979年前后在知青的光荣岗位上病逝；王世杰兄现早已从企业退休，以教授孩童书法为乐事——笔者补记）。“格资”喜欢“冲壳子”，据他摆的“龙门阵”，他好像读过了很多书，从《本草纲目》到《唐诗三百首》，从

《济公传》到《马克思传》，但在修家书时却将“亲爱的老母亲”写成了“亲受的老母亲”，惹得同队的知妹们哈哈不断。他资格极老，时常摆些光荣史，诸如1960年他拉了两车红萝卜跑西安做生意；诸如1962年大逮捕，他身上揣着80张逮捕证；诸如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他坐火车到乐山去，在车上碰到一个女娃子，高矮要跟他耍朋友，还给他留了地址：成都水花街25号陈玉华；诸如1953年，他在山上打土匪，一个人抱了一挺机关枪，不歇气扫了一夜，天亮一看，山坡上密密麻麻摆满了死人……

“龙门阵”越摆越热闹，他的资格也越来越老了，他的师弟邓克胜便笑眯眯地为他取了个外号，他便因此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可以使人忘忧解闷、可以让人消痰化食的“格（读着‘嘎’）资”。

却说“格资”爱摆的龙门阵之一是“我们老人教我的太极拳、点穴道，有气功在里头。不相信？要告（意即“试”）才晓得。老子一葫芦瓢水搅转，保险泼他龟儿一身洋姜大泡……”

一日，天已擦黑，“格资”与本队知妹付某为当天的饭没焖起锅巴而争吵起来。言语之间，彼此均有不逊之处。“格资”正吵得马脸泛红、口喷泡沫之时，刚从代销店购得煤油归来的汪君一见此场面，红不说，白不说，放下煤油，双拳紧握，怒骂有声，二目圆睁，走将上前“啪、啪”，结结实实的两拳打得“格资”始是偏偏倒倒，摇摇欲坠，继而背贴土墙，立正稍息，半天回不过神来……

披星月，踏凸凹，“格资”满怀悲愤来到我们队的知青点。半包“春耕”掏出，每人一支，吞云吐雾之际，大家靠在床铺上听他字字怒、声声恨地倾吐心中的不平和仇怨。我们都为此事不平。汪某与付某耍朋友，这是大家知哥知妹都打凑合（读作“抽活”）的事。“格资”与付某争吵，你汪某本应相劝摆平才对，为何要借“格资”挨拳头的胸口来表白你对付某的一片忠诚呢？

我问“格资”说：“你为啥不把太极拳拿出来，把龟儿老汪放翻再说嘛？”

“格资”一脸油汗，但气已稍平，半晌答道：“本来我都想放翻他两口子的，又害怕老子手重，给他龟儿弄成养老残，都是家乡人，不好下手……”“格资”是否会太极拳打人，是否有气功，会点穴道，原本我就半信半疑，听他如此这般解释后，更加疑心，便又问他道：“那你该点他的穴道嘛。”“格资”凝神片刻，垂首，二目如罩云翳，含羞般轻声道：“龟儿子的煤油灯没得油了，亮都不亮，看都看不清楚穴道……”

于是，满座轰笑；“格资”也笑，笑得似很快活，他的胸脯想来已不痛了。

“明天早晨，太阳照进灶房的时候‘格资’看清楚了，好生点他龟儿老汪的穴道……”

一群知青笑得前仰后合，欢喜得很！热闹得很！

看来“格资”根本不会太极拳、点穴道。他不过是“冲壳子”而已。然而，一年之后，

“格资”却以他的“太极拳”为知哥出了口恶气,大长了知哥的志气。

下乡的第二年,我们裕隆公社永兴大队的十几位知哥报名去参加修建泸沽渠,作为各生产队派出的民工,由民工连记工分,转给各生产队进行年终分配。我和“格资”都到了距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过二十来公里的泸沽渠工地上当上了光荣的修渠民工。

我们公社的民工编为一个连,有百十号人,均借居于新华公社的几户农家中。连长是别的大队的一个队干部,姓温,细眉小眼,待人甚刻薄。报到那天,他将我们十几个背着铺盖卷的知青安排在一间大约十一个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住宿。有知哥当即“喷痰”(意为“提意见”)道:“温连长,这么挤哪个睡啊?是把人打成捆子吗?还是把人弄来重起睡?”“哪个睡?好睡得很!”温连长当即示范表演了一番,只见他背靠土坯墙立正说道:“一个。”然后又翻转身体胸贴墙壁道:“两个”,再还原为背靠墙壁道:“三个”……如此这般,他绕墙壁转了二十几个半圆,面带胜利者的喜悦高声宣布道:“22个半!你们才18个人,松活得很!”“松活个屎!弄得老子们半夜翻身还要喊:一、二、三,预备起……”又有知哥“喷痰”道。

“要松活,回你们成都去松活!”温连长一句话,惹得众知哥皆口出怨言,“喷痰”声声。这自然无济于事,不怕官,只怕管,也就只有草席压草席,枕头挨枕头地各自铺好地铺,18个人长伸伸地倒在地铺上“演习”了一番,居然还睡得下,便有人叫道:“挤热火,再加一个!挤热火,再加一个!”便又有人翻身坐起,引吭高歌曰:“山连着山,海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修渠的活路,无非是些挖泥巴、“放神仙土”、修涵洞、运石料等等,三五人为一组,记件(比如按土方量计工分)。也就是一天吃三顿饭,出两道(次)工,睡一回觉;七天打一回牙祭(吃肉)。“格资”便时常给大家摆些他修康藏公路时如何“放神仙土”、一日干了七日的活路之类的光荣历史。“冲壳子”不打草稿自然容易,但真的放起“神仙土”来,“格资”却差一点“驾”了“土遁”,被“神仙土”活埋。

为了提高工效,挖方时不用挖而是用掏的方法,先将下面的土掏空,然后从上面将土层压塌,事半功倍,此为“放神仙土”。

这天,已是掏了半人深一个洞口了,我们都主张不能再掏洞而应放土了。“格资”却很老练很沉着地摇摇头:“不要着急!我修康藏公路的时候,比这个深的挖得多。”说罢,便扔掉烟锅巴,一副身先士卒的大将风度,将头伸进洞内,很豪迈地喝令我们道:“拿家伙来!”

我正欲问他是拿钢钎、铁铲、十字锹,还是拿挖锄、板锄,忽听一阵“沙沙沙”的响声,顶上的土已经松了,正在向下垮塌。“垮了!垮了!格资!”在我们的惊呼声中,“格资”敏捷得如同小兔,一个转身冲出洞口,一个鱼跃向前扑倒在地。

“神仙土”未待人放，即已哗哗塌下，烟笼雾罩，沙尘滚滚，少说也有七八方土。

在我们的取笑声中，“格资”脸不变色，但心肯定还在跳，他笑眯眯地说道：“这个神仙土算啥子嘛！老子修康藏公路的时候，比这个深的洞也拿我没法，老子看到火色不对，扯起就是一个空心跟斗……”

“你今天哪个不翻空心跟斗呢？”有知哥问道。

“哎呀！我码不实在（意即弄不清楚）你们跑开没有，空心跟斗阵仗大，怕把你们几个整倒（意即弄伤）。”

收拾完“神仙土”，众知青欢欢喜喜、说说笑笑收工回连部伙食团吃饭去了。

我又饥又渴，脚步甚快，率先走进了伙食团，忽见与我一个生产队的知哥梁君（梁君系化名，本名朱良俊，其父为国民政府的一任县长。他现已从企业退休——笔者补记）正与温连长吵得如火如荼。梁君气得浑身哆嗦，温连长以“一将挡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站在厨房门口振振有词道：“毛主席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参加劳动就是不开饭……”

原来，梁君这两日有点轻微感冒，懒懒地整日睡在地铺上，后脑一团头发已经睡成“绒毛”。知哥们知他并无大病，不过是不想做“仗笨”活路，也就不过问他，由他去睡。此时我见此情景，便知道是因他未出工，温连长招呼伙食团不打饭与他，要对他施行“饥饿疗法”。

猪尿包打人，痛虽不痛，但臊气难闻。是可忍孰不可忍！堂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焉有被你这般欺负之理？我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厉声大喝道：“姓温的，你不要太过分了！知青不是好欺负的……”

温某闻我之言，目光四下一扫，见有几个与他一个生产队的农民正来打饭，便挑衅性吼道：“知青干啥？知青你敢打人？你敢打我共产党员，连级干部？”

温某话音未落，几个农民立刻手握饭碗，前前后后护住了连领导。

“哪个敢动手？”

“贫下中农不是好惹的！”

剑拔弩张之际，猛听得“格资”一声吼叫：“干啥子？干啥子？老子大江大海都见过，未必然阴沟里还把船翻了么？”我回首之时，见他正在将披在身上的一件黝黑棉袄（是成都市专门发给知青的补助棉袄）抖落在地，雄姿英发，肩膀摇动，“啪！啪！”在胸口上拍了两掌，腰一下沉，双手握拳，两腿蹬开，扯了一个场子（即摆了一个架势），有点像打虎式，又有点像弯弓射月式，目光如电，直射温某等人。总之，扯了一个绝非太极拳、又非少林拳的纯粹麻外行的场子。

温某和那几个农民何曾见过这般阵势，那几个农民便纷纷后退意欲溜之乎也。我虽情知“格资”是装神弄鬼，虚张声势，但此时此景也只得假戏真唱，便有意压低嗓音道：“哎，

'格资！'你娃把细(意即'小心')点,不要弄凶了,整残废了,出了人命不好打整(意即'收拾')。"

"让开哦！我晓得！""格资"把头一摇,叭,胸口上又是一掌,一个虚步上前,又扯了个场子。仿佛双风贯耳,又似二龙戏珠,更像大鹏展翅……

温某并几个农民或许此时想到家中还有三岁的娃娃、八十岁的老母,想到气是软的,挣工分供家养口才是硬的,便均不与"格资"交手比试,各自唧唧咕咕了几声:"凶啥子嘛?又没有动手?""算屎,算屎！"便作鸟兽散。伙房里,便有炊事员已将饭菜打好,送到梁君手上,"快吃！快吃！吃了又去睡倒休息,哪个又不生疮害病嘛！"众知青围坐于地铺上吃饭之时,齐声赞颂"格资"今日为知哥出了口恶气。"格资"高兴得如同在打牙祭,红光满面,慷慨陈词道:"龟儿,不是老徐把我挡到挡到的,老子今天硬想点他几爷子的穴道……""格资"是一个能带给人欢乐的人,他有很多故事能让人喷饭。

二　知青批斗富农和知青批斗知青

下乡插队时正是报纸上、广播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一声更比一声高的年月。

记得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批斗会是批斗全大队唯一的富农分子卢本善。按当时的口径,地富反坏右均是头上有"点点"、身上有"疤疤"的阶级敌人。本大队没有地主,这富农自然便由"老二"升格为"老大",享受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一等待遇。

会场设在大队小学里。学校原系文昌宫,紧接大门的万年台保存尚完好,经修缮了的平房作了教室、办公室、教师卧室和厨房。方方正正的格局,正中一个大操场。当年,风华正茂的丁佑君被土匪抓住后,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她受尽土匪折磨,忠贞不渝;次日,又从这文昌宫里押到罗家场街上,被敌人剥去衣服,游街示众……烈士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使我们此时坐在烈士战斗过的地方,心中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几百名社员和知青坐在操场中,主持批斗会的大队书记厉声喝道:"富农分子卢本善站起来,交代你的罪状！"

一个身材瘦小年近半百的老头噙着烟杆,慢悠悠地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不惊不诧,穿过条条板凳,如散步般缓缓地向设有一张课桌的主席台兼批斗台走去。这时,竟从人群中传出了一声极富人情味的话语:"三爸,你走慢当点！"本大队姓卢的不少,这卢本善是很多人的"三爸",也不知是谁在呼唤他,宽慰他。而大队书记也似听而不闻,并不在意这个不合时宜的称谓和关切。

"我每天出工、干饭。个把月哇赶回把场,没有做过恶事,没屎得罪状……"卢本善几经大队书记的催促,终于开口交代"罪状"了。

这哪里是交代“罪状”，按当时的说法，这分明是有意对抗革命知识青年和广大贫下中农对他的批判斗争。大队书记一时无言，静场片刻。这批斗会真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这时，知青行列里猛地冲出了又矮又胖又黑的岳莽娃，只见他一阵风似的扑上前去，双眉倒竖，环眼圆睁，杀气腾腾地抓住富农分子卢本善的胸口，扯起就是一拳，“狗日的富农，还敢狡赖？”接着，拳脚交加，“啪、啪、啪、啪”，给了富农一顿饱打。卢本善一脸惊恐，作可怜状，双手上下移动护住了头部和腹下。会场中便有轻微的骚动，便有不满的唧唧喳喳声——“打得太凶了嘛！”“妈吔！好吓人哟！”

这时，我留意到了坐在我对面前排的邻队回乡青年王和富，也双手抱住头，双目紧闭，面部表情颇为痛苦，胸部一起一伏，似在作深呼吸。

王和富是我们下乡后最先认识的一个本地朋友。他时常来串门，借书，摆龙门阵，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屈原的《离骚》。还爱坐在我床上拉二胡，指法极不规范，左手只用中指、食指两根指头按弦，指头跳得很快，很古怪，像在跳跛跛脚，又像是一只小船在风浪中颠来簸去……他的父亲是富农，前年病故了。作为富农子女的他虽然成绩优良，高中毕业后也不可能考上大学，只有回家挣工分，我想象得到他此时一定很难受，想到了自己头上这一团不能消散的乌云……（28年后，我作为西昌市政府的客人——“知青第二故乡行”的代表，在市委招待所见到王和富时，他早已是中学教师了；人过中年，已经开始发胖，头发也开始花白了。）

痛打富农卢本善的莽娃正在争取入团，半月前，才到专区医院去给本队的贫下中农杨大妈输了300CC血，并且高矮不要献血营养费。他此时的行动，自然与献血一样，都是在向党、向团组织表现自己爱憎分明，表明自己站稳了阶级立场。

见卢本善鼻血流了出来，大队书记立即站了起来，站在卢本善和岳莽娃之间，挡住了莽娃，他大喝道：“卢本善，不要装死卖活！今天的批判会暂时收工，你回家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监督改造！”

立即，便有人上前扶住了卢本善，替他擦去血迹……

一场批斗会就这样闪电般地结束了。没有贫下中农抱着血衣上台哭诉；没有公社干部上台说挖出了富农的“变天账”；也没有公安人员出现宣布富农分子破坏抗洪大堤罪证确凿，立即逮捕。我怀着积极参加的心情走进会场，又怀着消极旁观的心态走出文昌宫，心绪烦乱地想：也许这个富农真的改造得还可以，没有破坏活动；也许莽娃打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过火行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地富反坏右也是人类，不是兽类，是不是也应该在解放的范畴之中？但是，如果卢本善真的改造好了，王和富的父亲又已经死了，我们大队没有了别的五类分子，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阶级

斗争在我们大队就提前熄灭了么……

后来，听说批斗会后，卢本善刚回家即有他的好几位贫下中农侄儿侄女或带着几个豆豉巴，或捧着一碗醪糟酒，或送上一把叶子烟去看望他，慰问他。再后来，听说好些社员在赶场路上一碰到莽娃就躲得远远的，说："这个知青凶神恶煞的，打人好下得手哟……"

岳莽娃本在一队，后来社教工作组重组了知青小组，我和他都被分到了八队，我成了这个知青组的组长。我们这个知青组与房东杨大伯一家关系很好，后来岳莽娃娶了杨大伯的女儿，留在了当地，被安排在另一个乡的毛猪站就业。我前后三次回到西昌乡下寻觅当年的脚印，但三次他都在上班，我都未见到他，更为遗憾的是没有可能见到我们的老房东、他的岳父岳母。听当年任大队长的杨国绪说，杨大伯一家因炖食补药"一枝蒿"而食物中毒，老两口和儿子均不幸亡故了；幸得莽娃和他的妻子无恙。关于莽娃，我在《读江姐》一文中有一段有关他的记叙——

> 就这样读来读去，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无意间也就背下了《江姐》的全部歌词。
>
> 一日，与我同队的知青岳莽娃向我借去《江姐》。是夜，莽娃读了一会便下楼去"方便"，及至他归来欲再读，却不料夜风卷书页，油灯不识字，已将这《剧本》月刊烧去大半，《江姐》已一字无存。所幸者，尚未引起火灾。我串队归来，得见此剧残骸，虽无泪，却也难受了许久、许久……

批斗富农之后，还发生了知青批斗知青的事，比如批斗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比如批斗"逃跑"回成都、途中又被挡回的梁君，但规模不大，仅限于本大队。真正大张旗鼓地知青批斗知青，是县上统一布置的对知识青年进行的所谓"整训"。

1965年，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县上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白铁生产合作社的主任或支书。一声令下，全公社200多名知青麻子打呵欠——全体总动员，打着铺盖卷到公社中心校报到，参加整训。

"整训"第一天，不要饭票的早饭吃罢，工作组王组长登台亮相，向200多名知青训话。

这位王某五短身材，白净面皮，身着一件网眼短袖衬衫，穿一条短裤，扎一条军用皮带，左手端一个搪瓷茶缸，右手夹着一支香烟，站在一张课桌之前。虽有藤椅他偏不坐，一会立正，一会稍息，一摇一晃、一板一眼地训起话来——

我是县委，这个派来的；来抓知青，这个思想整训的；知青中有阶级敌人——这个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的；知识青年中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可以肯定的。阶级斗争是长

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现在，我代表县委宣布整训纪律：一、不准请假外出；二、不准互通情况；三、不准互相包庇；四、不准……

王某人训话训得唾沫横飞，喝了一口茶……

因王某人身着网眼衬衫，他训话之后，便有知哥背地里称他为"洞洞眼眼"。又因"洞洞眼眼"不像人名，便有知哥改称他为"王烂眼"。

"王烂眼"搞运动很有一套，三下五去二便将知青划为了一、二、三、四类。一类为依靠对象，二类为团结对象，三类为挽救对象，四类为重点挽救对象。动员会、小组会、大组会、谈心会、交心会……革命须老实，对党要忠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动交代从宽，被动检查从严，揭发他人立功。差不多是个个过关，人人检查。一、二类，不站稳立场，可以变为三、四类；三、四类有突出表现可以成为一、二类。共青团的大门，是对革命青年敞开的。天热异常，人人汗流浃背。"王烂眼"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不断单独召见向他汇报思想、揭发别人的男女知青。

气温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担惊受吓，个个提心吊胆。听说安全大队已经挖出一个贪污了一千多元的知青；又说，哪个知青有次想强奸生产队里的"瓜女子"未遂；又说是"格资"历史不清，问题复杂，是这次整训的重点对象……

批判斗争"格资"那天，两百多人围成一个大圈子，"格资"站在中间，垂头丧气，接受揭发批判。

打死老虎和打假老虎，这是最可表现斗争精神而又绝对安全的美差事。打"老虎"时，便很自然地使自己区别于"老虎"，可以免于被别人当做"老虎"打。一举两得，何不乐而为之呢？故而揭发批判"格资"高潮迭起——

有人说他搞投机倒把，和他老母亲拉着两架架车红萝卜跑西安；有人检举他偷越国境，从杭州翻过两匹山就过了国境线，又被边防军喊了回来；有人揭发他当过土匪，在山上打了一夜机关枪；还有人说他宣传黄色歌曲，写了一首《十月怀胎歌》，用的是别名"陈华"。这些被揭发的材料，大都是"格资"平时爱"冲"的"壳子"；至于《十月怀胎歌》则是"格资"从与我一队的郭君那里借去的一本《南坪民歌选》中抄下的，又自己添了个"陈华词曲"，对知哥们说，陈华是他的笔名，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婆陈玉华……

便有知哥吼道：让"格资"唱一下他写的《十月怀胎歌》。会场上齐声响应："对的！""要得！""喊他唱！""王烂眼"也点头应允，对"格资"说："那你唱一下，唱个一两段，大家好批判帮助。"

"格资"忸怩半晌，不得不唱，只得沙声沙气地唱了起来"一月怀胎……"他不识简谱，哪里会写曲子？唱的是《采花人盼着红军来》的曲调，不三不四，不伦不类，吊儿郎当，会

场气氛由严肃紧张转为轻快、调侃，继而嘻嘻哈哈，笑成了一片，如同某单位在举办周末联欢会。“王烂眼”一改这数日的冷眉冷眼，也放下茶缸，用双手蒙住嘴巴，背过身去笑得肩头上下左右胡乱动弹……

大会批判，分组批判，自我检查，检举揭发，每天开十几个小时的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伙食团的饭菜已是顿顿有剩，人人食欲大减，夜间教室地铺上梦话不断。斗争如火如荼，为了挽救这些一年前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热烈欢送下乡来干革命的知识青年。

一件突发的事，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降临了。

我们裕隆公社的安全大队知青马禄富自觉“罪大恶极”，走投无路，心一横，从楼上跳将下来，满脸鲜血，气息奄奄……

这位马君为生产队里守了几个月的磨房，在大组批斗会上，一再要他老实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碾米磨面的公款。他由 15 元到 50 元，再到 100 元、200 元，最后承认贪污了 1500 元。“王烂眼”方定调道：“态度基本老实，还要继续检查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

当过知哥的都知道，守几个月磨房，总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块钱，哪里去找 1500 元钱给马君“贪污”呢？“王烂眼”却还要继续追查。这马君寻思 1000 元如何赔退得起，如赔退不出，便要坐牢乃至被枪毙，既然已无活路，不如早寻死路，这才轰然坠下，意欲一了百了，永别 18 岁的青春。

电话打到县里，专区医院救护车飞驰而来。马君命不该绝，跌了个脑震荡，除鼻梁跌断，鼻子至今仍现印痕外，全身零件完好，也不曾骨折，说得上是不幸中之大幸。

马君跳楼，本是坏事，但唯物辩证法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果然，“整训”立即降温。白日，气氛开始平和。晚间，由划为一、二类的知青轮流值班，凡三、四类起夜解手，一、二类即紧随其后，以防这三、四类步马君之后尘，增加了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县上另派要员来收拾残局。数日后，“整训”圆满结束。二百多名知青大会餐，人均半斤猪肉，吃“整训”的“最后晚餐”。是夜，约有一半的知青“垮方”（即“拉肚子”），男女厕所均排班站队，“炮声”隆隆。有知哥事后述评道：“这是因为神经高度紧张，睡眠不足，食欲不振而导致体质下降，所以肠胃无福消受‘油大’，只得无可奈何自愿退出‘赃物’。”此语言之有理，解人疑惑，为众知青所叹服。

作者简介

徐建成，成都人，1964 年下乡，1969 年回城当代课教师，1972 年转正。1983 年到四川工人日报社担任记者，后来成为部门主编。1997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有《美的流韵》、《情潮》、《寻常人生》、《感悟人生》、《寻梦人生》、《人间烟火》等多部作品。

黄河滩上的杭州知青

王维铮

黄河九曲，自巴颜喀拉山一路奔腾，过了宁夏境内的青铜峡后，流入了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平原东边是鄂尔多斯台地，西边是贺兰山，呈两头尖尖狭长的条状，黄河就沿着东山蜿蜒流淌。在这黄土高地上，黄河就像一匹脱缰的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插队那阵，黄河向东涮了过去，在河西淤下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们插队落户的多多少少故事就发生在这片新淤出不久的黄河滩地上。

永宁县农场

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有个永宁县农场，1965年秋，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插队落户来到这里，组建起了一个青年队，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名为县农场，其实与一般人民公社普通生产队一样。我们以及其他农场场员们也都和人民公社社员一样，没有工资没有粮食定量，也要评工分，也要等年底分红。到后来农场办不下去了，青年队解散撤销，建制成了通桥人民公社辖下的一个大队，取名叫东升大队，知识青年被打散二次插队落户，青年队里搬进了一些当地农民成了东升二队。

没有谁深究过为什么要办那么个集体所有制的农场。现在看来，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黄河边淤出来这么一大片肥沃滩田，总要有人去经营。另有可能是，宁夏各地检疫出来的患有鼻疽病的马，需要有一个偏僻地方集中喂养。黄河滩交通不便，又少大牲口来往，是个理想的鼻疽马隔离区。第三是因为反右运动后，有一大批亟待苦乏其身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需要弄个地方安置。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建立这么一个县农场。

到了四清运动后期，大批右派分子被摘帽恢复工作，农场人口骤减。正好我们响应

号召，到宁夏来插队落户，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安置地。为了安置我们112名杭州知青，场部从农场一队、二队的耕地中划出部分土地，成立了一个青年队。这片土地除了在青年点南面的杜家岗子的二十几亩是好田可以种麦子，其余都是些高海拔的易灌不易排、盐碱化很严重的低洼田。田里长满荒草、坑洼不平，田埂歪歪扭扭、时有时无，田块大小不一、高低不齐，都是些黄河东进后淤下来的未经怎么开垦过半荒田。

场部挑选了几个当地人与我们一起来组建青年队，一位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青年农民李大明来当我们队长，此人看人睹物习惯眯起一只眼，没多少文化却是第一个能听懂杭州话的当地人；年长点的叫杨伏山，已记不清他算是政治队长还是民兵连长，也可能是身兼两职的。一个典型的西北大汉，身高力大，话音洪亮。他的形象使我联想起我看过的一部世界名著中描述的一位扛起车轴救人的市长。一位老技术员也姓杨，也是队委会的成员；派到青年队的还有给我们烧饭的炊事员贾万银大伯，喂牲口的饲养员后来又种菜种瓜的赵大伯，以及专门负责教我们干农活的王利。这是一个狡黠的老中农，说毛主席身上也有几颗虱子的就是他。他还指着我们发的竹扁担问："这玩意小时候能吃？"有人回答他说能吃。我在晚上小组生活会上提出来，批评那人糊弄宁夏人，熊猫也啃不了那老毛竹。那人急得跳起来说，竹子小时候是笋，当然能吃，这我才恍然大悟。王利有一把锹，每天擦得锃光瓦亮，锹把光滑得像打过蜡一样。

我们一开始的劳动内容主要是平整土地，每天王利蹲在地头一瞄，拿锹在高坡的地上画一个圈，就像孙悟空画防白骨精那个圈一样，又怕我们把熟土都挖了，就交代一声"花花的挖"。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到低洼处，将锹往地上一扎，大声喊道："到这厮来！"我们就傻傻地拉着小车，随着他的锹头倒下一车车的土。

烧豆子

青年队是新组建的生产队，人员结构简单，清一色的高初中毕业生，缺少由自然村落形成的生产队那种年龄的阶梯结构。因此一些本来应该由老汉小嘎子干的活，在青年队里不得不由大小伙子去干，我就在黄河滩放了好长时间的马。青年队成立时，用我们的安置费到东山买了十头牛，一位杭州知青放牛时不懂，没经验给跑丢了一头，几年后才找回来。场部又给我们队配了两匹马和几头毛驴，其中有一头小叫驴，兽医来给骟了，叫另一位知青拉着溜达。晚上这位知青在拴驴时也是不懂，没经验在驴脖子上挽了个活扣，第二天发现小叫驴已被勒死了，青年队食堂意外地供应了一次"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因为前面已出过那么严重的两起事故，放马的责任也觉得很重。一队放牲口的是个瘸子，与我同龄但个子瘦小，看起来却像个小嘎子。他是黄河滩上放牲口的头，不管是哪

个队的,也不管是放羊的还是放牛的,一群小嘎子都服他管。这些人自小未离开过黄河滩,对城市的概念还是从几个月看一次的露天电影里得来的,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瘸子对我很好,每天我把马赶到滩上,他和小嘎子们就会过来与我扯谟(聊空天),我也就火车汽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海吹一番,马儿跑开了,他自然会招呼那些小嘎子为我赶回来。

也有让我感到新鲜的事。

黄河大堤外的河滩地人们叫做闯田,能收不能收全凭天意。种成了就是大丰收,而且可以不缴皇粮(根据国家规定闯田不征农业税)。种不成,庄稼迟了或这年汛期提前了,黄河水漫滩就连种子也捞不回来。因此只能种一些早熟的夏粮,一般都种大豆——榆林大黄豆,这样才能够在黄河发大水前抢收一部分。黄河滩上没有田埂没有沟渠,播种时用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拉着 24 行播种机可劲儿地跑,秧苗出来后是望不到边的一片绿色。

放牲口的小嘎子都是烧豆子的高手,豆子刚开始结荚,他们就会到豆田里去找那些饱满点的豆秧,连根拔起,找些柴火点着了烧。烧完,脱下衣服使劲扇几下,灰烬扇掉剩下的就是烧好的豆子,然后大家蹲成一圈拾豆子吃。

烧豆子有很多讲究,要视豆子成熟程度来增减柴火,等到豆子老了,还要摘去豆叶再烧,不然豆子就会烧成焦炭。吃也有讲究,要先将豆子扔到空中,再用嘴接着吃。我没这号本事,有次放马归来,半道上遇到杨伏山,他问我:“又偷豆子吃了?”我连忙否认,他说:“还不肯承认,看你的嘴都吃黑了。”

不管怎样,这烧豆子的事总是侵害集体财产的事,生产队如果发现我们带火柴是要扣工分的。这些小嘎子有办法对付,他们把火柴棍和火柴皮分开藏在他们的大裤腰里带来。不过那么一大滩的豆子吃掉点本也没啥,大人们管得也不是很严,即使给队干部发现了,也不过吓唬一阵。有时他们甚至也会蹲下来,跟我们一起拾豆子吃。

烧豆子吃多了上火,屁多,天天吃总也有个吃厌的时候。有时候,瘸子会叫几个小嘎子骑上毛驴去掰些青玉米来,不剥皮不去胡须放到火堆里烧。那味道比豆子好多了,甜甜的带点烟火味,我们往往连玉米芯都舍不得扔掉,也要细细地咀嚼一番。

黄河滩上,我们捞到什么烧什么,印象深的还有烧土豆也很好吃,最不好吃的可能要算是烧鱼了。

秋天了,大田的水都要往黄河排,那群嘎子平时没事就找个水坑,在出水处插一排柳枝让水流不让鱼过。哪天高兴了脱个精光,一群人在水里跳起踢踏舞,搅得水坑里的水都成了金黄色,水中的鱼儿被这泥沙呛得憋不住气,纷纷浮上来换气,这时的鱼行动非常迟缓很好抓。其实这种原始的抓鱼办法,说出它的名称来肯定大家都熟悉——这就是大

名鼎鼎的浑水摸鱼。

摸上来的大部分是一种当地叫马蔺棒子的鱼，约一扎长，肉滚滚的。捉上来后也不洗，找根柳棍从鱼嘴穿入就拿到火里烤，烤熟了就剥皮吃肉剩下骨头内脏。虽然这些小嘎子每次都会热情邀我尝尝，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只是每次都在边上享受他们的愉快。

煤油灯

我快要离开杭州到宁夏插队落户去的那几天，有天母亲下班回来问我："听人说你们去的黄河边的农场里还没有电？"我回答说："听老师说是这样。"母亲爱看书也爱看电影，她对农场的概念大概还停留在电影和书刊杂志上介绍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形象上，那应该是到处拖拉机康拜因，人人穿着大花布的衬衣和布拉吉，怎么会没电呢，不可设想！我们那时也不明白，只是受到的教育，听到的宣传都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所以虽然一点儿不知道什么叫艰苦，但还是摆出不怕千难万苦的英雄架势。母亲喃喃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不失时机地缠着母亲陪我到解放路百货商店去选购了一只塑料防水手电筒。1965年，塑料还不普及，有了这支手电，也使我在青年队里骄傲了一阵。

两辆大客车在黄土高原上的马车道摇晃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送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几排整齐的青年点宿舍，有门有窗，窗上还钉着窗纱，看上去不比学校的宿舍差多少。推开门看，白灰抹的内墙，一铺大炕以及连着炕的火炉，占去了大部分室内面积。靠窗放着一张小小的折桌，那种后来被称作知青桌，几乎在浙江各地知青点都可以见得到的那种。每人一张方凳，那种简易的骨牌凳，女生宿舍还多一个马桶。这几样都是随我们一道乘专列来的，宁夏农村只有矮矮的炕桌，没有凳子，马桶更不要说了。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脚煤油灯和一盒火柴，除此以外就再没其他任何家具摆设。

那高脚煤油灯又叫美孚灯，国产的，上下分三截，底下是装煤油的玻璃灯座，中间是铁皮制的灯托，里面装有一个灯头，灯头里装有一个棘轮和一个小手柄，可以调节灯芯高低，控制灯光的明暗，灯芯是宽宽扁扁的棉织品，也是要专门去买的。最上面的就是灯罩，薄薄的玻璃制品，上口小下口大中间膨起，时间用久了容易被熏黑，需要经常擦拭。

这种煤油灯的设计还算科学的，有充足的氧气供应，燃烧充分，发出的光作为局部照明，也是够用的。我们在灯下学毛选，读雷锋日记，也缝补衣袜做点针线活，灯光映出我们的身影在墙上，好像是皮影、幻灯。用煤油灯最讨厌的是当我们都在炕上睡定后，发现灯忘了吹灭了，没法给煤油灯也装上拉线开关。

记不起来到底是杭州市团委还是杭州总工会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送了我们青年队一架幻灯机。考虑到我们缺少电源，这个幻灯机是用汽灯作光源的。幻灯没放过几

次，但那汽灯我们经常用，那时我们经常组织联欢，那汽灯一点着，明晃晃的，站在三队也可以看见。这时贫下中农就会说："青年们又在演剧了"，各队的人都会结伴涌到青年队来，看我们自娱自乐。

这个汽灯，青年队里只有黄天增一人能把它点亮。黄天增是个印尼华侨，喜欢打羽毛球，早年在国外时晚上打球就用汽灯照明。汽灯又叫汽油灯，但是用的不是汽油而是煤油。点灯时先要给灯的油罐打气，再预热使煤油变成油蒸汽，燃烧后喷射到一个用钍盐浸透过的纱罩上，这纱罩温度升高达到白炽，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

汽灯最大的缺点是要经常加气，往往在紧要关头因为油罐气压下降，灯的照度也会下降。这时就要赶紧打气，因此那时也有人把它叫做气煞灯。"文革"动乱后，我们也不搞联欢了，汽灯纱罩易坏，那时也买不到，没人关心去买了，这只汽灯也就不知去向了。

"杭州侉子"

"南蛮子，北侉子"，按理说，我们从南方的杭州来到宁夏，应该称我们为"杭州蛮子"才合道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宁夏，我们却都被称为"杭州侉子"。我们一千来人散布在永宁县东起黄河边西至贺兰山的五个公社百来个生产队，好像事先有了约定似的，不管到哪个窝窝子，当地人总是称我们为"杭州侉子"。

这是一个含有严重排外情绪的称呼，是对我们的不恭不敬，是个蔑称。想起那些不大不小的嘎子，光着屁股，撵着我们喊道"杭州侉侉，吃鸡只吃爪爪"时，听着是多么的挠心！

时间长了，听得耳朵起茧，我们也听疲了，不当回事，也就无所谓——盾白儿(杭州方言喻反意的话)当做补食吃，我们自己相互间也称呼起侉子来了。

侉子有侉子的语言，杭州话里掺杂着宁夏方言。或者说，把宁夏的方言、谚语，用杭州话的腔调来交谈说话："咋话了"、"好着哩"……

侉子养的狗，从来不咬侉子，不管识得还是不识得。

只要你是侉子，不管走到哪个知青点，都会有人管饭管住宿。

就是出门在外，在银川，在养和，还是在回家探亲的途中，只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打招呼："侉子？"马上就会亲密无间。

四十几年过去了，这侉子情结还是没有些许的减弱，你看，赶时髦弄了个群聊，取了个名字还是用的侉子群！

宁夏话爱把状态说成"气"，美气、洋气等等的，于是侉子间就有了五气，洋气、土气、悬气、窝囊气、书生气。谁是始作俑者，找不到了，论来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吧！

劳动号子

宁夏的劳动号子很有特色。

第一次听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劳动号子是在杨显工地上。我们刚从杭州到宁夏才没几个月，有一天，我们被临时抽调去拉水泥涵管。这混凝土浇制的水泥涵管直径有两米多，中间穿了根碗口粗的松木，松木两端拴着绳。我们十几个人分两列拉着绳，想把这涵管挪动到指定位置去。天太冷了，水泥涵管好像已经与大地冻在一起了，我们使劲拉了拉，没动。这气温也是太低了，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天气，手握住绳，没有冷的感觉，只是觉得生疼生疼。还没热过身来，人感到有点缩手缩脚，使不出劲来。

带队的贫下中农杨伏山看了看说"这不行"。说罢，解开身上系的腰带，将棉袄敞开了怀，一步跳到边上的高坡，还在大家诧异时，手一挥，扯开嗓子吆喝了起来："同志们一条心吆……" "咳……！"大伙儿还没回过神来，回答得不够整齐有力。"干起活来就一股劲儿哟……""咳！"这回的呼应就有力多了。说也奇怪，他三声号子一喊，那水泥涵管就松动了，慢慢地随着我们开始滚动起来。四十多年过去了，似乎还能回味起那号子的韵味，不过老是要窜调，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电影《红高粱》里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个调子。那电影是在宁夏摄制的，敢情那作曲的也听到过宁夏的劳动号子，并且有所借鉴。

杨伏山并不是个喊号子的高手，那天都是些杭州娃，没其他会喊号子的，他才挺身而出喊起号子来。在宁夏农村，哪个村庄都会有几个喊号子的高手，轮到这些需集体出力的活，他们一般不用干体力活，就在一旁喊号子。词是现编的，根据现场情况编的词。真佩服那些民间高手，张口即来，诙谐幽默合辙押韵。有时看大伙干累了需缓口气，但还不到歇息的时候，会有很长一段引子唱来。喊号子的调有个基调，但也得根据劳动强度的轻重缓急，改变调子的抑扬顿挫。喊的号子总是那么高亢激昂鼓舞人心，加上那些变化多端的衬词，听着真是种享受。它会使人忘掉简单劳作的枯燥乏味，顿时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号子听得最多还是在贺兰山当民工那阵。

是因为要突击架设一条战备线路，我们被电信队临时招为民工。地方上的线路活好干，为了抢时间，用的都是松木杆，轻多了。而且通讯线路都是顺着公路跑，不用人拉肩扛地抬电线杆。后来转到铁路上干，用的是水泥杆，线路按规定不能离开铁路 20 米，逢山过山逢水涉水，运杆子把人都运怕了。有时几天工夫，只能运一两根电线杆。平地上四个人抬得动的杆子，上山时十几个人都抬不动。用一根绳在电线杆子上绕几圈，在杆子的头尾各打一个结，抬杆子的杠子就从那绕的圈子中穿过，这就叫治懒人结——中间的绳扣都不固定是活的，谁想偷懒松松腰，准把你压得趴下为止。就这样，抬的抬，拉的

拉，在那激昂的号子声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到吃饭时间了，就地啃些冷馍喝些生水，赶紧咽下肚找个阴凉处就地打个午觉。迷糊中，号子又喊起来了，抹抹眼揉揉肩，抓起杠子，下午的活又开始了……

还是想听那号子，还是向往那扛棒活——吃得下，睡得着！

场　上

北方地区哪个生产队都会有个社场，用于庄稼收割后的再加工和临时储存翻晒，大的有好几亩地，平常时间冷冷清清，也就堆点柴草，只是在放露天电影时才会有点人气，可收获季节那里会热闹得像过节。

到青年队后不久，就遇到宁夏的秋收，几个老农一合计，把青年点门口的那块地割去稻子，套上几副石磙碾了又碾，压得不起土了，便成了农场青年队的社场子。

收获的季节是喜悦的。眼看着一捆捆的稻子一会儿变成金灿灿的稻谷，一会儿又成了一袋袋的粮食。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第一次亲历北方的收获。我们喜悦、欢欣、激动，会暂时忘却田野劳作的筋骨之苦和远离亲人的思乡之痛。社场上充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西北少雨水，庄稼割倒后就搁在田里晾着，待整个庄稼割得差不离了，才回过头来将割倒的庄稼打捆。于是马车、牛车、毛驴车、拖拉机，各色各样的运输工具全部出动，把散落在各个田块里的庄稼运回到场上，堆成垛。庄稼全部上场后，选个日子消消停停地开始打场。

打场先要拆垛，然后将稻捆解散在场子中央圈成一个大大的O字，套上戴了口罩的牛、马、骡子，拉上几挂石磙子，在那个O字圈上反复地碾压，其他劳力拿叉叉将压过的稻子抖松，以便再次碾压，直到稻子全部脱粒。

拉牲口的人，顺着那个O字，转圈走着那走不完的路。寂寞而枯燥，时不时会扯起嗓子吼几声秦腔眉户唱几首花儿。我们不会那些，也不喜欢那些，我们哼的是二胡和笛子的独奏曲——青年队里学二胡学笛子的人多，那些独奏曲耳熟能详，谁都能哼上几句。

场上使用的工具（其实应该说是农具）也是专门的，就说叉叉，就有两股叉三股叉四股叉等，各有其用。还有像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有大小刮板，有幌叉、有木锨、有扫帚……场上的扫帚是少不来的，北方缺少竹梢，宁夏用的扫帚别有特色，是用当地产的芨芨草制作的——用一个不大的铁箍把一个柳木把和芨芨草紧紧地箍在一起，外形就像一把放大了的有柄的马桶筲帚。

经过多次碾压，谷物大部分脱落，就要开始收场。用两股叉反复抖动，将稻草和粮食彻底分开，再用九齿耙将稻草收拢捆好，运场边码垛，场上剩下来的就是当年的收获了。

用大小刮板把场上的粮食集中一堆，用扫帚将场上扫干净，接下去的工序就是扬场。

扬场是北方特有的，利用自然风对谷物进行风选分级（南方一般是用风车）。扬场是个技术活，专门有一老农负责。青年队是新建队，老农少，都由我们自己在干中学。这活看似容易，其实有许多讲究。扬出去的粮食要发散，不能成团，这样才能扩大受风面积，便于进行风选。还要根据风力大小调整抛扬谷物的力度和角度（风大扬低点，风小扬高点）。拿扫把打秕谷的也是个技术活。用一个麻袋对角折拢，披在身上当披风，扫把要使得不轻不重，正好把秕稻子扫掉而壮稻子留下来。等扬完场，秕稻子壮稻子泾渭分明，稍划拉几扫帚，就可分开装包进仓。

那么多知青集中在场上劳动，热闹劲可想而知。都是第一次打场，充满了新奇感，都想创造些新发明来。洋相百出，天天有笑话。

拆垛是个麻烦事，垛顶上站不了几个人，青年队人多，窝工。找了根锹把粗细的大绳，把垛拦腰一围，几十个人两边一拉，快多了！有一天拆到垛底子了，大伙儿铆足了劲没动弹。都学过物理，知道这时候需要克服静摩擦力，待垛底稍微一松动就省力了。不知是谁哼起了调子，调子很熟悉也很合这活的拍子，大家伙儿合着拍子一使劲，"啪"绳断了，场上齐展展的"坐下"两排人，墩的屁股生疼。大家站起来，拍拍尘土，揉揉屁股，相视而笑："都是那首调子不好！"什么调子，研究半天想起来了，那是一首内蒙民歌改编的二胡独奏曲《拉骆驼》。

场上收起的稻草，还得捆起来码垛，用作冬天牛羊和大牲口过冬的饲草。稻草垛与稻垛一样，底角是长方形的，稻子重，垛堆不高，稻草轻，都想把它堆高点。两个相邻不远的稻草垛，底盘正好成了个正方形，不知谁出的主意，把这两个垛拼成一个，堆出个金字塔来。这一天，食堂里的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反常的是原来那些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的男生，没人去吃饭，全围在了场上，十几个大小伙子，用三级幌叉一级级传递，在月光下完成了这惊世之作。

吃粮琐事

青年队刚成立时有 112 名来自杭州的知识青年，男女各一半，都是 56 名，后来从养和公社又调来一位女杭州知青，女生就成了 57 名，比男生多了。本来青年队的女生就够厉害的了，7 个小队有 4 个小队长是由女生担当的，女生又比我们思想积极来得比我们左，老说我们男生出工不出力，因此男女生之间少不了打些口水仗：女生骂男生都是些懒汉，干活磨洋工；男生嫌女生干不了重活，却要同工同酬。女生经常用毛主席语录"妇女可以顶半边天"来压我们，而男生中的几个弯弯绕却硬说毛主席说话原意是女的可以顶半拉子天，而老爷子们却可顶起全爿天。于是男生称女生为半边天，女生称男生为磨半天。

但每到月末，男生的嘴就开始软了。宁夏种的单季稻，生长期长达120天，加之黄河水灌溉日照时间又长，所产大米米质极佳，煮出饭来油汪汪的一粒一粒呈半透明状，吃口好极了。米饭好吃的出饭率肯定不高，半斤米饭，只有小碗里浅浅一碗。我们那时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段，牙好胃口也好，一顿饭吃个斤把不在话下，每个月都早早地把45斤定量吃光了。

女生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我们刚到青年队时还吃国家供应粮，每月总有结余。每当这时候男生的脸皮就会厚了起来，女生的心肠也会慈善了起来，我们只能靠化斋果腹，女生们也会跟着我们勒紧裤带节约下口粮来施舍，她们全明白，没有这点施舍，这批油子连磨半天也做不到。

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不知是谁发起了到县城买烧饼的行动。县城在养和街，与我们县农场隔了一个黑泉湖，有30多华里路。烧饼是长方形的，酷似老农纳的千层底，我们都戏称它为鞋底巴掌，也要粮票，那时我们刚到宁夏，都揣有家里带来的全国流动粮票。每次有人到县城去，总会捎回来一旅行袋的鞋底巴掌。后来有人提出来这是在搞特殊化，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于是，再没人去买了。

偷　油

青年队的管理、作息完全采用学校里的那一套模式。早晨，起床哨一响，赶紧到食堂打来热水，洗漱完毕后要集合到操场，在值日生的带领下做广播操，做完操才可以到食堂打早饭。等上工钟声一响，就以小队为单位，分赴田间劳动。

黄河边一马平川，食堂的烟囱成了方圆一带最高建筑物，老远都能看得见。每当干活累了饿了，大伙会不约而同地眺望，盼望炊烟渐落，盼望收工的钟声再一次地响起。当时流传着一首很优美的越南南方歌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唱：“太阳下山了，那安静的钟声再也不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青年队也开始混乱了，大家渐渐地看穿了这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什么理想情操世界观，什么扎根锻炼改造上进，都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整天一颗汗珠摔八瓣地搞些黄土搬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糊涂了，迷惘了。于是干什么都不是那样认真了，对食堂伙食意见也大了起来。“拳大萝卜对开即可，清水煮之加盐日日食用”、“取白菜一棵剁碎略炒，……”当时流传的所谓大众食堂菜谱，就是对我们伙食的形象写照。开始有一些情侣偷偷摸摸躲起来改善伙食，慢慢的三五成群四五结党的形成了许多小小团体，平时在食堂用餐，高兴了自己动手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是由四五个平时比较说得来的初中生组成的那么个小团体，号称小暴徒，是属于青年队里较能干的一伙。我们养了鸡养了一窝兔子，还经常钓鱼捉青蛙，小日

子过得确实不错，着实令人羡慕。可也有一样，就是食用油无法解决，这玩意儿紧缺，有钱也没地方买。有时步行三十华里到县城去买些肥膘肉熬点油备用，但是用荤油烧鱼，总不是个味儿。

我们那时还有定量油供应，都集中在食堂里。老实说，就这点油，食堂烧菜也不够用，还老是有人偷。大家都怀疑是住在食堂隔壁的大炮偷的油，大炮在家是独子，家庭条件又好，经常给他邮东西。他怕我们去分享去共产，就找到食堂边上的一间空房搬到那儿独居，孤家寡人关起门来吃独食。虽然有许多疑点，但总是抓不到证据，只得作罢。

有天晚上，我们打完桥牌已经很迟了，顺便又想到食堂去搞点油。食堂油罐里的油已不多了，摇了摇，索性就连罐捧走。想了想，还没尽兴，便拿起食堂写菜谱的粉笔，在搁油罐的案板上写下“此地无油三百两”，又在门上写了“隔壁大炮没有偷”。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一次青年队老知青聚会上，我们郑重其事地向大炮道歉，已是个小老头模样的大炮，嗫嚅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杭州知青到宁夏农村插队落户，有意无意间将南方的、沿海的相对而言较为先进的文化、文明的生活习惯，带到了这闭塞落后的乡村。现在看来，唯有这些，还有点进步意义。



王维铮，男，1965 年杭州二中初中毕业，同年秋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农场落户。现退休。

未忘却的记忆

和　蓥

我的户口又被转回农场了！

我顶着西双版纳的烈日，焦灼地奔走在大勐竜、小街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又仿佛是去场部看病，踽踽独行在生产队通往场部的泥泞山道上，路两边黑黢黢的原始森林恐怖地沉默着，我得加快脚步，天快黑了，我赶不回队上了。怎么翻了一座山，面前又一座山？山上是否有支土匪的枪管正对着我的后脑勺？我不敢回头，不敢东张西望，心惊肉跳、磕磕绊绊、一路小跑……梦醒了，吓出一身冷汗。

这种梦一做就是几十年，大概在 6 年前才告别了这缠身的噩梦。

我是 1965 年 12 月由重庆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我们这一批共 1500 多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系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其中我们渝中区的 516 名知青分配到西双版纳景洪东风农场（文革中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来又改为东风农场），其他区的知青分到西双版纳各个农场。我们这批知青绝大多数皆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而在中考、高考中落榜，也因为出身不好而无法获得任何的就业机会，只有边疆或农村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从小母亲叫我们填写的家庭出身是商业，因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即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回家，以经商为生。90 年代末当我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材料后才知道，我母亲的单位及学校都认定我的家庭出身是旧军官。怪不得从读高中一直到农场、到工作单位都时不时地听到一些人嘀嘀咕咕“有人隐瞒家庭出身……”我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些人说的是我？幸好这一切已是过眼云烟，再也伤害不到我了。

父亲的命运

我的父亲和承英，出生于云南省丽江县一个富裕的纳西族商人家里。1935 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南京汤山炮校第一期，两年后毕业，正值抗战爆发，分入中央军炮兵一旅，辗转京沪、华北地区，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任职运弹队长。在惨烈的战斗中，父亲被日军炮火击毁的一堵墙打晕埋住了，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被日军绳捆索绑丢弃在马厩里。父亲从小就和马打交道，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趁黑夜，他磨断了身上的绳索，牵出两匹马，骑上一匹，拉着一匹，哒哒哒地向着我方阵地奔去。小鬼子们发现了，疯狂地在后面追，一边叫一边开枪。父亲骑的那匹马被枪弹打中了，他飞快地跳上另一匹，拼命地奔跑，突然一条大河横在面前，不幸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左腿，血流如注，鬼子们嗷嗷叫着就要追上了，他只好抱住马脖子拼力泅渡，幸好一条渔船救了他，让他奇迹般地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父亲在青岛养好伤后，又参加了武汉大会战，随后又考入中央军校 17 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宝鸡特种兵学校。他的一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表兄李汝炯在此当主任(原系中央炮兵一旅旅长)。他不愿再受表兄的管束，加上旧伤引起肺部感染，他借口 17 岁离家上炮校那年父亲病故未曾奔丧，拒不到差而返回了故乡丽江。

时值沿海通道被日军占领，盟军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由滇缅公路输入，滇西一下成为运输咽喉重地。昔日冷僻的丽江县城——纳西人的聚居地，也热闹繁忙起来，每天都有大批跑印度、西藏的马帮摇铃过往。

父亲的长兄嫂在四方街经营的祖传老店也生意兴隆，正缺人手，弟弟的回来犹如雪中送炭。为了拴住他，急急忙忙为他订了婚。然而兄嫂在已长大成人的小兄弟面前失却了往日的权威，他已不是戏弄马驹子的学生娃。在纳西族家人的眼里，他是流过血、赶走过死神的英雄汉子。在亲友的崇敬与钦慕中、在长兄嫂过分的殷勤和监视下，父亲在故乡休养了几个月。故乡那浓郁芬芳的酥油茶、乳扇、火腿、腌猪头肉滋养了他军旅劳顿、疲乏失血的身子，使他很快恢复了体力，强壮得像一匹奋蹄的骏马。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狂跳了，外部世界强烈地吸引着他，终于假借外出采购货物的机会，怀揣好多金条，快马加鞭，跑了三天三夜，累死了一匹马，才逃出了他哥的势力范围。

父亲辗转来到贵阳，用带出来的钱买了几辆汽车为商家运货，当起了车老板，穿梭于滇黔川桂之间。自己开一辆吉普，自由自在地奔驰在崇山峻岭中。但是他太单纯，没有管理经验，没过多久，两个驾驶员拉货出去，再没有回来。父亲的发财梦破灭了，只好卖掉剩下的汽车，与人合伙开了家专售汽车零配件的大众拍卖行。他平生有个最大的愿望，那就是挣很多很多的钱，成个大富翁。然后盖一座很大的孤儿院，收容天底下所有失

去父母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不再受到他所遭遇到的不幸。

在贵阳,他遇见了一个来自陪都重庆的姑娘,他就是我的母亲。两人情投意合,不久结为夫妇。

父亲有一颗善良、博大的心,他待人热情、慷慨,遇事好冲动。听母亲讲,他们婚后不久,父亲的一个朋友结婚,请他当男傧相且帮忙照相。朋友结婚那天早上,他身着培罗蒙西服、腕戴欧米伽手表、眼架金丝眼镜、肩挎着德国产高级相机,从头到脚全部时髦行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兴致勃勃地出门去了。晚上,他却只穿着衬衣衬裤、光头赤脚、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母亲以为他遭强盗抢了。经他解释,才知道他在路上遇见了战友的遗孀和孩子,大起恻隐之心,把怀里的钱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不久,父亲又弃商从军,加入了贵阳航空委员会,任团副,监测、攻击敌机,为美国援华飞虎队服务,保卫贵阳山城。在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警报一响,父亲就往他的岗位上跑,别人是跑向安全,他是跑向战斗、跑向危险。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云南60军到越南接受日本鬼子投降,任职山炮营营长。帮助万保邦、曾泽生军长整编炮兵部队,重新美式装备,并参加了中法海防之战。两位军长都很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军事人才。当60军整编装备完毕,准备奉命开往东北与共产党打仗时,父亲借病住进了河内法国人开的医院,是鼻窦炎开刀治疗。当曾泽生军长将授予他为炮团团长的委任状拿到医院时,他已人走床空。父亲从越南昼夜兼程回了重庆。父亲对家人解释说,八年抗战,国共合作,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现在却要掉转枪口相互厮杀,他实在想不通。作为军人,抗击外敌不惜马革裹尸还,他的责任已尽到。再加上他最敬重的万保邦军长也解甲归田,所以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开了小差。

1946年春回到重庆后,父亲千方百计地走后门、送礼,好不容易退役复员当了老百姓。1948年初举家回云南丽江。父母亲带着4岁的哥哥和2岁的我,在昆明跟着一个大的武装马帮,整整走了十八天才到了丽江。

云南有句俗语:娶老婆要娶纳西婆。纳西女人披星戴月、吃苦耐劳,下地干活、出门经商,男人们却在家中带娃娃。传说中的女儿国就在丽江、大理一带。听说我们的奶奶是一个勤劳、能干、美丽而颀长的纳西女子。纳西人恋爱自由,但也鄙视小老婆。不知为什么她要作爷爷的第三个老婆,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应该是为了爱情吧。她一个人在金沙江边开了一个饭馆,闲时亦参加淘金,攒下了一笔财产,临死嘱咐留给他的小儿子。父亲继承了遗产,赶马到金沙江边拾回了奶奶的遗骨葬入和家的祖坟山。1949年春,母亲刚生下弟弟一个月,全家又搬回重庆。定居在长江之南的山峦叠翠中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清水溪,离城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的外公当时是1949年前该镇民选的最后一任镇长。

十几年的奔波劳累结束了,父母亲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窝。三十岁的父亲,早年

的雄心、锐气、幻想已被他的伤病和妻儿的拖累减弱了。他只想在这和平、宁静的山间小镇中太太平平地厮守妻儿，安心治病，休养生息。

为了生活，他也像当地许多人家一样做棉纱和织布的生意，时断时续，视他的身体状况而定。因父亲心地坦诚，自认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欣然接受新中国的成立。在解放后一年多时间里倒也相安无事。1951 年春，当地一钱姓二流子因赌钱、抽大烟不务正业，欠了父亲 600 元棉纱款久未还，父亲索要不休，他就诬告父亲私藏枪支。在重庆有名的"3 · 13"大逮捕中，我的父亲就被关押进了重庆市看守所。据说，父亲在审讯时拒绝认罪，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没有罪，你们这样平白无故地关押我才是犯罪。""我的枪口始终对外，我没有打过你们共产党。""我的身上只有小日本打的枪伤……"然而父亲的傲骨招致一顿顿的毒打。父亲素来信奉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大丈夫含笑赴沙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进看守所仅仅 3 个半月，我的父亲、一个抗日英雄、一个铮铮铁汉就离开人世，其时年仅 33 岁。死亡通知称他病死。就这样，我年轻、高大、英俊的父亲走完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27 岁的母亲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追随父亲而去。我们三兄妹惊恐的哭声又令她撕心裂肺，欲死不能。

父亲像纳西东巴一样会测字、占卜、算卦，他对自己的死似乎有预感。在被捕前，他曾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了一件白衣裳，爬到汪山顶上，在那里喝了一杯茶。"茶"是会意字，系人装在木头里（棺材），上面长草。他告诉母亲，这预示着他不久将辞人世，并且埋在汪山。果然，不到一年，他悲愤而死，葬在汪山。可怜孤儿寡母无钱为他立墓碑，以致几十年以后寻不着他的坟头，只记得那一片茂密的山林。

母亲的命运

我的母亲周静秋，1924 年出生于重庆一个小工商业家庭。她天资聪慧，自幼酷爱读书，学业超常优秀。因为要带弟弟，小学仅断断续续读了三年，靠自学连跳三级考入初中。初中也仅读了一年多，因为要让弟弟们读书，家里供不起她继续上学，她即考入黄炎培先生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会计专业。从上学起她年年都拿最高奖学金，常常去当枪手为同学们替考，因记忆力特好，在学校她的绰号叫"活字典"。

抗战爆发后，才十几岁的她就和同学们奔走街头，为抗战募捐。她们背着一个募捐袋，唱着"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明天……"等抗战歌曲，在大街小巷对过往的行人伸出小手童声琅琅："先生太太们，叔叔伯伯孃孃们，为抗战请捐出您的一文钱，买飞机、买大炮，打死日本狼。"在学校，她们为前方战士缝棉衣、做军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慰劳抗日志士的活动中。当年，最可爱的人就是那些保家卫国、浴血抗战、奋勇杀敌的好男儿。她的两个当教师的姐姐都嫁给了抗日精英——黄埔生。她毕业后到贵阳工作，遇

见了父亲，他们一见钟情，很快相爱结婚。看来，周家三姐妹都有英雄崇拜，不约而同地都嫁给了黄埔生。三位夫婿都是1米8以上的个头，个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勃。在清水溪镇成为美谈。

我不知道柔弱的母亲是怎么度过父亲逝世后那段悲惨的日子的。我只知道，为了我们她活下来了。那时哥哥七岁、我五岁、弟弟两岁，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漫漫跋涉。为了我们三兄妹能吃饱穿暖，她白天纺纱、轧衣服，晚上织毛衣，又当镇上的卫生员，打针、接生等，无所不干。后来考上卫生系统会计，分配在南岸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她节衣缩食，拼命加班，以致劳累过度，严重贫血。本就孱弱的身体极度虚弱，常常晕倒。此外还有"旧军官"老婆的身份带给她的羞辱、白眼和不公正的对待，她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着，为了孩子她宁愿付出一切。

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我们住在南山清水溪外婆家，母亲在山下长江边的医院上班。每到星期六，一放学我就要早早地等候在名叫一碗水的山崖上，遥望系着红围巾的妈妈从深深的山谷底慢慢地爬上来，一见到她我总是又蹦又跳，回到家我就寸步不离地黏住她。她总会带回来一些她加夜班后单位发的她舍不得吃的鸡蛋、饼干等等给我们吃。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美丽的嫦娥奔月、杨家将里的烧火丫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讲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母亲的故事使我的童年充满了幻想。

母亲特别爱哭，看书哭，讲故事哭，高兴时也哭，无论何时，只要母亲眼里闪现泪花，我们三兄妹马上跟着掉眼泪。我最怕看见妈妈哭，其实，她笑起来很动人，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白的牙，笑靥如花。看见她的笑脸我就很开心。那时候，小小的我成天在田野里、山林间疯跑，妈妈说我是个十足的野丫头。因为跑得快、胆子大、手疾眼快、行动敏捷，孩子们在一块做游戏我往往是赢家，输了的孩子就对我指指点点地吼叫："和营长！和营长！肺病壳壳！肺病壳壳！……"我一下蔫了，像被剪掉翅膀的小麻雀，伤伤心心地躲到角落舔舐伤口。在我稚嫩的童心里，已意识到我是不能与别人去争什么的，我总是比别人要矮一截。可我倔强好胜的性格又不甘受欺凌，有时也会反击、发飙。但只要我一看见妈妈垂泪就马上变得乖顺，我知道我应该像妈妈一样学会忍耐，小心翼翼地不招惹人，不能顽皮，只能好好读书，以好成绩出人头地来慰藉我的含辛茹苦的妈妈。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下山与母亲住在了一起。没多久，母亲调动工作到长江以北的市中区，在重庆清洁大队（后来的市环卫处）任会计。年轻的母亲温柔、娴静、聪明、文雅，身边不乏追求者，为了我们她一概拒绝。她曾对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找个男人对孩子们不好，那就自讨苦吃；而如果一个男人对她及孩子们都好，她又不忍心用三个孩子去拖累人家。外婆常常教训我们："你们要听话，要记住你们的妈妈为了你们几个鬼崽崽，一生的幸福都不要了，你们长大了要报答她。"在母亲的汗水和眼泪浇灌下，我们一天

天成长,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告慰了她。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机关里除了母亲与党委秘书是女人以外,全部是大男子汉们,他们都可以不去,单单挑了瘦弱守寡的、还有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大家心知肚明,只因她是"反属",她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安排。留下我们三个小孩给年迈的外婆看管。她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以后停发工资了孩子们又靠什么活下去。毫无人性的官员们不给她作任何的解释与承诺,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政策。

临别时,母亲抱着我们哭得肝肠寸断,母子四人乱作一团,我抱着母亲哭喊着不让走。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上学走人行道,横穿马路要小心,不准在马路上玩,放学就回家做作业,听外婆的话。"我们一边哭一边不住地点头。妈妈伤心得站立不住,我和小脚的外婆架住她。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个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她不舍得与我们分开,我们都还太小,她不放心,总担心我们有什么闪失,总想像母鸡保护幼雏一样地把我们拥在她的羽翼下面,不让我们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她给了我们全部的爱,独自一人吞下了人世间的苦难。那个年代,人心都被无休止的革命运动整怕了,污染了。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都被阶级斗争革掉了,人性中的正直、诚实、善良的美德都被扭曲了。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与兽的区别。可怜的孤儿寡母与世无争,能威胁到谁呢?

幸好,母亲一年多以后返城回原单位。母亲在农村干得很出色,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白天一同下地干活,晚上还打着火把去教夜校。母亲善良、热心,乐于助人,每次回家,都要买大包小包的东西送给邻居。她还把我们及亲戚家的旧衣服收集起来带到乡下,送给比我们还要贫苦的乡亲。母亲心灵手巧,教生产队的女人们编织、钩花,买不起毛线用棉线,为小孩和姑娘们用染色的棉线编织出各种美丽的衣裳。后来,这些乡亲们像走亲戚一样年年都要进城来看母亲。

我的命运

1961年,我还是一个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中考过后,成天只知道疯玩。万没想到1961年8月中旬的一天,接到的竟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哭得昏天黑地,一冲动,甚至不想活了。母亲怪我贪玩没有考好。可我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考试时也并没有失误,班上出身好成绩比我差的都考上了,是出身成分不好的原因吧?我们猜疑着。一种愤慨、一片阴霾深深地扎根在我纯净的心灵,我坎坷的命运由此开始……

谜底在四十年以后揭开了,我一个初中生的档案中有3份材料,注定了我的中考落

榜。

第一份是1961年4月5日重庆四十中学(我就读的学校)党支部"为了弄清楚该学生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保证中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向我母亲单位发的调查函。在调查事项家庭情况一栏里,母亲单位写道:"和承英(父亲)云南省丽江县人,是反动伪军官,曾在伪中央军校学习两期,任过反动营长与反动职务,在1951年'3·13'大逮捕中被捕。主要是藏枪不交,并与反革命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关押在区人民法院,因病故(监狱中)周静秋(母)现在我队工作,因其是反革命家属,时有反举。解放前是先后在贵阳、重庆拍卖行经商,成分是资本家。"

第二份是重庆四十中毕业生政治审查意见表,学校填写的是:"父:反革命分子(伪营长等职务),51年3月底被捕,同年7月死于牢中。母:资本家。"

第三份是招生报名单,上面有我报考的学校和考试成绩,四科总成绩为318.4分。引起我注意的是,按填表说明,第一志愿学校应该在"录取意见"一栏"说明录取与否及原因"。而在我的那份报名单上,这一栏是一个显目的空白。

随着不录取通知书一起来的是分配到沙坪坝区中梁山重庆电机厂当工人的通知,1961年9月,我一百个不情愿地到电机厂报到。我校共有108人分到电机厂,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大伙儿戏说我们是中梁山108条好汉。在集中学习了三个月后,还没有下车间干活,我就回家不干了。我要继续上学读书,不能想象我一辈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那些简单的、机械的劳动,没有热情,没有创造力,感受不到工作的快乐,我不能那么活。我决定回家自修,来年再考高中。我把决定告诉母亲,她全力支持。她从小就教育我们,知识就是力量,要求我们兄妹三人争取上大学。

半年后,1962年7月,在出身不好的阴影笼罩下,我战战兢兢地第二次进入中考考场,岂料发挥失常,考完后伤心得不愿出家门。正当我绝望之时,出乎意料地、录取通知书居然来了,我考取了北碚区的重庆朝阳高级中学(现在的北碚区重点中学朝阳中学)。学校位于清波荡漾的嘉陵江边,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四季花香。根据档案记录,1962年中考我仅考了281分,比上年少了37分,还居然考上了。这只能说明当年的招生政策有所调整,让我这个"反坏分子"的子女有幸如愿以偿,上了高中。

高中一年级,命运之神仿佛开始青睐我,我恢复了快乐的阳光女孩的本来面目。一进校,我即被学校领导选定担任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班上文娱委员,第二学期又改任学生会文娱部长。一年级期末,各班考试在前五名的,其姓名以镜框张榜于教学大楼进口处,我名列其中。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对我格外好,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被当做范文讲读,被同学们传阅,以致毕业时已找不回我的作文本。

我曾以夏衍的《包身工》(我们的课文),改编成话剧,集编导主演于一身,在学校公演

引起轰动，我们还排演过《火烧赵家楼》等名剧，老师们排演《年轻一代》话剧，让我演林岚，我是唯一参加该剧演出的学生。我擅长体操、田径，曾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当时，我校女篮是北碚区中学校冠军。记得毕业前夕，我还是学校400米武装负重（提枪，背背包）跑冠军。我是学校、班上举办的政治活动、文体活动、下乡劳动等的组织者、参与者，为学校、为班集体争得了大大小小的荣誉，是公认的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同学们当中很有亲和力，很有威信。

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大约高二年级下学期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学生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一夜之间，学校里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一律免职，甚至连各科代表也不让当。我从红极一时的学生会和班里的干部、老师们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被人斜睨的落后学生、剥削家庭的孝子贤孙。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原来他很器重我，班上的大小活动他都交给我承头组织。因为我爱好文学，经常与他讨论看过的书籍。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学识丰富，对我们班倾注了心血，我们由衷地尊敬他。他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令我非常难受。

那时，班上出身好的、出身一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分别开会，老师布置不一样的任务。出身不好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剥削家庭，一遍又一遍地过不了关。我曾向老师和班上的团支书反反复复地讲过我的父亲，详细地交代了他的一生，批判父亲的文章写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们总是认为我还是没有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他的反动实质。我一声声骂父亲反动军官、人民的死敌、反革命反人民的专政对象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当年的抗日英雄，没有任何罪恶，也没有与共产党为敌。而他钟爱的女儿却要亵渎他的英灵，昧着良心批判他，用脏水、用恶毒的语言污损他。即便如此表白，在高考政审中，我还是落得“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这一结论。

批判父亲我不存在太多的心理障碍，他死得早，我对他的记忆已经模糊。而学校要我批判母亲则使我痛苦不堪。我可怜的母亲，千辛万苦、孤身一人把我们抚养大，她有什么过错？错在和父亲做了八年的夫妻。我向班主任老师申诉，并将母亲写给我的信给他看。我母亲封封信都鼓励我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好好学习。班上的团干部们规定我定期汇报思想，要求我深刻批判剥削家庭烙印，与家庭、与母亲划清界限，他们反复启发我：你母亲的政治生命与反动军官的父亲结合在一起了，你要认清她的阶级立场是与人民对立的，你要与她划清界限。我的心在泣血！为了换取我的安危，我就得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违背伦理道义，去批判与我相依为命的苦命的母亲吗？要我昧着良心骂我可怜的母亲，那我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我简直要人格分裂了！在现实与良知中，我挣扎、痛苦、迷惘……最后想通了，你们爱怎么整我就怎么整吧，我是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天地良心这个坎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这个界限是永远也划不断的了。在我的高中毕业

政审表中，教导主任徐××对我的评语是："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

那时，老师安排我帮助一个工人出身、成绩很差的女同学，并告诉我若她考试还是不及格，就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位同学喜欢文艺，一向对我很好。自从贯彻阶级路线，我俩的身份几乎是掉了个个儿，她变成了骄傲的公主，对我颐指气使。开始我忍气吞声，耐心给她讲解。她总是一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不知道她是懂了还是没懂，让我觉得我像一个下贱的使唤丫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索性不理她了。显然，这成了我看不起工农同学的铁证。

我爱体育锻炼，身体好，当年，俯卧撑能做几十个，也可以在单杠上像男生一样拉引体向上五六个，全校女生无出我右。劳动中，我因体力好，专拣重活、苦活干，抬石头、挑大粪等。那时，每个班都有自己种菜的副业地，每个星期都有劳动课。在盛行学雷锋做好事时，我也曾悄悄地去打扫过厕所。我班的干部们一说做好事就叫上女生们上男生寝室去收集脏衣服、臭袜子，我很反感。也许是少女的矜持，我从不跨进男生宿舍，也不愿帮他们洗脏衣裳。他们自己也有双手，干嘛要我们洗呢？

贯彻阶级路线后，班上的同学明显地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干部们与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的鸿沟一天天加大，我由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班上比较左的几个工农同学视我为阶级敌人，时时横眉冷对。而我又从不会低头示好，不会巴结任何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首诗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决不会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可我的自尊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那时班上的所有文体活动，从头到尾均是由我操持、组织、安排，可每每活动结束，受表扬与嘉奖就没有我的分。那种委屈与愤懑不平噬咬着我的心灵。我毕竟只有十八九岁，除了母亲以外，学校、班集体、同学们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校离城里的家有五十多公里，那时交通不方便，家里也穷，我们只有放寒暑假才回家。学校又是封闭式教学，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关在学校，不准出校门，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至星期日我们才能出校门，大家戏称放风了。届时，约上好朋友，到北碚街上吃点凉粉、胡豆、逛逛图书馆，最爱看的是羊城晚报上面的"五层楼下"栏目，那是当时全国唯一反映百姓生活常态的一个小专栏。

高三下学期，我犹如醍醐灌顶、全力以赴备考，期望出现奇迹，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大学对自己是高不可攀。毕业前夕，在学校的告别晚会上，我们演了一出话剧。是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共同创作的。素材来自《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上海资本家的女儿鱼姗玲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的报道，取名为《决裂》，我导演并扮演女主人公。另外，我还编导演了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几个月后，我就真的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

我的政审表第一栏“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里，班主任填写如下：“该生入校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差，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同情和惋惜我校被打击的反坏分子。对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骂工农出身的同学笨得很，提出‘天才就是天才，聪明就是遗传’的论点，认为政治课是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该生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生活目的是为了吃穿玩，并且过早恋爱；贪恋外国十八世纪的作品，骄傲自大。但该生参加文艺演出活动比较积极，还关心班集体，劳动中较肯干。”

我的政审表第二栏“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里，班主任填写如下：1.家庭出身伪军官。2.父亲和承英伪营长，51年被我判刑劳改，在狱中病死。母亲周静秋现在重庆市清洁运输队作会计，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3.外祖父周士林，工商业，国民党员，伪镇长。姨夫孙淑文伪军官，别动队员，51年被我镇压。姨母周冰若，解放前是小学校长，三青团员。

我的政审表第三栏“学校对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意见”里，班主任填写如下：不予录取。（附有调查材料2份）

审查人：徐××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朝阳高级中学校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65年4月5日

我的政审表第四栏“考区办事处审查意见”里，由谢××填写如下：同意学校意见不宜録取（系红色印章）

时间为：1965年6月11日

当年的高考时间为1965年7月份，可是我的大学梦在4月5日就被扼杀了。

所附两份外调材料，其一是学校党支部向我母亲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发的公函。称：“为了贯彻办学的阶级路线，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请按下列提纲写一证明材料，并请注明材料可靠程度，加盖公章后速寄我校为荷。”

调查材料表中“请查复的问题”栏里，母亲所在单位党支部填写如下：该生的家庭是伪军官成分。该生父和承英系反革命，51年三一三捕在狱中。因肺病去世。曾作伪军营长，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母周静秋系反属，周静秋的父是清水溪镇长，开织布厂，雇有多个工人织布，靠剥削维生。在工作中表现不够大胆，在58年下放干部中抵触不满，有时因她小孩未升学也对政府不满意，说什么考好点的重点学校未考取，就对小孩发脾气，说什么你的成分不好等。在政治学习上很少发言，有时在生活或住房问题上也不满意。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清洁运输队支部委员会

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

姓名	和　[illegible]	性别	女	年龄	19	政治面貌	群　众	家庭出身	伪军官

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	该生入校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差，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敌对的情绪。[illegible]被打击的右派分子。对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有一定的抵触情绪，[illegible]。提出"天才就是天才，聪明就是遗传"的论点，认为政治课是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该生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生活目的是为了吃穿玩，并且思想意识[illegible]，贪恋外国十八世纪的作品，骄傲自大。但该生参加文艺体育活动比较积极，也关心集体，劳动也较肯干。
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详见填表说明）	1. 家庭出身伪军官。 2. 父亲和承英，伪营长，51年被我判刑劳改，在狱中病死。 母亲周静秋，现在在[illegible]市[illegible]运输队作会计，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 3. 外祖父周士林，工商业，国民党员，伪镇长。 姨父孙[illegible]文，伪军官，别动队员，51年被我镇压。 姨母周淑芸，解放前是小学校长，三青团员。
学校对报考高等学校学生的意见	不予录取 （附有调查材料　2　份） 审查人 徐[illegible]　学校章 [中国共产党 [illegible]市朝阳[illegible]中学校 支部委员会]　[illegible]年 6 月 5 日

考区办事处审查意见	同意学校意见 不宜錄取 （盖章）四川省重庆市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组 6 月 11 日
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时间为:1964年8月7日

另一份材料是由重庆印制三厂(我大姨妈所在单位)出具的:周冰若家庭出身工商业,属于反属,做过伪巴县跳磴学校、大渡口九宫庙小学校长,参加过三青团,写了申请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但未批准。其父周世林系伪国民党员、袍哥。其夫孙叔文系反动军人,二九师连长,中训团股长,伪军法科员,别动队员,51年被镇压在汉口。该人系我厂工人,表现一般。此材料供参考。

公章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印制第三厂总支部委员会

时间为:元月29日

孙叔文(大姨夫)一直住在武汉,我从未见过。周冰若(大姨妈)在解放后才回到重庆。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为了阻挡我进入高等学校读书,我的母校、我的老师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我相信,我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姐们,档案里都有同样荒诞不经的材料。我还相信,当年全中国出身不好的学生档案里都有如此材料,概莫能外。

不出所料,高考我落榜了。这一次我已经不像61年中考落榜时那样撕心裂肺地伤心了。因为,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阶级路线等政治运动,承受了学校对我们的歧视、打击之后,我对考不上大学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出路在哪儿?我茫然、惶惑。落榜的出身好的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当老师或进工厂当工人;出身不好的不安排工作。亲戚邻居们都说:“你还不如当初不去考高中,就在电机厂安安分分地工作,到如今都是老工人了。现在,你连工人都当不了哪。”世事多变,谁能预料?

早在1960年已上重庆水利水电学校的哥哥,学业优秀,思想进步。1961年却被下放到沙坪坝苗圃场劳动,是他自己说要为祖国分忧,主动申请下乡的。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时学校把他们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分成第三类、第四类学生,都必须写申请书,然后,统统调整出学校。本来在他中考时,与妈妈一再发生争吵,妈妈执意要哥上普高,因为她希望儿女们都上大学,自己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结果妈妈犟不过哥,哥还是上了中专。哥去了苗圃场后,在那里每天挑大粪、栽树苗,又苦又累,让妈妈心疼不已。而哥却说自己是脚踩牛粪、胸怀全球,就是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他经常教训我们,说出身不好道路可以选择,就是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脱胎换骨。

我弟弟1965年夏由重庆四十中初中毕业,毕业考试他考了全学区第一名而荣登《重庆日报》。但还是被高中拒之门外。他很听哥的话,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他要报名下农村,我哥叫他一定争取第一批去。弟弟于是写了血书申请,哥哥帮助他从家里偷出了户口。妈妈发现后伤心哭泣,她最心疼的就是弟弟。弟弟从小身体不好,高度近视,一只耳朵因小时无钱治病而失聪,人又太老实,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可16岁的弟弟义无反顾地于1965年8月随重庆第一批下乡知青去了四川省达县碑庙

区安云公社林场。后来撤场下队，在七大队四队。弟弟在那里一干就是9年，一直到1974年办理病残知青才回到重庆。其间，每次招工当地的贫下中农总是第一个推荐他，往往又总是被政审关卡住。

1965年12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到重庆招收支边青年，我哥极力怂恿我去，考虑到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犹豫了。当时有规定，只要家中有人下乡了，其他的人就可以安排工作。可我等不及了，因为出身不好我又心高气傲，难以忍受左邻右舍及周围人的蔑视与议论，总想走得远远的，摆脱压在我身上的桎梏。我又想，我的根在云南，那个我从小所向往的神秘的地方，那里有着许许多多失却联系、未曾谋面的纳西族兄弟姐妹，我此去建设我的故乡，以艰苦的劳动与汗水洗刷掉我身上耻辱的印记，只有这样我才会有前途，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憋憋屈屈。我把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默默地不停地流泪，见我主意已定，也就默认了。我哥说："你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就应该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去改造自己。"我的"革命思想"没有哥哥和弟弟那么完全彻底，我们家的孩子好像都继承了我父亲那种有理想、有抱负、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的基因。

我心痛孤孤单单的母亲，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临走，倒是母亲反过来安慰我，她咽下了眼泪，叫我听领导的话，一定好好干，不要忘记努力学习，并嘱咐我带上学习的书籍。于是，在1965年12月25日我带着艾芜写的《南行记》上下册；陆天明的《边疆晓歌》；带着高中的一些课本；带着母亲的祝福，踏上了载着我们命运的列车，怀着我们对理想、前途的热望奔向云南。在那里，我品尝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见识了社会的千奇百怪。在那里，我失去了天真，也找到了所爱。

1980年初，我和丈夫逃也似地离开了我整整待了十五年的云南。在列车上，我心潮涌动，默默地叨念：再见了，云南，我父亲的故乡，这浸透了我青春汗水的地方！再见了，昔日的理想、爱情、欢乐与痛苦！再见了，我的云南朋友们！再见了，我的那些尚未寻找到的纳西族亲属们！列车开动，我的泪水滚滚而下。

我随先生到了他的家乡工作了十二年，于1992年回到了家乡重庆。虽然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但仍改不了从小就顽强、向上的心性。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已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大学学业，取得了中级职称。曾在全国及西北五省卫生经济年会上发表过有关医院经济改革、医院经济管理多篇论文，在全国及省级报刊杂志也发表过多篇有关卫生经济改革的文章。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于1994年考取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同年进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1996年考取了注册土地估价师，取得司法鉴定资格。通过不懈的学习，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哥哥与弟弟也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弟弟学环保专业，是一名环保工程设计师；哥哥是一名园林工程师，曾因为云南世博园中巴渝园的建造获得了全国金奖，几年前考取了注册监理工程师。还当了十几年的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都实现了母亲

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三兄妹在过去的年代，因为血统论被抛在了社会最底层，备受煎熬。但是我们没有沉沦，各自都走过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在命运强加给我们的职业与环境中做出了成绩。有位诗人说过："在一切逆境到来时高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斗转星移，时光像流水淌走了我们的忧伤，淌走了我们两代人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记忆未曾忘却，时时萦系在我的心头。后来得知，我做了几十年的关于户口的噩梦，当年的知青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回城好久了都还在做这种梦。幸而，梦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愿历史不会重演如昨。



和蓥，女，纳西族。1965年于重庆朝阳高中毕业，当年支边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前哨分场八队。1969年调思茅地区文工团，1972年于云南省财校毕业。1980年调入陕西，1990年自考获陕西财经学院文凭。1994年考上中国注册会计师，1996年考上土地估价师，获司法鉴定资格。现在重庆中凯会计师事务所。



几经挫折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背上的“原罪”竟是那样沉重。



无声的群落

WUSHENG DE QUNLUO

卷二 脱胎换骨路漫漫

“脱胎换骨”路漫漫

李自森

“人生没有笔直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人们常说的话。几十年来，我与父亲两代人走过的人生路如出一辙，正好是对此话的一种诠释。

一


本文作者

我的父亲出生在四川省达县地区穷乡僻壤的农村，祖祖辈辈是佃农。他六岁给地主的儿子作书童，伴读，上私塾，念小学，凭着过人的天赋，通过不断的拼搏，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到了重庆谋生，后来娶了大资本家胡子昂的妹妹为妻，成了地主。这样，他脱胎换骨，从“被剥削者”变成了“剥削者”，由达县人变成了重庆人。由于出众的才干，父亲仕途亨通，他加入了国民党，当过国民政府合江县征收局长，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1949年后，父亲先在西南贸易部工作，继在四川省对外贸易局工作，后来调到重庆合作商业局。最后在重庆棉麻站工作至退休。

我出生在喧闹繁华的山城重庆，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是地主的儿子，是国民党员的儿子，1964年高考自然落榜，上山下乡去了达县地区。经过顽强努力，我在那里入了团，参了工，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脱产读了大学，追求进步二十多年入了党。我娶了工人的女儿为妻。这样，我彻底脱胎换骨，从“二等公民”变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居然当了达县外贸局局长，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退休。四十多年过去，我由重庆人变成了达县人。两代人

的经历真可谓“脱胎换骨”路漫漫。

1964年8月，我在重庆名牌学校重庆六中（现名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除了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外，还是学校篮球队长、校报《朝霞》主编、班上的英语科代表兼语文科代表。我踌躇满志，十分自信：不是大学选我而是我选大学。殊不知自己竟名落孙山，升学无门。一时我陷入迷惘，幻灭，在学校十几年正统教育中接受的信念濒于坍塌。

那时的重庆城，毛主席的教导天天在播放——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董加耕、邢燕子的事迹到处在宣传——农村是天，天高任鸟飞；农村是海，海阔凭鱼跃。达县来接知青的人更是绘声绘色地在各个街道办事处鼓动——大巴山人杰地灵，是革命老前辈王维舟、张爱萍的故乡，是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成千上万红军将士浴血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大巴山的山水一定能把你染红。

我从困惑中醒悟：骏马得在崇山峻岭中奔驰，蛟龙得在惊涛骇浪中遨游，雄鹰得在狂风暴雨中搏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得走脱胎换骨之路。九月初，我告别了山城，告别了父母，父亲百感交集地说：“孩子，去吧，去老家恢复祖业吧。”我随着那成百上千的知青大军奔赴达县，来到了地处该县边缘的新桥公社林场。

二

林场建在达县、开江、梁平三县交界的连绵起伏的群山里，一个当地人叫鹰嘴岩的石峰下面。这里，传说几百年前是乡民躲避匪祸的山寨，山门上依稀可见“天音寨”三个字。这里，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枯树横弋，荆棘遍野，常有麂子、野猪、野兔、豹子出没。建场初期，我们常听到麂子在夜里凄凉地哀鸣，我们曾目睹野猪偷吃包谷留下的一片狼藉，我们在大白天曾亲眼看见豹子叼着小猪逃窜。

第一年，林场有26名知青，分别来自重庆、达县城关、万家公社街道。场长叫颜鲁海，是当地农民，四十开外，复员军人，据说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受知青爱戴。

白手起家建林场，艰苦到极致，创业之艰辛不堪回首。

由于我们住在大山上，所在公社无粮管所，几乎每两天就得派人到二十多里外的万家公社挑米，购油，风雨无阻。

煮饭没有灶，我们与当地社员一样，沿袭古代人的方式，在屋梁上吊下一个可以升降的铁钩，将铁罐子挂在钩上，底下生火。头几个月知青炊事员刘俊芳、周志英缺乏经验，煮的饭不是生就是煳。吃饭无好碗。无论是饭碗、菜碗，统统是从山下碗厂捡回来的缺碗，那些土碗有如出土文物。

长期没菜吃，几乎顿顿是盐巴米汤泡饭，当地社员没种菜卖的习惯。有时社员送点腌菜，也是杯水车薪。

解手无厕所。林场二十多人仅有一个用茅草搭的"人"字棚，一个蹲位，棚口又无遮挡，常常发生"撞车"。多数知青解手是在一人多高的茅草地野外作业。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常哼着：大雪满山坡，屎胀莫奈何，风吹屁股冷，留到明天屙。更让人为难的是，解大便没有手纸，知青被迫学当地农民，用篾片刮。

住宿更麻烦。几十个人住在一个长二十米宽十多米的大茅草屋里，屋的四周及中间隔墙都是不到两米高的土墙，四面透风，地面是原生态的地，不少地方仍长着青草。每人一架小床，铺上稻草、席子或床单，挂上安置办公室发给的小蚊帐，盖上"安办"发给知青的薄棉被，睡到天亮周身都是凉的。因为潮湿，床下的鞋子两三天不穿就要生霉。饥饿成天伴随着我们，寒冷随时袭击着我们，政府发的每月两元钱生活补贴实在捉襟见肘，男场员的头发几乎都是相互用剪刀理成清一色的"马桶盖"，相当多的场员只能用盐巴刷牙。城市与农村，如此大的生活落差时刻考验着我们，我们坚持着，咬紧牙关挺着。一天天，一月月，我们深深地明白，脱胎换骨就得闯过生活关。

当时，我们曾创作演出过"诗朗诵——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

山城的儿女啊，
扎根在红色的巴山。
三个石头砌个灶，
茅棚里面把家安。
喝的是高山的清泉，
吃的是盐巴米汤下饭。
说苦，比城市里难道不苦！
苦中有乐，我们仍然觉得幸福。
说甜，比旧社会难道不甜！
甜中有苦，我们更不忘幸福来之不简单……

几个月后，我们搭起了厨房，建起了大灶，盖起了"猪楼"，有了厕所，基本上解决了"进出口"难题。一年半后，我们修建了一楼一底的瓦房，得以安居乐业。

三

林场，顾名思义应该是育林，造林，护林单位，可是上级要求我们在一至两年内达到粮食自给，经济自立。国家将在一两年后取消每月六元钱的伙食补助和两元钱的生活补贴，简称“断奶”。

不管叫林场还是叫农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大面积的开荒种粮自然是当务之急。寒露胡豆，霜降麦，农时不可误，季节不等人。几十号人紧锣密鼓，早出晚归，烧荒挖地，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成天腰酸背痛，双手打满血疱，我们坚持再坚持，决不退缩。公社党委刘廷寿书记带领公社干部上山支援开荒，武装部杨启富部长带领公社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来开荒挖地，接受监督改造。我一看这些“五类分子”，除了十几个老头和中年人外，其余都是年轻人，特别是还有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有点纳闷，怎么这点年纪也是“五类分子”呢？中午吃饭时，一打听才知道，那些老“分子”年迈体弱上不了山，由他们的儿孙来顶替。我恍然大悟，这叫父债子还。短短二十多天，我们就开荒整地好几十亩。

为了解决种子难题，我与五位场友远征南岳公社挑麦种。从林场到南岳往返有一百多里地。那天，天下着小雨，山路很滑，我穿着一双长筒胶靴，一大早就出发下山。中午，赶到南岳已深感体力不支。吃过中饭，挑起六七十斤的麦种往回赶。上路不久，肩膀就开始痛起来，于是把担子在两个肩头之间换来换去。硬是迈不开步，一路上总是掉队。我咬紧牙关走了 15 里地，到了大树公社，两只胶靴有如一副铁镣，寸步难行。于是我脱了胶靴，成了寇准背靴，赤脚大仙。场友黄昌政是本地知青，他比我年长体壮，帮我挑起了胶靴和衣物，我顿感轻松了许多，步子也快了点。走出大树公社场口，踏上那碎石路，赤脚经不住渣石的折磨，不能走了，只好又穿上胶靴。哪里知道脚上的泥没洗干净，那泥脚在胶靴里滑来滑去，脚又痛起来了。此时此刻，腰酸，背痛，腿软，脚底有如针刺。我咬牙跟着走，老是跟不上，雨水、汗水、泪水混在一起不停地往下淌。好不容易才走到万家公社，在昌政家洗了那已是血肉模糊的脚，换了双解放鞋，又把口袋里的麦种倒了些给昌政，再一同去追队伍。来到山脚下，天也快黑了，我给昌政挥挥手说，老哥，我不行了，你挑得重，先走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说：“我先走了，回场后再下来接你。”

陡峭的山，崎岖的路，我爬一阵歇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半山煤厂。天已黑尽，我终于倒下了。等到战友们打着火把将我接回去，我似乎只有一口气了，躺倒就睡。第二天我坚持参加播种，那麦种播在土里，那麦种永远种在了我的心里。

播种结束，进入农闲。为了给林场创收，我们又组织了副业队下山挑煤。半山煤厂到山下碗厂有五里多路，我起早贪黑从每天挑五趟到挑六趟，从每挑 100 斤到 120 斤。

一个月后，肩上磨破的皮、脚上打起的疱都好了。在此期间，我又学会了使用打杵，有了打杵，我每挑都在150斤以上。生产队的社员和碗厂的工人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知青崽儿硬是不简单。"我心里明白，我要用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灵魂，若要脱胎换骨，就必须闯过劳动关。

脱胎换骨需要正式的认可。下乡不久，我就向公社机关团支部交了入团申请书。这是我继初中、高中后第三次申请入团。

到林场一个月，场长颜鲁海在会上宣布：经请示公社党委同意，任命李自森、连丽先二同志为林场管委会委员。我心里洋溢着受到组织信任的喜悦，干劲倍增，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下山挑米，上山施肥，特别是推磨，将购回的包谷在社员家的直径约七十公分的大石磨上磨成粉几乎成了我的专利。不少场员转上几圈就头晕目眩，我一推就是半天，甚至一天。我嘴里说推磨不晕，其实，那也是把昏与累藏在心里而已。

更考验我们的是那次山林火灾。那天，场员陈国清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烧山时火巷没有留够，一点火又遇上风，酿成山火，整个山林一片火海。火光就是命令，明知火烧人，偏要闯火海。几十个场员冲向火场，我冲在最前面。见到陈国清还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叫唤："我要去劳改了，我要遭劳改了！"我不由分说，冲上前踢了他两脚，"赶紧起来灭火！立功补过。"

我们几十人每人摘下几根松树枝，用它们扑打火苗。眼看火快扑灭，我们稍微松劲，火又燃起来了。火仍在蔓延。累，真累惨了。口干，似乎喉咙在燃。忽然一阵大风，火借风势，死火复燃，四面是火，大火险些将我吞噬。衣服着火了，在地上滚灭，后来我干脆脱了衣服，赤膊上阵。颜场长不停地高喊："大家再加把劲，决不能让火翻过山，不然就扑不灭了。"大家拼命，真的拼命。我的身上已经散发出那烤乳猪的焦味。说来也怪，也许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上帝，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有老天相助，我们在山梁上终于挡住了野火。几十个人全部躺在山梁上，至少半个小时，没有人说话没人动。望着梁那边连绵的原始山林，那一片接一片的竹山，我真是不寒而栗。看看一个个烧焦头发、烧光眉毛的场友，宛如麻风病人，我险些见到死神，我的"胎"、我的"骨"，连同我那"阶级的烙印"差点被熊熊烈火烧为灰烬。

两个月后，公社党委刘书记找我谈话："重庆知青中，你表现不错，还需要坚持，公社准备发展你入团。"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算看到了脱胎换骨的希望。

四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开始了。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四川省在达县地区试点，达县地区又在达县试点，我们公社首当其冲。社员们在喊"运动了，运动了"，我们也

在喊“运动了,运动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仅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知青来讲,啥子叫运动,一问三不知。过去只是耳闻:土改运动给他爹戴个地主帽子;三反运动给他爹戴个不法资本家的帽子;肃反运动给他爹戴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反右运动给他爹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想:我都下乡戴了农民的帽子了,还可能戴个“外星人”的帽子吗?没有谱,难免有点紧张。后来一打听,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首先让所有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逐个接受社教工作队、组的审查,问题搞清楚了才让出来工作,这叫干部“洗澡下楼”。

很快,社教工作组进驻刚建几个月的林场。一夜之间,场长颜鲁海、副场长赵平顺被责令停职审查,我和几个成分不好的场管会委员被免职,接下来是林场场员按成分排队,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除了冯在兴、刘方明、周锡蓉、陈泽兰等几个十四五岁小知青成分好外,其余是一挑沙罐下岩——没得一个好的。这些人不光是资本家和所谓地富反坏右,还有其他诸多头衔,如国大代表、绥定府中级法院院长、国军师长、黄埔N期少校、国军连长等等。工作组很快任命冯在兴为副场长,上述几个好成分组成了新的场管小组。

林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彻底打乱了。一时间,我感到天低云暗,空气变得如此的紧,让人喘不过气来。

工作组罗组长是巴中最偏僻的公社大队小学校长。他工作一丝不苟,总想在林场揪出几个“四不清“的干部。他带领四个文化都在初小以下的好成分知青,天天晚上组织我们学习。台上五个人一盏马灯,台下二十来个人围在火堆旁靠柴火照明。台上,罗组长天天念文件,翻来覆去地念,冯在兴就跟着罗组长说,虽然磕磕巴巴,但总还可以翻版。刘方明就是那几句:无产阶级打江山,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我就是无产阶级。两名女领导几乎一言不发。下边的人鸦雀无声。这样的会维持了几天。

这天,全体场员下公社参加民兵组织成立大会。碗厂工人和林场场员大家整整齐齐站在操场上,公社武装部杨部长讲话后宣布:“从今天起,公社机关成立了新的民兵组织,碗厂是基干民兵连,林场是民兵直属排……任命冯在兴为直属排排长。下面请冯排长讲话。”冯在兴雄赳赳气昂昂上台就讲:“我们林场现在正式成立了民兵组织,我们叫植树造林排,我们的任务就是植树造林。”下面一片哗然,捧腹大笑。杨部长瞪了他两眼,大声纠正他:“直属排,直属排。”小冯仍然不理解:“植树排就是植树……”杨部长骂人了:“奶奶的,立正!散会!”人散尽了,冯排长愣头愣脑地还站在台上。

工作组罗组长主持的学习会天天晚上照例开着,他念完文件,冯排长不说话了,刘方明话自然多起来了。他说:“我就是无产阶级,我一无所有,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我没读过书,不像我们万家坝大地主梁子中,他把万家坝的好田好土占了一大片,他儿子还读了清华大学。我们林场还有些地主儿不老实,硬要安排我放羊,工分是最低的。”刘方明的话含沙射影刺伤了场员梁尤仲(梁子中是他伯父),梁尤仲立马在下面讲起了刘家

的故事：刘家祖上在万家坝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富人，有田土、产业。到了刘方明父辈，不争气，成天赌钱，吸鸦片，家业一天天衰败，到解放前几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土改时，他家当然是响当当的贫民啰。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街上的人说是他爹救了他，不然他也不是贫下中农。听完梁尤仲讲的一席话，我暗自思忖：这真是一个富人变穷人脱胎换骨的故事。梁尤仲的回马枪显然击中刘方明的要害，以后的会上，就很难听到他作报告了。

工作组罗组长组织的学习会仍然在艰难地进行。台上其他四个好成分，一个二个不说话，成了他的独角戏。已经几天一个样，文件念了又念，几个小时没人发言，纯冷场。这天，夜已经很深了，在场的场员有的睡醒了一觉，有的仍在闭目养神，连台上的人也在打哈欠了。罗组长终于按捺不住性子，拿出在学校训学生的把式，一拍桌子，一声大吼："不许打瞌睡，开会不发言，成何体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话一落音，屋角传出一个悠长的响屁。整个会场顿时喧笑起来，几个胆子大的知青趁机开了腔："这个同志配合领导很及时，领导喊放屁就放屁。"接下来的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会场上屁声大作，长屁、短屁、连环屁，此起彼伏，小青年们肆无忌惮，笑得前仰后合。笑声之中，罗组长愤然退场。以后连续几天晚上开会，都是屁声不断，几乎没有几分钟的消停。的确，那段时间，林场主食是红苕，吃了胀气。场员们对现状又有气。颜场长是"四清"还是"四不清"悬起的；几个工作积极能说会道的场管会委员又莫名其妙被免了职。成分好、没文化、不会说话的坐在台上；成分坏、有文化、会说话的坐在台下。只有屁响，而无发言，很自然。

这天晚上，罗组长又恼怒了，骂骂咧咧地说："知识分子还要打屁，今天晚上，我们就讨论'屁'的问题。"会实在开不下去了，罗组长也厌倦了。从此很少开会学习。

"社教"期间，知青们照常聚在一起，或在火旁，或在月光下。林文澜、王小林动情地唱起了忧伤的歌：

>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天啊！
> 亲爱的故乡，
> 望了又望，眼睛都望穿啊，
> 美丽的故乡，
>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
> 我不是不爱你呀，
> 亲爱的故乡，
> 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
> 要离开你呀，到远方。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从未离开过家的小知青们常常以泪洗面，一个人哭马上引来一群人抱头痛哭。

场员们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时时感到凉如冰霜。连日的大雪铺天盖地，我们的心情更是霜上加雪。这天半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厨房被一尺来厚的积雪压垮了。借助油灯的光亮抬头看，大家不约而同地声声尖叫。哎呀！不得了喽，只见那茅棚的脊檩以及其他好几根檩子被积雪压成U字形，有几根柱子也变弯了，似乎整个茅棚即将垮塌。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我顿时直冒冷汗。撤也无处撤，躲也没处躲。颜场长用电筒四处观察，对我们说，中间堂屋因长时间生有火，棚上积雪要薄一些，檩子明显弯得小一点。他当机立断，命令大家统统穿好厚衣裤，立刻到堂屋去，多生两堆火，烤火。我们迅速到堂屋，围坐在火堆旁。刚坐定，又一声巨响，女生寝室又垮了半间。真是太险了。此时此刻，北风呼啸，茅棚不时吱吱地响，我们心里格外紧张。杨胖子和几个女场员呼爹喊妈地哭成一团，惊恐，抱怨，哀叹，空气异常凝重。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必须立即振作精神，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我立马与赵场长商量，一拍即合，赵场长招呼大家："来来来，来唱歌！"他与我率先唱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接着大家齐声唱起了："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激昂的歌声一首接一首，歌声在夜空回荡，我们的心暖和多了。一直紧绷着脸的颜场长，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一定会住上高楼大厦。"我暗自沉思，说得有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日子一定会实现。

天亮了，雪住了，我们正忙着用准备盖猪楼、厕所的木料去撑那些弯得厉害的檩子。忽然，炊事员刘俊芳哭兮兮地跑来说，厨房的碗全部被打得粉碎了。我说："哭啥子嘛，反正都是些烂碗，破碗破摔没关系，只要我们人不出问题，不破人破摔就行了。正好昨天我收到哥哥从青海寄来的20块过年钱，我马上下山去买新碗，送给大家。顺便还买点肉回来，庆贺我们躲过一劫。"颜场长点头一笑，我拿根扁担，张文敏背个背篼一同踏雪下山，去为大家找回一点好心情。

面对着运动中遭受不公的待遇，面对林场严峻的局面，我脱胎换骨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工作组来林场不久，我再次向工作组交了入团申请书，主动接受运动的洗礼。林场的社教运动出现如此局面，公社社教工作队黄队长十分生气。大概因为黄队长是巴中县税务局局长，长期生活在城市，对知青上山下乡有相当的认识。来新桥后，又多次与林场知青比赛篮球，对知青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狠狠地批评了罗组长，怎么能按照你教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办法来对待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大城市来的知青呢？那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中也有表现好的，要求进步的嘛，哪能统统一棍子打死呢？黄队长又找来了林场颜场长谈话，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打消了颜场长离开林场回家种地的念头。黄队长还是个篮球迷，常常邀我参加他们工作队的球队对外打比赛。我马到成功，场场皆胜，黄队长十分欣赏。他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我，鼓励我争取进步。

罗组长再度上山，很快颜场长、赵场长恢复工作。接着我和几个被免职的场管会委员复职，林场又恢复了生机。

不久，工作组罗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你交了入团申请书，年轻人要求进步是对的，关键在行动。"接着他又说："林场有人反映你每天在学英语，是想偷越国境跑出国？"我说："学英语是事实，但是绝对没有想跑出国。"他说："你在林场学点林业知识、农业知识方面的书是对的，读英语是为啥呢？不学行不行？"我很快意识到，任何解释都徒劳，似乎我学英语是犯了错误，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学了。"罗组长笑了，说："这就对了。"从此我就把英语知识还给了老师。英语不敢学了，但我求学之心不死，仍悄悄地坚持自学中文。1965 年秋，我参加西师函授考试，被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读完一学期，却又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次交了入团申请书，罗组长又找我谈话，这次是关于我父亲的问题。他十分严肃地问："你父亲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家里很穷，为什么能读大学？为什么又能娶大资本家的妹妹做老婆？"我一五一十地给他讲述了我父亲从贫下中农到地主的故事。

我的父亲祖祖辈辈是达县地区渠县琅琊乡的佃农，幼年时，在乡里有神童的美誉。他六岁给地主老爷的儿子蒋道彬当书童，读私塾，作伴读念小学，背两个书包，做两份作业。13 岁时恰逢伪政府要装点门面，重庆川东师范在上川东和下川东取两名穷家子弟读公费生，我父亲有幸考中。毕业后，随本乡地主孙老爷的儿子孙定远（王维舟的学生，地下党员，烈士）出川，给孙定远的南京医社当收费员，后由孙定远资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一年后，孙定远被军阀孙传芳捕杀，父亲也难逃牢狱之灾，经校方保释才出狱。出狱后，父亲衣食无着，只好休学教书一年，再复读一年，再休学再复读，历时八年才大学毕业。毕业后，回母校重庆川东师范教书，同时兼授重庆女师的课，这样我父亲结识了川东师范的校长甘典夔（甘是军阀刘湘的血亲）。后来刘湘任四川省主席，甘即升任省财政厅

长，为培植亲信，委任我父为合江县田赋管理局局长，后又任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父亲在重庆女师授课期间，通过在该校读书的胞妹认识了正在该校就读的胡家幺小姐（胡子昂的胞妹），上演“师生恋”，遭到胡家举家强烈反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此事眼看成泡影。关键时刻，父亲一封求婚信直送胡家老爷。胡家老爷系清末秀才，办学教书几十年，他读信即眼前为之一亮，甚赞信的文笔，更对信上一手工整的毛笔字倍加称道：此后生就这一手字这辈子不会受穷。态度急转。于是派胡家大小姐率人赴渠县，微服私访。父亲得此信息，连夜派人赶回老家，托当年伴读的同窗蒋少爷巧作安排“借鸡下蛋”。胡家大小姐一行由父亲的胞妹带路到了老家，直奔蒋老爷家。我家爷爷早已身着蒋老爷的服饰，头戴蒋老爷的瓜皮帽，正坐堂屋，一言不发，概由蒋少爷张罗，给胡家大小姐介绍：这是李老爷的寒舍，这一弯弯是李老爷的田，那一片片是李老爷的地（其实都是蒋老爷家的田、地）……胡家大小姐一一记在心中，很快返重庆如实回禀“可谓门当户对”。胡家老爷欣然答应此门亲事。择良辰吉日，我父母终结秦晋之好，购置田产，脱胎换骨，由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

罗组长听了我讲的故事，似信非信。后来，工作队黄队长也问过我一次，听后深信不疑。黄队长说他老家有位同学，是贫农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到部队，被一位将军的女儿爱上了，结了婚，现在这位同学已是副师长了。

打那以后，我每月交一次入团申请书，先后交了八次，直到社教运动快结束时，为了体现社教运动能把“五类分子”的子女改造教育过来，展示运动成果（当时我们林场二十来个坏成分知青中仅有我一个人写了申请，在争取入团，全公社的“分子”子女几百人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写申请争取入团），1965 年 5 月 10 日，在社教工作队黄队长的亲自关怀下，团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并上报公社团委。没几天，我们林场其他三名新团员和公社各大队上报的新团员都批下来了，我的申请却没有批。我去支部书记老余那里打听，结果大吃一惊。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连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同时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又过了两个月，知青陈开益、杨丽君申请入团，团委很快又批下来了。老场长颜鲁海实在看不下去，找到公社最后一个“下楼”的领导党委刘书记，说：“李自森的进步问题直接影响着林场那一大片成分不好的场员的思想。”在刘书记的过问下，又过了两个月，到 9 月 12 日，公社团委才批准我入团。我终于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第一步。我既激动又高

胡子昂给外甥李自森的亲笔信(一)

胡子昂给外甥李自森的亲笔信(二)

兴，立即将此好消息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大舅父胡子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很快收到了大舅父的亲笔回信。老人家在信中说："我们祝贺你到山区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但每个人的前途是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先后八次申请入团，不怕丢面子，不怕碰钉子，一心向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这更算得一项值得称许的过硬本领。但是必须看到，入团是开始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一直到申请批准入党，一直到入党以后，不骄不躁，永远作一个党的忠实儿子。"舅父的教诲有如指路明灯，我进一步看准了前进的方向，随即向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

五

1965年的春夏之交，鹰嘴岩下早已是一片苍翠，希望的田野上，麦浪滚滚，金黄连着金黄。间种的玉米苗长势可爱，青菜萝卜郁郁葱葱，丰收在望。小鸟叫个不停，场员们歌声嘹亮。

在阵阵欢迎声中，新一批重庆知青来到了咱林场。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达到了38人。公社又派了一位曾担任大队会计的年轻干部来林场任场长、团支部书记，老场长改任指导员。林场成立了团支部，设立了农业组、林业组、畜牧组、副业组、后勤组。组织机构日渐完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

我负责部分副业组的工作。我先是带领邓光军、张延统两名新团员赴大队碗厂学做碗，不到两个月，林场又抽我带领王小林、杜光明、安定、黄昌政到深山老林的"老洼沟"利用大办钢铁时留下的废煤井办煤厂。"老洼沟"真像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夹皮沟"，离林场、离公社、离万家坝都有十多里，周围极少人家。白手起家办煤厂之难，可想而知。我们聘来了厂长，招聘了工人，大家齐心协力搭建茅棚，整理煤井，完善设施，很快投入了生产经营。我做煤厂会计，卖煤，其余几位场员下井拖煤。

煤厂是"原始人"的部落，一群"原始人"在这里淘金。每天，几个全裸的男人围着火炉穿脱，换上窑衣窑裤，包条头布，头上插个桐油壶点火照明，下井。钻过几千米高不过80公分的巷道进入工作面，挖煤，拖煤。下班出来赤条条地洗澡，吃饭，有时是一丝不挂吃了饭才洗澡。知青们也是一样，经常是一脸黝黑，只见两只眼睛在动。日子一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日复一日的工作是：生火，做饭，烧洗澡水，过秤，记工，卖煤，收款，记账，发工资。三十来个平方的煤坝子有时要堆几万斤煤，还得将出班煤一铲铲甩到几米高的煤堆上。我常常从早干到半夜。偶尔，因运煤工排班排不过来，我还得下井去拖煤。

场友们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一个人一干就是一年多，几乎寸步不离煤厂，煤厂里经常

只有我一个人。到夜里，那一大片山沟也只有我一个人。北风呼呼地吹，井水潺潺地流，不知名的野物声声嘶叫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止一次独自流泪到天亮。最难熬的是春节，每逢春节倍思亲。上年春节，我与场友们在一起，或打篮球，或下生产队演出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冲淡了许多感情的东西。而今在煤厂，放厂停工了，工友们、场友们都走了，我既要守煤，又要守厂，寸步难离。失群的孤雁啊，真的度日如年。背叛家庭，脱胎换骨，经受考验，只能把那浓烈的想家之感，思乡之情强忍于心中。场部常派场友送来年货，转来邮政信件，陪我半天、一天。场友一走，涛声依旧，我又重复着孤独。亲人、同学的来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止不住的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流。一把破二胡，拉着那《牧羊姑娘》、《康定情歌》、《数九寒天下大雪》、《思乡曲》度过这多愁善感的日子。

公社党委刘书记，林场颜指导员经常写信鼓励我："要坚持，要挺住，党是相信你的。"在那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我总是向前看，水是凉的，我的心是热的；煤是黑的，我的心是红的。我的心中燃烧着征服未来的熊熊烈火。

由于我们经营得体，管理精细，也由于煤矿的煤层厚，煤质好，产量高，销路畅，煤厂成了林场的经济支柱。滚滚财源流到林场，加速了林场的建设，提高了场员的待遇。我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林场领导和同志们的称道，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赞扬。我先后出席了达县地区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和共青团达县第五次代表会。我更坚定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的信心和实现脱胎换骨的决心。

久已期盼，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1966 年 6 月 29 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党支部大会。开会时，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吴国全说："今天我们准备讨论发展五名新党员，他们是王帮杰、周锡蓉、陈开益、冯在兴、李自森。我们一个个地来。""听说今天要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像触电一样紧张。"（摘自我的知青日记）

讨论入党，程序比较多，三个下来就到了半夜两点钟。吴书记征求了一下刘书记的意见，说："今天的支部大会就开到这里，余下的同志下次会议再讨论。"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我这类的青年人，真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回到煤厂，我更加干劲冲天，忘我地工作，期待着"下次会议"。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下次会议"一等就整整等了 20 年！

在林场当知青是我人生的起点，艰难困苦的磨砺铸就了后来的坚强。自那次参加入党审批会，仿佛我就是个党员了，我始终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后来的"文革"中，在插队落户期间以及参工后，我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从基层到县委机关工作，做到了永不掉队。1985 年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以高出录取线 160 分的成绩上了大学，圆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梦，证明 1964 年的不录取是"历史的误会"。1986 年，我在达县党校参加了苦等 20 年的"下次会议"，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我用22年的艰辛，终于甩掉了父亲“脱胎换骨”从贫农到地主给我背上的沉重的“成分”包袱，完成了一个逆向“脱胎换骨”的过程。

入党一年后，我就担任了达县外贸局局长、书记；三年后，上调地区外贸局工作，后又担任了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直到退休，加入达县地区（现称达州市）离退休老干部的行列。在红色的大巴山，我献了青春，献了终生，实现了展示老知青才智和捍卫老知青荣誉的心愿。

六

悠悠岁月，无论当年有多么困惑，总让人时常回忆。林场的山山水水并不秀美可爱，总叫人有挥之不去的思念。是爱，是恨，是怨？说不清，道不明。几十年来，我和场友们多次回那受苦受难的山村，一踏上那条路，便顿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1986年，我和一些当年的知青伙伴一起相约回到林场旧址。当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盖起的楼房没了踪影，我们住过的茅草棚荡然无存，那些屋基和球场已遍布杂草，那成片成片被开垦的土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芭茅草，那当年栽的成千上万棵树一棵也不见了，路也没了。唉！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蓝天还是那片蓝天，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个梁。啊！五年多的血汗付诸东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该向谁去讨回那逝去的青春？

1995年，我与知青战友带着爱人和孩子再次回山村。本打算登山赴林场，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且没路可走了。大家站在山间，喘着粗气，望着山巅。曾经读过我的《知青日记》的女儿感慨地说：“当年爸爸能挑100斤的大米上山简直是个奇迹。”我接着说：“如今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真事。”

归途中，女儿向我提出一个十分严肃而且很尖锐的问题：“看到你们这些知青叔叔孃孃，一路上谈笑风生，亲亲热热，你们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五年多，怎么就没有一对耍朋友？更没有一对结为夫妻呢？”我艰难地回答了这个沉重的话题。“当年，我们林场真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们这些知青的身上几乎都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扭曲的灵魂让我们有爱却不敢爱，只能残酷地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设想，如果两个需要脱胎换骨的知青坠入爱河，后果就严重了。”女儿非要一问到底：“有好严重？”我只得简而言之：“当时，我们知青们都有共识——地主儿娶地主女儿等于大地主家庭；地主儿娶资本家的女儿等于大资本家家庭。那他们的子女肯定升学无门。地主儿娶工人的女儿等于上中农家庭，那他们的子女升学就有希望。你就是属于后者，所以你能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在场的知青们笑了，那些孩子也笑了，我女儿很不服气地说：“我可是硬考的，高考分超过重点录取线几十分，并不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共产党的书

记，根红苗正，我才读成的！”我抱歉地说：“当初，我们哪里知道现在不讲成分了呢？”

2007年10月，我们林场23名战友聚首达县，共庆下乡43周年。在专程从深圳、成都赶来的孙世谋、程裕坤的倡导下，大家再赴魂牵梦绕的林场，来到山脚下，遥望鹰嘴岩、天音寨，年过花甲的场友们“畏途巉岩不可攀”，望而却步。我们来到老场长颜鲁海的坟前，挥泪烧纸，祈祷，追忆当年他带领我们艰苦创业的情景。仰望苍天，缅怀英年早逝已离开我们十多年的其他四位战友，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些“脱胎换骨”的同行者。他们当中，有的始终未能改变不幸的命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有的身体经不住“脱胎换骨”的磨炼——当年女知青标兵唐善莉，30岁便瘫痪，40过点便撒手人寰；当年体壮如牛的知哥黄昌政，而今刚满60就拄着拐棍，行动艰难。有的冤里冤枉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走这“脱胎换骨”的路——知哥邓光军，其母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后来落实政策时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丁点资料说明她是右派，原来她不是右派，仅是一个误会。知姐王能旭，其父解放前为国大代表、城口县副参议长。解放前夕，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军，为城口县的解放作出贡献。解放后，其父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工作，任城口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一副主席。然其好景不长，1952年其父以政治土匪罪被城口县法院判极刑。37年后的1989年，城口县人民法院一纸判决，“原判的政治土匪罪科处，显然不当……撤销原判，应予纠错”；其母曾因不实和不应定罪的罪名被判历史反革命罪、现行反革命罪，1987年达县市人民法院一纸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父母都得到平反昭雪。得知战友们的那些情况，我的心真的在流血，深感自己原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算是成功者，那这种成功如履薄冰，机会太小了。在那漫漫脱胎换骨的路上，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旋涡。身背沉重的成分包袱的知青们，“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有幸倚仗着重庆求精中学打造的校篮球队长和校报《朝霞》的主编那一武一文两根拐杖踏冰前行。1971年，凭着出类拔萃的篮球技艺和近乎疯狂的亡命拼搏，我入选了达县业余篮球代表队。以知青为主力的达县男、女篮球队在地区运动会上一鸣惊人，双双夺冠，改写了达县篮球的下游历史。我随十多名知青球员首批被特招参工到达县商业局。正在庆幸当权派执行阶级路线网开一面，得知商业局按成分排队分配我们去下属公司，成分好的到棉麻公司、日杂公司、干果公司，差一点的到农资公司，我是最差的分配到废品公司。我想，需要脱胎换骨的我，在当权者眼里属于“人中废品”，自然该去管那些需要再生的废品，也许这叫对号入座，物以类聚。

同时被招为工人的知青球员，到各公司报到后，粮食定量几乎都是27斤或30斤，工种为业务员、采购员、保管员，唯有我一个人很受“关爱”，粮食定量为43斤，工种为打榨工。公司安排我去了废品仓库，操作古老的人工打榨工具。没过多久，又安排我去废品加工厂当铁匠。我暗自好笑，让一个从12岁起就戴一千多度散光眼镜的人去打铁，真可

谓闭眼瞎遇到睁眼瞎。但我二话没说，服从安排，且好好地干，因为我有七年知青蹉跎经历垫底。我拿出当知青一小半的劲，就被大家评为公司先进。我感叹着："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我指望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大地，运动不断，革命在继续。1971 年 11 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上级要求各单位必须张贴标语，办好大批判专栏。公司周经理为找不到人办此事而发愁，想起了李铁匠，急招我回公司，问我会不会办专栏，我犹抱琵琶半遮面，心里一阵窃喜，应承了这差事。很快，横幅大标语拉上大街，大批判专栏如期上墙。上级领导赞不绝口，召开现场会。接下来，专栏一期接一期，标语写了又写。不久，四川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中篇报道《废品堆里闹革命》，从此，公司办公室多了个位子，废品厂少了个铁匠，我站到了干部队伍中。

尔后，我又借助那武拐杖调到了县体委作篮球教练，再借助那文拐杖作体委办公室负责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小平理论的践行，中国人前进的道路变得宽阔，我抓住了青春的尾巴，扔掉助残的拐杖，在人生的路上夙兴夜寐地展示，不遗余力地冲刺。然而，时光不可倒流，青春不会回头，一转眼，老知青人虽未老，一刀切的年龄到了。

数英雄，论成败，我们更应想想那百倍于我、千倍于我的失败者，他们失去了宝贵的青春，以至于失去了太多，太多。他们是失败的英雄。

"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渴望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可惜，对于我们的许多伙伴，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青春的岁月像条山路，望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作者简介

李自森，男，1946年9月1日生。1964年于重庆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年9月9日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新桥公社林场务农。1965年考入西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肄业）。1969年林场撤场，于当地插队落户。1971年3月，因入选达县篮球队参工到达县商业局土产公司。1984年调达县体委任办公室负责人兼达县男篮主教练。1991年调达县地区外贸局，后任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达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03年退休。

成都有个“青训班”

唐龙潜

“青训班”的全称叫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办于1964年，其组织领导机构是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

1964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一方面上山下乡正进入一种热烈的舆论准备，《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隽，以及江苏的董加耕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但从全国来看，还未形成一种运动，一定规模，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手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探讨、总结。另一方面，潜在的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存在。他们是在高中、大学升考中被淘汰而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待业青年。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贯彻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人，时髦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即使被升学的分数线拒之门外，也大多能够通过就业这一关。那时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是只需“政审”而无须进行文化考核的。只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会因为过不了“政审”而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同时“双开”，从而成为在城市待业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所以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不知道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怎样，但在成都正是这批人充当了有组织的成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以我所进入的第二期“青训班”为例，在五百多学员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见诸报端的那些典型也都个个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种领导职务，或成

为各种代表出席各种会议，甚至受到超规格的礼遇——如有幸同伟大领袖握手，并一同拿起筷子吃饭（进餐）。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本该是“根红苗正”的正统接班人的事业选择，结果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这宣传和实际的矛盾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是宣传的虚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

“青训班”自开办起来很快奇迹般地膨胀，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寿终正寝。

我是 1964 年 12 月 9 日走进梁家巷那座小院的。八月望断高考落榜，接着各种就业渠道均被堵死，连老“社青”所不耻的到山区修路的申请也因“政审”被驳回，顿觉末路途穷满目萧然，整日焦眉愁眼度日如年。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个所在：不政审不填表不查三亲六戚只要报名就成，不交伙食费进去就有饭吃，而且是放开吃。总算网开一面，我立马报了名，并破天荒地迎来了办事处干部的笑脸和一张大红喜报。原想弄个十天半月就下乡去吧，不想却由于种种原因一待就是整整七个月，得以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这个既不像学校也不像军营的时代怪胎的全部运作方式，几十年后想来这几个月还真是值得总结——算是解剖一只麻雀吧。

“青训班”首先是营造了一种环境，一种高扬的革命化的环境。一走进这里满眼所见都是革命的口号标语，红红绿绿贴满走道、食堂、寝室、操场甚至厕所周边，其中有不少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大喇叭里成天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等革命歌曲。“青训班”还有一条规矩：先到的要随时作好准备热情欢迎后来的。所以每一位提着被盖和网兜的人一进来，立即便会被蜂拥而上的男男女女所包围，代提行囊，嘘寒问暖，热情介绍，细心安排，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却能瞬间亲如一家。按那时的观念应该是比一家还亲，因为这时是只讲阶级不讲家庭的时代。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原本是很重家庭的，但在那时革命早已深入到家庭，家庭亲情、家庭关系、家庭纽带正被阶级、路线、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意义的家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成了直接听命于党的社会一分子，其外化形式就是由党所建立的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层级管理。

凡进来的人，多是东碰西碰碰得满面尘灰还是找不到庙门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的僻街陋巷独自领受落魄和孤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现在一下子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革命大家庭里，又有了组织，有了队伍，有了战友，有了领导，心头不热也热，顿时便会生出些终于又被革命接纳了的豪壮，进而依稀感到人生价值的提升。私下还有一层心底的隐秘：原来不止我一个啊，起码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嘛。这又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

针对这批人的实际，"青训班"制定了思想教育的重头戏，简化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背叛家庭，划清界限，从现在起抬起你的腿迈出革命化的第一步。那步骤自然是要先割尾巴。这方法特有效，大家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原来都是娘老子害的，窝了一肚子气，现在总算找到出气口了。不用怎么动员，很快便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竞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小组骂，大组骂，上午骂，下午骂，别人帮着骂，老师指导骂，骂的水平越来越"高"，分析得也越来越透。譬如说老娘给买了一件花衣服，其实质是诱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认真读书，是鼓励走"'白专'道路"，灌输"学而优则仕"的腐朽人生观。而如果父母叫你听党的话，那性质就更严重：这是以假象掩盖反动面目，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

最绝的是全大队集中开展的大暴露大批判。几百人挤在饭厅里，上方设一讲话台，学员自己走到台前暴露家庭，批判影响，表达誓死背叛的决心，其热烈踊跃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轮得上走出来亮相的多是大反动：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右派、大特务、大将军……大反动的子女们站了批判台，令小反动的子女们只好作壁上观。批来批去有点走调，有的人把握不好就老是在西服领带洋房汽车上兜圈子，竟成了好像在展示"先前阔"。我认识的一位哥们气不过，临机一动，将其父连升三级由局员擢升为局长，硬是风风光光地挤上台去过了一把瘾。

我无法用严肃的笔调来记述这一切，因为这实在像荒唐的闹剧，但我知道很多人那时是真诚地在做。至于我自己，一方面是说不清不好说（家庭成分没有问题，关键是父亲，但他当时是公民，有选举权，头上也没有帽子。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便已被定为叛徒、特嫌、内控对象）；另一方面是还没有发昏到那地步。所以大会小会我基本上没发言，只是冷眼旁观。

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艺术。在"青训班"学员自编自演的节目中爆出了一个"精品"——话剧《革命化的第一步》。剧情大意是一个名叫龙儿的资本家的儿子如何背叛家庭，立志下乡（就是进了"青训班"）。当时在成都剧场公演时座无虚席，颇赢得了不少巴巴掌。剧中那位反对儿子下乡的资本家太太有这样一句台词："龙生龙，凤生凤，我们的龙儿呀，一定要成龙，不会成虫的！"扮演者那嗲声嗲气的调门，扭腰撅腚的姿态，使每次演到这里时总要掀起一个小高潮，引来一阵哄笑。这笑声既是对演员惟妙惟肖演技的赞赏，也是对那位不识时务的资本家太太的嘲笑。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句台词和由它引出的热闹便同时打入我的记忆，至今不忘。

中国受血统论之毒何其深也！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如那位资本家太太辈均一体供奉。时光流逝，世事诡谲，有趣得很，这剧无须改动便由正剧变闹剧变喜剧了，如果现在再来演一回我敢保证仍不乏哄笑之声，只是其意态情趣另有所钟罢了。然而笑不出

来的会是当年"青训班"的知青们,被那位混账太太不幸言中,果然成"虫"乱窜了一阵之后的苦涩岂能轻易抹去? 回首挺身前驱的豪情和真诚、荒唐和荒谬焉能不刺痛那早已不再年轻的心? 谁道是青春无悔?

但是,多年来常常令我心灵震颤的却不是这艺术的一幕而是生活的一幕。

那是 1966 年吧,"文革"高潮中,一条很普通的陋巷,我去看一位也是在"青训班"受过训的战友,老远便听到那位仁兄如雷的吼声:"你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变天复辟? 白日做梦! 痴心妄想! 无产阶级专政……"我的心一下收紧,赶紧加快脚步。

只有几平米的一间破屋子里立着双目圆睁的那位战友，房间角落里站着个干瘪老头,前襟上露着个大洞可以一眼瞥见肋骨。面对面的战斗还在继续:

"你说! 不是想收听敌台搞个收音机干什么? "

"我没想,没想,也收不到……"

"你没有收怎么知道收不到? 还想狡辩,真是顽固到底,反动到底,死路一条! "

这第二次听到"死路一条",老头子开始呜呜了,接着就蹲到地上辩解,说没人跟他说话啦,没人睬他啦,他也是没办法只有听听收音机啦之类……大概觉得说到理直气壮的地方了,声音忽然大起来:"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我到底把你养了这么大……"战友冷笑一声,大义凛然地怒斥道:"少来这一套,是你把我养大的? 是党和人民把我养大的……"

尽管是父子,但现在已分属两个阶级。一面是咄咄逼人,一面是有苦难言。这就是革命?

据我所知,这位老兄这些年来就跟着这位地主分子的父亲在生活,多年来他父亲的工作是负责三所公厕的清洁卫生,也还算得勤恳,不偷奸耍滑。成天弓腰驼背地捏着把扫帚,提着只破桶臭烘烘地来往于三所公厕和一个家之间,即使不挂着分子的黑牌,那实在的臭味也要令人敬而远之。按说环境严峻,生活艰难,相互间本应该有些相依为命的感觉吧,不想却是怒目相向,斗室成仇。

我看见桌上确实有个小黑匣子,拿起来看了看是最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心想这该没有什么吧……老头忽然跃起,摇晃着身子靠过来摊着手求我还给他。我正犹豫间战友却一把夺过去揣进裤兜里,同时抛出斩钉截铁的一句:

"不行! 必须上交派出所! "

我浑身战栗了一下。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到那情景还是战栗。老头当早已作古,不知他是否曾活到揭"帽子"的那一天。那位仁兄后来失去联系,至今音信杳无。我想,今天他倘还健在,也该早为人父了,该有些别的想法了吧,愿他的灵魂已经得救。



培训班四期学员，由市政府安排到市建局当了三个月工人，后又回“青训班”培训下乡

“青训班”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层级保密制度。最高领导层是由团市委派来的干部组成，也就五六个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我们称某秘书长和某部长，其他几人大概是一般干部，我们统称“老师”。全部学员为一个大队，下分为若干中队，中队下再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大概 10—15 人。大队、中队设委员会，有队长、副队长和各种名目的委员。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所有学员干部都是由最高领导层直接任命，不搞选举。我想他们任命的根据一是档案材料，二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好恶，包括和自己关系接近的亲疏。“青训班”阴盛阳衰，很出了一批才貌双全的女干部，我想主要是她们更容易引起领导的注意。“青训班”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各种层级不同的会，而且基本上都在晚上。反正大家食宿在一起，方便。我在“青训班”是很落后的，所以连副组长都没弄上一个。因为我对这一切本能的反感，一点热情都没有，只是在熬着，应付。所以那些各级干部们在开些什么会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并且那些干部们好像很快就受到严格训练，每次会议下来个个守口如瓶，决不向外透露半个字。在这种高扬的革命氛围和严密的层级管理的组织控制下，“青训班”弄得很有些像军队，一眼看去那真是纪律严密，行动一致，万众一心。比如，我们凡是出去参加劳动(做零工)或别的什么活动，来去的路上不论人数多少都是整队行进，队前有人举着写有“上山下乡”字样的红旗，队列旁边有人吹着“左右左”的口哨，一路走还要一面唱着适合行军的“四二”拍

的革命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之类。每顿吃饭前也要立队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一起进入饭堂。

别人的感受怎样我不清楚，但我自己却觉得非常别扭，非常压抑，非常不适应，只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快点下到农村去。也许是这种情绪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结果拉响了一次警报。

那是一天很晚的时候，一个和我私交较好的同学(他当时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满面阴沉地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低声说："昨晚开组长会，例行汇报各小组成员的思想动态，你们组的组长在汇报中说你的思想有些消极，对'青训班'现在的做法流露出不满。某老师很重视这个情况，把你的名字都记在本子上了，并说要严密注意，随时汇报。"

这按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在那时就是天大的事了！在夜色沉沉中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顿时生出对那位汇报同学的厌恶，同时觉得这"青训班"真是像一个实行严密思想控制的特务环境。难怪他们成天都在开会，原来就是干这些？从此我三缄其口，谨慎小心，并对那位当组长的同学高度警惕。直到在农村几年以后，我和他才冰释前嫌，化为笑谈。他说他当时也没想到会那样严重，说过之后看到那位老师的神态自己也感到紧张。

"青训班"吃饭是不交伙食费的，但其实这伙食费得自己去挣。明白地这样说大家心里肯定会不舒服，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背叛家庭，革命化的第一步已经走了，现在要走第二步，过"劳动关"。于是到处联系看哪里需要临时工，不论干什么，只要有活干我们就去干。我们成了成都市最庞大的有组织的临时工队伍，揽过各种各样的活。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砖瓦厂干活的那一段。记得进去的时候是热天，我们几百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看去比砖厂本身的人还要多得多。大概砖厂的运作方式主要是依靠临时工，这用起来价廉物美。我们一去，厂里就把所有的临时工都打发了，实质上就是我们抢了很多人的饭碗。揽到这桩活，"青训班"的领导都很兴奋，暗暗在算着经济账，干两个月下来能够挣多少多少钱，起码后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问题了。当然，这算盘只是放在肚子里，最多是最高领导层决策会上拿出来算算账。

按照制砖的流程，所有人员编为几个作业组。原泥组：把黄泥挖出来，装上滑车运到砖机旁，作业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点火放炮。砖机组：把黄泥装进砖机，再把制出的砖坯抬上架子车。架车组：负责用架子车把砖坯运到晾晒的砖场。砖场组：负责下车、晾晒，并将晾晒干的砖坯运到烧结窑。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属于重体力，而且带有一定危险性。我编在架车组。俗话说："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这个组挑的都是身体条件比较好的男生，因为一人拉一辆车，独立操作，全无帮衬。一车湿砖坯有九百多斤，来回有三公里，还要上坡下坡过缆车等。我们架车队清一色的装束是短裤、背心、垫肩、草

鞋。只要车带一上肩，拉出几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论吃多饱只要拉一趟，肚子随即就感到空洞洞的。24小时三班倒，每班要拉近二十车，单行程就一百多里。砖机的轰鸣声响彻云霄，两个出砖口砖坯流水似的滚出，砖机组的人总是在大喊："架车，架车，快！快！"所以卸掉砖坯后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开跑。

我常常一面跑一面就在想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这机器真是害死人啊！我伺候的那台砖机说是慈禧太后时洋务派进口的德国造，虽说是老掉牙了，但当时仍是所有砖机中产量最高的。在累饿中苦撑苦熬的时候真是对那"西太后"的吼叫充满怨毒，唯一惬意的时候就是"老佛爷"病了。年代久远，"老佛爷"难免要常常出点小毛病。只要突然一下砖场清静下来，别说那心里有多畅快了，就暗暗希望这老掉牙的家伙一病不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检修人员随时就待在旁边，不等热汗晾干，那令人背脊发麻的轰鸣声便重新会铺天盖地而来。

在砖厂的整个劳动中，出现过几次险情，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和伤残。但坚持不住病倒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是卧床不起，养病的人就到厨房帮忙，状况再好点的就安排在坡道口，上坡时帮我们架子车推一把。在当时的那种高昂的革命氛围下，除非是真病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没人愿意自认趴下了来干这些事。我不明白"青训班"当时为什么要揽这样重的活，说是过"劳动关"也该循序渐进啊！据我所知男同学情况还好一点，有一些女同学可就是在这段超负荷的劳动中落下了病根。

砖厂的劳动干了近两个月，也许是钱挣够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青训班"的领导喜气洋洋地宣布胜利结束，撤离返回。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成都前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派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去动员待业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是为"青训班"找新学员。领导说这是我们接受了半年的训练，现在为党做的第一项工作。于是我们开始走家串户，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还真是"忽悠"了一大批人报名。

1965年7月11日，"青训班"第二期终于结业了，在阴沉沉的天空下，装载着我们的车队顶着蒙蒙细雨，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十万人夹道欢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时怎么就能从十万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她老人家一面挥手，一面拭泪，一面强装笑脸。篷车一晃而过，但这一瞬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样鲜活。

作者简介

唐龙潜，1964年在成都三中高中毕业，1965年7月下乡插队到西昌县高草公社，现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已退休）。关于知青的文字有73万字长篇小说《沧桑路》（四川人民出版社），大型歌舞剧《中国知青魂》、《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互联网）。

西山坪上的"小右派"

李北兰

1960年,共和国饥馑的年代。因父亲右派问题被捕劳改,我当年高小毕业没考上初中。为了生存,也为了"赎罪",便和本区同龄或大三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右派子女,以及部分右派分子,来到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公社所办的西山坪街道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农场撤办。

寒夜里的两盏"红灯笼"

1961年1月17日晚上,轮到我和同组的另外两个小伙伴成小眉、谭必全到"下屋基"值夜班守菜地——因附近的饥民常常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到农场来偷菜,故场里让场员轮流值班,以保护集体财产。

"下屋基"是一幢破败的土墙房子,离场部有一里多远,四周是农场的菜地,故专用做值夜班轮换之用。下半夜,瘦得像一把镰刀的上弦月落山,夜黑沉得愈发叫人发悚。尽管值夜班守菜地也不是头一回,但不知怎么的,却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笼罩在我们的心头——今晚该不会出什么事吧!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据说因为保卫集体财产被阶级敌人杀害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刚刚才摘下红领巾的我们自然也曾举起拳头在英雄遗像前宣誓。然而,一旦那些手持砍刀、被饥饿折磨得近乎于疯狂的偷菜的农民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却又难保不拔腿往回跑……恐惧、寒冷、饥饿轮番"轰炸",我们不由得紧了紧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张薄纸的棉袄,在最佳瞭望哨——一块突兀的大石头上蜷缩成一团。

好在我和小眉因家庭环境熏陶自幼爱看书,肚里都装着一箩筐故事,于是,便你一个《十日谈》,我一个《聊斋志异》地摆起龙门阵来,直到困倦和疲惫阵阵袭来。"好像有什么

声音？"迷迷糊糊之间，忽听得谭必全喊。"偷菜的……"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不，不，是飞机，飞机！听……"小眉说。果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只见茫茫的夜空中有两盏又大又圆的"红灯笼"，红得惊心，红得骇然，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那"红灯笼"便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从我们的头顶掠过。不知为什么，我竟想起小时候邻居家死了人，在夜空里施放的孔明灯。

兴奋，疑惑，不安，直到另一组值班的小场员到坡上来接替我们(每三小时换一次班)，我们都还在争论："那'红灯笼'肯定是飞机的前灯！""飞得那么矮，该不会是敌特的飞机吧？""敌特的飞机能深入到咱们四川腹地来吗？""恐怕还没过边境，就被解放军打下来了……"然而，不说"敌特"还好，一说"敌特"，大家都兀自紧张起来，即便回到生有一堆篝火的值班房，还时不时看一看四面通风的门窗，害怕有"空降特务"冲进屋来。毕竟还是13岁的孩子，最后我们还是架不住瞌睡虫的催促，在忐忑不安之中，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离天亮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该我们三个小伙伴值最后一班岗——以往的窃菜事件几乎都发生在黎明前的黑暗，而半夜时分的那两盏"红灯笼"的阴影尚未消散，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尽管害怕，尽管留恋值班房里那堆像母亲一样散发着温馨的篝火，但我们还是互相鼓励着冲进寒气逼人的旷野。

再坐到已凝上一层薄霜的最佳瞭望哨时，我们已全无睡意，虽"沉默是金"，但我们的心里却在不停地祈祷：快快天亮，快快天亮……拂晓时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锅，使劲睁大眼睛，也看不清眼前的一草一木。头天晚上那顿打了折扣的"吹吹"稀饭早已化成几泡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我便摸到菜地边掐了几根白菜头，不辨滋味地嚼起来。"小声点……有贼！"机灵得像一只猎犬的谭必全"呼"的一下掀开棉帽的耳朵。我们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了几秒钟。"嚓嚓嚓，嚓嚓嚓……"下面月亮田里的砍菜声明白无误地传入我们的耳鼓。"有人偷菜！"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月亮田那边跑去。夜雾茫茫，我们看不见偷菜人，只看见无数把雪亮的砍刀在夜雾中闪动。

"过来嘛，过来就砍死你们几个小崽儿！"尚未跑拢，便听得一声低沉的断喝。我们赤手空拳，自然不敢上前去阻拦，但"责任"却使我们不敢拔腿往回跑，于是便跑到迎风坡上扯着嗓子向场部大喊："场长，有人偷菜！场长，有人偷菜……"两股颤颤，那喊声自然也不利落，遥遥的拖腔在漆黑旷远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凄楚、悲凉。一会儿，忽听得场部响声大作，叫骂声、吆喝声、犬吠声、鸡鸣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几声朝天开的枪响，"嚓嚓嚓"的砍菜声骤然消失。

正呆若木鸡之时，却见高大健壮，有着一副男人大嗓门的场长肩扛枪，手持电筒向我们跑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农场的民兵。"为什么不早一点喊？月亮田的莲花白(即卷心白菜)几乎全被砍光！"还好，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拿我们的"高成分"来上纲上线。正兀自庆

幸时，却听得她嘴里吐出一串国骂："……值班不负责任，扣你们的罐罐饭！"斯时饿得人生菜都能吞下肚，"扣罐罐饭"的惩罚比挨打还要令人绝望。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眉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回到场部，准备"享用"值夜班挣下的半天休息时间，并相约着等午饭时间过了再起床，免得被场长"扣罐罐饭"后看见人家吃午饭时饿得更厉害。

路过离场部不远的长满水草的大堰塘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步，堰塘边那块光滑的洗衣石旁，分明漂浮着一张折叠的纸。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用一根小木棍将那张纸拨到塘边。拾到手里，却见那纸折了四折，边沿还订了一颗订书钉。"这是什么纸呀？还用得着订这么牢？"扯掉订书钉，将纸展开一看，我们却傻眼了，原来是一张印有"台北"字样的彩版宣传画……"哇，果真是敌特飞机！"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昨晚掠过头顶的那两盏"红灯笼"，随即便像开水烫了手似地将那传单扔在地上。然而我们明白，现在就是扔掉传单也脱不了干系——扯掉的订书钉不可能完全复原，如果这张被人拆看过的传单被搜山的民兵拾到，清查下来，我们笃定吃不了兜着走。商量过去商量过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拎着那张湿漉漉的反动传单到场长那儿去"自首"。

没有多少文化、但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的场长还没等我们"申辩"完，便暴跳如雷："好哇，丢菜的事还没了结，现在又看反动传单……等我搜完山再跟你们几个'小右派'算账！"说罢，便气哼哼地带着几个武装民兵搜山去了。尽管惴惴不安，我们回到宿舍后还是一觉睡到吃午餐的钟声敲响。也许是场长太忙，忘了对我们进行惩罚，我们端着碗到伙食团去，竟顺利地打到了饭菜。

吃饭时，方知场部已下命令：凡拾到反动传单、空投食物不交者，一律送交公安局；凡传看反动传单、偷吃空投食物者，格斗勿论。

忐忐忑忑一直挨到晚上，也不见场长的踪影，其间听得场员们纷纷传说：昨晚的敌特飞机是从西藏方向低飞入四川盆地的，过西山坪时撒下传单，过白羊坝和二岩时还撒下了面包、腊肉、糖果等食物。据说，白羊坝和二岩的老百姓不听干部和民兵的劝阻，悄悄将"有毒"的食物捡回家去"打牙祭"。"怎么不给我们空投点食物呢？就算是有毒我也要把它们吃下去，死了也是个饱死鬼！"传说者传说之后，往往还要不无艳羡地添上这么一句。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见场长回来，我们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忙她的阶级斗争去了，一时半会是顾不上来"理麻"我们的！

第三天上午，场长带着几个神情疲惫的武装民兵回到场部，她当即宣布："晚上开斗争大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小眉的心直往下沉——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晚上，当场长在马灯霍亮的斗争台上大喊"把人给我押上来"时，我们才发觉民兵的枪不是对着我们，而是对着几个平时"不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和"专与领导作对"的捣蛋

分子。"你跟空降特务有什么联系？""空降特务给你布置了什么破坏任务？""你吃了'刮民党'好多面包和腊肉？""你们的联络信号是什么？"这"痛打落水狗"的斗争自然是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不斗得被斗争者趴到台上不能动弹，是不会罢休的。这斗争当然没有结果，因为没有什么"空降特务"，这些被斗争者也不可能吃到扔在十几里外的二岩和白羊坝的"有毒"的面包和腊肉。

由于场里一连数晚上都开斗争会，场长早把要对我们几个"小右派"实施惩罚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

挡路的"大石头"

1961年春节前的那个星期天，气温骤然下降，从中午开始，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重庆鲜见的大雪。尽管天气恶劣，但回北碚街上休假(农场每周日休息一天)的场员们傍晚时分还是冒着大雪陆陆续续归场，一来是为了赶那顿属于自己的晚餐(过时作废)，二来也是怕场长每周日晚上的大点名——若迟到或旷工，轻则被扣"罐罐饭"，重则挨批斗。

吃罢晚饭，正待在寝室里等场长来点名，忽听得男寝室那边一阵大哗。"这家伙吃了豹子胆？竟敢不按时归场？恐怕又是去搞什么破坏活动了……"原来，场长点名点到其中一间寝室时，发现少了一个姓李的右派分子，故而大发雷霆。同寝室的另一个右派分子迟疑了片刻，便立正着说："报告场长，李某某已经生了好几天的病了，会不会……"话音未落，便被场长的一声怒喝打断："闭上你的臭嘴！你和那个家伙狼狈为奸，以为我不知道？我问你，那家伙哪一顿少吃过一口？分明是装病，逃避改造！"场长手中挥舞的棍子，差点敲到那个"多嘴多舌"的右派的头上。

刚刚跨出寝室门，场长便气急败坏地喊道："下山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几个武装民兵不敢怠慢，立即背上枪冒着风雪下山去了。

长年睡阴暗潮湿的地铺，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脚夜夜抽筋。这位懂医的李姓右派曾主动为我扎了几次银针，使我的病情大大缓解，我因而对他颇有好感(虽然有时也暗暗批判自己没站稳阶级立场)，再加之他是我们这个组的组员和监管对象(小右派监管大右派)，朝夕相处，多少有点息息相关。故我半夜睡在床上竟不能成寐，心里一直都在嘀咕李某某：若被民兵五花大绑押回来可就惨了！

第二天清晨起来，山野一片银白，铺在石板路上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厚。吃早饭时，便从其他场员的口中得知，昨晚，冒着风雪下山的民兵和李姓右派至今尚未归场。这一下，心中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忘忧草，吃过早饭，我和同组的几个小伙伴扛着锄头，打着雪仗，嘻嘻哈哈地顺着铺雪的石板路向远处的田地走去。刚刚转过离场部约一里路的松林

坡，一位眼尖的小伙伴便停住脚步大喊起来：“看，那是什么？”原来前面石板路的中央，横亘着一大坨积雪覆盖的东西。“大惊小怪，不就是坡上滚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吗？”“走，我们去把它掀开，免得挡路。”然而，当我们用锄头勾着那“石头”准备往坎下掀时，却发觉有点不对劲：“这是什么石头呵？怎么软塌塌的？”三锄两锄刨开积雪，却见一件看上去有点眼熟的黑色棉大衣，再仔细一看，棉大衣里还蜷缩着一个僵硬的人……“我的妈呀！”还没看清楚那人是谁，我们便哇哇大叫，丢下锄头往回跑，后面跟来的几个小伙伴见状，也慌不择路地四下逃散。

听了我们的报告后，场长铁青着脸，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国骂：“他妈的！”随即便带着场部的几名“官员”直奔现场。惊惊惶惶之中，有消息传来：死者正是那位李姓右派，据说从他的身上搜出了病假条和一张住院通知书。“这人也是，看都看得到场部的灯光了，怎么就倒在雪地里了？其实，只要再坚持十分钟，就有活的希望……”“重病、饥饿、寒冷、劳累等交替‘轰炸’，他能从北碚街上走上山，都算是奇迹了！只可惜……”“肯定是回农场来请病假的，谁不怕场长的‘周日大点名’呀……”也许是“兔死狐悲”吧，那天上午，我们这组的大右派和小右派皆无心做活路，第一次有了“共同语言”。

中午时分，几个武装民兵也一溜一滑地返场。他们声称，他们当晚就赶去了李姓右派的家，但却扑了一个空——据李姓右派的家人说，李姓右派已在两小时前出发返回农场。“既然这家伙已经返场，那我们也用不着再回农场去了。”因风雪太大，民兵们便“梭”回各自的家“温暖”了一夜……当他们得知李姓右派已用不着他们那根粗壮的绳子“伺候”时，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山路“蹉跎”的端午节

1961年端午节的早上，我和12岁的许陵陵抬着一只足足有我们半人高的粪桶，跟着场里其他担大粪的大人和半大人，说说笑笑地向十几里路外的二岩和白羊坝走去。白羊坝是嘉陵江温塘峡里的一个码头小镇（后因泥石流全部搬迁），二岩是紧靠白羊坝的一座山崖，崖上就是广义的西山坪。

二岩的笔陡早就有所耳闻，曾从一个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上看到，某人嫌妻丑，便把妻子骗到二岩推下万丈深渊……虽有思想准备，但一旦真的站到林木幽深、地势险要的二岩顶，我们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斧劈刀削般陡峭的崖壁上，一道用人工凿出的石梯几无曲折地一沉到底，别说走，光看一看也叫人眩晕！然而，返回是不可能的。如果无功而返，今明两天的罐罐饭要被扣掉不说，还有可能被上纲上线。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往下“蹭”，“蹭”到有两尺高的石坎时，我们两个“矮打杵”就只好拖着空粪桶往下“梭”。胆战心惊地下完最后一道石梯，高度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放松。

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但当我们把满满一桶大粪从粪船上抬到二岩的山脚下时，还是愁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么陡的路，这么高的坎，我们怎么爬上去呀？试着向上抬了一小段，最后还是被吓得退了下来——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把那只沉重的粪桶拖上两尺高的坎，还险些泼了自己一身大粪。其实，我们并不怕脏和臭，但却怕满桶粪抬回场部只剩半桶粪，不好交代。于是，我们把粪桶搁在路口，眼巴巴地看着同去的场员（年龄多比我们大）抬着或挑着粪桶，上一步台阶喘一口粗气地上岩而去。虽然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们内心还是希望哪位上了二岩之后，再下来帮我们一把。然而，我们把眼睛都望穿了，也不见有"雷锋"下岩来——时近正午，跟我们一样早上只喝了一碗清稀饭的大场员们也自顾不暇了！

二岩是白羊坝通向西山坪最近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据当地居民说，沿着白羊坝左边街口延伸出去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窄公路也能上山（公路的尽头是西山坪劳改农场），不过，至少要多走两倍的路。已是午炊时分，容不得再犹豫了，我们便抬着粪桶走上碎石铺就的公路。

这条狭窄的公路靠着嘉陵江边的一段还比较热闹，涛声、船夫的号子声、广播声（江对面是澄江镇）、在河坝练操的解放军的口哨声、"哗哗笃笃"的造船声，合奏出一支嘉陵江交响曲，使我们暂且忘记饥饿和疲劳。那一刻，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自己走了这条远路，而免去了泼掉大粪、摔下悬崖的危险。

然而没想到的是，越往西山坪腹地走，越是人烟稀疏，渐渐地，一种大雁失群的孤独感开始啃啮我们的心。累、饿、渴，再加之白花花的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我们歇气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一坐下来就不想再爬起来。眼见着太阳已经打斜，如不加快步伐，今晚就要露宿山野了。在理智的支配下，13 岁的我强打起精神，充当起姐姐的角色，不停地给小我一岁的同伴讲故事，还时不时给她画一只"大饼"充饥："回到农场，我们就可以午饭和晚饭合并享用了……"

下午 5 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公路尽头的西山坪劳改农场，这里离我们农场只有七八里路，而且没有坡坡坎坎。胜利在望，我们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不禁停下粪桶朝农场方向打了几声吆喝。正"忘乎其形"时，迎面来了一群放学回家的顽童，见我们这副狼狈相，便拍手大喊起来："小右派！小右派！""右派右派，夹个尿罐！"并挥着拳头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们实在有点忍不住，就与其对骂了几句，可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这些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竟捡起石头向我们掷来。寡不敌众，且身负"重担"，我们不敢恋战，便连忙抬起粪桶冒着"枪林弹雨"逃之夭夭，不想却因祸得福——脚下速度竟大大加快。

转眼工夫，太阳落山，夜雾渐起，黑黢黢的松树林里不时传来"嚯嚯嚯"的声响，早出

的猫头鹰在林间飞来飞去，时而发出阵阵怪叫。女孩子本来就胆小，再加之很少走夜路，我们的神经末梢都竖了起来，心怦怦地差点跳出胸腔。我们一边走，一边还是壮着胆子四下张望，生怕什么地方钻出一头怪兽把我们给拖了去。正脚“耙”手软之际，却见前面齐刷刷地射来几束手电光，“北兰，陵陵……”原来是我们同组的几个小伙伴（没有一个场领导和大人）——他们见天黑尽了我们都还没有返场，下班后没顾上吃晚饭，便邀约着前来接我们了。

搁下粪桶，我和许陵陵都大哭起来。

作者简介

李北兰，女，1947年出生于重庆北碚。1960年高小毕业因父亲右派问题未考上初中，到北碚西山坪街道农场劳动一年多，农场撤办后，又到北碚蜂窝煤厂劳动大半年，1962年考上重庆市二十二中。1965年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当年10月上山下乡到南江县坪河林场，1968年底插队落户到南江县碾盘公社长坪大队一队。1979年6月返城到重庆北碚日用百货公司工作，后调至北碚商业职工学校任教，1997年初退休。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



冤孽

施　明

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

我们都太快地摈弃掉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黑五类”子女，这是某一特定时代给我们的定位。此外，还有几个诨名：狗崽子、混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

其实，我父母亲不过是寻常百姓，并非大富大贵。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后来双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过不失。

但是，在1956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后期的肃反运动中，母亲不幸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清洗出教师队伍。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们唱《夏令营之歌》，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她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她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么成立的？ 1939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那时我母亲17岁，随家人逃难到曲江县。为了生活，考入一个官办的青训机构“统计班”，在里面学习文书、译电码的工作。我妈会唱的《热血》、《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我父亲还滞留广州。他们原本是邻居，青梅竹马，因战乱而劳燕分飞。母亲在曲江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只身潜回广州与父亲完婚，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青训机构。就是这几个月的经历，给我母亲带来终身遗恨。我曾看过那份给母亲定案的材料，内容大概还记得：该统计班名为抗日，实则反共。陈某某受训时间虽短，也

没有直接的罪行，但该机构背景反动，隶属国民党军统管辖……陈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且在审查期间意图自杀，消极对抗……“意图自杀”倒是事实；“消极对抗”实在莫须有。因当时母亲受不了“审查小组”轮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学校大楼的天台准备跳楼。我永远记得，当日母亲由两个女同事带回家的情形，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那段日子里，妈妈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天天以泪洗面，原来红润的脸颊变得蜡黄，清秀的眉目蒙上愁云；特别是过去一说话总露出微笑和一排整齐的皓齿，还有一对深深的梨涡……全消失了。那时母亲才 34 岁。

母亲被开除教职后，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我有一对孪生弟弟，当时才满两岁。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不见了“细弟”。昨晚我还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亲含泪告诉我，为了全家好，让一户无子女的农家夫妇把小弟抱走了，甚至我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何方，也不敢打听。穷人卖儿卖女也有个“卖”字，可“四类”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没过多久，“三年饥荒”来临了。粮食定量，物价飞涨。当时父亲每月工资 73 元 5 角，每人平均只有十多元，还买不到一斤鸡肉。母亲饿得面黄肌瘦……

为了填肚子，我们几兄妹要半夜轮流到市场排队买菜。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感觉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摸了很久，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痛惜地说：“你不是答应去买菜吗？两点了，该去了，不然连菜毛也买不到了……”我无奈地掀开被子，母亲帮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张小板凳，走出家门，赶到市场。市场大门紧闭，门外已有一串人缩瑟地等在那里……终于等到天亮了，市场的大门开一道小缝，外面的人一个个钻进去，争先恐后在各个摊位前再排起长龙。那时的市场，肉类已经绝迹，每天供应的菜少得可怜，排队的人只能定量买一角多钱的菜，通常是番薯叶、芋头、南瓜、菠菜等。买到这些，拿回家去，已经功德无量了，母亲会奖赏我两片饼干，然后去上学。我那时 13 岁，读初一。

那时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有“车、补、改衣服兼织冷衫”几个毛笔字，非常工整秀丽。那是母亲亲手写的。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替人缝补衣服。有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教我试穿一套刚缝制好的新衣，是邻家孩子春节要穿的新衣，那户人家有港澳关系。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后母亲端详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觉得手工还可以，就叫我脱下，我一边脱一边冲口而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来只想卖弄一下在课堂上刚学到的诗句，不想挑起母亲的伤心处。当时母亲潸然泪下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深入人心，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母亲的名字，街道的群众大会亦不许她参加，连家庭妇女组织的劳动服务站也将

其摈弃于外。本来母亲很想加入街道的车缝小组,但戴帽的“四类”分子没有这个资格。私人承接车补改衣服上纲上线斥为“搞自发”,被勒令停止,母亲只好在家粘纸盒,而即便这种活路也要靠我外祖父的名义才拿得到。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地劳作,家里所有空间都堆满纸盒,一毫几分地赚点血汗钱。

1961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做了切除手术。1962年母亲又患上肝炎,身体十分虚弱。生活贫困可以咬牙挺过去,可是精神劳役的杀伤力比肉体的癌更凶残。大概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争取在有生之年脱掉“四类”分子的帽子,让身边的人不再背黑锅;也许“谬误重复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觉接受监督改造,早已习惯那些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妈妈就挣扎着病躯出街扫地,由巷头扫到巷尾。只要监督的人说还有垃圾,又马上重扫。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每个月底在街坊的评审会上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有两项罪名强加在她头上是很荒唐的。有个街坊在会上发言:“她替人缝补衣服时,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补,她要我先洗了再补,真是岂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吗?丈夫做搬运工衣服当然有汗味,她是怕脏怕臭,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还有一个干部说:“我看见她儿子倒的垃圾中有几块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扎贫下中农的脚,是阶级报复行为。”每次莫须有的“检举揭发”,母亲都是逆来顺受,接着通宵写检讨,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们几兄妹升学政审时都被纳入另册。我的哥哥和妹妹初中毕业都没考上中专,尽管他们都品学兼优。我侥幸考上高中,妈很兴奋,但我读到高二就被列为下乡务农动员对象。那时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动,又使人思想走向极端——“背叛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说教灌满脑子。平时对母亲也不甚尊重,说出一些忤逆的话,还自以为是大义灭亲。高中毕业我别无选择地报名去了珠江农场。

母亲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时44岁。从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极左路线在全国最盛行的十年。这条路线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打下地狱。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是死神对一个顽强挣扎的生命最沉重的一击。1966年萧瑟的秋天,红卫兵举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两次来抄我们的家。他们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对父母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枕头,一边绣有“同心”,一边绣有“协力”,是组织这个家庭时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热切的心血绣上去的,抄家的人质问“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这对枕头。还有一张大床,因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围乱砍……抄家过后,专政机构一声令下:所有“四类”分子统统滚出城市!于是将母亲的户口强行迁到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她每天被押解着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个月后的一天母亲在劳累中吐血晕倒在地上,经检查是肺癌末期。父亲带着单位介绍信前

往苦苦哀求，才得以把病人带回广州。

这一切，父亲瞒着我没有来信告知。那时我在农场表现很好，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农场工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出墙报、搞“红海洋”的好手。我终于可以从“贱民”晋升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亲已经病危。我接到家信后，请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也不能平卧，吃什么吐什么，连说话都无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满，正忐忑不安，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留给我最后一番话：“孩子，纪律重要，前途重要，你还是准时上路吧……我是什么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还年轻，自己去闯吧……”

我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农场，我马上投身于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我们进驻了场部，把农场党委几个头头拉下了马，轮番批斗他们。那阵子沉迷在红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热无知的人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没有工夫去考虑个人或者家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给我送来一张电报单，上面写着“母死速回”四个字，我拿着这张纸，长长叹了口气：“她终于死了！”心中竟然异常的冷静，潜意识里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替死者？替自己？还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标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没有掉泪。

母亲生我育我，传我学识，给我智慧，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最亲爱的人死了！世上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潮水照样有涨有退，太阳依旧有起有落，人们还是那样天天奔忙着。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心内的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剧。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在报上登的讣文，其中“随侍在侧，亲视颔殓，尊礼成服”等字眼，总会咬噬着我的心，大概这就是惩罚吧，因为我不曾尽过孝道，该回馈的时候没有回馈，该恸哭的时候没有恸哭……

是什么使我们泯灭了天生的有缘有故的爱？又是什么使我们衍生出太多无缘无故的恨？是什么使我们对值得怀疑的东西一味的盲从？又是什么使我们对不必怀疑的东西却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荼毒！

作者简介

请见《逃亡》后的作者简介。

岁月痕

王安生

1964年9月2日，我们作为当年第二批上山下乡的贵州省安顺市49个（后来才知晓，其中46人是因父辈政治有问题而落第废学的）知青戴着光荣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原安顺县白坟公社林场集体落户。说是林场，实际是一片野林荒山，十几户老农和我们一起在贫瘠的山梁上开荒种地、栽树而已。可谓"上山"了。第一年，尽管住房简陋、拥挤，劳动艰苦，但有点粮钱供应，不知不觉也过来了。第二年就吃个人分的"人七劳三"粮（含包谷、洋芋），只够吃半年。基本的生活费是没有的了。有的知青回家要钱要粮，大多数知青都因家境窘迫而艰苦忍耐劳作。1965年"四清"来了，政治上的歧视也渐渐显现，"四清"工作组入驻林场，要人人自检和互相检举有何反动言行，要分析批判、无限上纲。在几次斗争会后，两个同学被逮捕判刑。"四清"尚未结束，"文革"的旋风来了。我们几个胆大的寻找到相关的部门和工作组成员，经过几番力争，才让被冤枉的伙伴获得自由。

我们都进城找到县（后改市）委要求回城，有关部门不仅拒绝我们的要求，还不许知青逗留城市。我们父母所在单位在询查，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在清理。我们还得东躲西藏。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好冒名去做点小工（挖泥巴、捶石子）或找课代。经人介绍，我到了邻近的普定县马官区余官公社张官大队代课。1968年底，我们又遵循知青要"返回原地闹革命"的批示，纷纷回到白坟。但此时当地政府已经决定解散林场知青，把一人分到一个生产小队（一个自然村），以防"知识分子"成堆闹事，这无疑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被分到大山沟里的前寨生产队。犁田打耙后一个人回到暂住的公房生火做饭，我弄了把小刀（15厘米长）作砍柴用，谁知大队革委会宋主任见了，说是"文攻武卫"的刀枪，

予以没收，并要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性格内向自尊，想到代课时张官地方的人要和气些，便转点到了张官插队。

本想躲开头上的那团乌云，但我错了。张官有个读到"贵大"大二又回乡的地主子女叫汪克伦，独自一人以游乡理发为生，我常在他处坐玩。他把我画的一张松树枝后一盘红圆月题为《暮色苍茫看劲松》的画，贴在他屋里的墙上。1971 年汪某被疑为自由党成员被捕，搜家也将画搜去了。一天，大队民兵连廖连长领着两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我与汪有些什么反动言行？我说没有。提到画的事时就问我为什么把红太阳放在树后面？我解释说，画的题词是暮色，时间表明是傍晚，红圆是初升的月亮，不是太阳。他们对我吼了起来："打胡说！现在大家都把毛主席比做红太阳，你却比做月亮……"等他们吼了一通后，我说："'暮色苍茫看劲松'恰恰是毛主席说的话。"三人才无言离去。我想，大概他们是第一次知道画的题词是毛主席诗吧。

同年，普定城里有位女青年姜莲(化名)在张官代课。姜爱好文艺，常来我住的阁楼(其实是牛圈上矮小的粮仓)座谈，我们也情趣相投，灵犀相通。她拿了我的《全唐诗》，送了我一本《海涅诗》和一本《鲍迪埃诗选》。大队搞文艺活动，我们到区、社演出，同台共舞。我们常在月下的田园小径散步，坐在河溪边的草坪上叙谈。张官人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地就的一双。谁知有一次她回家转来气愤地告诉我，大队老汪支书和民兵连廖连长在县城开会时去了她家一趟，谈到我时，廖连长告诉她父亲：王安生政治不清，公安常调查他的问题，他把张官大队民兵连的花名册提供给某个"四类分子"……她父亲(一个企业的支书)听后吓了一跳，尽管老支书为我解释，她父亲仍然把她训斥了一顿，并不准她与我来往。我找到廖连长生气地说："民兵花名册是你要我帮忙整理、复写上报公社的，我未留一个字。现在有人说我提供给了某个'四类分子'，你要为我澄清。"廖矢口否认，我一气之下，未提名地骂了他几句。

对于与姜莲的交往，我心里其实也有些茫然：自己处境恶劣，前程渺茫，生怕误了人家。此事过后，我渐渐退却。但姜莲却一往情深。不久，她参工回到县城，回城以后，她还一再来信表明心迹。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是"山高压不断山泉水"。但我还是请人婉言转告了我的歉意。以后她又因病难愈，不幸英年早逝。为此我一辈子都很内疚。

我在张官教书，在田间地里劳作，摸爬滚打地和张官人开凿地下阴河水，从邻近工厂引进电力(这在当时的农村寥寥无几)，抬石头砌洞门，采购电灌设备并参与安装，帮助邻近大队架线安装和维修电灌设备，还说服张官人购置了广播设备，丰富了文化生活。

这时，我只有两个心愿：一是努力表现自己，摆脱缠绕在头上那可怕的幽灵；二是使自己的生活有点生机。但事与愿违，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让我更加悲观失望，意冷心灰。

1971 年修湘黔铁路，我积极地报了名，但大小队领导都关心地说："修完了还得回来，

不去也罢。以后有抽调的机会我们不留你。”我知道他们是(留人做事)好意,就留了下来。谁知参加修筑湘黔路的知青和社青后来都安排了工作。

1972年贵州省六枝煤矿局来招工,每个公社都发了招工表,我没有得到招工表,就跑到区里找到煤矿局的招工人员,作了自我介绍,他们都说“你们知青也正是我们要招的对象”,还特地发了一张招工表给我。我工工整整地填好表,请生产队队长签了字,请大队压了印,跑到公社盖了章,亲自送到招工人员手里,体检完后,就回队劳动,静候佳音。后来听说被招上的都走了,我又跑到区里找到尚未撤走的两位招工人员询问,回答是:“他们说,贫下中农不让你走。”我没有追问“他们”是谁,默默地回到了生产队。

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公社发给了我一张招生表,我认认真真地填写,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南京行营文书的历史问题也照样填了上去,并在说明栏中要求在年龄上放宽一二。结果自然榜上无名。我不甘心地写了封信到安顺地区招生办询问,恰巧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知道后,打电话询问普定县招生办,县招办有个抽调上去又认识我的知青打电话询问马官区招生人员“为什么不见王安生的招生表”,回答是:“他的年龄大了,贫下中农不让他走。”那天,我爬上了张官北面最高的龙叉山山顶,环望着四面的群山、河流、林莽,想到这世界如此的苍宏巨大,而人却如此的渺小、卑微和劣邪。我们下乡时,从动员到落户生产队,也才仅仅三天的时日,为什么回城却如此的艰难?我曾两次游张官西面三公里处玉关山上幽深的庙宇,如果不是惦记家人,我也许就削发为僧了。

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张官地方年终结算每个工(10分)仅为3角5分上下,扣去口粮款,所剩无几。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即使我是单身一人,也常以红薯、洋芋当顿。农忙时,冷饭冷菜的也将就下肚,1973年就得了个十二指肠溃疡。这一年秋收后,生产队库房失火,为抢粮食,我和几个社员钻进着火的房里扒谷子,被落下的檩子木打在腰上,当时无钱医治,留下了残疾,以后一逢阴雨天就复发痛疼。这两病折腾我至今。

农民就更苦了。那几年,张官大队在青黄不接时就发生了以下事情:六、七月,汪云和、汪俭武等几户人家就开始扳下刚冒红缨的嫩包谷,用刀削下刚含浆的包谷米,舂碎了煮稀饭吃;汪芳家两夫妇和一个少年儿子,四月间就吃完了年前分得的口粮,先是向亲朋借了些吃,然后就卖新谷,即借别人100斤谷子,秋收分到新谷后还120斤;汪良发借别人40元钱,秋后还130斤谷子,这实际就是高利贷。唐诗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想不到,一千多年前古人所言之事,我有幸得见了。谌贵益家两娘母、赵姑娘家四爷崽只好出门游乡乞讨要饭。

其实,每年两次大小季青黄不接时期,上级都有几次返销粮(包谷)划分到各大队,供应缺粮户。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还是解决了部分缺粮户眼前的困难。1974年,新官有几

个大队干部竟然私分了部分返销粮。此事在张官两个自然村传得沸沸扬扬。五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又都是对粮食极其敏感的人，集在一起议定：拒绝将大队划拨到各生产队的工分参加分粮分钱。那时的大队一级不是经济实体，大队干部是按每年固定补贴和出差、开会的工分划拨到各小队参加分配。

我是五队会计，也拒分了大队工分（其中也包括我的大队工分）的钱粮。张官两个自然村是以汪、林姓为家族的寨子，这事拖到年底，有三个队因家族压力，也就分了。只有二队和五队一直不分。大队干部中，就有人造我和队长的舆论。那年春节前我与女知青杜某某结婚，有个大队干部出面对五队队长和我说，因为我帮过每个小队的忙，可由大队出面，叫每个小队各支持我一些谷子办喜事。五队队长说："谢谢大队的关心。王安生的事，我们五队会解决。"我本人也拒绝了大队某些人的"好意"。这就使我与个别领导的关系紧张起来，我和新婚的妻子因此丢了在张官的教书工作。薛家大队和我关系甚好，因我帮他们大队安灯架线，安装水泵和维修，凡逢布依族的节日，他们都要邀我过去的。听说此事后，他们愤然新办了只有一个班的学校，让我妻子去教书。我又回五队劳动，兼管大小队水泵的抽水和维修工作。

插队落户那些年，我很少回家。张官大队，高傍田多，阴河洞里6K9的大水泵有半年多都要抽水。我白天劳动，晚上抽水。那年年终，我大、小队的工分合计有四千多分。这本来应该说明我劳苦功高，谁知却引出了个插曲来。

一天，县知青办有两位领导到张官了解我的情况（后来我才知道是准备安排抽调我的事），找到我问了一下情况，就批评我和群众关系不好，不尊重领导。我才知道他们是先与某大队领导见过面后才找到我的，我说与群众关系好不好，你们应该多找几位领导和群众问问。谁知这话竟惹得其中一位训斥起我来："我们已经问了，一年360天，就算你天天出工，也才3600分，咋你就有四千多分？"我无言了，也不想解释，任他们再换什么话题问我，我一言不发，直至他们走出屋去，我也未说一句话。自然，这次抽调又泡汤了。下乡插队11年了，我也曾有几次抽调就业和读书的机会，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落空，这次泡汤也无所谓了。"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谤的由他谤，怪的由他怪吧！

1974年11月，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在大队召开大小队干部学习班，是搞什么运动记不清了。按例，区、社干部也参加了家住所在大队的学习班。学习班开办的第二天，由"文革"造反派头头而吐故纳新上来的副支书在会上发言，当他谈到张官情况时说到"有的人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过来要教育贫下中农"时，我的心顿了一下，就站了起来说："支书，打断你一下。请问，在张官，有哪个没有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副支书说："我又没有提你王安生的名字，你急哪样？"我说："在张官，就只有我和杜（我的

妻子)是下乡知青,除此之外,还有哪个?"副支书摆出领导架势吼道:"今天,我是在谈张官的阶级斗争路线问题,你们下乡知青只有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不要扰乱会场!"我说:"是你说到知青问题,我也才和你谈知青问题。"副支书说:"你是要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喽。"我也忍耐不住了:"张官贫下中农给我的任何批评教育,我都虚心接受,你代表不了贫下中农。今天你说不清楚你说的话,我就要教育你。"副支书红了脸吼道:"你反了你!"这时,有人喊了句:"把他捆起来!"我听那声音,就知道是廖连长的声音。听到这句话,我反而冷静了下来,心里一下把人间所有的荣辱都抛之天外,我走到会场上背了双手说:"捆嘛。"会场竟一下静了下来。这时,一个刚安排在区里工作的复退军人林开胜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扫了全会场一眼说:"今天哪个要捆王安生,就先把我捆起来。"我看了他一下,泪水猛地涌上眼眶,但很快又收了回去。这时老汪支书和五队队长边说边上前来拍我的肩膀:"安生,不要着急。"大队长汪克贤上来拉林开胜回原位坐下,几个生产队长和会计在嘟囔:"照这样,张官要捆的人太多了。""老子不干了!"。而工作组的三个人一直一言不发。我毅然离开会场回了家。

晚上,大队长、二队和五队队长来到我的住处安慰我:"不要理他,他是谁都要整,又整不到谁的。"我说:"怎么整,我都无所谓。要命的是以后抽调更无望了。"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工作组队员小焦也来到我处,说了些同情和支持我的话,又关心地问我:"他们要捆你,你不害怕?"我说:"我已经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了,要捆,只有捆去监狱。进去几年出来,或许还有条出路。"他默然了。

谁知这小焦因为到我处一趟,第二天下午,便被调走了。我感觉到头上的阴云又重了一层。我本想不再参加这学习班的了,无奈管着学习班的伙食账,又只得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天有征象,来学习班的这几天都是忽大忽小的连绵秋雨,阴河洞里抽水的电机必须抬上洞口来,以防水淹。那年月,购置一套水泵和电机非常困难,洞里的这套设备还是我和木支书(那时我们关系很好,他曾动员我入党,是我明白自己的底牌花,谢绝了。)辛苦奔波从一家军工厂购来的,一旦被淹,六百多亩高傍田就要望天落雨、歉收过半了。以前抬这电机都有我参加,这次是由民兵副连长汪克仁叫了几个党团员去的。

晌午时分,副连长回到学习班,把我叫出来说:"出事了,抬电机的绳子断了,电机滚进了阴河洞。"我一惊,说:"去看看。"阴河洞在寨子南面一公里远的山脚下,我进洞一看,山水还在淌进阴河,阴河面上漂荡着肮脏物片,一潭浑浊水。几个人傻着眼站在洞壁边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下去捞。""六七米深,哪个敢下去?"我说:"我试试。"我叫两人回寨拿来了一卷的钢筋和一个花兰螺丝,我把钢筋和花兰螺丝的一头连接在一起说:"我下去摸摸,先明确电机位置,再用花兰螺丝去勾住电机的吊环拉上来。"大家都说:"你要

注意安全,万一不行,不要勉强。”我说:“先明确电机位置再说。”便脱了衣裤,推开水面漂浮的脏物,一头钻了下去。凭着对阴河口开凿时的记忆,我顺着底部往下摸索,憋不住了,上来换了口气,第二次便直接潜向最深处。我十分明白,阴河的暗流就在距我两米处流淌。我紧紧抓住岩石摸索,摸到了底阀后又摸到了滚落在水泵底阀下的电机。尽管是在水里,那五百多斤的电机我仍搬它不动,只得浮上来,歇了口气,拿了花兰螺丝又潜了下去。摸到电机后又摸其吊环,直到将花兰螺丝的钩挂进吊环,我才浮出水面,叫他们慢慢地拉钢筋。我担心底阀卡住电机,还得下去想办法,就一直泡在冰冷的水里。直到洞口的人把那电机顺利地拉了上来,我才出水穿上了衣服。

回家路上,遇到了几位大队领导和工作组组长,见我的头发是湿的,大队长汪克贤就问:“安生,你落到水里了?”我嗯了一声,与他们擦肩而过。

回家换了裤子,洗了头,准备回学习班,谁知几位大队领导和工作组组长却进了我的门。老支书说:“安生,今天你又做了件大好事。”林开胜说:“像这样的同志,还要不要把人家捆起来?”工作组组长说:“前段时间,误解了你,委屈你了。”我说:“没有误解,也没有委屈,只有不活了。”

见其不解,我便说:“对我来说,误解、委屈太多,就不误解、委屈了。我们1964年下乡的知青,都被认为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下来赎罪的。任你如何表现,朝中无人,你也抽不上去。其实,我也不望抽调了,我已在这里安了家,生产队准备给点地,上级也给了点建房费,终守田园,也不是活不出来。只是占了生产队的口粮,过意不去,就尽力多做点事,多产点粮。即便这样,也不得安宁,只有不活了。”

那些年,揪资本主义尾巴的阶级斗争搞得人心惶惶。每户只限喂养三只鸡鸭,出门打工挣钱是走资本主义,要挨批斗。高度的计划经济使得农村的化肥供应少得可怜,而土地又得依赖化肥保产和增收。我与五队队长冒着违法的风险,筹备和组织了九千多斤猪肉,动用了民兵枪支,躲开了稽查,深夜运送到平坝化肥厂,兑换得三万多斤磷肥,分摊给了其他生产队和社员,保证了张官的粮食增收。这事大队也有人告到区社去,上面派人来调查,我和队长并未从中赢利,五队的各项税费也已完成,也就不了了之。

1975年,白琪大队找我帮忙修理烧坏的打米电机,在连夜嵌绕线圈时,陪我到深夜的杨支书告诉我,这活是要付我报酬的。我急忙说:“新来的县知青办袁主任正是你们大队工作组组长,他知道了,会给我带来麻烦。”谁知杨支书却说:“就是他说的,一定要给你报酬。”这时,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多少年了,这种关心和爱护,实在难得。第二天天刚亮,我正在给绕好的线圈浇绝缘漆,袁主任就给我送来一杯泡好的热茶,我不禁热泪盈眶,偏过头抹了一大把泪。

在那些艰辛、难忘又难堪的岁月里,各级组织里总还是有些关心和爱抚知青的好人,

我至今仍然怀念着他们。

那年，我下乡已经11个春秋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和国会就颁布了一条法律：凡在战争中服役一年以上的奴隶，就可以获准为自由人。每个月还有五先令的津贴。我好想200年前的华盛顿！

一直到了1978年，下乡整整14个寒暑之后，我才顶替退休的母亲转回了安顺城。次年，我妻子和两个女儿也随全国最后一批抽调的知青返回了县城。



作者简介

王安生，男，1946年生。1964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一中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在安顺县白坟公社林场。1968年转点在普定县余官公社张官大队。1978年回城在安顺市毛巾厂工作，1985年调安顺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助理工程师。由于所在单位属集体企业已倒闭，本人尚靠打工为生。

烙　印

赵明和

一

那是1970年的11月。田里庄稼早已收割干净，深秋的阳光洒满了那赤裸的土地。扛了几趟谷草，大家便坐下歇气。农妇们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就在田埂上边做边聊。往日，我也是这架势，尽量向贫下中农靠拢。而近来，悄然坐在她们身边，弥漫心间的是焦躁、恐慌，还伴着沉甸甸的忧虑。

不久前，一些厂矿招工，对知青敞开了门，回城工作的憧憬激荡着每个知青的心。然而，对于我，回城之路在何方？此时，我的父亲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有海外关系（有亲戚在美国和台湾），我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五类"子女。

我所在公社地处边远，可父亲的"罪行"越过山山岭岭一直传到了这里。也许有一天，他会被从城里押到我们这里来批斗，对此，我忧心忡忡。预感招工绝不会轮到我，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别人都走了，只剩下我留在这偏远的小山村，如同秋后留在田里的谷桩……

风，在田野上轻轻地吹，耳边，田埂上絮絮的家常话仍在继续。安静、闭塞的山乡啊，你接纳了我，我也曾与你融为一体，成为你怀抱中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可是，面对那最后的结局，一个22岁的女孩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接受。

骨子里蛰伏的叛逆逐渐苏醒了：人家既然不招我，那就自己走吧，单枪匹马去闯天下——尽管这非常渺茫而冒险。犹豫了半年，决心终于下定了。1971年5月的一个早晨，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寨子。转身望望逐渐隐没在树林背后的茅屋，我在心里说："别

了,山乡!别了,6年的农村生活!我要进工厂当工人,去追寻我的梦境。”尽管前方必经的那条山峡中的小路罩在浓雾里,阴森可怕,似乎在阻止一个处于十八层地狱又没有任何门路的“黑五类”子女进城去闯荡,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浓雾之中……

二

离开生产队时,我行李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贫下中农给我的一纸鉴定。这鉴定历数我的优良表现,与灰暗的家庭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身高1.68米,社员们总说我“个大力不亏”,其实不是力大,是干起活来舍得吃苦,舍得拼命。我一个人背过挞谷子的挞斗,一个人扛过扬糠的风簸,插秧割谷堪称能手,还尝试过像男子汉那样赶着耕牛犁田和耙田。夜晚,就着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我和女伴为全寨男女老少不知织过多少双线袜子。

在农村入了团,被选为优秀青年,每年都被评为五好社员。一次火灾中,冒着危险主动跑去救火,为抢救贫下中农的财产而负伤。

1969年,赴山西的安顺县学大寨参观团中仅有两名知青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这便是与自卑同时存在的我的自信。当时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之说,年轻单纯的我对此奉若神明,虔信通过劳动和与贫下中农结合能够脱胎换骨,能从那无可更改的“不由己”中走出一条“可选择”的路。

三

我设法在安顺郊区一所小学找到了落脚点,利用每天下课回城的时间打听,奔走,成了在招工组面前时不时冒出的文静而顽强的不速之客。

第一次遭遇便让我领略了现实的冷酷。

“父亲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历史问题。”“嗯?参加过国民党吗?”“参加过。”问话人的神经绷得更紧:“哪年参加的?集体加入还是个别加入?担任过何种职务?其他还有什么?”

我据实一一交代。对方的脸越来越阴沉,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们已招满了,你去别处看看。”这是我得到的最后一句话。

所有招工组都是一开始便盘查家庭,我走到哪里都得翻来覆去交代父亲的历史问题,有时只要说出父亲的名字,就会给我带来厄运。

塑料厂招工组。见进来一高个女孩,组长很高兴,正打算谈话,旁边有人神秘兮兮地捅了他一把,小声说:“这是××的女儿。”组长一惊,立即冷冷地说:“我们这里不招了。”我还未开口就被碰了回来。

几经失败后，我想只有改换方式，若能在招工组多待、多跑，让人家了解我本人，看看我的鉴定，或许会有希望。然而这毫无用处，只要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一切努力就都化成了泡影。

一次次伤害后，欲哭无泪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真不想再出门。然而为了前途，我仍顽强地奔波在各招工组之间。那天，又去登一个招工组的门。

打着酒嗝的组长望着我，面露喜色。"先谈谈家庭情况。"他吩咐我。我的心紧缩了，但不想谈也得谈。满屋的人静下来注视着我。

他的胖脸先是惊骇，继而鄙夷，然后突然把身子转了过去，和别人闲聊起来。我极其难堪地望着他的背影，咬紧嘴唇，站起身来，像在噩梦中那样一步步走出房门。这时，传来故意提高了的声音："这样的人也想进城来工作？谁敢要？进厂来搞阶级报复，炸毁了工厂我负不起责！"屋里爆发出怪声怪气的哄笑。我强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被人公然这样嘲弄和歧视让我感到空前的愤怒与羞辱，蒙受冤枉，满心委屈，面对狰狞的现实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深深地刺着我的心。

我发誓再也不去任何招工组，省得去受这份刺心戳面的折磨。然而，只要有新的招工消息，便有一股力量把我拉起来，再次捂上那仍在滴血的自尊心，用力去敲响那对我是如此森严的厂门。

四

树叶开始发黄了，我的前途依然渺茫。眼见一次次招工无望，母亲让我去试试马车社。可这里的头说："我们专管分派马车，现在正缺人手，不过你父亲有问题，我们不敢收你。"

管马车也要父亲没有问题？父亲，父亲，走到哪里都是"父亲"。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命运和前途的父亲，已经很久音讯全无了。我决定不顾一切去探望他。

步行二十多里到了荒凉简陋的农场，不敢找人询问，只知道几年来父亲一直在独自放牛，就往山坡上寻找。终于，对面坡上过来一群牛，后来跟着个驼背的、瑟缩的身影，两手围在胸前抱着一根长长的赶牛鞭。当放牛人终于来到我面前，我已几乎认不出他就是两年多不见的父亲了。他的胡子约有一尺长，在颏下杂乱地飘动，花白的头发很长很乱。身上衣服破旧，背上披件蓑衣，外加一个斗笠。脸庞十分消瘦，眼睛，最触痛我的是那双眼睛——那里装满了深深的孤寂、屈辱、痛苦和对这一切的默默隐忍。这哪像一个 20 世纪 30 年代就从名牌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分明不如街头的老乞丐！"爹……"我刚喊出一个爹字，喉头突然一哽，眼泪便像开了闸门的水夺眶而出。在一次次求职的失望中，我没有哭；在一次次直面社会对我的歧视和打击中，我强咽下眼泪。而此时，面对如此受磨

难的父亲，目睹荒山上、牛群中父女相见的惨景，几年来，尤其是进城找工作以来饱受的一切委屈、悲愤、辛酸，突然一齐向我袭来，我没法承受而放声恸哭，记忆中这种恸哭至今只有这一次。

探父归来，我的心更沉重了，只感到夜漫漫，路迢迢。

白天，我仍去郊区小学。放了早学，草草吃点东西，又等下午上课。这时，我唯一的去处是村边山垭口。那里有棵大树，坐在树下可以清楚地望见山下仅一路之隔的一个大工厂。我每天中午就那样坐在树底下，两手抱着膝盖长时间地深思默想，朝工厂凝望。虽可望而不可即也总要去望。厂里的工人何曾知道，山垭口上有双忧郁的眼睛，天天在窥视他们，那凄凉的眼睛里充满羡慕，更充满渴望……

没有退路的事实逼迫着我，心中的自信依然鼓舞着我，连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也变成了挡不住的激流，让我浑身只燃烧一个字：闯。继续闯。因此，我连那个时代最让人向往的011、083等“秘密厂矿”招工组都去过。自然没有结果。同伴善意地笑道，算了，你连管马车的地方都进不去还想进造飞机的工厂？那时我一笑了之。因为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寻找一份工作，我是在寻找一个答案，那就是：出身不由己，道路究竟能不能由自己选择？

五

这年8月，被称为“九化九化，贵州老大”的燃化部第九化建公司到本城招工。我又跃跃欲试了。

踏进这个由东北迁来的九化公司招工组，便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他们随和，平易近人，没有趾高气扬的救世主作风，更不同的是无论对谁，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家庭情况，而是“有没有推荐证明”？

我拿出那几张从来无人过问的写满字的纸。没想到他们忙不迭地打开，说：“来，来，看看贫下中农怎样鉴定你的。”那纯正的北方口音分外悦耳。姓丛的师傅和姓张的师傅埋头看着，不时抬起头端详我，并不掩饰脸上的惊异和赞许：“你去参观过大寨？还为救火负过伤？”“难怪你进门我就看见你脚上有块疤，正寻思那是怎么回事呢。”

热血涌上了我的脸庞。他们是这样地在意我用6年汗水写成的这一纸鉴定啊。而且，我穿着塑料凉鞋的赤脚上那块伤疤，竟一进门就在他们的视线中。脸红了，是因为腼腆，更是因为朦胧感觉到了这世界上“我”、“我自身”的真切存在，而不仅仅只有父亲的历史。

我觉得总算闯对了地方。

10月初，受到一场虚惊。下着大雨的一天上午，丛师傅突然冒雨来家告诉我将在本

地招收六名工人，其中一名是我，要我等着。

既然准备招收我，就得到父亲单位搞政治审查。能到政审这一步，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关，也是我最担忧害怕的鬼门关。果然，推开招工组的门，立即看到一张张严峻的阴沉沉的脸。我瞬时感到浑身发软，这里，我以为是讲政策的，是重政治表现的，是我唯一能找到出路的地方，而现在这里也“这样”了。“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你希望不大了……”他们说。顿时我觉得仿佛有座大山在眼前横空一挡，我和他们之间突然隔得如此遥远。泪水猛地冲出眼眶，我再也无法抑制，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无声地痛哭了。

然而有幸的是，我碰到的是几位不怕背黑锅不怕受牵连的正直而善良的人。最终，丛、张二位师傅主张不管家庭情况怎样，实事求是地依本人的条件来决定取舍，录用我。这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气魄与胆量啊。

然而，这仅仅是叩开了进厂的第一关，在我迈进厂门之前，竟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能通过公司审批，他们让我交出了保存多年的所有奖状和证明，放进我的档案带回公司。还让我也到九化公司去，住在他们的同事毕姨家中，以便审批中要见本人时好随叫随到。

第一次住进刚刚认识的北方人家中，仅这点就很令人不安。最不安的是每天都有人来“提审”我。那是热心的毕姨到处托人游说，这些人又总要找我亲自细问父亲的历史，于是我每天都得不断地重复叙说发生在几十年前，我根本不在场，也根本与我无关，而现在却要来决定我命运的那些事。

在这么多热心人的努力下，眼看审批就要通过了，没料到正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出身据称是工人而未被九化公司录取的女知青由其泼悍的母亲带着，抢在审批前赶到九化公司兴师问罪来了。她们斥责公司没有阶级立场，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这下如同晴天炸雷，公司有关方面立即作出反应：“马上把赵明和退回去。少收一个不要紧，别引来无穷的后患。”

从毕姨口里听说了这些。我只记住了张师傅留给她的字条上的那句话：“一切都完了。请转告小赵。”

“一切都完了。”我头脑里，不，整个世界里都只剩下这句话，一切都完了！有生以来没体验过这么透骨的绝望，它几乎让人窒息。夜深了，躺在床上，在昏暗中我大大地睁着双眼。没有眼泪，甚至没想到哭，疼痛的头脑在思索：怎么办？今后到底怎么办？我能做的都做了，能尽的努力都尽了，但现实冷酷地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有的只是唯成分论，道路不可选择！信仰和决心全线崩溃，自信和勇气丧失殆尽，我眼前的世界漆黑一团。天将亮时，闭了一会眼睛，即使在短暂的迷糊中，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种浸透骨髓的绝望！

天亮了,坐起身来,不禁吃惊,白色的枕头上竟有一层浓浓的黑发!仅一夜,我掉下了如此浓黑的一层头发!我的心战栗了……

告别毕姨,走上正下着小雨的滇黔公路,没有车,只能往回家的方向一边走一边等。衣服穿得不多,身上冷得发抖,但更冷的是我的心。

我不会忘记这绝望的一夜,也不会忘记这个早晨。群山隐在雨雾里,寂静的公路上没有第二个行人。当听见不远处火车的鸣笛声时,我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我冲动地想去卧轨自杀,想用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方式给那些唯成分论者一记耳光。在凄风苦雨的旷野中,我哭喊着冲上一条草坎,想奔到对面的铁轨上去,却又猛然趴在一棵树身上,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六

母亲已在家门前守望了很久。此去九化,家人都认为会成功,哪料到又是如此彻底地惨败回来。为不让母亲难过,进门之前我尽量装得平静,坦然,但那压抑不住的空虚眼神、彻夜未眠的倦容,一望便知结果。

在致命打击面前,亲情以特有的方式安慰了我。母亲不再多问,步履沉重而若有所思地走进里屋坐下,哥哥则以轻松的口吻说:"不要去想这件事了,我给你讲个笑话……"

"哈哈哈哈……"面孔木然的我陡然爆发了长时间的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使原本是想替我转移情绪的哥哥担心地盯住我的眼睛,生怕我一下子疯了!刚刚经过一场灾难,为什么就能如此地大笑?连我自己都不理解。是神经质吗?是因为哭得太多流干了眼泪,以致本该大哭却变成了大笑?

这一夜,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的我沉沉入睡,而我的母亲,就那样呆呆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叫到跟前,缓缓地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你今天得去找到招工组,对他们说,他们九化公司招收你本来是正确的,是按党的政策的,如果因为有人'告状'就把你退回来,就等于向世人承认他们做错了。"

是呀,母亲说得对,完全应该是这样的道理!我马上就朝住在市西饭店的九化招工组走去,路上碰见张师傅,我重复了母亲的话,他不言语,只紧紧地咬住了下唇。

中午,我在家洗昨天淋湿的衣服,一抬头竟见张师傅一脸笑容地立在门前,和善的细眼睛笑得眯成了两条缝。未等我开口,他便朗声宣布:"小赵,你被批准进厂了!人家军代表给你签了字,保送你!"我心里猛的一亮,人却怔怔地站住,呆了,扬着眉毛,微张着嘴,足足有几分钟。

原来,从、张二位感到自己虽没做错,但显得力量不够,若能寻得地方上的支持和推荐,估计公司会重新考虑。他们立即去找了当时地方上的最高权威机构——安顺县革委

军管会。素昧平生的军代表李殿祥详细听取了情况介绍，审阅了我的所有材料和那一叠奖状后，拍案而起："这样的青年，我们可以保送！"当下挥笔写下意见，签了名，盖上了县革委军管会的大红印章。丛、张二位随即向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公司回答："既然地方上愿意保送，当然就可招收。只是工种上要考虑。"

招工组给我看过军代表的签署。我泪眼模糊了。保送，曾被说成会去炸毁工厂的牛鬼蛇神的女儿，却由头顶五角星的军代表保送进"中央级工厂"。我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张公函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 为了全面体现党的阶级政策，像赵明和这样的青年不仅可以推荐，而且可以保送给第九化建公司。
>
> 安顺县革委军管会李殿祥

一颗受尽冷遇和屈辱的心，蓦然得到这样的信任、理解和有力的护卫时，只有四个字能表达心曲：终生难忘！

那时的社会风气与现在大不一样。军代表拯救了我，而我的回报不过是由张师傅领着到他的住处说了几句感谢话，表态说进厂后一定好好工作，临走倒让人家立正还我们一个军礼——这就是我与军代表的全部交往。从此再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他来到我面前我也认不出。但他的这张签署，却永远留在我心底，并永远激励我，鞭策我。

1971年11月23日，九化公司派来汽车接新工人进厂。从此，我有工作了！尽管饱经劫难，我仍很激动。太阳照耀着前方，未来的生活在热情地呼唤，我正一步步走近离开生产队时所追寻的梦境。我的亲人，还有不是亲人如同亲人的军代表、丛师傅、张师傅、毕姨……我永远感激你们！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父亲早已平反，并连续担任过三届市政协委员。那抛洒过青春与汗水的山乡，那如同一场噩梦的"文革"，还有那热烈神往过的工厂，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去越远。而从田野走进工厂的这些经历，以及在那种年代能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心灵闪烁着真善美光芒的平凡而难忘的人们，却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

赵明和，笔名萌禾，女。1965年下乡至贵州安顺旧州区、双堡区，六年后进入燃化部第九化建公司。1986年调入高校，先后担任贵州财经学院院报编辑、常务副主编、贵州财经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现为调研员。曾发表作品20余篇。

落户辽中的日子

杨 穗

乡村巨变

1965年的9月1日，我和我的26名高中同学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来到了沈阳附近的辽中县的张家村，那里有大片的水稻田和芦苇荡，地多人少，风景秀丽。唯一的缺陷就是一个字：穷。在全村清一色的土坯稻草房中，青年点的红砖瓦房在村里显得格外醒目。

那个年代哪是一个“穷”字能形容的？全村已经达到了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路不拾遗——没啥可拾的；夜不闭户——没啥怕偷的。家家进门就是一铺土炕，如果着一把火，啥也烧不起来。

村民吃什么呢？保证现代人任思绪怎么驰骋也想不出来——稗渣饽饽。这是用少量的玉米面和大量的稗草籽磨的粉混合而成的，吃得人人面露菜色，大便结燥。

冬天到来，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件空心棉袄，里面没有任何过渡的衣服。所以一些姑娘媳妇总是爱翻开我们的外衣，看着我们里面穿的毛衣和线衣非常好奇。

赵本山还有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呢，当时全村除了大队部有个喇叭，通信员有辆破自行车外，真像网上流传的搞笑诗：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村里的姑娘迫不及待地嫁出去，村里的小伙也自有办法。不知哪个开的头，从山东骗来了一个媳妇，于是滚雪球似的陆陆续续的都娶上了山东媳妇。结婚的时候的确挺像样的，新房的摆设总是一应俱全，大米饭也吃了几天。但是好景不长，先是家具不知不觉中没有了——原来是各家凑的，需要还的。吃的也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木已成舟极少有逃兵。再说山东老家上顿下顿的地瓜干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对于这些，公社领导自有评论：张家村人望房泊掉馅饼翻身等人挡。意思就是村民太懒了。

光荣入团记

听说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的时候，火车开动时站台上下哭声一片。而我们当年坐汽车奔向张家村的时候，是一路高歌一路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高兴劲儿不像是下乡，倒像是去大学报到。

究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年压抑的高中生活。学校地处沈阳的文化区，且设施齐备师资一流，所以学生大多由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组成。而知识分子家庭大多出身不好。所以自然形成了学校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在经过三年无数次和家庭划清界限的思想汇报甚至替老子作深刻检查而未果后，我们这些"另类"已经心灰意冷了，拿现在话说纯粹是"俏眯眼做给瞎子看"，整个三年白忙乎了，想要入团真比登天还难。你学习好怎么了？当年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当年的学生会的学习部长，考大学不是照样名落孙山吗？

怎么才能向党表明我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呢？只有下乡一条道。如我们所预料的，报名下乡后，立马见到了一张张久违了的热情的笑脸，我们立刻被冠以"革命青年"桂冠，自己也似乎觉得终于找到了组织，被组织承认了。

在这种情况下，下乡的感觉那真叫一个良好。抱着使命感，去解放全人类，所以我们挑选的地方是辽中县最穷的地方，发誓要靠自己的如花青春一腔热血去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农村的天地是广阔的，但是我们的心更加广阔。因为没有了出身的歧视，我们互相彼此彼此，当地的农民不但不歧视我们反而非常同情我们关爱我们，公社的领导很快宣布我们集体都入团啦！据说听到不同意见时，领导们义正词严地说：都下乡了，还不叫革命啊？还得怎么才算革命啊？

我们的心灵在歌唱，我们的思绪在飞扬，原来扬眉吐气地活着是这么的美好啊！所以我们在农村是非常卖力气的，六年后开始回城的时候，村里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基本都是我们这批人。

1968年的知青来了后，农民为了分清前后，把我们叫"老知"，把他们叫"新知"。在1971年第一批知青回城时，贫下中农委员会一致呼吁让"老知"先走，说是最听党的话的人应该最先得到好处。下到张家村的"新知"都比其他地方的回城晚，也算他们倒霉。

感谢爹妈早生我一年。听学校的学妹告诉我，1966年以后，我们这类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曾经有个同学被逼得写了一张大字报，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出身好的同学，是我



的父母剥削了你们的父母，我有罪，我得怎么做才能弥补我父母对你们父母做下的罪孽啊？”

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真是罪孽啊！幸亏我已经到了张家村，呼吸着农村的自由的空气，释放着自己被压抑多年的心灵。六年的农村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张家村更是我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

胜利大逃亡

现在回想起来，1965年刚下乡时的那股冲天豪气和如火热情是什么时候逐渐消退的呢？好像是在1968年后。“文革”的大潮波及了大多数人的父母，有关牛棚的，有遣送下乡的，有自杀的，有得病不让就医而死不瞑目的……这些无疑使得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受打击，再加上年纪大了，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了。



本文作者

所有当过知青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最盼望世界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地震，二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穷则思变吧，自己没出路了，就希望世界越乱越好，谁也别得好。

流传至今已成为经典歌曲的《沈阳啊沈阳》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知青填词借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优美曲调合成的歌曲。在那个无望的年代，大家都面向沈阳，用这首歌诉说自己的思乡思亲之苦：“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披上那节日盛装……有朝一日我回到沈阳，回到那亲爱的故乡，我和我亲人欢聚在一堂，共度那美好时光。”说句实在话，这个词填得有些逻辑混乱。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省的一个副省长曾经把词作了修改，改后的词主要是歌颂沈阳，词句优美逻辑清晰，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倒是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歌词，赢得了沈阳人的认可。现在一个沈阳人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眼里饱含泪水。

1971年，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由于年龄大了，纷纷考虑在农村成家，有的同学把箱子被褥都准备好了。我和现在的老伴也搞了几年的对象了，他家每月给他寄来30元

让他准备婚事。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春雷一声震天响,传来了知青抽调进城的消息,于是大家放慢了结婚的步伐,作好了进城的准备。

第一批共抽调11人,全村的“老知”、“新知”共五十来个,谁走呢?我记得当年的村支书说过一句名言:谁最响应党的号召,谁就得占点便宜,人家“老知”都来六年了,岁数大了,让“老知”先走吧。

于是这11个名额让我们“老知”占了大多数。谁走谁不走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决定,还是得让家庭成分好些的人先走。咱们这些人家庭都不咋地,矬子里拔大个,我丈夫也算是拔出来了,但是我就不行了,又是地主又是右派的,出线无望。于是我丈夫做了一个令自己一生都自豪的事情:走后门!他当过生产队长,和那些贫下中农代表关系本来就铁。他跑到人家里和人谈心,说我要自己走了,杨某就得死在张家村了。人家一听也有道理。当时我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像样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按老农话说“盖张纸,哭得过了”,于是我破例出线。直到现在,老伴提起这事还牛皮烘烘地,说他是走后门的老祖宗,让我每天一早一晚念诵两遍:感谢毕元把我带出张家村,否则我早就死在那了。

于是我们第一先卖破烂,好像卖了五元钱,把自己认为值点银子的打包带回去。终于坐上了接收单位开来的解放牌汽车,直奔沈阳。在车厢里大家都默默无语两眼泪,六年前,我们是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的,而如今壮志未酬,灰溜溜地回到了沈阳。进了沈阳城,马路两边的人们都向我们致意挥手,让我们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也有人高喊“力工回来啦”。的确,当年的知青回来哪有好工作啊。我当上了电焊工,丈夫当上了起重工(即架子工),至今家里用绳索绑点什么,老伴还能大显身手,会系各式各样的绳扣,相当的结实。

苦命的两口子

每年的下乡纪念日——9月1号,青年点的同学都要搞一次聚会。但是有两个同学却永远地不能来了,男的叫阿建,女的叫阿媛。

阿建死于心脏病,享年49岁;阿媛因尿毒症,于九年后追随老公而去。

1968年,阿建的右派兼教授的父亲从沈阳音乐学院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苦于家里没有劳动力,作为长子,阿建义无反顾地和阿媛离开了青年点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两个当时绝对想不到此举竟是拉开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大幕。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民县,他们一切从头开始。自己到河滩地去拉石子盖房子,种地养猪养鸡,所有的累活都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而两个弟妹则没有跟随家庭,留在了各自的青年点。最受罪的是公社召开批判大会,阿建需要顶替他爸去挨批斗,因为他爸身体不好,坚持不下来。

1971年我们开始陆续返城。他们两个因为"归户"了,就不算知识青年了,一次次的机会都与他们擦肩而过。1979年右派父亲平反后,他们才借光拖着一双女儿回到了沈阳,此时已经在农村生活了14年。

他们也跟命运抗争过。他们读夜校,试图用一纸文凭来改变命运,尽管成绩优秀,文凭到手,可是那个年代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规则,比如什么大集体不能转全民哪等等,总之他们后来只好自己开了一个杂货店来维持生计。

此时阿媛就得上很严重的肾炎了。治病得花钱,两个孩子都得上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由于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所以每年的春节都是初一在老丈人家过,初二就在我家过了,阿建对我们说他除了老婆孩子什么人也没有了。凄苦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和阿建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我老伴则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都跟他同学。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那真叫才高八斗,当年是我班的语文科代表,如果他能活到现在,有关蹉跎岁月的回忆就该由他来写了。而阿媛则是才女,《青年点之歌》的词曲作者,会多种乐器,至今我还记得她在学校的大厅里的钢琴独奏"旱天雷",学习成绩几乎门门100分。他们生不逢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不能上大学,由于特殊的家庭情况耽误了事业的发展,由于太仗义而毁坏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沦为以杂货店为生,生活还在继续地给他们打击。由于动迁,他们的杂货店从临大街给迁到了阴山背后,他们一没钱,二没人,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想阿建的糖尿病就是在这种糟糕的心情中得的,可怕的是他从不到医院看病,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直到1994年,他突然卧床不起了,才到医院就医,当时就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他由于糖尿病引起心脏衰竭。

几个月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也撒手人寰。阿媛此时已因为肾炎引起的高血压而得了脑血栓,那年他们都没到50岁。9年后的2003年,我和老伴在广州施工,传来了噩耗:阿媛因为尿毒症做血透,造成了脑血管破裂而亡,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在阴间相聚。

如果不是阶级路线,那么这两口子都会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都能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如果不是"归户",很快都会从青年点回城,也会有一个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工作;如果没有他家庭出身给他的最后的打击,他也许自得其乐地在自己的杂货店里忙乎着。太多的"如果",都没有给他一点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曾记得1962年的一个夏夜,上完晚自习的阿建曾经在开满槐树花的校园里对着明月给我背诵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当时的他神采飞扬,才华横溢。44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已是阴阳相隔。不知道阿

建在天堂上可好？你既然知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为什么还要这么急急忙忙地“乘风归去”？天堂再好，你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难道你不挂念吗？

你走了，你的妻子女儿失去了顶梁柱，我们失去了人生一知己，有多少次我们徘徊在你家门口，回忆着你生前的音容笑貌，回忆着我们两家人一次次的倾心交谈，你的妙语连珠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而今我们只有靠回忆来填充生活的寂寞，再也没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了。

是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苦乐相伴的日子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受苦的知青所受的苦都是相似的，但是苦中作乐所得到的快乐却各有不同：

一、打人了

青年点的房子盖好后，需要在院子里打井。因为地下水位很高，村子里都是使用抽真空原理打井，号称“洋井”。打井师父来了后，首先让我们把村里的电门总闸拉掉，因为用铁管往地下打的时候，上面就是裸露的高压电线，碰到就会出人命。一次一个同学拉掉电门后还在上面贴上一纸条：请勿合闸，但是在打井打到一半的时候，屋子里做饭的一个女生却发现电灯亮了，赶紧跑出来通知，打井师父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时候那根长长的铁管正在电线的周围上下移动，我们只好又去拉闸并且派人守卫在那里。

井是打完了，但是事儿不能完，被合闸这口恶气得出。经调查是村里的电工干的，于是在1965年的张家村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七八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走在深秋的土地上，步伐坚定表情决绝，如果换上一身黑西装，戴上墨镜，活像一群黑社会的打手。他们到了电工的家里，大喊一声：××，出来！那个电工心虚地出来后，还没来得及说话，首先就挨了一记窝心拳，然后又挨了一下无影腿。两分钟后，这群人扬长而去，回到了青年点，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据说当时咋呼得最欢的男生只是担任了站岗放哨，而平时文质彬彬的那个男生却是最先出的手。奇怪的是，那个电工后来反而经常来讨好我们，一点也没有复仇的迹象。

二、张家村的烧烤

现在我居住的是鲜族人扎堆的地方，来客人只能请人吃烧烤或朝鲜冷面，单调了点但却非常正宗。但我记忆中最鲜美的烧烤还在张家村。

那时候下地干活到了地头时，打头的首先派一个“半拉子”（其实就是辍学少年）去偷其他生产队的毛豆或其他可吃的农作物，这样这个“半拉子”就不用干活了，只要机灵点

不被人抓到就行。等我们这些人干到了休息时间，这个机灵的“半拉子”早就把毛豆放在干柴上烧熟了，我们就围坐在火堆旁，饿虎扑食般的恨不得手脚并用，在灰烬里找出烧得黢黑的毛豆，只听得一片吧唧声，最后个个满脸满手黑糊糊的，活像个包公。吃渴了就进行第二步：用铁锹在地下随便挖个坑，清澈的地下水就冒出来了，再随便撅一根芦苇，趴在地上，把头伸近水坑用芦苇管吸水，那水真叫一个甜哪。第三步就是吃饱喝足了到附近的水沟里洗脸洗手，再把烧烤现场毁掉就齐活了。现在想想，在农村的田野里吃烧烤总共分三步，还一分钱也不用花。

三、吃蛇记

生产队是水田，各种蛇很多。当地人是不吃蛇的。有个同学是湖南人，有点类似广东人，什么都吃，越是别人不敢吃的他越爱吃。他发出通知，凡是抓到蛇的都给他送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大显身手，用红辣椒炒了一碗蛇肉，闻着好香，别人还是不敢吃，我可没管那套，跟着他吃了个够。

那天下地，我俩因为吃蛇肉都去晚了，到了地头，全体社员都用担心的眼光看着我俩，好像我俩刚吃完毒药。一个跟我最好的农村小姑娘，那天下午始终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她说怕我什么时候出现中毒症状好及时抢救。我们就这么以身作则大吃蛇肉，可张家村人自始至终不肯向我们学习。

四、占了大便宜

到了秋天，排水沟里的螃蟹都成熟了，我们胃口的收获季节来到了。晚上提着马灯，成群结伙地去抓螃蟹，光着脚在排水沟里踩，脚底下硬硬的就是一个个螃蟹了。一个晚上几个人能抓一水桶螃蟹，回来煮熟后大家分享。记得一次每人分到四个，一个女同学说她不敢吃，跟我商量用螃蟹身子换我的螃蟹腿，结果她吃了八个螃蟹的腿，我吃了八个螃蟹的身子。这次占的便宜可是空前绝后的，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五、学的俄语用上了

大家轮流做饭，轮到一个叫刘俊的男生做饭时，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公一母两只小狗，整天陪伴着他。他为公狗取名“伊凡”，为母狗取名“安娜”。说来也怪，伊凡特懦弱老实，而安娜如同河东狮吼贼泼。于是大家叫刘俊时，就连带两只狗一齐叫：“伊凡懦夫，安娜泼妇，刘俊伙夫！”这下大家看出来了，我们当年学的外语是俄语啊。

可怜的是，严冬来临时两只狗为了取暖，钻进了灶坑，新换的伙夫不了解狗的习性，一把火就给熏死了。

两个农民

回想张家村的农民，首先跃入我脑海的是两个人：丁大爷和倪二哥。

丁大爷是我们到张家村最先和我们接触的农民，因为农村做饭都是大铁锅，公社领导怕我们不会用这种大锅，就派了丁大爷来给我们做饭。现在想想这一举措还是很英明的，别说大锅，就是小锅我们也不会用。丁大爷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长得倒也慈眉善目的。我们这伙人是抱着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根农村闹革命的态度来的，这下看到一个嘎嘎新的正宗的贫下中农了，就别提我们对他多好了。我们的衣服他只要看上了就随便拿，青年点的伙食本来就比当地农民好，丁大爷是做饭的吃得就更是好上加好了。由于我们是首批出现在张家村甚至辽中县的知青，所以公社给我们很好的待遇，起码大米饭管够了吃，丁大爷做饭又好吃，几个月下来，我们个个都像气吹的似的。当年那没有施用化肥和农药种出的东北大米，真是太好吃了，油汪汪的，没有菜都能吃两大碗。女生们尤其立竿见影，我们在前面走男生就在后面学我们走路的样子，胖得两条胳膊都耷拉不下来。丁大爷非常同情我们，总是用一种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不理解我们干吗放着舒服的城里生活不过，跑到这里来遭这份罪。虽然当时我们感觉他觉悟不高，但是还是从他那里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后来我们自己学会了做饭，大队部就把丁大爷撤回去了。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时髦的时候，丁大爷居然还给我们贴了一张。他以最了解我们自居，非常权威地声明我们这伙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怎么样，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云云，他要反戈一击。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居然赋诗一首作为大字报的结束："这些青年人儿，都是资本家的儿，不是牛鬼儿，就是蛇神儿！"看得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当时怎么没发现丁大爷有这么高超的文学水平呢？看来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农民如果给了他一个表演的舞台，给了他一个适合的政治土壤，他也会摇身一变，变成使我们感觉陌生的角色。在"文革"中，千千万万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不都走火入魔了吗？

倪二哥比我们大十几岁的样子，家就住在青年点的对过，相隔一条土路。他是我们的常客，为人非常之热情，那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种菜，闲暇时间和我们唠叨村里的稀奇事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整得（辽中土话）我们对他很有依赖，非常喜欢他。但他又是狡猾的。比如一次赶集回来，哭丧个脸到青年点，说在集上把布票丢了，大家马上好言相劝，之后纷纷给他募捐布票，还有个同学把她妈新给买的大头鞋也送给了他。后来别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他在集上把布票都用光了，买了不少的布。我们才知道上了那厮的当了，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孩子多，太穷了。"文革"期间，农村割一切资本主义的尾巴，连农民的那点自留地都收回去了。倪二哥就更穷了，以至于发展到去偷生产队的塑料布（培育秧苗用的）到集市上卖，结果被人发现，公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把倪二哥好一顿批斗。去年我们到张家村还看到了他，可能是由于生活好过了，满面红光的，但是人却是痴痴呆呆的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给我们讲笑话时的机智幽默的影子了。世事沧桑，时光荏苒，一个聪明狡猾的农民，一个热情幽默的农民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红房子里面疯子多”

人们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年一起下乡的26名同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被称之为“知己”。回想我一生所经历的各个群体，总是觉得“青年点”这个群体是最令我心情愉快、心意相通的集体。

这是因为我们这群在1965年下乡的同学有着同病相怜的人生经历。当年的沈阳二中和现在一样，是沈阳市尖子生荟萃的高中。但是当年特殊的政治气氛使得我们这些政审不合格的同学别说上大学，就连在城里找个工作都难。于是乎大家聚集在张家村就是人以类聚的必然结果了。

青年点人才济济，首先有个同学作了一首《青年点之歌》的歌词，马上就有个同学谱了曲，于是这首歌就一直成为我们的“点歌”：“我们是党的好儿女，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改变穷和白，永远跟着党向前进……”歌词全都是豪言壮语，鼓舞士气的。每当夜幕降临收工回家，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一群年轻人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美好理想，引吭高歌，歌声在混合着青苗和野花香味的空中随风飘荡，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令人难忘的一幕啊！

当年农村实行工分制，按照活的类别和人的体力计算报酬，但大家都要求秋后算账的时候平均分配，其实这样男生是很吃亏的。大家说一定要把青年点办成“乌托邦”，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脱离了实际的理想状态，实行了一年就被女生们反对掉了。

男生始终是非常照顾女生的，没有柴烧时，男生下工每人必须带几捆回来，女生则不必。最令我难忘的是，几年之后，女生的身体明显不支，首先表现在吃不进去饭，于是男生主动在做饭时给女生蒸一盆大米饭，而自己还是吃玉米面饼子，这种照顾一直到大批知青回城。当然女生也为男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拆洗被褥什么的。青年点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就是兄弟姐妹。

令当地人难以理解的是，公社曾经要把青年点迁到一个比张家村富裕得多的地方，我们竟然坚决不去，沈阳的东北制药厂来招合同工我们还是坚决不去。那是一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代。现在还有谁能理解当时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呢？

所以当地人说红房子里面住着一群疯子（青年点是村里唯一的红砖瓦房），于是“红房子里疯子多”的诗句纷纷出笼：

有看破红尘的：红房子里疯子多/假假真真奈若何/不忧今朝逢场戏/但恐来日梦南柯。

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红房子里疯子多/不循世故不拘格/言狂心奇笑明

日/志远哪怕人难摸。

还有豪气冲天的：红房子里疯子多/无须愁肠叹奈何/二载挥汗铺绿毯/三秋舞镰斩金波/曾将宏图相思虑/总把农事共商磋/笑指千斤任重处/便有狂人含笑托。

总之，一本不知道是谁的日记本随便扔在了炕上，谁有了感慨，谁就胡乱写上几句。我还算是个有心人，临回城的时候抄录了几首，一直保存到现在。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开始回城，至今已是35年了，每年的9月1日，必定聚会一次。先是拖儿带女的，逐渐儿女长大不跟着了，现在都是利手利脚的，我看很快就会带着孙子孙女参加聚会了。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离开张家村，大规模的回农村旧地重游搞了三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张家村，因为那是我们曾经放飞理想的地方，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幼稚，甚至很疯狂，但是我们当年毕竟太年轻了啊。

作者简介

杨穗，1946年生于苏州，1950年随父母来到沈阳成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1965年高中毕业，因政审不合格，不但大学不要，连街道小工厂都不要，只好下乡。1971年回城当过电焊工、不在编制的“黑”干部，1979年电视大学毕业后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干部，其实就是技工学校的老师。后来因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黄了，又回到公司机关混事儿，53岁的时候被人一刀切回家。

我的名字叫郑畹兰

夏先争

前不久,知青朋友聚会时,曾经和我上山下乡到同一公社茶场的老朋友邓鹏对我说:"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改回来嘛。"一提到改名,我的心就隐隐作痛,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立即浮现眼前。

中考堕渊

1964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于重庆六中(现名"求精中学")初中毕业。数学中考后走出教室,教我班数学的周南芸老师立即拿着她在考场外做好的数学考卷与我查对做题步骤和答案,见我分毫不差,高兴地对我说:"你应该是100分(满分)!"其他科目也感觉考得很理想。正当我踌躇满志地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班主任何恩勤老师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依你女儿的成绩,完全能考上三中(当时重庆最好的重点中学)。但是,因为家庭问题,很可能落榜。"两天后,我果然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

与此同时,我班成绩前三名同学中,除我以外,还有向继卿(现名向继红)同时落了榜。其原因是她解放前三年已来重庆当教师的母亲正在被追究"逃亡地主"问题。随后得知,全年级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全部落了榜。而出身优秀的"红五类"同窗们无论成绩优劣,却统统考上了高中或中专。

学校的革命教育虽已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血统低人一等,心里仍然愤愤不平。尽管《招生简章》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但是,我的中考成绩肯定会超过大多数考生,就是把"好"出身的录取完了,也该轮到录取我呀!年少幼稚的我哪会想到,已有明显血统歧视的《招生简章》还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一位当年在

高校任教的兄长告诉我，1964年时，教育界有规定：在文化教育上，要“让地主资产阶级断子绝孙”！ 44年后，当年的班主任何恩勤老师歉疚地对我说：“那时贯彻阶级路线，早在升学考试以前，学校教务处就已在每一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的表（指‘毕业生政治审查表’）上全部加盖了‘不宜录取’的印章，那时就已经确定你们不能上高中。”

我所谓的家庭问题，就是指我一丝不苟的老会计父亲1957年对单位领导挥霍公款吃喝提出意见被报复性地打成右派，关进监狱，服刑中又因抵制非人待遇罪加一等，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962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堪重负的劳改使极度营养不良的政治犯们接二连三地死亡，也因营养不良而全身高度浮肿、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因而被释放回家，交地段街道办事处劳动管制。

由于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外地，母亲得以对年幼的我们隐瞒真情，邻里更不知我家有个劳改犯。父亲回家以前，尽管不时见母亲将家里稍值钱的东西送进当铺，也没多想，认为那些旧玩意儿反正多余，日子依旧过得无忧无虑。

1961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填写招生履历表时，舐犊情切的母亲让不知底细的我照常填写了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和职业，隐瞒了父亲的“反革命”身份。我就读的中山四路小学当年只有几个报考重点中学重庆六中的名额。填写报考志愿时，老师对全班进行了告诫：“要充分估计自己的成绩水平，不要只填好学校，小心落榜！”听后，我心有余悸，不敢高攀，老老实实地填上了我校的对口报考学校曾家岩中学。班主任邵荣生老师看了我填写的志愿表后，问我：“你爸爸妈妈会同意你读曾中？”还未等我开口，马上用钢笔将我填写的“曾家岩中学”划掉，改成了“重庆六中”。我担心地对邵老师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邵老师很有把握地说：“没问题，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果然，我考上了重庆六中。而与我家同住一幢宿舍楼同年级的伙伴李德芬虽然成绩优异，却因在履历表上写了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同学骆振坤因写有母亲是右派，全都落了榜，她们只得去读民办初中。但凡履历表上写有家庭“问题”的其他同学也都没有考上初中。因而，我至今感谢母亲当年义无反顾地为我遮风挡雨，让我暂时躲过了血统论的荼毒！

父亲回家后真相大白。1964年中考，我在履历表上老老实实地填写了父亲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地落榜了。我中考落榜让全家笼罩在阴云中，尤其是母亲心情更加沉重：这预示着四个儿女都会因为家庭问题遭受失学之灾！想让孩子们上学，就只得与反革命丈夫断绝关系。

我父母之间感情甚笃。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五年，母亲一直等待着父亲回归；父亲被释放回家两年来，母亲受尽当反革命家属的羞辱也毫无怨尤。父亲回来前几个月，母亲的工作单位重庆市邮局的光荣榜上，赫然贴着母亲当选重庆市先进生产者的大照片，写着一大堆介绍先进事迹的文字。父亲回家后，母亲先进的光环立即褪尽。由

于父亲的牵连，母亲被撤销了所在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和党内职务，调离要求政治可靠的原科室，闲置一旁干杂务。父亲定期接受街道办事处审查训话时，也通知母亲陪同听训。母亲默默地承受着工作单位的处罚与精神上的折磨，与父亲依旧相敬如宾，丝毫也没产生与父亲分手的念头。然而，为了儿女的前途，1964年9月，父母被迫离婚，父亲独自离开了家。一个月后，无路可走的我远赴大巴山当了知青。

改名换姓

孰料阶级路线“天网恢恢”，父母的牺牲完全是徒劳的！ 1965年7月，成绩优异的弟弟小学毕业考初中，履历表上如实填写了家庭情况，仍然步我后尘，照样落了榜！令人更加束手无策的是1965年教育部门收回了民办中学自主招生的权利，与公立学校执行同样的政治审查标准，民办中学也不准接收任何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连民办中学也不要的未满13岁的弟弟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少年”。学校开学后，大街小巷中，仍然游荡着众多年幼的“黑五类”失学少年。街道办事处害怕大家在社会上惹是生非，便把我弟弟他们召集起来，收取学费，让几个落榜中学生随便讲点课，美其名曰“街道夜校”。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黔驴技穷的街道办事处被搞得焦头烂额，不得已，当局才让民办中学把弟弟他们收留了。

弟弟落榜后，忧心忡忡的母亲再从家庭问题深挖根源。为了争取儿女受教育的资格，母亲还能想到的办法，便是让我们四姐弟更改姓名，与“反动”血统完全脱离关联。母亲给已下乡的我寄来单位出具的证明，让我改随母姓，名字由郑畹兰改为夏先争。从此，我彻底“改头换面”了。

说实话，在我心里，真希望与反革命父亲没有任何关系。自从父亲劳改回家，被街道办事处指定在我们重庆市邮局家属区里打扫卫生以来，我家的好日子就被彻底颠覆了。欢笑离开了原本温馨的家，我们戴着“反革命子女”的紧箍咒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每当我放学走进家属区，心情立刻变得阴沉，只要听到有人叫喊“反革命”，便会加快脚步逃回家。课间闲聊，只要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家里的天伦之乐，我都会默默走开，我不光搭不上言，更害怕别人问及我的家庭生活。开始，班里没人知道我家的情况，自从在全校高、初中毕业生下乡动员大会上，班主任将我作为成绩好、出身不好的典型让我上台表态，并在我自拟的发言稿中替我添上“我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我一定要与他划清界限”的字样让我当众宣读后，我的家丑在学校曝了光。此后我每逢走在校园里就会很不自在，总觉得人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

学校的革命教育已深深地刻进我的骨髓，使我一直怨恨父亲。那两年我对父亲说话不仅吝啬“爸爸”二字，还不时对父亲冒些不恭敬的言语，把这种对长辈不尊敬的行径视

为“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并把父亲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体贴荒唐地看做是“反动派拉拢腐蚀下一代的惯用伎俩”。父母离异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不再直面反革命，不再那么“黑”了！如今，我与生俱来的姓名已彻底改换，在我心中，父亲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沉重的履历表

熬到下乡的第八个年头，进入1971年下半年时，披着知识青年外衣的我几乎知识殆尽，被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道山民。我对前景已不存任何奢望，准备在贫穷、落后、闭塞的大巴山区一如既往地度此一生。

突然，传来要在知青中招工回城的消息，这石破天惊的喜讯激动着渴望回家的每一位知青的心。随后，公社下发个人履历表让我们填写，以备招工审查用。一张十分钟就能填好的履历表却让我好几天都不能完成。问题仍然出在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面貌”这个致命的弱点上。我绝不能再像当年升学那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1964年考学校，实则考出身；八年之后招工，照样是招出身。尽管我下乡后曾担任社办茶场副场长，撤场插队后又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表明“脱胎换骨”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且母亲又是共产党员，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只要父亲的情况在履历表上表述不当，我就没有调工回城的可能。

一筹莫展之际，我去找同一公社插队的知青朋友卢晓蓉大姐讨教。卢晓蓉是爱国实业家、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长孙女。1965年，因为爷爷的“问题”，这位当年巴蜀中学的尖子生被学校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典型高考落榜。而卢晓蓉却是听党话、跟党走的典型，带头下了乡。我曾祖父郑东琴曾是重庆民生公司董事长，与卢作孚先生志同道合，情深意笃，数十年如一日，我因此对晓蓉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信赖感。深受血统论迫害的晓蓉姐与我惺惺相惜，冥思苦想后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在父亲情况一栏只写‘已与母亲离婚，与家庭无任何联系’，其他情况一个字也不写！”多妙的表述呀！既没隐瞒家庭情况，又开脱了与反革命父亲的一切关系！让我一阵惊喜，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履历表还要求填写“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这也是件让人费神的事情。亲戚们与我家“黑”得几乎是半斤八两。唯有七叔，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然而由于父母离异，这面鲜红的大旗已不能用来遮丑了。我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舅舅们的出路可想而知。读旧学的大舅崇尚孔孟之道，为人忠厚善良，有一副菩萨心肠，经常用开酒作坊挣来的钱接济贫穷的乡邻，口碑很好。即使土改后，村民们仍成群前来，心甘情愿地帮助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大舅妈耕田种地。大舅一家总用最好的酒肉饭菜款待大家，其乐融融，也因此招来横祸。1955年，大舅因“拉拢贫下中农、腐蚀贫下中农”等

罪名遭逮捕，押送新疆劳改。毕业于四川大学的二舅有很好的学识，1949年前曾任督学和成都省立中学校长。但因其间当过剑阁县县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历次运动没有少吃苦头，“四清”运动时被遣返回永川老家农村监督劳动。（外公1933年病故，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如果把这些写进履历表，调工回城哪有可能？

父系亲戚当然不会往履历表上填了，也实在没有可写的。我爷爷作为长房长孙，师专毕业后便回到永川县城老家管理家族的财物和田产，同时经营布庄和酒精厂，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赶下乡管制劳动，1955年病逝。当财务科长的四叔（按家族排行，四叔、七叔是父亲亲兄弟）1957年被错划右派由东北遣返原籍，妻子离他而去，无处安身，带着四岁儿子来到重庆南岸清水溪曾祖父家栖身，在就近农村监督劳动。积德一世的曾祖父在“文革”来临前病逝。“文革”中，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小将对资本家的遗孤毫不留情，抄了曾祖父的家，拿走了所有物品，强占了那幢两层楼的小院，将年迈的曾祖母及伺候身旁的二婆（曾祖父的二儿媳）、四叔父子等全部赶出了家门。还多次把曾祖母、二婆和四叔拉去挂上“黑”牌、脱光鞋袜、赤脚站在炭渣上或跪着进行批斗。遭受如此变故和打击的曾祖母受尽磨难后离开了人世，二婆后来精神失常。繁重的农活及“文革”猛烈的批斗已让戴着右派帽子的四叔看不到出路，加之受到严重胃疾折磨且无家可归，四叔绝望了。他不愿继续成为亲人的拖累，丢下年幼的儿子离去，至今下落不明（其后，单位前来为四叔平反，仍没找到人）。重庆大学会审系毕业的姑妈和姑父因家庭出身问题历次运动均受牵连。姑父因地主家庭出身，且1949年以前就在重庆民生公司财务处当会计，从1951年起，每次运动都被清查，难以过关。“文革”中不仅抄了他们的家，还把在银行工作的姑妈赶到北碚乡下劳动，把姑父关进由荷枪实弹军人把守的“牛棚”。这样的亲戚们，别说无须填，就是当写的，我也得抹去呀！

社会关系一栏是不能空白的，只有找个远亲替代。与我家往来密切的三外公（外公的三弟）一家在我看来是最相安无事的。没想到有一天夜晚，三外婆提着一大包东西匆匆来到我家，与我母亲窃窃私语。过后得知，一个远房亲戚带着一个同乡来重庆，找到她家投宿，同乡恰巧曾是租用三外公家土地的农户，这让三外婆大吃一惊。因三外公从读中学起，直至北京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丝厂工作，从未管理过田地，老家分给他的那份田产一直挂在三外婆头上。土改时，不仅给三外婆划了个地主成分，还令三外公回乡管制劳动。重庆蚕丝公司得知三外公正是他们稀缺的专业人才，前往要人，后经单位书面保释，才得以自由，到该公司工作。

随后，师范校毕业的三外婆悄悄来到重庆，曾在幼儿园和多所学校任教。逃亡地主一旦押回原籍，除没收全部家产外，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往往让人难以承受，致死者也不在少数。三外婆每每想到那些曾经耳闻和发生过的可怕场景就不寒而栗。她除了

好菜好饭款待客人外，临走时又送了厚礼。来人虽表示回去后绝不向外人泄露三外婆住址，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如此紧张的年代，谁敢相信一句口头保证呢？三外婆从此心神不宁，将家里的细软分散到几户亲戚家暂存后，仍然不断做着被捆押回乡的噩梦。其后搬了家，没告诉邻居新住址，方才静下心来。这些写进履历表也不合适呀！

挑来选去，即便六亲不认，还是左右为难。最后，我只好在履历表社会关系栏填写了一个舅舅，他是三外公的儿子。舅舅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当工程师，本人没有"政治问题"，舅妈是工人出身，只要不深究，可望蒙混过关。其实，当年填写履历表时，不光我如此，许多人都会在社会关系栏选择性地填几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领导干部等头衔，能给履历表带来"政审"优势的亲戚，而避免提及有政治问题者，以免引火烧身。

当我自觉天衣无缝地填完履历表时，吃过血统论大亏的邓鹏却立即敏锐地捕捉到我政治疏忽的蛛丝马迹："曾用名郑畹兰，姓名又是夏先争，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家庭出身肯定有问题！""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儿？！"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复思量后，找来小刀，将曾用名一栏的"郑畹兰"三个字小心翼翼地刮掉。还好，履历表的纸没被捅破，名字也完全看不见了。

履历表终于顺利通过了政治审查！ 1972 年 4 月，我如愿以偿，调工离开了农村。

痛定思痛

改革开放的春雷惊醒了执迷于阶级斗争的炎黄子孙，"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干戈相向转化为社会和谐与经济腾飞，在阶级斗争中备受煎熬的"黑五类"及"狗崽子"们终于跳出了苦海！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让许许多多的"黑五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无数个温馨的家庭被彻底摧毁，而我家却幸运地劫后余生。全部下乡的四姐弟陆续招工回城，摆脱了血统论羞辱的我赶上了教育的加班车，圆了大学梦。1979 年，父亲的罪名得到彻底平反，与母亲复婚，曾经破碎的家庭终于团圆。

从我女儿上学以来，历次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上，"家庭成分"、"本人成分"之类政治等级划分的项目已不复存在。她再也无须因血统"低贱"而困惑苦恼，也不必再为借用"红色"保护伞而绞尽脑汁。凭着自己的学习成绩，我女儿不仅念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而且读了研究生，完成了博士学业。宪法赋予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终于归还给了"狗崽子"！

前些时候，与卢晓蓉大姐聊起了当年填写招工履历表之事，我感谢她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让我跳出农门，改变了人生轨迹。晓蓉姐马上说："赶快替我向你父亲道个歉吧，当年我伤害了他老人家！"是应该认真地向父亲道歉了！当年，我是在往父亲的伤口上撒盐呀！我每每忆及当年妄信蛊惑、视父如仇、泯灭人性的行径，便深感痛悔！感谢神灵的护佑，让饱经沧桑的父母健康而长寿，使我能有机会尽孝道，弥补对父亲的伤害。

邓鹏说得有理，应该还我郑氏家族一个历史的公道！我的曾祖父郑东琴，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在合川、涪陵、巴县（即重庆）等地任县知事（县长），深受百姓爱戴，曾担任重庆警察厅厅长。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弃政从商，在我国航运业极度凋敝之际，把自己的全部心智和资金投入民生公司，用于发展民族航运事业，与卢作孚先生一道，为转运保存我国用于抗日战争的军事工业奉献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尽管当年因此而株连后代历尽磨难，但那不是他的耻辱，而是时代的耻辱，我们作为他的子孙应引以为自豪！我的名字应该回到郑氏家族中去！

然而，这件貌似简单的事实际上却难于实现。自填写招工履历表以来，我再也没有填写过曾用名。刚回城时，工作单位仍然严格地执行着阶级路线，我不敢声张，害怕露了"马脚"；极左狂飙过后，我既怕触碰伤痛，更缺乏祥林嫂那样的勇气，向人们无休止地重复解释既往。回城36年来，在我先后工作过的单位同仁的记忆中，在我的大学同学和老师的记忆中，在我交往的各界朋友的记忆中，在我诊治过的所有病人的心目中，在我的户口簿上、在我的大学毕业证书上，在我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上，不存在"郑畹兰"这个姓名，她早被血统论湮没了！

那么，就让祖宗赐予我的姓氏和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带着一代人心里的啼血走进历史的陈列馆吧。但愿她能警醒子孙后代：千万别让极左思潮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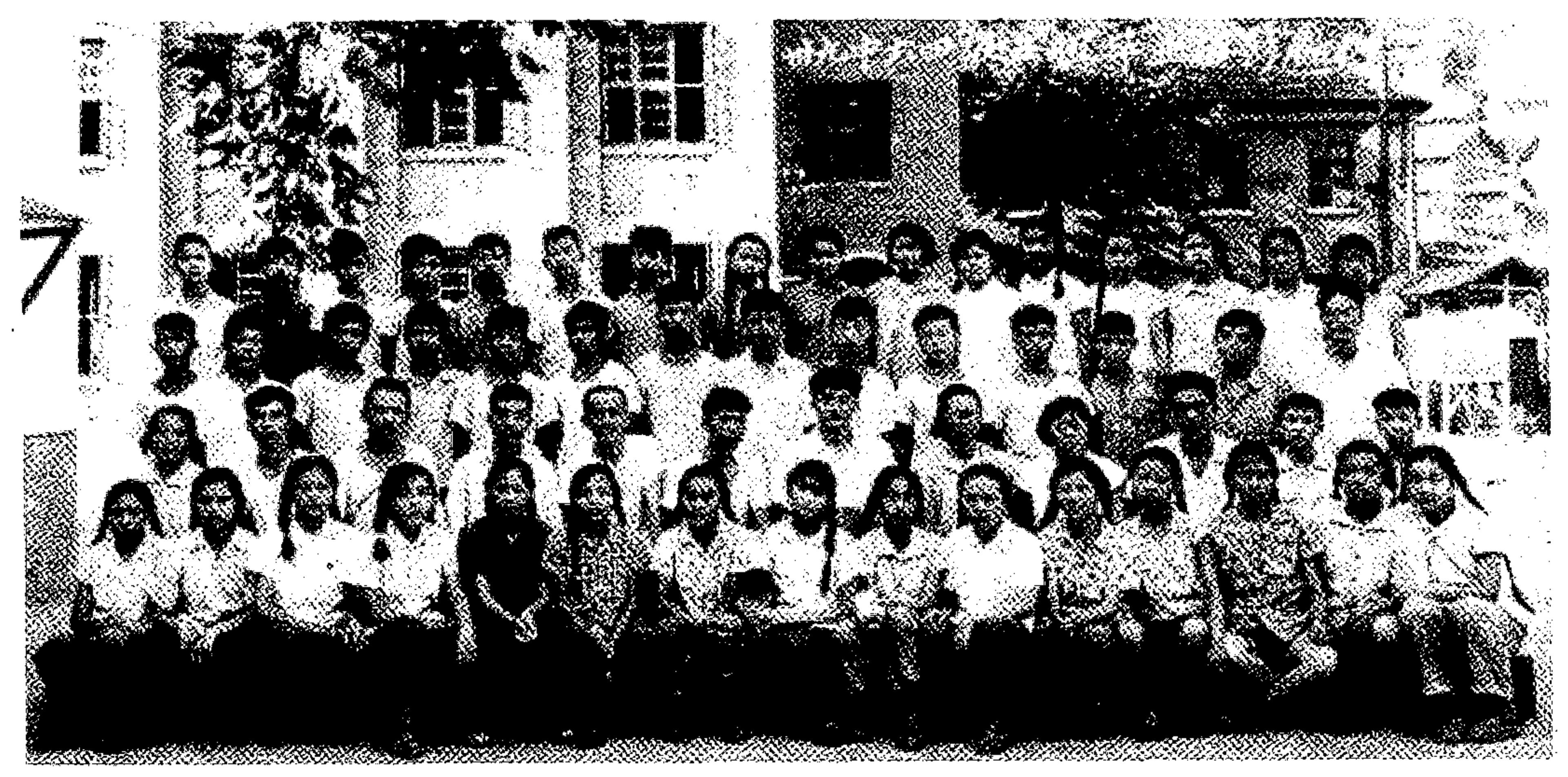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夏先争，女，生于1948年11月。1964年重庆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当知青。1972年回城，后考入张家口医学院学习。毕业至今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中国水利水电十局医院工作，现为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

南江纪事

何隆华

川东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自古苦寒之地。上个世纪 1933 年，呼啦一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地，“干人（穷人）闹翻身，分田、分地、分粮、分房子、吃饱饭”等当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色苏维埃书写的标语，在大山的崖壁上还随处可见。“文革”前的 1964、1965 年，1174 名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被送到这里，分散安排在南江县 59 个公社办的农、林、牧场里。他们来自重庆市南岸区和北碚区，大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够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蛮和饥饿



后排（第四排）左起六为本文作者

在社办场干部的助虐中,突然向这些远离父母的城市少年展开了生活最严酷的一面。

人最害怕没有希望,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人基本没有自由的年代里,这批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被打入了"另册",要求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或"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到大巴山的贫瘠山区去扎根务农,脱胎换骨。其实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到农村后甚至连当地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没有,不能读书、不能参军、不能被招工,甚至不能投亲靠友、拜师学艺,只能在远离家乡七八百公里的大山里挣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长的。1964年秋天,从9月中旬开始,连续下了两个月淅淅沥沥的秋雨,我所到的南江县黑潭云顶山社办场临时搭建的茅棚里里外外都是水,蜗居其中的我们被浇得个透心湿。早上天刚亮,公社驻场干部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轨,催命般把我们赶到山上,套着沾满泥土露出脚趾的破鞋,身材瘦小的知青(当时笔者身高不到1.5米,体重不足40公斤)艰难地在泥泞的山地里劳作,耳边不断传来公社驻场干部的大声吆喝:"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莫要偷懒。"少得可怜的一顿午饭要半下午才送到地头。天黑收工后,知青还要饿着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窑柴在泥泞中爬行几十里山路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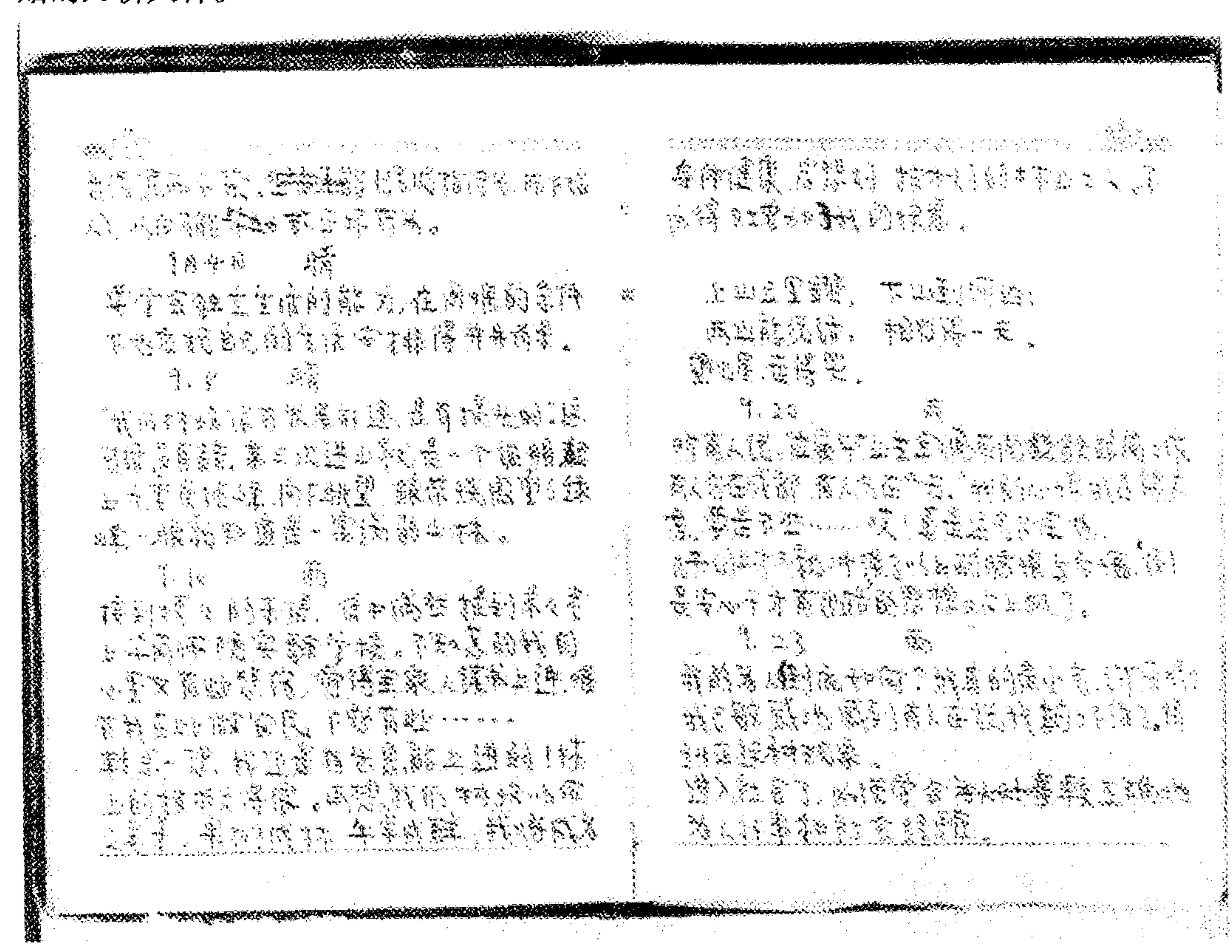
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钱,还因为林场管理混乱,年终从来兑不到现。这样的日子知青们并不感觉得苦,苦的是他们当中一些人为了早日"脱胎换骨",在干部怂恿下打小报告挣表现;苦的是领导宣布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扎根、开花、结果,永远不要想回家;苦的是这样的生活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大山的冬天总是来得早,雨季刚过,山风夹雪,刀子一样刮得饥肠辘辘的少年东偏西倒。在家心比天高,出门命比纸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流淌。买不起照明的煤油,漫长的冬季夜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收紧捆在腰间的草绳,蜷缩起冻得发抖的身躯,窜到邻近农家的火塘边去烤火。

1965年,南江县整顿社办场,县、区组织的工作组下到各公社。正直区8个公社林场"表现不好"的知青被通知集中到菩船公社办学习班;邻近的长赤区红光林场揪出了15岁的"强奸犯"陈春明,宣布逮捕法办(此冤案达县地区公安局1978年5月8日才通知否定撤销,详见杨兴全文章《凋零的花季少年》)。南江县安置办公室杀鸡给猴看地向全县59个社办场发出整顿通告。工作组向农民宣布:知青是来接受改造的,谁要不好好劳动调皮捣蛋,就把他一根绳捆起来送到县上。不少林场的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强奸。"文革"开始后的混乱日子里,山里的丛林原则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们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线,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寂寞终于使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是非观念,当地淳朴的山民也成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对象。他们成年累月地在打群架、被批斗、逞凶、偷鸡、摸狗、扒窃和百无聊赖的绝境中抛掷着无价的青春。

有儿不用教,“通南巴平”走一遭

南江县与巴中县交界处有一片苍莽的群山,其中圆顶子(现改名云顶)、土地垭、方家山、龙耳山,九重崖(当地农民叫撞鼻子崖)是这片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按照当时“林场办在山头,不与农民争地” 和“越是艰苦越是安置知青扎根的好地方”的原则,正直区8个社办场大都办在这些山顶上。山上气候多变,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雨,云多、雾多、湿气大,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山上道路陡峭,“看到屋,走得哭”,“两山喊话能见面,相见得一天”。山上土地贫瘠,石头多,地少,当地农民主要种植包谷、红苕、洋芋,靠的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作者当年的日记

俗话说:“养儿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县)走一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通南巴平地区被称为饥饿之乡毫不夸张,落雪天能够披蓑衣穿棕靴出门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员一家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十几岁的大姑娘衣

不蔽体躲在家里火塘边烤火。农民买不起煤油，晚上烧松光(松树的油节疤)照明。赶场天到供销社称盐的农民，大多数只买得起二两一包的分零盐。绝大多数农户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铁锅里一天两顿煮的不是粮食，而是红苕叶、胡豆叶、萝卜叶和一些不知是什么植物的叶子，黑糊糊的一大锅。有一次，我们来到当地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小正围在锅边，赤身裸体的大小娃儿眼睛盯着锅里，嘴边吊着涎水，只等大人说一声："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起来。抢完，娃娃们挺着被这些植物叶子撑得发亮的肚子到泥泞的地里玩去了。我们知青们虽然饿得心慌，看到这场面也感到心酸，转身准备走开。

"知青莫走！"老农说着，捧出藏在里屋的稀饭，无论如何要从远方来的知青吃下。知青们三下五除二把稀饭倒进肚里才发现碗底藏着一片农家做油的腊肉。这时，老农吧嗒着叶子烟，脸上露出为自己杰作而得意的诡笑。

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注意力长时间不能集中的心慌和总是有什么小虫子在啃噬自己的内脏和肠胃的感觉。2003 年，我和单位一帮年轻人去珠海、广州一带公费旅游。用餐时，鸡鸭鱼海鲜啤酒让大家酒足饭饱，一盘油腻的沙河炒粉动都没人动。我拿过来开始吃，突然大家都不讲话了。我一抬头，年轻人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何老师真能吃。"我解嘲地说："我十一二岁身体发育时遇到灾荒年，十五岁下乡当知青饿饭，二十四岁回城前基本没吃饱过饭。"虽是戏语，倒是实情，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惯浪费粮食。

光屁股滚澡

下乡后的第一个夏天，知青们还不习惯光着屁股在黑潭河里滚澡，便穿着内裤跳下河，当地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岸边看热闹，"哼！知青小衣(当地人称裤子为小衣)二个二个地穿，可惜了呗。"

日子长了，知青们终于明白了山民的叹息。跟在妇女身后割麦子，不小心一抬头就看见妇女衣服下硕大的白晃晃的屁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捡泥块扔向白色旁边的"筷子篼"，引来农妇的厉声叫骂："啥起马子事得，哪车打来的！"(这是当地骂人最厉害的话)后来才知道山里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是不穿内裤的。

不会过日子的知青哪里晓得，扯布做衣服不仅要钱还要布票，而按人头配给的布票农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补贴生活的。所以，当地农民一般几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觉时衣服裤子全脱光，叫做"打细困"，说是怕衣服在篾席上磨坏了可惜。

当时通南巴平几乎所有的乡场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当——漂染店。农民春节卖了猪儿，买来半匹白布就到这店来染成统一的深颜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

过年穿。春节期间，穿着这种低劣染料制作服装的男女老少成了赶场天一道奇怪的景观：裤子全部不分正反两面穿，叫做“称砣包包二马驹”（短及小腿），据说这样耐穿省布。

人工调配的染料深浅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种颜色，恍眼看去乡场上仿佛行走着八国联军。不过这也有好处，谁家的孩子走丢了不用着急，按颜色找去就行了。当然，穿着这样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滚澡的，因为这种染料染的衣服见水就掉色，既污染河水又染花屁股，所以当地人都光屁股下河滚澡。

偷 盗

现在人们提起当年的知青，似乎都是偷鸡摸狗之徒，事实上偷盗之事有之，但既不是人人都参与，也非下乡的全过程都有发生。我们刚下乡时，国家供应一年的口粮，但必须每月派人下山到粮站去背米。黑潭林场19个知青（14男、5女）的伙食由公社派来的一名叫陈官忠的会计管理，陈是林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会计（场管会主任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场长张朝万倒是个好人，没文化一字不识，场里的事务基本被陈把持。），陈一家人常住林场办在公社河边的纸厂里，从来不上山到林场。陈委派一个叫王正富的知青（工人家庭出身）负责知青的伙食，陈每月买好米就通知王派另外的知青下山去背。我们劳动了回来，只感觉到饭越来越少，菜基本没有，米汤里面撒一把盐就是菜。后来，饿得实在不行，知青江志胜和赵成真就为了争夺那点撒了盐的米汤，竟在厨房里打将起来。江志胜端起抢到手的米汤钵，赵成真手持铁锅铲说：“一人一半。”江不依，赵手中的铁锅铲就对直戳了上去。笔者闻声赶到时，只见江志胜还端着红白一片、面上全是鲜血的米汤钵不肯松手。这些年来，每当知青聚会，看见两鬓斑白的江志胜喉咙下前胸上那两寸长的暗红色终身伤疤，联想到现在餐馆、高校食堂随处可见扔掉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该为我们当年的争夺说什么。

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少得可怜的那么一丁点包谷饭，十五六岁身体正在发育的知青们白天走路打偏打偏的。晚上，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有些胆大的知青就去搞“袭击”。他们在电筒上蒙上一块黑布，黑灯瞎火摸下地，地里有什么偷什么，甚至刨出泼了粪的红苕母子，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连夜连晚架起脸盆煮来吃。

一天夜里，我们林场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还不够，又准备出门。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一看，门口虎视眈眈站着几个山区大汉，每个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柴块子，后面还围着一群妇女、儿童看闹热。知青们纷纷抄家伙准备打架。相持了几分钟后，一个姓侯的大汉叹了口气，粗声粗气地说：“你们知青为什么要偷我们地里的东西，庄稼嘛，只要你开个荒，种上它，就会有收成，自家就可以正蓝齐白地砍来吃了嘛！”说完摇摇头转身离去。另一个妇女走进来悄悄说：“你们知青何必去偷嘛？开点荒，种点吃的，公

社又不好批判你们搞资本主义的。"其他人也慢慢离去。农民几句简单的语言,居然说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人生哲理,这是若干年后,知青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直到"文革"开始,知青江志胜、贺亚伦、李大发、赵成真等到南江县城参加了"知造司",带了枪回公社,才弄清楚林场会计陈官忠勾结王正富贪污克扣知青口粮的事实。陈每月把19个知青的粮油从粮站足额称出,然后卖掉一部分,拿一部分回家去,再通知王正富派知青下山来背。王在山上又卖掉一部分,并用卖米的钱回了一次重庆。公社街上和林场附近的农民都证明从陈、王手中买过林场的米和菜油。更为严重的是,公社的大红人、早有家庭的林场会计陈官忠不仅贪污了知青的补助款,还以吃食和留在公社街上林场纸厂做轻工作为诱饵,居然先后把林场5个不懂事的女知青全部都哄上了床。

水红籽

几年前,我随单位到九寨沟旅游。正在欣赏清澈见底的河里横七竖八的圆木时,听到一个同事喊我:"何老师,你认不认得到这些植物,好好看咧!"我转身一看,久违了!河滩上长着一大片我熟悉的、结着小小红色果实的荆棘,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是什么,但是它那酸酸带涩的滋味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距黑潭公社10公里左右的花桥河边和大山的小溪畔,到处生长着这种结红色小果子的荆棘植物,当地俗称水红籽。社员告诉知青:"莫小看这些水红籽,灾荒三年当主粮,救了不少人的命。"1965年我们在花桥河上的九重岩上挖干田,收工歇气时,饥饿的知青和本地场员们都争先恐后到花桥河溪边去摘水红籽吃。这种荆棘植物长满了刺,采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一边采,一边吃。由于它的果实很小,我们好像越吃越饿。于是就有知青提议去把砍刀拿来,砍倒一片,提到石坝上去一阵抖,然后用扫帚把红色的小果果收集拢来。当时好像吃够了,可是回家就开始吐清口水,一汪一汪地吐,小便都是红色的,最后翻肠倒肚,四肢发肿,头重脚轻,起不了床。所以,我记住了它那酸里带涩的滋味。

我因吃多了水红籽,上吐下泄,浑身发软地来到公社邮政代办所,想给家里寄封信要点粮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邮政代办员谭兆孟说:"老何,听说你们知青早晨起来站成一排,嘴里搞得白泡子翻翻的,是不是真的?"他一边问一边用黑指甲从嘴里黄牙上刮下牙垢来粘贴信封上的邮票。我说:"那是在漱口呀!"他说:"嘴巴是吃饭的又不是茅坑,涮什么涮!我看你们还假得到几天。"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围拢来劝和我一起赶场的知青:"当什么虫钻什么木,你们知青赶场就背铺盖衣服到河里洗,还做什么活路?下了乡就要像农村人那样过日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刷口,铺盖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2004年,我回访黑潭,当我到公社邮政代办所原址打听谭兆孟时,一个时尚的小青

年推门出来，他穿着名牌T恤衫牛仔裤，头上一撮头发染成金黄色，正是谭兆孟的孙子。想起当年那些从不出远门、头上捆着帕子、身上穿着一圈圈汗迹破烂黑衫的山区父辈，意识到早已星移斗换。

上个世纪的1959—1961年，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老知青们（大多十一二岁）不幸遇到"人造荒年"。他们在城市里吃过松毛（松树叶）、蕨根、发酵的糠壳、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饭（把米反复浸泡，反复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几斤，于是推而广之的饭）；因饥饿得过水肿病；看到过街上打"抓精"（当时对站在街上冷不防抓了别人的食品，吐些口水在上面，任凭别人拳打脚踢，只顾把抢来的食物塞进嘴里的人的俗称）；忘不了那些蓬头垢面站在餐厅、食堂里等着舔碗、舔盘子饥饿的人们。到南江后，食品更加匮乏，随着身体的发育和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他们对饥饿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我曾经试图把水红籽的故事讲给我14岁读初二的女儿听，因为她也快接近我下乡的年龄了。可是她正烦她妈妈想她长好身体，成天要她多吃点东西。她居然说："水红籽肯定很好吃，你带我到南江去吃嘛！我最不喜欢吃家里面这些东西了。"她还说，有一天她下楼，听见楼下的小妹妹在和家长吵，小妹妹恶狠狠地说："你们现在一天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我吃。等我长大了，也去买些鸡蛋、水果来牯倒你们吃，看你们啷个办？""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就知道要娃儿多吃东西。"女儿的这番话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区级干部待遇

机关工作20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究级别、规格和待遇。这一整套讲究被组织部门提高为干部"讲政治，懂规矩"的基本素质。倘若哪一次你一不小心，马虎了，恐怕够你一辈子受用。什么级别，出行接待是什么规格，享受什么待遇，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机关内还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讲话，要按级别排序，级别最低的先讲，然后按级别顺序，观察着在场最大官的脸色变化依次发言，最大的官最后总结时，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要作认真记录状，并且不断地点头。走路，一定是官大的在中间最前面，其余的人根据自己的级别，走在适合自己级别的位置上，一定不要走快或走慢了。本人有一次在电梯里，事急又站在电梯的门口，电梯一到，跨步就想出去。突然听到有人哼了一声，抬头正看见区委伍副书记严厉的目光。我马上躬身弯腰，让伍书记领头，其余官员按级别顺序鱼贯而出。后来，一般情况下，我就不乘电梯了，干脆走路。由此，我回忆起40年前的大巴山，在那些年代，其实屙屎擦屁股都是要讲级别的。

在贫瘠的大巴山土里刨食，肥料是最宝贵的（当时还很少用化肥。），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夹回家去。知青们刚来不知道，赶场天内急了满街找厕所，农民说全区只有一个厕所在区公所，于是闻其味而寻去，终于在一个猪圈旁边找到区公所的专用厕所。进门就看

见墙上挂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一些小竹片，旁边还写着“请节约使用”等字样。原来是区公所的老炊（炊事员）分管此事，煮饭之余就为区级干部方便准备大便后刮屁股的竹片。

享受了区级干部待遇后，知青们才弄明白，各公社办的舀纸厂生产工艺非常复杂，先把竹子砍下来放在池子里用生石灰浸泡几个月，再捞起来用牛拉着石碾子反复碾细，然后倒在木盆里搅拌均匀，榨压后用帘子一张一张的舀，接着还有砸干、裁角、揭纸、晾晒、收衣等等复杂的手工工序。社办舀纸厂的收入是当时各公社重要的财政收入，这种土法生产的又硬又厚的草纸全都得卖给供销社，供县以上的干部享用。区里干部用竹片，公社干部用树叶，农民的娃儿屙了屎一般唤狗来舔。这种事情知青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

现在的读者读到这一段文字，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经历过40年前那种社会生态环境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在50年时间里进一步发酵和强化。级别突出的是官本位，而官本位带来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诸多好处。于是乎，乡变镇，县建市，市争直辖；歌星授中将军衔（相当于省部级干部），和尚定级别，社会各业争级别，中国终于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大染缸。

莫得思想也莫来头

“文革”期间，“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人们叫得最响的口号。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收工之余都要深挖思想。知青中有一少年，下乡时尚未满十四岁，小学都没读完，因随哥哥下乡，也获街道办事处批准。这娃在学习中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思想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饿，在漫长难熬的夜晚，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钟悄悄靸上鞋溜出门去。时间一长，引起大伙注意，于是跟踪，发现他在偷吃猪食。原来他每天煮猪饲料，到保管员处领来定量包谷面掺进黑糊糊的猪草煮时，并没有搅拌，而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就独自去享用那人间美味。

真相大白，群情激愤！偷吃猪食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无数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学习批判会上，巴山战友们纷纷上纲上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脚踩污泥，眼观全球，放眼世界。全世界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全人类、缩小三大差别就全看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这等丑事云云。

终于，小崽儿被弄得疲惫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蔬菜瓜果。”小崽儿还说，我们不论忙时闲时，一天只吃两稀，还要定量不管饱。这下激怒了干部，他们大声武气地斥责道：“乱用毛主席语录属现行反革命，找根烟绳把你吊起来！”随后气势汹汹地要小崽儿深挖思想根源：“你脑子

里到底装的什么思想？”小崽儿也急了：“我脑子里莫得思想也莫来头！”这句南江方言，反把当地干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无之别，如果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你批判他什么？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干部瞠目结舌。

五个窝棚一锅端

刀耕火播、广种薄收是20世纪60年代山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向荒山要粮食”的鼓噪声中，人们寒冬腊月背着红薯和被盖上山了。手持砍刀剃头似的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全砍倒，春天再沿山脚一把火，今年烧这几匹山，明年烧那几匹山，谓之轮种。烧山后开始点包谷，每人背个笆篓，里面装着拌有桐油柴灰的包谷籽，为了在陡坡上站住脚，左手抓住尚未烧焦的草根，右手紧握点锄，啄个洞丢几颗包谷。一个山头通常只能收大半背篼七长八短的包谷，且要在齐腰的荒草中去寻找，粮食可是比命还金贵。

为了不让野兽糟踏这宝贵的收成，人们隔几个山头便用茅草搭个窝棚护秋。于是到窝棚去敲锣、赶野兽、看粮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轻松工作，一来可以偷偷弄几个包谷烧熟充饥，二来可以白天晚上算双工分。但是，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宣布：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顾女知青，一人看一个窝棚。五个少女立刻欢呼雀跃，收拾行李背着锣鼓上了山头。

晚上，队长提着马灯也上山了。山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女孩们没有想到锣鼓可以轰走偷粮食的四只脚野兽，却轰不走糟踏人的两只脚禽兽。在那人人都饿得打偏打偏的年代里，身穿黄军装的转哥（转业军人）队长却吃得滚瓜肚圆，精力特好，一晚上连续端掉五个窝棚。黑灯瞎火的夜晚，女孩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事后，她们终日以泪洗面，神色痴呆。队长在乡间到处绘声绘色地吹嘘他的辉煌战果，听故事的当地无赖也借此用不堪入耳的话来糟蹋女知青。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男知青呼啸而散。五个未成年少女没有地方吃饭，被迫嫁给了当地条件最差的农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处。

1968年，四川武斗日盛。为混口饭吃，不少林场知青受雇于当地造反派组织充当武斗前锋，因作战英勇，名声大振。一日打恩阳战斗结束，打死、打伤对方组织战斗员若干。大卡车上架上机关枪，亡命少年吊在车门两厢，一路高歌抬头望见什么星，心中想念什么神，凯旋至巴中县枣林公社附近，前方一农妇蓬头垢面，负重扶棍而行。任凭汽车喇叭叫，农妇充耳不闻，仍然各自在公路中间辗转慢行。“你聋了哇？”盛气凌人的武斗少年火暴暴地跳下车来，抢起皮带准备一阵猛抽。“罗华溪！”农妇突然叫出少年的名字来。少年睁大眼睛，他实在不敢相信，当年嘻嘻哈哈、走到哪里都扔下一串银铃般笑声的同窗、街坊吴朝玉，就是眼前这个佝偻肮脏、满脸沧桑的农妇。

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窝棚而加速了“再教育”进程，转业军人生产队长在广阔天地里提前为她们完成了“再教育”科目。40年之后，男知青回忆起当年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依依惜别时，女知青家长“出门要互相照顾哈！”的一再嘱咐，大多感到心悸。当年在农村，听到农民传言“林场的5个女娃儿，都被某某搞了”时，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心痛，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患难姊妹，反而觉得她们都是贱货，竟为了那么点吃的出卖自己，有的甚至提议把5个女娃儿赶出林场。当我们也为人夫、为人父时，已经没有为自己十五六岁时的愚蠢行为忏悔的资格了。

步行回重庆

“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一天，我们一帮人到正直坝赶场，适逢县城红卫兵下乡宣传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知青们听得如痴如醉，跃跃欲试。但是，老知青这一特殊群体是时代的弃儿，既非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学生，亦非当时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贫下中农。公社宣布：知青只能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否则以破坏领袖战略部署论处。强烈的自卑笼罩心头：都是同龄人，为何无缘无故被打入“另册”，成为再教育对象，没有革命的资格？愤懑之余，他们决定：回老家，走也要走回重庆！

于是，南江到达县的山区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是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的罗华国、罗华溪、王正富、李大发、赵成真、江志胜、尹渝汉、耿建国、朱毓龙、汪涛生、邱仁杰、袁德礼等。出发之前，他们从山上林场背了几百斤谷子到粮站换成麦子，把麦子磨成面做成饼子，连同红苕、洋芋、铺盖、口杯、土巴碗，装在几个喇叭背篼里。一个知青贡献出一床床单，拿到公社漂染店去染红，写上“红卫兵”三个字，沿着公路开始了从南江正直黑潭公社到重庆的步行串联。领头的罗华国虽然扛着写着“红卫兵”的旗帜，却没有正宗红卫兵组织的书面证明，沿途红卫兵接待站都不予接待。这支既不像学生又不像当地农民、不伦不类的队伍，引来沿途赶场的人纷纷侧目与议论。“抬起头，挺起腰，虚啥子虚！”罗华国突然一声吆喝，底气不足的老知青们打起精神，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们口渴了喝沟边田角的水，肚子饿了吞自带的干粮，天黑了睡农户的屋檐。一千五六百里路，十二天行程，硬让他们步行着踩了过来。在故乡重庆望龙门码头的轮渡上，老知青们互相看着磨穿了底的胶鞋和流着黄水溃烂的脚，忍不住互相抱头痛哭。

20世纪60年代，这群脱离了主流社会“多余的人”变极度自卑为扭曲的自尊。日后，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纵横于整个川东北，成为通南巴平及原达县地区人见人怕的打、砸、抢、抄、抓武斗精英。以至于当地民间发生纠纷，也要请他们到茶馆去“搁平捡顺”。时至今日，他们当中超级“天棒”的名字和故事还在当地人口中流传。

户口啊，户口！

报载：重庆直辖之初，3000万人口中75%是农村贫困人口。现年均46万人口“农转非”城镇化水平达35.4%，城乡差别一步步缩小，经济快速发展。呜呼！中国社会“户口人格化”的现象终于逐渐淡出。

但是，你可曾知道，在长达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户口是衡量一个中国人存在价值的主要标准。从娘胎里落地之日起，紧随而来的户口就基本决定了你这辈子的社会地位。在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两大类中，又分别有：山区山上农村户口、河边平坝农村户口、乡场非农业户口、区镇非农业户口、县城户口、地区户口、大城市郊区粮农户口、菜农户口、郊区城市户口、大城市市中区户口等等，九等十八级，各级各类户口等级森严，差别明显。含金量最高的当属大城市市中区户口，最不值钱的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

户口迁移可以从城市往农村递次向下迁移，绝不能从农村往城市向上攀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各级各类非农业户口的级差，供应不同档次的粮票、肉票、油票、煤票、布票、盐巴票、火柴票等给城市户口的人购买生活必需品。持城市户口的人还享有政府统一安排的就业机会。而持农村户口的人不仅没有供应，还要交粮、交钱、接受派工等承担各种义务。这种不可逾越的差别使中国的户口体制就像池塘里的水圈，核心是大城市中心户口，一圈圈向外延伸，最边缘的就是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处于外圈边缘户口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千方百计向内圈核心游。

那时候的婚姻也因户口而变得尴尬。非农业户口的老汉可以轻而易举找个年轻体健的村姑；农村户口的小伙为了进厂、进城屈娶非农业户口老妪；山区山上的姑娘为摆脱贫困降低条件争着嫁往平坝；平坝的姑娘嫁乡镇；乡镇的姑娘嫁区县；区县的姑娘嫁地区；地区的姑娘嫁郊区；郊区的姑娘嫁市区；市区的姑娘向往京、津、沪……形成基本固定的婚姻走势。人格因地区差价各异，仿佛全国人民都在围绕户口转。

混乱的60年代末期，知青们切身地感受到他们含金量最高的大城市户口忽然变成了边远山区山上农村户口，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已经堕入社会最边缘时，明显地缺乏边缘人生存必需的谋生手段、能力和心态。饥寒交迫之际，他们还受到当地一些吃国家供应粮的乡场非农业人口、收入较好的山下平坝农村户口人的奚落。这样，江青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小青年爱玩枪”，“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经受锻炼”激活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烦躁和愤懑。在武斗遍及全国的时候，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农民、知青与干部之间的群体械斗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混战。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天罗地网

1968年，雨季农闲，长赤区红四林场的39中同学周治中、王保明等约我和一群男女知青去长赤区赶场。经十几里山路跋涉，我们来到进长赤集镇路口，发现当天赶场的人少得出奇，多数街上居民伸出头张望后赶紧缩身关门关窗，少数胆大的望着知青窃窃私语后也抽身回屋。忽然，一个女知青说："你们看，对面山上粮站怎么这么多人送公粮，每个人手里还拿着根打杵子（山区背东西歇气的工具）呢！"话音未落，街上的一些门忽然噼里啪啦地打开了，一些人手持棍棒冲将出来，大叫："打呀！把这些狗日知青的屎挤出来！"我们见势不妙，拔脚就跑，殊不知天罗地网早已形成。对面粮站的人包抄过来，田坎、路口、粪坑旁，到处是组织严密，手持刀枪棍棒的人在围追堵截。

知青突然成了反特电影片中落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空投特务，抱头鼠窜，逢岩跳岩，逢坎跳坎也插翅难逃。开始我们还不想跑，心想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可是看见那些拿着棍棒、刀、火药枪的人已经打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看见是知青就打。前面十几名男女知青已经被分隔包围打倒在地，只听到他们喊爹喊娘，鬼叫狼嚎。周治中随手不知在那里拖了一根扁担，带领我和王保明不要命地跑，王保明和我的鞋子跑掉了，赤脚被扎得全是血。一群人围过来，王保明急中生智从背包里拿出报纸包着的准备打菜油的瓶子高举着大吼："手榴弹！"趁人们犹豫时，我们钻进了山林。

后来，在一个长赤区当地知青（他曾经在长赤街上当剃头匠）的带领下，我们躲进农民的猪圈，半夜起来过三江坝闯广元，躲过沿途民兵和"群专"（当时称之为革命群众专政队）盘查混火车回到重庆。回渝后，才知道，这次打知青是县武装部长点头、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行动。长赤区邻近的沙河区团结公社打死知青3名，重伤2名（详见杨兴全《南江风云》一文）。

尽管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是"油炸某某，火烧某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砸他个稀烂，滚他妈的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恐怖口号和革命行动，但一下子死伤这么多知青毕竟不是小事，悲痛欲绝的家属亲友不依不饶。多次上访未果后，他们聚集到菜园坝火车站准备卧轨强行爬车进京告状。

时值重庆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之间武斗升级，先是重庆军分区交通艇在郭家沱水域巡逻时被高射炮击沉；继而登陆艇、炮艇沿江而上，炮击东风船厂、朝天门码头及沿岸建筑和船只，长江交通中断，人心大乱；然后空压厂的坦克开进市区，南山建起了高炮阵地，不时向上新街和市区发射炮弹。

此时此刻的菜园坝火车站已成死港，站台上胡乱摆着几具乱枪打死的死尸发出阵阵恶臭，没有火车，也没有司机。欲哭无泪的死难知青家属们困兽般在火车站折腾了几天

后，分期分批赴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殊不知此时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已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局势失去了控制，中央信访部门被造反派接管根本无暇过问此类小事。

经过两年的煎熬，重庆天府煤矿一名老实巴交的井下矿工使事情有了转机。此人小名狗儿，大名吴金全，阴差阳错作为产业工人代表被选进"九大"任候补中央委员。一日在北京开会分组讨论，周恩来总理到四川组听取汇报。在总理亲切目光的鼓励下，老吴实在按捺不住，战战兢兢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侄儿和其他知青一起被无辜打死的冤屈，说完话这个木讷的挖煤工已经大汗淋漓，泪流满面。

在中国，通了天的事情就好解决，加之领袖已经发出"12 · 22 指示"，大批的知识青年还要下乡。中央正好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的政策。1969 年秋天，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组织基干民兵滥杀无辜知青的团结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何碧忠等 7 名区乡干部逮捕法办。

带着硬伤回城

70 年代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在这一运动中，知青是悲剧的主角。他们既不能如领袖所希望的那样解决因为"文革"而积压起来的上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不能完成"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相反，全国 1683 万中小学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子在炮火中，颠沛流离到西南维系了国家的教育，而上山下乡运动却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传承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断层。大批缺乏知识、思想糊涂的青年既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又是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混乱无序和文化衰败的制造者。尽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花费了 100 多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然严重伤及农民、知青、知青家长和社会，社会各界怨声载道。70 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大返城，这是建国以来就业问题最严峻的时期，为了通过顶替、招工、病残、参军、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等脱离农村返回城市，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通关系、走后门、找门路、公开行贿、多少无钱无势的女知青只好含泪出卖自己的身体。世风恶化，前所未有。后患无穷的裙带关系网社会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逐渐演变成组织严密，控制中国社会一切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

匆匆返城的知青们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数都没有专业知识还思想茫然，在大城市的生存竞争中是从头开始和准备不足的一代，他们在农村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回城后猛然发现自己早已被时代所抛弃。许多人在困境中奋起挣扎，真正出类拔萃者为数区区。相当多的人苦苦挣扎后，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漠视

社会，为了生存在社会最底层辗转挣扎。日后企业改制与改革中又轮到他们纷纷下岗，老之将至，衣食不保，知青终于构成城市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如果还有人津津乐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青年的成长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认为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其他时代青年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财富的话，阿Q就真有理由笑话那些头上不长癞子的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民族、个人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它伤害的不仅仅是知青。"青春无悔"的是那些知青中凤毛麟角的"成功人士"，"劫后辉煌"的是那些"龙生龙，凤生凤"、下乡镀了金的太子党高官。面对绝大多数草根老知青的惨淡人生，我们不能脱离开伤害去奢谈磨炼，而应该首先弄清楚这种磨炼的性质。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

作者简介

何隆华，重庆市人。1948年出生。1964年8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牧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2年至1986年在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运输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运工人。1986年至1989年受聘到长寿县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子弟中学，教过初、高中，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曾在重庆市某机关供职。

龙泉山中十度秋

万晓农

怀念"罗修"

我下乡的成都市龙泉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是典型的深丘型山区，离繁华都市并不远，坐汽车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当时感觉知青的人生旅途却还很遥远，仿佛没有尽头。我所在的公社有"文革"前两届和"文革"中两届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及办农场。不到两百的知青中，有四个在农村走完了人生旅程，其中三个是自己给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一个女知青因与农村青年感情纠葛而服农药自尽；另一个女知青是在进大学培训快结束时因为婚姻的不如意而上吊自杀；还有一个更年轻的男知青在农场失火后不能忍受旁人对自己纵火的嫌疑，选择了让公路上的汽车来带走自己的生命。为了避免给司机带来麻烦，他没有忘记在自己身上揣上遗书。

时代的冷酷未能冻僵知青们的同情之心，兔死狐悲，况同类乎！但随着时间推移，印象已经逐渐淡漠。然而，那个在自己土地上直到累倒再也没有站起来的知青，没有谁能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用生命留下一篇无言的下乡祭文，给我们仍然行进在人生旅途中的知青们永久的哀痛和深沉的启迪。

他就是罗自强，成都九中高六四级毕业生，学生会干部，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培训班一期学员。1964 年 11 月 29 日到成都市龙泉区茶店红旗五队插队，后又搬迁到古井一队落户。

罗自强身材不高，敦笃结实。他待人坦诚，勤恳踏实，朴素节俭，自视很高，却从不显山露水。记得有次在古井沟我们搞了条狗会餐，几个老饕弄好调料就守在锅边，熟一块

吃一块，只有他一直做红案师傅砍狗肉，坚持到把最后一块丢进锅里，而先吃的知青们已经在鼓腹而歌了。

他生性倔强，疾恶如仇，有独特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经常面带笑容的他，却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大概是他太爱提出意见和修正人家的看法，大家称他为“罗修”。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可以到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使我们一般朋友觉得他偏激到了有些心胸狭隘的地步。如公社某领导曾与他发生争执，几年之后，这位领导居然不计前嫌，根据“罗修”为人和文化水平推荐他去公社中学代课，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罗修”却坚辞不就。他认定这位领导虚伪，拒绝跟他妥协。又比如，下乡三年后，他对我们说知青小组的存在，妨碍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结合，“挤人”劳动人民门庭的知青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彼此的弱点产生共鸣，不利于思想改造；相互优点的棱角经常碰撞，又容易产生矛盾；生活上的互助则导致不能独立。他甚至认为组上颇具爱美之心收拾打扮的女知青小资情调太严重，在一个屋檐下已是冰炭不相容。于是，他不惜颇费周折地从红旗大队迁到古井大队，开了茶店知青小组分家独过的先河。在“罗修”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知青小组纷纷掀起分家热潮，知青小组由大到小，变成一人或两三人的组合。

公社领导都知道“罗修”原则性强，就动员他到五匠办公室当了会计，因为农村的石匠、木匠、骟猪匠等匠人，个个是能人，走乡串户，脑袋灵光，能掐会算，惯钻空子，原来的会计被这些奸狡巨猾的匠人搞得头晕脑涨，账目有偏差，领导和生产队都不满意。“罗修”头脑清晰，坚持原则，递烟来不抽，坐茶馆不去，打平伙不来，应当缴的管理费一分不让，该划给生产队补贴的一分不少，连管五匠办公室的领导找五匠办事，也照样收费。这样一来，原来认为“罗修”管得太严的匠人终于觉得应当像这样管理了。“罗修”给谁都不留情面，有的匠人，戏称他为“白脸包公”，因为“罗修”的脸皮虽经太阳暴晒仍十分的白净。

“罗修”性格内向，行为腼腆，能符合他标准的又能够接触到的女知青非常有限，我知道有几个他印象很好的女知青，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深交，已经被其他勇敢的男知青抢先一步了。以“罗修”谦谦君子的为人，是耻于和人争夺女朋友的，哪怕是自己心仪的人。就这样，他与能够相知相识的一些女知青次第交臂而过。下乡八九年，在大部分知青已经招工返城后，“罗修”仍然与我一样孤身一人形影相吊。一次我们仍在农村的知青一起谈到结婚安家和出路问题时，我说虽然自己已经和农村姑娘相过亲，但终于没有勇气在农村安家，他笑着而又慎重地说在农村安家的路可能由他来带头走第一步。果然在我下乡十年招工回城后不久的1976年，通过公社管理知青的陈书记介绍，“罗修”由知青大哥姜蜀菱陪伴到我曾经插队的石经大队相亲，跟队里的赤脚医生汤群芳交了朋友，并很快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成了知青中为数极少的彻底扎根派。据参加他婚礼的知青讲，婚礼虽然喜庆，但“罗修”的情绪并不太高。

他岳父母年纪大，有慢性病，身体极差，药罐不离身。妻子是幺女，几个姐姐远嫁他乡，不能指望帮助，生活颇为艰难。有了孩子后，夫妻俩经济负担更加沉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罗修"仍然拒绝了城市中父母的经济资助。他母亲退休时，他毫不犹豫让在城里的弟弟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后来他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工作。工作期间由于供销社离家较远，为了省钱，他中午不到食堂买饭，自己煮面，但常常碗里没有一点油星。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分地到户后，土地无劳力耕种，他又要承担田间劳作，于是争取调大队供销社工作，以便离家近一点。这样上班时间干会计，休息时间下地种庄稼。人到中年，白日夜晚地奔波，他没有叫苦叫穷叫累，只是默默地在自己选择的崎岖山路上负重蹒跚而行。

"罗修"的精神世界里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执著和自尊自信，而他的生活地位的卑微、生存方式的艰辛、家庭的重负、处境的艰难，使自尊和自卑在他内心激烈地交织，深陷于不解矛盾的异常痛苦中，特别是在多数知青回城有了工作，生活变化很大后。这种压力是我们跳出农村的知青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我也不相信这就是"罗修"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我们没有资格去非议他无奈的选择，因为这是对一贯特立独行的"罗修"的一种侮辱和伤害。内蕴很深的"罗修"肯定是明白这一切的，周围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他进行灵魂深处的沟通和交流了。他唯有坦然面对一切，并用知识分子仅存的自尊和矜持的硬而脆的外壳来极力掩饰和保护自己。

我每次回乡会知青朋友，第一个便是探望他，一是担心和同情他的处境，二是怕他会误解老朋友瞧不起他，从而封闭自己。每当我询问他的生活情况，他都会如实相告。但如果我话中流露过多的同情，他很敏感，会愤然用"农民都过得下去，我有啥过不得"诸如此类的话堵口拒谈。记得一次我带几岁大的儿子到大队供销社，请他也带孩子到尚有不少知青教书的茶店中学会面叙谈。他女儿正好在那儿，也是五六岁，穿一身褪色陈旧带补丁的小红花布衣服，脚上一双自做的白底毛边黑布鞋，裤脚边沾满泥土。听说要去中学会朋友，孩子抬头满怀期望地看着爸爸。"罗修"看了看女儿，然后摇摇头说，这个样子，不带她去。我看到女孩马上低头掉泪的样子，断然地对"罗修"说，这有啥子嘛，农村就是这样，未必知青还会嫌弃吗？这下点破了"罗修"的心病，他才带女儿一起到了茶店中学。回来后我就想，知青在农村扎根这条路太难走了，艰难的不仅是生活和劳动，而且要面对城乡巨大差距带给他们的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

"罗修"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不管是对工作、对社会、对同事，还是对家庭均是如此。知青姜蜀菱到区广播局当领导后，正好那里缺会计，考虑到"罗修"家庭经济困难，打算让他去。但"罗修"以怕远离家庭后当"陈世美"为由，谢绝了改变自己境遇的又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家里太缺劳动力离不开他。直到现在，知青大组长姜蜀菱还为没有能

说服“罗修”到区上工作改变处境而自责不已。

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劳作、精神的重负和隐藏已久的疾病终于击倒了不肯服输的“罗修”。那是1986年深秋种小春作物的忙碌季节，10月20日那天中午，他刚下班回家便挑起一担干粪到山顶的责任地种小麦，家人煮好饭等他。可是两点过了还不见回来，喊叫又无人应。妻子上山后才发现他已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倒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双手还使劲地深深插进刚翻过的泥土中。他手指出血，面色发紫，嘴张着仿佛还在痛苦地大声喘息。后来从医生的口中才知道“罗修”早已查出心脏有病，医生吩咐过他不要劳累过度，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卸掉自己肩上的一两负荷，就这样过早地跑完了生命的全程。当我刚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玉碎”。

追悼会上众知青的悲痛自不必说，分管知青的女书记是发自内心的痛哭和检讨。遗留问题处理也较顺利，众知青给“罗修”的孩子筹集了一笔基金，资助他们继续读书。作为他的挚友之一，我当时很想为“罗修”说点或写点什么，但心绪太乱，直到多年后才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的欠债要还，特别是“罗修”的下乡之祭。

岁月蹉跎，青春无愧；勇于执著，疏于变通；玉碎难能贵，瓦全不足珍；盖棺亮全节，终究志高存。能按照自己选择的路一直走到底的人是大浪淘过的金沙，保持性格完整，坚持初衷并非易事，“罗修”，你清贫一生辉耀着的执著和坚贞，照出我们精神的些许苍白，你不苟不染的傲骨和清影将促扫我们内心的积尘。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一个真正在农村扎根的老知青。“罗修”兄，你安息吧！

相亲记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七八年了，知青组五个知青四个已经招工返城，只剩下我孑然一身。男大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家无老婆是鬼窝，知青亦难免俗。还真有说不出的苦。我也不是冷血，但自从一次与女知青交友努力未果后就无东山再起之心。俗话说“一拨水，一拨鱼”，不知不觉中，这拨知青水中的“鱼”在水波不惊的情形下都名花有主了。在蹉跎岁月中，我自然在众知青中成了重点帮困对象，还有幸享受了众朋友相助相陪相亲的豪华待遇。

一天，知青张哥约我等场上茶铺见。他先批评我在婚姻问题上“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又推出“三个面向”（老知青、新知青、回乡青年），还说“红苕花”亦光彩照人。原来经张哥等牵线搭桥和推荐引进，公社谢社长看这批知青不错，踏实肯干能吃苦，愿为自己初中毕业的侄女招女婿。我问谁是推荐对象？吴小娃朝我挤眉弄眼坏笑：该你娃交桃花运喽。我说开不得玩笑。张哥方正颜道，那回谢社长亲眼见你光胴胴披个围腰穿条短裤，在石经寺庙门田坝犁田，与农民别无二样，他晓得你文化水平也不错，所以点明招你。那

时我下乡已八年，再教育的课已上了两个大学的时间，犹未毕业。七尺男儿之躯，已近四七之龄，感情未曾麻木，无“鱼”也苦恼，结婚安家也该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一想到农村安家一辈子扎根，又觉得这样认命于现实，内心又很不踏实。我好犹豫。朋友们却不管我的心情，纷纷怂恿我去相亲，说是至少多探条路走，并保证消息不扩散。冲着兄弟伙的热情和关心，我终于点头，引出了这一段难忘的农村相亲的故事。

下一逢场天，张哥、吴小娃、郭眼镜和我借了四辆加重自行车浩浩荡荡出发相亲，折合成现时标准，起码也相当于一列的小轿车队了。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紧张不安，或是久不骑车车技失常，出门下茶店的陡坡一个急刹车摔我个大跟斗，把张哥吩咐我穿得整齐一点的衣服弄得泥巴皱皱的，颇是狼狈，或许这是老天在预示此事的不顺？

相亲的方式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口替社长顺路送信，实际去偷窥他侄女的芳容及了解家庭条件。郭眼镜说为了突出重点，一定要让我走在最前面，免得女方看走眼。按信上地址，在贾家场附近一个桃花盛开的村庄鱼塘旁找到姑娘的家。这是一个冷落僻静的农家院子。张哥是个急性子，他边喊边敲门边闯将进去，我紧跟其后。屋里出来一个姑娘，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双眼明亮有神，皮肤白里透红，留着长辫，一身褪色浅红小花衣服，手拿围腰，脚下一双自做布鞋。见四个牛高马大的陌生小伙子，一脸惶惑。张哥忙说，赶场顺路替你叔叔带信。交信时，重点指着我介绍说，这是在茶店中学代课的万老师，都是你叔叔的属下。姑娘忙喊请坐，说父母均赶场未归，便进去给我们烧开水。

我们趁机将姑娘的家打量了一番。这是普通三间农村住房，干净整洁，陈设简单，堂屋只有一张方桌和四张条凳、两把竹椅和一个粮柜。墙壁上有样板戏画片和一家人的照片。一会儿，姑娘给我们一人端出一碗开水，原来竟是糖水鸡蛋。三人谢过边喝边闲聊。我心怀鬼胎，坐立不安，说了些什么话一点也记不住。过了一个时辰，张哥猛使眼色，于是大家告辞。

归途中，各人发表高见。张哥说姑娘很勤快，居家过日子不错。“眼镜”说形象通得过，遗憾个子偏矮。小娃说文化也将就，关键你看得起不？我说，女娃眉眼也很端正，还有点希腊鼻子味道，但你几爷子不要逼我，人家还蒙在鼓里。张哥说，等她看了信就知道了。我说，幸好她还没来得及看信，不然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因为信中谢社长写明了相亲的来由并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张哥拍着胸膛说，只要你看得起，我保证说通。我苦笑说，成了你们试验品，还不晓得人家啥意见，等有消息再说。

相亲一个月来无消息，我想，秘密状态下的相亲，不声不响地结束最好。不料一天中午，谢社长亲自来茶店中学我处，掏出封信，叫我先看信，后谈想法。我一来从未享受过公社首长单独接见的待遇，二来此等重要事情居然就在这封信中，顿时心头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晕，接信时手都有些发抖。姑娘在信中提了三个问题：一、为啥代课未转正；二、

为啥现在还没解决个人问题;三、是否决心在农村扎根。解答前两个问题虽费口舌,但说得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却使我陷入沉思。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纪念章下乡,接受了八年"再教育",其间我栽秧打谷、挑水浇粪、犁田耙地、砍草抬石、担沙面土,吃红苕汤,穿千层衣,住茅草房,当五好社员、先进知青……可现实的锄头铲不掉希望变化的幼苗,幻想的丝线总是在编织理想之梦,我像一颗随风飘荡的种子,直到此时也未找到落地生根的感觉。诚然,知青与村姑结合并不标志同化、退化或进化,但有勇气在农村安家的毕竟凤毛麟角。姑娘头脑非常清醒,提问面对严酷的现实,她不想也不会丢失自己。作为特殊时代产物的知青,我是否在丢失自己呢?!丢掉幻想,就丢掉希望,就可能放弃将来,虽然未来还是未知,但安于现状可能禁锢自己。扪心自问,我的确没有在农村安家扎根的思想准备,还想读书,充实自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还搞得那么隆重?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额头立马冒出不争气的汗珠。我想如果面前有一面镜子,那里面一定是天下最难看难受的面孔。既然无可回避,我便吞吞吐吐如实说完自己的想法,准备硬着头皮挨一顿训。不料谢社长听罢,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说的是老实话,没有几个知青是打算真心实意在农村扎根的。这事就算了,以后再说。"

这次相亲的结局是祸是福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相亲之后,我曾两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上大学,一次名单仅到公社,一次到区,均无果而终。两年后,凭知青政策"三抽一"回城,我读书的心愿才勉强得以满足。

难忘农村十年,使我现在活得充实;忘不了那次相亲只见过一面姓袁的农村姑娘,是她让我在关键时刻认真思考人生,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忘不了热心肠的张哥、关心我的知青朋友和农村那次相亲。

捉贼记

在乡下,我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捉贼经历。我只身一人仅凭观察、分析和判断,在最短的时间破案,这对福尔摩斯迷的我来讲,在平淡的知青生活中无疑比赶场吃了份回锅肉更令人兴奋。但这一颇有戏剧性的经历最终没有使我高兴起来,反而好几年都像有块难消化的冷红苕哽在心头。

队上给知青修的茅草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半山坡。与屋前仅相隔一块地,是一大片苍劲的柏树林,著名古刹石经寺便掩藏在这参天古木里。1967年"文革"中,知青组上其他人返城未归,我一人在队劳动。初冬的严霜染白屋顶,地里胡豆苗冻得皱眉缩眼,砍过草的山坡更显荒凉寒峭。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发现枕头下15元过冬钱不见了。当时,我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没有了工作,五兄妹全都下乡,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仅值两角钱,过冬钱来得不易,15元钱按工分值算大约得辛辛苦苦挣三个月。我顿时脑袋发

热，浑身冒汗。是否放错地方了？东翻西抄找了几圈，最后只好承认现实。急而无用不如冷静思考。如果找队长报案，不仅于事无补反招人耻笑，而且也有违我万事不求人的信条。平时不是爱看侦探小说吗？不如自己破案吧。想到这里，我晚饭也没有心思做了，独自坐在灶前冥思苦想。

我落户的生产队是个响当当的穷队，社员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在全大队都是老实巴交出名的，对我们极好，甚至还不止一次集体保护我免受“文革”中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暴行，知青的东西从未遗失或被盗。我们也很放心，钥匙常塞在门边石凳下，但除知青外无人知道这秘密。失窃后门锁完好无损，作案者显然一定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流窜犯光顾，损失就不止15元钱了。熟识的外队知青朋友知道拿钥匙进门歇脚或煮饭，我们知青小组算得上是当时颇有人气的小小接待站，但深信朋友中无这类小人，如事急用钱必会留下字条说明原委。还有谁呢？房左侧是保管室和猪圈，而常从石经寺林盘中出来走知青屋旁小路的人，可能会看见我拿放钥匙而找到放钥匙的地方。

我开始逐一将必须或经常走这条路的人排队，最可疑是那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穿身衣服全家不冷”的单身汉富某。这人小时候从红旗大队过继到我队，但父母、养父母早已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年龄，身高仅有一米五左右，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娃娃脸上更看不出他的实际年纪，不过从他大炼钢铁时就到威远挖过煤这件事来推测，应在30岁以上。因为当年挖煤时脚受过伤，富某只能干轻活，出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饱一顿饥一顿，是队上唯一的困难户。当地民政部门每年冬季救济棉衣、夏季补助蚊帐，而他则夏季卖棉衣买肉，冬季用蚊帐换酒。加上“文革”有段时间听人使唤在公路上拦车混顿饭吃，在大队乃至公社还小有名气。我也经常被安排与他一起给棉花打农药，因为我能给农药准确定量，而他则是胆大不怕农药毒害。由于爱帮忙，他在队上人缘还好。经常有社员想陪老婆睡觉不愿去值夜守晒坝，就叫他来吃晚饭，饱餐后富某就高高兴兴地扛着烂被盖去晒坝了。在山路上他会吼开嘹亮悠扬的龙泉山歌，这时大家都知道富某又在替人守夜了。富某虽无偷摸坏名声，占小便宜却是常事。入冬农活少，队长怕他工分挣不够，安排他帮饲养员喂猪，经常路过此路。我越想越可疑，怕他跑掉，打算连夜去追查。转眼一想，他要跑早溜之大吉无法找到了。好事不在忙上，且山陡月黑路难走，最好还是等明天一早去，察言观色，见机行事，有线索还愁破不了案么！想到这里，我才塞把柴草进灶堂热饭。

第二天天刚亮，满坡的茅屋开始冒出阵阵炊烟，我出门去找富某。在离知青屋约半里远的山坡上，一个破烂低矮茅草屋小三合院，片石混泥墙，隙牙漏缝，烟熏四壁不见本色，住着他和两个孤寡老人。那是我队最高的居住点，也是刚下乡时的知青暂住地。两个老人尚未起来，富某穿黑布破棉袄，蹲在门槛上抽叶子烟。平时做活路喊我“眼镜”、

"四眼狗"的常开玩笑，今天见我居然没打招呼，有些反常。看来他心中有鬼，我心里也有了三分把握。于是我板着脸叫他过来，一方面在试探他，一方面我也怕惊动两个老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富某看了一下左右，犹豫一阵，很听话地来到院外大杏树下，这使我的怀疑再增加一分。他站在我面前，瞟了我一眼，正碰上我审视的尖利目光，便盯着地面使劲嘬叶子烟，也没问有啥事，那眼光分明带着羞愧难言的神色。我的把握增至五分，便开始了预想的心理战。"你做的事我都晓得了。""我又没有做什么事。"底气不足的回答又增添我两分把握。我语气肯定地说："你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有人在柏树林边看见你从石头下摸钥匙开门。"富某没有抬头没有反驳和其他反应，我的推断确实没有错，于是继续实施我的战术。"你把钱还我就算了。不然先抖散骨头，捆起来送公社，说你破坏上山下乡，把你关起来。"不出所料，有文化的知青几个回合就战胜了知识贫乏的农民。威胁讹诈见效，富某当即承认从枕头下偷走了钱，原来他确实曾见过我在石头下取钥匙开门。

破案非常顺利，我不免得意，便继续深挖细查起来，问他为啥要偷钱。他吞吞吐吐说道："天冷没得鞋穿，脚冻裂了口痛，想买双农田鞋。"我这才看他一双赤脚，有裂口能放进火柴棍。夏天见他打惯赤脚，没想冬天仍无鞋，确实也可怜，农田鞋不过三五块钱，我想能收回剩下的钱也好。哪知他是手散穷大方，在供销社买鞋碰见熟人说他发财了，该请客，富某也难得有钱豪爽一盘，当即他就以烟糖酒办了招待。吃得高兴一身酒气出来正好遇见他在红旗大队的大嫂，大嫂见富某提双新鞋满嘴油光，就数落他道，侄儿的书本费还没有着落，你倒在街上大吃大喝。说得富某满脸通红，于是将剩下五元多钱交给大嫂，还说交书本费剩下的再给侄儿添顶帽子。

听着富某一五一十的交代，我那破案产生的喜悦兴奋渐渐消失殆尽。看着破烂的茅草房，看着穿着救济破棉衣、打着赤脚、光着脑壳、一身精瘦弱小的富某，我半天没有说话。富某仍蹲在地下，抬起头来看着我，可怜巴巴地央求说："鞋子还没穿，在粮柜里。我赶场卖红苕还你钱，你不要跟别人说。"我长叹一口气对他说："鞋子你还是穿起。你都是二'五保'，板凳没一条好的。一担红苕三四块，卖了你吃啥？给你留面子不说出去。不要再干这蠢事了，你也经不起打。"

此后几天我很不安，案破了，心情依然沉重。偷东西不值得同情，贫穷愚昧害人不浅。我对富某始终恨不起来，也没有给社员们讲过此事，除了深交的个别知青。事情过去多年，那破烂低矮的茅草屋、羞愧难言的眼光、长满裂口的赤脚……总不时在我脑海浮现。不知何年月幸运女神才能眷顾这穷乡僻壤？

改革开放后，我几次回到那个山村，但没见到富某。听老会计刘驼子说富某这几年"整对了"，学会挣钱了。养了头种羊和脚猪，或别人牵猪、羊来配种，或他赶猪、羊上门服务，收配种费，还要吃荷包蛋。听说还准备要抱养个女儿来养老送终。刘驼子感慨道，你

肯定想不到富某会有这个造化，真是世道变，人也变。这消息真像一味温胃姜汤终于融化了我因捉贼而哽在胸中几年的冷红苕。

另记：文中富某和会计刘驼背已于几年前去世，令我不胜感慨。

招工记

我下乡的那个山区的农民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用这句话来形容知青，特别是一些"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可以说恰如其分，其回城的艰难和离奇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上山下乡如疾风暴雨，大浪推沙，遍洒山林；招工回城像涓涓细流，曲折蜿蜒，终回大海。在这招工回城的溪流中浸透多少辛酸的眼泪、屈辱和愁烦、悲伤、喜庆。我的招工回城经历也颇为奇特，极具磨难，令人冲冠扼腕。

招工初期，大多知青都未回神醒眼，第一批知青不知不觉中回城进了工厂。这一来，知青和家长们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下乡五年后，五人知青小组走得只剩下我一人。有知青和农民朋友对我说，论表现应当你先走。真诚同情也罢，廉价安慰也罢，我统统笑纳称谢而已。

作为从旧社会走来带有历史"污点"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一个刚从"文革"中的"牛棚"出来，一个因病辞职在家，面对全部下乡（三个插队、两个云南支边）的五个知青子女，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父亲一生清白正直刚强，视开后门为不正之风和人格耻辱，除了相信、依靠组织和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指望了。只有在漫长的岁月中耐心地等待，像我们中间流行的自嘲那样"前途无量（亮），奋战（粪沾）一生（身）"了。

我一个人在农村又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每天收工后，我升火做饭，在柴草火光中，我的身影与挂在灶门的热水吊壶影，放大映在墙上，真是一幅绝妙的"形影相吊"图。一个读书人孤身在农村，寂静的夜晚如果没有煤油灯和书籍相伴，那真是难熬。而在白天我是幸运的，年轻力壮的我与山区淳朴的农民朋友一起劳动甚至比赛较量，这样愉快相处也是令人陶醉的事。当时农村水利建设掀起高潮，山区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驱逐了我的冷寂，冲淡了招工的诱惑，群体的和谐劳动溶解了自我封闭的冻圈。乡上三大水利建设，我参加了其二。在胜利水库我进入了指挥部，负责宣传并出版工地战报，身为"可以教育好"子女，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和知青好友国平真还把一张工地小报办得像模像样的。

胜利水利工程快完工时，刚被招工的知青好友甘国工向单位力荐并亲自带人来招我，我想，命运之神终究要眷顾我了。谁知好事多磨，公社社长说要留用此人，给朋友和招工人员一个软钉子，随后把我挂在南山小学代课。

我开始教小学一年级。小学和茶店中学共用三栋三层楼的校舍，当时在山区四个公社属于条件较好的。和农村七八岁纯真顽皮的孩子交往，让我感到童心未泯。当我教他们"大小多少"笔顺笔画时，确实有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而又心惊胆战的事。我班上有个孩子天生缺陷，口、鼻腔直接相通，说话不清楚，同学和老师都叫他"哑巴"。他也是调皮的学生。一天做课间操时我发现"哑巴"不在，同学说是还在三楼教室。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冲上楼，进教室一看，"哑巴"踩在打开的窗户框上，双手攀缘在屋顶和墙壁的夹缝中正在掏麻雀窝。我又吃惊又气愤，但不敢发作，生怕惊吓着他摔下楼。我轻轻地告诉"哑巴"脚踩稳手抓牢，慢慢下来。"哑巴"自知行动出格，开始一步步往下移动。我靠近窗台准备接他。谁知在"哑巴"下到第二格窗框时，突然失手，在我面前从窗户上面头冲地掉下去。说时迟，那时快，我急忙伸出双手一把抓住"哑巴"快要掉下窗台的那双赤脚，费尽全力把"哑巴"拽进教室。这时先回到教室看到这惊险一幕的女孩们都吓哭了，小学负责人唐老师脸色惨白，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万老师，要不是你救了"哑巴"，我们都不知道咋个交代。"哑巴"脸都吓成乌红站在窗前连眼珠都不转了。一个男老师上前就给"哑巴"一耳光，狠狠地骂道，这么调皮要害死老师吗？原来"哑巴"是大队干部贫协主任的儿子，要真摔下三楼肯定小命玩完，那么不仅是我，可能所有小学老师都脱不了干系。来小学刚一年，因为中学缺老师，我又到茶店中学去了。

到中学先当初中班主任，把学生从初一教到毕业进高中，我又成了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没有成。和我相处非常好的社员罗四爸安慰我说，这是"破竹子遇到节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节疤就是"破"不过去的，能推荐到乡、区已属不易，哪能有更多奢望？

在中学教书的日子是愉快和值得记忆的。学校教师和代课的众多知青朋友相处融洽，由于正式教师多不愿到山区任教，领导很器重这批代课的知青，学生也很喜欢熟悉农村、体谅农民的知青教师。我在中学做了不少事情，如组织山区农村教育调查，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喂兔子、栽蘑菇，举办诗歌文学讲座，编辑油印学生诗集，教学生游泳、练武术，参与组织学校宣传队、球队等，真还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自得乐读书千卷，尽苦心栽桃植李"，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是没有正式工作的知青。只有每当夜晚我和同是知青代课教师的老董、老郭等在一起聊起蹉跎往事和渺茫未来时，在自嘲我们已具备经得起任何打击的钢缆神经而长啸大笑之后，才又会惆怅地想，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归宿呢？

难道我的命运真如一位知青朋友给我算的那样吗？她用树叶给我算命，说是命太硬太苦，30岁后才会转运。我想她无非是在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去乱想胡为罢了。可惜却不幸而言中。

1976年初，我虚岁30，知青招工返城的特殊政策“三抽一”的硬指标终于落实到我家。当时我家五个是知青，大妹在攀枝花当地安置，小妹好不容易办了病退从青神县回家，两个弟弟在云南支边。我下乡十载，近而立之年尚未安家立业，弟弟们坚持要将此指标让给我，父母亦同意。招工回城是好，两个弟弟作垫底留云南代价是何等之大！做大哥的将何以为报？再说十年时间，是坨生肉也长骨头上了，社员待我不薄，师生相处甚善，教学效果不错，我愿教书，能教好书，哪怕在这穷乡僻壤。但成为正式教师是最低的合理要求。学校领导把我的意见通过乡领导向区教育局反映，回答是无法保证转正。我真的无话可说，加上“三抽一”招工名单已定，焉能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指标？只好惜别我喜爱的学校师生和待我甚善的农民朋友，决定走知青招工之路。

在招工单位市二轻局来人到公社办理招工事宜期间，正巧，父亲单位有了招工指标，能照应家庭，当然最好。为此，与我同时被招工的知青朋友杨代欣多次帮我与招工单位斡旋，并与区“安办”讲明情况，同意我等待父亲单位来招工。

不久，父亲单位果然如愿前来招工。我想人生的竹节疤不可能太多，这次该是水到渠成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了。公社绿灯放行，不料到区上办手续时，区“安办”主任突然翻脸不认，说上次二轻局来招工你不去视为自动放弃，不能二次招工。我说是你亲口同意让我父亲单位招我，我才没有到二轻系统的。谁知回答是：“我是答应过，但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不能办。”我尽管可以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但却绝不能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对我的命运这般捉弄和侮辱。在茶店街上曾被围攻当众受唾的奇耻大辱我克制了，而这时候自诩为钢缆神经的我愤怒到了不能自制，更何况指标是以两个弟弟献身云南为代价替我换取的！我与知青朋友喻小庠拍桌子掀板凳与他大吵大闹一场，一些人拖着挡着我怕打起来，一些人劝说，一些人在冷眼旁观，整个区“安办”乱成一团。“安办”主任气急败坏地叫人请公安局派人来“安办”抓人，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我真不知道是没有给他循例送礼，还是他对这批知青天生有某种对立仇视心理，或是我命中注定还有这场磨难。要不是其他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拿招工证明文件到区办公室去替我盖了那个要命的章，真不知道这事会怎样收场。遗憾的是在极度的愤懑和激动中我竟然没有记住那个替我去盖章的好人。

万幸的是当时我的手上没有利刃等凶器，因为当时我心中第一次产生了杀人的念头，一霎时我理解了《水浒》描写杨志杀牛二时的“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这一情节。原来罪与非罪的间隔真不如薄薄的一层纸。这一念之差的结果我将会成为替知青除害的英雄，杀害区干部的凶手，而世上要多两个冤鬼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龙泉区知青“先代会”贴在大街上的光荣榜名单中我是排名第一的。人人皆有的求生自保的最后权利受到侵害时，就有犯罪的可能，造成这一念之差的环境和条件虽非俯拾皆是，却

是不难发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完全可能被逼成罪犯。每当看见那些所谓的执法者对犯了点小规、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求生的弱者施暴和欺辱时，就会想起我招工时想杀人的感受。如果那些弱者被迫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些不合格的执法者难道不也是逼人犯罪的罪犯吗？

两年后两个弟弟有幸随着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潮流回了家，搬掉了一直压在我心中的大石头。大概我人生磨难的竹节疤在前30年已经“破”完了，也或许是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变，这后30年真的比较顺利，再也没有大的坎坷。知青吴小娃对我招工回城的总结是：久等必有一禅。30年前那场招工的噩梦让我痛忆至今，然而醒来已是艳阳高照的早晨。忘记过去是对历史的背叛，沉湎于往昔会丧失奋起的契机。只愿生活中少一些薄情寡义的冷酷，多一份通情达理的温馨。错位的思维、时代的局限、人为的刁难、人生的挫折无须过多地计较，饱经磨难的老知青将义无反顾地前行。

作者简介

万晓农，成都市第七中学高六五级应届毕业生，1965年9月经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东五中队培训，1966年2月插队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乡石经村九组。下乡十年间当过队会计、代理队长、代课教师、五好社员、先进知青。1976年4月调动回城。1982年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在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现退休。

见证塔里木河

王泽恂

从北京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塔里木河。

经过七天旅途颠簸，我们被送到一片荒凉的沙漠中，两边都是沙丘、沙海、胡杨树。

汽车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在这儿停车干什么呀？"

"不是让我们到农场吗？"

"房子呢？我们住在哪儿？"

这时听见一声哨子响，一个穿军装的人叫大家下车，按班排站好队，然后叫大家席地而坐，那军人拖起长腔开始讲话：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党支部——给大家——开一个欢送会，不对了，是欢迎会（掌声）！同——志们，你们——不远万里，从新疆——来到北京（笑声），不对了，是从北京来到新疆，你们——辛苦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工作是修公路，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工作——是艰苦的，生活是繁重的！不对了，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笑声）！同志们都看到了——我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住在劳改队——给我们修好的地窝子里——但是，我坚决相信从首都来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北京知青——都是不怕艰苦的——你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就叫好儿女志在东方（笑声），不对了，是好儿女志在四方——我们工程支队党支部——坚决相信，毛主席身边的优秀青年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我们的新疆建设得更美好！"

欢迎会开过以后，开始分配住房，指导员（就是刚才讲话的人）把我们带到几个土丘边，

那土丘原来就是地窝子,每个地窝子前都有一条沟,沟是越往里走越深,直通地窝子里面。

走进去后光线很暗,只有顶上开了一个天窗。在地沟的两边就是睡人的“床”,上面铺着芦苇和胡麻。“床”上只能睡觉不能站立,否则脑袋就会顶到屋顶。人等于睡在地上。一班30个人,分两边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床”上,不敢打开被子,因为屋顶在滴水。

有人开始发牢骚,说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可不住又怎么办呢?总不能睡在沙漠里去吧?既然来了,就听天由命吧!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咱们下河洗澡去!”大家都说对呀,一路上风尘仆仆,都快成泥人了,为什么不去河里痛快地洗一洗呀。于是,大家飞快地跑到河边,脱下衣服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起来。一些女知青知道了,也跑到河湾另一端,纷纷跳进河里。

以后我们知道,这条河便是著名的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世界第二大内陆河,由叶尔羌河、阿克苏河汇聚而成。这两条河都是天山的雪水,经过浩瀚的沙漠蜿蜒而来,因此清澈透明,绝无污染。塔里木河河面十分宽阔,流速徐缓,水最深处仅有两米,河底皆是粗沙,脚踩在上面格外舒服,真是游泳、沐浴最理想的去处。

沐浴在清澈的河水中,不但洗尽一身的污浊,也使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可以忘掉那些烦忧和失落。因此,每当大礼拜(工作14天休息一天),我就和阿起到塔里木河畔散步。

塔里木河真是一条美丽的河,神奇的河。

沿着塔里木河远望,满目湛蓝的河水,两岸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远近近,红柳、骆驼刺和胡麻使河滩变得色彩绚丽——红柳丛中鲜红的嫩枝,深紫色的花穗;骆驼刺上结满了银色铃铛果;胡麻绽出粉红色小花,让人忘记正置身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穿过河滩,便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这里林木蓊郁,除了胡杨之外,还有树皮银白的大叶杨,古老的林木覆盖着两岸大片大片沙漠,形成一条绿色巨龙,绵延百里。离河更远处,时见大片枯树林,伸展着枯枝,像是千千万万根手指,直指1966年的天空。奇形怪状的枯树,就这样绵延无尽,让人深感苍凉、神秘和恐怖。

静,是塔里木河的又一个特色。

行走在河岸,除了脚下细微的轻响,几乎是万籁俱寂,仿佛远离人世。那种静谧,使听觉分外敏感,甚至可以听到几公里以外动物的奔跑。这种静谧,静得神秘,静得让人能够产生幻觉,静得惊心动魄。

因了塔里木河流速缓慢,便与汹涌澎湃的第聂海河形成鲜明对比。它慢得让人根本感觉不到是在流动。尤其无风的日子里,河水平静如镜,水中沙砾几可一窥见底,那水草间的游鱼时隐时现,闪闪烁烁。于是,沙漠腹地的塔里木河更显宁静,幽美。

在河流转弯处,常常会现出碧绿的芦苇,在微风中摇曳着,浮浮荡荡,浩浩瀚瀚。这苇浪一经与河水交融,本来空旷平坦的河岸便婀娜多姿起来,似画卷上润了绿色,深深浅

浅地模糊了河岸弯曲的线条,使人莫辨河水与河岸。当阳光炫目时,水里光影交融,水上金色的光线穿过无数枝隙,变成淡淡的蓝色。向阳的树叶是鹅黄的嫩绿,背光一面则是墨绿和深棕。苍老的树干上,色彩斑驳,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大自然用绚丽的色彩描绘着这片神奇的大地,使其幽绿遮漠远,空漭着色多。

塔里木河最美的地方当是河湾。

如果站在沙丘上,可以俯瞰河湾全景。大自然用它神奇的画笔,给塔里木河画了一个巨大的"S"形。伫其一端,尽览四面河岸的不同景色:近处成片的莆棒草、对岸的甘草滩、隔岸的胡麻花和远处的灌木丛。棕黄、深绿、深黛几种色彩交融,不能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和阿起沿着塔里木河走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劳累,也忘记了一切烦恼,真的是远离了人世喧嚣,进入了一种梦幻般的境界。我们恍然已经融入大自然,融入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融进了塔里木河。我渴望远离告密、株连、内讧、揭发、冤杀、相残,远离人间的"红色恐怖",渴望将自己化为一滴水汽,在塔里木河上空飘浮着,穿过清新的带有胡麻花香气的大气层,慢慢地在低空翱翔。

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乘舟在塔里木河漂流,看一看上游到底是什么样子。后来这一愿望居然得以实现,而且是无意识地做了一次塔里木河流域的探访,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漂流给我俩带来了横祸。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苦干,总算在10月1日那一天可以休息了。原定每隔两周休息一天没有了,说什么"迎十一,献厚礼",要不是干部们国庆节要回家团聚,可能连10月1日也不会放假的。有什么办法呢?可是,这一天休假怎么过呢?这里没有北海、颐和园,没有香山红叶,更没有美术馆和音乐厅,待在地窝子里睡觉?那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我想到了阿起。阿起是我们支边青年里的最幸运者——被分配到河边看管菜地,单独住在维吾尔族人遗弃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一同被遗弃的还有一只卡盆(维吾尔人的独木舟)。

我对阿起说:"咱们坐卡盆去漂流你看怎么样?"

阿起说:"我早就想了好长时间呢。怎么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于是,我们来到河边检查起这只卡盆来。

这简直是一件远古的遗物,令人不禁想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它在今天船类中实在是太古老,太简陋了。它完全是用一根硕大圆木凿成的,根据木纹可以辨出是一棵梧桐树,直径约有七十公分,长约三米,中间被挖空处约长两米。一头被砍成尖楔状,乃是船头;另一端稍呈圆形,自是船尾。挖空部位的内壁呈凹凸状,表现出制造匠人因工具过于简陋而造成工艺粗糙。船下体因长年浸在水中而布满了藻类,致使色泽深绿。船里尚有积水,仓内斜放着一只破桨。我们称之为桨,实际上不过是一棵胡杨木,将中间刮细,两头

略呈勺形——这便是这只卡盆的全部了。

阿起拿起饭盆淘着船里的积水，说：“这卡盆只能坐两个人，但还要会上，上不好就会翻船。”

果然，在我上船时船身整个侧翻，只好又一次淘出水，然后从船后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才终于坐稳。就这样，我们开始逆河而上。

我坐在船尾，笑着看阿起划桨。我说：“可惜没有照相机，要是能拍一张照片多有意思！你看这卡盆，还有咱们穿的这衣服，活脱脱是两个原始人！”

阿起也笑起来，说：“列宾有一张名画，叫《意外的归来》，我看，我们要是拍了照片，可以叫《从远古出发》，如何？”

阿起像划单人艇的运动员一样，左一下右一下划着，累了就换我。好在塔里木河流速徐缓，划起来并不费劲。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S”湾（阿起起的名字）。我们将船泊在岸边，登岸去摘那骆驼刺上结出的铃铛果，观赏两岸一片片千姿百态的红柳滩，阿起不住地赞叹道：“太美了！太美了！”

我们来到岸上半岛的凸出部分，见河边有粗壮的芦苇丛，苇间波动频繁，发出好听的响声，当是鱼儿们正在聚集。我叹道：“可惜没带鱼竿！”阿起说：“谁能想到这里有这么多鱼啊！”

阿起指着对岸那片胡麻说：“你知道吗，胡麻又叫罗布麻，它不但能开出香艳的花朵，而且能治疗高血压。这里的甜甘草都是最常用的中草药，你看那些老军垦挖出的甘草，根系多么粗大，有的在这里生长了十几年，所以药用价值特别高。”

正说话间，对岸的灌木丛后出现了一群黄羊，全身棕黄，四肢细长，鼻梁上有白色条纹，长长的两角弯向后方。它们悠闲自在地来河边饮水，对我们视而不见，然后又悠然离去，直至消失在远处混生林深处。

我们正想绕过河湾去寻踪那群黄羊，不料河对面的凹湾突然改变了塔里木河的温柔宁静，变得刀削斧劈一般，全是陡峭的悬岸，直上直下，沙岸间尽是树根和苇根结成的网，盘根错节，密密麻麻，呵护着陡峭的沙岸不致坍塌。这里的河水变得湍急，那是因为河道变得狭窄的缘故。河岸上则都是古老高大的桦树。穿过桦树林，是一片骆驼刺和红柳的灌木，中间也有沙枣树。那里的红柳与半岛上的红柳又截然不同，都自然长成了圆形，好像故意留出中间一圈空地，高大粗壮的红柳围成了天然的篱笆墙，足有三四平方米。有的枝干粗壮如柱，这种红柳绝大多数都已枯死，根据当地维吾尔人的说法，这些红柳少说也有数百年了。

我和阿起被这怪异的红柳圈吸引，都惊讶不已。这些古老的灌木为什么会长成圆形的奇观呢？而在圆圈的中心又为何寸草不生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种现象，还有那塔克拉玛干大漠深处夜晚不时升起的绿色信号弹，都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成为了大漠羌风深处的不解之谜。我和阿起正为这些怪异现象纳闷时，只听得红柳圈里“噔”的一声，



一只巨大的黄羊从里面腾空跃起，落在红柳外飞快地逃遁远去，吓了我们一跳。阿起说："好大一只黄羊，跳起来快有两米高呢！"

我俩议论着，又上了卡盆溯流而去。没有多久，河岸左前方出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枣林，疏密不一。好大一群马鹿，正在追逐嬉闹，有的探身河边喝水，尤使我们惊奇的是这群马鹿数量之大，足有二百多只，几乎覆盖了整个沙枣林。其间，有不少壮硕的公鹿，体重少说也有一百多公斤。我不由兴奋地说："天哪，简直是天然的动物园啊！"

小船继续向上游划行。天空蔚蓝，树林苍翠，河水的颜色则是介乎蓝与绿的湖蓝色，如果没有映入水中的几片白云，你简直无法分清哪是天空，哪是树林，哪是河水。小船悠悠行驶在河上，除了木桨划水的声响，天地间一片静谧。阿起说："这地方太静了，静得有点吓人，要是我一个人，绝对不敢来漂流啊！"

似乎是在回应阿起的话，右岸桦树林里忽地传来鸟鸣，开始是响亮的啼啭，尔后变成了群鸟的喧哗，像是极其巨大的合唱团。当我们向树林走去，却不见一只鸟儿。正奇怪时，又是一声鸣啭，接着群鸟争鸣。我和阿起再次弃舟登岸，去寻觅鸟踪。我们穿过一片参天的桦树林，竟连鸟影都没有看见。再往前走，一片新生的梧桐和胡杨豁然而现，间杂有沙枣树和甘草，在这片低矮的混生林中，我们终于看到了成群的新疆八哥、内蒙百灵、美丽的黄雀和在灌木中飞跳的腊嘴。原来这里是一个真正的鸟类王国！丰茂的林木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居环境。我和阿起不忍打扰，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俩划着卡盆继续上溯，行进了约一公里，两岸树木逐渐稀疏，再向前行，原始森林没有了，只见河边成片的灌木丛，眼界陡然开阔，看得见两岸起伏的沙丘。河水变浅，河道渐宽，只有中间能够行船，如果走偏，便要搁浅。过了这片浅滩，前面出现一个美丽的沙洲，沙洲正好在河道中心，长约二百米，宽约六米。沙洲上长满各种灌木，偶尔也有几棵高大的乔木，使得景色更加生动和有立体感。这里的灌木，用群芳荟萃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除了沙漠里常见的红柳、罗布麻、骆驼刺和甜甘草外，还有许多不明植物。有一种很像枸杞，枝头结满了红色果实。在水边还生长着一种很像马兰草的植物，紫花绚丽，但是比马兰硕大了许多，蒲草和芦苇更是遍地皆是。我和阿起正在为自己对植物学的孤陋寡闻而自悲时，不远处飞起两只白色大鸟，身长约六十厘米，翅膀张开有一米四，长腿红嘴，翅后侧有蓝色羽毛，像鸳鸯又像天鹅，总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鸟儿。

在沙洲上走着，经常有绿头鸭被惊起，然后又落入水中，还有些白色、灰色的小型鸟类。穿行于河面与小岛之间，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其实是一个鸟岛。我们走到一簇茂密的灌木丛时，看见两只毛茸茸的幼鸟，正在一个大鸟窝里朝我们鸣叫，阿起抱起小鸟好奇地看时，只听着头顶一声凄唳，阿起被啄了一下，吓了一跳，急忙放下幼鸟，摸着脑袋说："好疼啊！这大鸟真凶啊！"我说："这是动物的本能啊！你要是不放下它的孩子，它还要

和你拼命呢！”正说话时，天空又飞来几只同样的大鸟，在半空中鸣叫不止，看来是在向我们两个人侵者示威，我忙对阿起说：“咱俩快走吧，不然会有麻烦的。”

我们回到河边，爬进卡盆在岛边划着，发现河边的芦苇特别茁壮，苇叶宽大，苇秆有大拇指粗，更发现在芦苇丛中有活物在游，仔细看时，是一只水老鼠，浑身棕红色，毛发润泽如绸缎，体长有20厘米，长了一根特殊的扁形尾巴，高高翘起，像一个船舵。我听北大的陆昕说过，这是麝鼠，皮毛异常珍贵。记得1954年在百货大楼看到一顶麝鼠皮帽子，那时便卖两千多元。我对阿起说：“你看这塔里木河到处都是宝啊！”他说：“因为这里人迹罕至，如果人多就惨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动物啊。”

我们说着，继续前行。这时两岸的树木开始分外茂密起来，只留下中间一条河道，根本看不到远方。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经看不见了。河水变成暗蓝色，好像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穿行，顿觉凉气逼人。我们知道已经天近傍晚，遂决定掉转船头，往回划去。我们都有些担心起来，如果继续向上游远划，会不会遇到什么伤人的猛兽呢！

顺流而下，船速快了许多，有时根本不用划桨，由卡盆在河上自由地漂着，那只桨只用来调整方向。当卡盆漂到“S”湾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渐渐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那天正巧没有月光，两岸树木、沙丘漆黑一片，小船只能借着天空与河面映出的微弱的青蓝色光带行驶。没走多远，我们惊异地看见左前方一颗耀眼的信号弹划破夜空，落进大漠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信号弹升起，依然是美丽的绿色，落入一片黑色的沙丘，距离我们约有两公里。阿起问道：“你说这是什么人在放信号弹？”

我说：“听说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都看到了。有人说是马步芳部队的溃散人员，有人说是‘苏修’特务。阿起，你有没有胆量？咱俩今天就去看个究竟！”

阿起当然不肯示弱，于是我俩弃船登岸，朝着信号弹升起的方向前进。我们穿过无数座沙丘和稀疏的树林，走了大概二三公里，始终不见一个人影。黑暗中，只是隐约见到一座座隆起的沙丘，像坟墓，令人毛骨悚然。忽然，在一座红柳丛后面发出怪异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蹭着红柳枝。我和阿起躲在一丛骆驼刺后面，屏息观察。这时，月亮已经升起，能够看清眼前的沙丘、胡杨。我俩一动不动，几乎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到底红柳丛后面是人还是动物？是“苏修”特务，是土匪，还是猛兽？正在这时，又哗的一声，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了，啊！原来是一头野猪！它匆匆朝右侧的沙枣林方向蹿去。

我和阿起都长舒了一口气。

作者简介

王泽恂，男，1938年生，1966年由北京赴新疆建设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后并入二十九团，后调入该兵团石河子工一师六团，1998年退休回京。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章孟杰

"阶级斗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报刊、广播、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幅大标语。据说有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说实话，未出校门之前，"阶级斗争"对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关它的知识全来自书本上和老师的教诲，头脑中的"阶级敌人"早已公式化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之流，他们一个比一个残暴奸诈荒淫无耻。落户到大巴山社办林场不久，我就有幸目睹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并参与其中。

记得那是到达林场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上山来到林场，告诉我们今天不用出工，准备参加批斗大会。当时我们初到林场，临时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厢房，三合院的中间是空坝，开会时可容纳二百多人，主席台就设在堂屋门口。听说要参加批斗会，大家都为能亲眼见识阶级斗争而感到兴奋(现在想来那似乎是专为我们安排的)。

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五十来岁。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有块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

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方言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

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阶级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老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什么。我气愤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

老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感到一

阵厌恶，用手推开她，但我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的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子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送菜。看见这个农村女子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子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哦，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子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解放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起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解放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几十亩田地买过来成了地主。解放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

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文革"爆发，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了逃兵。

1986年暑假，我带着儿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摆脱饥饿贫穷的乡亲们。我又看见了姓何的地主。只不过现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宣布撤销人民公社的同时，为全国几百万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现在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摆谈中我得知他又干上了经商的老本行，把乡亲们家里的鸡鸭及蛋类收购起来贩运到城里去卖，从中赚差价，这使他又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我更祈愿那荒唐的阶级斗争闹剧永远不要再在这块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演。

作者简介

章孟杰，男，1964年7月初中毕业于重庆二中，当年9月5日下乡，落户巴中县双凤公社林场，任林场团支部书记。1978年7月考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分配于重庆小龙坎职业中学任教。现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中国民主促进会沙坪坝区常务副主委，区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区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区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

天上掉下招工馅饼

吴三学

1971年7月初，又有招工消息从公社最高权力机关传出，说是成都市沙石公司要在本公社知青中招收20名精壮劳动力，以补充“深挖洞”、“反修防修”力量之不足。此前，已有12名听话、优秀的知青被成都饮食公司相中招走。初闻此消息，我反应木然，未往心里去。不像有的人那样亢奋、跃跃欲试、上蹿下跳。因为我深知自己底气不足，天上掉馅饼之事绝不可能降临我头上。

论家庭成分，我属于问题“麻五类”，论表现我无疑属于不思进取、行为不轨的另类知青，俗称“散眼子”知青。其实，我先前并不这样，也是好同志。当年，跟风赶浪头脑发热的我，曾坚拒亲朋好友的善意劝阻，义无反顾地奔赴“革命第一线”。下乡伊始，我就自断后援，要求经济条件尚好的父母别寄钱寄物，我要凭借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干一番事业。秋收时节，我一人连续摇打谷机两个小时是常事，肩挑毛谷一两百斤不在话下。修筑西礼渠（西昌西宁至礼州干渠），我与同队知青李娃曾创造个人单日挖土6.5立方米的纪录。当时，一个全劳力能挖两三立方就很不错了，为此，受到西昌西礼渠工程指挥部的通报表扬……这豪气，用我当时炮制的一句打油诗：“愚公传人非我谁，定教山河谱新篇”或可印证。“文革”一来，几经大风大浪颠簸折腾，微贱小命虽得以苟全，理想信念的圣殿却已倾塌，陷入苦闷彷徨。于是便到处漂泊，于是便消极怠工。即便大忙季节，我与患难兄弟洪友伦君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常躲在狭窄的阁楼，或睡大觉，或阅读当时所谓的禁书，或听收音机，有时也外出游荡。我们给自己兴了个不成文的规矩，戏称八不出（出工）：一曰，天气不好不出；二曰，睡过了头不出；三曰，不喜欢的工种不出；四曰，赶场天不出；五曰，外出游玩不出；六曰，朋友来访不出；七曰，取汇款不出；八曰，心情不好不出。

好在双方都有家庭接济，饿不着也冻不着。我们的倒行逆施，必然招致社员的忌恨与指戳。不外乎：你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闲饭的，生产队不养懒人。站在他们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歪理：生产队人手本来就不缺，我们工分少分得也少，并未亏欠任何人；要恨，就去恨那些工分迷，就去恨把我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人……如此想来，心就放平了，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结果，与社员关系更加恶化。处境如此尴尬，岂敢有上调回蓉的非分之想？更何况全公社有二十多个生产队，僧多粥少，说什么也轮不到我。

然而，过了几天，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们生产队居然分得两个招工名额。我本不抱任何幻想，闻讯不禁怦然心动：机会不是来了么，何不参与竞争，碰碰运气？再说，我的身体在本队男知青中数一数二，优势明显。但仔细掂量，又觉很难，最难难在过社员关，没有他们恩准，万万不行。可关系已弄成这样，一时半会怎么扭转？正感希望渺茫，抱有同样想法的洪友伦君来了灵感："走，找队长疏通疏通，看看能否对我们网开一面。"于是，我们在获知消息当晚，趁天未黑尽来到队长家。队长不猜就知来意，揶揄道："平时难见你们的影子，是哪股风把你们吹来的？""队长，这次调工作有没有我们的分？"我避过锋芒，直人主题。"调工作就得有表现，你们自个说你们的表现够不够格？"队长一脸严肃地打起了官腔，还把我们的"罪过"一一列举，就像威严的法官对犯人无情地宣判。"是我不对，还影响了友伦，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向来没有求人的习惯，此刻也不得不违心地在队长面前下矮桩。"放过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洪友伦君也在一旁敲边鼓。游说了半晌，队长才缓和了语气，不置可否地说："招工表该给哪个我做不了主，明晚开社员会就知道了。"队长把话说得很玄，但毕竟还未将路完全堵死。次日晚，我们早早来到生产队的固定会场大库房。以往，我们难得参加队里的马拉松会，即使参加，也只打个照面就溜，而今晚的会却不同寻常，将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非来不可。其时，先于我们到达的队干部们正在研究事情。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点燃了兰雁牌香烟，虔诚地恭候其他人光临。不知等了多久，社员知青才陆续到齐。终于开会了，队长讲完生产上的几件事，然后拉大嗓门说："成都省的人防单位要在我队招收两名知青当工人，大家说推荐哪两个合适？"社员们先是七嘴八舌地议论，然后提名。洪友伦君鸿运高照，第一个被提名并获全票当选。他平日面带微笑，待人友善，不得罪人，受到众人"拥趸"，亦属"实至名归"。随后，有人提到别的名字，其反响并不强烈，赞成的人也不多，却令我方寸大乱，头脑嗡嗡作响，血直往上冲。"为什么不提我，为什么？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正在怨天尤人，就听见饶舌的赖二婶的喊叫声："吴三学懒㞞得很，不想做活路，把他推荐出去算㞞了！"此言一出，附和者众，社员们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连队干部也一个不少。我做梦也没料到自己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粉丝"，且在过经过脉之时挺身而出，

为我化解危局。欣喜雀跃之余，又有一种被淘汰出局的无奈与悲哀。很明显，全队上下一致推荐，并非真想成全我们，而是趁此机会掀掉包袱。这样一来，生产队就少了两个抢夺他们口中食，给他们添乱的懒虫。他们并不知道：推荐可以从根本改变人的命运，给他们提供新的生存空间，从而提升其人生价值。不过，我仍从心底感激那些勤劳、质朴、憨厚的山里人，正是他们的抬爱，他们的义举，我才侥幸拿到了那张朝思暮想、弥足珍贵的招工推荐表。

接下来是填表、政审、体检，所幸都很顺利。深感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洪友伦君不幸在政审关卡了壳，未能如愿以偿。（事隔不久，他又遇上招工机会，在峨眉矿山机械厂当了工人，后来念过大学教过书，凭借睿智与才干，担任峨眉师范学校校长长达十年之久，为乐山地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师资人才，使学校财产增值一千多万元，成为当地口碑甚好颇有影响的人物。以事实证明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句老话的颠扑不破。）因为洪友伦君的缺位，我有幸成为本队第一个通过正规渠道跳出“农门”的知青。尽管这份工作是块烫手的山芋，我还将继续接受特繁重体力劳动的洗礼，但它毕竟满足了我一时可怜的梦想，毕竟是我在失意沉沦时抓住的一根稻草。

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高指示，由家里寄钱，偿还了欠生产队的口粮款22元1角6，卷裹起破烂，我终于于1971年8月25日踏上归途。从此，远离了这块剥蚀我青春、扭曲我灵魂的伤心之地。

作者简介

吴三学，1945年7月生，成都市人，大专文化，1964年7月成都四中高中毕业，1965年8月至1971年8月在西昌阿七公社桂花四队当知青。



从大学生到农民

徐孝清

再见了，妈妈

1964年4月8日，一个原本极普通的日子，但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一天，我们500名知识青年从成都人民南路出发，奔向大凉山插队落户。这一



四川大学中文系五九级乙班毕业照。摄于1962年5月12日。后排左起第二人是徐孝清。

天,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这一天,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蓝天白云,红日高照。人民南路上彩旗飘飘,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声、口号声震耳欲聋。人海中,有胸佩大红花和上山下乡纪念章整装待发的知青,有热情相送的党政领导及家乡父老,更有难分难舍的知青们的亲属。我的许多川大同学也来了。穿梭在人群中的新闻记者还采访了我。当他把话筒伸到我面前时,我激动地对送行的同学们说了一些豪言壮语:"读书明理立大志,主席教导暖我心;奔赴农业第一线,三大革命当尖兵。""改造乾坤意志坚,脱胎换骨不畏难;学习侯隽、邢燕子,告别温室去种田。"当时情景,真是比过节还热闹。

当满载着500名知青的15辆大卡车启动的时候,鞭炮声又噼噼啪啪地加入了送行的大合唱,把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紧随15辆出征车后面,还有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送行的亲属,浩浩荡荡,一路出城。到了双流县的路口,知青与亲属们全部下车,依依惜别。有紧握双手的,有抱头亲吻的,有泪流满面的……曾红麟的母亲哭喊着"我的红麟女儿呀……"亲人们千叮咛万嘱咐,真是难舍难分啊!

我们的车开出老远了,家长们还站在原地,挥动着手臂,凝视着我们远去……

当时,我们中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最大的也就是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

从大学生到农民

有人问:"你都上大四了,为什么还要当知青呢?"

1963年初,我在读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时,不幸患了精神抑郁症,休学住院治疗,病愈后学校让我休养两年再复学。我认为这是浪费青春,不愿在家休息。当时,青羊宫街道办事处党委聘我当民办中学教师兼班主任和学校会计,后又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刚干了一个学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响应号召,积极报名。

我在川大读书时,就曾通读过四卷《毛选》,申请下乡后,又着重学习了《毛选》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指示。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实行不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立志并实行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使我明白了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明白了一个革命青年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熔炉中自觉锤炼自己,才能当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毛主席还说:"一个革命的知识青年,应当热情地到农村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做起。"当时,我还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白天毛选随身带,见缝插针学起来;晚上还要加夜班,梦中也在背毛选。思潮起伏难入眠,干脆翻身坐起来……读毛选,读毛选,好似婴儿偎母怀,愈读愈觉心头暖……"

有人说:"你已经读到大四,马上就可以拿本科文凭了,这时下乡,不是太可惜了吗?"

当时我认为革命青年应该以祖国的需要为第一志愿，"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不是多数都在大学读书吗？可当时的形势是：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毅然投笔从戎，奔延安，赴太行，到抗日第一线去。他们不但放弃了学业，更有人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民族革命中建功立业，成就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投笔从农，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的热潮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奉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把自己锤炼成合格的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呢？有什么可惜呢？

当时我积极参加团市委组织的各种学习活动。除了学"毛著"，学革命先辈的精神，还学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赵耘的先进事迹，听成都市先下乡的知青陈云珍、杨元安、张洪遂作的报告；看话剧《青年一代》，看电影《朝阳沟》；到青白江公社去实习，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座谈会、讨论会等等。这一切，使我对上山下乡，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永久牌"的新农民非常向往，认为那是比回四川大学复学还要有意义的事。



本文作者与彝族小姑娘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复学的机会，义无反顾地申请上山下乡了。我多次写申请，表决心，被川大同学誉为热血青年。我当过成都市西城区人代会列席代表并在大会上发言，又到一些中小学去作报告；召开成都市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时，我是主席团成员，就座于主席台上，还作了大会发言；《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的相关报道中都提到过我。

昭觉，你好

后来，从成都出来的车队又兵分三路，向大凉山进发。其中有两路各 200 人分别去了越西和普格，我们这一路 100 人则直奔凉山州首府昭觉县。

尽管一路颠簸劳顿，风尘仆仆，但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五通桥流化溪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美姑县年轻人的女声小合唱，西宁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等等都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4 月 11 日中午，车队就要到达昭觉了，老远就望见昭觉大桥上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从昭觉大桥到烈士塔以至整个昭觉城，里三层，外三层，到处都挤得满满实实的。州县领导还与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则不顾一路的疲惫，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革命的口号。有些彝族老乡，站在高高的烈士塔上，兴奋不已地发出“啊——啊——”的喊声。

我们在州府住了四天。兴奋与激动之后，有些人心里犯起了嘀咕：昭觉城太小了，真是“一灯照全城”，“一家煮肉，全城闻香”。公路是泥巴路，车子一过，尘土飞扬。路上行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路边的建筑，大都是矮小的土坯房、瓦板房，我们戏称“昭觉的钉子（指瓦板房上压的大石头）一颗有几十斤重”。晚上没有路灯，没有商店，也几乎没有行人，全城一片漆黑，一片死寂。老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赤脚，据说冬天脚冻裂了，就用针线缝起来，减轻行走时的疼痛；身上穿的察尔瓦、百褶裙破烂肮脏，据说从来不洗；有的在地上坐着啃荞粑、包谷粑；有的几人一堆传递着喝一碗酒，手脸都脏得发黑，据说也是从来不洗，因为怕洗了后荞子、麦子就长不好。真是贫穷、落后、愚昧得无以复加。这一切，与车水马龙、文明富裕的成都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而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真是不可思议，不敢想象。于是乎困惑、彷徨、落空、无奈等负面情绪一起涌上心头。张发云、马长珍等几个年龄小的女生，竟关上寝室门大哭起来。这时带队干部立即分别与她们谈心，用自己离家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开导启发。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们住地的大门上、墙上贴满了这些小同志在成都时历次用大红纸写的决心书，原来它们还是带队干部让成都方面空运来的哩！

重温出发前的决心，使大家坚定了扎根凉山的意志。我们观看了州文工团的精彩演出，什么《奴隶之歌》、《红披衫》、《快乐的诺苏》、《阿哥追》、《全家福》、《修路的大哥卡沙

沙》……观看了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又与社干部、社员代表座谈，更重要的是，我们12日专程谒拜了烈士陵园，并向其英灵庄严发誓："……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在烈士们洒下鲜血的这块热土上，洒下我们的热汗，用它来浇灌这片热土，为它美好的未来奉献我们的青春和智慧；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足迹，走到共产主义。"

跳坝——我们的新家

15日，我们跳坝点的17名男女知青，在队干部和送行的县干部带领下，出城向目的地前进。当时六个知青点中，跳坝离城最远，还隔着一条昭觉河。来到河边，隔河眺望，跳坝队就在对面的半山坡上，坡后是渐渐高上去的大山。喜气洋洋、笑容满面的社员早已在山坡上敲锣打鼓迎接我们了。年轻人争抢着帮我们背行李，全队男女老少一路夹道簇拥着我们到达住地。那是全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两栋土坯瓦房，有一个大小适中的晒坝，是全队开会的场所。坝子打扫得很干净，上面还堆放着两大堆社员们为我们准备的柴火。另两方，一栋是一个老阿妈的住房，一栋是一个巴底（单身汉）的住房，坝子就在这四栋房子的包围中，像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在欢迎会上，队上用早已宰好的牛羊、杀好的猪鸡为我们接风。我们与社员频频举杯，并且第一次品尝了彝族待客的坨坨肉、杆杆酒、酸菜汤以及那没滤过的豆渣……那天夜里，在彝家山寨的新家里，在木板搭成的连铺上，我们睡得特别香。

换肚子

刚下队时，国家发给我们每人每月六元生活费（三个月后改为三元），供应粮食30斤，肉一斤，清油半斤（一年后全部取消）。开始时，我们仍能每月打一次牙祭，平时还可以买点最便宜的莲花白来当菜，买一点干海椒和盐来调味，油则少得可怜，后来就只有以洋芋为菜了。再后来，就产什么，吃什么，除少数大米外，只能以洋芋、包谷、荞籽、燕麦、黄豆为主食了，副食基本上没有。由于劳动量大，油荤奇缺，几乎人人吃不饱。然而马长珍等小女生就是肚子再饿，对洋芋等粗粮仍难以下咽，经常把洋芋坨坨送给男生吃，自己只喝一点黏稠的洋芋汤汤。看着这一幕，我都有点怀疑"饥不择食"这句成语了。小女生曾红麟吃了粗粮后，一直不消化，天天拉稀……

社员视粮食为命，自留地里也种粮食，不种蔬菜，他们是可以只吃洋芋等粗粮不吃蔬菜过日子的，我们则实在不行。有一次，我们用洋芋向凉山铁厂的"改右学习队"换了些莲花白来调剂一下生活，被队长大骂一顿，说我们"傻"，"不知道过日子……"

后来，我们向社员学会了做嘟拿粮（又称连渣菜），并学着社员们薅包谷时，将杂生其间的野菜扯起来，择洗干净，加在嘟拿粮里混着吃；向社员学着吃海椒盐巴水蘸洋芋；把包谷

加工成粉，粗的作包谷饭，细的炕包谷粑；把荞籽脱壳打粉后，蒸窝窝头、煮荞粑粑；把园根叶煮了，沤酸，晾干做酸菜；并粗细搭配，变着花样吃。半年后，我们不但能在集体户中做到收什么吃什么，还能到社员家做客，与他们同吃一锅饭了。其中，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做的嘟拿粑，于是社员们做了嘟拿粑或什么其他好吃的东西，总爱请我们去家里分享。

学彝话

刚下队时，我们听不懂彝话，更不会说彝话；大多数社员也听不懂汉活，不会说汉话。互相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严重阻碍着我们与彝族群众的融合。只有转业军人马忠全、会计曲木新尔和个别小伙子会汉话，他们成了当然的翻译。在劳动生活中，每当社员用彝话说什么，我们就不约而同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翻译。我们想说什么，就问他们用彝话怎么说？比如"今天干什么？"彝话为"额捏虾苏？"于是每天早上，我们见队长就问："队长，额捏虾苏？"我们还彝汉话互译编成歌谣，比如：吃饭就是渣子苏，睡觉就是依里古，要问你们哪里去，彝话里面叫卡波。有时，我们又将彝话说成俏皮话，比如"快点来"，这话是"嘿几木哪"，为了好记，我们就俏皮地说"海椒不辣"，一下子就记住了。有些女社员总爱问我们"阿母额额？"（想妈妈吗？）我们先马上重复一遍，接着答"阿额"（不想）或"额"（想）。开会时，大人们爱说："阿衣，躺沙！"我们也马上重复一遍，并通过翻译知道是"小孩，别闹了"。我称之为重复记忆法。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记录常用彝汉话互译，一有空就拿出来读、背、记，就像在学校时学外语一样。大约过了半年，我们就可以彝汉话夹杂着说"团结话"了。有时，还外加手势比画。一些年轻社员也向我们学汉话，说"团结话"。比如"休息一会儿"，说"一领领休息"；"心肠很好"，说"心肝瓦九瓦"；"身体好"，说"各博好儿好"……

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们就可完全甩掉翻译，流利自如地与社员交谈了。闲来无事，走村串户，夜深人静，听老木苏（老年人）讲故事都没有问题了。我们与社员更加亲密无间，自然也就不再孤独寂寞了。

扁担压痛扁担医

插队落户当农民，对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少男少女来说，确实够呛。我们生来就没下地劳动过，什么栽秧子、割谷子、收麦子、薅包谷、挖洋芋……从来就没有干过，完全是陌生的。就说脱鞋下水田弯腰栽秧吧，已经让我们腰杆胀痛得难以忍受了，更何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栽出来的秧子还不合格哩。因为不得要领，不是浮秧，就是五爪秧，还不成行，且速度极慢，跟不上趟。有一天出早工扯秧子，一条受惊的水蛇四处乱窜，吓得女生们大声尖叫，慌乱成一团。还有一天下水田栽秧子，我发现两条小腿肚子钻进了五六根

蚂蟥，用力拍打得生疼后，蚂蟥终于退了出来，但立即鲜血直流，令我胆战心惊。当时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薅包谷不是杂草除不干净，就是把包谷苗判了死刑；挖洋芋也常把大得爱人的洋芋挖烂成一分为二；割谷子也笨手笨脚，常留下一根根稀疏地立在原处，戏称烧香拜佛。割麦子时腰和腿胀痛得不行，干脆跪在地里割，而且人人手上先是磨出了血疱；继而破了，血流不止，疼得钻心，最后变成老茧子。背包谷、洋芋上公粮，挑大粪，令双肩出血、发肿、掉皮，疼痛难忍。但活路还得天天坚持干下去，没办法，我们喊出了“扁担压痛扁担医”的口号，也就是以毒攻毒吧。嘿，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灵，由于横下一条心，咬紧牙关拼命干，疼痛反而减轻了许多，甚至消失了。

有一次，我背了一大背洋芋，小心翼翼地从山上下来，刚走上水稻田坎，一不留神，左脚踩虚了，陷在水田里，怎么也拔不出来，努力挣扎了许久，一点效果也没有。幸好男知青曾纪云路过，才用力把我拉扯上来。对这个力大无比的曾纪云，我真是感激不尽……劳作确实艰苦极了，天天的日晒雨淋，背太阳过山，我们不但脸变黑了，皮肤变黑了，手杆上、肩膀上都脱了几层皮。

所幸的是，社员并没笑话我们，嫌弃我们，而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们，鼓励我们，当我们有了一点进步，就及时表扬我们，使我们越来越信心百倍。在社员们的热情关爱和耐心帮教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刻苦学习与锻炼，一年下来，我们基本上学会了要干的所有农活，样样都整得起放得下了。

鱼水情深

从我们下队到离开，彝族社员对我们都非常之好，他们常说：“你们离开家乡，离开爸爸妈妈，来到跳坝，跳坝就是你们的家，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诺苏（彝族）汉呷（汉族）一家亲嘛！”他们称我们“如如阿衣”（知识青年），给我们取彝族名字，什么木呷、木牛、呵呷、果子、阿母妞妞……我是自己取了“凉山雄鹰”，让他们翻译成彝话即“古火久什么”。

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阿咪子（女孩），全身一丝不挂，一片黄泥巴色，只见两个黑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心中不忍，便将自己的衣服剪短袖子、裤脚给她穿上。她高兴地连说：“卡沙沙，卡沙沙（谢谢）。”其他知青也都把自己多余的衣服送给彝族老乡。我们又给阿普、阿妈（爷爷、奶奶）洗衣服、被子，教阿衣（小孩）学文化、唱歌、说汉话。他们直夸我们“如阿礼心肝嘿几嘿，瓦几瓦（知识青年心肠好得很）”。他们也教我们说彝话，唱彝族歌，比如“妈妈的儿子嘿卡嘿卡哟，自由幸福嘿卡哟（妈妈的儿子多快乐，自由幸福多快乐）……”给我们讲古老的美丽传说，如火把节的来历等。送给我们布票，弄好吃的，比如嘟拿粑。劳动中，在地里挖到了野地瓜，总是先给我们吃；劳动的间歇中，请我们吃烧洋芋、炒包谷子。有时还扯一把黄豆，连秆一起烧完后，在灰烬中刨烧熟的黄豆给我们吃；有时

又采一些栽秧果(一种野果)、野李子、刺糖梨给我们吃;收核桃时,又让我们吃个够……这些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当时粮食不够吃、人人吃不饱的情况下,却是十分珍贵的。过火把节、彝族年更不用说了,家家户户都争相拉我们去做客,并把我们当贵宾,让我们坐上座,还要给垫上厚厚的擦尔瓦(一种羊毛织的披衫)。火塘里熊熊的大火噼啪作响,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面庞。坨坨肉、包谷酒、酸菜汤、嘟拿粑、老豆腐应有尽有;彝话、汉话、团结话、俏皮话,此起彼伏,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人人高举酒碗,频频互致祝词。在酒酣耳热中,在浓浓的民族风情的氛围中,在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什么想家呀,乡愁啦,都一股脑儿烟消云散,不知去向了。

当组长的悲哀

刚下乡时,不但领导器重我,知青也都羡慕我文化高,读过大学,当组长似乎是顺理成章;我也认为读书时当过团支书,教中学时当过班主任,当个知青组长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谁知不久就现了相。由于知青之间年龄差距大,文化程度悬殊,高的上过大学,低的初小都没读过,连家信都写不起,戏称"文盲知青";大家经历也各不相同,除少数刚离校不久外,大都在社会上混过几年,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最爱说吊二话,"出口成脏"。我当起组长来力不从心,无法胜任。几次向领导要求辞职都未获准,还反被别有用心的童某某造谣我诬告曾某某要夺我的组长权。于是曾某某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给我找别扭。还有一次,我一句无心的玩笑话竟激得张某某火冒三丈,大骂了我的祖宗三代,气得我夜里捂在被盖中大哭一场。

刚到农村时,由于与社员语言不通,知青们又不理解,我们队离城又远,干部们少有下来,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孤家寡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在农科所实行亦工亦农时,我好心在分饭时给同桌的知青多分些,自己少分点,被说成是虚伪、假惺惺;我做活路时拼命大干,被说成是假积极、好表现;我不参与说想家、说吃穿,被说成是清高、脱离群众……总之,在知青们眼中,我一无是处。我无话可说,也懒得辩解,于是成了说话没人听、做事无人帮的"光杆司令"。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矛盾一下爆发了,我成了众矢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我袭来,什么"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啦,"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啦……有些平时说过的话,我都忘记了,却成了知青们手中上纲上线的钢鞭材料。有一次,开知青会,会议室先到了一些人,我随便在一条空长椅上坐下来。知青们陆续来齐了,其他的长椅子都挤满了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一条长椅子上,而且大家还指指点点,挤眉弄眼地嘲笑我。我真想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躲起来。开完会,别人都走了,我却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当时,我尊敬的领导成了走资派,我自己则成了御用工具、黑爪牙、知青中的走

资派，被彻底孤立。我不敢与任何人说一句话，怕被揪斗，在极度的恐惧、孤独中度日如年。于是，我感到信仰倒塌，理想破灭，整个精神彻底崩溃了。最后，精神病复发，而且由抑郁症变成了分裂症，只好赴重庆治病，住进精神病医院。后来，医院也成了武斗的后方医院，而且两派对立，为了安全，又不得不回家定期到临时的医疗点门诊治疗。这时的我整天唱《国际歌》、"语录歌"，而且泪流满面。有时半夜三更睡不着就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弄得四邻不安。我产生了幻觉，总觉得有人要迫害我，不如自己死了干净。为了达此目的，我甚至到大街上去打解放军，喊反动口号，心想这样就成了反革命了，就可以被枪毙了，死了就一了百了，因为活着太累了，太痛苦了……多亏亲人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经过三年漫长的岁月，病情才得以缓解，返回了凉山昭觉。

青春无愧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少男少女们，早已为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甚至当了爷爷奶奶。年轮刻上了我们的额头，青丝变成了白发，除大多数退休回了成都外，我等十多个人像一粒粒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永远锁定在大凉山了。

对此，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早已把凉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和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与淳朴的彝族同胞结下了不解之缘。唐素清、周淑芬、阮尚瑶三位漂亮的女知青还分别嫁给了三个英俊的彝族小伙子。我们已经与凉山融为一体了，我们甘愿把骨灰撒在大凉山上，永远安息在她温暖的怀抱之中。我们能够为大凉山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令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们每个亲历者而言，它不仅是刻骨铭心的，更是生命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上山下乡虽然让我们失去了许多机会，备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历经人世沧桑、坎坷风雨，流过伤心的泪，却也有过开怀的笑，得到过丰硕的收获，如甘甜的劳动果实，纯真的友谊，甜蜜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奋斗。在凉山一日千里的进程中，有我们矫健的脚步声；在凉山的巨变中，融进了我们的青春、智慧、心血、汗水。我们见证了凉山的历史，我们践行了当初的誓言，我们的青春在奋斗中闪光，我们的生命在成长中绽放异彩。我们尽力了，我们有作为，大凉山可为我们作证！

作者简介

徐孝清，女，1963 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肄业（因病休学），曾任成都青羊宫民办中学教师、街道少先队辅导员。1964 年 4 月 8 日到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南坪人民公社跳坝大队插队。1971 年 4 月招工到昭觉县水泥厂。

故乡的云

周国威

一位朋友的来信让我又拾起了尘封多年的纸墨。朋友向我约稿，说是当年的老知青们正在集体撰写回忆录。

"回忆录" 这几个字有些刺痛我。以前的知青朋友大多已返回重庆，一些人事业有成，再不济的也是个城里人，他们写回忆录，那真是在回忆恍若隔世的过去岁月。而我却至今仍滞留在"老少边穷"的南江正直乡，仍然天天面对着别人阔别了几十年的"现实"，"回忆"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事实上，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江老农民，伴着土生土长的山里老婆，带着土生土长的乡下儿孙，这里的人们也似乎早已忘记了我身上那已经很久远的"知青"的称谓。

然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并未磨灭。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艰辛的生存，那些坠落的理想，那些一度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那些对故乡重庆的深深思念，便都伴着文字如飞流喷涌而出！ 44 年蹉跎岁月，那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都是真的啊！

费翔《故乡的云》那一唱三叹的旋律，就是我的那份失落与伤感。

一着棋误

我不堪回首的一生，是从下乡那一天拉开序幕的，从下乡那一天起，我就"死"了！

1963 年，我高考落榜，郁郁寡欢地回到天府煤矿家中。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已高考会名落孙山，自我在天府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发蒙始，我的学业就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我又顺利考上了全省重点中学之一的巴蜀中学，这可是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圈定的西南地区高干子弟中学校，落榜没理由啊！

家庭的文化氛围也助长着我的求学精神。我家祖籍湖北汉口，世代书香，礼教甚重，家训极严，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立命安身信条。父亲博览群书，古文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魏碑。且多才多艺，年轻时常票京戏，曾和梅兰芳等名角一起出入梨园。我们兄弟五人皆深受父亲影响，喜爱文学、艺术，一部《古文观止》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自信高考分数不会在录取线下。

后来我才弄清楚，当年我落榜是由于父亲的原因。父亲虽然从 1938 年起就成了天府煤矿的一名“红色”工人，但不幸他有历史问题，我们家仍然成分不好，我便成了父亲历史问题的替罪羊。

本来我准备复习一年再考，退休在家的父亲也支持我，还陪我一起读古文。但是事不从人愿，贯彻阶级路线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宣传者们一日紧似一日地加强了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攻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只是所谓动员实在有些像哄骗，他们夸张地鼓吹红色南江是“金铺路，玉砌街，手捉野鸡棒打鱼”等等，同时又以下户口、扣口粮等方式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深深领教了什么叫“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64 年 6 月，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上山下乡大潮终于把我这个“待业青年”卷下了乡。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下乡便是一生！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人生如同下棋，一步走误，满盘皆输；人生犹似演戏，一句唱错，全场都砸。此生大势已去，我是棋也没下好，戏也没演好啊！有时独处时我也会想，当年要是考上了大学，抑或落榜后没有下乡，我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然而我又想，当年硬撑着不下乡行吗？——我不知道。

经历“劳力”到“劳心”的磨炼

1964 年 6 月 26 日清晨，我们一行下乡知青乘坐几辆大卡车，离别了天府煤矿，离别了美丽的山城重庆，离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上艰难跋涉了七天，我们于 7 月 1 日下午抵达了南江正直镇。

我被分到正直公社正直社办林场，还被当地政府指派的场长、场指导员委任了一个副场长兼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大巴山深处的“通南巴”是历史上有名的川北苦寒之地，从此我彻底告别了莘莘学子的生活，在这广阔天地里开始经历刻骨铭心的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

林场建在大垭深处，荒渺几百亩，劳作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我们白天在密林里开荒地，割松脂，抬头望不见天；夜晚住宿在古祠里，黑暗中不时传来令人惊悚的野兽悲嚎。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割松脂。操作时，用一种特制的松鹤形的割刀在大松树两米来高

处割一个“丫”字形的口子，松油便顺着受伤的口子流到挂在树干上的竹筒里。在割松脂的日子，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赶到离驻地一里多的大松林里去，上百棵大松树必须在前半上午割完，若等到太阳升高，松油就流不动了。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危险的劳动，因为多数树都长在悬崖边，割松脂时得一手抱住树干，另一只手拿着刀操作，两只脚则一脚踮在岩边，一脚悬空吊起，因此不敢十分用力，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悬崖粉身碎骨。大约十来天收一次松脂，收下的松脂装在木桶里，挑到街上木材站去卖。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我体力大长，一担百十来斤的松脂，可以一口气不歇从驻地挑到木材站。

林场里养了蚕，也就有了采桑的劳动。采桑叶得到林场外的生产队去，采下的桑叶用背篼装上背回来，路途远，劳动量很大，这都是我们几个大点的男生义不容辞的任务。有一次，场指导员带领我们背桑叶回场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本来就沉重的背篼进了水，越背越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半路上，我真想把背上的背篼扔掉，然后躺倒在雨地里歇一歇，但是我又想到我是林场的副场长，而且知道这是林场知青赖以维持生计的东西，也就只好咬咬牙挺下来。雨越下越大，大家脚底下像泼了油，艰难地跋涉着，谁都不说话。后来天黑尽了，行走更加困难，我们就靠着天上闪电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挪动。直到深夜我们才勉强拖回场里，我感到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当年在林场里，像这样超负荷的劳动简直数不胜数。

生活也非常苦。到林场头一年，当地政府拨给我们每人每月 40 斤大米，8 元钱生活费，还算过得去。但第二年就分文没有了，吃穿全得靠自食其力。

即便是第一年，由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竟然也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当时，我们的生活费由林场会计统一掌管，会计一次将我们半年的生活费领回来，部分钱交给公社粮站，我们再按月到公社粮站去背米。

这年冬天特别冷，田里的水结了冰，山泉水结了冰，崖边悬挂着水桶粗的冰挂。冰天雪地中恰恰场里的粮食也吃完了，我就跟大家商量下山去背米。我们十来个人每人背一个背篼，带一条口袋，踩着山间小路上的冰凌，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走去。

来到山下的河边，大家都傻眼了，往日的渡船全不见了踪影，而这时河风刺骨，赶路汗湿了的内衣比冰还凉。我们又冷又饿，都不约而同地向着空空的河面喊起来：“过河！……”喊了好久，我们差不多已绝望了，没想到凄厉的喊声终于惊动了对岸公社的干部，他们叫来船家把我们摆渡过了河。

我们匆忙赶到了粮站，谁知粮站不给我们发粮，说我们林场没有交钱给粮站。后来才知道，那年冬季征兵，林场会计当兵去了，走时把我们的全部生活费也卷走了。

我们怏怏地回到林场，向附近的农家四处央求，借来些谷子。农家大嫂教我们把谷子擂出来，放在碾盘上碾，再一点点用碓窝杵，用小簸箕扬去糠壳，最后筛出了白生生的

米。吃着来之弥艰的糙米饭，我不禁身有感触地脱口而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肉和油就更少见了。每月二两菜油、半斤肉，吃一回肉就叫"打牙祭"（也就是"祭牙齿"）。由于每月肉、油太少，劳动量又太大，人人捞肠刮肚，这月刚打了"牙祭"，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下个月的"牙祭"。为了能多吃点肉，有时我们就带上绳索和节省下来的米饭，到沤河沟去下套打野兽。

知青的文化生活尤其贫乏。在南江这个"老少边穷"地方，除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队伍经过这里曾经住过的山洞、残留的宣传标语，几乎再没有什么文化踪迹。只有放露天电影时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但凡听说镇上到了放电影的，那可是欢呼雀跃，全林场的知青们不等吃晚饭，便急匆匆地上了街。菩船、花桥、朱公几个公社的知青也来了，大家嘻嘻哈哈，跑上跑下，整条小街溢满我们的说话声、笑声，小镇突然间热闹起来。到了晚上，区卫生院门前的篮球场上拉起了电影幕布，区上和公社的干部们还专门给知青们放了好几排凳子。其实看电影只是一方面，更高兴的还是重庆老乡的见面，我们在一起亲热极了，就像亲兄妹，摆不完的家乡龙门阵，诉不尽的背井离乡悲苦情。看完电影，我们把镇上唯一的一个招待所让给其他林场的知青们住，我们场的知青都在公社堆放的棉籽堆里蜷缩一夜，但是大家心里都挺高兴。

19岁的我就这样忍受着殷殷的异乡思念，度过了几年难熬的林场生涯。但如果和后来的经历比，从1964年开始的两年林场生活，相对来说又算是比较平稳的日子。

1966年，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我们林场也成立了小小红卫兵，我还成为了林场和场周围大队的群众领袖。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我领导林场红卫兵狂热地进行斗地富和斗当权派的斗争。后来，又响应"砸烂社办场，杀回老家去"的"革命口号"，刮起了返城风暴。但是，这种革命行动的结果，是我和一些知青被公检法悄悄列进了"黑名单"。大串联开始后，我一段时间回到了父母暂住的成都新都县二哥那里，后来回到正直才知道，公检法准备逮捕的知青领袖、名人中就有我。公检法还准备枪毙一些人，幸好全县的留守知青红卫兵造反将逮人的黑材料抄出来了。天哪，我差一点在"文革"动乱中成了丛山老岭的冤魂野鬼！

刚下乡时，尽管我心中有一些怨尤，但仍有些自欺地用孟子的话勉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而，事实把幻想击得粉碎，我没有因此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在穷困、平庸中度过了一生。难道老天就是这样眷顾我的吗？

脱胎换骨变成真农民

“文革”砸烂了社办林场。两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我们这批老知青也开始插队落户，我又怀着新的幻想来到了牛头坝这个新的广阔天地。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我所经历的，才真正是我人生中的沧海桑田，我从一个林场知青准农民完全、彻底、干净地变成了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我是经过好多人的建议，权衡再三，才决定落户牛头坝的。这是朱峨山丛山中的一个坝子，方圆好几百亩，坐落在陡峭的燕子崖上。相传若干年前有张氏兄弟来到这里。哥先来，占了山顶上的大垭一带，修建了大张家祠堂，称先来户；弟后来，只能住在山腰，也建了小张家祠堂，称新来户。兄弟俩常因边界的田地归属问题不睦而械斗，历经数辈，至今两族仍心存芥蒂。

插队之后，我就住在小张家祠堂里。偌大的祠堂一处是粮仓，一间就是我的家。一床、一灶、一锅、一碗，从家里带来的一条被子和一箱子书，向队里特要的一张书桌，以及这些年来无时不在陪伴我孤独寂寞的二胡和长箫，这些就是我落户农村的全部家当。这祠堂里白日轻易不来人，到夜晚人儿伴着孤灯，耳听天籁俱寂，不时传来几声老鸹悲鸣，让人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

每天天不亮，队里催社员出早工的梆声就敲响了，人们得饿着肚子，做上两个小时才各自回家吃早饭。然后，除了吃晌午，就要一天做到黑，这叫两头不见亮，背太阳下山。落日放工，回家煮饭。等吃过晚饭，收拾完家务，睡觉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晨梆声一响，周而复始的贫乏日子便又开始了。

挖地、下种、锄草、挑粪、背牛屎……样样都得来。除了做集体的活，还得挤时间务队里分给我的那八分自留地，种点葱蒜小菜或南瓜什么的，以解决佐饭之需。一时吃不了的还可以做成咸菜，放在不同的坛子里以备青黄时节作菜。

春去秋来，手上的血泡磨成了死茧，肩背的皮肤晒成了棕黑，那件做工穿的破衣服因长年不洗也汗得酸臭。但我的工分也从每天七分加到了十分。一个劳动日的满分也就是十分，这可是达到了农村一个主要男劳力一天的工值！

虽然我成了全劳力，但也不值什么，一个劳动日就值两角钱，照这样计算，一年里一天都不耽误，我也仅能挣得七十多元钱。但是无奈地想想，自己也总算是自食其力了。这年年终，我扣除了分口粮的工分，还分得现金二十多元钱。捧着这一年的血汗钱，心里也得到一丝苦涩的安慰，两眼含着辛酸的泪笑了。

牛头坝的光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日出荷锄，昏晚憩肩，学会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打石头、做木活；还修过电站，建过堤坝。再后来，我娶了个地地道道的南江村姑，生

了几个儿女，那就真正脱胎换骨变成了南江农民。不要说当地人渐渐把我纳入了土著，就是我自己有时也忘记了曾经的知青身份。

我开始过起了真正庄户人家的日子。在屋外靠墙处，我用小树和麦草盖了一个很大的柴棚，用以堆放柴火和杂物。当里面堆满了柴的时候，我就安心了，因为一家人这一个冬天不用愁了。

我的屋边还建有鸡窝狗窝猪圈，因为庄户人家毫无例外都要喂养鸡、狗、猪。赶场的日子，"我家里的"（当地男人在人前对自己老婆的称谓）上镇子里挑挑选选买回来几只小鸡娃，又上别人家抱回来一只小狗，于是田间地头撒落的粮食、菜籽，放酸了的剩饭剩菜，便都由鸡狗们来收拾了。每天放工回家，鸡"咯咯"地叫，小狗欢跳着跑来围着人打转，用湿润的舌头亲热地舔人的手，小日子便也平添了一些乐趣。是鸡呀狗呀的陪伴我们一家打发了许多难挨的乡村生活。

我们家每年都要喂一两头肥猪和一头母猪。喂猪很不容易，每日三餐比人吃还要得紧，有时放工回家，顾不得给人煮饭，先得给猪们操办。猪食量大，每天晚上宰猪草都要弄到半夜。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也指望着猪。庄稼肥料靠着猪粪，吃肉也得靠猪。母猪就更重要了，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小猪崽，每窝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一二个。喂上两月，得有二十来斤一个就可以拿去卖。按每斤猪崽一块钱，一年也可收入四五百块，一家人零用不愁了，我的酒钱也有了，还可以给孩子们添几件过年的新衣服。

庄户人家过日子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但什么东西都离不了，瓶瓶碗碗坛坛罐罐，柜子缸子，磨子碓窝（杵臼）……哪一样都少不了。记得我们老大（大儿子）生后一个月就没奶吃，我不得不每隔三两天就用撮瓢端上几碗米到别人家的手磨上去把米磨成粉，给儿子煮米糊羹。老大就吃这长到一岁。后来，为了用磨子方便，我就为自家打了一副手磨。家里好多的小家具小农具，像小箱柜呀、戗水缸呀，一样样都是我自己做的。到后来，石木二工匠我都练成半拉子了；再后来，我干脆就去帮别人做小家什挣点钱了。

这十年，我是脏臭重累的活计干过，粗粮野菜吃过，酸甜苦辣尝过，一手老茧，一身臭汗，增加了苦难的承受力，但是往日的理想和抱负却慢慢沉溺了。我感到自己饱尝苦涩艰辛，遍历人间炎凉冷暖，没有了光明和欢乐。那些年，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只有默默沉浸在自己最喜爱唱的《草原之夜》、《三套车》、《森吉德玛》这些歌里。

"为了你我受尽了草原的风霜，望穿了双眼，再也不能相见哪，森吉德玛！……"这些歌声，还有一把二胡、一支箫，就这样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山乡难眠之夜……

灵肉分离的爱恋

由于家庭出身在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也由于 1967 年初看到的那张黑名单的影响，

再加上初到牛头坝的失落，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万念俱灰。上坡劳动的时候，身体的疲惫使我心灵麻木；到了晚上，我更加感到可怕的孤单。我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一人形影相吊，下意识地渴求人间最基本的温暖。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生产队的老乡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这天，我一个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挖自留地，一伸腰，不经意间看到了隔壁张大婶家人团聚的场景：张大婶正在纳鞋底，她家几个娃也在院子里大婶身边歇着，融融亲情叫人神往。一阵阵思乡思亲之情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

忽然，一双慈爱的手将一杯水、一小块冰糖（当年少有的稀奇食品）递到我面前，眼前是张大婶慈祥的笑脸。泪水顿时充满我的双眼，眼帘外分明是我年迈的妈妈，我不禁动情地喊了一声“妈妈”！思念亲人的泪水再也按捺不住往外涌。

谁知就是这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叫，锁定了我后半生“南江老农”的命运。大婶可怜我，一定要他家二姑娘一辈子帮扶我过日子。大叔却认为不合适，为此，老两口还闹翻了。但从那以后，她家老二和队里几个大女孩就经常出入、滞留在我住的祠堂里。撤场插队的第二年10月，无亲无靠的我终于带着心如死灰的想法成家了，成了南江的上门女婿！

一年后，正值20周年国庆，我们补一下旅行结婚，回到重庆老家。妈妈看着我们，眼睛里透着无限的心酸和无奈。说实话，我心里何尝不梗塞？从根本上看，我的婚姻是可怕的孤单与极端的无奈的产物，谈不上两情相悦，而像一句歌词唱的：“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但是在家的日子里，我妈仍无处不在地疼爱着这个从农村来家小住的三儿媳。妈常常带着儿媳一块儿从八楼下到街上去玩，买很多的零食给她吃。时至今日，“我家里的”年事已高，却仍然喜欢吃零食，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吧？

与妻子文化上的差异、精神上的差异、家庭教养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小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相互难以体谅的窘境，并不幸福，我们的婚姻仿佛只是以一种非人世的概念在延续。这种难以言状的郁闷导致我常常跟一个相似命运的知青在一起宣泄。我俩都会一点乐器，就常借演奏以忘掉心中的愁烦。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把各自的苦闷斟满酒杯——那虽是自己酿下的苦酒，却也是苍天不公啊！

家庭悲剧矛盾的激化还在于我心中的那朵难以淡忘的玫瑰。我们是在镇上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相识的。当时，为了表示对动员的抵触，每去应会我都带一本书去看。一天，我正埋头书中，感觉一股深情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我，一抬头，我便被那双秀目的电流击中了。会后，我将一张字条悄悄递给她，于是我们便开始每天相约在黄昏矿区的绿阴道上……卿卿我我，甜得如痴如醉，那是少男少女初尝爱情的滋味！

过了十多天，她忽然告诉我，她被招工到云南思茅一个工厂，月工资45元。事出突

然，我怔住了，她却突然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了我，好久好久……她走了。但仅过去了七八天，我就收到了她从云南寄来的一笔10元汇款单，并附言说以后每月都要寄钱给我。然而就是这张汇款单，却让我受到了一贯家教森严的父亲好一番严厉的训斥，父亲还亲自去邮局退走了这张汇款单，夭折了我们稚嫩的初恋！后来，她仍然继续给我写信发誓要等我；再后来，我上山下乡了……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渺茫，我只能刻骨铭心地默默记住她的名字——那个故乡的青春漂亮的姑娘。婚前婚后的日子里，我都常常独自一人在野外吹箫，唱《秋水伊人》——忍不住想她啊！

在牛头坝的20年里，记忆本也可以随逝水东去而日渐淡漠，然而命运却再一次戏剧性地嘲弄了我。我心中的那朵玫瑰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下落，竟然给我来了封信——原来，我下乡的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找我！遗憾的是，"我家里的"拿到了这封信，她把信拆开看了，并且把信撕毁了。也许，我这位山里老婆的头脑里并没有"拆人信件不道德"的概念，但对我而言，这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悲伤和愤怒的泪浸满心田，我感到不可遏制的不满和彻心摘肝的痛！这人怎么这样？最起码你该把信还我！是爱情自私的占有欲？是嫉妒？还是对我隐私的迁怒？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草率结合的她，就是这样一个自己曾红杏出墙的她，竟然敢于如此蔑视我完全纯真的情感！我感到做人最基本的尊严遭到了蹂躏！从此，我们的不睦日渐加深。

为了压抑心中的痛，我拼命地干活，再重再累再脏也不管不顾，一身一年四季出坡做工穿的衣服不换不洗，老远汗气逼人，完全是一副舍生亡命、自甘堕落的模样。回到家里，一盅子老白干，一捧南瓜米，喝完又走人。若是"我家里的"贪玩好耍带着娃儿串院子、回娘屋里不着家的话，冷锅冷灶就更令我怄气了，我赌气一扭头，不吃也罢，坡上地里还找得到许多快乐！

记得有一回春季里收水栽秧，我们都半蹲在秧田里，栽了一上午秧，趴得腰都快断了。别人回家吃过中饭都要歇一歇，我到家闷头喝了一大盅子寡酒，又顶着太阳摇摇晃晃蹿进了秧田。一头牯牛正在田边歇气吃草，我醉醺醺地竟然嫌它挡路，跟它干起架来。幸亏别人发现，把昏昏沉沉、满身泥水的我拉上田坎，这才避免了一场危险。

有位哲人说，失去也是一种幸福。我想，这种"幸福"或许蕴含的是一种记忆与想象的空白美吧！几十年已转瞬过去，那些青春的记忆已经那么遥远，远得模糊不可及，但我苍老的心却依然无法完全平静下来。我曾经陷入的"幸福爱情"虽只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恋，然而那一封我没有收到却永远渴望探寻、心中难舍难弃难以释怀的信，和她的名字一样，都深深埋进了我的心底，它们将伴随我一直在艰难的人生旅程上走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春风不度牛头关

我曾经有过几次返回故乡重庆的机会，但我都没抓住。回想“文革”后招工回城的事，我时而懊悔时而怨恨。春风吹来了，可是我的春天在哪里？但有时我又想，那几步棋似乎都是我自己走错了的，怨谁？于是我便自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牛头”关！

早在1972年年初，我父亲退休前所在的天府煤矿就给我寄来了特招函——回供应科顶班就职。那时我已经在牛头坝插队落户，结了婚，有了两男一女，别说自己舍不得，就是岳父母也不愿意。记得有一年天干，地里欠收，口粮不够吃，我一家拖娃带崽五口人，苕叶、胡豆叶成了餐桌上的美食，还去挖过山上的蕨根和白色的观音土来充饥。后来还是我家乡的父母兄妹得知灾情后，纷纷解囊寄钱寄粮票，才帮助我一家度过了那个灾荒年景。要是我现在拍拍屁股回了城，孩子们怎么办？孩子可是我心中的神！我自认为从下乡那一天起自己就“死”了，而孩子延续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灵魂从此有了寄寓的载体而得以传承。孩子是我的一次生命涅槃，佛让我借孩子超脱了生死！还有“我家里的”，虽说我俩感情不怎么好，但她是孩子他妈，要说我完全不担心她，那是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左思右想，我还是放弃了那一次回城的天赐良机。

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似乎展开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所谓“政审”也放宽了，多少埋没数年的才子均一展身手，进入了高等学府，后来成了华夏的泰山梁木。然而机会同样不属于我，当年被不公平洗牌洗掉的我这个高考落榜生是高六三届的毕业生，而新高考政策却只能惠及六六届以后的学子，差着几届哪！

1979年，我再一次放弃了回城的机会。那一年，南江来了好几拨重庆的招工单位。我这次倒是下了决心要走的，可没想到招工单位对应招的知青作了一些规定：一、单身；二、夫妻都是知青；三、和本地人结婚的，必须离婚，并且不能带小孩回城。这让我十分为难。而且凑巧的是，“我家里的”又快要临产了，前面的二男一女都还令人愁，这个尚未面世的孩子又托付给谁？“我家里的”也出来阻挠，弄神弄鬼地说什么做了个梦，兆头不好，有灾，怕我一去不回。这回岳父母两老倒是支持我回城，说是让我了心愿。我认真权衡了各方面的情况，家庭的生存终究还是心头的大障碍，于是又放弃了这次回城机会。虽然后来我后悔死了，但那机会却是无可挽回了。

人未走，心却发慌，眼见得跟前的知青一个个先后都回了重庆，我只能留下无奈的诗句：“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回重庆终究成了春梦一场，但我还是很想改变务农的命运。1976年春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同情我的村支书陪着镇中心小学的吴校长来到我家，邀请我去任教。虽说

就是一个村小教员，可那也是说情送礼挤破了头的位置，走投无路的我焉能不动心？于是急忙答应下来。从此，我好歹是脱离了捏锄头的工作。

当村小教员以后，我在那座小镇里似乎如鱼得水，比以前的境况似乎好了许多。然而无形中，总像有一个巨大的钳子在卡着我，夹着我，压抑我不得施展。我在人前总是不苟言笑，把情感潜藏得很深，暗地里则仍不服自己的命运，感叹自己犹如一块未凿的璞，不能成玉！我苦闷地觉得自己仿佛钻进了一个重重包裹的坚固的壳，却破不出那个壳。于是常常自欺地诠释人生：人生是什么？是皮格玛利翁效应——你把它当成什么，它就是什么！

剪不断的桑梓情

从少年时到南江至今，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重庆，尽管我在南江度过的岁月比在重庆要长得多，尽管我在这里已经有了儿孙，尽管我还放弃了几次回重庆的机会。

记得刚到正直林场时，领导要我这个副场长兼团支部书记协助消除知青中的想家情绪，但那时我自己都思家心切，夜夜以泪洗面，这项工作哪能做好？有一次，几个知青拖了一只肥肥的大黄狗回来，大家伙争先恐后地剐狗皮、烧水、剥白果，一时间热闹非凡。直忙到半夜时分，三个大脸盆盛满香气扑鼻的白果炖狗肉端上了大石桌，场长也提着一大瓶老白干来凑热闹，场面就更火暴了。可就在这时候，不知哪个女生说了一声："没得妈妈弄的味道好！"闹哄哄的场面霎时了无声息。场长说吃啊，几个女生却带头哭起来。我喝了几口酒，拉起了二胡《江河水》，也一边拉一边哭。不一会儿，祠堂里就哭声一片。附近的农民闻声过来，都静静地望着我们，还有几个大嫂陪着流泪。

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天天盼着家乡亲人的来信，家书抵万金哪！父亲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不论我写信与否，每隔几天就有父亲写来的带有母亲关注和思念的信。那一页页信笺，沉甸甸的，满载着父母拳拳深情，温暖着我那孤独、凄凉的心。每当我孤寂难耐、病痛无依时，就拿出厚厚的一叠家信来，贪得无厌地一封一封地读。父亲"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家训，至今仍是我生活的座右铭。

不堪的沉重劳作更是助长着我绵绵的恋乡、思亲之情。每当回忆凄苦一生，我觉得唯有童年最快乐。童年是和故乡连在一起的，只是数十年过去，故乡怕也早已物是人非。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要是回到家乡，恐怕不光是别人不认识我，只怕是我连家乡的路也不识了。

几十年前的天府矿区，离家两三里远便四处是山。早晨，顺着山上的小路爬上山顶，淡淡的红日刚跳出山凹，雾带缠腰，茫茫雾浪中，只看得到远处群山的山帽，十分壮观。矿区有几个好大好深的矿井，从山肚子里挖出很多煤来，然后有小火车拉到山外去。

山的那面有一个极大的溶洞，那是小时候我和伙伴常去玩的地方。洞里到处都散落着贝壳化石，有的嵌在洞壁上，要用尖尖的石头使劲敲才取得下来。在这里甚至能找到少见的虎皮斑纹贝壳。有时，我们还进到溶洞的深处，那里有一汪汪终年不干的积水。还有从地里长出的石笋，高出我们的头，一个人还环抱不了。洞顶倒吊钟乳石绵绵不断的滴水声，洞极深处传来的潺潺的阴河流水声，发出很有节奏的、美妙的天籁之音。我们常在洞里玩耍好久好久，忘了回家。

儿时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不光是能穿上我妈亲手裁缝的新衣服，以及得到家家都有的用大红纸包起的压岁钱，而且还能上街玩。每逢年前，妈妈和桂花园（我们的家）的邻居母亲们都要带着各自的小孩出门，我和二姐自然是要跟去的。孩子们背着小背篓跟在妈妈身后，清晨出发，翻过磨心坡，赶到离家20里远的黄桷树镇吃早晌午，然后再到黄桷树镇周边农家的橘林去买鲜红橘。

黄桷树镇坐落在嘉陵江边，江的那边就是北碚城。滔滔江河水经过镇前，向东汇入长江。江面上有渡江的轮船码头，有来往的小小木船和运煤的拖轮。站在江边的黄桷树下眺望，碧水蓝天、市区小镇、林园尽收眼底，美如画屏，令人忘情。

我们买的红橘都是在农家橘林亲自采摘的。红橘是北碚黄桷树镇的特产，红得剔透，小而甜，刚摘下来的红橘橘蒂上还带有一两片绿叶，爱煞人。夕阳西下时，人人的背篓都摘满了，这才回家。我们小小年纪背负着二十来斤红橘，一路上汗流浃背，但心中却充满了快乐。

……

往事不堪回首，故乡的一切都缥缈得像一团雾了，我也渐渐衰老了。有时夜深人静时，费翔那依恋中隐隐透着一丝哀怨的《故乡的云》会在我耳边响起，我也会伤感地轻轻吟唱：“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回故乡对于现代的许多人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无论他身处什么地方，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小小的“地球村”各处显得不再那么遥远，即便从南极到北极，也不过转瞬之间。然而我不能，大巴山距重庆虽仅咫尺之遥，但对我却是天凡之隔——我紧巴巴仅够维系基本生计的经济条件，我早已老去的年龄，我拖娃带崽的一大家人……我凭什么回重庆呢？——除非是我的骨灰！

目前我的身体状况是更恼火的事情。我患有很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不能久坐，即便写这篇东西也已是勉为其难，却还不得不承负家庭生计的天职——稻粱谋之精力尚且不足，又哪能有余隙不切实际地奢望回重庆呢？

于是，故乡之恋便只剩下逝去的记忆，我只有在记忆的天空里去追寻那一片故乡的云，在记忆的梦里去追寻我心中的那一朵玫瑰！……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仰望夜空，那一首《故乡的云》又在我耳边萦绕：“……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作者简介

周国威，1963年重庆巴蜀中学高中毕业。1964年6月到四川省南江县正直区正直公社社办林场。1968年5月插队，当年在农村安家。1976年到当地小学教书。现退休。住四川南江正直镇。

再顽强的生命，有时也难以承受无情的狂风暴雨。



卷三 凋零的花季

泣血的映山红

孟 华

这是2007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妻子上街采购了一大批年货回家，晚上儿子夫妇俩将带着我那乖巧的小孙女回家团年。

路过三峡广场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叫我："孟华哥！"我循声回头看去，叫我的人是一个老妇人。只见她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上挎着一个大塑料袋，活脱脱一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

我怀疑她认错了人，但她分明叫出了我的名字。她见我愣愣地看着她，脸上立刻现出凄楚的神情，低下头说："你真的认不出我了？我是李玉英……"李玉英？这名字好熟！我拼命在大脑里翻动着记忆，几秒钟就定格："啊，你是李玉英……"她欣喜地点点头，尽管眼角挂着泪珠。

可我印象中的李玉英绝不是这个样子。

四十多年前，我家和她家同住在沙坪坝一条老街上。我和她的大哥李志强是初中同班同学，1961年我升入高中后，她也来到这个学校读初一。那时的她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皮肤白皙，身材匀称，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脸上常带着微笑。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组织的新年文艺演出中，她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舞蹈中表演孔雀舞，曼妙的舞姿轰动全校，后来大家就叫她"孔雀公主"。她也很想将来能在这方面得到深造，走上正式的舞台。

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击碎了她的美丽愿望。

她不幸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归国华侨，"抗战"时从新加坡回国效力，出资开了一家小糖果厂，生产糖果糕点出售。如果是现在，他肯定会被列入民营企业家

的行列，没准儿还会被推荐当上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可惜那是国民党时代。解放后，她父亲因雇有十多名工人，被定为资本家，厂子也在1956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被公私合营了。从此以后，她家就每况愈下。她父亲仍在厂里上班，每月有四十几元工资（这工资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都没再加过）。她母亲在街道运输队拉板车送货，每月没有固定收入。靠这点工资要抚养李玉英兄妹六人是很艰难的。大哥李志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尽管成绩优异，仍放弃继续升学将来报考大学的机会，去读不收学费的重庆煤校。在严厉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1963年，他还没毕业就被赶出学校，发配到重庆松藻煤矿去当挖煤工。但和后来陆续下乡当知青的弟妹相比，他又无疑算最幸运的。1964年，李玉英初中毕业，因父亲是资本家，她自然不能继续升学。戴着"资本家"、"特嫌"、"里通外国"头衔的父母，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批斗，早已成惊弓之鸟。街道刚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就赶快替女儿报了名，根本没考虑女儿此去面临的凶险。李玉英于是同年9月上山下乡去了地处大巴山区的通江县社办林场落户。她是一个温柔孝顺的女孩子，理解父母的难处，到农村去好歹可以使家里少一个吃饭的人，让不堪重负的父母能松一口气。

我和弟弟在1964年高中和初中毕业时，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也双双失学。为让我留下照顾母亲，弟弟于当年9月去了巴中县社办林场落户。但街道上的干部并没因此放过我，仍天天上门纠缠动员，实在待不住，我也在1965年5月下乡到通江县社办林场。

临行前，李志强闻讯赶来为我送行，他嘱咐我有机会关照一下李玉英，说她性格柔弱，容易被人欺负。我满口答应。到通江县后，才知道我所在的林场离李玉英很远，况且大巴山区交通极其落后，我连见她一面都不可能，"关照"更无从说起，真是愧对朋友的叮嘱。

1966年5月，"文革"狂飙发难，不久就波及到大巴山。当年满怀豪情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理想和信念早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大家想的是怎样早日离开农村，回家和亲人团聚，于是喊出了"砸烂社办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也起来造反了。

1967年5月初，通江县各社办林场派代表到县城开会，协商如何统一行动，决定林场的去留命运。我当时是林场的团支部书记，受全场知青的委托出席了会议。会后，因造反派夺权，交通瘫痪，我们一行人决定结伴走回林场。我所在的林场距离县城近百里山路，要两头黑走整整一天，但还不算最远的。

清晨天未亮，我们在县城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毛浴河边。为了节省每人五分钱的摆渡费，有人提议游过去，大家欣然同意。于是各自把衣裤脱光，裹成一团顶在头上，先后跳入河中。

初夏时分，毛浴河水还冰凉激人。我的水性本来不错，可能因为走热了突然被河水

一激，再加上没吃午饭，游过大半便眼前慢慢发黑，四肢发软，身子往下沉。我情知不妙，挣扎着大声呼救。众人慌忙向我游来，七手八脚架着我赶快向岸边游去。好不容易脚踩到了沙滩，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已经躺在床上，有人说："好了，好了，他醒过来了！"我睁眼一看，众人围在床边，一个很面熟的女孩子正笑盈盈地望着我。

"孟华哥，你终于醒了，可把我们吓死了！"那女孩说。

我这才认出她是李玉英，三年未见面，她出落得更漂亮了。

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我，上岸后我就昏迷不醒，撑渡船的老汉说我是发了急痧，要赶快找医生看。但这里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到哪里找医生？大家商议后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林场落脚再说，于是众人轮流背着我到了李玉英所在的林场。玉英是林场的卫生员，略懂医术，她急忙用铜钱沾上菜油在我背上刮痧，又喂我吃了"十滴水"，我这才醒来。

这时大家饥肠辘辘，玉英他们赶快煮饭给大家吃。饭后，众人急着赶路，我本想跟着走，但玉英坚决阻拦，说我没有完全康复，还要好好休息。我也自觉头晕，决定第二天再走。

这天下午，玉英一直在床边陪我。在摆谈中，我知道这个林场的知青全是同校的高、初中毕业生，也几乎全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大家平时团结和睦，亲如兄妹。我听后也放了心。当时林场很多知青都趁乱回重庆了，我问她怎么没回去。她说在这里种粮种菜，好歹有饭吃，回去反而增添父母负担，再说回去有什么用？她这样体贴父母真让我感动。

第二天上午，我去向她告别。她和另三个女孩住一间屋。走进她的寝室，只见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张木板拼成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一码书，全是初中的数理化等课本。我问她："你现在还看这些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桌子当中一个玻璃瓶里插着一枝正开得繁茂的映山红，花儿红得耀眼，花瓣上还挂着水珠，显然受到主人精心呵护。

玉英知道我要走，说："你没来过这里，路不熟，我送送你。"我先推辞，后见她执意要送，只好同意。

我俩沿着山间小路向山顶爬去。在山腰一块平地上有一所村小，孩子们正在上课。玉英停住脚步，凝神望着，充满向往地对我说："我经常来这里……如果我能在这里当一名小学教师，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该多好啊！"难怪她一直在复习功课！依她的性格，我想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女教师，但这可能吗？她又问我："孟华哥，你说我们真的要在大巴山当一辈子农民吗？"我无法给她准确的回答，因为政府当初动员我们到山区安家落户，恐怕就没准备再让我们回城市，我们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只好安慰她："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大巴山有一万多知青，政府总得考虑我们的出路。"

走上山顶，这里少有人来，遍坡的映山红在朝阳的照射下一片火红。玉英说："我就不送你了。你看，翻过前面那两座大山就是你们林场了。孟华哥，你多保重！"说着她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张烙饼，叫我带上饿了吃。这姑娘真细心，我从心里感谢她，也祝福她。

我走了很远后回头望，在初升的朝阳映衬下，还见她站在映山红丛中向我挥手，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从那时起我没再见过她，后来回重庆见到她大哥李志强，才知道她远嫁到河南省去了。那时社办林场被解散，知青们分散插队落户，很多知青结婚真的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了。不少女知青千方百计想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只要男方有工作有工资，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不管对方是跛子瘸子，一嫁了之。至于婚姻幸不幸福，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今天在这里遇见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过得一定不妙。

我和妻子邀请她到家里去，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我家客厅里，我仔细问起她这40年来的经历，她沉默一会儿后竟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妻子示意让她哭，一个人受的痛苦太多，哭出来才好受些。

哭了好一阵，她才断断续续讲了这40年的经历。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历史，我今天如实把它记录下来，只为后人能客观地评论那个时代。

以下是她的讲述：

1969年初，林场要撤销了，知青们都在联系各自要去的生产队。一天晚上，同林场的男知青王旭悄悄找到我，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就跑了。

王旭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重庆某大学的教授，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王旭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可是初中毕业时也没考上高中。他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平时和女孩说话都要脸红，今天给我塞纸条不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我进屋在煤油灯下打开纸条，上写"玉英：要下队了，我俩交朋友吧，你同不同意？"纸条没有落名。

我第一次收到男孩子求爱的纸条，脸一下就红了。我知道王旭是很不错的男孩子，忠厚善良，家庭教育很好，就是书呆子气很重。

我拿不定主意，马上写信回家告诉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家里很快回信严厉制止我和王旭谈恋爱，说两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将来孩子怎么办？他们要我赶快回重庆，他们已经给我物色了对象。

第二天，我找到王旭，把父母的回信拿给他看，委婉地拒绝了他。王旭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把信还给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为此我后悔了

一生！

回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家里就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客人。他个子高大，看起来很富态，身穿一件蓝色中山服，说一口普通话，一看就是国家干部样。他带来了不少礼物，有腊肉、香肠、白糖等当时要凭票供应的紧俏物资。

妈妈喜笑颜开，热情地招呼他进屋坐。凭着少女特有的敏感，我知道这人肯定和我的婚姻有关。

来人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四川省财政厅宣传处处长，南下干部，老家在河南省沈丘县，此次来重庆是专为弟弟娶媳妇相亲。他的姨妹和我父亲同在糖果厂工作，就向他介绍了我，今天按照北方风俗特地上女方家送聘礼。

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步不慎，带来的将是人生悲剧。我不愿意就这样草率地把自己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我把母亲悄悄叫到屋外，告诉了我的想法。她又气又急地说："人家出身是贫农，他大哥是国家干部，条件那样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再说你快满 21 岁了，也该出嫁了。你下面还有四个弟妹要靠我和你爸抚养，你现在这么大了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只有嫁人这条路，你好好想想……"

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一角多钱，我一天最多挣七分工，也就是说劳动一天得不到一角钱。如何养活自己？我心里矛盾极了。

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讲他弟弟忠厚老实，个子和他差不多，家里条件很好，绝不会让我吃亏。他许诺我和他弟弟结婚后，一定设法给我安排工作。

他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能有个正式工作，每月发工资，这是当时每个知青心中最大的祈求。我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条件：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不满意要允许我回来。那人满口答应，拍着胸膛说先去看一个月，不习惯就回来。

第二天，那人带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临走时我身上没带一分钱。

我第一次出远门，稀里糊涂地跟着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转了一道车又一道车，几天后一个下午乘汽车来到河南省东南部的一个县城。那人说快到家了，当晚就宿在县城一家客栈里。那人说客栈只剩一间屋，屋里刚好有两张床。我当时并未在意，因为他一路上对我照顾都很周到，又是国家干部。

但是我错了。半夜时，困倦中熟睡的我突然感到有人在脱我的衣裤，惊惶中睁开眼，只见那人正扑在我的身上。我愤怒地叫道："你怎么能这样做？我马上就要和你弟弟结婚了！"他嬉皮笑脸地说："重庆姑娘太漂亮了，我一见你就被迷上了。那小子有艳福，今天你得先让我尝尝！"

我拼命挣扎着不让他得逞。那人恼羞成怒地说："你的命现在捏在我手里，

你还想不想要工作？”

我被他掐得头发昏，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那一夜，他把我强暴了！

而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目的地——河南省沈丘县张家村。这是豫东南的一个农村，“抗战”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掘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使这里成为黄泛区，到处都是沙质土地，不积水，庄稼收成低，吃的粮食主要是麦子和红苕，每人每年只分七八十斤麦子，其余就是红苕，还比不上通江。

到了张家，我首先见到了我要嫁的男人。他叫张旺财，在家排行老五，今年29岁，接我来的那人是他大哥。张旺财个子确实像他大哥一样魁梧，黑红的脸膛，头顶上包着毛巾，一副北方庄稼汉模样，后来才听说他没上过一天学，是文盲。他大哥读过几年书，淮海战役时是民兵队长，后来当上县委副书记。刘邓大军南下时，他随队来到四川，后分到财政厅工作，当上处长。

村里人听说张家小五子未过门的媳妇来了，都跑来瞧稀奇。围观的人群纷纷议论：“你瞧，四川的女子长得多俊啊！”“是啊，是啊，你看她那脸多嫩，掐得出水来……”“小五子真有福气！”

听着这些议论，屈辱的我坐在屋里又气又恼。

张家父母是两位善良的老人，他俩见我脸色不好，连忙将围观的人群劝走。

第二天，张旺财让我坐上马车去公社赶集。在公社办公室里，他逢人就敬香烟，嘴里不停说着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话。那些人都笑嘻嘻地望着我。不一会儿，张旺财就拿着一张纸又赶着马车和我回家。我问他拿的是什么，他递给我看，原来是结婚证书。我气愤地说办结婚证的人还没征得我的同意怎么就办了？他说别人都是这样办的（2006年我和他离婚，出示结婚证时，那上面仍没有我的签名）。

回到张家，我哭闹着要回重庆。张家的人七手八脚拉住我，不让我出门。我要见张家老大，这时他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身陷绝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苦无援，身无分文的我即使想回重庆也无可能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当天晚上，张家办了几桌酒席，我和张旺财就算正式结婚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贫穷，当地的姑娘大多嫁往外地，使这里男多女少，男人娶媳妇要送女方很大一笔聘礼，很多男人因此娶不上女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到南方贫困地区去骗女孩子甚至拐卖女孩子。几年后，一个四川省巫山县的女孩才16岁也被骗来这里。她长得非常清秀，常到我家玩。她想念父母多次闹着要回家，她男人把

她看管得很严，走哪儿都有人跟着，直到她怀孕七个月后才稍稍放松看管。有一天她悄悄找到我，哭着要回老家。我给了她200元钱作路费，让她跑了，至今她男人都不知道是我把她送走的。

第二年初我就为张家生了一个儿子。临产时，没钱上医院，就请农村的接生婆接生。她竟然将手伸进产道将胎儿硬拉出来，造成我的宫颈撕裂，流了大量的血，差点死去。孩子出来后，按照当地的习惯做法，用高粱秆皮割断脐带。

张家见我为他们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尽量让我吃好有充足的奶水喂孩子。

此后几年，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七年间就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还人工流产两次。张旺财和北方其他汉子一样，身体强壮，性欲亢奋。尽管白天庄稼活很累，可到了夜晚他在床上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没完没了地折磨我。我不堪忍受，偷偷跑到公社卫生所安节育环，可还是怀孕。后来医生检查后告诉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宫颈撕裂伤口恢复不好，宫颈口已变得嘴巴一样宽，根本安不稳，环是什么时候掉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几顿白面，其余时间就只能吃红苕。他们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磨成粉，吃的时候再加水调成面团，用手拍成饼或蒸或烙，就着缺盐少油的菜汤吞下肚完事，没有一颗大米吃。我真怀念老家的生活，那里有亲人，有白米饭，尽管也吃不饱。

但就是这样的苦日子老天爷也不让我平静度过。1999年底，我带四个孩子第一次回重庆探亲，张旺财和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勾搭上了，那女人竟然住进了我家。我探亲返回后很快就知道了这事，气得差一点儿发疯。我为他付出了一生，他竟然这样回报我。我绝望中想吞农药自杀，是孩子们哀哭着劝阻了我。我向张旺财提出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孩子们也苦苦哀求我，但我实在不愿意再延续这个噩梦。抗争几年后，张旺财终于让步了。

2006年5月，我孑然一身回到久别的重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身患重病，大哥和弟妹们都已各自安家，境况也不大如意。

我离开重庆时是一个青春少女，现在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且一身伤病，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

我租了一间屋安身，撑着有病的身体去找工作。我当过清洁工，做过保姆，给药房守过夜，每月靠几百元工资养活自己。我不好意思去见过去的同学，他们也没人能认出我，我只想默默无闻地打发掉人生剩下的日子。

空闲的时候，我爱独自一人坐在三峡广场的石凳上，打量从身边走过的一

对对欢乐的少男少女，从他们阳光般的笑脸上追忆我失去的青春年华。我真羡慕他们能自由恋爱，只要心心相印，而不会计较对方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们升学、就业可以自由选择，再也没有人去追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辈曾经做过什么了。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啊！不知他们意识到这种幸福没有……

听着玉英的讲述，我和妻子早已泪流满面。

高尔基曾说：人生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玉英因轻信别人而对婚姻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由此酿成了一生的悲剧。可这能全怪她吗？对别人而言，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而玉英做了一生的噩梦，她能醒吗？谁能回答她？

注：应文中女主人公要求，李玉英系化名。另鉴于隐私权方面的考虑，作者也用了笔名。

风垭林场四知妹

李忠公

一、不愿诉说的身世

我们邻水县风垭公社林场在达县地区的社办场中，恐怕要算规模最小的林场之一了。我们林场只有七个男知青、四个女知青。四个“知妹”下乡时都正值豆蔻年华，每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名字：韦素珍、向玲、洪忠萍、祝玉辉。她们的文化层次从初小、高小、初中直到高中。其中，韦素珍、向玲下乡时刚满 15 岁，洪忠萍才 16 岁，这三个小知妹年纪虽小，却都有着辛酸的童年。

个子瘦小的韦素珍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了高小就辍学在家，没有出路便报名下了乡。那时，她在我的眼里，还是一个未曾发育的小女孩儿，身体十分单薄，衣着十分简陋。

向玲比韦素珍高出一个帽帽，一双大黑眼睛忽闪忽闪，笑起来娃娃脸上挂着一对好看的小酒窝。几个“知妹”当中就数她的问题多，空闲时经常拿着一本书找我问这问那。她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死得早，继父是重庆惠工机床厂的工人。她家里住宿条件差，一家人（父母、她和弟妹）挤在狭小的两间小屋里，生活极其困难。看着渐渐长大的女儿，继父居然起了歹心，母亲不得不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女儿，生怕她受到一点伤害。为此，向玲小学刚毕业便毅然决然地去了农村，发誓一辈子再也不跨进这家门。

“知妹”洪忠萍父亲是地主，新中国成立时被镇压，母亲把才学会走路的女儿从农村拖带到了城市。为了生存，母亲嫁给了重庆市第十七中学（原东方中学和辅仁中学合并的学校）老师洪传权。不幸母亲病逝，好在继父一直很喜欢她。后来继父认识了一个小

学教师，成家后她们三个人的小家过着甜蜜的生活。洪老师是学美术的，当时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1957年，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收二十多名学生，一千多名考生中，十七中就考上了七个，我哥班考上四个，我家就考上三个（两个哥和五嫂），真是师高弟子强。然而灾难不期而至：1958年那年，洪老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抓去劳动改造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得以昭雪回到十七中学颐养天年），可怜的小忠萍又一次失去父爱。后妈与继父离了婚，搬出十七中学的教师宿舍，住回了她小学的宿舍。几年后，后妈又同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学生结了婚。忠萍眼看就要中学毕业了，那个新家狭窄的空间哪里还能容下她安身？新的家庭关系、比自己年长不了几岁的男性长辈使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产生反感和恐惧。于是她常常在同学家里借住，巴望着中学毕业后考上高中，可以去住校继续她的学业。可是，幸运之星没来叩响她人生的大门，严酷的阶级路线让她落榜了。她需要尽快有一个安身之处，然而重庆这么大的城市，却没有她安身的地方。到农村去——那里是广阔天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吃的，有住的——动员她上山下乡的人如是说，她便真下了乡。

二、这就是我们的家吗？

我们乘坐着解放牌大卡车从重庆被装运到邻水，从九龙区到风垭公社天天受到夹道欢迎，天天受到宴请，不谙世事的知哥知妹们几天来一直处在亢奋情绪中。场长来公社迎接我们，有贫下中农送我们进山，我们打着甩手上了路。走进了荒凉的深山沟，转过两道大弯弯，爬过一匹光梁梁，走过两根窄田坎，沿山涧小溪边山道而上，跨过一壁乱石崖，眼前突兀见一土屋。屋后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大山，屋前涓涓小溪水潺潺，溪上横躺着用松树棒棒捆成的只能一人经过的小桥。来公社接我们的场长笑道："林场到了。"我们众知青的心，从离开公社那一刻起，跟着自己的脚步，一步比一步沉重，一步比一步紧缩，一步比一步寒冷。大家屏住了呼吸，没有谁说一句话，此时此刻，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

两间土屋加旁边一抹水的矮房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扎根一辈子的林场吗？房边小坝子上东歪西倒立着几个农村青年，面无表情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们看。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杨长路的胖罗汉，坛子似的肥肚顶开了邋遢破衫。另一个是生着一双金鱼眼，穿着一条短到"连二杆"的刷把裤叫叶四的人。几个小知妹不停地问："这就是我们林场啊？""这哪个住得下恁多人？"这和想象中的林场完全是两码事，找不到一棵参天大树，看不到一片像样的松树林。我和她们一样，那一刻真是从头顶一直凉到了脚板心。

大家放下被盖卷和各自携带的东西，就赶忙"参观"我们共同的家了。

左边一间七柱房是男生寝室，门坎几乎平膝盖那么高，没开窗，无天花板。因为墙上只安了几根楼杆，没有楼板，仅有几片玻璃瓦透下几束日光照亮全屋。进门两边对排三

架小木床，最里边安放一架，正好安顿我们七个知哥。

中间同样大小的屋用木板隔为两小间，前宽后窄，前后各开一扇门；后间上面铺了木板做楼，边墙矮得只有大半人高，从前屋有木梯上下。

右边一抹水的侧屋就是厨房了，里面做了一个石面的泥灶，上面安放着一口海锅，锅边生有锈，底部那一块黑里泛着光。这是用来给我们煮饭和煮猪食用的。

最恼火的是没有看到一个可以遮风蔽雨的厕所。我们问场长，他说接着就和猪圈一起修。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男生还好，急了还可以找个僻静角落方便，知妹们呢？场长说：好办好办，临时挖个凼凼、搭个棚棚不就解决了么？克服克服嘛。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哭笑不得！几个小知妹哇哇地叫起来："早晓得是恁个样子该不来了！"

女生寝室被安排在后面那间小地屋。小知妹们的问题最多，向玲嘟着嘴说："这屋天上墙上到处都是洞洞眼眼的，地下又潮湿得流水，咋个睡嘛？"几个知妹都不愿打开铺盖卷。还是大姐姐祝玉辉安慰她们说："算了算了，来都来了，将将就就嘛，反正我们都带有蚊帐，那些缝缝叫场长派人糊一下就好了嘛！"四架小木床首尾相连安放到四墙边，祝玉辉只好睡靠隔墙那架床，向玲早准备好"抢"到了进门边那架床，就这样她们便安顿了下来。

知青们从城市真正来到荒山野岭，来到这两边是高山的"夹皮沟"，实实在在地摆在大家眼前的那幅生来还未见过的原始蒙昧景象，犹如当头一棒，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一样，不禁为前程担忧起来。只有我的几个小知妹，一阵想家哭闹之后，不久就笑逐颜开，让那"夹皮沟"里也溅出了清脆的欢声笑语。

三、偷窥风波

光阴慢慢地在山沟里消磨，无可奈何之中，知青们烦躁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场管会建立了，团支部也建立起来协助场长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公社安排我当副场长，祝玉辉担任团支部书记。

到林场没几个月，场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知青们都很气愤。

一天，我正在小溪边洗衣服，小知妹向玲从小晒坝朝我走过来，气冲冲的样子，"呃，给你说个事。"她嘟着嘴说。"又有啥事嘛！"她听出我有点不耐烦的口气，"好，不找你说，我们是小学生！"她赌气转身就想走，我连忙站起来，甩着滴水的手："哟，脾气还不小，过来过来！"

我平时都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又没有多少龙门阵可摆，今天的样子恐怕是有点正事。

"你是副场长，领导噻，不跟你说又跟哪个说嘛！"

"废话少说，啥事？"

“我们那个寝室，”她回头看了看，“一点都不方便，烦死了！”

“呃，有啥事直说嘛！绕弯子做啥子。”我有点不耐烦。

“着啥子急，衣服我给你洗都要得。听我说嘛，我们那个楼板，恁宽的缝缝，楼上的老场员啥子都看得到，换件衣服都要躲到帐子里。”她低眉回首，似乎难以启齿。

此时，我才掂量到事情的分量。一阵沉默，我把视线移开，抬望眼，屋后小松林上的山岩，竟变成了怪石嵯峨，心情不可名状。

“你给祝玉辉讲过没有？”我沉思着低声问道。

“她都住在里面，哪个不晓得！跟她讲也没得用。”她抬起头来，望着我，面露愠色：“昨天中午放了活路，我进屋正换衣服，刚把外衫脱了，无意间抬头一望，把我吓惨了！”口齿伶俐的她，话语急切愤然。

“那个楼板缝缝里头露出两个黑眼睛，鼓起把我瞪着，发出两道凶光！我差点叫起来了，赶忙钻进了帐子里头，心怦怦直跳。”

我心沉重起来，为先前冷漠的态度而歉疚，为同命的知妹们徒生悲悯。面临险恶的环境，男子汉可以胆壮无畏；对女孩子来说，尤其是太稚嫩的她们身处危惧之中而无法自卫，突如其来的恐惧对敏感的向玲来说，无法承受，她来找我，显然是在寻求帮助。从她那求助的凄切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道义。“看清楚没有，像哪个？”“肯定是叶四！那双鼓眼睛烧成灰我都认得到！流氓！”她愤愤然，“还有那个杨长路，他两个经常故意大声讲些下流话让我们听，气死人了！”

“这事你不要到处讲了，又没有证据，他死不认账，把他也没法。”我再三叮嘱她说，我会找祝玉辉，找场长商量，向公社反映，要她们自己多加小心。

我找祝玉辉谈及此事。

“对头，背时的叶四和杨长路说些话牛都踩不烂，是气人。场长还不是听到的，有啥办法嘛！”她不急不躁，不瘟不火，甚至不会发脾气。但她能分清是非，天性善良。眼睛近视的她的确没看见，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她们头上那些粗俗原始的野性的欲火。

“哪个不把墙用报纸糊一下嘛！”我用责怪的口吻说。“糊了的，还是昌广宪（会计、本地场员）专门糊的，时间长了就飞起来了，手一顶就掉下来了。那两个家伙硬是怪，他要偷看有啥法，看得到，摸不到，他又犯得到好大一个法嘛。”

“向玲也爱吵，杨长路说下流话，你莫搭白就算了。”她平静而漠然地说。

我对场长讲起此事，他无可奈何：“农村人是恁个爱讲怪话，不理他就算了。”

我把此事和男知青们说了，大家愤愤然：“龟儿子叶四是个烂杂菜，找时间修理他！”

陈昌吾说：“叶四那家伙坏，我亲眼看见他在屋背后山坡上脱了裤儿耍他那个鸡巴，还经常在女生面前说骚话，是该修理修理才行！”

杨、叶二人，本是农村的孤儿，是世上最可怜的孩子。他们房无一间，衣无二件；没有父母的照顾和疼爱，没有家庭的管束和教育，从小放任自流养成一身恶习。安置到林场来与知青为伍，真是苦了我们的知妹啊！

一天，我看见叶四，给他一点警告："叶四，过来！"他当着我们男生面装人样："啥子嘛。""你少在女生面前说怪话！你是不是在楼上偷看女生换衣服？""没有，没有，哪里是偷看嘛，恁大的缝缝哪个都看得到。"他嬉皮笑脸不以为然地说。"你少打坏主意，谨防我们男生捶你！""不敢，不敢，晓得你们知青受法律保护。"他竟装起乖来。这样一个瘪三，实在无法跟他讲道理。

我们还向公社管林场的陈书记反映了此事。有次陈书记来林场，知哥知妹们众口一词地给书记再次反映了女生寝室的事情。他认为是个问题，说等把女生寝室分开就好了。但他又说，眼前场里没有钱再修一间屋，只有过段时间再说。

于是，我们照旧在默然中打发沉闷的日子，而叶四和杨成路他们或偷鸡摸狗，或明目张胆地继续宣泄他们的欲火。

一天，我从老场员门前过，听到向玲在骂人："看，看啥子，回去看你屋妈！咒死你个龟孙子！看看看，看瞎你那双狗眼睛！"

一阵山风，把沙子吹进了我眼里，揉出了泪水。我真为知妹们担心，在这样原始愚昧落后的环境中，文明遭践踏，斯文被蹂躏，人哪还有尊严可言？

第二年的夏天，场长带领我们去偷砍了相邻九峰公社国有林的松树，在男生寝室旁修了一间五柱的土墙房，知妹们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这才结束了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

四、命运全靠自己掌握

1967年，"文革"期间，知青们造反满天飞，没找到出路的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回了林场。待在林场无事可干，无聊至极，我和余立两人便回城了。

小知妹韦素珍和向玲的故事是我的知哥们告诉我的。他们两个小知妹，从下乡后，便从来没再跨进过家门，即使在林场被砸烂之后，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可见她们处境的危艰。

老场员中那两个怪家伙——鼓眼叶四和大肚罗汉杨长路成天就打两个小知妹的主意，找不到地方出气的知青看出他们居心叵测，便故意寻衅把杨长路狠揍了一顿。

叶四蜷了脚，不敢对知妹伸脚动手。那个挺着罗汉肚的杨长路生性骄横，狂呼乱叫："老子是贫下中农，还怕你们这些狗崽子不成！""老子今天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和韦素珍结婚，关你几爷子屁事！"在那个年月，初小文化的韦素珍年幼无知，无依无靠，身体娇小瘦弱，哪是壮如大牯牛、心似饿虎狼的杨长路的对手。可恶的场长充好人，竟表示支持知青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后来，杨长路哄骗欺诈，威胁利诱，施用各种

手段,居然得手,跟韦素珍在林场同居起来,给每个知哥都洗过衣服的小知妹就这样如羔羊般落入了虎口。知青们真为她惋惜了一阵子,但是又爱莫能助。

看见杨长路得了手,一直打了向玲几年主意的叶四也猖狂起来,更加死皮赖脸地纠缠向玲。向玲总是严词拒绝叶四的挑逗,气极了就大骂他一阵:"你个龟孙子流氓、无赖,今天我就不怕你!"每次遭到向玲的臭骂时,叶四总装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儿。仗着他是贫农孤儿,色胆包天的叶四经常对向玲伸脚动手,向玲在林场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在林场附近的生产队"到处流浪",过着凄凉漂泊的日子,用她柔弱的身躯,以她坚强的个性和命运抗争。

没有了生活费,知青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五个知哥把林场仅有的一头膘肥体壮的大水牛偷偷地牵到后山去卖了,把林场房子的屋梁、椽子、门窗等木料也全部变卖,彻底把林场砸烂,各自回了城。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生活是无情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一群"狗崽子"。无家可归的向玲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贞操,她没有向命运低头。她嘴巴子甜,博得了不少农村好心人的同情。她东家住一天,西家歇一晚;吃过众家饭,睡过百家床,从风垭公社流浪到了相邻的星火公社。

后来经人介绍,她终于认识了一个叫李德华的人。李德华是地主子女,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在邻水县九龙区中学任数学教员。像他这样出身的人,尽管当了教师,由于成分不好,在当地很难找到对象。向玲见他有知识有文化,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便嫁给了比自己长八岁的他。

小知妹向玲爱学习,丈夫便成了她的恩师,他们生活得和和睦睦。

改革开放后,向玲到李德华任教的九龙中学当了图书管理员,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川大学毕业,一个职大毕业,都找到了自己满意的职业。

可怜的小知妹韦素珍和贫下中农杨长路离婚后只身回了城。一天,我在重庆的大街上偶然碰见她,谈起各自的经历和处境。她对我说:"好在还没得娃娃。"我想也是,对于这位当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小知妹,这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作者简介

请见《天路迷茫》后的作者简介。

历练痛苦

黄欧平



本文作者与父亲

我出生在一个三代教师之家①。我的祖父、外祖父、父母亲在解放前后都是教师，但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父亲在1957年又被错误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1978年正式彻底平反）。十年“文革”动乱中，他又先后两次被打成“黑帮分子”。这一切不利的政治因素，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我的学业，使我多次失学。1965年高考落榜后，我听毛主席的话，毅然决然地选择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年轻的我，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一条革命的道路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然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有一个右派的父亲这两道魔咒一直缠绕着我，让

---

① 《湘乡文史》教育专集2004年第14期里有介绍我们这个教师之家的文章。

我一生历经坎坷，饱受磨难。

一、艰难求学路

1957年，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他任教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一中错划为右派分子，正值高小毕业的我，因为这个原因就险遭失学。那一年也是解放后教育界的子弟受政治影响失学最多的一年。湘乡县教育工会竟然有“不识时务”者，为这些幼年失学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仅仅两个班的职工子弟中学，我也幸运地进去了。可是好景不长，子弟中学开办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再次面临失学的我，在当年秋季幸运地进了一所民办初中——城关初中学习。我们学校的老师教学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只因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亲人在解放后被“关、管、杀”，还有的则是因为个人历史有污点，或者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有致命的政治问题而离开了原来的重要工作岗位。他们因不能安排正式工作却要养家糊口，就一起创办了这所民中——师生后来戏称它为“饭铺”。我在“饭铺”里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学业，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三年初中顺利毕业，我当时报考的是县直第二中学，升学考试成绩是甲等，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班主任吴老师手里，他还让同学通知我去学校收取。然而，我的录取通知书却被录取学校收回去了，我再次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听说被无理收回去的还有七八个与我一样出身“黑五类”的同学。

1961年，湖南省农垦局某些领导脑子发热，在洞庭湖区一下子开办了五所半工半读农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那个暑假里，招生的老师满天飞。我得到消息后，到湘潭市通过简单的入学考试，现场就拿到了去湖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沅江茶盘洲分校学习的入学通知书。1961年秋天入学，我被分配在农作二班。第一学期，我得到了劳动模范和甲等学习成绩的奖状。可是在第二学期快结束时，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被迫离开了学校。当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学校要精兵简政，但是，我不幸听到了我们农场的张书记在食堂里作报告时的一段话。

那是一个月明星疏的晚上，班团支部书记贺某为我申请入团一事找我谈话，我们俩在食堂前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坐下来。谁知道身后的礼堂里正在召开（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人参加的）会议，听到声音，我俩都好奇地从窗户外看进去，只见农场的张书记正披着外衣半蹲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作报告，我们俩听到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对河的大蒋介石没有打过来前，我们要先强制管好大陆上各种各样的小蒋介石，学校里也不能留下他们……”这是自从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听到人家用“小蒋介石”称呼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记得当时我拉上团支书就跑，她一边跟着我跑一边说：“不要紧，不是说你们呢。”不久湖区发大水，我连行李也没有带就离开了学校，到家后不久，就接到了遣散通知书。

这是我第三次失学。

1962 年中考过后，我因找工作无望，参加了“饭铺”（当时民办学校是不能与正式学校同时招生）的升学考试后，再一次回到了课堂，进入它新开办的高一年级学习。在“饭铺”的特殊环境中，我竟然当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班上的学习委员，读书的热情再一次高涨。但“饭铺”并不具备高中教学的条件，不久，我放弃了它，插班到父亲所在的学校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八班。高三八班当年录取的是全县各所初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且绝大部分是出身贫苦农家的子弟，只有极少数几个城镇学生，也多是贫民阶层的孩子。班上的另一部分学生（约十人）则是上届的留级生，也多是出身没问题家庭的孩子。在这个班级里，高一快结束时，班主任竟让我替补当上了学习委员。1963 年学校宣布我父亲摘掉右派帽子，这两件事让我这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再次做起了大学梦。

1963 年中国农村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1964 年上学期开学时，学校统一撤换了所有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同时开始对学习成绩突出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并进行无形的重点监控，让我亲身体验到了政治的无情，我感到彷徨，也很伤心。

一天，一位姓池的女同学在排队去吃中饭的路上，悄悄地塞给我一张字条，纸已经揉皱，看来她是在找机会交给我。条子上写道：“小心你周围的人！不要随便向人交心。”虽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相信她的为人不会无事生非。后来的两件事，证明她的提醒是有根据的。

第一件事：一位贫民出身的女生李某正好和我睡相邻上铺，她受命与我拉关系，想诱导我说班上另一位侯姓团员（她是留级生，高二时通过石门的某上层关系从常德某女中转学来的。因匿名送过一件旧花棉袄给初一沙姓男生而被学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转学来不久她就以患急性肝炎为理由，长期住进校医务室，并且不参加班上的任何劳动。）的坏话。我平时就很少与侯同学接近，且又不喜搬弄是非，但经不起李同学几个晚上的唠叨，就回复了她一句话：“既然大家都说她是装病住医务室，何不告诉老师让她搬出来？”谁知道到周六，班主任孙老师（也是一位出身不好的政治老师，虽然他平时尽量让

① 1963 年 2 月 11 日—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3 年 9 月 6 日—2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提出 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摘自《中共党史大事记 · 1963 年》）

自己表现得很革命，但不久他就被学校派往社教工作队，离开了学校）就组织全班女生在女生寝室开会。开始是不点名地批评出身不好的学生对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打击侯同学的积极性，话越说越明朗，矛头显然对准了我。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逼向我，觉得很委屈，却没想到过要给自己辩白，更没有和盘端出那个李同学说的话。好在大多数女同学和我关系不错，那次短会也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一位姓廖的女同学说了几句为我开脱的话，事后被班主任在 15 分钟的写字课里公开辱骂为："又当巫婆又做鬼，两面出头当好人。"记得这 14 个字成了我们当天写（大）字的内容。课后她与班主任针锋相对地顶起来后，我才知道是因为我。

另一件事发生在高三年级二期。有天我到班主任宿舍去交作业，无意中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写满了字的纸条，字迹太熟悉了，这是自从学校开展学雷锋后，我和我的同桌（姓刘）共同帮助的一位姓伍的男同学写的。这位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1964 年他的父亲因肝癌去世，家里经济很困难，差点失学。他的姐姐曾专门找到我，代表她的母亲，当面感谢我两年来对她弟弟的帮助。可是，那张纸上他却保证从此再不和我来往，坚决跟我划清界限，把我两年来对他的帮助，说成是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子弟。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若不是后来中央改变了政策，决定不在高中学生中打右派，以我的政治条件当时就是个准右派了。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68 年秋天，我在园艺场接受批斗时，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杨某在发言中披露了这些事，此人的表妹就是那个想诱导我说别人坏话的李同学，他可能认为我自己应该知道，所以他说我"对（园艺场）组织隐瞒历史"。

1965 年高考后，我们这个年级将近八十名毕业生，也是石门县当年的全部高中毕业学生，被录取了近七十名，其中包括十个留级生中的政治条件好的几位，侯同学和那位李同学也进了师专。而我和另外几个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则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实际上，我们这类学生的命运早就由学校按当时的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在我的档案材料里学校意见一栏中写着"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而且还盖上了学校的大印。"文革"初期，一个参与抄学校毕业生档案的学生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父亲。1966 年高考前夕，我曾经去看望过我的高三班主任张老师（现还健在），他问我还想参加一次高考不，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想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双料地主（父母两家都是地主成分）出身，不考也罢。"班主任的无奈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让我想起了在农校里听到的"小蒋介石"这个判词。14 年来，就是这些人为的政治包袱让无辜的我在无望的求学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终点。

1965 年 9 月 10 日，我挑着小小的行李，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离开了学校，来到了位于荒顶山的石门县园艺示范场。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去，是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奋劳动来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阶级烙印，却不料走上了另一条更辛酸的人生路。

二、出身不由己　道路难选择

1965年9月9日上午，父亲陪我去了石门县知青安置办，一位姓李的办事员接待了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诚意和热情感动了他，他大笔一挥，把我分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县园艺场。园艺场离城最近，或者说就在城郊，一月还有14元的工资。我很乐意地签字接受了。当时发的证件，我怕丢失就放在父亲处保管，结果丢得更快。“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我父亲的宿舍，把我的《下乡光荣证》和一切他们认为的“四旧”一起横扫了。

我被分配在石门县园艺场第二工区第二知青组。虽然身体瘦弱但认真学习园艺技术，我的努力得到了老职工和知青们的认可。那年冬天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青通过了考核，参加了第一年的果树嫁接工作。年底被评为1965年度知青积极分子，与另外的六个男女知青一道参加了在1966年春节后举行的全县农业生产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到会的还有从石门各个知青点上来的知青积极分子。分组讨论会上，我听到了他们热烈的发言，记得有一个1963年下放到石门文化山区的常德女知青欧阳珊泰，她的事迹的确让我感动。她曾经长期护理生产队一位无人护理的“五保户”老人，这个老人烧伤后因无人照顾，烧伤面几乎全部溃烂，全身发出一股浓臭。这让我对“接受再教育”有了较明确的思路：人家不乐意去做的事，我应该去做，有了荣誉我不要去争，随时想到自己是一个政治上先天不足的人，这样才能自觉地接受再教育，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由于我的真诚与努力，1966年春天，园艺场党支部向进驻在我场的“四清”工作队推荐，由工作队长龚某通知我准备1966年秋天上湖南农学院系统地学习园艺技术。上大学本是我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然而随着“文革”爆发，我的美梦终成为泡影！此后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灾难、坎坷让我历练痛苦，不幸伴我终生……

1968年暑假，我的男友被学院分配到北方某部队农场接受军训，他即将北上，我请好假准备回省城送他并考虑婚事。晚上我去学校告诉父亲，发现再次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父亲正在作外出的准备。原来他因不服校方和造反学生随意主宰自己政治命运，准备再次上北京告状。

父亲曾有过一次进京告状的经历，那是“文革”运动初期，他被自己的学生、当年的红卫兵揪斗吊打致一夜白头后，倔强的他，愤而进京上访成功。历史走到了1968年秋天，天下大乱，京城里的许多大官们自身难保，一个接一个地下马入狱，父亲一个摘帽右派想

不当"黑帮分子"的要求，就显得过于幼稚了。我用二十多岁的我所能找出的一切理由，试图说服父亲不要再次冒险进京告状。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没法和谁讲道理啊！我认为父亲要想不再受皮肉之苦，要想不再让人找到借口给自己加重体罚，要想日后真正为自己留下一个说清楚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和"黑帮"们待在一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到最后，父亲勉强答应了我，于是我们分手了。

然而，固执的他，没有真正接受我的请求。他一意孤行的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浑身的鞭伤，造反派拿走了他的金表、三百多元现金和一百来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带来的则是一桩莫须有的政治冤案及三十多年坎坷的生活经历。这段遭遇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谁也不愿提起的话题。

就在我动身往津市的第二天，父亲没走常德，选择了水路也来到了小镇津市。由于发大水，我被阻隔了一天，他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的到来。在同行高中师姐的伯父帮助下，我和师姐第三天乘民船走了，父亲则被随后追来的红卫兵小将们抓了回去。

15 天后我送走男友，于 8 月 18 日下午按时回到了园艺场。8 月 19 日中午，我正在保管室里忙着与代替我管理食堂的女知青杨某移交账目，突然被通知集合开会。当我离开房间时，工区长老单不让我锁门，随即闯进来四五个场部的中年男女，他们开始在我的保管室里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我心坦然，头也没回地去了会议室。

这就是当年湖南轰动一时的"8 · 19 红色风暴"，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贯彻上面清理阶级队伍的精神而进行的全省统一行动。在搜查发生一天后，场部开"文革"成果展览，这时候我才看到他们从我的房子里抄走的几张发黄了的旧照片——父亲的大专毕业证书和某单位聘请他当农业技术员的聘书，旁边有几个赫然入目的大字：黑帮后代×××保存的反革命证件和反动照片，是想翻天的罪证！我的名字被打上了大叉叉。看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2006 年我回到离开三十多年的园艺场后才知道，当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搜查吊打批斗的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有刘××，罪名"私藏金器"；刘××，罪名"参加了武斗"、"脾气不好"；叶××，罪名"投毒"；苏××，罪名"书写反动日记"；吴××，罪名"作风不好"。知青蔡××不仅场里的住处被搜，他城里的家也多次被搜查，场里甚至派人到他母亲的学校搜。我的好朋友知青黄家珍也被无端怀疑为我收藏转移其他更重要的罪证在 8 月 20 日清晨遭搜查。

原来，那天父亲在津市镇被他的学生抓回去挨了吊打后，还想找机会再进京，于是把他认为重要的一些学历、资历证件及他读高中时参加抗日军训的旧照片全放进包里后送到了我那儿，交给正在食堂保管室代替我工作的杨某。8 月 18 日我回来后，一边出工，一边与杨某忙着交接账目，父亲的包就放在米桶上面，也没空去翻看。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对父亲送的东西又一无所知。按理，杨某政治条件好，工区领导也信任她，平时和我的关系又是最好的，她是完全可以帮我说清楚的。可是，那是场里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革命成果，他们突袭的首选对象就是我们这些"黑帮"子女，说得明白的事情也说不明白，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想让你说呢！ 19岁的杨某不仅没有帮我去解释，反而因为与我彻底划清了界限，积极参与批斗揭发，让她在政治上攒足了资本，1969年整党后，成了第一位入党的知青。

这样，我由一个昨天的优秀知青，一下子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从此，无休止的批斗会和盘查谈话搞了近半年时间，却从来没有人让我自己亲眼看看照片，确认一下罪证。

在第一次批判会上，造反派认定抗日军训照片上是革命志士在被吊打，聘书和毕业文凭上面有蒋介石的相片和中华民国国旗，是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铁证。我父亲是一文弱书生，近在咫尺的石门一中校园里，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那些老师中的造反派一年多来批斗我父亲也没有捏造过的罪名，园艺场的文盲就这么凭想象捏造成功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真是到了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

后来的日子里，我天天陪斗或挨斗。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想让我开口，决定保持沉默，在批斗会上什么也不回答。回来后就把前一次的空洞的检查书颠倒着段落抄，他们竟然谁也没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多半是文盲，而是因为他们谁也没兴趣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用手中抢到的权力，每天变着法子整人，以整人为职业。

好多年以后，有人问我，别的挨批的知青被吊打了，造反派为什么没伤我半根毫毛？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1967年武斗还在初始阶段，许多单位的造反派为了能让自己的组织更具权威性，都想法在单位上扯一面大旗为自己贴金——虽然他们也斗走资派，但走资派往日的威望还在，何况这个小小的农场？于是，就有人强迫老书记表态支持他们。有天傍晚老书记把我叫到山上，将自己的苦恼和难处毫无保留地说给我听，他希望我这个有文化的人能帮他"撕扯撕扯"他心中的乱麻。我告诉他，我探亲假期间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凡是两派斗得厉害的单位，多半是领导介入了派性斗争，这有点像家里被大人宠爱的孩子欺负别的同胞一样。我建议他不要明确表态支持谁，因为场里当时只有一个大派"红联"（别的反对派当时还没成立），而这个派里目前活跃的人，大多是平时爱出风头不喜实干的职工。如果这些人得了势，场里就别想搞生产了。书记接受了我的建议，与这些人周旋着一直到47军接管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47军派出人员到我们单位时，书记还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我，但军代表找我谈话时才了解到我的政治条件太差，没法挑大任。于是老书记顺利地进入了场革委会担任一把手，几个"红联"头头也如愿进入园艺场当时

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个原因是场里的“文革”成果展览会后，我和书记也有过一次谈话。我希望能看看那些照片，至于文凭和聘书我给他作了解释：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学历和资历是他工作的资本，这些除了写进档案，还得有实物证明，所以保存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是想翻天。书记虽然只有解放初期扫盲班的文化水平，却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应该是听懂了。但他只能叹气，他说目前这种“热火”（指刚刚开始的批斗）状况，他没法制止。他有难处我也明白，他已经五十多岁，那个书记位子造反派头头中就有几个人觊觎已久，他得小心行事，才能保得大局。也就是那一次，我向老书记提出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我被人‘武斗’了，我只找您要政策。”他倒也爽快，说他目前的权力就是能强调“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后来每次批斗我时，我看他总会坐在会场里。发生吊打其他知青是在下面的工区里进行的，那里天高皇帝远，就成了坏人施展淫威的地方。

半年后，场革委通知我，因为我表现好，可以不再接受批判恢复自由。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至于我挨批判的原因，他们却没有给半点解释。

在这种自由下，我找到在“五七干校”劳改的父亲，问清楚了那几件物品的来龙去脉，就想着去给自己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还自己清白。在原来的县政府里找过信访办，在县委会找过宣传部长田某，希望他们能比园艺场里的文盲懂得多一点，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是：“旧东西就是‘四旧’，‘四旧’就是反动的！”无知的逻辑！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这些行动，又触犯了革委会里造反派头头们的威严，趁着1969年春天开始的整党，他们逼着场党支部承认是他们错误地培养了我，让老书记通知我再“下放”到他们指定的湘北边界的大山——东山峰茶场去。我提出自己回家找安置的地方，找好了再回来办迁移手续。

三、后知青生活

没办理任何离场手续，1969年3月5日，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城市“黑人”（无户口，无粮，无工作）生活。生活艰辛，处处遭人白眼，提心吊胆地过着每一天，个中辛酸，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但是，我顶住了单位、居委会及个别家庭成员的各种压力，认定了一个想法：坚决不再下乡。那几年我尝尽了“赖活”的滋味！

姐姐结婚后一家四口长期住在娘家，家里那间又当厨房又当住房的黑屋子里，已经挤巴巴地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外面临街的一间小小的偏屋，在我离开家前是我经常看书的地方，也放了一张床和小外甥们的摇篮等杂物。我用父亲读书时候用过的行军床在偏屋里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小的蚊帐里就是我的天地。

因为我家的地主成分，1968年居委会曾经把我姐和两个还不到读书年龄的小外甥列为下放对象，但是姐夫出身贫农，贫农的老婆和贫农的后代是绝对不能让人当地主下放的。姐姐倚着这把保护伞，和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娘们进行了几个晚上唇枪舌剑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死"罪免过，"活"罪却难逃：她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天天到居民小组里出义务工。当时正是全国都在贯彻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全民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街道里一切可以出力的人，不管是"四类"分子还是贫民，都得积极响应号召，在街道下面几米深处挖防空洞。我回家后接替了姐姐的这项劳动，白天在洞子里挖洞，也不多说话。起初没人说什么，以为我是从外面回来探亲的，时间久了就有人议论，居民积极分子开始警惕起来。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从后门偷偷溜进来告诉我，她晚上已经几次碰上在外面听"墙脚"的人。

有好心的邻居悄悄地告诉我，有人在他们队上到处说我是在"文革"中打了单位上的书记才被开除回来的，说男友不要我了，还死赖在家里不早点找个人家嫁了。也有附近菜农家的年轻男子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如果嫁给他，就没人敢来欺负我了。居民小组和工宣队也在抓紧向我施压，三番五次上门来逼迫我，让我滚到在农村的婆家去。三天两头半夜上门查户口，还让我去派出所说明白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的家里，经济也很紧张，母亲的工资一月只发28元，其他的全部被冻结。母亲没被打成"黑帮"分子，也没有被抓去戴高帽子游街，但是，她出身"双料"地主家庭，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外公是被土改工作队"镇压"的(1982年彻底平反昭雪始恢复名誉)。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能按月发生活费给她，已经是很优待的了。姐姐的孩子还小，姐夫一个普通职工每月42元的收入，要按月寄钱养他在乡下的母亲，又要养老婆孩子，经济上肯定很拮据。如果说以前母亲的收入还能给姐姐家一点帮衬的话，现在又添上我这张"黑人"的嘴来分享母亲可怜的28元，贫困人家的日子真是越过越没得盼头了！于是，有人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把我踢出去，才能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终于让"关心"我的人们找到了由头。

一天早上，母亲正准备去学校，姐夫照例是用很恶毒的言语咒骂我的父母。我提出两口子吵架不准伤害我的父母，就被他顺手抓了一把雨伞追打，幸得邻居菜农的一位大哥及时抱住了他。但大哥出身富农，于是，一场家庭纷争就升格成了地富子女合伙欺负贫下中农的政治事件。被他告到居委会，串通居委会的人来对我兴师问罪，决定下午在我家召开调解会。姐夫还亲自跑到我母亲的学校为她请假，逼着胆小的母亲参加会议。对于他在我家的劣行，我忍了一年多，知道母亲惧怕这个长年进驻家里的"农宣队"！我可怜的父母这些年在社会上已经受够了欺负，在自己的家里竟然还要频频遭人侮骂，我那天的心情已经气愤到了极点。即使在园艺场被冤枉的日子里，我也没想过要和谁吵

架，因为那些人不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文革"中催生出来的一群政治疯子。

姐夫要把事情闹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挤出这个家。那天，当辱骂声再起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冒着被定为打击报复罪送进监狱的危险，也要维护父母和自己的尊严！当年我才2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所谓"士可杀不可侮"，即使有更严重的后果，我也顾不得了。

调解会上气氛很紧张，上午发生的事情，果然被姐夫提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他是当秘书的出身，嘴上的功夫很厉害。我胆小的母亲躲在学校里不敢回来参加会议，只有我自己能为自己说话了，我决定作最后一搏！当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我义正词严地给予了回击。这是我自从1968年秋天含冤受屈以来所有情绪的一次大爆发！在诉说了他在我家表现的点点劣迹后，我大声对趴在窗户上伸着头的、站在我家房门外的听众说："大家看着我在这小巷里长大，我不是他们说的'黑人'。"又对这些神气地坐在我家里，发言时警告我"二十多岁的人了，应该到乡下婆婆家去安家落户"的"领导"们说："我还没结婚，没有婆家！我有单位，我的户口在单位，只有单位有资格来管我！"我指着屋子里坐着的居民小组长说："1958年春天，我还和你一起参加过居委会组织的下乡支农，当年12岁的我当了劳模，你为什么没挂大红花？"我指着姐夫说："这里是老虎窝，你干嘛赖在这里不肯走？这可是我父亲的房子！"当时，他正得意地用右手掐着纸煤子，左手端着水烟筒吸旱烟，脚下面趿拉着一双旧布鞋。我气愤地说："如果说你我之间是路线斗争，你这样子就是旧社会那些大烟鬼！哪像什么贫下中农？"门外有一个老者大声说话了："管什么成分，岳母娘没死，姨妹子还轮不到你当姐夫的来管！在岳母家打人你还有理了？"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也就草草散场了。

我姐姐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无奈，说我不是说他更不行，于是牵着两个小外甥，跪在天井里朝天发誓："天啦！你要报应别报应我和我的两个崽，你去报应他吧！都是他想出来的主意。"经这么一折腾，那些人不敢再惹我，也没人三天两头到我家来逼我下乡了。1970年秋天去农场锻炼的男友回来了。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父亲被他原来劳改的"五七干校"遣散回来，家里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家里那位贫下中农，却因在单位搞派性斗争被搞得焦头烂额，东躲西藏，顾不上和我进行路线斗争了。

1972年9月30号，我带上半岁的儿子第二次离开了我的家，到矿山我的户口所在地去了。

四、古井无波

1972至1980年间我在湖南一个铅锌矿里生活了整整八年。我曾不顾丈夫的极力

反对，拖着怀孕的身体和浮肿的双腿，坚持参加矿山家属服务队的重体力劳动直到孩子出生。我也不定期地到子弟学校去代课，哪怕只要代一个星期我也去。我的工作质量和态度得到了家属队和学校的好评。当1976年矿山里决定从职工家属和子弟中招收40名大集体工时，我被家属队推荐并被矿山录用了，同时安排在子弟学校以工代教。

1980年，许多教工子弟顶职到了教育系统，而我母亲的退休指标却被某些人利用职权占用了。等我高高兴兴回到家乡才发现自己又成了失业者，与相关人员多次交涉的结果是先当代课教师。两年后我通过考试转正了。从1965年到1982年，在经历了17年的艰辛后，我总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来了一份正式工作。虽然工资低得不能与我的教龄和教学水平相提并论，虽然这一切来得太迟太迟，但是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后，我已经不奢求工作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了，所谓"古井无波"大概也就是这个心境了。

当我倾尽全力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当教师的地位开始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后，当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并且开始有了小小的辉煌后(1982年后，我是湖南省《中学化学园地》的特约通讯员)，上天又和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85年，落实知识分子(我是知青，不能算知识分子)政策成风，我不无遗憾地丢下了我的实验室、我的学生和我的粉笔，再次背井离乡，来到丈夫工作的单位湖南省冶金干部成人中专，换回来的是一家人的团聚。

在这所学校里，因为没有大学文凭，我只能在教学资料室里为他人准备教学资料。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我曾坚持自学了三年《社会学》专业，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新站上讲台，为学员讲课。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锅饭"开始被砸烂，靠吃工厂而发迹的堂堂省级干部学校，辉煌了十年后一下子瘫痪了四五年，在1999年夏天终于被下级单位兼并了。在我2000年退休时，工资卡里面没有了所有与教师有关的部分，退休证上"曾经职工(职务)"一栏还原成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无情的空白，只有我的老户籍本上记录着我曾经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人民教师！

五、辛酸的句号

1972年上半年，农工调往矿山还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丈夫所在的矿山主动与园艺场联系我的调动。可是，园艺场竟然在我的个人档案里面塞进去"文革"冤案中那些没有正式结论却能置人于死地的内容，让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丈夫一气之下打报告到园艺场要给我办辞职。当时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得到消息后立刻向场部表示本人坚决不同意辞职。可是，园艺场竟以我丈夫的要求为准，把我和孩子的户口立马迁到了他工作的矿山。

1973年，被遣送回家在居委会蔬菜队劳动改造三年多的父亲已经回到了石门县教书，我的事情却一再被搁着，场里没人为当年的错误承担责任。直到1982年，我因转正

为国家教师时需要工龄证明，才由我的知青朋友黄家珍找到园艺场的新书记杨士迪先生开出了正式证明。此证明在退休时为计算连续工龄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收进了我的个人档案。也是在那一年，经杨书记批准，园艺场为当了三年“黑人”的我，补发了拖欠八年之久的生活补贴费 600 元。记得当时还附来了一张表格，里面有一栏是要填写对补发生活费的态度。我不假思索，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损失国家补，给多少我不计较。我的祖国十年的损失谁来补！”

2000 年 5 月，当单位为我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我档案里面的工作时间没法连接。从 1972 年起，我先后在三个学校工作过，1982 年才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国家教师！公司劳资部门的人找我去问，我只好把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一一说出来。年轻的人事干部笑着说，“您要是能搞到原来单位的相关证明就好。我们相信您的话，可是档案里面没有就不能给您上报连续工龄。”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因此还要少算百分之五。正当单位打算派出外调人员和我一起去园艺场时，我想到了 1982 年转正时园艺场杨书记开给我的那一张工龄证明，于是找出来交给他们。到此，我的知青生活记录才算真正结束了，同时结束的是我的工作记录。

从 1965 年 9 月到 2000 年 5 月，35 年！ 13000 个日日夜夜，把我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白发老妪！这是一段漫长的知青生活轨迹。命运和我开的玩笑到这时候才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

作者简介

黄欧平，女，湖南省湘乡县人。1965 年毕业于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高三 8 班。同年 9 月 10 日自愿申请下乡，由石门县劳动局“四个面向”办公室安排到石门县园艺示范场。1968 年后，由于受“文革”动乱中父亲错案牵连而坎坷一生。2000 年退休。现客居广东顺德女儿家。

我的知青生涯

王时燕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一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她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前进的方向不够正确，读书是为了成名成家'唯有读书高'，发言不能与行动结合，缺乏工农淳朴感情。"而学校对我的最后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是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不过虽然她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20世纪80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主编，因在1957年划为右派，被贬谪到五中教初中语文。钟老师很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这件事在"文革"中成为他的一条罪状："重

视和吹捧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歧视和打击工农子弟”，为此被打得死去活来，牙齿被打落好几颗。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这种人注定命运多舛。四十多年以后，我从当年的班长口里得知，当时学校领导早就研究内定将我下放到农村，可不谙世事的我还在痴痴地望眼欲穿盼那录取通知书呢。早知命该如此，我也不会那般伤心欲绝地大哭一场了。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想象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向我关闭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其他同学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 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硌）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 16 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除了下乡，别无他路可走。

我的父亲王认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 年，他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他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24 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千叶步兵学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他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他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1948 年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由于父亲性情耿直，口无遮拦，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合作化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合作化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地压在父亲头上，到死没有摘下来，并且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年岁最长的大哥早年去了东北谋生，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第二个哥哥 1963 年下放江永，我下面两个弟弟尚未成年。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父亲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我当时想，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也好跟熟悉的同学结伴而行，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 82 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

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不久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竟未能回家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国民党的牢房，却在64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二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避人耳目。可是没过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天麻麻亮出早工，天擦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我个子矮，担子高，踮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说："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插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

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用的草纸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用搓纸捻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却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简直

就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比男子汉差。她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心里暗自纳闷，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环境里，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从此过上独居生活。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30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王大姐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以为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这位丈夫病逝后，已成年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于是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那狭小的木板房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虽然我们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却找不到任何语言宽慰她。

三

上山下乡的日子苦多乐少。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几个知青一起去赶集，寄回家书，领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和汇款，买一些维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然后一起走进饮食店吃一碗“马打滚”——靖县当地出产的一种用糯米制作的小吃。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这些离巢的孤雁与家乡、与亲人还保持着某些联系，从收到的包裹和汇款上仿佛还可以感觉到亲人的手抚摩后留下的体温。但是这种喜悦对于我这个离家不久的女孩子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没有可能给我寄钱寄物。母亲失业在家，被街道办事处指派去挖防空洞，说是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不仅没有工资，连工具都要自备。两个弟弟因为家里困难又

出身不好,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去当"土夫子",天晴去担土,下雨只能望天,饱一顿,饥一顿,自顾不暇。为维持生计,母亲只好变卖旧家具,最后连床铺都卖掉了,搭块门板睡觉,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援我。我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农民。

我们生产队在当地还算富裕,每十分工分值三角钱。队上最强的女社员如妇女队长王大姐是评为每天七分工,而我被照顾评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挣到一毛八分钱。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粮钱等等,不倒欠生产队的就算不错了。倒是本地农民因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粮多,吃饱肚子问题不大,虽然没有钱分配,养猪喂鸡种菜搞副业,办法比我们总是多些。由此我体会到我们是没有办法与那些带头上山下乡的董(加耕)模范、邢(燕子)标兵相比的。他们是回乡知青,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都是从小练就的,人熟地熟,非亲即故,虽然也会遇到困难,但总算是龙归大海、鸟入森林。加上模范标兵比我们出身好,到处现身说法作报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没法比了,所以他们可以至今无悔,而我却只能哀叹"没有岁月可回头"。

断绝了家里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开始了。没有钱买牙膏、肥皂、草纸,更谈不上买书、添置衣服。下乡一年,我的身体在苦难的磨炼中开始发育,原来的衣服越穿越紧,经常会绷裂了线缝,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没钱买新衣,只能趁着晚上脱下来,自己就着油灯拆开了放吊边,顺便把磨破的肩头、挂烂的衣襟给密密补好。学着邻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边、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点肥皂钱。不料旧衣服经了一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水泡汗渍,早已糟朽不堪。再经草木灰碱水浸泡、棒槌捶打,展开来已是千疮百孔,叫我后悔不迭,赶快改了办法用手轻轻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几度寒暑,穿在身上还得时时注意,以免再出破绽招人笑话。

我们湾里生产队因为距离县城近、田多人少,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亲自带领县委工作组驻扎在队上,大搞试验田,兴修水利,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得苦耐得劳,不搞特殊化,群众反映很好。不过社员们也评价说,工作组驻队的时期要算老百姓历史上最辛苦的时期了。出工更早,收工更晚,还不准磨洋工,哪怕逢年过节也不休息,战天斗地在田地里、水库工地上。久在农村的社员尚且叫苦,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能否吃得消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组长见我虽然个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后还帮着妇女队长记工分,可能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便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是在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后,妇女队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工作组说了,我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像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现这样好,不正常,只能说明我思想复杂,队上要特别注意。我听到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说

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事实上，表现好是思想复杂，要是表现不好那肯定又会说是思想反动，那叫我们如何表现呢？看来这辈子我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四

不过，因为工作组的安排，我总算走了一回好运。为了应付工作组对生产队要搞多种经营的要求，塘湖大队指派我跟随农业局的带队干部去沅陵学习养蜜蜂。回来后，大队买了20箱蜜蜂交给我喂养，仍由生产队记工分，大队给生产队以补贴。这样我就告别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成为了少见的女知青养蜂人。

当我踌躇满志地接过这批蜂箱，打开一看，顿时就傻了眼："怎么全是不适合箱养的中蜂？别人买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吗？"大队书记挠挠头说："管他东风西风，便宜就好。都是工作组搞花样，不搞还不行，你先养着吧，有什么不懂去问农业局带队干部。不过话先说清楚了，买蜂的钱是大队贷的款，不是儿戏，你可千万小心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蜂箱搬回来，按在沅陵学的办法喂养。养蜂哪里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蓝天白云、明月清风的浪漫，个中的艰苦只有养过蜂的人才能体会，更何况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数不清被蜜蜂蜇过多少次了，反正到后来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进皮肤里，既不红又不肿，只叹息又牺牲了一条小生命。尤其我养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极易分群，产蜜量不高，箱养容易生病虫害。养中蜂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带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于奔命，去追赶出逃的蜂群。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飞不远。每当我赶上蜂群，拨开蜂团，找到蜂王，庆幸之余，将它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带回所有的"逃犯"。每天两次打扫蜂箱，格外留意有无新的王胎——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现，如有，必须毫不留情地马上掐掉，否则，不出几天，就会再次上演"胜利大逃亡"了。

我们生产队附近没有多少花源，为了寻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现被洪水冲毁的飞山水库周围的山里开放着许多荆条花。于是找到农业局请来的沅陵师傅和县镇上的一位男学员帮忙，一道将蜂箱搬运到飞山水库的后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我身边的草丛中飞快地滑过，吓得我背上好一阵凉飕飕。胆小力薄，只好邀上沅陵师傅和男学员同去。他们见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胆又不敢得罪他们，好在我借住的那家农户为人正直，总是关照和维护我，还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起睡，这才避免了许多骚扰。也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赶蜜蜂的同时，其他的知青和社员们也正在挥汗如雨地修复飞山水库，规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头才有饭吃。真是知青同命运，各有各的苦呀！

劳碌之余，当我躺卧在杂草丛中，百无聊赖地呆望着天空南来北往的云朵，就遥想起

远在长沙苦命的母亲。母亲冯筠是出身于京城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冯汝骙最后一任官职是宣统末年的江西巡抚，《清史稿》中留下了对我这位外高祖的简短记载："冯汝骙，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知川、鲁、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职。后以理财功升至浙江巡抚。辛亥年移抚江西。武昌变起，赣处下游，举省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礼送出境，至九江，仰药殉。谥忠愍。"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却不会顺应潮流和部下拥戴，当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勋。他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药自杀以殉。虽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节，却没有给后人带来任何好处，倒让李烈钧那小子拣了个弃暗投明的便宜。

外高祖死后，社会巨变，家道中落，但外公还是京津地区四大名医之一，所以母亲小时候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她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事报酬优裕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乱加上婚姻的不幸，母亲辗转来到东北，并跟随我父亲来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亲解甲归田以后，母亲洗尽铅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父亲去中南军政干校学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与街坊一起成立织布社，日日夜夜纺纱织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积极参加群众扫盲工作，被录用到学校任教，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就被清洗回家。过苦日子时期，母亲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件首饰都换成了沾着泥巴的萝卜和红薯，填进了我们姐弟们的肚子，几件压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们的童装。母亲经历了太多的离别，20世纪50年代初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送去荒凉的新疆参军，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又先后把哥哥冯世续和我送到江永和靖县农村劳动。父亲落难之后，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父亲和岌岌可危的家。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亲去世之后，我家的老院子被没收，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被赶到两间狭小的公房居住，并经受着她曾经的扫盲学生、后来的街道干部们的抄家、管制、批斗。

望着天边飞驰的白云，我仿佛听到母亲用她那熟悉的温和语调在向我呼唤："燕子，你在那里还好吗？"我仿佛看见母亲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坐在杂乱的床边，呆望着窗外天边北去的雁阵，口里喃喃地念诵着"又是一年春草绿哦……"哦，母亲，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门前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微风吹拂的柳枝，还是依稀听见了秋日长空里那天际传来的余音袅袅的鸽哨？女儿在靖县的山中为你遥遥祈福啊，这两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时能了？

五

天地之间，青春鲜活的生命总要开花结果。但是，苦涩的雨水浇灌苦涩的土地，只能开出苦涩的花朵，结出苦涩的果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心里渐渐萌生出对爱情的朦胧渴望，但对于周围同时下乡的知青同学，我却无动于衷，对当地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是充满反感。这是因为在五中读初中时，有一位同级不同班的男同学与我相互有好感，让

我不能忘记。当送我们上山下乡的汽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竟然从送行的人群里冲出来，来到我坐的车窗下，与我握手告别，这在当时算是勇敢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我们的脸上写满着的惆怅，似乎都明白那代表着什么。

近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体会，我要写信告诉还在五中升读高中的他，告诉他乡下的真实情况，要他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朦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注意。于是我在信中写道：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相反，我们今后只会被落后习惯同化。这是文明向落后的倒退，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流放，是当年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流放西伯利亚的翻版，等等。信，发出去了，我天天盼望着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会看错，我们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淳朴的感情，我们的心是不会因为两年的离别而疏远的。我多么期待着他的安慰成为我打发日子的精神寄托呵。

在焦急漫长的等待后，回信终于飞来了！我避开最亲密的女伴曹志华，躲进油菜花盛开的田野，用微微颤抖的手撕开了信封，回信却让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批判了我的落后思想，并告诉我，他和全体同学很快也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奔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线了。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人类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解放，我们要把整个人生都献给革命都还嫌不够，哪里还有时间来谈什么个人感情呢！"

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抛向空中，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谶。历尽离乱，30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对我问题的解答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原来当时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他大吃一惊，第一个举动是观察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的情况比比皆是。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他思想斗争一

宿，最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问得过良心。再义正词严地回了一信，想必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

六

凛冽的寒风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知青组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两个男知青都不在队上，只留下了我和曹志华。我再也顾不得考虑蜜蜂过冬了，横下一条心，和曹志华一起卖掉了口粮，筹够了路费，终于踏上返城之路，像两只孤雁扑打着翅膀，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沙。

我虽然离开了靖县的土地，但知青的身份没有改变，回到长沙也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更没有工作单位的返城知青，我面前的知青生涯正长。

离家两年，母亲明显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许多。她和两个弟弟挤住在别人换给我家的两间又小又破的公房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时候，连父母的老相册都被抄走了。家里给我开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跟母亲挤着睡。正说着话，哥哥冯世续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原来他早已从下放的江永县倒流回到长沙。哥哥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他兴高采烈地把印着"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拿给我看，并鼓励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点下头，他就做我的介绍人，我马上就是个造反派战士了。我对哥哥说："家里这个样子，妈妈老了，两个弟弟都还小，你还不如找个临时工做，家里才有饭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懒得与我计较的样子，转身又风风火火冲出去了。

母亲又告诉我，我姐姐来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去。这个消息倒是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岁就报名参军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也就是近几年被称誉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为她生性活泼，又长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进了文工团。她曾寄回来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那飒爽英姿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她与一名军官结婚，就调到所在连队改行当卫生员，想来生活状况是不错的。到"文革"时期，姐姐扎根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从来信中、报纸上、电影中，人们都知道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无人烟的戈壁变成了塞上江南、美丽的绿洲、各民族团结的天堂。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那个年代人人喜爱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描写的就是新疆军垦的场景："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我对曹志华，还有下放靖县五四园艺场、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说了姐姐的来信，她们也高兴地要求与我同去。曹志华也充满着向往，希望成为一名骑马挎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

女战士。她们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去新疆的决心。

去新疆路途遥遥，乘火车要走好多天，火车票价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哪里掏得起。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只对一些串联到外地的红卫兵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车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的五官和头发有点像新疆人，普通话讲得也还可以，她们俩就推选我假扮新疆红卫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车票。没想到第一次“行骗”居然是马到成功，到手了三张宝贵的火车票。

我们兴奋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装，突然又想到当时外出盘查很严，一路上都要检查证明，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是行不通的，说不定刚刚出发就被押解回来。可是我们刚从靖县农村回到长沙，又到哪里去搞介绍信呢？

正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曹志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们在五中读初中时的班长简光复同学。简光复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虽然成绩一般，调皮捣蛋，但因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学校时就深得信任。初中毕业以后，他直接进了长沙水泵厂，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还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见过世面、远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简光复虽然自己出身好，却并不歧视和欺负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们几个一直都走动得勤。为人又特别讲义气，能够帮得到忙的事，在所不辞，尽力而为。加上他一直爱慕着曹志华，所以她一开口，简班长就满口答应想办法。

过了两天，简班长来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空白介绍信，下面赫然清晰地盖着一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韶山兵团”的鲜红大印。我们问他，这张珍贵的介绍信是如何到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厂里车钳刨铣样样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这个革委会头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啰。

拿到介绍信的我们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绍信上写明我们去新疆传经送宝，串联学习。只是在填姓名的时候，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我们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学的高中学生，现在是停课闹革命。因为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知道我们是假红卫兵、真知识青年，那就不仅仅是造假逃票的问题，要是再查出我们出身，一上纲上线，那就是犯了“假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招摇撞骗的大罪，关上几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当中，秩序大乱，知青的社会地位也还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们只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们用“曹东英”、“宋继红”、“王韶燕”之类的假姓名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登记，借路费、伙食费，到了运动后期清理还款，凡是用真实姓名、住址登记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钱，只有我们安然无恙。

临近出行的前一天，简光复、胡天培等几个原五中初六八级的同学特意为我们安排在天心阁饯行。想到我们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远，恐怕是难得再见了，大家都有几

分依依惜别。还在读高中的胡天培强打精神,半是鼓励半是安慰地说:“你们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干,到明年我毕业了,也到新疆来找你们。”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那个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幸亏简光复的父亲正好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领着我们从行包房直接进站,把我们和行李从窗口一个个塞进了快要开动的列车。

上了火车犯了愁,车上挤得满满的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光是没有座位,连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行李架上都是人,气都喘不过来。去乌鲁木齐要八天八夜,这要我们如何是好。我们韶山红卫兵的身份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听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小将,车厢里各地的红卫兵肃然起敬,腾出一排座位请我们坐,他们自己钻进了座位底下,还一定要欢迎我们介绍革命圣地韶山,讲伟大领袖早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事到临头,身不由己,我们只好胡编乱造,瞎吹一通。好在他们对我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听得眼都不眨。其实,那时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还要高,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体表现吧。

列车一天天往西北开行,我们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度过。饿了买个冷馍,渴了喝口凉水。想到姐姐在来信中说的:她和姐夫已经在风光秀美的边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种着葡萄、苹果,我的灰暗的心里就燃起了一线光亮。

列车一路烟尘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走下拥挤的列车,眼前的景象就把我们惊呆了。候车室里凡是能够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着、站着、睡着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的身后是巨幅的标语横幅:“抬头望见北斗星,上海知青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要活命!我们要返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早几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总理还专程代表党中央到石河子慰问过他们。提起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声泪俱下,哪里是我们听说和想象的那般诗情画意。艰苦劳累、忍饥受冻就不说了,主要是连队管理简直是法西斯,动辄打骂关禁闭,逃跑的抓回来吊起来打。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就是绝食、卧轨、讨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乡。眼见为实,这一幕场景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一个下马威、当头一棒。走出候车室,冻雨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零下二十多度。此时的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而乌鲁木齐还是朔风刺骨,积雪盈尺,衣着单薄的我们冷得牙齿打颤。突然,一颗流弹(长沙俗称“冷炮子”)嗖地一声从曹志华的脸旁擦过,吓得她把头缩进衣领里,半天不敢伸出来。

曹志华有个亲戚黄伯伯在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当领导,我们三人径直去找他落脚打听。黄伯伯在运动中已经“靠边站”了,听清我们的来意,劈头盖脑给我们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里是你们想象的世外桃源!不多说了,吃饱饭,休息一宿,赶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说:“那还是靖县好些,至少是青山绿水。我们园艺场栽了好多橘子树,橘子树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她们两人又直接回了火车站。只有我还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长沙和靖县的遭遇就不想回头，加上离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远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进兵团。一打听，去伊犁要翻过天山到北疆，路程还有一千多公里，不过，农四师在乌鲁木齐设的办事处倒是离得不远，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去伊犁。于是告别了同伴，一个人去了办事处。农四师办事处接待湖南人很热情，一位工作人员凑巧认识我姐姐，他悄悄告诉我：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

原来我姐姐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因为经常要下基层巡弋，茫茫戈壁沙滩，地广人稀，连长不放心，经常亲自陪同护送。他是个甘肃汉子，憨厚老实，和姐姐相处时间一长，双方就有了感情，报告要求结婚，谁知惹恼了上级。因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长远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问题，而我姐夫只是个连长，级别不够。报告没有批准，另外给我姐姐指定了对象，我姐姐却坚决不从，铁了心要嫁给连长姐夫。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了得！从此以后，婚虽是勉强结了，姐姐姐夫都没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们升官的升官、转籍的转籍、调机关的调机关，只有我姐姐在连队一待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拿着微薄的几百元退休金。儿女都在当地就业，正是"一颗红心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工作人员的悄悄话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火车站，曹志华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车，我本来是打算给她们送行的，上了火车话别，她们一边一个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下车。正在拉拉扯扯，列车开动了，本来犹豫不决的我就被她们拖着又回了长沙。

七

从新疆回到我又爱又恨的家乡长沙，我的想法变了。既然逃到边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不学孙悟空闹一遭阴曹地府。不过我和孙悟空的动机相反：孙猴子大闹阎王殿，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掉，得个长生不老、与天同寿。而我只不过一心想要把我的名字重新加回到我家的户口簿上去，过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

我随着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长沙造反派声势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纷纷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例如"湘江风雷"知青支队、直属支队，还有"红一线"、知青造反团等等。各个组织联合行动，高喊着"我们要户口，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返城"的口号，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造反派还迅速包围占领了当时的南区公安分局，要求给知青上户口。听到消息以后，我赶忙拿着家里的户口簿跑去，只见南区公安分局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都在争先恐后地排队上户口。我也努力挤进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里的户口簿，还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粮票。不过我当时高兴得太早，只过了几个月，造反派

失势，我的户口又被注销了，我又被打回原形，还是个一无户口、二无口粮的返城知青。与我相同遭遇的返城知青还有不少。

我哥哥他们一群江永知青驻扎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们都是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诉说他们在江永几年遭遇的苦难。他们的文章张贴出去以后，总是引来许多人观看，许多人一边看还一边议论，流下同情的泪水。他们还派人上访北京，恳求中央来人调查解决。

当时我总是跟在这些哥哥姐姐的身后，帮着写材料、贴标语、发传单。为了写材料，我也跟他们一起到韭菜园的农业厅招待所提审过走资派杨第甫。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分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提审，我了解到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和一步步发展。据杨交代：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明白点讲就是饿死）几千万人，许多地方劳力缺乏，田地荒芜，恢复很慢。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严重停滞倒退，虽然精简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工人，但每年毕业的大批青年学生无法安排就业，所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待业问题。所以后来“知青办”也称为“安置办”。我感觉到决策者在考虑和布置国家大事的时候，“知识青年”只是一种将青年学生变成农民的美称，上山下乡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大约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过。

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东西。因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没有钱和布票添置衣服，发现招待所的被单到处乱扔，就麻起胆子用一大卷标语裹夹着一床被单回了家，将被单染成青色，请裁缝做了套衣服。因为染色的技术太差，深一块、浅一块的，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要安定团结”、“斗批改”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文革”，军宣队进驻，“地富反坏右”都被关起来，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也都被抓起来审查。我大弟弟因为街道上无休无止来抄家，挖地三尺找旧社会埋藏的枪支弹药，忍无可忍和干部吵起来，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军宣队关押起来，说他是“阶级报复”，打得吐血。江永县也派人到家里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关了两年才放出来，究竟什么罪名我们至今不清楚。哥哥出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没多久得了败血症，又没钱治，1974年就过早地离开人世。街道干部还带人冲到我家来开我母亲的批斗现场会，说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后台。他们进来的时候，母亲正在对着我父亲的遗像独自垂泪。街道干部去摘相框，发现相框两旁我母亲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副挽联，上联是“子欲养，亲不在”，下联是“树欲静，风不止”。这还了得，这明显是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老右派、历史反革命鸣冤叫屈，立刻把我母亲拉出去关进了街

道办的学习班。

八

斗的斗了，批的批了，关的关了，这就叫安定团结。只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开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街道上天天催我快点回靖县去，我们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个个回了靖县，只有我还是不敢回去。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使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性质有了深刻了解，对于回乡继续劳动争取前途出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又想起那20箱蜜蜂，我走后肯定是跑得无影无踪，回去怎么赔得起大队借的贷款，说不定还落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不久又听说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斗，下放在园艺场的我们五中带队知青孟铁强被批斗后投塘自尽，同学校同年级同下乡的朱稚黄因为反动标语事件被判了七年劳改，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这么宽，地这么广，怎么就没有一块容我们母子们安安静静生活的天地！

此时我的一个熟人魏老师来看我，平日里我们喜欢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她很同情我，劝我在长沙找个人嫁了算了，只要嫁了人，生活就有着落了。我看多了文学作品，想象中的婚姻应是纯真爱情的归宿，为活命嫁人那不是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纪吗？魏老师费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临走前说：“你最好早点作决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没有好日子过，留在长沙至少还可以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后，邮递员送来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问我怎么还没有去，说他们虽然受了点冲击，日子还过得去。姐姐还告诉我，近来内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们连队许多老单身汉都讨了老婆。她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又能干，脾气又好。她已经把我的照片给他看了，男方很满意，答应给我做几套新衣服。姐姐还说，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结了婚，马上就可以迁户口。要赶快，赶上今年分秋粮。

看着姐姐的信，我凄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来我们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没有路可走了。与其嫁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人，还不如听魏老师的劝，就在长沙找个安身之处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师家，她很高兴，夸奖我识时务，说：“现在女知青要想嫁城里人还不容易，听说过长沙给返城女知青编的顺口溜吗？‘不是不爱你，吃不起黑市米（指通过非正常渠道购买的高价粮食）！’还幻想什么白马王子，面对现实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只说是借书，不说别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而至，看到她家坐了个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师高兴地来报信，说昨晚那个人看上我了，问我的印象如何。我说15支光的电灯（即15W功率的白炽灯泡）灯光太暗，没看清楚，好像蛮成熟老练，有文化，但不像干部也不像工人。魏老师说：“你们今晚自己见面谈吧。我可没有介绍你是知青，只说是我们学校代课

的音乐老师。”

晚上会面，我竹筒倒豆子什么都交代了。他也谈了他的过去：他姓彭，读中专时划为右派，后来中央有指示，中专学生不划右，毕业时甄别摘帽了。他先被分配进厂当技术员，后来被精简回了长沙，现在区办厂子搞技术，机械制图、车工都来得。父亲已过世，哥哥已成家，他因为历史原因，又高不成低不就，快三十岁了还未成家。母亲与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里。他表示不嫌弃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会不给我机会，愿意带我到社队企业学技术，还可以带我弟弟做徒弟。我感觉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应该有共同语言，对家里也会有帮助，就下决心跟随他去闯荡江湖吧。

1968 年秋季，对造反派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街道干部威逼我立即回农村，母亲和大弟弟还关在学习班，我只好去找才认识几天的彭商量。彭建议我躲到他家去，跟他妈妈睡。我再一次横心离开了空荡荡的家。半个月后，母亲从学习班被放回家，听我说了彭的情况，她坚决不同意。我急了，说同不同意都是木已成舟，我是走投无路，只有认命了。母亲叹息着对我说：“你执意要走这条路，妈妈也不能拦着你，要怪只怪你的父母对不起你了。唉，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了人家的门，你的心气不要太高了。”

于是便跟彭某约好去领结婚证。当年领结婚证必须要有男女双方单位的证明，我是个“三无”知青（无工作、无户口、无居民粮），到哪里去打证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识，买来草酸和氧化剂，找到一张盖有公章的信笺纸，将纸上的字迹褪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为避免碰到熟人，我们特意去了北门一个街道办事处，凭着这张证明，街道民政办同意打结婚证。手捧红宝书，先对着毛主席像高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鞠躬，礼成。假证明换来了真结婚证，这年彭 29 岁，我 19 岁。

从此，我与彭一起开始了到处讨生活的流浪——长沙俗称“打机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岳阳、汨罗、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队的农机厂去打工或接些加工业务。彭通过朋友关系，将我的大弟弟介绍进了府后街的湘江模具厂任当家钳工，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婚姻给我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流浪期间，我练就了一手好技术，描图、车工、钳工都来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跑江湖，许多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不过他们的户口仍在江永，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九

生活向我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更加艰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彭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年划为右派、失去正式

工作，以及以后多次运动挨整和牢狱之灾，对他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次的恋爱失败更使他不再相信人间有真情。一方面他脑子活泛，许多问题我们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对家里的生活来源是负责的，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并不叫苦，总是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另一方面，相处不久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暴躁、缺乏修养的男人。婚后不久，我们同去看电影，他要我拿着他的手套，出电影院后发现手套只剩下一只，他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引来很多人围观。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冬天我洗完脚后顺手将自己的袜子带进寝室，没有注意他的袜子还留在洗脚盆边，他又是一顿骂，顺便给我上一堂"夫权"课："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从小被父母珍爱，从未挨过骂。父亲的传统家教也很严：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语不高声。母亲则用一些西方文化引导我：要忍让，别人打你的左脸，应该将右脸也伸过去，原谅宽恕别人，感化别人。在我当时那种"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彭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不识。他父亲旧社会经营些小买卖，解放后公私合营进了单位，已经过世了。母亲刘氏一双小脚，虽不识字却非常精明。她在旧社会受过婆婆不少气，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对我这个知青媳妇、黑市堂客家规更加严厉。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气地检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夹带了东西。家里规定由男人专用的脸盆、提桶、脚盆甚至晒衣竹篙，女人是不准乱用的。我初过门不懂规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冲进来就是一顿大骂："男人洗脸的香皂你拿着洗下身，你太不要脸了！"骂得我半天回不过神。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袜子剪成碎片，当着我的面撒了一地，我不敢问缘由，彭回来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为我买了两双尼龙袜没有给她买。以后，彭凡是给我买东西，必定为娘同样买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彭与别的女人有染。原来彭在婚前已是情场老手，婚后依然拈花惹草。我当时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诚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还愤怒指责彭的不忠："我哪点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应该会赶快检讨保证，下不为例。谁料他却轻松地说："你没什么不好，但再好也只是碗红烧肉，我总不能天天吃肉，间常也要吃点小菜嘛，这是我们男人的特权。"停顿一下，他反过来指责我："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饿死了。你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你还不满足要怎么样？！"

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开始厌倦这场婚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他回靖县去。可是我母亲阻拦住我："你既然已经生下了女儿，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带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母亲的话震住了我，让我记了一辈子。我明白我和彭终究不是

一路人，但为了孩子，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他。直到四个孩子都成年且事业有成以后，我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看到我提着行李又回来了，彭当时更认定我离开他会无路可走，从此也就更加轻视我了。

生下大女儿后，因为彭和婆婆都不满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连三地生下三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更难看了。好在三女儿刚满月，就又怀上了老四。“文革”期间宣布对“二十一种人”实行专政，摘帽右派也属于“二十一种人”。20 世纪 70 年代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历次运动彭都是挨整的，被戏称为“老运动员”。1974 年全国开展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市工商局打击办硬说彭的个体劳动自由职业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报公安局逮捕关押，巡回游斗几十场。关押到 1975 年，要求我们家属积极退赔减轻处罚，我们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点的衣服都交给“打击办”，还说不够，他母亲只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两千多元。结果正式宣判时，认定他从 1963 年精简回长沙到 1974 年被逮捕前，个体劳动都未经批准，定性为投机倒把；历年收入估计应有两万多元，全部定性为投机倒把收入，因为只退赔两千多元，故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这回是个男孩。但我们一家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彭家的私房要没收，抵判决的违法收入退赔款。婆婆被他大儿子接走了，我生孩子还没满月，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一左一右各牵一个，拖着四个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观看，啧啧连声，我此时眼泪早干了，脑袋也木了，机器一样往前走，忽听得大喇叭里在播放《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了洪湖上。那天风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我突然笑起来。六岁的大女儿佳佳仰起头问我笑什么，我说：“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们的船舱呀。”母亲当时正因为我江永哥哥的早夭而经受着老年丧子之痛，怕我得神经病，反过来赶紧安慰我，我们娘娘崽崽就挤住在母亲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制鞋厂当学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铺了。彭被判刑入狱后，彭的亲戚对我们母子避之犹恐不及，连我寄存在他哥哥家的一台缝纫机也不肯还给我，他们甚至劝我把孩子送掉几个。只有彭的母亲心疼孙子，还时常来看看。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的母亲坚定地支持我，她说：“孩子多不过就是煮饭多放一瓢水。哪怕去讨米，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小儿子满月后，我找到城南路办事处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管事的书记说，根据我的情况，应该遣送我回原来下乡的农村去。我答道：“那好！不过，四个孩子我就交给国家负责了。”书记沉吟片刻，关切地说：“其实知道你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都说你是个好妹子，就是没嫁对人。这样吧，先到居委会的纸箱厂做临时工，改天我们签个意见，去派出所申报户口吧。”此后我就进了居委会工厂，几娘崽总算有了我每月 30 元的合法工资收

入维持生活。母亲看着家里实在太挤，我负担太重，带着我两岁的三女儿到新疆姐姐家住了几年。

我一边工作一边跑户口，到 1975 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终于同意为我向南区分局转报。这时必须从靖县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我又要上班，又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走得开？婚后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与所有知青同学的联系，只听说回去的知青除了少数由父母单位带指标去招了工，大多数自找门路"转点"到了老家农村，也不知是否有哪个同学还留在靖县。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只写：靖县飞山公社塘湖大队长沙知识青年收。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这封信落到了与我同时下放、当时还在洪家冲生产队的周学礼手上。他看了信马上帮我跑到公社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开始不同意，说要我自己回去，先把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讲清楚。周学礼回答说："那好，只不过她会要带着四个孩子来，先把户口上到你这里。"公社秘书一听急了，赶忙开了迁移证。我收到他寄来的这张对我至关重要的薄纸，激动得几夜没有睡着。

可是，迁移证交到派出所后，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还没有批下来。一打听，有人告诉我，上次是以服刑罪犯家属的身份上报的，上面不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报。这个主意让我心里开了锅。彭是受害者，我们无论感情好坏总算患难夫妻，他又是为了家庭生计获的刑，如果我提出离婚，别人肯定说我不仁不义，彭也可能恨我一辈子。但是，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计。纸箱厂很快要解散，我没有户口以后再去哪里找工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没有户口以后怎么读书入学？容不得瞻前顾后，一咬牙向南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状。法院很快就下了离婚判决。我再次写信给周学礼，请他再帮忙办知青证明。终于，1977 年 3 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户口，我长达 12 年的知青生涯终于结束了。我给儿子取了"四立"这样一个没有诗意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他是第四个孩子，在他出生以后，我们才立了户口。他比三个姐姐都幸运，才一岁多就再不是"黑人"了（指没有合法户口登记的人口）。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文化大革命永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我家被没收的房屋于 1985 年落实政策退还了，省参事室也按干部遗属待遇开始给我母亲发放生活补贴。彭也于 1983 年被宣布无罪释放，那时《国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八年冤狱没有赔偿一分钱。生存的压力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使我们选择复婚，共同创业。当事业小有成绩，孩子们长大成家了，我们就像摆脱了压力的生命气球，飘向各自向往的彼岸。彭去追寻他的美色之恋，而我终于摆脱知青生涯带给我的屈辱婚姻，找回自我。

母亲于 1989 年病逝，与父亲合葬于金盆岭。2002 年，王氏家族的后人们齐聚金盆岭寝园，祭奠我父亲的百年诞辰。每年的母亲生日和清明节，我和弟弟以及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去祭扫。我们和孩子们创立了几家民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数百万元税金，并

容纳了一大批城乡人士就业。我去年以知青身份办理了退休养老社会保险，至今人退心不退，仍继续担任行业协会副会长职务，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天亦有情，我孑然一身度过几年寂寞的日子，2004年，初恋情人遭遇经济纠纷，妻子离他而去，我利用江湖经验与社会关系帮他解困。有情人终成眷属，初恋情人历尽坎坷终于又走到一起，相依为命度晚年。我相信，这辈子除了死神恐怕不会有什么人间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再分开了。晚辈们对我们的选择都非常理解，子女孙辈时常与我们团聚，笑语满堂。直到晚年，我终于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回顾往事，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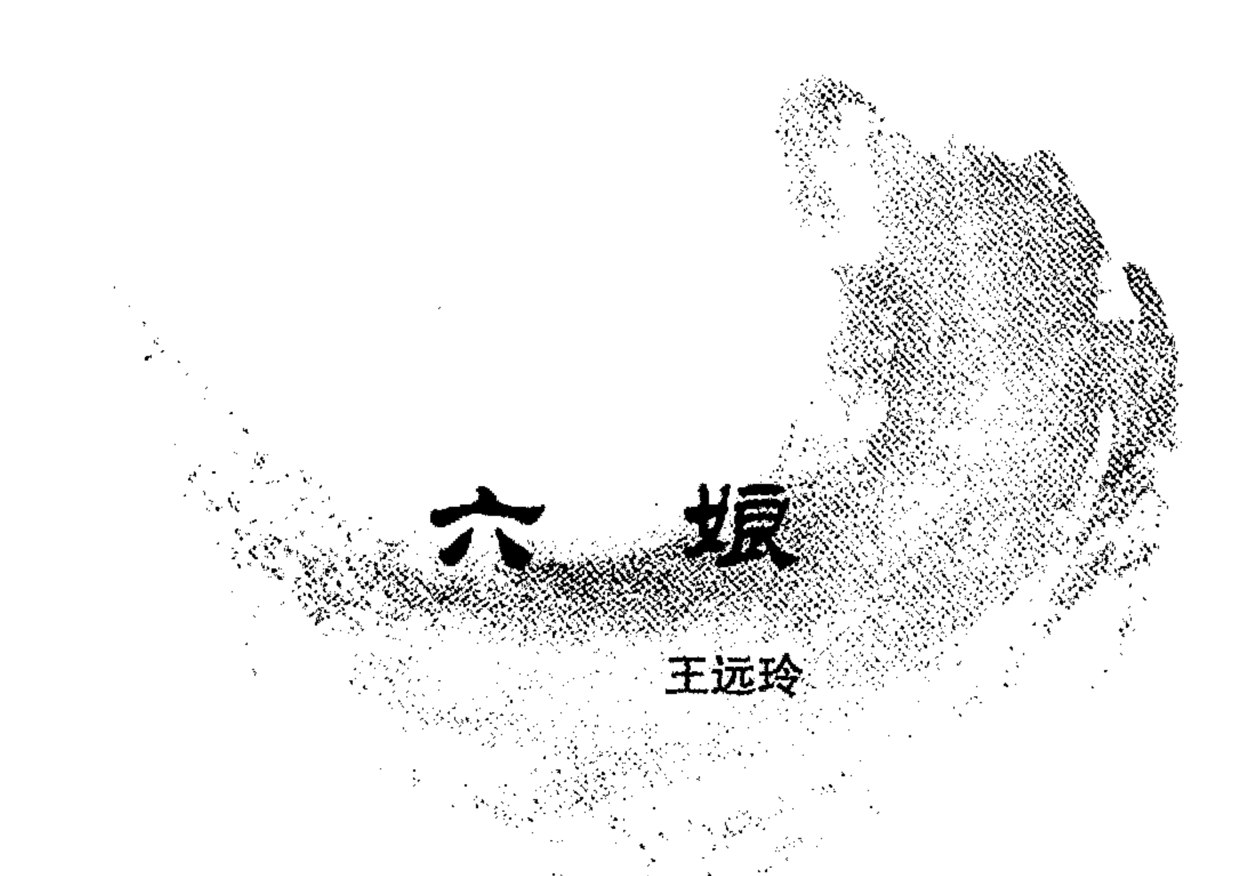
我们有着几十年友情的靖县知青战友仍然经常聚会，虽然我们的容颜随着岁月无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们的心灵永远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们欢笑着，呼朋唤友，明天我们也一定会互相搀扶着，笑看夕阳！

只是偶然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梦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们赶到农村去当知青。我有时也会梦见，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条胡同小巷里，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驳的大门前，叩响了锈迹斑斑的门环，耳边传来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歌：

>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
>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作者简介

王时燕，女，1949年3月出生。1965年于湖南省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下放到湖南省靖县飞山公社。1968年返城嫁人，以“黑人”身份留城。1977年户口迁回长沙，进街办工厂。1983年从街办工厂辞职，从事个体经营。1994年—2008年进入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创办长沙市鹏程出租汽车公司。现任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六　娘

王远玲

我那段死亡的爱情、死亡的婚姻，伴着知青岁月的结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虽然它像潇潇秋雨中朦朦胧胧大雾缭绕的华蓥山，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目，但那些经过的人和事，尖刀般刻骨铭心，又像大雾慢慢散去后的山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本来早已结痂的灵魂的伤疤，谁又会不顾心痛去撕开它！为了警醒儿孙后代，就让我去揭痂，尽管心会流血。

我的前夫刘长珂是邻水县人。

邻水县位于华蓥山南段，县内“三山两槽”地形纵向由北蜿蜒向南。中山上有个九峰公社，他家就在山上中心大队四方井生产队。

过去，他父亲刘天模是有名的华蓥山游击队的老交通，他的家，自然就是联络站了。真具有点传奇色彩。

别人说刘家风水好，一连生了七个儿，一个女也没生。解放后，从父亲到儿子，个个都是共产党员。

大哥刘长建，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转业后人民大学毕业，达县农科所所长。

二哥刘长维，参加过西藏剿匪，武汉飞行大队飞行员，九峰公社党委书记。

三哥，邻水县委干部。

四哥，参军转业回邻水，邻水县财政局局长。

五哥，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省公安厅、达县公安局干部。

老六刘长珂，初中生，公社信用社主任，金融系统革命接班人。

老七刘长举，在部队当兵。

他的家在当地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庭。



前排右三为王远玲

我的家庭成分是伪军官，算“黑五类”。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妈妈是医生，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文职官员，懂三国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是重庆建设兵工厂的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我家自然遭到厄运，家被抄过三次。爸爸过去身着旧军装的照片，甚至还有撤退到台湾的飞机票都被抄了出来。爸爸被隔离反省，最后被开除了公职。

1964年初中毕业时，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管你在校是多么优秀，肯定落榜，命定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我毕业后便上山下乡到了九峰公社林场。

林场离公社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去了没多久，公社小街上的人和知青都熟识了。

林场几年嘻嘻哈哈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68年底，“社办场”砸烂了，老知青也就地落户了。

和刘长珂早些时候就相识,要说有交往那是撤场插队这段时间开始的。

他当时是九峰公社信用社的主任,党员,23岁。相貌平平,个头也不魁伟,但还是清清秀秀的。

他二哥刘长维时任公社书记,县里区里亲属关系也多。他自然而然成了革命接班人,年轻轻一个初中生进信用社没多久就当了主任。

我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管家庭成分有多坏,总还有顶革命的帽子顶在头上,说是受法律保护的。

从这时起,我便开始了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生命之旅。

落户选队的事全靠刘长珂的二哥,是他亲自给我安排的,我和同场知青李开蓉插到了街上那个队。

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刘书记对落难中的老知青十分关心,特别是对我可以说爱护备至。那天在街上遇见他,只见他向我走来。

"王远玲,我看你和李开容最好在公社街上那个队落户。"书记口气亲切态度随和地对我说。"你不能干,但家庭条件好;李开容能干,但她家庭困难。你们俩在一起好互相照应。"

"哎呀!我就是做不来事,你是啷个晓得的噻?"我一串串哈哈笑。

"在林场你是出了名的,我又啷个不晓得!你看嘛,粮站、邮局、供销社哪都隔得近,生活方便些嘛!"

书记的关怀,让我很受感动。

我想:街上那个队虽然工分价值比起最好的队来并不算高,只能算中等,但我又不图那个,我图的就是个方便。还把开容姐安排在一家,算是和我心想一样了。

我郑重其事地望着刘书记说道:"刘书记,真的哟!是不是就这样定了?"

"当然一切要看你自己了,我只是给你建议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书记的关怀下选队的事一槌定音,别人想都想不到,我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和李开容在街上生产队落了户。房子是生产队新建的,必需的家具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外加猪圈、粪凼,一样都不少。

新屋离公社也只一步之遥,就在公社后面的小土坡上。

我胆子特别小,怕黑夜,怕毛毛虫,春雷一响,我从梦中惊醒,赶忙把开容姐抱得梆紧,嘴里直叫"开容姐,开容姐"。

李开容其实和我是同学,并大不了我几天,因为家庭困难,也就没我那样娇贵罢了,总是处处让着我,呵护着我,真像大姐姐一样。

那年冬天,公社成立宣传队,主力当然是知青了。刘长珂喜欢吹笛子,也钻到宣传队里来了,和大家混得很熟。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会唱会跳,还能编,在学校汇演时还得过奖,在公社宣传队绝对是主力。

刘长珂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人,言语不多,但他会献殷勤,节目排晚了,时不时还送我回家。

我早就知道开容姐喜欢刘长珂,在家来来去去也很自然。刘长珂土生土长,手脚也勤快,到家来总是帮着忙前忙后的,倒也处得很融洽。

时日一长,小街上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说刘长珂在和王远玲耍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原以为刘长珂追求的是开容姐,哪晓得自己早已卷入了蓄谋已久的爱情旋涡。

县里搞文艺汇演,刘长珂鞍前马后不离左右,把我们吃饭住宿都安排在县人民银行。

有次吃饭时,刘长珂一亲戚陪桌,席间他突然玩笑似地对我说:“我看你们俩还有点缘分,硬是天生的一对,地作的一双,各方面都配得齐。”

过后我问刘长珂这是何人,刘长珂道:“他,是行长。”

有了行长的话探路,刘长珂的胆子也大了。一日,他找了个机会,便单刀直入。

“我们两个耍朋友嘛,别人都说我俩有缘分!”

“爬哟!哪个跟你耍朋友啊!你不是喜欢开容吗?哪个又要和我耍?”

“哪个说的我喜欢她!我只喜欢你!”

“不行,不行,要不得,要不得!”

其实我心里明白,刘长珂早就在打我的主意,只是觉得开容姐喜欢他,自己压根就没朝这方面想。

李开容早就清楚刘长珂看上的不是她而是我,她也说不出口,其实心里很难,就任其自然罢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李开容认识了叫蒋三的男朋友后不久就搬出了我们的家。

开容姐一搬走,家里天天冷锅冷灶,烟囱没冒过烟,一天到晚有一顿无一顿的。反正离公社近,我干脆到伙食团去搭伙。

这样一来，那条从公社到我的知青屋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小道上，常常看到我和刘长珂的身影。

夜深人静，那条小路像一条通向黑暗，走向幽冥的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尤其是想到还要穿过坟堆堆，更令胆小如鼠的我毛骨悚然。

一天夜里，刘长珂打着新装电池的手电一路呵护着我回那土坡上的小屋，打开龇牙裂缝的木门，点燃眨眼的煤油灯。一切安排妥帖，他准备返身回公社时，我似乎从梦中坠落回现实，陡然心生害怕，没有人的陪伴，我孑然一身在这孤独的土屋里哪能安睡，禁不住打起了寒颤。我赶忙追出房门用发抖的声音叫住了刘长珂。

"你一走我就怕，怪头怪脑地乱想。"

"那啷个办咧？"他试探着问道。

黑森森的山，迷糊糊的林，时时有犬吠声声，农家院落已熄了灯火，唯有公社的屋院里映射出昏黄的电灯光。

"有我在你还怕啥子嘛！"他话语间顺势牵着了我那纤柔的手。我赶忙抽开了已冰凉的小手，姑娘时的那份敏感与矜持即使在怯懦时也让我保持着一份清醒。

"就让我留下来陪着你嘛！"

"不行不行！"我态度很明确，很坚决。

到那时，我们相处已有些日子了。他从来不对我动手动脚，言谈举止也很得体，除了那浓重的邻水土语腔调，很难让人看出他是乡下人出身。

"到公社去找个地方住嘛！"是央求，是撒娇，似乎都有，我边急跺着双脚边打着哭腔。

对我的要求，他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

吹了灯，锁了门，我们又向公社走去。一道晃晃悠悠的电光在那山路上摇曳着，比去的时候还慢了许多。

从那晚起，我便和公社妇女主任同床共寝了。后来连被盖都抱了过去，把公社当做了家。生产队分的粮，包括玉米红苕，粮站都给换成了粮票交到公社食堂，除了给钱，我一概不管，啥都有人帮着干。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书记的亲戚的亲戚、老表的老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让我感到了人间的真情与温暖。

俗话说日久生情，刘长珂火火的追求和亲亲戚戚们有意无意精心的照顾，让我对他们心生感激之情。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对照耀她的艳阳，岂能没有反应！更何况处于那种环境、那种年龄的姑娘了！

那些天，妇女主任也像大姐姐般按照她的人生经验给我谈起了婚嫁之事。

“不怕你笑话，农村俗话说豇豆要插簪，妇女要靠汉。”

“靠汉靠汉，穿衣吃饭。”

“我们农村人讲实际，一个家庭也要工农结合，妇女操持家务，男人在外工作。像刘长珂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有几个？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时至那时，我的的确确还没认认真真考虑过要朋友甚至结婚成家的事情。但摆在眼前的路又不得不让我思前想后，认真考虑起来。久之则食不能甘味，睡不能安寐，着实苦恼了好多天。

我本是爸爸的乖乖女，从小最听爸爸的话，在哥哥和弟弟三人中间，爸爸也最喜欢我。可是，自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开始，我便完全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

学校的教育和一年比一年更厉害的阶级路线，让我从社会和学校生活中感受到一个孩子不该也承受不了的政治压力，始而怀疑起我所崇拜的父亲从小对我的人生教导，特别是把落榜归咎于父亲的履历。

我一气之下偷出户口，完全不征求父母的意见上山下乡去了。

而爸爸却理解人生，理解社会，更理解女儿。他对我说：

“我一生中走错了两步，一是在黄埔最后一期毕业时没有跟陈伯达等共产党人一起走，二是要解放时拿到飞机票都没有到台湾去，不然就不会让你们跟着我活受罪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哪能解读父亲这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感悟！

现实生活的惨烈更激起我对父亲的反感，最终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再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都吃家庭成分的亏了。

那个年代，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林场时就规定了两年之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然就是作风不好，轻则受批判，重则受处分。对羞于启齿的“爱情”二字从不公开谈论，只能自己去意会了。

对刘长珂的呵护和他众多亲人们良苦用心的关照，我是心存感激的，但对他的感情并没有触电的感觉。

刘长珂见我迟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他的爱情，便使出了杀手锏，在我面前海誓山盟，长跪不起，甚至以跳岩、上吊寻死觅活相威胁，逼着我下决心明确恋爱关系。

我又不是一个怕要挟的女孩，但从他的行动中我体味到了他爱之切、爱之真、爱之深的那一颗鲜活的心和难能可贵的情。

想起自己在农村孤立无助的处境，想起自己由于成分不好所吃的亏受的罪，我的心扉开始向他敞开。

我问他究竟爱我哪一点，他说我样样都好，十全十美。

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

我对他讲："我家庭成分坏得很！会连累你，世世代代都要受影响，子子孙孙都伸不到皮。"

他哈哈大笑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得意。

"你成分不好没得关系，我好噻！有我们家的保护你还怕啥子！在九峰，在邻水没有走不通的路！"

看到他那得意的模样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把话题一转。

"你也该算知青，你也是初中毕业生噻！"

"我算哪门子知青哟，和你比，我是乡巴佬！"

我知道他羡慕城市生活。他羡慕知青，因为知青是城里人。

在我看来，他人品不错，忠厚老实，有文化有知识，家庭也没得说的。在农村生活，有这样的人相伴，有这样的家庭撑着，也就放心了。

于是便答应了带他到重庆见父母大人。

本该充满浪漫温馨的归途却变成苦涩酸楚的旅程。

父母，特别是父亲没有接纳他这个"乘龙快婿"。在目光炯炯气宇轩昂的父亲面前，刘长珂低眉颔首，一言不发，问一句答一声，显得格外老实。殊不知，有军人气概的父亲最讨厌这种癞蛤蟆式戳一下蹦一下的"闷生"，他说这种人的心思不容易摸透，阴倒干，缺乏阳刚之气。

最要命的还是门不当户不对，"根本配不上我的女儿"，父亲一脸不悦地对我说。

俗话说"女朝爹来儿朝娘"，我很有些父亲的脾气。

事情不做则已，要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即使错了，也要一错到底。真有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犟劲。

父亲以"一切后果自负"绝情断义的正告送走了我们。

然而我也没有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改变"私定终身"。

我认定了他的人品，又有一个革命家庭，我这辈子可以脱胎换骨了，子子孙孙也不会像我一样吃成分的亏受成分的罪了，在农村生活也有了一个依靠。

决心已下，即使是堆狗屎，我也吃了；哪怕是火坑，我也跳了，一切都豁出去了，甚至命都可以不要了。

1970年初夏，我和刘长珂在公社扯了结婚证，择吉日在九峰公社中心大队四方井生产队他们刘家，按照农村改革了的新风尚，新娘不坐轿来不哭嫁，也不要那些烦琐的仪式，只是办了酒席，招待亲朋好友。就是这么简单，刘家也闹腾了好几天。在外的哥嫂侄儿侄女能回来的都回来了，七弟在部队，没能回来。

叫我最开心的是各位哥嫂把亲亲的大大小小的侄男侄女喊到面前认亲。

“六娘！”“咧！”奶声奶气的叫声连着脆亮的一串笑哈哈。

“六娘！”

“六娘！”

我在众亲人眼里像演员一样漂亮，活像“七仙姑”下了凡。

那脆嘀嘀的叫声融进浓浓的亲情似一片祥云萦绕在刘家屋院。

好兆头，我们刘家人丁会更兴旺，世世代代会更发达。

公公婆婆看着我这个新进门的媳妇，既喜上眉梢又隐忧心头。

婆婆笑盈盈地拉着我细皮嫩肉的手心疼地说：“看你这双嫩生生的手哪里是做活路的手哟！以后恐怕要难为你了，你屋妈真要是看到怕会心痛得要死的。”

公公一边用竹片编织着背篼一边插言：“只要勤快，农村也一样的活人，一样的养家！我们几十年不就是恁个过来的嘛。”

我急忙表了一个态：“我和长珂说好了，进了门就是一家人，二老放心，吃苦我不怕，只是不会不为怪，我会慢慢学的。”

公公笑道：“那当然喽！重活不是你干的，不会的多问问，我们会教教你。”

刘家大院呈东西走向八间正房一字排开，大娘二娘住东头，我和公婆住西边，中间是堂屋。

厨房、柴屋、猪圈各家皆齐备。

门前一大三合土晒坝，屋后是竹林，还有好多棵果母子树，桃李橘梨橙样样齐全。

农村儿大要分家，大娘、二娘自己开伙。我进屋与公婆同住，一锅吃饭。

我是个要强的人，生活习惯要按城里的来。洗脸的盆归洗脸，洗脚的盆归洗脚，各人一套。锅儿碗盏该换的也换了，白瓷碗碟小瓢羹，铮亮的铝锅铝水瓢，换去了粗碗黑铁罐，我把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老习惯硬给改了，这给家吹来了一股扑面的春风。

长珂一切依着我，领得的工资也一分不少全交给了我。

我父母说话也算数，为了惩罚不听话的我，自我们结婚就没再寄钱了。

我过门不久，便当起了大队耕读校的教师。学校就在家对面湾里，不远，上课吹哨子都听得见。上午九十点钟听到吹预备哨时才赶去，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回家吃午饭。

顺便在那湾里（院子里）我还开了小店，卖点针线毛巾、油盐酱醋、煤油、作业本之类的小百货、小文具，既方便了社员，又找几个小钱。

公公年纪也大，年届古稀，加之腿脚也跛，劳动不得了。

上山打柴的事情我也硬揽过手，大娘二娘都靠自己，我还能靠公公不成。

开始时公公和长珂手把手教我用竹篾条捆柴的方法，手被划破流血是常事，用扦担（一种两头装上铁的尖式扁担）"杀"柴捆时，累得满头大汗也起不来身。从小捆捆开始，天长日久，也就熬过来了。

小闹钟到早晨四点半就叫醒了我，天不亮就上了山打柴，回来再吃早饭。下了学，扒几口饭又背背篼下地割猪草，晚上还要辅导上小学的侄男侄女……随那日出日落，周而复始。

转眼就到了冬天，我已有了身孕，渐渐出怀。

我已不是过去的模样。荷锄能种地，打柴能上山；上得课堂，下得厨房；饭要煮，猪要喂，自留地要种，浆洗补连样样会，外搭还要伺候年迈的公婆。就连身怀六甲也要到田边水井去挑水，农村女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农村女人不能干的我都能干。

长珂在外忙工作，经常回家都晚，家里的事一点都没操过心。

有次到县里开会，那天回家早，几十里山路走得肚子咕咕叫，脚刚进屋就叫道：

"今晚黑吃啥子？"

"吃啥子，吃红苕噻！"

等他揭开锅盖一看：

"咿，哪个还蒸得有碗白米饭？"

他心想自己的媳妇硬是好，晓得疼各人的老公。

他欲伸手去端碗。

只听得一声"搁倒起！这哪是你吃的，是给大大（跟孩子叫爷爷）蒸的"。

啪的一声响，伸出去的手被打了回来。

"真的呀？"他惊诧地瞪着我。

"你不信，各人去问大大好了。"

此刻，在屋里听到说话的婆婆发话了：

"是的，每天都是恁个的，一个冬我们难得吃颗米，就是你老汉个人吃呵。"边说边在捶背。

长珂一听，两个眼睛都睖起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搂着我的腿，头紧贴着那腆出的肚子，泪水刷刷往下流。

长珂也是有情有义有良知的人啦，心想，是他自己命好，天下哪去找这样孝敬公婆的好媳妇啊！

他被感动得心潮翻涌，音咽气哽，泣不成声，长跪不起。

九峰山高，冬天大雪漫山，气候寒冷。农村老人到了冬天要"凝冬"，特别是山区，吃红苕包谷多，老人口无味，吃不下。

入冬以来，我都专为公公蒸碗白米饭，还经常打酒割肉，孝敬公婆。

我的好孝心生产队甚至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大娘二娘也佩服我。家里有事都爱和我商量，要我拿主意，信服我。

过了旧年，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经霜雪扎了的麦子绿油油黑墩墩直往上蹿，小春作物丰收在望。

我的身子越更天天挺出，只好蹒跚着走路，直硬着腰上灶。开学了照样上学教书、开店。

看我这样，公公婆婆反倒心痛死了，总是要我歇着养身子。

大娘二娘都是过来人，总是热心热肠教我准备坐月子和小孩儿所需的东西。

去年秋天就专门喂了一窝小鸡，叽叽叽已长得一身羽毛油光水滑。老母鸡下的蛋、杀年猪最好的边油、发醪糟用的糯米，坐月子所需的食物，应有尽有。

快要当父亲的长珂春风满面，回家更是勤快，帮着干这干那，对我也体贴入微。

1970年农历4月17，一声婴儿的啼哭，让守在门外的长珂、公公婆婆、二哥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落了地。

异口同声道："啊！是个儿！"

刘家又添人进口了，大人孩子都喜上眉梢。

在农村，女人生孩子，生死隔着一张纸。

我人年轻，自从有了身孕，吃的东西讲营养，土洋结合，又不停地劳动，顺顺当当给刘家又生了一个乖孙子。

农村"坐月"规矩很多，有很多忌讳。头上要包毛巾帕，不能洗澡，还要忌口，好多东西都不能吃。

我在林场当过卫生员，学过一些卫生常识，母亲又是医生，也听说过不少医学知识，特别注重产后的卫生，婆婆的话、大娘二娘的经验，该听的才听，不想听的也就不听，他们只好依着我。

远在重庆的外公外婆得知有了外孙，气也随时日烟消云散，赶忙寄来了娃娃的小衫衫、小被盖之类的一大包东西，虽没有明确接纳女婿之意，表示了对我的宽容。或许是一种默认，或许是一种无奈，但却沟通了断绝近年的父母子女情。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我的生活似一潭死水，平静得使人麻木，让人窒息。我遗忘了时日，遗忘了外面的世界。

全身心都奉献给了我的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锁在了那狭小的空间里。

偶尔，只有我以前同班的知青朋友回渝路过时，会带些消息给我：

"知青开始调回城了，当然第一批都是成分好的新知青。"朋友对我说。

"我安了家，又拖娃带崽的，已经没有资格回去了。"

"你真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

"你看咧，那还有假？"我随口答道，接着又是几个笑哈哈。

"你还是原来的样儿。"

"不，自从有了毅儿，好像一切都变了。"

春去秋来四季往复，毅儿都两岁了。我除了上课教书、开店，还兼任了生产队的记分员，放学后就到地里逐个点名记工分。我干事认真、公道，得到社员们的信任和赞扬。

寒暑假和节日，我还同社员一起上坡劳动，尽量多挣点工分。

长珂的工资再加我的勤劳，家里没有衣食之忧。

寒来暑往，霜打风吹，烈日暴晒。繁重的家务操劳和生产劳动在我那白净的脸上已刻下了道道印痕，能干的双手也早起了厚茧，此时的我诚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能文能武的农妇，毫不逊色于邢燕子、李敏其那些原来的标兵。

那年辰还没规定计划生育。不多久，第二个孩子又上了身，我还算怀得稀的。

农村女人真苦，既是劳动的机器，又是造人的机器。

长珂也没有原来那样回来得勤了，说是信用社工作忙，常加班加点，累了就歇在了公社。

白天累了，晚来搂着孩子直睡到天亮。

成天就是那些事，好像什么也不想，是满足了还是麻木了，我自己也说不清。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长珂乱搞女知青"的事在外已传得纷纷扬扬，最

终还是传到了我的耳里。

“鬼才有那事！又不晓得哪个砍脑壳的造他妈的谣！”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种事。心想：我才不相信全公社还会有哪个女知青比自己还强，还逗人爱！自己的男人自己晓得，他不可能去爱别人。

我搜肠刮肚在心里逐个把女知青排起队来，无论怎样也找不出一个比自己还强的人来。

那天长珂回来我问起这事，他死个舅子不承认。

二哥回家来，我把他请到堂屋，寻根究底地追问，他也闪烁其词，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来是我的一个学生的母亲，也是我十分要好的朋友证实了这事。

“六嫂，你要作个准备才是，是有那事，她叫苏文华。”

我赶到公社，翻看知青登记的花名册，才把情况弄清楚。是个落户到亲戚家的新知青，我找到她，看她究竟啥模样。

原来不咋样，个子矮小，像个娃娃。问她，只是笑，不回答一句话。

我怎么也搞不懂，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我才意识到，长珂变了，他骗我好久了。

在事实面前刘长珂低下了头，承认了有那回事，说是她找的他。

我听到他亲口承认了这事，顿时只觉天昏地暗，心一阵撕裂般疼痛，身怀有孕的我几乎晕倒在地。

是理智战胜了感情，还是这几年生活的重压已把我变得愚钝，我没有表现出呼天抢地的号啕，甚至没有一句责骂，强压住了心里的愤恨。

我的心告诉自己，今生今世我的爱情从那时起便死亡了，海誓山盟是靠不住的。

没几天我便冷静下来了，瞻前顾后，从全局考虑，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我对刘长珂说：“要保你无事，要保全这个家，只有离婚，你去和她结婚。以后你们过不下去了，愿回来，我们还可以同到老。”

我还想保住我行将就木的婚姻，中国女人从来都会这么做。我很传统。

刘长珂痛哭流涕，不言不语只是摇头。

1973 年刘长珂因犯破坏上山下乡罪被判刑七年，送到宣汉县大山里的监狱服刑。

我那时已生下二女儿，听到消息，我没流一滴泪，但好多长夜未能眠。自己该怎么办？我一时竟没有了主张。

在家的二哥二娘、大娘、公公婆婆轮番地安慰我，一边骂刘长珂没良心，一边又劝我看远点，身体重要，娃娃重要，熬几年就好了。

多少天来，我只是听着众人劝，一直缄口不说话。

我内心的苦谁能理解，心里那么多疙瘩哪个又能解得开？难道这就是命么？自己的命为什么会这么苦啊！这不都是自己找的么？

我想来想去，不思饮食，人也直见瘦了，脸也不见了血色。

远在故乡的父母理解自己的女儿，劝我离婚迁回重庆，把儿女都带回去。

我咬紧牙关，把心一横，那股犟劲一上来，不就挺过来了。

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对父母说："看着那一双儿女，我心也就软了下来。不能看着她们有娘没爹，我不能走啊！"

我仍然上我的课，开我的店，挣我的工分……早晨太阳慢慢爬上山来，傍晚徐徐落下坡，时日似乎越来越长了。

仲夏一日，炎阳已偏西。老同学路过我家，我正在自留地薅红苕，便放下手里的活，转回了家。

"又回重庆去了来嗦？哪个走的时候路过都不来坐会呢！"

"那天你不在，走得急。"

我们在厨房外小坝坐定，吹吹牛，摆点龙门阵。

"你变了，咋个瘦了呢？"

"是么？我倒不觉得，拖娃带崽的又哪个不瘦嘛。"

"现在可以办顶替，你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可以顶了嘛。"

"你看我这个样子走得脱不？他们得让我走吗？唉！"

"莫非你还要等刘长珂回来？"

"哪个想等他，我是看两个娃儿可怜，不然的话……"

秋雁"人"字儿排开列着队向南方飞去，掠过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新知青一批批回去了，老知青个别有门路的也走了，没走的望着回城颈子都望长了。

我和他们想得不同，巴望不得宝贝儿女快点长大就好了。

我们刘家三妯娌相处得十分融洽，大嫂二嫂虽没多少文化，但都是朴朴实实的。

晌午时分，天下起了毛毛雨。大娘掐着从地里拔回的收头海椒秆上的嫩尖尖，喊着我说："今天我弄样菜肯定你们重庆大城市的人没有吃过，包你说好吃嘛！"

"要得嘛！你弄的啥菜我哪样没吃过？那我和大大今天就光焖点豇豆饭来吃好了。"

说笑间，大娘就把用海椒叶嫩尖尖和着些小青椒炒的水盐菜端上了中间堂屋的桌子。

我用筷箸夹着尝了一口，辣呼呼香沉沉真是好吃。

二娘听说也凑过来尝稀奇，"我在农村恁多年都还没吃过呢！"边吃边笑好不融洽。

不一会二哥刘长维从公社回来了，还没吃饭，二娘赶忙说："那我们今天就吃面，弄起来快些。"转身沿屋檐下回了屋。

公公听说午间吃豇豆焖饭，手提箢篼到菜地摘"罢脚"豇豆去了。我看着天雨未停，溜天滑地的，担心公公年纪又大，腿又跛，摔倒了咋办，便去地里接公公。

炊烟袅袅，细雨蒙蒙，风吹山雾，似淡还浓。乡间多闲适，危难见真情。

我跟在公公后面回走到屋前大晒坝边，忽听二哥刘长维在高喊：

"糟了！你们二嫂死了！"

公公一听，惊吓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我赶忙抢前扶住了他。

我也慌了神，提着豇豆朝二娘屋边跑边喊："是啷个搞的，刚刚都还是好好的嘛！"

家里人都朝二娘屋跑。大娘站在二娘歇房门旁，手捂着半边脸，想看又不敢看，吓得瑟瑟发抖。孩儿们紧随身后，惊恐地张着双眼，使劲扭着大人的衣服。

我赶忙拨开前面的人，站到头里，也不敢靠前。屋内靠着玻瓦投下的昏暗光线，只见二娘挺在大床上，双手把满是尘灰的印花蓝罗帐已扯下了一角，满嘴冒着一大堆白泡子，瞪着恐怖的双眼，僵硬地扭歪了颈。

"二娘，二娘，你啷个了噻！你啷个了嘛！"我急跺双脚哭着叫喊着。

突然，二娘似乎有知，双手又使劲扯动了那罗帐后便无动静了。

桌上，还摆着两碗未吃完的白面条，一碗只吃了点，另一碗所剩无几了。

二哥刘长维呆坐灶前，木然地吧嗒着叶子烟。

大人娃儿都憋着大气不敢出，屋内死一般静寂。

我走进厨房，大声责问二哥道："才好一会嘛，啷个一个大活人说没得就没得了噻！我们刚才还在一起吃咸菜炒海椒都是好的，啷个会眨个眼睛就死了嘛？"

人命关天哪，我又急又怕，家人都瞪着双眼看着我一个人又叫又喊。

刘长维阴沉着脸，不发一言。

那一刻，时间停止了流逝，站在空气凝滞的屋内，人们屏住了呼吸。

雨越下越大，我似乎听着老天爷也在哭泣。

我愤愤然对公公说："未必是吃了啥东西啊？海椒炒咸菜，我们都吃了的噻，我看……"

还没等我说出口，公公急忙开口道："哎呀，莫说了！人死都死了，说了还有啥用！"

转过身公公干个人的事去了。

我找到大娘说："我看这事有问题,二娘怕是吃了耗子药才死得恁个快,好好的人啦,说死就死了。"

大娘听了,生怕我说漏了嘴,把家丑外扬了,急忙说道:

"你莫乱说,你又没得啥子根据！人都死了,关你啥事,算了算了。"她这一顶撞,关了我的话匣子。

二娘有产褥热病、哮喘病,怕过冬。生了两个女儿再想生个儿子也生不了。二娘性格和善,在家相夫教子,哪个会出这样的事！

她娘屋没有爹妈了,只有一个靠公社救济的五保户的单身兄弟,以前是林场的老场员。我对他讲到她姐姐的死和我的疑惑时,可怜他号啕大哭着不停地摇动着那毛发稀疏的脑袋,紧咬着双唇不愿吐出一字一句来。

二哥是公社书记。那以后,我没听到过任何一个人提起过二娘的事。我迷惘了,只能仰天长叹:"这世道啊！人都在干些啥子事啊！"

三个月过后,新二娘又接进了屋。

新二娘是过婚嫂,但人年轻,比二哥小十几二十岁,还带来一女。可过来不久就给二哥生了个儿子,这下她也有了翘尾巴的本钱。

新二嫂好吃懒做,自私,经常一个人在家煎蛋吃,还嫌弃二娘生的一双女儿。

二哥回来,我动了恻隐之心向他告状:"你要不信,找大大来作证！"公公总说:"是恁个的！""你还不信？那喊娃儿过来问！"可憎二哥哪个都不说那婆娘一句好歹！

刘家的风水转了,妯娌间的和谐不见了。

名存实亡的婚姻让我寒心,分崩离析的家让我痛心,我悔恨当初没听父母的话。

我这辈子怎么过都没什么,儿女的前途才是我心之痛。

不敢想象毅儿长大读书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娃儿的老汉是劳改犯！

我还常梦见二嫂被毒死时瞪着一双大眼恐怖的情景。

我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决定带儿女离开这个不堪回首的地方！

父亲从重庆赶来,蹲在合流区上,帮我办理离婚手续。

刘家从老到小都不同意,我只身跑到宣汉大山里的监狱要刘长珂在离婚书上签字,他坚决不签。他知道他家里人给他撑着,我拿他没办法。

一张无形的网把我死死地网住了。

这次诉讼我失败了。

“文革”后我爸爸平反昭雪了，还补发了两万多块钱工资。家中条件好多了。

那年寒假，听说姨妈从美国回来了，好想看我。我携儿带女回了重庆。看着满脸沧桑的女儿拖儿带女回家来，母亲真不知说什么好，又高兴又辛酸，把外孙和外孙女看了又看，抱了又抱。

多年不见，都年过半百的姨妈还是那样年轻漂亮。她拉着我皮肤粗糙满是老茧的手说：

“小玲，你变化太大了。你小时我没少抱过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好乖的一个娃娃哟！”

看着眼前的我，她的双眼湿润了，哽咽着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当她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时，一言未发，沉思良久，表情肃然。



退休后的王远玲

“你人太年轻，阅历太浅！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自己有选择的权利，而你所处的时代剥夺了你的选择权，造成了你现在的悲剧。”

“我是自找的，不怪父母，只是我不听话。”

“离婚诉讼现在怎么样了？”

“仍然没有消息，他们家在邻水的关系太多了，没办法！”

“不要灰心，你一定得行！”

时代变迁，神州大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时至1979年，我陪着父亲，坐镇邻水县城，为离婚与刘家进行了一场“持久战”。

刘家在邻水县城动用了县委、公安局、文教局、银行等单位所有的关系布下了一张无形的罗网。

三哥、四哥热情款待爸爸，轮番上阵游说并许下海诺：“六娘只要不走，工作任她挑选，供销社、信用社、学校，想去哪就去哪。”

经过几个回合，爸爸瞅准了关键人物是四哥，他不开口放行，刘老六是不会在离婚诉讼上签字画押的，还是会像上次那样风尘仆仆白跑宣汉无结果。

爸爸是铁了心的，也在公安局找了关系帮忙。我们干脆住进四哥家中，与四哥对决。

爸爸好酒，四哥亦贪杯，借酒兴吐肺腑之言，表儿女长情。回肠荡气，有理有义有情，说得四哥泪流满面，自知理屈，无以应答。

“是我们刘家对不起六娘，我一定帮助六娘满足她的要求。”

当即写信说服其弟在离婚诉讼上签字画押，但要求留下刘家的两个苗苗。爸爸执意不允，只让法院秉公判断。

我手握四哥的“尚方宝剑”急奔宣汉，刘长珂见到四哥手迹和二上宣汉的我，想到自己造的罪孽，不禁潸然泪下。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儿女一双，大势去了，他耷拉着脑袋半天不开腔，最后还是签了字画了押。

法院最后还是把儿女全判给了我。

我把那死亡了的爱情和婚姻埋葬在了巍巍华蓥山间。

1979年底，我带着儿女顶替母亲回到了重庆。

汽车在华蓥山间的汉渝公路上喘着气急驶，苍苍华蓥山越来越远，想起十年噩梦般的生活，醒来才觉后怕，但愿它像那远去的苍山，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

二十多天后刘长珂提前释放回到邻水。

我后来生了一场大病，支气管扩张，吐了半脸盆鲜血，医生说是积劳成疾，差点要了我的命。这辈子就落下了这病根。

（李忠公整理）

作者简介

王远玲，1964年重庆十七中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邻水县合流区九峰公社林场。1969年撤场插队。1979年顶替回重庆牙膏厂工作，1998年退休。

到"广阔天地"里去

蔡源远

1965年我高中毕业。在高考冲刺的时候,家庭问题的阴影时时影响我的情绪,像魔鬼缠身一样总也摆不脱它的纠缠。想到家庭的影响就感到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但心中仍存侥幸,总觉得凭自己的学习成绩和一贯表现上个普通大学问题不大。经过了艰苦的高考准备、难忘的三天拼搏之后,身心疲惫。

八月下旬,几乎每天头顶骄阳和朋友裘晓梅一同去七中,在校门口等邮递员送通知书。每天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同学、朋友收到川医、川大、同济、电讯的入学通知,我仍然在天天盼着。后来川师、重师的通知书也发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上大学的梦彻底粉碎了。那些日子真是度日如年。白天有事做,但不时发呆,精神有些恍惚;晚上无法入睡,常常一个人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真有痛不欲生的感觉。我觉得生活欺骗了我,我读小学、中学是那样努力,那样认真,但这一切都付之东流了。

八月底的一天,我去火车站送走了自己童年、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同窗六年的裘晓梅去重庆西农读书,回家的路上,心里十分怅然,以后怎么办?我下定决心上山下乡,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环境,到农村去奋斗一番,我想我也只有这条路了。

妈妈坚决不同意我下乡。她反复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没有川大好。"但我仍一意孤行,瞒着母亲到七中去报名。我去的时候,正巧有位老师在贴上山下乡的红榜,于是我请这位老师在最后加上我的名字。回家之后我给妈妈说我被批准下乡了。起初妈妈不相信,因为事前她亲自去找过学校,告诉校方我的妹妹已下乡了,要把我留在身边。当她知道我的决定已经无可挽回时,无奈地说:"那我就恭喜你了。"听到妈妈这句话,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号啕的哭声把多日郁闷在心中的苦痛宣泄了出来。

从19岁起，我成了一名游子，从此漂泊他乡。但成都和四川大学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魂牵梦绕的地方。无论我走到那里，成都情结不会淡忘。因此，退休了，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家乡——成都。

如诗如画的郫县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

1966年2月11日，我们一百二十多个16至20岁的青少年，乘坐几辆解放牌货车，来到位于郫县犀埔镇的四川省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刚下车，我就被眼前如诗似画的风光所陶醉，惊喜得无言表达。

放眼望去只见平坦无垠的川西平原上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油菜，在绿色的汪洋中镶嵌着大片粉红色的花，一打听，原来那就是苕菜。空气中弥漫着庄稼特有的清香，在笔直的机耕道上，奔跑着拖拉机。这真是风景如画啊！给我的第一感觉，这就像电影里苏联的集体农庄。

我亲眼目睹了绿油油的小麦变成金黄色的麦浪，平生第一次看到联合收割机，一个原来电影上才看得到的庞然大物，把小麦齐刷刷地割下来，又立即打成麦粒，装进一个个大麻袋。一辆辆卡车，把装满了小麦的麻袋运进了粮仓。收小麦的过程，全是机械化。被机器割断的麦杆仍在田里，被太阳晒几天之后，熊熊的大火，把它们全部变成了灰烬。

我们刚来时只有脚踝高的油菜秧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长成了小树般壮实的油菜杆，开出黄灿灿香得醉人的油菜花。养蜂的师傅们从北方回来了，无数的蜂箱整齐有序地放在油菜地边，蜜蜂在油菜地里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只听见嗡嗡声一片，如果你走近它，冷不防，蜇一下，痛得你红肿好几天。

收了小麦、油菜之后，拖拉机把大地耕了一遍，只见成都平原黑油油的沃土与天际相连，最大的一块田竟有20亩。成网状的大大小小的沟渠引来了都江堰的河水，把这片土地灌成了水田。一季庄稼收了，又一季庄稼要播种了。我感叹中国勤劳的农民，把成都平原的精耕细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回忆起来，我们在这个农场半年的时间里，主要的劳动就是收油菜和插秧子，因为这两件事还不能很好地用机械来解决。我们整整插了三个月的秧子，从早稻至晚稻。每天早饭后带上秧凳，去秧母田中拔秧子，把它拴成小捆，又用板车拉或挑到大田去插。每天在冰冷的水田里泡着，弯着腰踩着泥浆，干着重复的劳动。一上岸发现脚杆上爬着七八只蚂蟥，裤脚、裤裆常常是湿淋淋泥糊糊的一片，脚上手上脸上身上甚至头上都是泥浆，有时腰都直不起来了。早春时，清晨水田里的水冷得刺骨，到种晚稻时，中午下午太阳毒辣，热气上冲，汗流不断，不知是水还是汗把衣服打湿了又晒干，晒干了又打湿。那段时间我的指甲都长不出来，还陷进了一些。我常发自内心地感叹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几个月的劳动无疑是艰苦的。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大地脱下了金黄的外衣换成了嫩绿色的新装，看到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劳动者的自豪与喜悦。

在郫县农场从事的体力劳动，主要与锄头扁担打交道，尽管我每天累得腰酸背痛，但思想上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在这儿没有哪个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也没有天天周周月月烦人累人的考试。这段时间真是精神抖擞，身体结实。由于刚从大城市到农村，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加上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劳动中从不惜力，不怕脏不怕累，大有有志青年大有作为前途光明的感觉。

这儿的生活也相当令人满意，我们在农场每月发 17 元 5 角。吃饭上食堂，吃的是最好的新米，米饭白生生香喷喷；吃的菜则是农场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吃的肉是自己喂的猪牛。当时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寝室，寝室是刚刚才建成的，干净明亮，连一根钉子都没钉过。每个周末农场在晒坝放映露天电影。农场还有图书馆，可以借阅书籍；有广播站，我还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的播音员。

为什么在这新修的农场仅劳动生活了半年，农场就宣布撤销，安排我们离开郫县到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这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想不通的事情。在郫县的半年里我们与那儿的工人、刚大学毕业下放锻炼的大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真舍不得走。农业厅的头头们动员我们去凉山时，我天真地想另一个农场也会像这儿一样秀美吧。所以走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并不十分难过。

我们离开郫县农场时是 1966 年 8 月 16 日，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回来大家多次谈到如果晚走半个月，我们就会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也就不会去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也就少受些罪了。

蹉跎岁月——不堪回首的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

插完秧之后，还来不及收谷子，场部就通知我们：四川省农业机械化试验农场宣布撤销，我们所有的知青和愿意去凉山的原农场的轮换工到凉山普格五道箐农场。省农业厅的头头们说五道箐农场是一个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型农场，那儿将来山上放牧，山腰种果树，山下可种粮食养鱼，将变成一个花果山米粮仓。我们都不知道凉山普格在哪儿，只听说在西昌那边，听到这一宣传，我们都高兴得巴不得早点动身。

我们 8 月 16 日出发，几辆解放牌货车，拉着一百二十多名充满浪漫理想的知青，一路颠簸，摇摇晃晃地从成都出发。汽车开出成都后，平坦无垠的良田逐渐远去，进入眼帘的是丘陵地带层层梯田、起伏的公路，然后看到的是崇山峻岭、飞泉瀑布、山花奇石、原始森林、竹林，盘山的公路绕山的白云。对于我这个从小在成都生长、第一次离开成都平原

的人，沿途的风光真是美不胜收。我们途经雅安、荥经、石棉翻过了泥巴山，经过了大渡河，路过了西昌。一路上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欢声笑语不断，高唱革命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到我们西昌来……”为了更好地观看沿途的风光，我基本上是站了三天多。

8月19日，我们到了普格县拖木沟区。由于这一行知青来得太急，五道箐农场的干部还来不及安排。他们就临时把半山腰一个破烂的配种站打扫出来，分成男女两大间寝室。几十个人就睡在用木棒搭成的通铺上边，翻身都要喊一、二、三。房间用竹席子四处围了一下，房顶的旧瓦勉强能遮风雨，室内充满了猪牛羊的屎尿臭。

八月的凉山秋高气爽，山上长着野菜、野花，还不时看见大朵大朵黄灿灿的野黄花。虽然住在臭烘烘拥挤的大棚内，但初到这儿，心里充满了幻想和热情，心情还不错。

凉山五道箐农场有二百多人，主要由五部分组成。有原来的拖木沟林场留下来的十多个老工人及家属，他们是农场各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人都朴实勤劳没什么文化，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孩子。还有十来个1965年大学毕业学农的技术员，他们每月五十来元工资，是农场的干部。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万县人，他学的是园艺专业，大家喊他应大汉。他热情地教我们学习果树剪枝和嫁接技术，教我们如何栽培梨子、桃子、苹果。另外有十来个随我们一道来凉山的郫县青年农民，也都具有农民的优点和缺点，他们大概只有小学文化。另外是111个成都知青，57个南充知青。南充知青中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有的只写得起自己的名字。在农场里，当然知青的地位最低。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农场内工人、干部、知青的思想越来越混乱。这个农场本来就是一个筹建农场，以后还办不办？五道箐农场处在一个深山夹皮沟里，交通极不方便，严重缺水，土质很差，开垦面积有限，根本不具备办现代化农场的条件。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知青们不甘心长年累月重复单调的体力劳动，想念亲人思念家乡，思念文明、文化生活。这些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知青们成立了“12 · 20”造反队，农场渐渐瘫痪。1967年初，我和一些知青朋友回到成都。

这年二月，我和知青朋友到了北京，住在中国农业部，接触了一些到北京来造反的省内外知青。知青们共同的心声是，在农村干没有前途，想要回自己的户口，想回城，不想在农村、农场务农了。

回到家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上山下乡的真正含义。在家中闲耍，我成了一个无工作、无粮食（因为当时实行粮票制）、无户口、无地位的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考上了川大数学系，她经常要从我们家的门口经过。每次只要迎面碰上，她就赶快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几句。老同学虽然表现出热情、关心，但话语中的同情，更使自己悲从中来。与老同学见面之后，精神就像受到刺激，几天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住在家里，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带回的粮票有限，成都只有妈妈一个人的粮食定量，逼得妈妈常常找她的朋友要粮票，有时买黑市粮票来对付。后来1964年下乡的妹妹也从会东县回来耍，带回不多的粮票和钱。妈妈当时只有六十来元的工资。我每月有17.5元，这点钱要供养三个二十来岁的孩子，米面油不够吃，有时就买些四季豆、豇豆、洋芋、南瓜来充饥。

母亲供职于川大图书馆，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书籍，从小便养成了爱阅读的习惯。在成都吃闲饭的日子，我有更多的机会阅读中外名著。有两本书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本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狼》。这两本书主人翁强者的形象、坚强的毅力、不向困难服输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古典诗词也是我的最爱。这段时间，我还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两本唐诗、宋词。随后我把喜欢的一些书和诗词的手抄本带回了农场。1978年，我能在32岁上（为报考大学改小了两岁）挤进南充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大门，跟我当知青时热爱阅读不无关系。

我下乡之前生活和读书的环境很单纯，也比较封闭，接触社会很少，只是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完全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母亲在我五岁半时就与他离婚，我们三姊妹由母亲一手抚养大。我从小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干部，高中担任学生会干部。读高中时，我喜欢看《中国青年报》，常常把励志文章中的精彩句子用红笔勾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听到别人说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认为这人思想反动。在高中阶段我一直积极争取入团，立志背叛家庭，走革命道路，但就是入不了团。1964年，妹妹没有考上高中，母亲到处托人好不容易为妹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我却坚决支持妹妹下乡。妈妈的心在滴血，但女儿们全然不理会这些。

我下乡之后，特别是到了大凉山的普格县，才知道走出了繁华的城市，中国还有好多破败的中小城市，更有当时只有一条街的普格县，只有几排用石灰刷过的干打垒的平房和一所小学、一个篮球场兼晒坝的区政府。中国除了有都江堰的水滋润的出产丰富的成都平原，还有大量因缺水长满野草的黄土山坡。这就是我们农场的所在地——五道箐乡。

荒凉的五道箐乡同川大的人文环境、美丽的校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普格县是一个彝汉杂居的县城。彝族多半住在山坡上或山上。那时这里比汉区落后很多，农民的住宿条件、卫生状况都很差，彝族同胞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我曾到过普格县插队知青家去耍，就在我们到达的当晚，就发生了农民和知青的斗殴。农民并不欢迎插队知青，知青和农民的矛盾很尖锐。

农场瘫痪后，知青们到农场办公室找出了我们的档案。在我的档案中有这样的批语："出身剥削阶级，不宜录取"。我们农场有一百二十来个成都知青，1965年应届的高中、初中生中，有不少是关、管、杀、地主、旧军官、右派……的子女。这些都是被当时的阶

级路线、唯成分论打入另册的青少年。我们中多数人都是学习优秀，勤劳肯干，遵守纪律，很有上进心的学生，是愿意为祖国的建设效力的有用的人才。我真想不通，政策为什么不要我们升学？国家为啥要抛弃我们？为啥要这样对待我们？

在成都闲住的日子，我的一个好朋友、老同学、老邻居从攀枝花市回成都来探亲，顺便来看我。她当年因出身问题也没有考上大学，但就是不愿下乡。当时我认为她思想太落后了。这次见面，她谈到了自己如何躲过下乡动员，与妹妹一起到了攀枝花市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去当了名教师。谈到她的工作、工资和个人问题，她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相形之下，我为自己一腔热血积极下乡、现在是一名知青而深感自卑和沮丧，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不懂得社会、不懂得生活，多无知、多幼稚！我终于明白报纸上和学校的宣传完全是谎言！我们是被愚弄了。

我真是对不起含辛茹苦养育我们成人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16 岁就下乡，那时，哪个人不称赞她长得漂亮，真是一枝含苞待放的花。她体质不好，性格软弱，在艰苦的大凉山会东县插队八年。她一辈子命很苦。正如人们常说的“红颜女子多薄命啊”！

在这农场五年多的时间里，干得最多的就是开荒改田、起田坎。我们的主要成绩就是把场部前的乱石冈改成了梯田。锄头、钢钎、簸箕、扁担是我们每天的工具。几乎每锄挖下去都是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的用钢钎撬，小的用锄头挖。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垒成田坎。在劳动中我的手常常打起血泡。

五道箐农场虽然名字叫农场，但实际上仅是一个筹建单位，一切管理还未走上路，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6 年分来的大学生的工资比我们高，地位比我们高，但同样不安心在农场生活，同样对前途、婚姻、家庭感到茫然。每一次回成都探亲之后再返农场，我们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大家交换回家后的见闻，有不少人说宁愿回成都扫厕所也不想再在大山中待了。

有人说我们是“高级知青”，因为我们毕竟有 17.5 元的工资。在农场期间，我们的口粮到粮店去买，连蔬菜也要到附近农村，甚至到荞窝、西昌去买。由于蔬菜缺乏，我们早餐常吃炒盐就稀饭，中午晚上常吃南瓜、萝卜、白菜，经常不到吃饭时间就饥饿难耐，于是工间就跑去食堂舀碗米汤来充饥。

除了改田改土，我们不时要到螺髻山上去砍竹子、砍柴、拖木料。起初上山，觉得很新鲜，天刚一亮队伍就出发了。我们背两个馒头、一壶水、一把砍刀和一根绳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走累了，在大石头上休息一阵又走，汗水打湿了衣衫，模糊了视线。我们钻进了原始竹林，走进了原始森林，登高远望，真是“一览众山小”，亲近自然的豪情油然而生。多次上山之后，失去了对山的新鲜感，更多体会到的是上山砍木料的苦和累。特别是砍了木料之后，往回拖的路上汗如雨下，疲惫不堪，饿得有气无力。天快黑了，可是

离家的路还远……要何年何月才能走出这荒蛮的大山啊！

1968年后农场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期间，知青们以各种方式来打发白天和黑夜，来消磨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我和许多女知青一样学会了挑花绣朵做枕头套，学会钩花做窗帘……部分男女生喜欢下象棋，相当一部分爱好乐器，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其中拉二胡的最多。搞乐器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在晨曦中，在月光下，由起初的“杀鸡杀鸭”声，经过几个月的操练，不少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有的已进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农场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能歌善舞，常到周围社队、普格、荞窝等地演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这儿没有电，每天晚上点煤油，晚上的活动就是唱歌、拉琴、讲故事、发牢骚，早点睡。这儿很长时间没有凳子、椅子，几乎每间寝室都有几个表面光滑的大石头用来代替独凳。我们可以坐在石头上，以床为桌写家信，坐在石头上洗脚。这儿没有报纸，98%的人没有收音机，只有靠家中的来信得到点大山外的消息。当你走在公路上时，真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感慨。

大家在这赤贫的物质生活和赤贫的精神生活中混着，今天是昨天的翻版，明天又是今天的翻版。在这深山沟中我度过了20到24岁的生日。这是本该学习、工作的宝贵年华啊！我们这辈子就在这大山中生活吗？看不到一点希望和前途，不敢想象恋爱和婚姻。我对周围的一切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冷淡，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心情，似乎已看破红尘，我的心已经老了。

1969年5月凉山州政府派来了军宣队，而后又派来了革委会主任李肃仁。他来农场之后，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立功心切的他昧着良心，大整知青，整出了杀人集团、偷盗集团、收听敌台的反革命集团、造反派坏头头等等。一个才二百来人的农场，就有八人被打入大狱，有的被关押长达10年之久。当时的农场真是一片杀气，搞得鬼哭狼嚎人人自危，整得惨不忍睹。

1970年11月1日，我们一行十多人，首批离开了荒凉、恐怖、血腥的农场。不久，农场解散，知青被安置到了拉克铁矿、乌坡铜矿，十来个大学生和老工人都安排到了普格县农业局等单位。这样，拖木沟又恢复了五年前的寂静。但是五道箐农场的一切已深深地铭刻在这一批人的心中，永远无法忘却。

作者简介

蔡源远，1965年高中毕业于成都七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东5中队学员。

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

杨兴全

1965年9月，秋老虎肆虐，天空异常沉闷，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这时，四川省南江县安置办公室，首次向全县各知青林场发来通告，要求各林场认真学习通告，每位知青必须写一份心得体会。

通告如下：

通　告

陈春明：男，汉族，年龄：15岁。原南江县长赤区红光公社红光林场重庆籍知青。此人在重庆时整天在社会上鬼混，周身沾满社会恶习，在下乡到红光林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贯好逸恶劳，不但没有改掉以往的坏作风，反而变本加厉，伙同林场其他知青不务正业破坏生产，经常调戏女青年，流氓成性，并企图强奸本林场知青陈××。幸一老场员从屋外路过，陈××才得以逃离他的魔掌。这作风极其败坏的坏分子，现已被公安机关以强奸未遂罪逮捕法办，判处三年劳动教养，被清除出知青队伍……希望广大知青认真学习，讨论此通告，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更希望那些不积极生产，不务正业的一小撮人悬崖勒马，认真反省，争做新时期的新农民！……

天！才15岁！那时的知青都那么纯真，就如同一张白纸，他才这么小，能懂吗？

接到通告后的当晚，我所在林场就召开批判大会。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声讨、咒骂陈春明（以下简称春明）这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居然对同来的姐妹下黑手，根本就不配做重庆人，太丢重庆人的脸了！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早就该清除出知青队伍了，有

的知青甚至写信要求加重处罚……我们几个认识春明的同乡知青心情很是沉重,在慷慨陈词的背后更多的是疑虑。事后得知春明是被某些人给黑整的,但却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转眼12年过去了,1977年春节,我回重庆过年,偶然遇上春明,看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瘦弱微驼的身躯,我的眼眶湿润了。当握着他那满是老茧的双手,望着他红红的眼睛,两条汉子当街紧紧相拥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在他耳旁轻轻说:"兄弟,现在好吗?当年你为啥要那么傻呀!为啥不上告呀?"春明紧紧地搂着我,呜咽着对我说:"二哥,我冤啦!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啥事你都知道,我会是那种人吗?更何况那时懂这些吗?那时我家刚迁到北碚黄桷街道不久,就下乡了,在南江没待上一年就把我抓了,判了三年劳教后,就给弄到宜宾修铁路,一修就是12年呀。年年上诉可全都石沉大海,自己被如此冤枉有时真想不通,最初还曾想到过自杀,可死了这不更说不清了吗?黑锅不就背定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直到现在。我也是刚被释放出来,我一定要告到底,让他们还我清白。这些事林场的其他几个知青都知道,哪天你碰上他们问问就明白了。"接着春明就把他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这是一起因私欲、妒嫉所导致的冤案。

当年重庆北碚黄桷街道的这批知青下乡,到的是四川省南江县长赤区红光公社林场,大家来自同一街道,自然关系特别好,很是团结,相互照顾,如同亲兄弟亲姐妹。春明下乡时还不满十五,人又小又机灵,大家都喜欢他,更加照顾他,称他"小调皮"。林场有一女知青陈××,由于都姓陈,所以关系特好,陈××就像大姐一样关心、爱护着春明,春明整天姐姐长姐姐短地围着陈××转,活像跟屁虫似的。

林场除了知青以外,还有些当地的农民(场员)。红光林场有位老场员姓邓,他的儿子邓×暗恋上了长得清秀可人的知青陈××。当时下乡到穷乡僻壤的那些女知青,是山区的一道靓丽风景,她们的美丽和含蓄、学识和气质,倾倒了当地的人们。邓×很想对陈××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但怕在遭拒绝后,林场知青知晓,更怕惹怒众知青。当他看到春明围着陈××姐姐长姐姐短的,而陈××又时时关心、爱护着春明时,便认为春明是他获得陈××好感的最大障碍,就把心中的妒火集中在春明这小知青身上。于是邓某求助于老爹给他想办法,他老爹就想到了他的老表、林场场长杨林春。邓家于是隔三岔五地宴请杨场长,在推杯换盏中把邓×的心事告诉了杨场长,杨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事全由他做主,这些知青本就不服管,他早就想整一两个典型杀鸡儆猴,这事全包在他身上,一定把陈春明整得永不翻身,到时这女知青就会乖乖地嫁到你家的。这杨场长本大老粗一个,但他不惜为这事绞尽脑汁,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无中生有之计。

于是他开始四处找茬，对知青指手划脚，总是无中生有地找知青们的麻烦。日子稍长，众知青对他的抵触情绪加剧，事事都对着干，当面顶撞者有，背后骂他的也有，都认为场长是啥也不懂，是个成天瞎指挥的混球。春明和其他几个男知青就时常与场长发生争执，这正中场长下怀，于是杨场长频繁地出没于公社书记、社长等人的办公室，向头头们汇报、诉苦，开始了他苦心经营的无中生有之计。他还拉上老场员邓某为他作证，编造谎言，说什么林场的知青如何如何难管，安排的劳动从来不参加；那最调皮的捣蛋鬼陈春明常常带头起哄，讥讽老场长，还当众辱骂场长屎经不懂，是个笨蛋；还说什么公社领导全是蠢猪，怎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场长……杨、邓两人狼狈为奸、声泪俱下的丑恶表演，果然博得诸多的同情者。随着他俩的频频表演，公社领导对林场知青的看法大为改观，印象越来越差，公社领导开始寻找整治知青的时机。

1965 年 7 月的一个赶场天，杨林春场长照例出现在公社书记何某的办公室。何书记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询问林场的近况，而后又叫来社长与武装部长，再次让杨场长详细汇报林场的情况。杨林春哭丧着一张老脸说，求领导再派位场长，他实在干不了啦，这批知青他没法管了。公社各领导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他说，这可是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你不管也得管，回去先发动群众揪出典型报上来，杀一儆百，看这群知青服管不，那个带头搞事的陈春明就是个典型嘛！杨林春得到公社领导的一致支持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回到林场当晚，杨林春就通知几位亲信场员到家中开会，而后又叫来女知青陈××。他把公社领导的讲话传达了一遍，然后就让陈××检举揭发陈春明的劣迹，陈××当场愣住了，说："揭发啥呀！他平日挺好的，不偷又不抢，喊我来说啥子呀？""小陈，你晓得今天开会为啥只让你一个人参加吗？这可是公社领导对你的重视哟，你不是正在争取进步要求入团吗？今后的一切可就看你现在的行动了"。场长一连串的威逼利诱，吓得同样身处花季的女孩子阵阵颤抖。试想一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少女，此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遭受逼迫万般无奈的陈××终于妥协了，"那……那让我说啥呀？""平时陈春明这小子嘴里就不干不净的，你就写他时常在你们女知青面前讲下流话，有作风问题嘛！"场长提示。"要是我在林场写，大家知道了，那我脸往哪搁呀？"陈××胆怯无奈地说。杨林春见如此轻易地就说服了陈××，心里的开心就别提了，"这事好办，明天我上书记那儿请示一下，不会让你为难的。"第二天陈××就从林场消失了，问场长才得知她被公社抽调去搞什么黑板报去了。原来是公社领导为了方便给陈××洗脑，更好地控制她，才将她调离林场。为了整春明的黑材料，陈××违心地按照公社领导意图，开始写当时连她自己也弄不懂何为强奸的揭发材料。当要她写春明如何强暴她时，她也犯难了，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懂，这时多亏领导们的智慧和指

点，才集体创作出以下的精彩片段："那天场员们都上工去了，留下我与陈春明煮饭，我们先去山中挑水，回来正准备做饭，陈春明见四处无人，强行将我按倒在地，我不愿意就高声呼救，正好被过路的一个老场员听见，陈春明才慌忙溜掉了……"等等具体的细节。陈××照着公社干部预先写好了的抄下来后，不安地问书记："这样写要是被其他知青知道了怎么办呀！"书记安慰说："别怕，我们不会让其他知青知道是谁写的材料，何况这又不是在整他，这是在挽救他！"陈××哪曾料到，就是这份材料，结束了陈春明不到一年的知青生活，带给他三年劳教之灾，长达12年艰苦的筑路生活和屈辱的后半生。

在陈××回到林场的第四天后，场长一早宣布，早饭后全体知青集合，到公社开会。饭后，知青们迎着朝阳踏上崎岖的山路，边走边开着玩笑，有人说："安逸，好久都没开过大会了，说不定中午在公社食堂还整得到一顿肉吃！"这一说可把知青们馋得厉害！脚步也更加轻快了。"对头，要是有肉整千万不要和春明坐一桌，他娃抢起来凶惨了！""算了，大哥莫说二哥，你几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有回锅肉的话绝对包干，要是坨子肉我绝不与你们争！"春明开心地说。一路上知青们三三两两的有说有笑，只有陈××远远地落在后面一言不发。大家赶到公社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武装部长安排大家到公社小会议室就坐。一进会议室，就见公社书记、社长、区公安特派员阴沉着脸坐在台上，众知青隐约感到有些不妙。没过多会儿武装部长也来到会议室，问场长人到齐了吗，场长四处观望一番回答人齐了，这时武装部长宣布开会，并说首先请书记讲话。武装部长话音刚落，从门外走入几个彪形大汉，有两个站在门边，另外几个就站在台前，面无一丝表情地注视着会场。接着书记就开始他那千篇一律的讲话，什么国际呀国内的情况，县委传达的文件啦，一通胡扯以后就谈到林场上了。"林场的知青们，你们到农村大半年了，多数知青还是热爱集体、热爱生产劳动的，也能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可还是有少数知青整天吊儿郎当，出工不出力，还讽刺打击上进知青，希望这少数知青努力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走向正路。不要学个别知青，整天流里流气，游手好闲，满嘴的胡言乱语，他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而不自知。下面由区公安特派员讲话！"这时在座的知青一片哗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全没搞懂今天公社干部卖的是哪包药。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之时，区公安特派员猛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大声叫道："我们红光公社有没有坏分子？""有！"预先安排好的人一齐呼叫。"哪一个？""陈春明！""来人，把犯罪分子陈春明押上台来！"只见那几个早就悄悄站在陈春明后面的彪形大汉迅疾地猛扑过去，将春明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如老鹰抓小鸡似的架到台前。特派员继而摸出拘留证大声宣读："罪犯陈春明，男，汉族，现年15岁，因流氓成性，强奸女知青未遂，破坏上山下乡革命运动，证据确凿，依法对其刑拘。南江县公安局1965年5月15日。

把罪犯陈春明押出去！”当时的春明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吓傻了，一张脸煞白，浑身战栗，连话也说不出，就这样被拖出公社，塞进汽车绝尘而去。经过几小时的颠簸，下午四点多钟被关进了县看守所。

通　知

陈春明：

你对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被决定因强奸幼女犯罪，强制收容实行劳动教养叁年，提出申诉，现业已调查清楚，强奸幼女犯罪不是事实，应予否定。因此，撤销原强制收容实行劳动教养叁年的决定。特此通知。

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

抄送：南江县公安局。

陈春明平反通知

直到春明被押出会议室，众知青还是没能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看着众知青惶恐的神情，武装部长趁热打铁地威胁道："我看那些吊儿郎当的人，今后改不改？不改，陈春明就是你们的榜样！散会！"众知青垂头丧气地返回林场，心情很是沉闷，大家心里都暗自猜测："春明他可能吗？他平时是那样的天真可爱，到底是谁在陷害他呀！"

六月初，县人民法院判处春明劳动教养三年，而后押送到宜宾修铁路。这一去就是12个年头，直至宜宾铁路全线竣工后才被释放。回到重庆后，由于是"两劳"人员，非常受人歧视，任何工作单位都不愿接收他，他只有平时做点零活来维持生计（春明的父母在他服刑的第三个年头才知道他出事了，老人焦急万分，四处打探他的消息，直到第四年才知晓他在宜宾）。1978年7月，街道派出所通知春明，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给他的案子平反了，让他抽时间到达县领取平反通知书。春明听后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呀，这三千多个日子的屈辱终于结束了，长达12年之久的耻辱到头了，又可抬头挺胸做人了。第二天，春明就赶到达县中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默默地把平反通知书递给了他，没有赔偿金，往返车费还得自己掏腰包，居然连一句致歉的话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平反昭雪！之后，春明被天府煤矿招为大集体工人，现在还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但直到现在，单位连养老保险金都没有给他缴纳过，每月就四百多元的工资，还得养家糊口，春明今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

作者简介

杨兴全，重庆人。1964年8月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团结公社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8年参工到重庆天府煤矿大集体。90年代到西南大学劳动服务公司任职。2009年3月去世。

漂泊的孤魂

龚增玓

我时常翻看当年我们下乡时的照片，那是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的青春岁月。学校欢送我们上山下乡的合影静静地放在桌上，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如在眼前。那时候，我们也是如金似玉的风华少年，满脸的纯真和稚气。虽然我们品学兼优，也曾经做过许多的美梦，但是，我们生未逢时，那个年代讲血统论，讲贯彻阶级路线，需要我们这些小小少年离开课堂，离开家，背起背包，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脱胎换骨，我们不能理解，更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四十多年过去了，“不思量，自难忘”，看见照片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轻轻地叫着每个同学的名字，一想到那个与昨日岁月一同逝去不返，永远漂泊在大巴山上的孤魂，我的心里就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人的生命显得是那么的卑微和无奈。

我和刘鼎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家也住在同一所大学校园里。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他的父亲是敌伪人员，“文革”中都被关进了牛棚，在綦江鸡公山上劳动改造。

1965 年初中毕业，同样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继续升学，于是，和另外 21 个同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再读书的同学一起，怀着一颗虔诚而炽热的心，到了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公社莲花山林场。

下乡前，在一次表决心的班会上，刘鼎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在艰苦的劳动中炼“一颗红心、两手老茧”，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农村不入党我就坚决不回来”！

我们林场分为离县城稍近的莲花山和山更高更险、路更难更远，各方面条件更艰苦，山上只有四户人家的黄家山两处，相距三十多里山路。一到林场，刘鼎就主动要求上黄

家山，他说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实现下乡时的誓言。

我们是来锻炼改造的，怎样艰苦就怎样去做。在林场，刘鼎非常能吃苦，每次背牛粪（从牛圈往山上背）、背火灰（从山上往下背到沟里给洋芋施肥），他都是用那种最大的喇叭口大背篓，而且还要用打杵子把牛粪或者火灰使劲往下杵紧，好多装一些，牛粪还要堆出个"帽儿头"。修水库背土石方也总是比别人背得更多，那一大背篓牛粪、火灰起码将近二百斤，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劳动强度啊。看见他被压得龇牙咧嘴，憋得青筋凸起，那种痛苦的表情，我们心里都觉得难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背着背兜弯腰把东西倒出来，每次都是连人带背兜一起滚进牛粪里、灰堆里、泥土里，要咬着牙忍着泪才能再弯下腰，或者再直起腰，一听到喊歇气，一下子全都气喘吁吁地瘫倒在地上。他好像生性乐观，还有精神说说笑笑，坐在地上天南地北神吹。

黄家山的冬天，寒风呼啸，冰天雪地。按山上的习惯，这时候都不出工了，就在家里把以前从山上挖回来的那些枯死了的大树的柁蔸烧来烤火。但山上十几头牛、几十只羊每天都要吃草，一个冬季牛羊尽吃干草不吃青草也不行。可天太冷了，大家围着火烤，都不想出门，刘鼎总是自告奋勇上山去割草。因为冬天山上很难找到青草，听社员说只有在靠近南江县那边的山崖上才有些青草，于是，他常常顶着寒风，冒着生命危险爬到那些悬崖边去割青草回来喂牛羊。因此，他的双手满是被刺笼和茅草割裂的血口子。

黄家山离公社有四十多里山路，到巴中县城更远，山上没有小学，几户人家的娃娃没地方读书。我们知青队的副队长谢宝渝就和刘鼎一起，在山上林场张书记家里办了一个识字班，晚上收工后，点上煤油灯教几个山里娃学认字、写字。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经费，他俩就把自己家里有时寄来的一点儿钱拿来给学生买教材，买本子，买煤油。有一次趁天下大雨不出工，他俩一大早就赶到县城去买识字课本，晚上回来时，只见他俩光着膀子，浑身都被雨水淋透了，几本书却是干的，原来他俩是把衣服脱下来包着书一直抱在胸前的。就这样，黄家山上的茅草屋里时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那几个娃娃从一字不识到后来能够写简单的作文了。后来，山上有几个社员也来读这个扫盲班，能认字写字了，都非常感谢他们。

记得是我们到林场的第二年，有一次，刘鼎把他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和寄来的一本《四川文学》拿给我们看，要我们帮他分析一下。刘鼎父亲写的那封信，好像是说，《四川文学》上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受到了批判，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叫刘鼎读了以后跟他划清界限，还要回信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知道刘鼎是怎样回信的，反正我们没怎么看懂文章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样进行批判。

刘鼎跟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男同学最烦他不爱干净，每

天劳动出了很多汗水，换下来的衣服、袜子却不洗，过几天又拿出来轮流穿。寝室里的人被臭味熏得实在是受不了，就把他的那堆脏衣服扔到院坝里，逼着他到堰塘去洗，他往往也只是咧开嘴“嘿嘿”笑两声。

因为山上没有电，所以，我们都要轮流背谷子到山下去打米，一些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也都要从山下背上来。上黄家山有两段特别陡的坡叫“白庙”，由于坡太陡，又是一坡光溜溜的石板，只有一些用凿子凿出来的浅浅的阶梯，也只能放进去大半截脚掌，所以背东西上山在这里根本没法歇气。我们每次背东西爬白庙那个陡坡，腰几乎都弯成了 90 度，后面的人低着头爬坡，只能看见自己头上、脸上不断往下淌的汗水和前面的人流在石板上的汗水。即使是冬天，衣服也被汗水湿透，连棕背垫都是打湿了的。夏天，背兜的绳子好像勒进肉里去了，只好用双手使劲把背兜底往上抬。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完一段石板后，才有稍微平点儿的地方可以用打杵子撑着背兜，伸起腰，抬起头，擦一把汗水，长长地出一口气，接着又开始爬第二段坡。有一次，大家坐在石板上歇气，刘鼎一边掐汗衫上的虱子，一边眉飞色舞地讲那些历史故事和典故。忽然，他躺到石板上，不说话了，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神情伤感地说：“看来，这辈子要想当个文学家、史学家是不可能的了，只有等到下辈子再说了，还是觉得太遗憾了。”过了一阵，他猛地站起来，说：“算了，不想了。”转身捡来一些枯树叶，抽出刚在公社买的火柴，点燃那些枯叶，又突然脱下身上那件爬满虱子的汗衫，把它丢进火里烧了。他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堆灰烬，为了不让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流出来，又赶快把眼睛闭上了。我们都沉默着，没人说话，心里很害怕，也很无助和无奈。看看四周望不到头的重重大山，就好像是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希望。至于未来，谁都不愿深想，听天由命吧。大家心情沉重，默默地背起背兜又继续爬山，只觉得背兜越来越重，脚步越来越沉，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我们十几个女生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房上的瓦盖得稀，遇到下雨下雪，雨水、雪水就顺着瓦缝流进来，黄泥巴的地面本来就坑坑洼洼的，现在就成了一个一个的稀泥巴凼凼，我们穿着胶鞋、统靴在屋里走，就像是在踩瓦泥一样。因为怕床被打湿了，我们把下乡时包铺盖卷的大塑料布盖在床上，晚上睡觉就钻进塑料布下面，从头到脚都遮起来。有时候就在铺盖窝里唱歌、吹口琴或者讲鬼故事，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毛骨悚然，吓得一阵阵惊叫，也不管从房顶上滴下来的水又顺着塑料布流到地上。如果忘了把鞋放到床下去，第二天起来，鞋里装的都是水。有时没完没了的雨要下半个多月，屋里又冷又潮湿，床上是潮的，床下还长了菌。林场就派了几个社员带着我们做瓦烧瓦盖房子。烧砖瓦的窑点火以后就不能熄火，要不停地往窑里加柴，否则一窑砖瓦就全报废了。刘鼎主动要求去守窑，白天黑夜不睡觉，硬着头皮干，几天几夜累下来，人瘦了一大圈，脸也熏得黢黑，他却没有一点儿怨言，反倒认为这是对他的锻炼和考验。

1967年的下半年，林场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我们经常“放饭假”，没有饭吃。10月份，即将进入冬季的时候，大家都先后离开林场回重庆了，只有刘鼎和另外一个同学还始终坚持守在黄家山上，没有下山。那时，早就已经没有一颗谷子、一颗麦子了，每天只有靠洋芋充饥。几个月以后，有人回到林场，看见刘鼎的样子，都不敢认他了：蓬头垢面，脸色发青，头上的乱发像一堆枯草；穿的那件下乡时发的“劳改犯棉袄”又脏又破，扣子也掉了几颗，腰杆上捆着一根葛麻藤，脚上的烂解放鞋糊满了稀泥巴；背着一个大背兜，独自在大山里转，边护山边割草喂牛羊，还高一声低一声乐呵呵地吼着跟社员学的山歌。

1968年春节过后，我们林场有些男知青回到巴中，住在县城里，同其他林场的知青还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一起加入了巴中的武斗。热血沸腾的刘鼎，这时也下山来“誓死捍卫革命路线”。

巴中那边的武斗开始后，信也不通，我们在重庆只偶尔听回来的同学说打得很凶。5月下旬的一天，在街上碰见刘炯贤，她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鼎被打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希望这只是个误传。后来，才听当时在场的同学讲了那天发生的悲剧。

196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的晚饭后，刘鼎和几个知青在巴中县城的一个招待所里休息、闲聊。他照例又是站在屋中间，挥着双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旁边床上坐着的人在玩一支半自动步枪，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惨剧瞬间发生了。只听见刘鼎“哎哟！”一声，停在半空中的那双手一下子捂住左边的大腿就蹲下去了。顿时，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涌出，他痛苦万分地倒在了血泊中。大家都吓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醒悟过来，应该马上送医院抢救。但谁都没有经验，手忙脚乱地背起他就从三楼往下跑。有人赶快冲到街上拦了一辆大卡车，还找来一把椅子放在车厢里，扶着他坐着。他脸色惨白，鲜血顺着他的大腿往下流，房间、楼道、椅子、车厢，留下了一路血迹。万分不幸的是，医院里空荡荡的，没有医生，连个人影都没有，都躲武斗去了。晚上九点多钟了，好不容易才从四处找来了医生，可医院的血库里又没有血。几个人完全都急疯了，就在广播上去喊，这一下，在巴中城里的认识和不认识的重庆知青有十一二个人都拥到医院来献血，我们林场的邓世儒也给他输了220CC血。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那颗不慎走火的子弹，从刘鼎大腿的外侧穿进去，打断股动脉，旋转着从大腿内侧飞出来，出口有饭碗口那么大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折腾了这么久，到深夜十一点多钟，刘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在巴中县人民医院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战友睁着双眼静静地死去，都禁不住号啕痛哭。后来，他们说，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刘鼎那双死后还睁着的、充满着极度惊恐与绝望的眼睛和半张着的嘴，可他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

那段时间，我没有回林场，在住家的校园里有时能碰见刘鼎的妈妈，每次她都焦急地

向我打听她儿子的消息。以前,我都说不知道,可现在能告诉她实情吗?看着她担忧、焦灼的神情,我怕她受不了这么残酷的打击。心想,还是给当母亲的留下一个盼头,不要让她就此绝望吧。于是,我仍然说不知道。可从那以后我总怕再见到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我不愿对她撒谎。

那一天,我终于还是碰到刘鼎的妈妈了。她急切地一把抓住我,还没开口说话,已是悲泪纵横。我心都揪紧了,知道再也瞒不住她了。她使劲捏着我的手,声音哽咽地说:"你咋个不给我说实话呢?"我不敢看她那哀伤的目光,又难过又歉疚,低声说:"对不起,刘师母,我不晓得嘟个给你说。"我突然发现她已经苍老了许多,头上白发更多了,满脸憔悴无神,本来就矮小的个子更加瘦小了。我不能想象她最初知道这个噩耗时的情景。看着她佝偻的身影、蹒跚的脚步,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痛,一忍再忍的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淌下,连一句安慰她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几年后,我顶替母亲回到学校工作。有一天,刘鼎的妈妈来找我,她说的一句话吓了我一大跳。她要我托人把刘鼎的骨头给她带几块回来。我惊愕地望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她想去,但实在是走不动啊。我知道,刘鼎的爸爸还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她也年老体衰,怎么可能千里迢迢去找回儿子的尸骨呢。失去儿子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却又那么无助无奈,我想让她在心灵上能得到一点儿安慰,就犹豫着点了点头。

我赶紧去找大家商量怎么来办这件事,可听到的消息更令我大为震惊:刘鼎死的时候是5月份,天气已经热起来了,由于当时还在搞武斗,形势又紧张,停放几天后,下葬时尸体已经肿胀了,他的个子又高,勉强才塞进棺材里,连盖子都盖不严。大家急急慌慌地在林场我们住地旁边的土坡上挖了一个坑,将他下葬了。1970年清明节,谢宝渝去给刘鼎上坟,还立了一个石碑,邀请知青肖民仆用凿子刻了"刘鼎同志之墓"六个字,并涂上了红油漆。林场撤销以后,大家都下生产队了,没有人再到林场去上坟培土了。不知什么时候,那块墓碑已经被社员挖出来抬去修了猪圈。而且,因为当时坑挖得太浅,上面盖的土又薄,几场暴雨过后,坟上的泥土被雨水冲走,一群野狗把坟扒开,把尸骨都拖走了。天哪!太悲惨了!怎么会是这样啊!我简直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去给刘鼎的妈妈说啊,还是只能撒谎了。我只好对她说,同学们都离开林场了,那边已经找不到人了。

后来,刘鼎的妈妈离开学校住到成都去了,我却又想再见到她,想好好跟她摆摆龙门阵。不久,她病逝在成都。刘鼎的父亲在学校病逝后,我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愿他安息,但我知道,两位痛失爱子的老人,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现在,每次我们同学聚会,都要提到刘鼎,有人说他下乡前不该表那个决心。

刘鼎兑现了他当初的誓言,他没有回来,那个荒谬和疯狂的时代吞噬了他。从他满

怀真诚与激情踏上那块土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他那 19 岁的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大巴山上。

离我家不远的沙坪公园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处据说是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园，埋葬着四百多名当年重庆武斗的死难者。好几次，站在阴森潮湿、乱树斜枝、杂草丛生的墓群中，阵阵冷风吹得我心头发颤，内心一片悲凉。“独留青冢向黄昏”，那些同样是在那场葬送了自己青春和生命的“革命”中战死于花季雨季的长眠者，尚有一块青草做伴的墓地，让人们来此追念。而刘鼎呢？他那孤独凄凉的冤魂在大巴山的山野间永远地漂泊，无所依托，无处寻觅，只有在那张当年学校欢送我们上山下乡的合影上，还能看见他憨憨的模样……


作者简介

龚增玓，女。1965 年毕业于重庆八中初中，同年 10 月下乡到四川省巴中县平梁公社莲花山林场。20 世纪 70 年代初调回重庆。现退休。



小　草

董世琳

小草实在是太嫩弱、太不显眼了。路人不经意地践踏它，牛羊的利齿不停地啃啮它，风霜雨雪不屑一顾地从它头上掠过。它死过去，又活过来，就那么抖抖索索战战兢兢地活着。

然而，微弱的生命也是生命，它就那么微微弱弱地活着，也还是——活着。

在我们万源县长石林场就有这么一棵“小草”。

那是1965年11月的一天，我们林场又到了一批新知青。我们这些早到林场的知青满怀兴奋和好奇到路口欢迎他们。突然，在新伙伴中我发现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姑娘。她：一双茫然无顾的眼睛，一张白里泛青的小脸，一头黄毛搭须的头发还用橡皮圈在右边扎着个小鬏鬏。我目测了一下，她身高肯定还不到1.4米。嗯，是个小学生，恐怕是哪个带队干部的孩子，一个营养不良的“三类苗”。然而打探的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她竟然是这批到场的十几位知青之一。她叫唐仁芳，年龄倒也有十五六岁了，但连小学也还未毕业。

“她也算知青？”我心里有一种被亵渎的感觉，要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是燃烧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激情主动要求到农村去锻炼、去战天斗地、去大有作为的铁血队伍。她来这里能干什么？如果她都算知青，这不是太可笑了吗！这不明摆着是甩包袱吗？我心里为那不负责任的父母愤怒了：没有能力，就别干养孩子的事！也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而悲哀：唐仁芳小朋友那孱弱的肩膀经得起他们穿皮鞋的大脚踩吗？

果然，唐仁芳同志没能实现他父母和带队干部的“厚望”。

这年冬天，是我们到农村的第一个冬天。本来，大雪无痕的季节是山区农家的“闲月”。从那家家屋顶飘出的炊烟里，已经闻得到年味了。但是，领导们说，农业学大寨，我

们知识青年林场要给农民做个榜样。于是,我们在场部所在地的端公坪下面的山坡上摆开热火朝天的改土造田战场。

大巴山可能是千年万代造山运动的结果。卵石遍地,一锄挖下去蹦在石头上,弹得手麻痛。大家能使钢钎的用钢钎,能用锄头的抡锄头,没有工具了,干脆就用双手抱着一个个冰冻大卵石装进筐里。寒风刺得人睁不开眼,雪花飘进脖子里化成了水,大家仍汗水大气地干着。突然我听见有人喊"看唐仁芳"!扭头看去,只见她右手尖起两个指头像唱戏的兰花手那样捏着颗小鸡蛋大的卵石,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挪。有人喜剧地问:"唐人(她的绰号),你在做啥子?"她认真回答:"运鹅石板噻。"同志们忍俊不禁地大笑。这笑声里,有苦涩,有无奈……也有人在心里颤抖地呻吟:天哪!

改土造田一天天地继续着,唐人也仍是一天天地用两个指头运着鹅石板。场指导员丁社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叫她回到室内工作,砸油饼。即用槌子把菜油饼砸成小颗粒,然后用水泡来做肥料。那油饼差不多像现在街上卖的大饼那样大小厚薄,唐仁芳努力工作一天才砸烂了半个油饼,还干得直掉泪。是累抑或是急?反正有一点,她好像真的是那种只会吃饭不会做事的人。当时林场是吃定量,每人每月 45 斤饭票,用大锅煮饭,每顿随自己的饭量在炊事员那里交饭票称饭。大家注意到,唐人打的饭不比其他人少。后来,场里基本上没给唐仁芳安排什么活,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

虽然开始大家有些看不惯唐仁芳这种能吃不能做的人,但处的时间长了,人和人之间也慢慢有些感情。跟大家在一起时唐仁芳一般都木讷讷的不讲什么话,但有时别人讲话时,她往往在过节处戳上一句,还刚好对头,有点画龙点睛之妙,伙伴们都戏称她"关键话",久而久之,这也成了她的绰号。

唐仁芳会讲"关键话",也会做"关键事"。刚到场时,我们睡的是木头捆绑的通铺,人多热气高,营养充足,不久,知青们身上都养了种小动物——虱子。虽然大家都称它为"革命虫",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女孩子一下班都忙着烧水烫衣服,捉虱子。唯有"关键话"干革命彻底,当她在自己一件橡皮红的针织衫上发现了虱子,顺手就把衣服丢在火炕里捂了灰,让伙伴们暗暗心疼。那种衣服在那个年代算是奢侈品了,而唐仁芳本来穿得就单薄。于是,唐人给同伴们留下非常特殊的印象,"关键话"做事也"关键",在关键时刻她毫不软手。

事后,"文革"风云涌起,大家都涌回城了,唐人仍待在场里,和几个当地老场员在一起。当初她被家里当包袱一样丢出来,现在也似乎无家可归。

那年,我回公社去取粮票,回到端公坪,一片冷清,一片荒凉,昔日的歌声、笑声不见了。唐仁芳和陆续回来的几个知青围在火炕边,几根小柴棍在火炕里有气无力地燃着,但唐仁芳好像还胖了些,一副怡然的表情。真是任你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以前知

青们吃不惯包谷米和白米掺着煮的饭，但他们现在吃的是纯包谷米饭，还吃得津津有味。黑糊糊的案板上摆着一溜小药瓶，那是我们到农村时学校送的，装了满满一药箱。现在人去药空，药瓶便挪作他用，每个瓶里用盐水泡着几根四季豆，他们就用这个下饭，显得安之若素。

只是，我那次回去得很“不幸”，为了唐人与一个男知青发生了战争。一直以来唐人都是大家开玩笑的对象，和往常一样，那次回去的几个知青围在冷清的火炕边无聊间又拿唐人开了涮。我无话找话地打趣了一句说，你们回来这几天唐人都瘦了。不想这句话燃起漫天烽火，场里一个平素文质彬彬的男知青忽然翻了脸骂了我一句难听的话。这要是出自他人之口，我肯定等而下之不去理会了，然出自这位先生之口，使我大出意外。回城一段时间我们还互相通过信，算是较为知音者吧。于是，我发懵委屈气恼之极，便与他动起手来。我提起锅铲追了他好远。回来，痛定思痛自认受了莫大侮辱，要以死抗争，挽回尊严。于是我猛烈地向墙壁撞去，孰知，泥巴墙反作用力差，没法让我达到目的，加上又被朋友拖住了，但头上撞出的青包疼得我昏沉沉黄泉路近地睡了好几天。（真是自寻苦吃，何苦来着。至今想起，仍觉无聊可笑之极，真是年少无知啊！）

1969年初，林场散伙，我们纷纷插队。所幸的是，我跟孟寅生、何光惠两个朋友插在一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连家里寄来的钱也“共产”。虽然艰苦，倒也苦中有乐。无论如何，团结就是力量，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听说唐人也插了队，就在我们九大队四队。在全公社，我们九大队所处的地势最高；在我们九大队，我们插的三队和唐人插的四队地势最高。这一“高”，条件就相对恶劣多了，用当地农民的话说“苦寒得很”。我们不知道孱弱的唐仁芳怎么熬得过这苦寒，因为我们自诩为坚强的三女侠都抱头痛哭过。（倒不是因为青黄不接的正二三月我们断过粮，饿过饭；也不因为我们在被农民称为“手爬崖”的坡上只能一只手拉着树枝稳住脚，另一只手拿着锄头点包谷的艰辛，而是用齐秦的歌说，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坚强”如我等尚且甚感苦寒难熬，而没有生活能力的唐人又将如何过？

那天在坡上，听队上的人说唐人和她本队的一个姓胡的农民结婚了。还说那青年很喜欢唐仁芳，说大城市来的女娃子又会打毽又会跳绳的，激跳得很。我们没答话，心下一阵发冷。没过多久，就听人说，唐仁芳经常挨他老公打，打了还不准吃饭，说大城市的女的啥事都不会做，要和她离婚。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那唐仁芳在林场时就只会往火炕里扔长了虱子的衣裳。大白天，这么大的姑娘还穿着内衣内裤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连自己都难自理，确实没有资格做农民的老婆。做农妇，起码要能喂猪煮饭洗衣纳鞋生儿子。有一天，我们在坡上做活路时，听说唐人要生孩子了，心下为她高兴一阵，却又为她捏把汗。听说，我们队

上的女人生孩子，就在门后头摊一堆灰，跪下就生在灰边，然后自己用剪子把脐带剪了，把血灰打扫干净，还照样挑水煮饭喂猪儿。这些，唐人办得到吗？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干活"歇稍"时，坡上的人又摆起了唐仁芳的龙门阵。一个青年说，你们唐仁芳，好惨哟。生娃儿，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那个惨叫声，几里路外都听得到。后来娃儿出来一只手，婆家慌了，才叫人抬到下面煤矿医院去，好不容易把娃儿弄下来，死都死了，哭都没有哭一声就死了。唐仁芳还命大，没有死，就是没得人管她了。那婆子妈也太黑心了，丢一碗谷子给她个人办米。唐仁芳没得法，各人爬到水缸面前舀瓢冷水喝，结果肚子又大了，全身都肿亮了，看样子活不成了。还是一个好心人，扯了些草草药熬起给她喝把她救了。"你们知青好惨哟"！摆龙门阵的人用这句话打住了话头。我们的心却一阵阵抽紧。但是，我们无语，冷冷地咬紧牙齿，把悲伤咬碎在心里。

回城后听说唐仁芳最终被她丈夫休了，扫地出门。那姓胡的农民说自己当初瞎了眼，看上了这么不中用的城头女娃子。又听说，唐仁芳流落他乡，嫁给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孤老头。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我下班后顺便到七星岗百货店买点东西。进了店门不远，一个站在柜台前与里面的售货员聊着的妇女忽然回过头，她看见我，我也看见了她。是她：唐仁芳！还是那张没有酸甜苦辣的脸，那双木然的没有亮色的眼睛。她穿着肥大的衣服，还穿着一双不合时节的胶靴。她叫着我的名字迎上来和我说话，告诉我说她顶替她母亲回来，在这里做清洁工，一个月二十多元工资。她说她又和一个工人结了婚，还先后生了一儿一女。她很兴奋，看来是好多年没看到知青朋友了，叨叨絮絮，没完没了。余下话我没法听进去，我只想悲怆地大叫一声："狗日的唐仁芳，你终于活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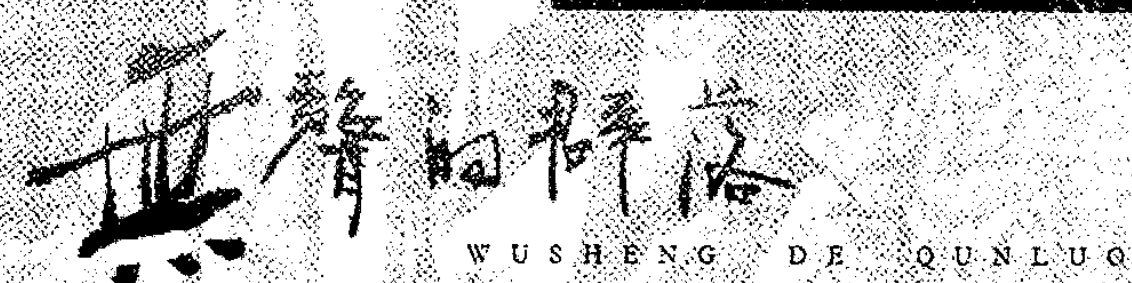
难怪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诗至今还那样脍炙人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作者简介

董世琳，女，1949年6月14日生。1965年9月下乡到万源县长石公社林牧场。1969年插队到长石公社9大队3队。1972年招工回城。当过建筑工人、重庆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政治处新闻干事、重庆市妇联办公室秘书、重庆市青干院现代文学教师和学报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国土局全国18城市土地局长联席会秘书处副处长和秘书长及《地政月报》杂志副主编。现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学会秘书长，《重庆国土资源》杂志副主编、副编审。

正因为经历了那场使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他们才格外珍惜今天的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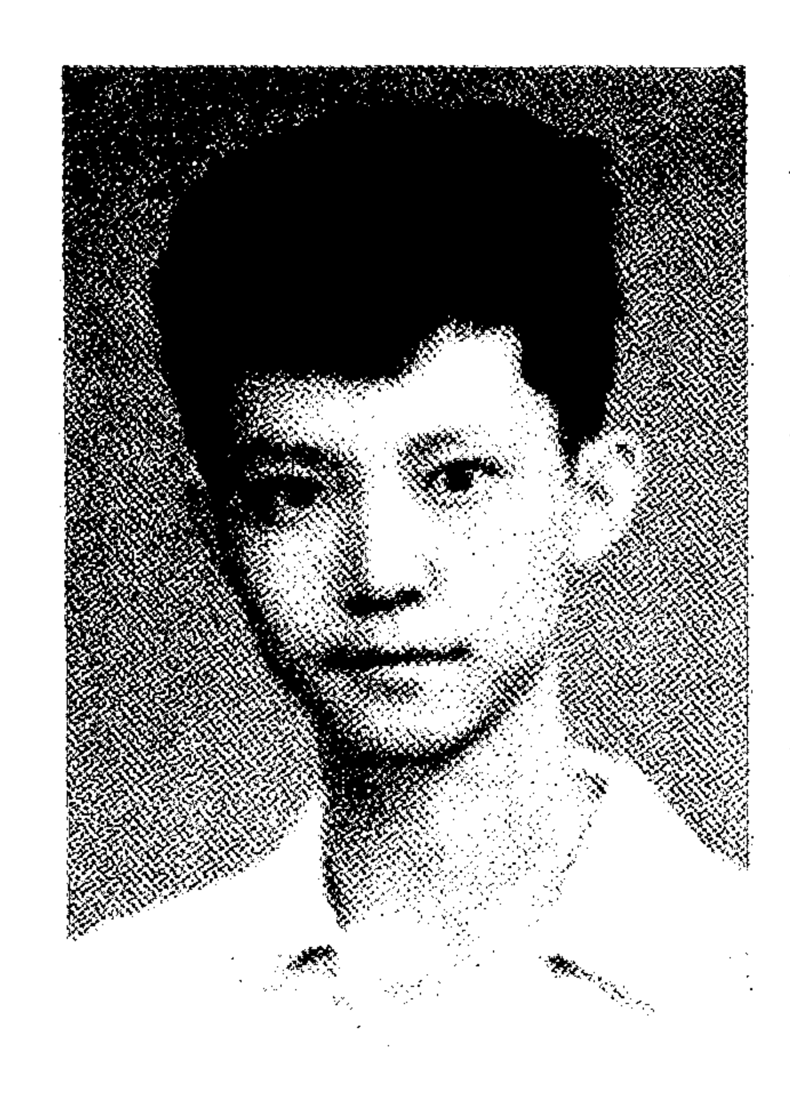




卷四 见证乱离

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郑文斗


长沙知青诗人王百明

许久以前，立明姐就要我写篇文章纪念百明哥，我却总是迟疑着不敢下笔。曾多次听几位江永的知青朋友说过，王百明是江永知青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我想那痛，应是一道长期郁结在心中，时时揪心却又让人不敢轻易触摸的伤痕；应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却又说不清理不顺的复杂情绪。人已逝，痛还在。在这个命题前，我久久徘徊。

春去秋来，岁月的长河缓缓地流淌着。如今，我们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岳父岳母早已相继离开人世，百明哥的侄儿们也都长大成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有些忙碌又有些平庸。还有几天，就是我的妻舅王百明大哥四十周年的忌日。整整四十年过去，又是一个纪念日到了！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 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 年 8 月 17 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只有 22 岁。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地走向明天。

为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谨表祭奠。

一

我与百明大哥其实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到我们公社的。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当时在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会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视为“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竟然让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即因如此种种，很久以来，百明大哥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站在迷雾深处的模糊身影。

二

我依然想要更进一步地走近百明哥，很想看看当年他的那些诗作，仔细倾听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心路历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家中没有留下他的任何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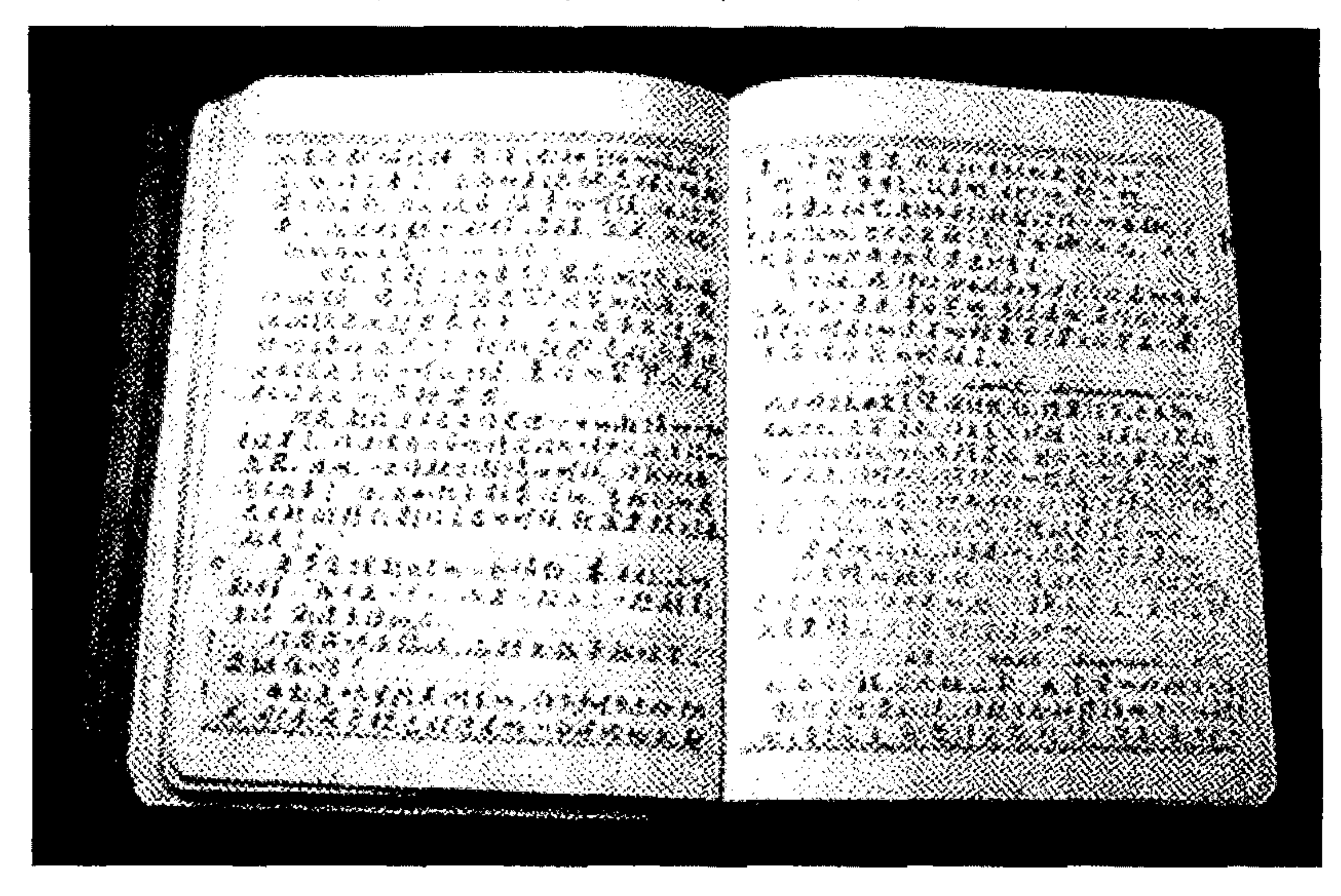
我只看过他不多的几首诗，都是一些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感觉这些洋溢着激情的字行，与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风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政治化了的长短句。我很是困惑，他的这些诗与我所想象的有着许多的差距。

几个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给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记的印刷件，断断续续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节都经过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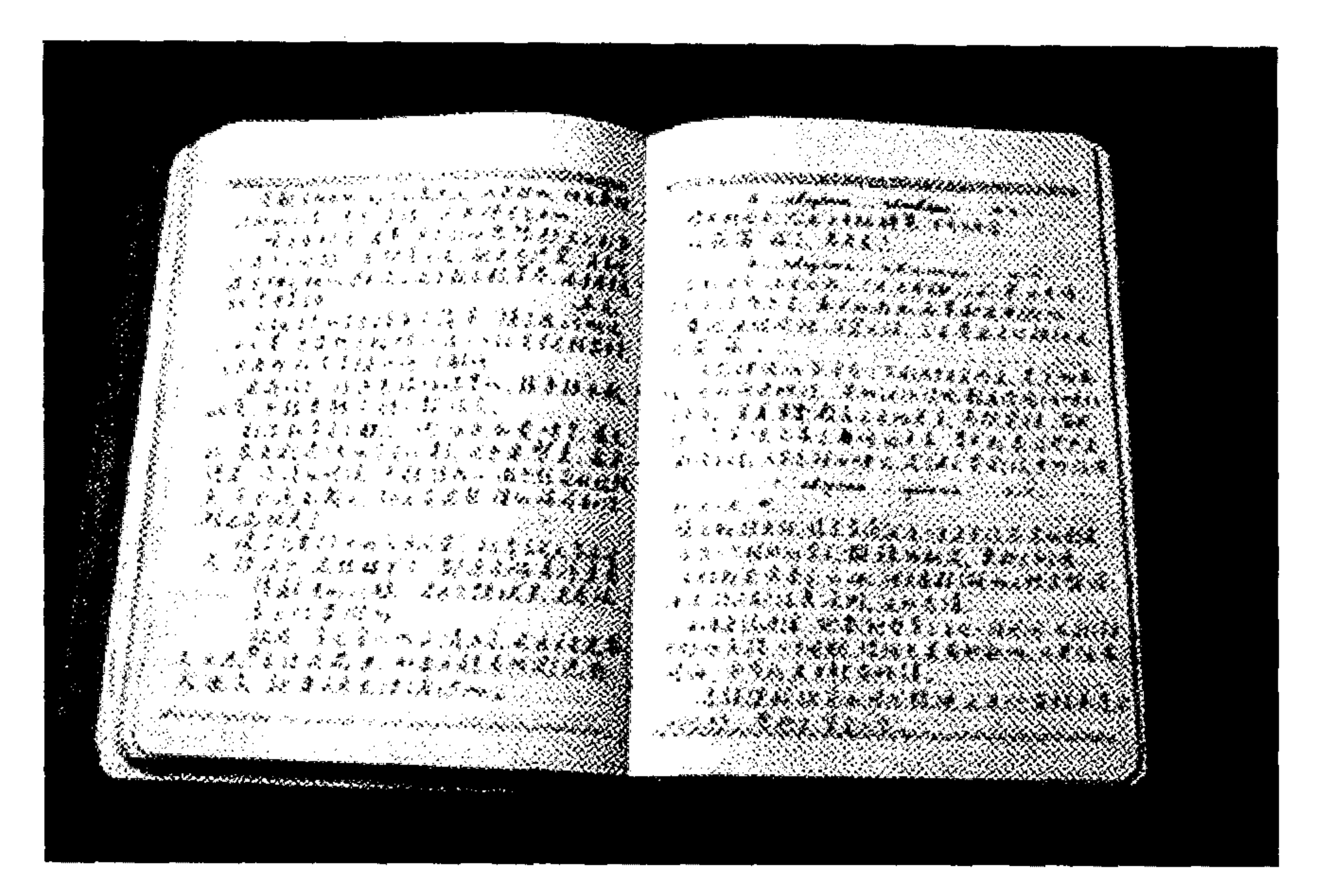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日记，期待从中能看到他超凡脱俗的思想火花，看到他长风破浪般的斗士情结，期待能读懂一位悲情英雄的心路历程。可是一行行地读下来后，我心底里不禁隐隐地浮起了一丝失望。内容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那种标准日记，从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没看到个性张扬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融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

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身上那种深深的原罪感。



王百明当年日记



王百明当年日记

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曾使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三年考不上大学，曾使他多次应聘工作不被采录。现实迫使他下了乡，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极其希望能脱胎换骨，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被召到轻骑队这样的认可，也能使他有一种成就感。

他殚精竭虑追求的所谓认可，就是能让他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于是他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记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自我告诫：

“家庭包袱依然是个大问题……历史注定你的个人遭遇是会很坏的，要正视现实……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恼一辈子了。”

“以后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唱外国歌，切记，切记。不要以自己会唱外国歌来炫耀。”

“看书，尤其是看理论书时尽量避开人家，宁肯夜里迟点睡，短几年寿也行！切记，切记。”

“不要到处鼓吹读书，讲那些文绉绉的俏皮话；不要公开谈论国际局势、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任何东西，谈的只能是穿衣、吃饭、挣工分。”

“不和人谈书，不在人前读书，不在外面摆农业书和‘毛选’以外的任何书。”

“以后要宣布不买灯油，摸几个月黑，学会在黑暗中写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农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谈就是生产、学习、时

事，要多跟他们谈生活、谈天气、谈吃喝、谈村里的逸事。说古道今，态度随和，不显清高。"

"多干活，多看书，少讲话。这就是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走上层，三年就会高升，而你却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泥土里去。"

……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禁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在这频频不断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唱外国歌曲、在别人面前读书、说文绉绉的俏皮话，这些在今人看来极其正常的行为，却令他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于是他只能放弃休息在别人睡了后读书，只能学会在黑暗中写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饭、挣工分，只能写歌功颂德的诗句。表面上他很坚强，他激情澎湃地为新生活写词谱曲，不遗余力地投身劳动刻苦磨炼自己，对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那样痛苦。在那黑色长夜中，他就像是一个艰难的独行者，踮着脚尖，万分谨慎地避绕着满布在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与陷阱。

关于这些文字，我猜想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认定自己需要赎清罪恶，以至不惜采用几乎是自虐的方式来改造自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正统的承认，所写下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检举揭发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体环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里写下的并非全是他的真实思想，更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从中看到的都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从百明大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惶恐和盲目，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存状态中的一部分。

虽然环境是如此险恶，我却从百明哥的日记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对于农村那种仍然贫穷落后的现状、对于某些神圣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倾向，还隐隐看到了他一些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绪。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结，他思念故乡、向往爱情，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淡淡地、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尽管对于看书学习他深恐被人非议，却仍顽强地坚持下来从没放弃过。怕虚度时光的恐慌感特别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几天没看书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紧时间。仅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看，几年时间里他已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起源论》、《美学原理》等，还涉猎了俄语、农业知识书籍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有精神做底子的恣意生命是所有卑微生物的希望。智者的绝望不在于生命不能重写，而在于他的生命如流星划过天空时人人都在沉睡，在于即使是那微弱的思想闪烁也无从表露。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苦难的岩缝中谨慎地生

根发芽，小心地探出枝叶，在风霜雨雪中苦苦挣扎，心中却总还怀着一个梦想，他迫切地想要与长在平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新的一年开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强音要爆发在明年。"

同年九月，他又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此刻，他仿佛已隐隐地预感到实现那个梦想的日子快要来临了。

三

1966年，百明大哥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了那场"文革"运动。他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要遭屠杀，已在长沙的他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

从日记上看，他应是一个极其内敛谨慎的人，一个平时连聊天谈国际形势都有顾忌的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化呢？

我试着将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中，去尽量设身处地地分析他的行为，我想主要应该是有以下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那一代人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哲学的熏陶下成长的，反复观看的《红岩》、《刘胡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艺作品，常使我们热泪盈眶，深感生不逢时。而"文革"的发生，使一代人的这种渴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实际上，那时不管是哪个派别的人，参与"文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这些英雄为榜样，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无比崇高的壮举，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义和团、农民运动等榜样的革命气概。在这种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维护真理的斗争中，在这种一个俨然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有着浓烈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迫切希望赎清罪行、涤净灵魂，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百明哥，将这场运动视为一场响应领袖召唤、保护神圣政权的斗争，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他想通过出生入死的努力，来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成为一名红色阵营中的红旗手，一名叛逆反动阶级的革命人，以此改变自己以前那种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运。

然而，那种不可逆改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67年8月17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与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县城的一家饭店吃早餐时，闯进四个农民，手上的鸟铳与大刀一齐对着了他们。来人喝道："谁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边应答着，一边站起来从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枪声砰然响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还在抽搐着的他，手里正紧握着一条小手帕。

枪声响过，硝烟四散。此刻，一个冤屈的灵魂，正袅袅飘升在这个贫穷荒凉县城的上空，飘升在这片他曾激情讴歌过的土地上空。天堂里多了一位知青诗人，天堂里不再会有阶级斗争。

多年以后，有人向我介绍到掏手帕的这个细节时说，也许就是他这个讲究整洁的"小资"习惯，使对方误以为他是掏武器便抢先开了枪。可我不这样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动作，百明哥能逃得过这一劫吗？

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22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在他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有在这里一辈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个，留下的一个也是你。"看到这里时我不禁心中一颤，没想到，他的这句话竟然是一语成谶！

听立明姐讲，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书他看过好几遍，每看一次后都要激动好几天，他一直以牛虻为自己的榜样。意味深长的是，那个曾一直把蒙泰里尼作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虽然发现被欺骗之后，一直都在向虚伪的蒙泰里尼发起斗争，但在他的精神深处却仍深深依恋着蒙泰里尼。革命者牛虻被当局杀死了。实际上，蒙泰里尼教父是杀死牛虻的真正凶手。

一直渴望成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尝不是死于他的精神教父！

四

2003年一个暮春的早晨，我与蒲生、风雨人生、师嫣、曹夫子等几位好友来到了江永县政府的大院，百明哥就埋葬在这个坪内的一个花坛下。机关里还没开始上班，晨风轻拂，四周静寂无声。我们放上鲜花，将酒洒入泥土中，向百明大哥深深地三鞠躬！

按一般习俗我们还带来了冥纸与蜡烛等，但在这个机关大院中觉得有些不妥，当天下午就在江永千家峒的大泊水瀑布前，我们燃起了这些祭品。鞭炮响起，青烟袅袅，五月的鲜花开满了山野。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我默默祈愿百明哥灵魂安息！

蒲生告诉我，那天百明被枪杀后，被人草草塞进一口薄板钉成的箱子里，与另一个同一天被杀的富农一道，胡乱埋葬在县城外乱葬岗浮土中。三个月后，重返江永的知青为他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并将他的遗骸取出，深埋到了县政府大院之中。

为防止日后被毁，当时知青们倾下了几吨水泥在这里。

又有人告诉我，“文革”结束后，百明哥的墓被用炸药彻底炸毁，只怕早已尸骨无存了。后来还有人告诉我，百明哥埋葬的位置不是在花坛这里，应是向南（也有的说向东）十几米的地方……

啊，百明哥魂归何处，难道，你的灵魂至今还无处安放吗？每想到这里，我们就深感不安。

2006年5月，我和妻子三姐妹全家人又一次来到了那个花坛前，哽咽中我们轻轻捧起一掬土，放在一个小袋中带回了长沙，我们要让百明哥回家，让他与父母团聚。在购墓地时，陵园单位给了一个墓地证书，上面一栏工工整整地写着岳父、岳母和百明哥的名字。

百明大哥，从注销你的长沙户口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有四十多年了，想不到今天竟是以这种方式，你终于取到了故乡的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让你永远合法留在长沙的资格证书！

岳父、岳母的骨灰盒分别从两处地方移到这里来了，我们从江永带来的那袋泥土，还有百明哥的一本写满了眉批、已发黄了的《乐府诗集》，也都一起放入了墓坑中。

在这里，埋葬着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三个成员，在这个望去满眼都是密密麻麻坟茔的陵园中，百明哥他们的墓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座，没有谁会去关注他们曾经的故事。

岳父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面，那时我还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还一本书，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瘫坐在围椅上的白发老者。话题是从蒲生哥还来的那本书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们一起谈雨果，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谈欧洲文学，这位老者很平和地与我们侃侃而谈，竟然谈了一个晚上。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没想到在这间破旧的小屋内，能有幸与一位有学识、思维敏捷的老人邂逅，当然更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会成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岳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从这里而来。

岳父是做会计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个官员。1949年前夕，岳父遵百明哥外公嘱托替他买了去台湾的车票，并将其送上火车，没料到一个家庭的厄运就由此而开始了。解放后，正值年轻的岳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数年。再之后就是历次运动中都被拉出来批斗、反复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最后失去工作瘫痪在家。

还有我的岳母，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因为丈夫问题的牵连，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种种屈辱，整个家庭的生活担子也全压在了她身上。她用她那瘦弱的肩头默默而又坚强地承担起了这一切。而对她人生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百明哥之死了。家

中唯一的一个男孩，一个聪颖有才华的儿子，一个曾让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儿子，竟就这样惨然离去。我不敢想象她当时心中的那种感觉，那该是一种怎样锥心泣血、肝肠寸断的痛楚啊！

在我与她相处的几年中，她极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痛苦是永远无法释然的。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使她忧郁成疾，还只六十多岁时就溘然逝世了。

深深地记得那次岳父出葬，她追着灵车呼喊着岳父的名字时，满怀悲怆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带着百明呵！"

百明哥最小一个妹妹的儿子出世后，要外婆给取个名，岳母缓缓地说："就叫小百吧。"这是一个深受伤害母亲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爱与痛，悠悠绵绵，不绝如缕。

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岳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张纸对我说，是法院送来的。这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通知，上面写着岳父的名字，内容大意是，经重新审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只有几行字，连句致歉的词语也没有，其时离岳父去世时间已有四五年了。

错案可以撤销得了，可是，一个家庭这几十年所经历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销得了吗？王百明那鲜活的无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销得了吗？这些，该由谁来补偿？

——漫长的苦难历程，所能换回来的仅仅只是一纸薄薄的通知书！

但毕竟，一个荒唐年代的凄凉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虽然闭幕时也仍有荒唐。

五

终于该结束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累，写得很沉重。越过无边黑暗，我走进的是一个已渐行渐远的时代，扑面而来的是迷离扑朔的政治烟瘴，我在心灵上努力试着与百明大哥进行对话，因而自己的情感也一次次地受到撞击，甚至有点心力交瘁。

此时窗外已依稀发白，不远处的公园内山影逶迤，隐隐可看到晨练的寥寥人影。我从黑暗中走过，新的一轮太阳即将升出。

百明哥，愿你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作者简介

郑文斗，湖南长沙人，1949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12月下放湖南省沅江，1975年12月招工回城任搬运工，改革开放后从事商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多年努力，成为国内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现为该公司顾问。

红与黑的颠倒

——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魏宽达

晴天霹雳，祸从天降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征稿通知，望着窗外的绵绵秋雨，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样是初秋的9月末，同样是下着这令人心烦的连阴雨，同样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陕西省眉县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泥泞村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往村小学校。几分钟前，一位小学生跑到知青点告诉我，我的同学——一起下乡的知青德安从县城回来，叫我赶快去小学校见面，有急事找我。我边走边想，我同德安还是两个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见了一面。当时我和他都是被邀请回陕师大一附中，给1968年准备上山下乡的校友作先进事迹汇报和动员的。那以后，我在村上忙于大队实验种子农场的生产，他则在县革委会帮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几里路赶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能出什么大事呢？全大队知青大部分都在队里参加生产，还有两位在宝鸡、西安随团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动员，不可能出什么事呀？

当我忐忑不安地推开德安的房门后，只见他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回过神来问我："你知道一队知青的事吗？"我告诉他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怎么出事啦？！他告诉我：今天下午县革委会召开大会，吴主任宣布，一队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为"阶级报复

打死贫下中农”罪，并命令县公检法军管组立即前往该队抓捕罪犯。晴天霹雳啊，我站立不稳，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摇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冷静，要挺住，想一想，这事与你有关吗？”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

年轻的代价

1968年四五月份，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县各村都在批斗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我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们依据大队革委会和队委会的安排，借此批斗之风，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队棉花失窃的积案——一个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队仓库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飞，当时县公安局侦查了很长时间，终因证据不足一无所获，将此案搁置了下来。明眼人都认为是内盗，矛头直指当时的队干部。

第一生产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对重点怀疑对象——原生产队队长李生荣隔离审查。在审查中，一队知青自然成了专案组的主角。成为主角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势使青年学生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二是下乡知青在队上无亲无故，无牵无挂，没有户族矛盾。膨胀的“革命”情绪，导致他们极不慎重地将审查室设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涉世不深、远离父母亲人、缺少正确引导的年轻学生，在审查李生荣的过程中采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荣一只胳膊因捆绑时间长而发青（原因是谭永宁睡过了头，没有及时给李生荣松绑），急送县医院抢救，后又转宝鸡市中心医院治疗，8月初李生荣死于该院。事情发生后，当时公社革委会委派一名公社干部和我（我在第二生产队，是全大队知青负责人）去宝鸡市中心医院索取死亡证明，医院开据的死亡证明中注明李生荣死亡原因是：病人长期拒绝饮食，脱水致死。证明拿回公社后，公社革委会认为李生荣抗拒交待，自杀身亡。公社革委会在宣布此定论的同时，对第一生产队部分知青采取的私设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严厉批评。

正因为我受公社革委会委派参与了李生荣死因的调查，从而粗略得知，第一生产队知青在审查李生荣期间为了保密，没有跟其他小队的知青通气，更没有同我这个负责人打招呼；也得知审查李生荣过程中有该队队委会干部参与其中。

红旗变黑旗

听我讲述完，德安长出了一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基本与你无关。至于抓人的事只能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了。

同德安见面的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组冒雨进村了。当晚在三小队马房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会，全体下乡知青被要求参加会议（我们当时下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下乡知青参加贫下中农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个红脸膛的干部发表了如下讲话：我们是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吴主任的命令来大队抓人的，抓捕对象就是一队的部分知青。这些知青出身反动家庭，实施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李生荣。有人说余管营大队的知青是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是什么红旗？是黑旗！他们是一伙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当时在场的知青们无法接受这种攻击，群情激愤、据理力争。我公开要求发言，我说：我们全大队四十多名知青从 1964 年到村上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苦活累活抢着干，访贫问苦，用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接济生活困苦的贫下中农；我们组织宣传队和科研组努力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完全同贫下中农融为一体战天斗地，被共青团中央和陕西省委命名为全国下乡知青的一面红旗。你们说是黑旗，用心何在？医院证明李生荣不是被打死的，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定论。你们凭什么说是被打死的？把你们的证据拿出来给全体贫下中农看看。说我们是小蒋介石，小蒋介石能当先进典型吗？！

那个红脸膛的干部被问怔了，他指着我大喊：你叫什么名字？医院的证明不用给你们看，你们这些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知青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第三天开始，第一生产队知青林源生、夏伟生、谭永宁等七人被看管、隔离起来，并逐个进行审讯（当时全大队知青曾组织一部分知青赶往西安到省革委会反映申诉，但无人给予伸张正义）。几天后，谭永宁（时年 18 岁）在高压下偷喝农药自杀了，公检法小组放言：死一个谭永宁怕啥，还要抓出幕后操纵者和打人凶手！

大概十天后，公检法小组在大队召开公捕大会，抓走了“幕后操纵者”林源生（时年 22 岁，是知青小组长）、“打人凶手”夏伟生（时年 20 岁）。其余凡是参与此事的第一生产队知青数人除大会陪绑、反复接受批斗外，还出资受罚。召开公捕大会时，大标语、大喇叭声称我是幕后操纵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会陪绑、接受批斗，我称病拒绝到会。终因证据不足，我没有被定为幕后操纵者，逃过一劫。用那位红脸膛干部的话讲，只要查出我参加过一次李生荣的审查，就可以按幕后操纵者抓我，他还说我太嚣张了，竟敢跟公检法小组对抗！要求公社、大队对我进行批斗。因此，撤销了我的大队种子实验农场场长职务，并多次受到批斗。

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倒下了，余管营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时间用辛苦换来的荣誉扫地了！此后，他们大部分人备受歧视、被打入另册，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驻队的军宣队黄营长听说这件事后，曾多次召开知青和贫下中农座谈会了解真相，并组织驻队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试图为该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黄营长突然被调回部队。全大队知青的心彻底绝望了。

随后开始的下乡知青大招工，我们这些在农村苦苦劳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为“黑旗”、“小蒋介石”没人敢推荐，没人愿意接纳。我们中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时年龄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岁左右，返城后的窘况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伟生在公捕一年后公审判刑2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释放。夏伟生，这位提笔能作画、吹拉弹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面手已经精神错乱，出狱时前妻和女儿不敢相认，几年后凄惨地死于劳改场。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吁，终因势单力薄、证据不足，没人给予平反。

反思那段历史，李生荣和第一生产队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质上的损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后者，更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64、1965年几千西安知青抱着改造自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理想上山下乡。当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变成了我们这些亲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简介

魏宽达，陕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毕业于陕西省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因历史的原因于同年11月25日到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二小队下乡插队。1975年招工进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作，曾任该厂技工学校教务主任，现退休。

我莫名其妙就成了杀人犯

龚联宇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我正在凉山州普格县五道箐农场当知青，是农场一百多知青中的一员。正当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小青年热火朝天地开荒、种树、筑房建设新农场的时候，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那是 1969 年，新到任的革委会主任李肃仁来到了五道箐农场。他上任不久就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在我们知青中间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其中血腥和残暴的程度至今说起来都令闻者不寒而栗——知青们所流的鲜血，仅仅被李肃仁用来达到染红自己顶子的个人权欲目的。现在仅从我本人遭受冤屈的一例中可见一斑。

那时的我不幸成为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不但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冤屈，身体也遭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最后差点被判极刑含冤而死。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个黑暗年代，李肃仁的卑劣、狠毒、可耻。

事情起源于农场南充女知青罗某因感情问题想不开，而在一天夜里偷偷上吊自杀了。本来这是农场皆知，清清楚楚再简单不过的殉情事件。当时普格县公安局也派了两位公安人员来调查，并开了座谈会了解具体情况，并得出了自杀的结论。一段时间后，大家已经淡忘了此事。没想到这件自杀事件竟被李肃仁制造成了一起震动五道箐农场，轰动全川乃至全国，让很多知青想起来都胆寒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案。而跟此毫无关系的我，竟被打成了该案件的首犯！

死者的男友成为嫌疑对象。当时他正在跟我学小提琴，因出于师徒关系，我曾坦诚地问过他：到底跟该女知青发生过性关系没有，发生过什么过激冲突没有？他都断然否定。我轻信了他，并告诉他只要没有这些事，他女友的死就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并帮

他写过一篇《辩白书》(因为他只是小学毕业)。没想到幼稚的我的这些单纯的做法,竟成为证据,最后使我成为李肃仁所炮制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首犯。

原来,自杀事件正好给对知识青年怀着刻骨仇恨、伺机寻找专政对象而苦于找不到证据的李肃仁带来了绝好的借口。在那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黑白颠倒,混淆视听的年代里,他利用这件当事人已死,相关人物在他的淫威之下为明哲保身,只有嫁祸他人的有利条件,把这件本来与我毫无关系的简单自杀事件,硬是屈打成了多名知青参与的勒死女知青罗某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案。

从这事件可看出李肃仁的丑陋、卑劣、残忍的本性。他可以无视当事人女知青的《绝命书》,诬陷是我教她写的;他可以无视当时普格县公安局的第一次座谈会的调查结论,诬陷该会是我组织的人员参加(实际是农场各方面的人员都参加了的)。他没有任何证据,完全是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完成了自己杜撰的故事。

我与他无怨无仇,过去并不认识。他的目的就是镇压知识青年,想用无辜知青的鲜血染红自己,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达到升官的目的。

1970年元旦之夜,当时农场的知青自发聚在一起联欢唱歌,迎接新的一年。活动在高潮时,我正在拉小提琴,李肃仁就冲进来煞有介事地说:普格的反革命分子在暴动!然后又到了他的办公室,给拖木沟区政府打电话:农场的反革命知青在造反,请派武装民兵来镇压!紧接着他组织了一批打手冲进了知青联欢会场,挥舞着棍棒、绳索对手无寸铁的知青进行肆无忌惮的毒打和捆绑。荷枪实弹的区武装民兵也来了……这就是震惊普格的"一·一反革命事件"。有十多名知青被抓进了他私设的集中营——集训队。我也在"一·一事件"里作为重犯被抓进了集训队。

为了蒙蔽广大不知情的群众和欺骗相关的专政机关,李肃仁把我制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首犯,指使其打手对坚决不肯就范的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我经常长时间被迫跪碎瓦片、反吊在门框上毒打、打肋部,左肋被打断两根,为了自疗,我只能喝自己的尿。不准吃饭,不准睡觉地接受审讯,天天都是鼻青脸肿。晚上睡觉也戴着私制的刑具背铐……

集训队另有一人被李肃仁诬陷成盗窃犯遭受到残酷的毒打,他不堪忍受罪名和暴虐,上吊自杀了。这一件事,也被李肃仁加以利用,说是我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叫他自杀的,以此来威胁"革委会"。对我又是一顿批斗和毒打。我真是叫天天不应,身体和心灵遭到了空前的重创,我真想用死来解脱这些痛苦。我找过一位朋友,请他帮我找一瓶农药……但遭到了拒绝。我知道他是为我好,相信总有一天能澄清事实。

李肃仁又利用一些年幼无知的小知青写大字报制造舆论,并在他的导演下举行各种侮辱人格的批斗会,要我承认如何杀死罗某。面对莫须有的罪行,年轻而无辜的我怎会

承认？

李肃仁深知，没有我这个首犯的招供，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的故事就无法成立，也就无法达到他的目的。既然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李肃仁自己写了一张纸条：今晚查清①罗某不是自杀、是他杀，是龚联宇、袁某、孙某将其勒死后制造的假现场；②查清他们是怎么密谋杀人……然后李肃仁又指使一位女知青趁打扫审讯室的时候，做出同情我的样子，将这个纸条揉成团扔在我的脚边。当时他们正在逼我写怎么杀死罗某的交代，我看见纸团就拾了起来，展开一看就明白了，这明明就是给我下的一个不得不钻的诱供圈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自己的清白要维护，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和在经受着无止境的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的小环境里，我还能挺得过来吗？我不承认就很有可能被打死；承认了，还有可能暂时缓一缓。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按照纸条上的诱供方向交代了。

同时，我也深知那张诱供纸条将可能是最终还我们清白，并能够证明是李肃仁有意迫害我的重要证据。因此我必须设法保住它。但要怎样才能保得住呢？在那个黑白颠倒、毫无法纪的年代里，在我这个当事人身陷囹圄、没有自由、得不到清白而旁观者胆小怕事、不明就里又无法信任的情况下，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知青能保住这张诱供纸条吗？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集训队“犯人”在放风入厕时我碰见了同是集训队“犯人”的胡义迁（也是被李肃仁迫害的知青），他责问我：“你怎么会干那种事？”我说：“我是清白的。”看到周围没有打手：“这就是他们陷害我的证据！”把纸条塞给了胡义迁并告诉他：“请帮我保存好，这就是我的命！”

我于1970年4月被关进了凉山州普格县公安局看守所，成了一名等待枪决的死刑犯。离开了李肃仁暗无天日的统治，我理所当然地否认了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行。我一再提起申诉，凭着各种证据等待着时机，并揭露李肃仁残害知青、制造冤案的种种伎俩，让世人看清这一切的本来面目。公安机关也把那张胡义迁偷偷藏起来的诱供纸条从厕所墙缝里挖了出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成都知青胡义迁，他不但没有用这纸条去邀功请赏，还为证据的保护尽了自己的力量和道义，为这件冤案顺利澄清创造了条件。）

随着“十年浩劫”进入尾声，国家法制开始恢复，定罪开始注重证据。我被关押了四年多，于1974年7月和其他被冤枉的知青们终于得到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安排工作。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变成华发满头的老人，在每天逗着孙儿怡享天年之余偶尔也会想起那人生沉沦、法度全毁、人权被践踏的可怕年代，深感一个安宁、和谐、法制健全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多么重要啊！

作者简介

龚联宇，男。1965年成都七中高中毕业后在知青训练班学习，1966年2月下乡。1974年在凉山州昭觉工作，1986年在凉山州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退休。

误入"主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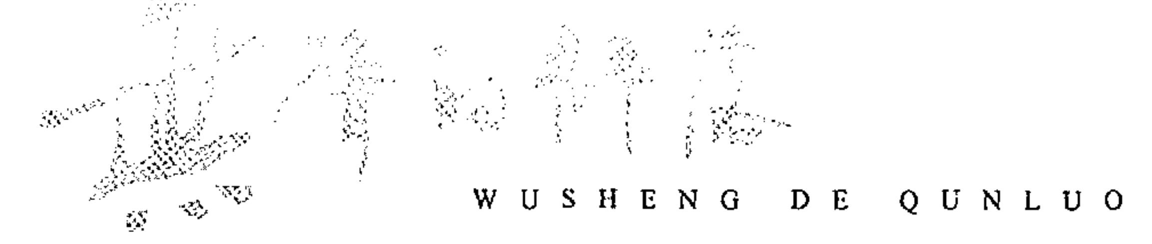
何隆华

1970年9月的大巴山，又开始阴雨绵绵，挖完红苕就该忙着种小春了。生产队派我下山去背化肥，在场上碰到一同插队的知青江志胜。他说："我们去公社革委会请赵文书喝一顿酒，再请他给出张证明，跟我一道去看看我哥，行吗？"我说："你哥在哪里？"他说："在广元煤矿，我妈妈写信来叫我去看看他。"

我一下兴奋起来，早就听说广元煤矿是国营大煤矿，我俩去一定能蹭到几顿饱饭，兴许还能吃上肉。连日里在阴雨天挖红苕，腰酸背痛的还真想出去走一走。于是想方设法搞了一斤酒，提起去找公社文书赵世荣。赵在酒精和肉麻的讨好话、恭维话作用下，大笔一挥，"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等等。下面是："兹有我公社革命知识青年江某某、何某某因事前往广元煤矿，请沿途准予食宿，特此证明"云云。落款南江县正直区胜利公社革命委员会，上面盖上一个鲜红的印章。我俩欢跳着跑回生产队去请假，信签纸写的证明不敢放在衣袋里，一直捧在手上，生怕弄花了上面鲜红的神圣印章。

背着干粮步行九十多里山路到了东凡，摸出证明走进东凡公社供销社小旅店，旅店管理员仔细分辨证明上的印章后，在证明上批上"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店住宿"并盖上旅店的章，才给我们登记。四角钱住一晚上的床位是供两人合睡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俩按计划在东凡至旺苍的公路上选择了一处坡陡弯急的地方埋伏下来，一边抖落身上的虱子，一边等候过路的货车。终于，一辆从东凡开往旺苍的货车来了，赶紧尾随而追，在汽车爬坡减速时翻身而上，上车后立即躲进车厢两旁驾驶员反光镜看不见的死角里。数小时后，汽车快到旺苍县城了，我俩跳车赶快逃跑，被驾驶员抓住是



要挨黑打的。接着就趁夜幕爬小火车，和一群盲流一起半夜扭开车门，钻进停在车站运耕牛的车厢里，忍受着牛粪的熏陶和耕牛的挤压。天快亮了，盲流告诉我们：如果火车头挂旺苍方向的车厢就赶快跳车，挂广元方向可以悄悄地不要动。经过小火车一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和耕牛一起抵达广元。

当我们在广元火车站下面的河边洗干净脸、整理好衣服，一脸从容地跨进国营广元快活煤矿的大门时，天色已经晚了。在接待室坐了一会，一位穿军装的干部匆忙赶来，看了看我们放在桌子上盖着鲜红印章的证明，客客气气地把我俩带到矿部招待所。干部说：你们先到澡堂洗澡，我去食堂为你们安排伙食。我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进澡堂，在空畅的澡堂里，热水哗哗地冲去淤积多年的猥琐与自卑。我和江志胜互相打闹着，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洗完澡，在食堂吃着热腾腾的菜饭和久违的猪肉，接着又躺在招待所干净、柔和、温暖的被盖里，我俩感慨得辗转难眠，当一名国企职工竟然是如此幸福。

第二天吃早饭时，干部又来核对我们要找的人的姓名。他到矿部去查了人事档案告知我们要找的人在七中队，并安排生活车送我们到了七中队。在七中队办公室，几名干部仔细研究了我们的证明后，进里屋去抱出一大堆档案来翻阅，一个干部突然神色严厉地喝道："江志胜，你和王复生到底是什么关系？"江说："他是我哥呀！""什么！你们两个为什么冒充外调干部？"我说："我们没有哇！""你们知不知道王复生是改造对象，人民的敌人！"

我俩一下傻了，糊里糊涂地我们成为了阶级敌人的同伙。这时，我悄悄抬头才注意到墙上到处是"抗拒改造，死路一条"、"阶级斗争要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越抓越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杀气腾腾的标语。我们被带到房间的角落站着，面壁接受训话：1.广元快活煤矿是省属军事管制劳改单位，阶级斗争主战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来的；2.王复生是有现行的被镇压地主阶级狗崽子，他小时候吃江志胜母亲的奶是压榨、盘剥劳动人民，王与江家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到处乱跑，更不能与王接触，以免中毒，必须限时离开。我俩一下掉进了冰窖里，幸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走得太突然。

我们空着肚子，垂头丧气地走在七中队到矿部的公路上，心里却在愁这几百里路，身无半文怎么能够回到生产队。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人慢吞吞地弯腰系鞋，当我们经过他身边时，他突然递给我们一个纸包，手指了一下公路对面的小树林，匆匆离去。我俩抬头看见树林里一个矿工打扮、瘦高英俊的青年在向我们招手，"那是我哥。"江说。打开纸包，里面是 20 块钱和一张写着"兄弟保重"四个字的纸条。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30 年悠悠离去。历经人生的坎坷和沧桑，这段经历我本早已淡忘。一天，江志胜在楼下喊："老何，我哥回来了！"我向门口迎去，未见其人已闻其

声。“砰、砰、砰”是金属与地板的猛烈撞击声。打开门，只见江志胜扶着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沧桑，拄着一根铁拐棍的瘸腿老人进来。“你还认识他吗？他是王复生！”江向我介绍。“哪个王复生？”我莫名其妙。“1970年我们去广元煤矿——”我恍然大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瘸腿老汉就是当年那个英俊小伙。“你的腿？”我指着他的下面。他摇摇头，“在里面，这种事太平常了，你现在看到的好多了，我在地上爬了一年多，总算活出来了……”

在他哥俩的摆谈中，我才弄明白，原来江志胜的母亲是王的奶妈。王的父亲在广安因地主身份被镇压，母亲病故，失去双亲后，江志胜的母亲把王当成自己的儿子带到重庆。初中毕业后，王在重庆港务局参加了工作。从小在江家长大的王一直把江家当自己的家，把江的母亲当自己的母亲，把江家的弟妹当自己的弟妹。不料“文革”中，港务局清理阶级队伍，原本是朝天门码头理货调度员的王，被查出其生父是广安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加上他本人不满港务局里造反队干扰生产，被造反派诬陷。批斗之后，军代表一张条子，就被送到了广元快活煤矿。

江家的兄妹都长大成人，结婚后分开外住，陪伴九旬高龄的母亲共度残生的竟是六十开外仍然独身的瘸腿养子王复生。中国人半个世纪后才开始修补与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亲情。梦醒之后不该再有噩梦。

作者简介

请见《南江纪事》后的作者简介。

迟到的鞠躬

张崇实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跨入省城长沙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初级中学，开始了自己的中学学习生活。

我清晰地记得教俄语的是一位小个子、面容姣好的女性——文老师。

文老师您还记得吗？第一堂课在自我介绍后您就开始给我们教字母发音。

当时，座位紧靠着教室门边的我，嘴里有一下没一下地附和着大伙，眼睛却盯着门外，饶有兴趣地望着不远处墙根前一对正在对眼争斗的大红冠子公鸡。

"张崇实同学，请你发一下'p'好吗？"不知什么时候，您站到了我的座位前。

第一节课就被老师以这样一种方式给记住了，我感到十分害怕与尴尬，脸一下就红了个透，嗫嚅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卷起舌头，用舌尖轻轻抵着软腭，抬高舌根部位，用力送气……"

朝外瞥了一眼，您顺手将教室门轻轻地掩上后，笑容可掬地鼓励我："别紧张，试试看。"

望着您诚挚而又慈祥的笑容，我轻松下来依次照做，蓦然，感觉舌尖在一股气流的冲击下发出一阵颤动，仿佛有一台小型发动机在口腔中轻轻轰鸣："嘞……"

"好，再来一次。"在您鼓励下，我如法炮制，再次用力，舌尖又一次颤动并发出悦耳的声音。课堂上掌声响起一片，我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

课后，您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轻柔地对我说："一般俄语初学者发'P'音时，在前面往往都不自觉地带有一个短短的'D'音，看来你还是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和悟性，只要认真学习，反复练习，终将会有所成就。"没有批评与指责，只有鼓励与开导，您亲切的语气

恰似一位老师妈妈。

由于自小耳濡目染熟练运用方块汉字，对于像蝌蚪和蚯蚓形状、干瘪单调的俄文单词，班上的同学大都提不起兴趣；于是一种“我是中国人，不愿学外文，英雄交白卷，好汉打零分”的奇谈怪论在班级中悄悄地浸淫滋蔓，学习氛围缺乏，学习效果和成绩可想而知。

对此，老师您并没有愁眉苦脸地对大家横加指责，而是谆谆诱导循序渐进地帮助我们提高学习外语的兴趣：您将字母谱成曲，让33个枯燥乏味的字母伴随优美的韵律鲜活地跳动，美妙的歌声和跳动的音符，将一些毫不相干的字母与声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排列组合成为一个个朗朗上口颇具想象活力的单词和短句；为帮助大家提高口语能力，您将课本内容编排成情景小话剧，分成几组与别的班级举行对抗竞赛，以此增加同学之间相互情感沟通与口语交流的机会。记得当时，我们同学在街头巷尾相遇时还情不自禁地使用表演剧中的对话，不断引来过往行人惊愕不已的目光。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您寓教于乐帮助同学们领悟学习外语的真谛，也使得我们对俄语学习的兴趣直线上升。

一个滴水成冰的中午，下课铃声响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打开自带的饭盒，望着冰凉生硬、难以下咽的饭菜正在发愁，您刚好路过教室来到我身边。

“哦，你在学校吃午饭？”您关切地向我问道。

当得知我家离学校较远，而不得不带中午饭到学校吃时，您皱了皱眉头：“饭太凉了，吃下去会伤肠胃的。来，到老师那儿去把饭菜热一下，顺便把所学过的知识温习巩固一下。”像是一位妈妈老师，话语是那么的温馨朴实。

就这样直到来年的春暖花开，您那简洁的宿舍成了我新的温馨家庭和双语对话的第二课堂。正是您的鼓励与帮助，我的俄语成绩和口语能力突飞猛进，每次考试与竞赛都名列前茅，年级中很多熟悉的伙伴都谑称我为“俄语小博士”。

由于家离学校实在太远，第二学年伊始，我要转学了。在办理转学手续时，您得知这一消息，特地赶来为我送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您将两个对于物质特别匮乏的那个年代说来还比较高级的塑料封皮单词本递交到我手中，殷切地叮嘱道：“发扬自己的特长，勤学苦练，持之以恒，以便将来用自己的专长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当时，我将您的话牢牢地记在心底并暗自立下志向。

想不到，再一次见面是在不可思议的时间及场合……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尽管学习成绩优秀，档案材料里阅卷老师的“可取北京外语学院”的批语上面被赫然盖着“不予录取”的方形小章，宣判了我与升学无缘而只能与大多数成分不好的同学一道被下放到广阔天地中脱胎换骨去洗刷祖辈的原罪。

1967年，正是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民主横遭践踏的年月，乾坤颠倒，斯文扫地：学生不复上课，工人不复做工，农民不复耕田。像大多数知青一样，我逃难回城，成为一名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一天，百无聊赖的我在街上闲逛，走近曾就读过的那所学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一行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打倒修正主义的卫道士、代言人文××"。熟悉的名字上被重重地打上了几个血红的叉。这不正是我那昔日的老师吗？回想以往的那段岁月，我的心感到一阵发紧，脚步也沉重了许多。

蓦然，前面十数米处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我的心又莫可名状地剧烈跳动起来：炎炎烈日下，身着被汗水浸透了的灰色衣装的您，正双手挥动着长扫帚清扫街道旁大字报的残片，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更显瘦弱，大汗淋漓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原本满头略带卷曲的秀发剃成了个"阴阳头"，一块硕大、画着三个大红叉的木牌搁置在街边转角处。

也许是街上的行人不多，也许是心灵感应，此时，您抬起了头，四目相对，显然您也认出了我——一个曾经充满些许期待的学生。

顿时，我心底油然升腾起一种久别重逢的冲动，立即快步朝前，欲对昔日的老师行礼鞠躬。然而，待走到距您咫尺之遥时，我停住了脚步……或许是因为当时您的处境与我心中的尊师形象相去甚远？或许是我没有达到您所期待的那样，而愧疚于内不敢与您面对？或许是当年的"小博士"如今的"乡下佬"会令您感到失望？或许……太多的或许使尚未成年的落魄少年脆弱的心里无法承载、难以判别。刹那间，我选择了逃避，内心惶惑不安而又默默无语地在您面前低头而过，甚至不敢回头，但分明感受到了一双充满期待而又颇感困惑的、如电的目光长久地射向我渐行渐远的背影。

岁月递遭，寒暑相推。当年那不谙世事的毛头少年现今早已两鬓飞霜。过往成长中的几多喜乐哀怨恰似过眼烟云，唯有那一次邂逅在时常叩问我的心扉。曾几何时，我寻访原来的学校，打算面见亲爱的老师。一来，感谢您曾经的教诲之恩；二来，就那相见不相认的懵懂之举向您致歉。然而，时过境迁，学校早已改换门庭，成为一所旅游中专学校，无人知晓您现在的去处，也无人知晓您现在的状况，寻访中仅仅得知一个震撼人心的往事细节：1968年底在欢送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即将登上远去的轮船前一刹那，在滚滚人潮的呼喊声和喧嚣嘈杂的锣鼓声中十分清晰地传来了您那独有的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的号啕哭声，那哭声是惋惜青春毁灭，还是抗议天道沉沦……

老师，如果您还健在的话，想早已步入古稀耄耋之年，所幸当年我们师生间各自所经历的遭遇与厄运，如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早已不再。

"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情。"值此今年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请您接受我

——一位学生迟来的道谢与鞠躬，并借此机会衷心祝福普天下所有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的老师们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张崇实，1965年湖南长沙五中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湖南省江永县。

秋天的故事

章孟杰

"……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

这是10月的一天，我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范读课文《白色鸟》。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几片枯黄的梧桐树叶摇曳着打着旋飘落在窗台上。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声音好大。待外婆回来，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他一个下午。外婆说：'听话，莫出事，没断黑不要回来。'……忽然传来锣声，哐哐哐，从河那边……'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

读到这里，我的喉咙哽住了，声音有些变调。学生们惊愕地抬头望着我，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篇课文是当代作家何立伟写的小说，讲的是十年"文革"期间，一位老人为躲避城里造反派的批斗，带着她的外孙子来到农村，但造反派仍没放过她，追到乡下。在知道即将被批斗的时候，这位慈祥的老人借故将外孙子支得远远的，不让他看到这残酷的一幕。当外孙子在田野上尽情嬉戏时，村里的斗争会开始了……

在现在的少男少女们眼里，这不过是一篇平淡无奇的课文，老师何以如此动情？他们不会理解这些文字在我心灵长河中掀起的巨大狂澜。愈合已久的伤疤被重新揭开，鲜血又缓缓地流出……

49年前(1959年)，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那也是10月的一天下午，刚上课一会儿，教室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班主任何兰贞老

师走到门口小声问了几句后，转身向教室里坐着的我微笑着说道："章孟杰同学，你爸爸找你。"我那时学习成绩优异，担任少先队中队长，老师宠爱，同学拥护，生活充满阳光。

我走出教室，看见父亲仍穿着整洁的蓝色中山服，手里提着铺盖卷等行李，似要出远门。他温和地对我说："爸爸要外出学习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月才回来，你和哥哥弟弟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担心。"我问他要走多远。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不太远。他接着拿出一叠钱给我，说是我和二哥今后的生活费。

那时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母亲正下放到南川县的一个农场劳动，大哥在重庆三中住读，年幼的弟弟因无人照料只好寄养在舅舅家，我和二哥跟当教师的父亲住在一起。

父亲说完就转身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名警察。但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并未留心这个情节。

放学后，我打开纸币，发现夹有一张纸条："放学后去找二哥，天黑前不要回家。告诉妈妈不要为我担心。"我看了一时摸不着头脑，要我去找二哥有什么事，父亲没有讲明，但我还是去了。

二哥就读的中学离家较远，恰巧那天他们被组织运废钢铁去了，我没找着，只好提前回家。在路上我迎面碰上何兰贞老师，她一把拉住我，紧张地问："小章，你父亲怎么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紧张，老老实实地说："爸爸要出去学习一段时间。"何老师同情地看着我，摇摇头走了。这时一个要好的小伙伴跑过来找到我，急切地说："那边广场上正在斗争你爸爸！你还不去看！"我一听顿时惊呆了，赶快随着他跑去。

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人，口号声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方挂着"揪斗反革命分子"的横幅，父亲和另几个人胸前吊着长方形牌子弯腰低头站在主席台前沿，他们身后站着持枪的警察，父亲胸前的纸牌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章祖德"。

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难以相信学识渊博、慈祥善良、走路连蚂蚁都怕踩死的父亲竟会是反革命分子！在我的眼里，白公馆、渣滓洞那些杀害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才是反革命分子。

我家祖籍安徽省滁州。950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被朝廷贬谪于此，逆境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从那以后，滁州人就形成了尚文的风气，人人以读书为荣。我曾祖父荣登进士后，被清廷任命为安徽省学台，更在全省兴学。生在书香世家，秉承先辈遗风，我父亲兄妹六人，就有五人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其中一个妹妹在南京大屠杀中，因反抗日本鬼子强暴，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父亲每忆及这段历史就悲愤难忍，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

若干年后，父亲劳改释放回家，我向他问起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来历。他告诉我，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中央大学流亡来川，毕业后应聘到江津县中大附中（由南京迁

来)当教员。那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的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避难来到江津县石墙院安身。父亲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出于对这位中国当代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敬仰,父亲与一批青年才俊多次上门拜访他,见他生活窘迫也曾资助过他。解放后,父亲在课余闲谈中曾向同事谈过这些往事。父亲乃一介书生,头脑里只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哪里懂什么路线斗争。他的这些谈资很快被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的人捕捉到,立马向党组织告密。胆敢同情并资助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这算是犯了大忌,父亲大难临头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日子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痛苦地思索:当历史都不幸成为反革命后,还有什么人不能成为反革命呢?潘汉年、胡风、彭德怀、刘少奇……无数的老革命家不都是这样罹难的吗?

当天晚上,二哥很晚才回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把看见的告诉了他,并拿出父亲留下的纸条,兄弟俩揣摩了很久都没弄明白文中的意思。

成年后,我才明白,一贯教导我要诚实的父亲这次却对我说了充满父爱的谎言,他不愿让我看到那残酷的一幕,他在尽最后的努力避免使我受到伤害,可惜老天爷阴差阳错使他这一善良的愿望落了空。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们兄弟的人生轨迹从这天下午开始发生逆转,我们沦为了"狗崽子",从此歧视、屈辱、痛苦、绝望伴随了我们整整23年!

几天后,母亲请假匆匆从南川县农场赶回,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几经周折,才打听到我父亲随劳改队在原中美合作所内的新建厂(即后来的松山化工厂,现已垮掉)劳动。

一个星期天,妈妈吩咐我和二哥去探望爸爸。爸爸是北方人,喜食面食,临走时妈妈特意烙了几张饼,包上过冬的衣物,叫我俩给爸爸送去。

时值深秋,气候逐渐寒冷,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我兄弟俩一路问人,好不容易找到新建厂。只见山坡上和山沟里到处是穿着浅灰色劳改服的犯人在进行土石方作业。接连问了几个人后,终于找到父亲劳动的地点。父亲正挑着一担土迎面走来。他身子本来较高,沉重的担子压弯了他的腰,于是他只能佝偻着身子像"苏秦背剑"式挑着担子踉踉跄跄地走着。

他看见我们小兄弟俩,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问我们是怎么找来的。我见他比走时瘦多了,满脸胡楂,浑身是泥,连耳朵上都沾着泥,那一定是跌跤所致,脚上满是稀泥已分不清穿的是什么鞋。父亲平素酷爱整洁,每天都要刮胡修面,头上从不会有一丝乱发,衣服上不会有一处皱纹,他每天都以最完美的形象走上讲台。他精通英语,在研究古汉语文学方面很有造诣,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可眼前的父亲跟其他的犯人毫无两样。

我和二哥心里都酸酸的,强忍住眼泪,把妈妈烙的饼拿出来给他。看见还带着微温的面饼,父亲双眼放出光芒,他用一双泥手接过去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他显然饿坏

了。

这时冷不防一个管教干部走来，他狂吼着："章祖德！你是来劳动改造的还是来享福的？"父亲低声申辩道："我的孩子给我送东西来，我刚坐下……"那管教干部又凶神恶煞地吼道："赶快去挑土！"他说着夺过我们手中包着冬衣的包裹随便往稀泥地上一扔，说："先放这里，完工后自己带走！"他转身又教训我俩："你们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不然也没有好下场！"父亲挑着担子，温和地对我们说："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说完，他佝偻着腰挑起担子又踉踉跄跄地融入劳改的队伍。我和二哥一路哭着回到了家。

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自古坚守一条信念：士可杀不可辱。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中，不甘受辱的邓拓、吴晗、老舍、傅雷、田家英、张闻天……成千上万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而父亲却在劳改营非人的折磨中幸存下来。是他懦弱怕死？是他担心自杀会给妻儿带来更大的灾难？还是他根本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我无从知道。但我想，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夺去你的生命，而是剥夺你做人的尊严！让一个知识分子生不如死这其实比一枪毙了他更残忍！由此，我深深地理解邓拓、吴晗们。

1962年的秋天，一身伤病的父亲被释放回家。那时全国闹饥荒，劳改营里死人太多，他们怕父亲死在那里给他们添麻烦，让他回街道接受监督改造。

街道上有一个叫阎春的"王大姐"（重庆方言"妓女"的别称），平时好吃懒做，靠卖淫为生，其名声在街坊邻居中臭不可闻，平时在路上和她相遇，人们都要捂着鼻子绕着走，生怕她身上的梅毒病菌会传染给自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批斗我父亲时是最凶狠的。她声嘶力竭地带头呼口号，蹦跳着用那双肮脏的手强行按着父亲的头，要父亲低头认罪。父亲脸色涨红，沉默着一次又一次把头昂起来。这"王大姐"恼羞成怒，使劲狂抽父亲耳光！这个平时被人看不起的女人是要用践踏反革命分子的尊严来捞回她做人的"尊严"！

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我和二哥1964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理所当然地落榜了，随后上山下乡去了大巴山社办林场落户，弟弟也于1971年赴云南支边。学业优异的大哥被赶出就读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发配到一家生产农药器械的小厂当学徒工。

看着孩子们的遭遇，父亲心碎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的历史造成的。为了使我们不再受连累，他和母亲协议离婚，搬到偏僻的歌乐山半山腰一间破茅房居住，由大哥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五元钱给他作生活费。

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天真了。尽管在离婚协议上注明我们都随母亲，和父亲从此断绝来往，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有什么用？我们身上已永世打上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烙印（天理良心，我家从来没有剥削过谁），这绝不是一纸离婚协议能改变得了的。为此，我们悔恨终生！

1967年冬，在经历了"文革"武斗的动乱之后，我从大巴山第一次回到满目疮痍的重庆。母亲告诉我，父亲现在生活极其困难，叫我第二天给他送点生活费去，联络方式已在信中说好。

第二天上午，我赶往接头地点——沙坪公园大门外。那时人们忙于派性夺权斗争，公园内游人稀少。父亲早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我，他转身朝公园里走去。我跟着他，保持20米远距离。父亲走到湖边一条石凳子上坐下，我确信无人跟踪后，也到石凳子上坐下。几年没见父亲，他更苍老了(那时他才55岁)，背更驼了。我心里陡然涌出一股悲凉。他欣喜地拉着我的手，眼光里充满慈爱："孟杰，你和二哥在农村还好吧？"我点点头。我看见他额头上有伤疤，就问："他们打你了？"父亲脸上立显出愤怒的神情："那些红卫兵简直是暴徒！""他们怎么会找到你那里？""地段干部告诉他们的。"从父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的遭遇。

父亲住的茅草房原本"不设防"，因为它没有门，家里也没有任何能让小偷感兴趣的东西，唯一值钱的是价值两元的竹壳热水瓶。红卫兵冲进屋里砸烂了一切，连一只破碗都没有放过，也顺脚踢爆了热水瓶。然后在屋里掘地三尺，因为他们相信既是反革命分子，家里一定埋有武器或值钱的金银财宝。当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父亲踢翻在地，用军用皮带暴打，要他交待把武器和金银藏在什么地方。在"文革"期间这种暴行随处可见。

父亲随后详细询问我母亲及几个兄弟的情况，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眷恋这个家的。我把每月五元的生活费交给他，并问他靠这点钱怎么生活的。他说只要天晴就要到街上去替别人挑煤球或干别的下力活挣点钱，平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减少开支。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句口号叫做"知识分子劳动化"，父亲应该算是践行这个口号的典范，不知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

临别时，父亲拿出一包新鲜蔬菜给我，说是他自己种的。我坚辞不收。父亲生气了，我只好含泪收下。

我回大巴山不久，他给我来信，信中说："……党的政策正确英明，我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遵守党和政府的法令法规，从未犯过任何错误，相信不久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看后唯有苦笑。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如果给"地富反坏右分子"平了反，那些热衷于斗争的人失去了斗争的对象，他们靠什么生存？

1976年7月5日，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的父亲，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溘然长逝于歌乐山腰那间破草屋里。死时圆睁着眼，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至今尸骨不知在何处。三个月后，"四人帮"倒台，可惜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2年10月，父亲离开人世六年后，他那为时23年的冤案才被推翻。

在人世间，人们总爱尽情赞美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春天，而人生的经历却使我独钟

情于秋天。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对春天的检验。你在春天播下什么种子，到了秋天就会收获什么果实。但春天的鲜花并不都是有益于人类的，比如罂粟花同样美丽娇艳，而秋天结出的却是毒果。

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秋天的故事。

作者简介



请见《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后的作者简介。

兵团战友阿蔡

董大南

2001 年夏天,我出差又回到多年未去的上海。

几年不见,上海的市容变化巨大,几乎不认得了。地铁、高速公路(还分内环、外环),我出国时连影子都还没有呢,现在全冒出来了。最显著的市容变化,要算那些高楼。原先的上海展览馆(最初叫中苏友好大厦,两国吵翻后改了名)、国际饭店,它们还在那儿,只不过夹在那些大高楼中间,像个小娃娃,完全不显眼了。

在上海忙完公事,还有一点时间,该看看老战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阿蔡。

天已擦黑了。多年没有联系,上海的电话号码早已从 6 位数滚到了 8 位数。听说阿蔡还住在原来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顺便再走一次当年常走的马路。记得当年我和阿蔡常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憧憬着将要去新疆过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滋味都有……

这是徐汇区武康路,两边冒出了不少新建筑,然而,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是那么熟悉。那条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缩在梧桐树影里。阿蔡家的小房子居然还是老模样,只不过显得更加破旧,也更加寒酸了。阿蔡家门虚掩着,一推开门,就看到轮椅上坐着阿蔡。他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件小东西。

"阿蔡,还记得我吗?"

阿蔡转过身来,目光有些迟钝。大概是为了方便轮椅移动,房间里就摆一张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张空床上。这样的摆设对来访的客人很不方便,还得把凳子搬下来才能坐。

阿蔡只犹豫了一会,眼睛里就闪烁出火花,当年的阿蔡又回来了。

"啊哈,×××,我当然记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没听过别人这么喊我,当年在农场,差不多每人都有个不那么雅的外号。阿蔡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会儿瞧我叫你的外号。

隔了这些年,我们都老了。阿蔡看起来发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据说下肢瘫痪的人,由于人体的代偿功能,会使上身发胖。当然,整天用手摇轮椅,上身锻炼的机会也多些,可能也是另一个原因。我总觉得小房间里少了些什么。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过世了,是前几年。我能给他们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呀。我白天有时到上海残疾人协会帮忙,当义工。"

"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还想问些什么。比如怎么做饭,怎么洗衣呢?怎么上床,怎么解手呢?就一个截瘫人怎么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什么也不用问了。

阿蔡的编制还在新疆兵团。他已经退休了,靠农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农场每隔三个月把退休工资寄给他。多年下来,农场的干部换了好几茬,寄工资的人也换过几个。新的人已不认识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云烟,被人遗忘了。有时农场忘了给他寄工资,他还得写信去,反复解释,折腾几回,才能把工资要来。

然而,阿蔡没有忘掉农场,更没有忘掉当年共患难的知青哥们儿。

阿蔡的记忆极好,他还清楚地知道有哪几个知青还留在农场,谁谁谁现在干什么。有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阿蔡就会提醒我。

"不记得了?当年和×××打架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把他忘了!不就是当年死追×××的那个吗?"

他还告诉我,一年前,回城的农场老知青们为纪念进疆35周年,特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真热闹,连农场的宁波知青也结伴来到上海参加聚会。谁谁把老伴也带来了,谁谁把孩子们都带来了。还有谁谁谁来不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随着阿蔡的叙述,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了。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

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像当年的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一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是，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嗐，别想了，那个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我要弄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

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也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二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分支边青年心情沉重，愁眉苦脸。阿蔡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心里没底。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 11 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

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喊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三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 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干什么好事不说也知道。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 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 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 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

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阿蔡跑哪儿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

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他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

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真是的，就记得我的外号。

"×××，你怎么这副模样？"

我也还了他一个外号，一比一，咱们扯平了。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窸窸窣窣，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

是非常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

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报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待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被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于是，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犯，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

子弹从阿蔡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五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但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蔡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待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战友们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会场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在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像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像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蔡，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写到此处，心里响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一支男声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冈，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不是幼稚可笑。

六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蔡要的是这个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还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待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待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得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蔡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值吗？ 12 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 12 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到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七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回到了 2001 年，回到了武康路阿蔡的小窝，两个饱经风霜的老知青还在长谈。

这十几年，阿蔡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阿蔡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组织”——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在这里，阿蔡结识了许多生理缺陷类似、生活困难类似的伙伴。残疾人协会一有活动，阿蔡总

是当义工,发通知,布置会场,加入拉拉队。在这里,阿蔡的生命又迸发出火花。

在多次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阿蔡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懂得用法律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开始了向法制社会的转型。有了法,老百姓的权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级领导就不容易胡作非为,有关人员执行政策就不好阳奉阴违。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这一切还是白搭。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违法乱纪的权贵欺凌,被愚弄、被迫害,却不知道如何申诉,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阿蔡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帮弱势群体讲话,为老百姓讨个公道。

上海图书馆,成了阿蔡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阿蔡借阅有关的法律书籍,教材,以及专业杂志,记笔记,做练习。

清晨,阿蔡的轮椅夹杂在拥挤的上班族自行车队中,在马路上缓缓地行进。用双手的力量,拨动载着全身重量的轮椅的大轮子,朝着上海图书馆行进。从武康路到上海图书馆的距离不近,然而,有了目标,拨一圈就近一点。只要坚持,目标就可能达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这样么?

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容易。阿蔡做到了。大部头的法律教材,啃下来了。深奥难懂的法学词汇,记下来了。国家规定,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必须通过一个什么考试,才有申请当律师的资格。阿蔡以自学成才、同等学力的名义报名参加考试,居然通过了。

离当律师的美梦只差一步之遥了。然而,这一步却像一道深壑,阿蔡无法逾越。弄不清是目前国家政策上有什么限制,还是阿蔡的身体条件有什么限制,反正阿蔡目前不符合当律师的条件,哪怕有了那一张证书也不行。

阿蔡没有气馁,他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他继续等待。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化,国家的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天办不到的,明天有可能办到。

阿蔡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临,夜上海灯红酒绿,下了班的人们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蔡却龟缩在这静静的小窝里,没地方可去,没有人交往,看看书而已。不孤独吗?

"阿蔡,你不想找一个伴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好小子,你又拿我寻开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蔡担忧,没有一点寻开心的念头。然而,对照现实,我问的这句话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经习惯了。”

阿蔡又补充了一句。

“在生活中慢慢接触了解，一切都随缘吧！”

我也补充了一句。

阿蔡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我为他高兴。

上海变了，新兴的高层建筑林立，崭新的市容连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识了。上海的人也变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那种装腔作势，三句话离不开“最高指示”的高调不见了。

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也显得更个性化了。当年把胸脯捶得嘭嘭响的“左左先生”，现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十分投入地唱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当年被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标签，吃足苦头的落后分子，现在却关心起国家大事，甚至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担忧了。

崭新的上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华丽的时尚、成功的人士、抢眼的新闻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遗忘的社会底层，还有着像阿蔡这样一批人。他们守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时间不早了，我向阿蔡告别。

我告诉他，今后回国时，我还会来看他的。

夜深了，我又沿着当年经常漫步的路，走着。

明天一早，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阿蔡又会加入浩浩荡荡上班的人流，喧闹的马路上，又会出现一辆轮椅，慢慢地向上海图书馆行进。



请见《通往新疆之路》后的作者简介。

在哥哥走后的日子里

孟企平

善良的人性，是暗夜中的月轮，虽然朦胧却给夜行人以勇气；是久旱中的甘霖，虽然稀少却给焦渴的土地以希望；是三九严冬中的阳光，虽然微弱却给饥寒交迫的人们以温暖。她更是岩石下的草根，乍看不见，但你翻开岩板，会看到在那么严酷的条件下，草依然在顽强地潜滋暗长，总有一天会冲破岩石的重压探出头来，点染出一片春色。

在文化大革命那腥风血雨、摧残人性的年代，人的天性中恶的成分被充分释放并成为主导，但善良仍在。在哥哥走后的那些日子里，是人性的点点星光照耀着我，给我勇气、温暖和希望，陪伴我走过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

1968年初冬传来哥哥去世的消息，使人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可能吗？哥哥孟铁强是1965年9月从长沙市五中高中毕业，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带队下放到边远的湘西南靖县五四园艺场的。在学校，他是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委员，下乡后他是团支部书记、知青队长，劳动不怕苦，事事带头干，为救火负过伤，出席过地区的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8年他还不满2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们的父亲早逝，母亲患癌症刚做过大手术，我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且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在家，还有一个因病弱智、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弟。长兄当父，哥哥是全家的主心骨，他怎么会弃我们而去呢？然而，与哥哥一起下放的知青学友吴镇泰的一封靖县来信却把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摆到了我的面前。天塌了！山崩了！地陷了！

哥哥去世的消息让人猝不及防。这消息太突然了，他不是一个多月前才在母亲的病床前告别，按通知要求返回靖县就地闹革命去的吗？虽然听说知识青年成立的群众组织成了运动后期清理打击的主要对象，县里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园艺场这个知识分

子成堆的地方，他也在受审查之列，但不是还有那么多同窗数载、同劳动又三年的同学，还有一条天天挂在嘴上的口号"相信群众相信党"吗？母亲和我天天牵肠挂肚盼来的竟是他的死讯？！不！不能让母亲知道！少年丧父、中年丧夫已经让她尝够了人间的苦楚，病痛折磨和无辜受辱又雪上加霜，现在老天还要把老年丧子的最恸加之于她吗？

哥哥去世的噩耗令我手足无措。不让母亲知道是很难的。一个亲人长期没有信息会令人生疑，何况我们所在的母亲工作的工厂有数百干部职工，人多嘴杂，"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是死人的大事，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国虽然科学通讯不发达，消息传播得却是出奇的快，上个月厂里一位女职工的丈夫在内蒙古草原上被另一派用马刀劈成了两半，不胫而走的消息不到半个月便传遍了各个车间、宿舍。加上母亲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使用范围极广的专用政治名词一直遗传到现在，只要你在中文计算机的键盘上输入"niuguisheshen"这一串拼音字母，它就会自动生成这个触目惊心的词汇），天天出门右臂上都戴一个黑袖章，上面一个大大的"牛"字。同事们有必要对阶级敌人抱有同情、保守秘密吗？想瞒，太难。想不瞒，更难！那岂不是要了母亲的老命吗？

怎么办？令人窒息的现实摆在了少不更事的我的面前。几夜无眠，无法可想，索性一咬牙，一跺脚，能瞒一天是一天！于是擦干了腮边的泪水，强睁开红肿的眼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悄悄地察看着母亲和周围的动静。半个月过去，居然风平浪静。母亲终于有些疑惑："铁强怎么快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每天跑到厂门口传达室去问，而每次得到的都是失望："如今到处搞运动，信哪里会及时啰？莫性急，再等几天！"几天又几天，几天是多久？分分秒秒牵动的是母亲盼儿的愁肠！

只有一个办法——造假信！而这又何其难。哥哥一笔潇洒流畅的好字，让我关起门来背着母亲苦苦模仿了十多个夜晚。然后把假信装进另一个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靖县的知青朋友吴镇泰——唯一可以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他把假信在靖县投递，信又寄到了长沙。那天，传达室的门卫终于给了母亲一个喜讯："你靖县的儿子来信了！"母亲扬着信兴奋地回来，急不可耐地撕开，在昏黄的灯下阅读，头也不回地告诉我和身边的邻居王姨："他们那里运动搞完了，园艺场解散，安排到了附近的塘湖大队，条件比园艺场还要好！"王姨惊讶地抬起头来："咦——不是听说……"话未说完，被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制止。"这个好消息我要赶快打电话告诉你姨妈，她担心好久了！"母亲匆匆出门去了厂传达室。王姨才接着把话说完："厂里人都在议论说，你哥哥在县里被挂粪桶游街，后来被逼自杀了，可惜一个好伢子！未必是造谣的？！"我回想起来，半个月来，许许多多异样的眼神，许多次欲言又止的神态，原来知道真相最晚的竟然是我们母子！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在路上，许多人走过来，不声不响地摸摸我的头、拍

拍我的肩，而在我母亲面前都守口如瓶，听她兴高采烈地复述每一封靖县来信的内容，附和着她的每一个评论。在她被监督劳动的车间里，人们默默地为她分担了劳作。在我家的窗台上，常常发现工友们悄悄送来的食物和用品。在批斗“牛鬼蛇神”的高台上，有人为她特别摆上一把椅子，而批斗主持人也视而不见，让她坐着接受批斗。我懂得：不管政治态度如何，他们都还是不忍心伤害一颗母亲的心啊！

然而春节临近，麻雀也要归巢，母亲去信要哥哥回家。吴镇泰焦急地把母亲的信转寄给我，商量对策。于是在正月初三那天，两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前，那是来自靖县的五中同学周学礼和湖南师院附中知青好友刘达旦。他们告诉母亲，我哥哥因为公社留他突击写材料实在是走不开，只能委托他们来看望母亲了。他们带来了靖县特有的雕花蜜饯还有腌制的杨梅，掂掂分量不够，又在厂外商店买了两个柚子。家徒四壁，母亲就剥了一个柚子待客，那柚子不知是什么孬品种，既酸又涩。但母亲一边大口吃，一边不绝口称赞：“靖县的柚子真好，又大又甜！你们快吃！”我实在咽不下去，托故跑出门来，对着旷野放声大哭一场。

不料这集体合力营造的善意的谎言竟然能继续维持下去。其间，靖县方面寄回了哥哥的遗物——一只破旧的皮箱，盛着几件旧衣、几本日记，此外没有片言只字。传达室悄悄地通知了我，我不敢拿回家，厂里开恩给我在集体宿舍安排了一个床位，好把箱子安放在床下。睹物思人，肝肠寸断。我噙着泪读完了哥哥的日记，那是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急切希望摆脱家庭出身阴影，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他批判父母，鞭挞自己，期望像哪吒那样把全部的骨肉都归还给生身父母，成为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新人，去赎前世的罪孽。母亲省下生活费给他买了一件衬衣寄去，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的城里公子哥儿穿的硬领衬衫，怎么能够在农村穿呢？怎么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呢？我要告诉妈妈，再也不要给我寄任何东西了，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建造新的生活。”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今天到县城挑粪，有位同学的粪泼了出来。我虽然用手帮他把粪捧回粪桶里，但动手前却还有着犹豫。分析起来，不是大粪臭，而是自己的思想深处仍然有不干净的东西，需要长期改造，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日记里表示：希望像当年“火线入党”的战士一样，用自我改造的行动来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哥哥究竟是怎样死的，我终于从一些他的知青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哥哥在知青下放前后一直是被当做背叛剥削阶级认真改造思想的典型来培养的。担任团支部书记、队长也好，选为学“毛著”积极分子也好，上面的意思是让他在知青中带个头，利用他的威信协助管理这些难管的知青。但是哥哥在返城期间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潮，开始反思社会和人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到靖县后，他再也不是原来老实听话的领头羊，反而参与组织成立了知识青年的群众组织，造了县委县政府的反，并提出了许多为知识

青年争取权利、改善待遇的要求，团结大多数知青在当地形成了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这大逆不道的行为触怒了当权者，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于是在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联合进驻园艺场、宣布解散知青群众组织的行动中，他很快被隔离审查，被挂上“知青反动组织坏头头”的牌子在全县大会上批斗，脖子上挂着粪桶游街示众。之后又押回园艺场监督改造，发动知青揭发批判。由于当权者扬言将立即撤销园艺场，对哥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所有知青分散，根据政治表现再次下放插队到生产队，在威胁利诱下，有的知青不得不昧着良心与哥哥划清界限，甚至有个别知青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哥哥。严酷的政治形势和相处多年、情同手足的知青兄弟反目成仇，使年仅 23 岁的哥哥万念俱灰，他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在批斗会结束后的深夜，乘看守瞌睡溜出监房投塘自尽了。当权者不准收尸，还张贴出了“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标语。几天后尸体有了异味，才由知青乘夜悄悄以芦席裹着就地浅埋。又过几天后，野狗刨开坟堆，撕扯出一些衣服和肢块，还是知青们再次培土筑坟。而园艺场所有的知青果然在不久以后就形单影只地全被分散安插到远离县城的公社生产队，曾经成为全县乃至地区一面红旗的知青园艺场从此不再存在。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责备那些屈服于压力的知青同伴，我们不能原谅的是那个时代和当权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俯首帖耳的走狗和奴才，一旦奴才走狗觉醒起来，要想摆脱奴性，做回自由人，他们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哥哥的悲惨遭遇就是极好的证明。

母亲大约听到了一点风声，写信要哥哥寄一张近照回来。幸而在哥哥留下的日记本里夹有一张在靖县的照片底片，于是到照相馆放大了头像，洗了一张“寄”来，照片里的哥哥依然是容光焕发，洋溢着青春朝气。母亲端详审视了半晌，高兴地说：“还好，看来救火还没有在脸上落下伤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吴镇泰来信说，同样没有出头之日的他要离开靖县转点去离长沙不远的望城农村，信，不能帮我转寄了。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收发过信件的都知道，一封信上必然有两个邮戳：一个发出地邮戳，一个收到局邮戳，不从靖县转寄长沙，这两个邮戳哪里来？情急之下，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伪造。用万金油的空盒子周边涂上黑油墨，盖在信封上，用细细的竹签蘸点油墨画出两道横线，再写上“中国人民邮政”和“靖 14 支”的细字，然后用毛边纸吸去多余的油墨，擦模糊了，就是靖县的邮戳。拿着这封假信跑到距厂不远的邮电所，递给值班的伯伯或是阿姨，他(她)们抬起头来似有所悟地看我一眼，接过信来，也不做声，“啪”地盖上个邮戳，顺手就丢到一堆刚收到的信里去了。

最困难要算我下乡的前夕。本来鉴于我家的特殊情况，1968 年知青大下乡时街道就没有催我去，反而安排我做临时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也只“三丁抽一”嘛。但到了 1969 年底，风声更紧了，母亲所在工厂派人到街道注销了我的户口，通知我下放湘

西永顺县。临行前,我找到厂革委会主任,请示是否厂里把哥哥去世的事情与靖县有关部门交涉清楚,通知我母亲算了,因为一旦我下到湘西,假信几乎就无法再造了。素来不苟言笑的主任一反常态地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号召,谁敢不积极?至于你哥哥嘛,听说是个不错的青年,运动的事嘛,一时也说不清。考虑你母亲的身体情况,还是不告诉她为好。你还是克服困难,下去后再想想办法嘛。"于是,这一套造假的工具便跟随我来到了湘西农村。白天,我的身体劳作在永顺的山林,到了晚上,我的灵魂却游荡在靖县的田野,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情节。而那些每两个月一封的靖县来信按时从永顺县寄给了在长沙与我母亲关在同一"牛棚"的"牛友",再由她们完成我没有做完的工作。与此同时,我还必须用另外一种笔迹书写我自己写给母亲的家书。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我和那些好心的人们会努力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然而,世上真没有永久的谎言,否则我愿意为购买它付出任何代价。最担心的事在我下乡一年以后终于发生了!

我母亲劳动的班组烧了一台小马达,却没有人承认,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很自然地落到了母亲这个阶级敌人头上。急于表现的生产组长组织了批判会,其实他出身地主,比我还差。见工人们都低头不语,他只好自己开了大炮:"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全家没一个好人,你丈夫、你儿子都死有余辜!……"如晴空霹雳,母亲被惊呆了,她再也听不见后面骂了些什么,她只是挨个地问:"告诉我,我儿子怎么啦?"从工友到领导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她只能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写信一问究竟。当这封信辗转到达我手中时,正是腊月二十六,我在大雪飘飘的水库工地上抬石头。我知道母亲希望我坚决地否认这个令人崩溃的事实,但我已经无法继续隐瞒下去了。写了回信寄出,我便立即请了假,赶了几十里山路,终于跳上了两天行程的长途汽车。当我在风雪里闯进母亲的小屋,母亲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坐在床沿边,捧读我的来信。母子抱头痛哭,那惨痛我至今不敢落笔。

直到林彪死后的第二年,靖县知青安置办给母亲单位来了一份公函,说"孟铁强同志被林彪、黄永胜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迫害致死,经研究,予以平反"。以后,厂领导又说要恨就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雪总要化,天总要开,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些作恶多端的家伙一个个死的死,关的关,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将要日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拷问。母亲厂里那个曾蹿红一时的生产组长也早就身染恶疾离开人世,而我历尽苦难的母亲却像一株遍体鳞伤的老树、一棵傲然挺立的枯草,以85岁的高寿顽强地活在今天!冥冥之中正应验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

狂风暴雨的日子终于过去,善良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和想象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一

个疯狂残暴的时代。但亲身经历过的我们却不会轻易忘记，哥哥的冤死，就是那个时代的罪孽的铁证。如今他孤独地长眠在靖县那块土地上了，在他的坟头上“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陶潜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40年过去，那仍然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永远的伤痛。我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中夭折的青年远不止他一个。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的悲哀，这也是一代人的悲哀，这是天下人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善良的人们啊，感谢你们曾经给我的关爱，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祝福你们，愿幸运之星永远在你们的前面照耀。我也祈愿人性的光芒继续照亮我的人生之路，直到那一天，指引着我进入天国，去陪伴我那亲爱的孤独的兄长！

作者简介

孟企平，男，1949年2月出生。1967年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五中学高中肄业，退学做临时工。1969年12月下放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插队落户。1973年在修建枝柳铁路时被招工到古丈县剧团。1979年调回长沙外贸企业。1982年—1985年以自考生身份不脱产学习，在广播电视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2004年在湖南省外贸系统工作，担任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公司经理等职。2004年因病内退。

南江故事

杨兴全

题　记

最感人的是历史的真实
因为它虽然粗砺却曾经鲜活地发生过
最折磨人的也是历史
因为它已经无可更改了
最诱惑人的还是历史的真实
因为它蕴含着对未来前途的昭示
为此——我愿为它付出所有的努力

砍树风波

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王远明、郑开忠、杨兴全等，都是1964、1965年由重庆北碚区到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林场的知青，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年底，开始解散社办林场，林场知青分散插队落户，几人或一人到一个生产队。这样，林场知青就全部拆散了。知青被安置在当地农户的空房或集体的房屋（生产队保管室）居住。插队落户中知青生活上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多知青家中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木凳、盛米的木桶、装衣的木箱也没有，更别谈其他的。一个字：难呀！

正是知青安置过程中当地干部的不理不管，才引发出了这场惨案。

知青王远明已与一女知青结为夫妻，他们与另一知青郑开忠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王远明夫妻被安置在一农户的空房中，除了在空房靠墙处用泥砌了一个灶之外，四壁空空。王远明、郑开忠就找到队上反映情况，请求队长帮帮忙，砍棵树让他们做点小家具。可时间一天拖一天，队里始终没有回复。王远明他们又向公社革委会反映此事，同样也杳无音信。当时公社的干部正为那点权成天钩心斗角，根本就没把知青的困难放在心上。就这样反复多次，王远明、郑开忠在万般无奈之下，就商议自己动手解决眼前的困难，反正没人管——砍树！

一场惨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天王远明、郑开忠在柴山看到棵较大的白杨树，满心欢喜，这么一来做点家具就不用愁了。二人忙回家提来斧子就开工了。“叮咚、叮咚”的伐木声敲醒了沉睡的山林，也引来了一位过路的农民。当树砍到一半的时候，这位农民赶了过来。“喂，做啥子的？这树也是你们能砍的？晓得这树是哪个的吗？”王、郑二人给问呆了。“你说是哪个的？”“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家的。”“不可能吧，这明明是生产队的嘛。”王、郑二人打量着对方，“你是哪个呀？”“我就是他屋头的，这树说是他家的就是他家的，就不许砍。”这下可把王、郑二人惹毛了，心想：“妈哟，比老子还横。”王远明道：“爬开点哟，你说是他的就是他的？这明明是队上的树。我还说是我的呢。别理她，老郑，砍！”那人一见苗头不对，转身溜走了。（这树后来证实确实属生产队。）

两人累了大半天，终于把树给放倒了，接着请了些社员把树锯开抬回了住地。三人（包括王妻）忙里忙外地款待社员们，又忙着商议该先做啥，后做啥。就在他们满怀希望扎根农村的同时，一场噩梦却悄悄逼近。

当生产队会计吴腾禄得知知青砍走了他看中的树时，心头的火腾地蹿了上来，心想，我吴腾禄看中了这棵树，队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知青！这不是明摆着当着众人扇我耳巴子（耳光）吗？大小我也是个干部，你才来的知青就这么横，要是以后再多来点知青那还得了？不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这帮知青。吴于是四处秘密找人，准备打王、郑二人。

1969年7月上旬某日，这天王远明家中好不热闹，知青、社员坐了一屋，谈笑声、斗酒声不绝于耳。这天是王远明儿子满百日的喜庆日子，再则好多知青自农场解散后还是首次聚会。正当大家沉浸在这喜悦之中时，队上一社员李某满头大汗跑了过来。李某是王非常要好的朋友，王正要埋怨他咋这时才来，他却把王拉出门，告诉王说：“不好了，会计吴腾禄约了好多人，带着凶器要来修理你。他们把东西藏在秧田边，他们正在薅秧，可能待一会儿会来找你。”“我又没惹他！”王远明感到不可思议。“唉，还不是为了上次砍树的事。”李某说。王气坏了：“又没砍他的树，还想修理我，知青怕过谁？”转

身就把这事告诉了在场的知青们。这下可炸开锅了，一下就激起知青们的怒火。“走，打死这狗日的！”（一群“大黄蜂”正愁找不到目标泄愤，你说这会计不是自找吗？）当时，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等几个知青一下子冲出房门，王远明、郑开忠就带着众知青来到秧田边。一群农民（全是男子）看到一帮知青冲了过来，全吓傻了，呆呆地站着。众知青上前就把他们手中，还有藏在田坎边的凶器全部收缴了，有铁剑、马刀、棍棒等。王远明叫正在田里的吴腾禄上来，吴这时心里害怕：“咋搞的？一下冒出这么多知青？王远明、郑开忠两人都已不好对付了，怎么又来……”他不知道今天是咋回事，只好战战兢兢地上了田坎。王远明见到那些凶器，心中那个恨呀，这不明摆着要置人于死地吗？见吴上了田坎，就忍不住冲过去打了吴几下：“格老子，为了棵树你还要整死老子嗦。”众知青见状忙拉开了王。众知青见吴已怕了，就商议让吴写份保证书，保证再不与知青为敌，不与知青起冲突（这主要还是怕以后王、郑遭报复），并限吴在下一赶场日将保证书贴到公社的黑板报上。吴见众知青都是些不怕事的主儿，又怕继续遭打当众出丑，所以满口好话一再承诺：“行，行，回去就写。”众知青见吴如此识趣，也就回王远明家继续庆贺百日酒。

7月15日，这天正值当场，赶场的人挤满了本就很小的大德乡场（属旺苍县）。知青们当然也不会放弃这难得的热闹、聚会的日子，况且还要买些必需的日常用品。茶馆、小饭店就成了知青们聚会的场所。王远明这天也在场上，先后遇见了肖润泽、吴行成，众知青免不了一番亲热打闹，来到茶馆闲聊起来，聊着聊着就扯到了王的事情上了。“走，哥几个，反正没事，我们去瞧瞧那吴小子的保证书去。”于是几人直奔一河之隔的团结乡场而去。几人来到公社一看，啥也没有。“狗东西竟敢涮老子坛子嗦。”王远明一时气不打一处来，转身返回大德场上，在场口遇上一本村农民，王问他见到吴腾禄没有，那农民说在场上，刚才还遇见的。王等人在场上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后街碰到了吴。王将吴拉到后街一僻静处就问：“你写的保证呢？要我嗦？”吴见场上人来人往的，离公社也不远，料想知青也不敢把他怎样，底气足了说话也显得从容了，“啷个嘛，忘了。”吴坦然地说。众知青那个气哟，立刻就一人给了他一巴掌，这几巴掌可把吴给打蒙了：“我写，我写，行了吧！”吴这时吓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连忙求饶：“我回去就写，下次赶场天我一定贴在公社，一定。”“那好吧，我们再相信你一次，要是下场再看不到你的保证书，绝对就没今天这么好说了哟。”众知青转身走了。

7月20日，又一个赶场日到了，我也来到团结乡场上。公社正在召开三级扩干会。在场上我遇见了王远明、郑开忠、万启超、肖润泽、吴行成等人。我问他们到哪去，他们就对我讲了吴的事，我说待会也去瞧瞧。王等就先去了公社，没见到吴的保证书。正巧吴也在公社开会，众知青找到吴，就拉着他到楼上公社社长艾永林那里评理。到了办公室

社长就问:“你们有啥事?”王就把砍树以及吴带人准备打他的事详细地反映给社长,同时也提到保证书一事。“我们今天就是要吴腾禄给我们个交代。”吴心想现在在公社,又是社长办公室,你几个知青还敢造反不成?谅你们也没这个胆,况且大小我也是个干部,这脸我可丢不起,所以就硬着头皮耍起横来:“不写,不写,就是不写,你们敢怎样?告诉你们,这里可是公社,这是社长办公室,这可不是街上,不是你们耍横的地儿!”众知青站在一旁,没想到吴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这可惹恼了在一旁的知青万启超,他一下从衣兜里摸出一把裁纸刀,顺势就扎在吴的大腿上:“狗日的,你还凶?”这时的吴才知道知青不是随便惹得的。吴哭丧着脸,用手捂着伤口连声说:“我写,我写,你们饶了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当时我正在公社同武装部长安怀和谈论二大队王砍树的事,商议如何善后,要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械斗,因吴已组织过人想打王远明,知青中也有人想打吴,这事可得妥善处理。正谈论间就闻楼上出事了,我和武装部长随即赶到楼上社长办公室,见公社书记何碧忠、社长艾永林都在场,门外站满看客。社长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书记何碧忠把我拉到一旁征求意见:“怎么办,老杨?现正在开扩大会议,这影响……唉!”“快,快把吴腾禄送乡卫生院。”我说。“那知青怎么办?”书记环顾四周群情激奋的知青,说。“等大家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再坐下来谈吧,”我说。可武装部长安怀和却非常激动:“谈,谈,谈啥子,在公社都敢杀人了,这还得了!”书记则说:“就先按老杨说的办,别把事态整大了。老杨,你先把知青的情绪稳住,稍后再谈。”

午饭后,双方的情绪都趋于平和,双方来到公社小会议室坐下,由书记主持会议,商讨解决办法。王远明就把为砍树所引发的事详细地告诉了在场的领导。书记总结了事件的根源,然后对众知青致歉:“这是我们的失误,这是安置过程中我们出现的漏洞。今后的安置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人、到户,保证知青们的住房,还有必备的日常用品。”又让王与吴握手言和,双方保证不再起摩擦。众知青听了书记的一番话后,心里感到特温暖,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挥手告别,回到各自的生产队。

谁知,几天后,一场灾难悄然而至。

镇 压

7月23日,公社财粮干事邓弟星急匆匆跑到公社办公室,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书记和武装部长反映。书记同武装部长在书记办公室接见他,邓说他刚从九大队返回,在路过筒车坝铁匠铺时,亲眼看见肖润泽、吴行成等一伙知青在里面打刀,还听见他们说下场要来抢信用社,并扬言要杀书记、部长和其他公社干部。(全是谎言。)

这邓弟星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邓弟星与知青惨案有何关联?为何要陷害无

辜的知青呢?

邓弟星,本地农民,为人奸滑、内向,处事不择手段而冷静。他初中毕业后在财会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安排为公社财粮干事,但他不甘心屈人之下,总想找机会往上爬。当时公社成立革委会,他削尖了脑袋四处钻营想当选革委会成员,抓点实权。可由于既不是公社头儿们的亲信,又没后台,结果落选了。他就把怨恨集中在了公社几位头头身上,准备寻机报复。作为财粮干事的他经常下队,在下队的日子里结识了九大队的社员周登科。周这人胆大,但头脑简单。后来两人结成了干亲家。周登科正好又是吴腾禄家亲戚,所以邓也时常出入吴家,同吴家关系很是热络。邓弟星得知吴被知青扎伤后,就与周、吴聚在一起商议如何教训教训那帮知青,出出心中的恶气(这些都出自当时的交代材料,笔者阅过)。当时邓已得知本区另一公社新店公社 7 月 17 日武装部长主使农民残杀知青二人的事,邓觉得机会来了,冥思苦想后,暗想:公社革委会主任何碧忠(也是公社书记),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头脑简单,大老粗一个,好糊弄;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安怀和,性情急躁,做事不计后果,也好蒙。要是能在革委会与知青中挑起事端,这样既能报吴的仇,又能把书记等人赶下台(邓弟星心中清楚,残害知青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就出现了谎报知青要抢信用社、杀公社干部的一幕。

何书记、安部长听了邓的报告后坐不住了,当即通知公社各单位召开紧急会议,书记就把邓汇报的情况在会上讲了,然后商议该如何对付这起突发事件,众人议论纷纷。在会上何书记也讲了新店公社打死知青的事,他说:"这伙知青太狂妄了,特别是万启超,上次在办公室用刀伤人的事还没找他算账呢,居然又敢聚众打造凶器图谋不轨。既然新店子的群众都敢与知青斗,我们又何必怕呢?既然他们要打死我们,不如我们先下手,把他们最凶恶的头头万启超整死,其余的都打他个半死不活,看他们还敢凶不!""不,要整就绝不能手软,要整就多整死他们几个。啥子王远明、吴行成、肖润泽这几个都可以整。"武装部长安怀和起身说。大家接着又商议该如何下手、组织人手等等,其间还有人提议要打残杨兴全(笔者)与另一知青方明仲。当即决定组织督战队,由公社治安员安兴德、刘祥生、张子林、徐世太等人为督战队队员,由书记、武装部长统一指挥。在整件事过程中,其他革委会成员无一人表态,公社社长也没表态。还有一人低着头坐在一旁悄无声息,他就是邓弟星,心怀鬼胎的他暗自高兴。接着书记又召集二、三、四、五、八、九各大队民兵连长火速到公社开会,让他们回队组织青壮年基干民兵,随时听候调遣,服从督战队的指挥。又派邓弟星回九大队找来周登科,让周找人去探万启超、吴行成、肖润泽的行踪,严密监视,有情况随时汇报。一切安排妥当后,何书记同安部长就打电话将此事向区武装部作了汇报,请示下一步行动。区武装部长安云德的回复让人瞠目结舌:"你们的手长来干啥的,是用来端豆腐的吗?"(作为高一级的领导,可悲可叹!就这句话就断送了三

条人命，也为自己招来八年的牢狱之灾，断送了一生的前程。）

7 月 24 日晚七时左右，各监视点相继回报一切正常，这几个知青都没外出。当即，书记、武装部长就召集督战队、基干民兵在公社集合，随时待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滴答、滴答"的钟声在死寂般的书记办公室回荡，门外候命的几十人也悄无声息，不时闪亮的烟头如同鬼火，恐惧充满在场的所有人的心中，好些人身子都在不由自主地哆嗦。他们知道要对付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那些在"文革"的武斗中亡命冲杀、经历沙场不要命的主儿，所以他们只能各个击破，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晚九点整，书记一声令下："出发！"由督战队带领的几十名基干民兵摸黑向八大队三队的万启超家扑去。

当晚万启超在家闲着无事，就想起了他的牌友、生产队长岳星全，到岳家打起了长牌，全然不知死神正悄悄地向他逼近。十时左右，督战队人马根据眼线的情报聚集在岳家大院外，在督战队的指示、安排下，几十人分成两组堵住前后门，又命住同一大院、岳星全的侄儿岳安德（民兵排长）先进屋下手。岳安德手持大马刀，双手藏在身后就进了队长的家门。万启超背对门外，听见有人进屋，转头一看是岳安德，就招呼："你也来了呀，来，来，大家一起打几把。"岳一言不发，上前一步亮出身后的马刀朝着万的头部就劈了下去。由于心慌意乱，这一刀却砍错了方向，把木桌的一角给砍了下来。万当时就愣了，忙起身闪在一旁。"搞啥子？我是万启超！""砍的就是你！"岳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举起马刀再一次劈向万启超。一道寒光直奔万的右肩，"嚓"的一声，万的右臂应声而断，鲜血像喷泉似的洒满了这间土坯房。万还没来得及叫喊，门外的打手一涌而入，手里的锄头、木棒雨点般击向已毫无抵抗能力的万启超，万当场就瘫倒在地。众人并未住手，继续击打不见一丝动弹的万。过了会儿，有人喊："别打了！人早死了！"众人这才从慌乱中缓过劲来住了手。岳安德叫身边的一人拿灯去照照看人死了没有，那人拿灯照了照，嘴里直嚷："死了，死了！"（事后这人告诉我，当时自己怕得要命，尿都撒在裤裆里了，哪里还敢看哟。）岳听说人已死，就说："快去找块板子来，把人抬出去扔掉，扔远点！"板子找来后，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愿意干这事儿。岳没法只好在人群里硬拽出位身强力壮的，过来把血肉模糊的万搬上木板，两人把万抬出房门朝着离大院不远的一处悬崖松林坡奔去。大约走了三四百米的时候，木板上突然传出万的哀求声："求……求求你们……救救我……快送我上医院吧……求……"话还没完万再次昏死过去。这可把两人吓坏了，"糟啦，还没死呢，这可怎么办？"同岳一起的那人吓得都快哭了。"管他的，抬到松林坡再说。"岳强压心中的恐惧。两人抬着万，胆战心惊地来到松林坡，刚把万放下，那人撒腿就跑，岳就喊："跑！跑啥子，给我回来，要不有你好瞧的！"那人被岳的淫威吓了回来，边走边说："是怕嘛，人都还没死。"回到原处已不见板子上的血人了，原来岳已经把还没

死的万推下了悬崖。正当两人抬着板子准备回去时，悬崖下方再一次传出了万的呻吟声，原来是可怜的万被崖下的小树给卡住了。两人头皮一阵发麻，"狗日的命还长吔，快，快去搬石头，砸！"两人手忙脚乱地搬来石块，一块块朝着那点微弱的呻吟砸去。一块接着一块，两人不知砸下了多少石块，"轰隆隆"的巨响在山谷中回荡，惊飞了宿鸟，惊醒了周边的山民。万启超就这样被砸成了一摊肉泥，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抹杀在大巴山的土地上！

当晚，督战队确认万启超已死后，马上带领基干民兵速疾扑向八大队二队，准备趁势除掉家住二队的肖润泽。到二队后，监视点的人就迎了过去，悄声汇报肖的情况，说："肖润泽家中今天来了好些知青，可能不好对付。"督战队员经过商议，怕打起来遭到众知青的反抗，众知青都是些亡命之徒，搞不好自个还得搭几条人命进去，所以决定当晚先撤，不动肖，派周登科负责，第二天在肖赶场的路途中埋伏人手，见机除掉肖。其实肖润泽家里只来了一位客人，是从八庙乡来的知青张大模，好友相见的激动当然不用提，可他们欢快的谈笑声却惊走了死神。

晚十二时左右，督战队率领的基干民兵潜入了八大队一队吴行成的住所周围。当时吴连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只好暂住在队上的保管室里，每晚队里都派一社员与吴一起照看保管室。当天值班的社员是岳云辉，事后回忆此事时，双眼里还不时透露出一丝恐惧。当晚他们很早就睡了，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吴大声问："是哪个？"听到屋外人声嘈杂，吴顿感不妙。这时屋外就有人喊："吴行成！快把你的刀扔出来！"吴说："我只有菜刀、柴刀，哪里还有其他啥子刀嘛。""把你平时在院坝耍的那把刀丢出来。"屋外人接着叫嚷。其实吴玩的是把铁剑，这把铁剑就是从二大队吴腾禄那伙人手中缴获的。"啊，晓得了，是铁剑嗦，等到，我找一下。"吴就下床找了起来。屋外一社员赵文清在督战队的授意下，在门缝架上了火枪。当吴把铁剑从门缝丢出的那一瞬间，赵文清的火枪也随之闪出一团火光，而后一声巨响回荡在山谷中。（我当晚像是预感到有事似的，整晚没睡好，这枪声也曾听到，当时以为是山民赶山放的枪。）这一枪正打在吴的脸上，一群人踢开木门就冲了进去，只见吴双手捂着脸，痛苦万分地蹲在地上连声叫疼。随着一声"打"字，无数的棍棒就落在了吴行成的身上，一阵"噗、噗、噗"的闷响伴着阵阵的惨叫声，萦绕在公房上空。全身是伤、疼不可耐的吴一边惨号着一边从棍棒如雨点般的屋内挣扎着爬到屋外的晒坝，而等候在门外的打手们也一拥而上棍棒齐下，活活将吴打死在晒坝上，让血淋淋的尸身暴尸于晒坝上才扬长而去。

打死吴行成之后，他们就向一大队我的住所进发，准备顺便干掉我。吴行成所在的八大队与我所在的一大队隔河相望，我家住在离河岸不远的小山坡上，河对岸的小径正是督战队回公社汇报战绩的必经之路。24日这天正值河里涨水，水势很大，加上又是深

夜，泅水渡河得冒很大的危险。可督战队却毫不顾忌，他们来到河边住户岳云义家，岳家人常在河边打鱼，水性很是不错，他们就想让岳云义的父亲带着他们渡河。可老人家跟我关系特好，待我就像他孩儿一样，他不但不愿领路，还告诫这群打手，知青可不是那么好惹的，说不一定那杨兴全手中还有家伙呢（枪之类的武器）？其实那时参加武斗时的武器全都上缴了，我最后的两颗手榴弹也用来炸了鱼。可他的儿子岳云义年轻气盛，不顾他爹的劝阻，带着十几个会水的打手冒险渡过了河（后来被老爹一顿狠揍），悄悄摸到我的住处。当晚，一两点钟时不知怎的我心里特烦，难以入眠，后来干脆搬来小凳在院坝里拿着笛子胡乱地吹了一通，而后又进屋生火炒了几个鸡蛋喝上了闷酒，结果把爱人给吵醒了，还被骂了一通。一群打手的悄然逼近我却丝毫没有察觉，他们潜伏在我家四周听着我与爱人对话，也许是他们太紧张了，听见我说什么炒鸡蛋，居然听成了什么手榴弹、地雷、手枪之类的，吓得这群人连滚带爬地溜掉了，死神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他们回去汇报说，杨兴全家里很是凶险，啥武器都有，别去招惹他。岳云义也说前几天还曾看见我用一支小口径步枪打过鸟呢！（其实那是武装部长安怀和让我帮他修的，早就还给部长了。）

7月25日（当场日）上午八点多钟，对昨夜的惨剧与险情全然不知的肖润泽与张大模准备去三队邀约万启超同去赶场，刚走到万启超家对面的一个山坡时，突然从旁边的树林中蹿出一大群村民，全是清一色的男人，有拿火铳的，有拿锄头锄把的，有拿刀棒的，为首者是九大队的周登科与邓弟星。周大叫道："肖莽子，站倒！"肖见几十个村民杀气腾腾的狠样就知不妙，转身撒腿就朝去区上的路一阵狂跑，村民紧追不舍，只留下惊魂未定的张大模。肖没跑多远，前面又出现一群手持凶器的村民堵住了去路。肖掉头朝一山坳跑去（地名阴弯），后面追赶的村民不停地狂喊："快，快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打死他，打死他！"肖本就跑不过常年走山路的村民，更何况在奔跑中，一双破胶鞋早就不知踪影，一双脚上扎满了草丛中的棘刺，血肉模糊，疼痛难忍。村民顺着血迹很快就发现了瘫在红苕地旁的肖润泽。周登科带人慢慢地围了过来，见肖手中有把三八式的烂刺刀，停住脚步，厉声叫喊："把武器交出来！快点扔过来！"肖没办法只好顺从地把刺刀扔了过去。周见肖现在赤手空拳已无反抗余地了，这才嚣张地大喝一声："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带头扑向手无寸铁的肖。面对这群村民，肖双手无力地护着头部，哀求这群双眼赤红的村民别打了。转眼间一阵刀棍雨就将他放倒在地，浑身是血的他不停地在苕地里翻滚，惨痛的哀叫声在山谷中回荡。肖在生命已快走到尽头时，再次哀求："叔叔……伯伯……求求你们，求你们别打我了，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是家里的独子呀！……求求你们啦！"谁知这群打手中有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八大队三队的社员张培和，因头上无几根毛发，被人戏称为"张秃子"，他把肖哀求声中的"独子"误听成了"秃子"，他的怒火腾地一下

就蹿了出来："狗日的肖莽子，死到临头还敢骂我，老子整死你！"说完举起手中的锄头，反过来，用"锄脑壳"对着肖的头部恶狠狠地砸了下去。一连三下重击，肖的头就如同摔烂的柿子，脑浆四溢，死于非命。又一条冤魂留在了南江的土地上！

7月25日上午，对昨夜的惨剧同样毫无知晓的王远明和郑开忠去公社赶场，刚走到公社小学旁，就见路边厕所板缝中支出许多黑洞洞的枪管，厕所里人影幢幢，惨白的夏日照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可喧哗声却无处不在："来了！来了！"两人一见黑洞洞的枪管已感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冲！别让他们跑了，打死他们！"一声叫喊，无数农民从旮旯处涌了出来，手中的火枪、大刀、木棒四处挥动着疯狂地追赶王、郑二人。二人见四面八方全是气势汹汹的农民，来路也给堵上了，只好顺着平坝狂奔到河边。河水虽退了些，可势头还是不小，二人不知在湿滑的石滩上摔了多少跟斗，鼻青脸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跃入河中扑河而过。后面的人群步步紧逼死命追赶，随着河中水花的渐渐消逝，疲备不堪的二人被围困在了大德公社塔子山上。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打手几棒就将瘫坐地上的郑开忠打翻，而后围着王远明就是一阵乱棒。人越集越多，棒如雨下，王远明甚至连一声哀号也没来得及就被打得晕死过去。这时，四大队社员马万发手持马刀大喊一声："闪开，看老子的！"照着王的脖子一连就是三刀。血流如注的王皮肉外翻，惨白的骨头露了出来。据郑开忠讲，第三刀要不是被一根较粗的树枝挡了一下，王远明的头很可能就被砍掉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有人传话过来："死了没得？莫要打了，书记和部长喊把王远明、郑开忠弄回去，开批判大会！"这时众人才住手，叫郑开忠背上王远明，下山回公社。郑背着血人到公社球场放下，王已是毫无知觉奄奄一息，郑全身衣物已被王的鲜血浸透。当天的太阳又凶又毒，一息仅存的王又这样被暴晒在球场上，郑束手无策地呆立一旁。球场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许多善良的村民早就被这血腥一幕吓得面无人色，更多的是在暗自落泪。当场也有一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女知青，他们的悲愤早已替代了恐惧，众人迅速集结在王、郑周围，知青刘桂伍找来急救包，同郑一起给王包扎伤口。

批判大会开始，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日子，公社那些害人虫被我们广大的社员降服了，公社往后也就太平了！……"接着部长发言："今天，我们齐心协力把一贯横行乡里的几颗毒瘤给铲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我们镇压了！……""什么是害人虫？啥又是反革命？"在场的所有知青愤怒了，"说清楚，这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谁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残杀知青，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面对知青们的责问，书记、部长愣在当场。知青们又要求道："快去找医生救人，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战友死去！"迫于无奈、害怕激怒众知青的公社头头们只有请来大德医院的郝医生给王远明缝合伤口，送往乡卫生院治疗，几天后伤情恶化，才被送往县医院，几周后才从死神手中把王拉了回来，王从此落下

全身病根，终日与药罐为伴。后来也是在众知青的强烈要求下，公社才叫生产队找了几块破木板将那三名死者就近掩埋了事。

7月25日下午，太阳渐渐西沉，我心中疑惑怎么今天没见队上的社员赶场呢？河边路上也不见赶场的人回家，我家可是队里上公社的必经之路呀。平日赶场天我家可热闹了，村民歇脚的、讨水喝的、还有打牌的，人可多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一个人影也不见呢！正在我思绪不宁的时候，门外路上闪过一道人影，出门一看，原来是一小队的社员萧明珠，神情慌张地疾步而行。我就更纳闷了，这小子平时最爱上家里坐坐，讨几支烟抽，今儿怎么跑得这么快？转眼间他已到我家侧旁的一道山梁上，他停下脚步，四面望了望，然后很是神秘地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啥子事嘛，做得神神秘秘的。有啥子快点说。"我慢腾腾地走了过去。"杨二哥，不得了啦，今天王远明在赶场的时候遭砍了，不晓得活得过来不。郑开忠也遭打了。安部长(武装部长安怀和)让我给你捎个信儿，让你这几天提高警惕，注意自身的安全。"说完转身匆忙离开。这时我已感到不妙，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我忙与妻子商议，准备出去避避风头。我急忙出门找来一要好的社员安平德，把被盖与一些衣物交与他，寄放在他家中。夫妻二人又心急火燎地来到队长陈兆裕家中，请求借点队上的公款返回重庆。当队长了解到情况后，对我说："别怕，你又没干坏事，怕啥，我看哪个龟孙子敢到老子队上打人！老子队上两百来号人又不是吃素的，要打，我们一起干，怕个屎呀！"为了安全起见，队长叫来副队长陈琪富，让他腾出房间，先把我们藏在他家。当晚十点多钟，我们就随着副队长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匿在他家里。

7月27日，躲藏了两天的我妻子就待不住了，她嚷着要过河去找万启超老婆玩儿(她们是很要好的姊妹)，顺便也打探一下情况，看看那边有啥事没有。(当时还不知万他们出事了。)我想这也对，就没拦她，她一人就下山了。妻子走后我就琢磨着王远明的事，可始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估计是不是他们在场上与人发生了纠纷，可为啥武装部长又派人来警示我呢？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拿出我自制的两颗手雷(准备炸鱼用，点燃导火索五秒钟左右起爆)，仔细地作了一番检查，以防万一。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妻子满头大汗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惊魂未定地说："糟了，糟了，快点跑！""啥子事嘛，你说清楚噻。"妻子带着哭腔说："别人讲，万启超他们遭打死了！""他们？还有谁呀？""还有肖莽子和吴行成！""啊！"这时我如雷击般愣住了。"快走吧！冯妈说那些人连我也要抓，说要逼你出来，各处埋伏了好些人！快点走吧！"我这才知晓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加严重。当即我俩决定马上翻过后山到石矿公路，搭车离开南江。我将手雷插在腰间，直奔生产队会计家里准备借钱出逃。

正在打借条的时候，队长带着六七名公社干部走了进来："杨二，莫慌，公社干部给你保驾来了。"我抬头一看，这几位平日里同我都挺要好，其中还有武装部长的侄子安星德。

"保驾？骗谁呀！是来抓我，还是来杀我的？"我怒气冲冲地说，一边警觉地拉着妻子缓缓退到门边。看到门外晒坝上空无一人，躁动的心情才慢慢地平息了一些。"万启超他们真的遭打了？"我问。他们很难过地点了点头，接着说："杨二，我们平时的为人你是晓得的。何况有些事我们想管也管不了哇，这次的事也不是要整所有的知青，也没有针对你。今天我们就是代表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的，主要就是让你们生产队保护你的……"正在谈话间我隐约听到屋外传来阵阵叫喊声，急忙转身出门来到院坝，吼叫声更加清晰地从山谷中传来，只见山下有许多农民手中提着东西，沿着河岸直扑我所在的小队而去。"走呀！快点呀！听说杨二在山儿岩，快点去打哟，别让他跑了呀！"这群农民直朝我家所在方向奔去。见着这一切，我心里一横，反而坦然了，心想：这些农民沿河而上到达我家起码也得走一两个钟头，况且我腰间插的那两个东西也不是吃素的，要是这是公社几爷子搞的鬼，老子先炸翻他几个再跑，整死一个够本，整翻两个赚一个！我转身点了一支香烟，望着随之而出的几位干部说："听到了噻，狗日的，喊到我的名字打，这就是你们革委的决定？"安星德连忙说："杨二，你不要冲动，这绝对不是我们搞的，真的不是呀。你要是不信，我们就在这儿陪你，等到晚上一起回公社，这总行了吧！"我说："那好嘛，我暂时就相信你们几爷子，要是扯拐噻，老子是不得认黄的哟！喂！有烟没得？给一包噻。""有，有。"区食品公司的老李摸出一包"朝阳桥"递给了我（以防万一呀！）。就这样我夫妻二人在惶恐中熬到了太阳落坡。傍晚，趁着天空中那丝微光，踏上了去公社的小径。前面三个干部领头，后面是另四人，我夫妻二人居中，一路无语，异常沉寂。天渐渐地黑了，清冷的月光洒满山谷，盛夏的燥热被这凄冷的月光所替代。虽说早已准备以死抗争，我还是感到一丝战栗。当我们一行人下到山脚河边，快踏出本生产队时，我点燃了香烟，在到公社之前让这拼命之火始终不离手中，我担心在平坝中遇到埋伏。

快到公社时，安星德就带着我们去武装部长二哥家吃饭，离公社也就一千多米。饭后才又向公社走去，刚到公社医院旁，一条黑影从路边蹿出，冷冷地喝道："口令！""消灭害人虫！"走在前面的干部答道。听到这口令我的手就悄悄地插入怀中（与我一起的这几个干部当时也猜到我身上有东西，他们也是一样的胆寒，事后全都骂我），没过多会儿书记和部长都来了。

到公社后我同书记和部长展开长达三四个小时的详谈，他们在谈话中提到7月23日知青在筒车坝铁匠铺打刀打凶器、要杀公社干部的报告。这时我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我说："糟了，你们上当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码事，7月23、24号河里涨那么大的水，哪个知青不要命敢过河到筒车坝去。部长你敢不敢过河嘛？是哪个狗日的说的，把他娃揪出来问就晓得了！"这时书记和部长才大梦初醒，哭丧着脸相互望望，又摇了摇头。看来他们感到事情的棘手了。谈话完后，部长让社长带我到一王姓社员家中休息，妻就留在

公社。社长一夜一直陪着我。我悬着的心这时才稍稍安定下来。

就在这夜，社长详细地把整个事件全告诉了我。他说他对此事早就产生了怀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道理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呀。所以他在这问题上只好选择沉默（因无实权）。这事将来谁也脱不了干系。翌日，天还没亮，部长就匆匆来到王家，单独给我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懊丧说："都怪我自己太冲动了，虽说请示了区武装部长，可事发后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后悔也晚了。我只好极力地保护好你同方大哥（方明仲），事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唉！"我冷冷地看着他那可怜样儿一言不发。当天又是赶场的日子，他们怕发生意外，早早地书记也来了，而后就让社长护送我们夫妻到远离公社的十大队山中一社员家暂避，直到8月2日。就在这几日里，公社领导不时来劝慰我，让我留下，可我坚决要求离开南江。

1969年8月2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他们终于妥协了。我们夫妻二人在治安员安星德等几位公社干部的护送下，离开了团结公社，再搭乘上南江至广元的班车，离开了南江。

公社怕出逃的众知青回来报复，于是调集全公社各大队的公积金，购买了许多钢管、火药，造了大量的土枪、土炮，日夜防守。一时间弄得全公社鸡犬不宁，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村民逃避外地。其实当时也真有此事，如不是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可能南江真的会死很多人。当我们夫妻二人到达广元时，广元已聚集了从南江县各处逃出的知青七八十号人，他们正在计划如何打回去。这时已经有人联系上了群众的派别组织广元铁路局兵团，铁路局有很多重庆籍职工，听说我们知青的惨况后，当即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支援我们武器弹药。虽是"文革"中的武斗刚结束，可他们的武器还没上缴完，居然还有几门迫击炮。由于种种因素使复仇计划流产，一场灾难再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南江县打死五知青的惨案发生后，县、地区的有关部门都没处理，但死伤知青们的亲友悲痛欲绝，不依不服，他们向县、地、省的有关部门层层反映、告状，但都没有结果。在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他们想到了告御状。原来，在被打死的知青中，有三人是重庆天府煤矿的子弟，而天府煤矿有一个矿工吴金全，是全国劳模，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又作为产业工人的代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于是，死难知青的亲属便多次到吴金全家中哭诉，要求申冤；天府煤矿的很多其他职工也要求吴候补委员出来伸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吴金全用了极大的勇气，向中央反映了南江知青惨案的情况。中央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今后还有以千万计的知青上山下乡，若残害知青之风不刹，"最高指示"何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出台了保护知青、惩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罪犯的政策，并敦促四川省革委、省法院认真处理残害知青事件。

1969年秋，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的亲自督促下，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撇开达县军分区、达县地革委，将残害知青的罪犯绳之以法。

事件中主要人物及其结局

万启超，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三队。

吴行成，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一队。

肖润泽，死难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二队。

王远明，重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郑开忠，受伤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一队。

杨兴全，笔者，知青，落户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一大队。

何碧忠，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书记，死刑。

安怀和，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死缓。

周登科，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九大队村民，死刑。

殷仕华，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二大队村民，无期徒刑。

岳安德，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八大队村民，有期徒刑十五年。

安云德，南江县沙河区武装部长，有期徒刑八年。

邓弟星，南江县沙河区团结公社财粮干事，有期徒刑七年。

作者简介

请见《不应忘记的少年沉冤》后的作者简介。

